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会史纲》

乔治-帕克-费希尔，法学博士，神学博士

耶鲁大学教会历史教授

原著出版日期：1887 年

《基督教会史纲》

乔治-帕克-费希尔，法学博士，神学博士

耶鲁大学教会历史教授

1887年

==========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GEORGE PARK FISHER, D.D., LL.D.

PROFESSOR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N YALE UNIVERSITY

译者注：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的基督教会与属神儿女

诗篇102：26-28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目录

++++++

第二阶段。。。。。。。。。。。。。。。。。。。。。。第 53 页
从使徒时代到君士坦丁
(主后100年-313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进展。

第一章。。。。。。。。。。。。。。。。。。。。。。第 53 页
福音的传播：罗马人的迫害。

领土的延伸

第二章。。。。。。。。。。。。。。。。。。。。。。第 60 页
教会中的管理和纪律。

教会的兴起

第三章。。。。。。。。。。。。。。。。。。。。。。第 67 页

基督徒的生活和敬拜。

福音。

第四章。。。。。。。。。。。。。。。。。。。。。。第 76 页
基督教文学和教义。

作品的特点

++++++

第四章。。。。。。。。。。。。。。。。。。。。。。第 116 页
教义的历史。

++++++

从查理曼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主后800-1073年).

第一章。。。。。。。。。。。。。。。。。。。。。。第 152 页
基督教的传播

第二章。。。。。。。。。。。。。。。。。。。。。。第 158 页
教会的政体，以及教会与民事政府当局的关系

在教会事务中的控制

第三章。。。。。。。。。。。。。。。。。。。。。。第 167 页
基督教的生活和崇拜：基督教的教义

无知与迷信

++++++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

从希尔德布兰的加入到协约的签订 (1073-1122)

第二章。。。。。。。。。。。。。。。。。。。。。。第 179 页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从《沃姆斯协议》到英诺森（INNOCENT）三世的死亡(1122-1216)

第三章。。。。。。。。。。。。。。。。。。。。。。第 188 页
教会的政体和政治关系

从英诺森三世的死亡到继任的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主后 1216-1294)

第四章。。。。。。。。。。。。。。。。。。。。。。第 197 页
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制度

新的秩序

第五章。。。。。。。。。。。。。。。。。。。。。。第 203 页
教义的历史

第六章。。。。。。。。。。。。。。。。。。。。。。第 213 页
中世纪的宗教和崇拜的某些方面的反差

++++++

++++++

第五章。。。。。。。。。。。。。。。。。。。。。。第 329 页
荷兰的宗教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第六章。。。。。。。。。。。。。。。。。。。。。。第 334 页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及其原因

第七章。。。。。。。。。。。。。。。。。。。。。。第 371 页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天主教议会改革

第八章。。。。。。。。。。。。。。。。。。。。。。第 382 页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基督教；和查尔斯一世：三十年的战争： 教皇制度：东方教会

第九章。。。。。。。。。。。。。。。。。。。。。。第 399 页
新教教会的政体和敬拜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第十章。。。。。。。。。。。。。。。。。。。。。。第 409 页
教义的历史

拉瑟派和改革派

第十一章。。。。。。。。。。。。。。。。。。。。第 432 页
基督教传教士

第十二章。。。。。。。。。。。。。。。。。。。。第 442 页
新教在美洲的定居点和社区

++++++

十八世纪英国的宗教和美国的复兴

第四章。。。。。。。。。。。。。。。。。。。。。。第 499 页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马天主教教会

法国革命至拿破仑垮台期间的罗马天主教教会

教会的状况；教会和神职人员在法国

第五章。。。。。。。。。。。。。。。。。。。。。。第 503 页
拿破仑一世倒台后的教皇制度：基督教在欧洲国家

第六章。。。。。。。。。。。。。。。。。。。。。。第 527 页
美国宗教教派的历史简述

第七章。。。。。。。。。。。。。。。。。。。。。。第 547 页
基督教传教士。罗马天主教在十九世纪

第八章。。。。。。。。。。。。。。。。。。。。。。第 562 页
基督教的虔诚和基督教的慈善事业

革命的时代、一群人的时代

++++++

译者附录。。。。。。。。。。。 。。。。。。第 583 页
历代罗马天主教教皇列表
历代法国统治者列表
历代英国统治者列表
历代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列表

++
++
++++++++++++++++++++++

_____

_____

_____

序言

我认为将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事实以一种不难读的形式纳入这卷书的范围是可行的。关于在这样一部作品中插入什么是明智的，排除什么是最好的问题，没有两个人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判断。我必须预料到，读者在寻找他们没有找到的东西时，或者在找到他们可能认为最好省略的东西时，偶尔会感到失望。

在两个方面，我试图使叙述特别有用。首先，我试图充分展示基督教和教会的历史与同时代的世俗历史的关系。将教会历史从人类的一般历史中分割出来是很常见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割的过程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我试图比一般人更清楚地指出政治领域的事件和变化与更严格地属于教会和宗教领域的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我认为有可能对神学教义的历史做一个相当完整的调查。诚然，必须进行压缩的陈述；但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占用多少空间，而是论述是否清晰准确。

至少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从出版社发出这样的作品时，人们自然会感到有些不自信。一个原因是，要想在如此广泛的领域中不陷入或多或少的不准确之处，是很困难的。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作者费尽心机地讲述真相，那么他最宽容的评判者就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们根据经验知道避免错误是多么困难。尴尬的另一个原因是必须对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事情，以及许多仍有或多或少争议的问题，作出判断。我充分认识到这种任务的责任，我只能说，我

是本着避免一切不公平的真诚愿望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在我看来，在存在意见分歧的各种问题上，坦率地表达我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要比采取模棱两可或沉默不语的做法更好。如果长期进行历史研究，可能会产生一些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如果对圣洁和爱的精神保持热烈的同情，无论它在哪里表现出来，这也不是一种坏事。

由于这本书不是专门为专业学生设计的，而是为一般聪明的读者设计的，所以我们抵制了对困惑或有争议的话题进行深入细致讨论的诱惑。例如，关于教会最早的组织，虽然我对哈奇、阿道夫-哈纳克、海因里奇、魏茨赛克等人最近进行的有关长老职位和类似话题的调查感到兴趣，但我没有记录任何结果，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结果仍在等待令人满意的证明。目前，我同意莱特福在他的克莱门特书信和《腓立比书》中的结论，尽管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进一步的启发。

免除脚注的计划使我无法偶尔参考现代作家对这个问题不同部分的看法，如果不是义务的话，这样做也是一种乐趣。除了尼安德、吉塞勒和其他已经去世的大师之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还有许多在世的学者，我无法向他们表示敬意，只能说是一个与他们从事相同研究的人的默默感谢。然而，我不会否认我自己对我博学而受人尊敬的朋友沙夫博士的著作的满意。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学生亨利-E-伯恩先生的重要帮助，他今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在我的要求下，在我的监督下，他根据我的讲课笔记手稿，承诺写出一些章节，然后提交给我进行修改。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在这些章节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是如此；因为他纳入了从他自己的阅读中得到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朋友威廉-L-金斯利（William L. Kingsley）先生在修订校对时再次给了我批评的好处。

G. P. F. 新港，1887年9月1日。

==========

==========

引言：

教会史的范围和分工

什么是教会史？

它属于教会的历史，描述十八个多世纪前在巴勒斯坦开始的、拿撒勒人耶稣是其创始人的团体的兴起和进展。教会史的作用是叙述基督的宗教在人类世界中连续几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当他的追随者寥寥无几，没有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明显前景时，他宣布他们是 "世界的光 "和 "世上的盐"。他把推进他已经开始的工作，即在人类中奠定神的国度的基础的任务交给了一小批被选中的门徒。在这个国度里，随着它的发展，人类将被他的精神所渗透，在兄弟般的联合中团结在一起，并"接近上帝"，他们共同的父亲。在这个由被救赎者组成的基督教社会中，古代的先知们已经提前瞥见了这一点，正义和爱的精神将取代所有自私的冲动和原则。神圣的想法是，新的王国不应该消

灭，而应该提高人性的正常活动，并在种族的文化和文明中占有真正的和有持久价值的东西。神的国度的概念，历史的理念和目标，是旧约宗教和福音宗教之间的结合点。以色列的历史指向并导致了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来了，不是〞只为那个民族〞，而是要成为全世界的救主。在他来之前，这个王国以其基本的国家（以色列国）形式存在。通过他，突破了它被限制在其中并暂时受到保护的外壳。通过他达到了成熟的精神形态，它就准备好了开始它的征服事业。

耶稣把基督教在未来的外部发展比作一粒芥菜籽的成长，因为它就在他的脑海中。它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一粒--微小的、无足轻重的胚芽；但它的产物却盖过了花园里所有其他的植物，成为一棵足以让鸟儿在枝头安家的大树。这个寓言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基督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领土进展。基督教的属灵效果，它改变人的思想和心灵以及改造社会的能力，耶稣把它比作〞藏在面团中〞的面酵的作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比喻中，教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归入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从这些观点的划分中，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研究。

首先是，福音是一种宗教，要传播的宗教。它不是〞隐居的美德〞，要由一群奉献者秘密地加以珍惜。命令是把它传给每一个受造物（世人）。在这个关于基督教传播的一般主题下，有一个关于迫害的叙述，即它的逼迫者将要用武力压制它，或阻止它的发展。传教士的征服有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代包括古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信仰，以及其境内异教的衰落。第二个时代包括未开化国家的皈依，特别是那些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国家，通过这些国家，罗马帝国被颠覆了，这些国家成为现代文明的标杆。第三个时代是路德改革以后的近现代时期。

第二个一般性议题是教会的政体的历史。从一开始，基督徒就团结在一个可

见的社会，有自己的官员和纪律方法。他们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组织系统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一个较简单的教会政府模式发展出一个等级制度的政体。在西欧，教皇制度就是从这种政体发展而来的。作为宗教改革的结果，新的教会管理方法更符合其精神。早期的教会，以及后来的各种基督教团体，或多或少都与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民事政府和教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合和分离，以及一种相互影响的巨大作用。这种教会权力与民事政府权力的关系，以及它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包含在目前的标题之下。

第三，基督教是一种教义。它的创始人的教导是呈现在权威的圣书中。因此，神学逐渐产生了。制定福音和构建基督教真理体系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内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激烈的辩论，并与教会以外的人和团体发生了许多冲突。神学家们努力为基督教下定义，击退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并根据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体系化地理解圣经的教义。因此，教义的历史以及信条和忏悔（信仰告白）的形成，构成了基督教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特的分支。

第四，基督教在其目的和效果上是一个实用的系统。它的目的是重新塑造其信徒的心灵和生活。它远不止是一个需要学习和背诵的信条。它是灵魂中新生命的源泉。它确立了规范行为的道德标准。新的道德规则、新的习惯、新的社会习俗从它那里涌现。它像春天的太阳一样照耀着大地，带来柔和的微风和山坡上的青翠。基督教在实际生活方面的全部工作，以及它的弟子们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格言和情感，都属于这个部门。这里是考虑已经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基督教经验的地方，以及像修道院这样的机构；是关于奉献与生命见证的研究分支。这里属于基督教慈善的记录。一般的主题是全面意义上的基督徒生活。

最后，基督教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自身所特有的崇拜形式。它们经历了

广泛的变化，或好或坏。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教会在其不同分支中的礼仪，以及在各个时代的仪式。其中的特殊主题包括教堂建筑、教会仪式、礼仪、赞美诗和教会音乐。

因此，基督教的历史影响的总和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福音传教、教会政体、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生活、基督教崇拜。

在叙述一个人的生活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他出生时周围的时间和地点情况。正是这些环境在他事业的起点上影响着他，并构成了他的人生轨迹的范围。我们在历史学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叙述教会的历史前奏时，我们在门槛处停顿下来，调查基督教诞生时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的起源时的环境。那个出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的救赎主，是马利亚的儿子，也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永生之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的母亲是一位犹太少女。他在一个加利利木匠的家里长大。在他身后有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要做什么，要受什么苦，等待他和他的追随者的是什么待遇，他和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他所呼唤的群体要采取什么样的特殊形式，这些都是天意已经规定的条件所要决定的问题。一条河流，当它离开它的源头时，是在一个宽阔的表面上蔓延，还是在一个狭窄的峡谷中发出它的全部水流，它的水是平稳地流淌，还是在一个陡峭的、动荡的洪流中下降，这部分地取决于它的道路被指定要经过的国土的构造。

历史上的年代划分应与发生特殊变化的时代相吻合。它不是明确的时间标点，而是事件过程中的转折点。

应决定分界线。教会历史自然分为三个主要时代--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包括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以及在日耳曼部落的迁移和征服期间。它的终点是在德意志血统的基督教君主卡尔大帝

（即查理曼大帝）的领导下，西方帝国的重建。古老的时代延伸到了前八个世纪（主后一世纪至主后八世纪）。在这个时代结束时，我们发现曾经由罗马凯撒行使的权力已被转移到新的横跨阿尔卑斯山的种族，现在与罗马教会结盟，并与教皇制度联系在一起，教皇制度以一种新的精神统治权取代了旧的帝国。现在，中世纪开始了，从查理曼大帝到路德和十六世纪初的新教改革，这段漫长的间隔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在中世纪，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与西方教会（罗马为中心）的联系逐渐被切断；（这种联系）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专制统治下处于瘫痪状态。东方的基督教团体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弥漫着一种昏昏欲睡的气氛。相反，在西方，这个时代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充满了变化。它的标志是拉丁等级制度和教皇制度的主导地位，然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教皇的权威逐渐被削弱了。在宗教改革中，教皇的统治权被日耳曼血统的国家所抛弃；传统的信条在圣经的基础上被重建；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之间发生了教义上的冲突；一个新的文化和文明的时代出现。在这种变化中，在调整哲学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过程中（译者注，从回归圣经为基础，摒弃古罗马亚里斯多德的经典哲学，以圣经为本源的认识论出发，重新审视自然哲学与方法论），出现了认真的调查和争论；而与此同时，福音显示了它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革工具的潜在能量，教会以一种新的热情参与了在异教徒国家中传播福音的工作。简而言之，这就是近代以来的特点，直到现在。一般来说，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可以被描述为教会历史的等级教会时期。这一时期，教会政体、礼仪、官方人物、复杂的教会系统的整个结构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在近代，其他元素，包括基督教的伦理方面，已经推进到前台。这种区别在过去两个世纪尤其明显，与中世纪的主流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在进行如此广泛的旅行之前，最好先对河流和山脉的边界线作一些具体的描述。

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每一个主要时代都分为不同的部分。

当我们沿着历史长河往下走时，我们会到达一些中间点，那里的河道会转向另一个方向，或者那里的风景会呈现出新的面貌。第一个次要时期涵盖了从教会的建立到使徒时代的结束，或第一世纪的结束。从这一时期到君士坦丁在主后313年颁布的宽容法令之前，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的（众多宗教中的）一个教派（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都有着鲜明的偶像崇拜、多神主义、泛神主义特征），受到法律的禁止，有时还遭受严重的迫害。然后，它的地位得到了保证；它成为罗马国家的主导宗教。

在这一时期的范围内，即第二世纪结束时期的最后几年，出现了另一个时代，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不那么明显，但却非常重要。这时我们发现，基督教会已经从异端党派中分离出来，并在主教制下形成了一个更紧凑的组织，特别的荣誉和信誉被赋予了使徒出身的著名教区，作为正统的支柱。这样，区别于后来的罗马天主教的旧天主教教会就出现了。在这期间分为几个时期。

从主后300年到600年，或者说从君士坦丁到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教会所宣称的基督教，以及通过会议所确定的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公认信仰出现在东方（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和西方（罗马为中心）。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从600年到800年，或从格里高利一世到查理曼大帝，福音被日耳曼民族接受，教会对这些民族的控制权得到确立。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教皇的统治权在西欧越来越多地被建立起来。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即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的时代，以及其对教皇权威的高级主张；他于977年成为教皇。

他开创了教皇统治的繁荣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或者说到博尼法斯八世的教皇统治时期，其威望和权威开始减弱。但即便如此，在新教

起义开始之前，也有两个世纪的时间，在这几个世纪里，产生那场大起义的力量正在慢慢聚集。因此，我们被带到了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的时代伴随着教义和政治上的争论，直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由此结束。大约在这一天，可以把最近时期的曙光放在这里。它的特点是哲学和文化的新精神，科学调查的传播带来的讨论，关于自然和启示宗教基础的辩论。它的特点还包括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展，以及传教士努力的重新觉醒。

以下是对教会历史进程的概述，与本著作的计划相对应。

第一阶段。基督教的开端，或使徒时代，至主后100年。

第二阶段。基督教的进步，直到主后313年的君士坦丁。

第三阶段。教会在罗马世界的最高地位，至主后590年。

第四阶段。教会在日耳曼民族中的发展，至主后800年。

第五阶段。教廷的发展：至主后1073年格里高利七世的教廷。

第六阶段。教廷在西欧的全面发展：至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执政，主后1294年。

第七阶段。教廷的衰落和改革运动：至主后1517年路德论文的发表。

第八阶段。宗教改革和不同基督教团体的冲突：至主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

第九阶段。文化、哲学和科学的新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和冲突；社会改革；传教士探索的新阶段：到现在（主后1887年）。

==========

==========

==========

==========

==========

==========

==========

==========

古代

第一阶段

使徒时代（主后1-100年）

==========

==========

第一章

世界的状况：外邦人和犹太人

时代

在基督诞生时，文明国家的状况有利于引进和传播一种新的宗教，其性质适合于所有人类。

在罗马的主权下，在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下，他们（罗马帝国）被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团体。世界经历了两个强大的文明机构的好处，即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统治。古老的神话宗教最初源于对自然的神化，现在已经衰败，失去了对智慧阶层的控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来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信仰的丧失产生了迷信和不忠这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都不令人满意，而且都与最好的思想相抵触。哲学在扩大和教育智力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但事实证明，它基本上无力保持宗教信仰的活力，无力抑制激情，也无力在困境中提供希望和慰藉。使徒对异教徒的描述是:"在世上没有希望，没有上帝"，这在这个时期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导致罗马帝国崛起的整个事件过程，在文明国家中产生并传播了一种挥霍无度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的。道德束缚的松动，恶习的盛行，不要说萦绕在邪恶中的灵魂的悔恨和良心的恐惧，不能不唤起许多人对需要更有效的约束的意识，——比起异教（偶像迷信与自然神话）的崇拜、希腊的文字和哲学、或罗马的民法所能提供的更有效的约束。人们或多或少隐约感觉到，他们渴望一种新的再生力量,这种力量应该以赋予生命的效力进入古代社会的核心。这个时代已经成熟，准备好迎接这样一个纪元的到来。"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当基督出生时，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历中为基督教时代的开始指定的日期之前四年，罗马帝国世界由奥古斯都-凯撒统治。他在首都和各省的权力实际上是绝对的,尽管它是在先前凯撒所颠覆的已灭绝的罗马共和国的形式下行使的。奥古斯都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和平的。在他统治后的第一世纪，曾多次被入侵的英国终于在主后85年被征服，一直到苏格兰的菲斯；后来在106年，多瑙

河以北的达契亚成为一个省。罗马的统治范围从该河延伸到尼罗河的流域和南部的非洲沙漠，并从大西洋向东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它们的不同特点在后来的政治分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更是将希腊教会（东正教的前身）和拉丁教会（天主教的前身）分开。政治特权的传播，包括罗马公民权的好处，逐渐将各省提高到一个共同的水平，并使罗马成为帝国的大都市。在皇帝的臣民中，成为罗马公民是一项令人羡慕的特权，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远处。它赋予了重要的特权。它是对防范各种侮辱和危险的一种保障。至少在名义上，它使拥有它的人成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

凡是有助于打破国家和种族反感的障碍、并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团结和连接感的东西，都为在宗教出现时对基督教产生的公正评价铺平了道路，并将有助于它的进步。这么多国家共同服从于一个政府，本身就在这个方向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除了外在的好处，如对生命的保护，以及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以及促进交往（这些都是罗马的统治所保证的），它的自然效果是唤起了一种统一的感觉。罗马法律体系，在有罗马公民的地方实施，是一种具有类似倾向的教育性影响。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相互影响，以及希腊和拉丁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不仅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思想，而且还有助于与拉丁人形成智力和道德上的共鸣的基础。在所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中，希腊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是最突出的。他们在文学、科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精彩创造，正迅速成为各国的共同财产。柏拉图合理地吹嘘说，虽然其他种族，如腓尼基人，一直致力于赚钱，但希腊人在智力和成就方面，比他们都强。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希腊文字在东方得到了广泛传播。主前332年在埃及建立的人口众多和繁荣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因为他而建立的。亚历山大城成为一个繁荣的希腊学习场所，是希腊和东方文化交融的中心。主前300年，塞琉古-尼卡托（Seleucus

Nicator）在叙利亚建立的安提阿（Antioch）是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东方的第二大城市。希腊自由的衰落和罗马人对希腊的征服，进一步推动了希腊人的文化在各方面的传播。在早期，他们的定居点散布在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希腊语最终成为商业语言，成为礼貌交往的工具，并成为罗马帝国所有东部地区的共同交流媒介。同时，拉丁语作为罗马官员和罗马军团的语言，被带到了罗马征服者和殖民地的任何地方。在亚得里亚海以西，特别是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拉丁语盛行，如同希腊语盛行于其他地方一样。

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罗马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旅行和交往得到了更大的刺激。这包括，文职和军事官员的旅行，以及军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交际活动。海盗行为已经被制止，现在和平已经建立，贸易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增长，犹太人在各地都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人们为了健康和快乐而进行了大量的旅行。罗马青年在雅典学习，参观埃及和东方的古物。各省的人都热衷于旅行和交通，乐于见到罗马。由于好奇心，并为了获得工作或大笔资金，为了购买和出售，为了寻找或提供娱乐，他们涌向首都。

由于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独立瓦解时，必然会对宗教信仰产生冲击。

那些没有保护和拯救怀疑论者的神灵在哪里呢？它们（众神）的崇拜者呢？这么多不同的宗教体系混杂在一起，加上其杂乱无章的各种仪式，往往会破坏它们（众神）从其教民那里吸引来的信任感。此外，智力的扩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哲学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神话传说和思想的怀疑。希腊的怀疑主义在罗马的教育阶层中蔓延开来。有教养的人想知道，那些偶然相遇的占卜者，是否能够彼此看着对方的脸而不笑。罗马官员的职责是监督各种众多的宗教仪式，他们私下里对宗教仪式和想象中的神灵以嘲笑的态度对待；尽管他们是在外表上看似庄严地进行那些宗教仪式。受过教育的人的这种不相

信往往延伸到自然宗教（即，那种基本的、自然的、敬神畏天的信仰）的基本真理，如上帝的存在和未来的生命（即，受过教育的人倾向于不相信这些东西，既不相信神灵的存在，也不相信人死以后的生命）。而那些哲学作家们，如西塞罗，经常尽量不去提这些话题。

古代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包括试图回答困难的问题，解决有关宇宙、人类和其他方面的哲学问题；二是包括对人类和其他方面的思考，他的命运，或者作为一种实际指导和安慰的手段。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高级部门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主前580-500年），一个神秘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并非没有高尚的思想；其早期的猜测只涉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在苏格拉底（主前469-399年）那里，灵魂是引人入胜的主题，美德和道德改善是关注的首要对象。他主张有神论、神圣的政府和天意、服从良知的最高义务、不义的罪过和愚蠢。他相信，——虽然不乏疑虑，——但他相信个人的不朽；然而他赞同对多种神灵的共同信仰，并过分强调知识或智力洞察力是美德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他的教学的认真和高尚，加上他作为殉道者忍受死亡的宁静，他发挥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他的学说基础上产生的两个主要体系是柏拉图（主前429-348年）和亚里士多德（主前384-322年）的体系。

古代的柏拉图哲学的崇高、灵性特征与福音的基调是一致的。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不仅认为物质是永恒的，而且还相信有一个 ″理念 ″的领域，即所有现实的模式或原型，并与神性并存。他把美德定义为根据人类能力的大小与上帝相像。然而，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无法提出关于上帝的适当概念，除了国家之外，他不知道任何形式的人类协会或兄弟关系，并且认为只有智力较高的人才能获得最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有神论者，他把上帝设想为运动的第一原因，沉浸在自我沉思中，并且具有不完整和模糊的人格。他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对实用道德的讨论上，尤其是在与宗教没有重要关系的各种科学中。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推测性的思想衰退了。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个人主义精神得到了发展；国家不再被认为包含了人类所有可能的好处；人们对人类有了更广泛的看法，并在世界的各种变异中寻求内在的力量和和平。出现的两个主要体系是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伊壁鸠鲁（主前341-270年）的弟子将幸福作为生活的目的和目标，并将美德与追求幸福的审慎结合起来。他们承认神的存在，但否认他们（众神）对世界的事务有任何兴趣。安提斯泰尼（约主前366年）的追随者、愤世嫉俗学派，他们的表现成为了对于苏格拉底的学说的讽刺；他们把对外在利益的轻视提升到了蔑视的极端,并对普通的生活舒适度不屑一顾。第欧根尼(主前412-323年），被柏拉图描述为苏格拉底疯了的版本，他的粗暴的苦行引起了他在浴缸或木桶中居住的故事，他是这个教派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斯多葛派并没有复制他们的先驱、愤世嫉俗派的过分行为。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主前358-260年）和克里西普斯（主前280-207年）宣布美德是最高的善。顺应自然的生活是他们的主要格言。理性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所有反叛的情绪都要被制服。个人要默许所发生的一切，而不在内心发出抱怨。斯多葛派的冷漠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动情绪；它是一种积极的、自愿的顺从。一个非个人的命运主宰着一切，但事情的进程是按照理性和规律进行的。世界在一个循环中运行；火是主要元素，所有事物都将在最后的大火中结束。圣人，从他自我的宁静的高度控制，平静地看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后来的斯多葛派中，该体系的严酷特征被软化了。斯多葛学派的人类兄弟情谊的思想在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主后50-120年）的著作中得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

在尼禄的导师塞内加（约主前3年-主后65年）身上，上帝的位格和世人未来生命的真实性得到了明确的承认；而在各种诫命中，这位哲学家呼吸着类似于福音的人道精神。斯多葛哲学对宇宙及其设计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观点。作为一个实用的系统，它缺乏谦逊，而且在其不加修饰的形式下，使人的心变得坚硬；但它在向国外传播人类形成一个单一群体的想法方面，有不小的影响。在其后来的影响中，它减轻了罗马法的严厉程度。

总的来说，在训练良知方面，古代哲学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旧约》中的律法。

它点燃了人们的愿望--例如，对人类更亲密的交流的渴望--只有上帝的国度才能满足这些愿望。在这方面，它不自觉地具有预言性。但在福音出现的时代，在新的柏拉图学派手中，哲学已经陷入泛神论（即，否认上帝的位格，而把自然世界与神等同）。当时有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倾向于在这里和那里摘取教义的碎片，并将各种体系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在宗教中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混合主义的倾向--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信条和宗教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塞涅卡和保罗（罗马书一章24-28节）一样，对奥古斯都时代的道德状况进行了黑暗的描绘。淫乱和残忍，是古代社会的特征。某些形式的异教徒宗教助长了这种恶习。希腊神话中不道德的故事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指责为对年轻人有害。由于自由的衰落和内部纷争，希腊的社会生活变得毫无生气。″个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远离国家，″并在道德上沉沦到 ″没有国家的人 ″的地位。在征服希腊和掠夺东方之后，罗马人的美德在奢华和感官的诱惑下让步了。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被盛行的不洁行为所感染。巨额资金被挥霍在豪华的宴会上。一些甚至无法描述的恶习被肆无忌惮地实施，而且几乎没有人指责。众多的奴隶提供了为感官放纵的无限的机会。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

奴隶们往往受到极端严厉的对待。杀婴行为被自由地容忍和实施。在罗马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中，舞台、马戏团和圆形剧场，道德的堕落是最明显的。舞台成为罪恶和腐败的学校。人们对角斗士比赛的兴趣与日俱增。在罗马和帝国的其他主要城市，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起，目睹人与野兽的血腥较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战斗。从苏拉和马利乌斯的冲突到奥古斯都的胜利，内战时有发生，不仅给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而且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勤奋工作和道德习惯。

即使在那个时代，古代社会的图景也各有其光明和黑暗的一面。然而，总的来说，事情的状况远远没有达到所希望的好的程度。对于普遍存在的社会与道德弊端，无法找到任何补救措施。因此，有不少人被绝望的情绪所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信仰失落的情况下，在黑暗和混乱的海洋中模糊地渴望着一个锚，许多人倾向于将目光转向东方，即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所在地，希望在那里找到光明和帮助。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危机中，救世主诞生了。

广义的哲学、科学、文化，是希腊人送给人类的礼物；法律和政体是罗马人留下的遗产。但 ″救恩是犹太人的″。他们自古以来就意识到自己在地上的民族中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有哪一个大国，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呼求他的时候，离他们这样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像这一切神启示的律法（旧约圣经）那样公义的律例和审判呢？″他们也没有失去属于他们的、相对于其他人类而言的、崇高精神地位的意识。但他们的民族独立已经永远消失了。他们已经被广泛的 ″地中海的君主 ″所吞没了。

从马加比时代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希尔卡努斯二世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受制于罗马人。根据他们的意愿和同意，希律，安提帕特的儿子，一个伊杜米亚的异教徒，被立为犹太国王。希律是个能干的统治者，但却是个暴君，他死后，他的王权被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主前4年-主后6年，犹太地的四

君子阿克琉斯被废黜，并被放逐到维埃纳。然后，犹太地区被并入叙利亚省，并由检察长统治，其中之一就是本丢-彼拉多。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希律的领地被统一在他的孙子希律-阿格里帕一世的手下。

犹太地区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发源地，也是犹太人在伟大的宗教节日中诉诸的圣地。犹太人在帝国的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大量的人口。许多流亡者在巴比伦长期定居，而不是随着以斯拉（主前457年）和尼希米（主前444年）的商队返回耶路撒冷。在北非亚历山大城及其附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一百万。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旧约》被翻译成希腊文（约主前250年），这个版本被称为七十士译本，在巴勒斯坦（即犹太地）地区以外的希腊人或散居的犹太人中普遍使用。在安提阿和叙利亚的其他地方，在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地中海的其他岛屿，在希腊的城市，在伊利里库姆，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城镇，犹太人大量定居。他们效仿法尼西亚人的做法：凡是有希望通过贸易和商业获得收益的地方，犹太商人都蜂拥而至。

自巴比伦流放的日子以来，他们的政治独立就被消灭了，除了在马加比起义（主前142-61年）时的一段很短时间；但犹太人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坚持着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政治统一的丧失产生了收紧种族和宗教界限的效果。先知们的时期--主前九世纪、八世纪，在与偶像崇拜的冲突中，在外国入侵的考验和危险中，以色列的信仰像火焰一样迸发出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期，何西阿和阿摩司的时期，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的时期，——（如今）已经过去。从以斯拉和重建圣殿的时候起，律法及其严格规定的仪式完全生效，祭司拥有最高的控制权。这段时期被称为 "圣公会 "或 "等级制度"--圣职者统治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尽管他们接受了摩西五经，但由于是混血儿，仍被视为异类和异端，受到犹太人坚定不移的抵制。

法利赛人坚持反对外邦人的错误和腐败，他们与撒都该人形成了（犹太人中

的）两个主要政党。

他们是党派，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派；法利赛人是最严格的正统派的代表。他们不仅坚持律法，而且还坚持围绕律法的大量传统解释。与他们的形式主义相混合的是一种强烈的、狂热的爱国主义。他们自然倾向于推理和争论，这就产生了伪善，并常常与自私的贪婪精神和对神圣的声誉的喜悦相联系。撒都该人的名字来自大卫时代的大祭司撒督，主要由祭司贵族组成。高级圣职人员一般都在他们团体中。他们对外国人和外国影响不那么敌视。他们把正典的权威归于摩西五经的法律。他们受到理性主义精神的感染，对盛行的弥赛亚盼望没有同情心，不相信复活的教义。这两派都有代表参加犹太公会，这是一个大法庭或宗教议会，具有司法职能，其所在地在耶路撒冷。与法利赛人有关的是文士，他们是圣书（旧约圣经）的教师和抄写者。第三派，可以适当地称为一个教派，是埃塞尼人，人数有几千人。他们主要居住在耶路撒冷以东、死海附近的村庄社区。他们有严格的组织，将体力劳动与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放弃婚姻和财产，他们有条不紊的纪律和固定的工作，使他们与后来的修道会或兄弟会有相似之处。摒弃祭祀，并以某种隐晦的方式召唤太阳，是他们与正统宗教的主要区别之一。

在巴勒斯坦之外的亚历山大，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犹太神学，其中柏拉图式的哲学与旧约圣经的教导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是通过对圣经的寓言式解释完成的。在亚历山大，我们称之为 ″伪经 ″的书籍被纳入了《旧约》正典。其中一本名为《所罗门的智慧》的书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犹太地）的犹太人推荐亚历山大的神学而写的。亚历山大犹太哲学的主要阐释者是斐洛，他大约生于主前20年。

犹太人的教育和崇拜中心是犹太教会堂，它们在流放期间和之后兴起。它们（犹太教会堂）不仅存在于巴勒斯坦（即：犹太地）；而且，在罗马帝国所

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都发现了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都有这些会堂。这些建筑是普通的、长方形的建筑物，要么座落在一个突出的地方，要么用一根从屋顶升起的杆子做标记。会堂是由〞长老〞管理的。在安息日，所有忠实的犹太人都在其中聚会祈祷，聆听和学习（旧约圣经）法律。

尽管犹太人因其排他性而受到憎恨，但他们在使人改信其宗教方面的热情却得到了关注，正如异族作家所证明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改信者分为两类--〞公义的改宗者〞，他们受了割礼，获得了生为以色列人的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特权，以及〞入门的改宗者〞。后者这些人被允许享有某些特权，条件是遵守所谓的七条诺亚克戒律，其中包括禁止不洁、禁止拜偶像和禁止吃〞带血的肉〞。

这样一来，一神教（即相信，有、且只有一位神，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主、全能的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就在罗马各省和其边界以外的地区扎下了根。伴随着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对律法的强烈奉献，犹太人普遍期待着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被颠覆的那一天的到来。他们渴望有一天，他们能从外国统治的可怕枷锁中解脱出来，统治权将转交给耶和华神的选民。此时，对（旧约圣经的）预言的解释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主旨上或多或少都有灵性。但普遍的希望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将摆脱可恨的罗马统治，并给以色列带来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宁和舒适。他的宝座将竖立在耶路撒冷。所有国家都要向锡安山上的圣殿送上他们的礼物和祭品。

==========

第二章

教会的建立

_____

施洗者约翰。

犹太人的大部分都渴望从罗马的暴政中得到解脱。少数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属灵祝福，-渴望良心的安宁和心灵的纯洁，这就是弥赛亚将带给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下，预言的精神发生了新的、巨大的爆发，这是神圣启示的最后时代。施洗约翰的传道引发了巨大的兴奋，这位先知以其严厉无畏的精神，以及粗犷的衣着和朴素的生活方式，让人想起他的前辈，古代的以利亚。在约旦河以西荒凉的地区（旷野），他向蜂拥而至听他讲道的敬畏的众人宣布主的迅速降临，并劝他们悔改。这时，耶稣基督也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受洗。约翰要拒绝给他施洗，并指出他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是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的一些门徒归附于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的事工就开始了。

基督的事奉持续了三年半，一部分在加利利，一部分，特别是接近尾声时，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普通人被他的教导深深打动，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有权威的人，从属灵直觉的深邃中说出来令人震撼的话语；而且是作为一个与天父上帝亲密交流的人；他宣布自己是被上帝派来的。他们被他的医治神迹，以及其他超自然能力和对人类痛苦的温柔同情的表现所震惊和打动。但是，当他拒绝支持他们对暴力革命和世俗王国的渴望时，他们很容易被（祭司长、长老、文士和法利赛人等等）说服，转而反对他。同时，法利赛人被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属灵的骄傲所刺痛，并害怕他们（法利赛人）的影响力被推翻，于是密谋要消灭他。犹太人领袖和民众的结合导致他被抓，在该亚法和彼拉多面前被提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耶稣基督）曾预

言和期待着这个结果：他看到嫉妒和仇恨的乌云越来越浓，预示着他头上的风暴即将来临。但他没有向罪人屈服，也没有向绝望屈服。他的爱也不能被他前来传道的对象的盲目和恶意所征服。他知道，尽管他死了，甚至通过他的死，天父通过他拯救世界的目的将得到实现。人们期望他作为罪犯的可耻死亡将是他事业的终结。尽管他（耶稣基督）试图让他的追随者为这一灾难做好准备，但他们（基督门徒们）还是感到悲哀和沮丧。但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从沮丧中清醒过来，并激发了他们所有人的喜悦和勇气。在他死后的第三天，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访问中，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即四十天）内，他向他们展示了自己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消除了他们中最难以相信的人对他复活的怀疑。他们对这一事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他们传道的基础。它使他们有勇气忍受排斥和死亡。它是基督教在世界历史上成为重要力量的根本基础。耶稣最后离开他们的视线之后，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大约有一百二十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从前的不信已经被耶稣复活这一明显的事实所征服。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十一位使徒，包括彼得，约翰；和被增补选上（代替叛徒犹大的）马提亚兄弟；在使徒的名单上，彼得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耶稣亲自给了他一定的优先权，这并不意味着规则，而是由于他作为领袖的品质而授予的。他冲动、急躁、热心，在突然出现的诱惑下可能会动摇，但在犯错后会迅速忏悔。在使徒历史的早期阶段，他是使徒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在一次一百二十人聚集的会议上，在彼得的提议下，有一个叫马提亚的人，他曾是基督的同伴之一，被任命取代背叛者犹大的使徒地位，与十一人一起为主的复活作见证。逾越节和耶稣受难后的第五十天（五旬节），在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了令人震惊和印象深刻的迹象，表明圣灵的存在和能力。这些都是神奇的表现。除此以外，圣灵永久地住在信徒的灵魂中，作为一种照亮和圣化的力量，使他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

随着五旬节的到来，"热忱的教会 "的事业正式开始。摆脱了胆怯的使徒们在

五旬节这一天的热情表现，对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到耶路撒冷的人群（因为这是旧约圣经中规定的犹太教重要节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根据路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描述，说方言的行为超出了后来在使徒教会中发生的、以同一名称描述的、发光、狂喜的言辞。这是彼得激动人心的演讲的前奏，在演讲中，将弥赛亚置于死地的罪责在他的听众中被强调，耶稣的复活和他在高处的统治被宣扬。就这样，使徒们开始通过他们的首席发言人向世界作见证。许多人--根据路加的陈述，大约有三千人--被彼得的劝告所感动，承认悔改并接受洗礼。

使徒和其他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相信弥赛亚已经到来，已经死亡，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并将以可见的形式再次出现。

作为虔诚的犹太人，使徒们：他们求助于圣殿，并遵行圣餐之礼，纪念基督为他们而死、而舍的身体、而流的宝血。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兄弟会，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们的皈依者成倍增加。在圣殿门口神奇地治愈了一个瘸子所引起的骚动，导致了彼得和约翰被带到犹太公会（宗教法庭）面前。这些文化低的人不加掩饰的勇气在法庭上引起了惊讶。他们被禁止以耶稣的名义传教，然而，他们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民众骚动的加剧和它在城市范围内的蔓延引起了对彼得和约翰的第二次提审。在这一场合，议会（犹太公会、宗教法庭）中的一些人表现出特别的敌意，但这一敌意被节制的、政治性的建议所抑制。使徒们被鞭打，并再次被禁止传教；但他们获得了自由。

很明显，事情相对和平的进程只能持续到门徒们被承认为一个独特的团体。这方面的一个步骤是由于希腊化的犹太教徒对分配救济金方面的疏忽的抱怨而采取的。这导致了对一类教会官员的任命；这类官员被称为执事，负责照看穷人。

司提反的殉道。

其中一位执事名叫司提反；他在向犹太人的呼吁中的表现，他在口头辩论中的胜利，特别是他阐述福音普遍性的方式--这被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错误地理解为对注定要消失的摩西制度的攻击--引起了强烈的愤慨。他被拖到犹太公会面前，被传唤回答指控者的问题，他迅速回顾了整个犹太历史，并对那些在谋杀正义者（耶稣基督）的过程中达到高潮的罪行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在愤怒的狂潮中，众人不愿再听下去，而是把他赶到城外，在那里他被用石头砸死，他最后的一口气是恳求主对于谋杀他的人的宽恕。

司提反被杀在新生教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它是一场迫害的信号，驱赶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把他们分散到邻近的地区。只有使徒们留在城里某个安全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被他们视为新团体和新王国的中心，他们放弃它是不对的，也是不合适的。

其中另一个执事，腓力，前往撒玛利亚，使那里的人皈依。在撒玛利亚，已曾经被耶稣亲自播下了好种子。彼得和约翰拜访了他们，并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因此得到了圣灵的特殊恩赐。通过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和他的几个朋友的皈依有关的情况，彼得因着神的启示而知道福音既是外邦人、也是受割礼者（犹太人）的救赎手段。

塞浦路斯（居比路）和古利奈的其他希腊派门徒向 ″希腊人″--也就是异教徒--传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徒行传11：20）。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为这一类门徒建立了一个核心，而巴拿巴本人是塞浦路斯人，也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被派往那里照顾这一新的行动。

在将福音传到犹太教以外的地区方面，最令人难忘的事件是大数人扫罗的皈依，或称保罗。他是作为一个严格的犹太法利赛人长大的。他是一个赞许司提反被杀的旁观者，并以狂热的态度参与了迫害基督门徒的工作。正是在从事这项残酷的工作时，他完全相信自己所作的是一项宗教和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启示给他，让他 ″在异教徒中传讲他″。他到了大马士革；但犹太人的敌意迫使他离开了那座城市；接着（主后38年）在耶路撒冷对彼得进行了访问，在那里保罗还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在大数停留之后，在巴拿巴的请求下，他去了安提阿（主后43年），在那里与快速发展的外邦人教会相关的工作中提供帮助。大约在这个时候（主后44年）发生了约翰的兄弟雅各的殉教事件，他被希律-阿格里帕下令杀害；彼得被囚禁，然而神迹使他被释放了。此后，主的兄弟雅各--不是十二个人之一，但实际上具有使徒的地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务中起了主导作用。

安提阿基督教会的力量和热情表现在派遣保罗和巴拿巴，以及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作为他们的伙伴，在小亚细亚东部地区的布道之旅中，一同进行传教。

他们首先访问了塞浦路斯，在那里，执政官塞尔吉乌斯-保罗信了主。然后他们航行到潘菲利亚海岸的西斯特鲁斯河口，靠近佩加；从佩加出发，他们前往皮西迪亚的安提阿，从那里向东到以哥念，一直到利卡尼亚的路司得和特庇。他们回到阿塔利亚，然后直接驶向安提阿。传教士所到之处，都引起了骚动。犹太人的敌意被激起，特别是由于使徒们通过福音向外邦人提供救赎。在一些地方，异教徒在犹太人的劝说下加入了对传教士的攻击。但许多人皈依基督信仰，教会也被组织起来。这是保罗第一次闯入异教徒的领域。

保罗对耶路撒冷的第三次访问--第二次访问是为了向犹太教的弟兄们运送救济品--是一个对基督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教会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后52年，安提阿的教师们必须与使徒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皈依的异教徒以及他们与摩西律法的关系达成谅解。弥赛亚的国度是包括外邦人的，这一点是所有人都认为的。但皈依的异教徒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也在增加，其中有皈依的法利赛人；他们把对旧约摩西割礼律法规定的顽固执着带到了基督教社团。旧约应许的意义是什么？在弥赛亚的国度里，犹太人的优先权是什么？如果异教徒不先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的方式成为以色列人，作为犹太人又有什么用？耶稣并没有通过明确的教导来解释新国度将采取什么形式。但是，他所说的：——宗教的属灵性质，把功劳放在外在仪式上的愚蠢行为，他自己比安息日和圣殿更优越，他所来引入的更高类型的崇拜，对他的信仰是唯一必要的东西，——这些都包含了摧毁犹太礼仪制度的种子。通过他的死亡和他上升到天上的永生和属灵的宝座，它（旧约的预表）的作用得到了实现。它（旧约的宗教）在历史上被破坏了；但在圣灵的启迪和天意的教训的影响下，它被留给了时间，以实现它的衰落（从而被基督的救赎恩典的实质所成就）。

保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决地坚持福音的自由和普遍性质。他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一样，首先把好消息传给自己的同胞。但是，当他所访问的地方，他们以轻蔑的态度拒绝相信耶稣的呼召时，他转向了外邦人；福音受到了他们（外邦人）的欢迎。向他们（外邦人）提供的救恩并不以他们要戴上（旧约的礼例）律法的枷锁、通过割礼进入犹太教的范围为条件。哥尼流和其他一些人被承认为弟兄，但他们的人数很少，情况也很特殊。当整个社区兴起时，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些社区中不需要遵守特有的（割礼）仪式。犹太基督徒希望他们的同胞（异教徒以及希腊化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皈依，他们出现困惑和犹豫是很自然的。当时有严重冲突的迹象。

然而，所威胁的分裂被避免了。保罗和巴拿巴首先与使徒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私人会谈，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作为一个团体与耶路撒冷教会会面。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彼得、雅各和约翰，对保罗的教导没有任何不同意。当他们看到他（保罗）所取得的成功时，就向他和他的伙伴伸出了友谊的右手，并向他们祝愿上帝的到来（同在）。我们注意到，支持普世教会的主要论据与哥尼流事件中、神说服彼得的论据是一样的。很明显，神的灵充满了保罗的布道：好的果实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教条式的理论都无法阻挡这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天堂的裁决已经给出。当时为与保罗的关系所指定的理由是对大公无私的激励，也是对狭隘的长期斥责，直到永远。

犹太教徒要求保罗的同伴之一提多受割礼，他的父母是希腊人；对此，使徒绝对拒绝遵守。提摩太的情况则不同，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在这个后来发生的案例中，没有原则问题：不涉及外邦人信徒的权利。在安提阿教师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上，彼得--鉴于他先前得到的启示，可以预料到--站在自由的立场上发言。雅各随后赞同他所说的话，引用了先知阿摩司的一段话来支持彼得的观点。他补充说，给皈依的外邦人 ″找麻烦 ″是不好的。但吩咐他们不要吃献给异教神的动物的肉，不要吃血，即动物的生命，这在摩西制度中是神圣的，不要吃被杀的动物身上的血，以及不要通奸，这就足够了。如果这种道德上的违法行为不是指乱伦婚姻，那么在如此简短的禁止事项目录中提到它，表明不洁之罪在异教徒中是多么普遍，多么不受谴责。这些建议中没有任何与保罗的想法不一致的地方、或者他认为是对他的皈依者所要求的自由的缩减。保罗自己很满意（译者注，请见哥林多前书9章）。雅各为这些限制提出的理由是，旧约的律法总是在会堂里读，这可能意味着需要促使犹太基督徒不会有忘记其要求的危险。然而，更普遍的理解是，如果皈依的外邦人不能戒除令人厌恶的做法，就会在所有犹太出身的人中激起对他们的强烈偏见，就会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交往的障碍。

保罗在罗马。

保罗完成了去罗马的夙愿，作为囚犯被运到那里，他曾向凯撒发出呼吁。他在地中海失事后，被抛到马耳他岛上，在路加对这次航行的生动而准确的描述中，他安全地去了首都。在那里，他被允许在自己租用的公寓里接待那些希望见到他的人。关于罗马教会的形成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保罗在他后来写给罗马人的书信和从罗马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中都没有提到彼得，这表明把教会的建立归功于他（彼得）的（天主教）传说是虚构的。这一点甚至被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学者所承认。犹太人有可能在五旬节皈依，或在第一次迫害中被赶出耶路撒冷，找到了他们的首都，并在那里形成了教会的核心。它包括犹太和外邦的基督徒。在他们中，有犹太化的反对者，但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信徒对保罗抱有同情和尊重。在此期间，在罗马写下了《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意味着从监禁中释放。在他第二次入狱前的这段时间，他似乎去了马其顿，并两次访问了小亚细亚；他最远曾到过西班牙，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第二次监禁是保罗之死，因他的殉道而结束。他是在尼禄统治末期，即主后67或68年被处死的。作为一个罗马公民，我们可以假设他是被斩首的--可能是在门外，在通往奥斯提亚的路上。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像使徒保罗那样，在智力和道德上站在如此高的高度。在那个时期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事实比他坚定不移的信仰更崇高。他在罗马世界的许多大城市中，形成了从安提阿到罗马的链条，建立了教会，这些教会组织起来，相互沟通，并通过他们的慈善募捐（如果没有其他方式），与耶路撒冷的母亲教会联系在一起。

尼禄的迫害，主后64年。

就罗马统治者对教会的迫害而言，其动机并非是宗教热情或不容忍。在第一世纪，尼禄和多米蒂安的残酷行为源于个人怨恨或自私的利益。此后，主要

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即希望压制一种被认为是违反法律并具有分裂性影响的宗教。正如莫姆森所解释的那样，排除新宗教的法律，就像排除抢劫或任何其他罪行的法律一样，写在罗马法规手册上。这些法律的执行程度取决于地方法庭的意愿，或取决于罗马中央当局的提示，无论是严厉的还是温和的。

记录在案的第一个明显的异教徒敌意的例子是尼禄时期的迫害。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了这一事件。从他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徒当时作为一个独特的教派是众所周知的。尼禄因其残暴的暴政而受到憎恶；为了避免自己被怀疑放火烧了罗马，也许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他指责基督教徒点燃了火焰，使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化为灰烬。塔西佗补充说，最后人们对尼禄的凶残迫害的这些受害者感到同情，尽管他们被认为是有罪的。至于此时基督徒在各省可能遭受的其他残忍行为，我们没有真实的资料。

尼禄所激发的恐惧和恐怖，使他在30岁时就被自己亲手杀死—成为凯撒家族的最后一个人。

犹太战争，主后66年。

在保罗去世的时候，罗马的犹太战争--其结果是提图斯占领了耶路撒冷--已经开始。

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被提图斯的士兵投掷的火种所毁，是对犹太教的致命一击。

不确定的是，在耶路撒冷被提图斯占领后，犹太人的崇拜仪式是否被允许在耶路撒冷举行。可以肯定的是，在哈德良时代（主后135年），犹太人在一个自称是弥赛亚的、名叫巴尔-科查布的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激烈的起义，这次起

义被巨大的屠杀所粉碎，旧的（犹太教）仪式被完全排除在该城（耶路撒冷）之外。大部分犹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敌意，以及对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审判命运，通过骇人听闻和天意的行为，使他们的命运灭绝。

在犹太教的支持下的新王国的胜利希望破灭了，而犹太会众中实行的摩西仪式的主要支持也随之破灭。基督教会在外邦人中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约翰的福音书和书信与保罗的著作一样都是普世教会的语气。耶稣的宗教已经打破了旧约制度的束缚链。

当我们考虑到使徒们传道的结果时，我们看到伟大的事情已经产生了。对一些人来说，使徒们所创造的神迹和奇迹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些人，如在加沙的埃塞俄比亚皈依者，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多么符合古代的预言。"对许多负担沉重的人来说，基督教所宣布的上帝的平安在无望的处境中带来了希望，在软弱的地方带来了力量，一种有吸引力的影响使他们超越了所有的疑虑和困难，甚至在哲学家的嘲笑声中。与善良的基督徒交往，瞥见他们安静的家庭美德，再加上像保罗这样的人不畏危险的勇气，激起了对上帝的渴望；基督曾暗示当门徒们让他们的光芒照耀在人们面前时，这种渴望就会出现。福音的大肆宣扬和随之而来的强大的宗教觉醒，产生了最非凡的鼓动"。正如我们所见，在耶路撒冷，数千人同时接受了福音。在皮西迪亚的安提阿，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听保罗讲话。在以弗所，为戴安娜制作神龛的银匠们担心他们的生意会消失。女神面临着被她的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耶路撒冷、安提阿、哥林多、以弗所和罗马的基督教会都非常大。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塔西佗告诉我们，在罗马，基督徒有很多人。帖撒罗尼迦的呼声是，使徒们把世界颠覆了。保罗可以说，福音已经传给了每一个受造物（世人），并在全世界结出了果实。启示录表明，“皈依者的人数非常多"。如果有人说他们一般是来自于穷人和受苦的人，那么这并不是一致的事实。他们当中有属于皇室的人。在教会中，有富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妇女，

如腓立比的吕底亚，甚至多米提拉，多米提安的亲戚。也有一些社会声望杰出的人。"如塞浦路斯的执政官塞尔吉乌斯-保罗斯；马耳他的罗马统治者普布利乌斯；曾在罗马担任执政官的弗拉维乌斯-克莱门特；以弗所的亚细亚官长，或亚洲的主要官员；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雅典阿罗帕古斯会议的成员；埃拉斯托斯（Erastus），哥林多的公共财务官；凯撒利亚的百夫长科尼利厄斯；医生路加和提奥菲勒斯，他的著作（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就是写给他们的；克里斯普斯（Crispus），哥林多犹太会堂的统治者；以及犹太人中的犹太公会成员、法利赛人和犹太教祭司。"

教会组织的基础是信徒的兄弟般的平等。"你们都是弟兄"。与其说是圣职者秩序，不如说是一个普遍的祭司制度（信徒皆祭司）。

谈到了 "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以色列的 "会众 "相呼应，这是旧约读者所熟悉的概念。他（耶稣基督）将成为这个教会的建造者。一个基督门徒对另一个基督门徒的抱怨要向 "教会",即以基督使徒们为首的门徒团体提出。他（基督）命令使徒们监督羊群，以及洗礼和主的圣餐的仪式（圣餐之礼中的交流与共融，意味着教会成员之间的明确的联系）。

外邦人的兄弟会是逐渐形成的。在写给哥林多的信中，保罗没有明确提到那里存在的官员；但他谈到了那些被神呼召来帮助和管理的人。起初，执事们的任务是照顾穷人。路加没有说明长老的制度，也许是因为这个职位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教会里，就像在犹太人会堂里一样，众长老（或监督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尽管其中一个长老（在犹太人会堂中）是作为 "会堂里的官长 "。

在外邦教会中，长老们也被称为 "主教"，这是一个希腊词的翻译，意思是 "监督者"。这两个词（长老，与监督、或主教）在新约中被不加区分地应用于

同一官员。bishop或″监督者″这个词对于七十士译本（希腊语）的《旧约》读者来说很熟悉。“长老″和″主教（监督）″这两个词在《圣经》中都有使用。

所有教会中的长老会的工作，主要是监督宗教崇拜，部分是监督兄弟会的世俗福利。他们最初被选为″统治者（管理者）″，而不是教导者；然而，教导的能力很快就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资格，并成为该职位的一项基本和主要的功能。

担任职务的能力，或以任何方式为教会的精神建设服务的能力，都被视为圣灵的恩赐。当然，对这些不同事工的称呼符合被选中的人的天赋（恩赐）和能力：由圣灵驱动。就灵性的激发和指导而言，它们包括方言的恩赐，这是一种狂喜的、无法理解的言语，那些拥有解释恩赐的人对其进行解释；预言的恩赐，或热切的言语，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无论是信徒还是来参加聚会的异教徒；辨别灵魂的恩赐，或判断讲话是否来自真实和神圣的来源；以及教导的恩赐，或以更安静和联系的风格进行演讲。那些被认为具有这最后一种恩赐的人被认为是″教师″，并形成一个以这个名字命名的阶层。″传道人″是传教士，是使徒们的副手，由他们（使徒）挑选来协助他们的传教工作。提摩太、提多、西拉和其他人都属于这个群体。几个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是由基督门徒们（即那些教会会众）选立出来的。

在这个或那个人的″家里″的教会是为了方便而在那里举行的宗教集会，″教会″一词是按其普通意义上的″集会″使用的。教会之间的联系指的是，他们通过同情心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使徒们（并教会）被赋予了钥匙的权力和捆绑的权力，也就是行使基督教纪律的权力，以及与传播福音有关的立法或司法职能。在哥林多，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在使徒的嘱咐下，将不值得的成员逐出教会。

==========

第三章

基督教的生活：基督教的崇拜：基督教的教导

耶路撒冷的教会：共同的财库

根据路加给我们的关于耶路撒冷教会的描述，它一开始就像一个家庭。然而，向公共库房交出物品完全是自愿的。它既不是成员们的普遍行为，也不是一个永久的习惯。

这是复活的耶稣的追随者中首次涌现的兄弟之爱的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的加利利门徒可能在家里卖掉他们的财产，把所得的钱作为礼物送给兄弟会。这种做法不能继续下去。教会不是要取代自然关系，而是要使其神圣化，如产生个人所有权并成为家庭和国家的基础。然而，这个放弃私有财产的例子，再加上使徒们不带钱囊或金银财宝去往各地传道,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人们兴起了对第一批门徒的字面模仿的欲望。

除了在圣殿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普通的犹太教崇拜外，门徒们每天还在私人住宅中分组聚会。

在这些聚会中，他们一起坐在餐桌前，进行宗教聚会；共同进餐，即爱的盛宴。在这顿饭结束时，无论谁主持，都要把面包和酒（葡萄汁）递给大家，就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做的那样；基督在那时嘱咐门徒们（以及后世基督

徒们），应当这样行，以纪念他即将在十字架上所舍的身体和所流的血；这就是圣餐的原始形式。

基督徒在忍受迫害时表现出一种坚定的精神，这是使徒保罗所称赞的；一种宽恕的精神，这不是他们种族（犹太人）的固有品质，这种精神出现在司提反临终的代祷中，是福音的效果之一。

在十字架上的主曾为他的敌人祷告。

在外邦人教会中，基督徒和他们周围的世界之间的对比必然更加明显。他们要抛弃的东西更多，因为异教徒的宗教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混杂在生活中的许多职业和娱乐中。在使徒书信的不同段落中，我们注意到了异教徒中引人注目的“道德改革”。这种变化在贞洁方面尤其显著；因为淫乱是异教徒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恶习。在异教文化中（罗马与希腊帝国范围内），家庭的纯洁被感官上的沉闷（与淫乱）所取代；以及婚姻关系的松弛，这种松弛使离婚成为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女人被提升为男人的伴侣，而不是男人激情的工具和暴政的受害者。然而，皈依的外邦人有他们特有的缺点。肉体血气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剥夺的。基督徒的原则可能会在与感官的诱惑的冲突中让步。另一方面，对投机的喜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智力上的骄傲和对那些才能低下的人的傲慢情绪，是希腊人的恶习，偶尔会在基督徒中重新出现。一些教会中的妇女表现出对装饰和展示的热爱，在哥林多，她们新近获得的平等意识，超越了古代情感规定（于妇女）的谦虚和矜持的界限，在那里出现了紊乱，如果他们被允许传播，而不是被保罗有力的提醒所遏制，就会使基督教社团名誉扫地。

保罗有机会劝阻在异教徒法庭上的诉讼，因为这是不虔诚和可耻的，并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内进行仲裁，甚至耐心地忍受别人的伤害。对世俗的强烈反应，以及道德的严重败坏，使一些人产生了禁欲主义精神。在哥林多，在婚姻问题上似乎有两派，一派坚持婚姻，另一派则完全摒弃婚姻。在这里，保罗采取了一个中间立场，他给出的建议是基于〝目前的困境〞，这使得每个人都宜于保持原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个建议，使徒否认了灵感（圣灵启示）的权威性。它是作为他自己的私人判断而给出的。

耶稣和使徒们都宣称应尊重民事裁判官的权威。他们肯定了政府的神圣起源和人类法律的约束力，只要它不与上帝的诫命相冲突。保罗利用了他作为罗马公民的特权。为那些实施残酷迫害的统治者祈祷。然而，禁止传授福音的禁令，以及关于向皇帝致以宗教性荣誉敬意的命令，都被违背了。一个更高的法律，一个高于国家的权威，就这样被承认了。在这种良知权利的颁布中，埋下了公民自由的萌芽。古代的国家万能论现在不是由苏格拉底这样的单个哲学家来抵制，而是由许多人，其中大多数人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福音在公民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伦理，需要时间来充分发展。使徒们劝告主人要公正和善良，劝告仆人要顺从和忍耐，这就足够了。在与基督的关系中，在那个层面上，既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而是在共同的主和法官（上帝）面前平等。在他的餐桌（圣餐之礼）和爱的盛宴上，世俗的主人和奴隶并肩而坐。留给基督教的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影响来扫除（社会不公义的）障碍，并通过一个间接的过程来平息不平等现象；而这个过程并不因为它是间接的就不那么有效。

随着基督教会的建立，爱的统治也随之而来，在地上开始。对穷人的仁慈和慈善，是耶稣通过诫命和榜样灌输的。执事的设立是为了他们（穷人）的缘故，并在一些教会中致力于慈善。妇女和男人都可以担任执事。然而，分配

管理教会的慈善事业属于长老；执事和女执事在这项工作中向他们（教会的长老们、或称监督们）提供帮助。寡妇和孤儿受到特别照顾。一类寡妇被称为〝登记的〞。她们完全由教会支持，并提供特别的服务。勤劳和节俭是被要求的，以便基督徒可以有办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保罗敦促教会成员在每个星期天把他们能奉献出来的钱留给穷人。雅各谴责富人的自私、吝啬的精神。由门徒们提供食物的爱宴，给了较富裕的人一个机会，为较贫穷的弟兄们的生活提供慷慨的捐助。

犹太基督徒起初经常去犹太教会堂。他们继续遵守律法中指定的节日和礼拜；只是渐渐地将基督教思想和犹太教事实联系在一起。他们按照摩西的诫命，在星期六守安息日。

但是，在遵守这一规定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在一周的第一天，即主复活的日子，举行基督教崇拜的习俗。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发现一些关于这一天聚会的记载，其中包括外邦人的基督徒。在《启示录》中，它被指定为主的日子。

我们看到了一个机构崛起的第一步；这个机构将取代旧约中的每周纪念活动（安息日，或星期六的纪念活动；它是对世界创造的纪念；见创世纪一章与二章），而成为对于世人救赎的纪念活动（主日，或星期天；它是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而使得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救赎恩典的纪念）。我们没有明确提到外邦人基督徒中的任何一年一度的节日。然而，在一些教会--例如在小亚细亚--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地方，似乎很可能继续保留逾越节，但将其转变为对主生命中最后一幕的纪念。

基督徒的聚会起初是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亚居拉和百基拉是做帐篷的，有大房间；在他们的家中有基督教会的聚会。我们发现在哥林多和罗马，他们（基督徒们）都在自己家里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所。在以弗所，保罗在〝推

喇奴的学校〞举行聚会（使徒行传19：9），这无疑是为这个目的而租用的。它要么是一个教授哲学的校舍，要么是众多带有学者名称的建筑之一，这些建筑被罗马希腊异教徒（那些崇拜偶像众神的人）中的宗教团体用来作为聚会场所。

使徒时代的崇拜是虔诚情感的自发表达。宣读的是旧约圣经的选段。随后是解释经文和自发的发言。如果有使徒的来信，就会向大家宣读。祷告在一定程度上是礼拜过程中领导者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在场的崇拜者的自由、瞬间的冲动而产生的。毫无疑问，主祷文被重复使用，而且可能从犹太教堂的礼拜中转移了祝祷和简短的奉献形式；但没有明确的礼仪的痕迹。

有些赞美诗是由个人唱的，有些是由整个集会唱的。其中大部分来自旧约诗篇，但也有基督教的赞美诗，其片段在使徒书信中可以找到。洗礼的普通方式是浸礼。

一开始，信仰的内容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之后，古老的预言教导，弥赛亚受难的古老预言，以及关于耶稣的回忆性教导，揭示了这些事件的意义。在圣灵的启迪下，使徒们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看到了宽恕与和解的基础。对他神圣的儿子身份的信仰出现在前三部福音书中（使徒约翰则在后来写了第四部福音书），最明显的是对他（耶稣基督）作为世界的审判者的称谓。保罗和约翰则明确地教导他的先存性和神性。早期教会意识到启示已经达到了高潮，或者说〞末世〞已经将要到来，他们期待并渴望着主的迅速回归，以完成他的国度。使徒们展开了教义教学的类型，在这些类型中，同一个福音被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来。保罗以更逻辑辩证的方法介绍福音与律法的关系；约翰则从耶稣所爱的门徒的直觉出发，他在爱中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保罗在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中，有节奏地描绘了同样的爱的优越性；在保罗那里，深刻的神秘主义脉络与逻辑辩证的精

神相融合。雅各关心的是要防止用理论上的合理性代替实际的职责履行。

==========

==========

==========

==========

==========

==========

==========

==========

==========

第二阶段

从使徒时代到君士坦丁

(主后100年-313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进展

==========

==========

第一章

福音的传播：罗马人的迫害

领土的延伸

这一时期的传教工作主要是针对异教徒的转化。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哈德良的Ælia Capitolina殖民地被建立起来，是一个外邦人社区；因此，即使在那里，会众在其性质和敬拜方式上都是基督教。

基督教很早就被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国Osrhene的首都埃德萨。第二世纪中叶以后，埃德萨的教会非常兴旺，其成员中包括国王阿布加尔-巴马努。大约在这个时候，福音被传到了波斯、米底、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我们有关于三世纪初阿拉伯地区教会的文献。著名的亚历山大教会教师奥利根（主后185-254年）曾数次访问这些教会。在第四世纪中叶，一位来自Diu的传教士Theophilus在印度建立了教堂。在埃及，基督教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它（福音）从那里传播到古利奈和其他邻近的地方。在北部埃及，科普特语言和人们的迷信是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早在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就已经站稳了脚跟。此时，福音已经从罗马传到了非洲，并在迦太基城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教会。在高卢，德鲁伊制度及其祭司和祭祀崇拜是凯尔特人的宗教，有几个教会是从小亚细亚来的传道人建立的。在第二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里昂（今法国里昂）和维埃纳（今法国维埃纳）都有强大的教会。在这个时候，里昂的主教伊伦纽斯(Irenæus)谈到了基督教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的建立；北非长老特图良谈到了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

夸张的是，福音的迅速征服。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皈依者的人数肯定非常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贾斯汀-马蒂尔关于众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热情语言。特图良与伊伦纽斯（Irenæus）都留下了详细的记述文字。

从弗拉维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主后69-79年）登基起，基督教会已经在和平中度过了近30年。接替暴君多米蒂安（Domitian，主后81-96年）的是内尔瓦（Nerva，主后96-98年），是一位温和的君王。他在所

有方面都推翻了其前任的政策。随着特拉扬（TRAJAN，主后98-117年）的到来，世界政府的管理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公共福利的重视取代了前一时期的个人激情和不负责任的专制主义。特拉扬在军营和议会中同样表现突出。他性格开朗、公正、脾气好、作风朴实，喜欢与塔西佗和年轻的普利尼(Pliny)等人为伍，可以预计他不愿意对他的基督教臣民采取严厉的措施。但他是个保守派，有意愿维护旧的罗马公共秩序体系，并加强帝国对内部瓦解势力以及边境敌人的抵抗。关于基督教会的迅速发展，至少在某些地方，我们在特拉扬与普利尼的通信中得到了有趣的证明。普利尼是比提尼亚的总督。此外，这些信件使我们看到了罗马迫害记录中的一个里程碑。普利尼在主后111年写道，在那个地区，许多男女老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被指控为基督徒。他所说的这种 "迷信"，即基督教，已经在乡村和城市中蔓延开来。异教诸神的庙宇几乎被抛弃了。用于祭祀的牺牲品很少有人购买。他希望得到罗马皇帝特别的指示，以处理这个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的教派的方法。

特拉扬在答复中决定，让他们独善其身，除非他们被提供姓名的指控者起诉。如果被定罪，万一他们拒绝祈求神灵，他们将受到惩罚。特拉扬的这一回应被普遍认为是标志着基督教被明确定为非法宗教的日期，是福音与罗马国家冲突的一个纪元。然而，特拉扬并没有颁布新的法规。只是发出了执行现有法律的禁令。但罗马国家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就像这样定义的那样，从那时起就一直坚持着，有宽松和放任的间隔时期。根据对安提阿主教伊格内修死亡日期的普遍看法，他就是在这个统治时期，即主后110年，非常愿意为基督教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被押送到罗马，作为殉道者在圆形剧场中丧生。哈德良（Hadrian）（主后117-138）多才多艺，喜欢文学和艺术，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各省，亲自关注臣民的状况和需求。他的脾气很暴躁，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很残忍。他建造了昂贵的寺庙，并严格遵守古老的罗马宗教。然而，在回答小亚细亚的一位执政官的询问时，他说，根据特拉扬的授权，仅仅是民众的请愿和呼喊，要求杀死基督

徒，是不应该被理会的。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投诉人，并以通常的方式进行审判和定罪。诬告者将受到惩罚。在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主后161-180年）的统治下，基督教徒既遭受了民众的愤怒，也遭受了政府的打击。这位罗马皇帝在试图阻止宗教创新方面是最坚决的。这位睿智而富有哲理的统治者在基督教殉道者的身上发现的只是顽固不化的迹象；他们的欢欣鼓舞的面对死亡，在他看来，就像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是一场 "悲剧表演"。在这个统治时期，民众经常发生反对基督教徒的骚乱。这些都是由罗马帝国遭受的可怕的灾难引起的。不仅有不间断的战争；还有地震和水灾。饥荒和瘟疫席卷了众多的人。主后166年，发生了一场瘟疫，尼布尔告诉我们，从这场瘟疫的破坏性影响中，帝国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苦难都被归咎于基督徒和他们所谓的不虔诚（即，那些坚持敬拜古罗马偶像众神的人认为，这些基督徒们得罪了罗马的古代众神灵）。

在小亚细亚，有一些人被处决了。殉道者之一是可敬的波利卡普，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监督）；他曾坐在使徒约翰的脚下（即，他是约翰曾经亲自教导的门徒）。当时正值基督教的复活节，异教徒们在执政官提图斯-夸德拉图斯面前举行比赛和其他游戏。这位年老的圣徒在城市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被士兵逮捕，他在那里避难。此前，他拒绝利用另一次逃跑的机会。当他被要求咒骂基督时，他说：“我为他服务了八十六年，他对我只有好处；我怎么能咒骂他，我的主和我的救赎者！” 他拒绝放弃信仰，被烧死了。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殉道者”，他一般被这样称呼）【译者注：即，他的名字MARTYR就是英文、或拉丁文中“殉道者”的意思】--（他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教会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罗马被处死。里昂和维埃纳的高卢人的教会受害最深。他们受迫害的细节在他们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信中给出。关于他们的聚会中的乱伦和其他可憎行为的诽谤性指控被传播和相信。这种诽谤性谣言在涉及基督徒和其他教派的情况下很常见，因为他们的集会是私人的。即使是年轻的少女，在异教徒法官的手中也毫不

退缩地忍受着酷刑，其严厉程度几乎难以置信。十六岁的青年庞提库斯和女奴布兰迪娜所承受的折磨的故事就具有这种特点。从早到晚的折磨只能让这个娇弱的少女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做坏事。”年过九旬的主教波提诺（Pothinus）受到了残酷的对待，两天后在狱中去世。

据称，在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的军队中，有一个由基督教士兵组成的 “雷鸣军团”响应祈祷，降下了一场雨的奇迹；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在全部程度上），是非常稀奇的。教会随后有了一段休息的时间。

残酷的康莫德斯（Commodus）（主后180-192年）是一位贵族父亲的私生子，对宗教分裂和争斗漠不关心。从康莫德斯之死到戴克里先登基，长达92年的时间里，皇帝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士兵们决定的。他们对基督教的处理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性格和对维护罗马旧制度的热忱程度。直到德西乌斯才进行了全面的迫害。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统治的最后阶段（主后193-211年）见证了前几年的温和政策的逆转。迫害发生了，特别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在那里的殉教者中，有两位妇女，珀珀图亚和菲利塔斯，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超过了大多数人。对前者来说，正如她所说，“地牢变成了宫殿”。她没有屈服于她年迈的父亲的可怜的恳求；她没有“悔改”（即从自己的基督信仰中退缩）。

迫害在卡拉卡拉（主后211-217年）时期继续进行。继任的皇帝们将不同的宗教融合在一起，他们对东方宗教体系的兴趣，为基督教信徒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在野蛮和暴殄天物的埃拉加巴鲁（主后218-222年）和更高贵和虔诚的亚历山大-塞维鲁（主后222-235年）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在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主后235-238年）的统治下，异教徒民众的愤怒被那些敌视基督教的统治者所刺激，被允许不受限制地发泄出来。卡帕多西亚和庞都的地震，以及

其他地方的重大灾难，激起了他们的迷信怒火，表现为对基督徒的屠杀。他们（基督徒们）的 “不虔诚 ”（即那些敬拜罗马偶像众神的罗马人认为这些基督徒们背离了那些众神）总是被归咎于这些判决。在接下来的两个统治时期，即戈尔迪安（主后238-244年）和阿拉伯人菲利普（主后244-249年）的统治时期，基督教徒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骚扰。

他们（基督徒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奥利首次表达了他之前的基督教教师不敢接受的信念，即福音凭借其固有的力量，在没有奇迹的帮助下，将取代异教徒的宗教。

教会的繁荣和光明前景重新点燃了其反对者的敌意。德西乌斯（Decius）皇帝是一个出生于潘诺尼亚的人，着手恢复帝国的统一和活力。他一心想恢复昔日的美德和秩序,并认为恢复特拉扬和马库斯-奥勒留的政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德西乌斯决心消灭基督教，采取了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标。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现在行政长官面前，放弃他们的宗教，并向罗马的神灵献祭。许多人仍然在基督信仰中坚定不移。但也有不少人屈服于恐怖，要么以某种方式加入了异教的崇拜，要么获得了虚假的证明，证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政府所要求的事。

对教会来说，幸运的是，德西乌斯的统治期（主后249-251年）很短。在加勒斯统治时期（主后251-253年），瘟疫在整个帝国蔓延，各省发生干旱和饥荒，再次激起了异教徒的愤怒。帝国颁布了一项诏书，要求所有罗马臣民向诸神献祭。基督徒殉道者中有两位罗马主教，科尼利厄斯和卢修斯。德西乌斯皇帝未完成的工作由瓦勒里安（主后253-260年）接手，他针对教会的法令制定得很巧妙。这些法令包括针对所有有地位和身份的基督徒的特别规定。在这场迫害中，可敬的迦太基主教塞浦路斯被处死，罗马主教西克斯图斯及其教会的四名执事也被处死。

瓦勒里安皇帝的儿子加里安（主后260-268年）推翻了他父亲的政策，恢复了被流放的主教的地位，并给予基督徒实际的宽容。现在，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教会享有几乎不间断的休息。然后，所有迫害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爆发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政治家，他与马克西尼亚努斯共同执政，并任命了另外两位凯撒，各自统治帝国的一个广泛地区。

其中一位是君士坦丁-克洛乌斯（Constantius Chlorus）。另一个是加勒里乌斯，他娶了戴克里先的女儿。在加勒里乌斯的怂恿下，并在罗马古老的保守主义情绪的刺激下，戴克里先在主后303年决定消灭基督教，恢复罗马古老的崇拜体系。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特意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每一条都比前一条更严格，以达到他的目的。罗马的监狱里很快就挤满了基督教会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戴克里先退位后，主持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务，并利用其权力保护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克洛乌斯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但新的凯撒、马克西尼亚努斯和加勒里乌斯继续着他们的野蛮行为。最后，在主后311年，加勒里乌斯完全改变了他的路线，宣布了宽容。主后313年，君士坦丁，现在是西方的唯一统治者，与他在帝国的同事利西纽斯一起，在米兰发布了一项完全容忍宗教的诏书。

在君士坦丁获得最高权力并采纳了基督教信仰而结束的、此前一连串迫害中，有许多人被迫害。

在君士坦丁之前，在那曾经的一连串的迫害中，有许多人屈服于监禁、酷刑和死亡。那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英雄时代，当时，在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罗马帝国的全部力量都被手无寸铁、不加抵抗的基督教信仰的信徒们胜利地抵御了。帝国的罗马，世界的征服者，自己也被基督教门徒的队伍所征服，

他们温顺而无畏的勇气比她（罗马帝国）所有的力量更胜一筹。

==========

第二章

教会中的管理和纪律

教会的兴起

我们现在要考虑教会的组织。其中的特别主题是主教制的兴起，圣职思想的传入，教会等级制度的发展，直到这个时期的结束。

如我们所见，在新约圣经中，每个教会有两类官员，分别称为：（1）长老（或称主教、监督、牧师、牧者），和（2）执事。我们发现，在每个长老委员会中，都有一个人被专门称为 “主教（监督）”，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也经常被称为长老。换句话说，在一个两层（即长老与执事）的教会官员机构里，演变出了一个三层（即，在长老和执事之上，产生了一个更高的级别，即所谓的“主教”）的事工。

关于主教职位的起源问题，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值得研究。提摩太、提多和其他传道人承担了对教会的某种监督。但他们履行的是一项特殊的使命，如果可以称之为 “可移动的主教职位”，那么在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正式描述，而且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化（教区）主教职位截然不同。引用Lightfoot主教的话说，“‘主教’一词的历史以及它从低级职位转到高级职位的演变，与其说是一种孤立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渐进的、从长老团中产生的发展过

程；不是在各地以统一的速度前进，而是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教会表现出不同的成长阶段。” 波利卡普（士每拿教会的牧者）被认识他的爱任纽斯指定为主教。但波利卡普在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没有提到那里的主教与长老的区别。克莱门特在主后96年给哥林多教会写书信时，他们还没有主教。如果这个职位在那里存在，他的书信的特点和目的就会使他提到它。在促进主教职位的兴起方面,雅各在耶路撒冷担任主席的例子将在叙利亚产生影响。一个早期的传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使徒约翰有特殊的作用，据说他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中任命了主教。伊伦纽斯告诉我们，波利卡普是由使徒们任命的。正是在这些叙利亚和亚洲的教会中，主教制度似乎首先扎下了根。个人的显赫地位，就像约翰的弟子波利卡普和保罗的学生罗马的克莱门特一样，可能来自于与使徒的亲密关系，或者来自于其他一些特殊的尊敬，都会使特定的人获得优先权，并使他们高于同僚的长老们。根据经验，在一个由同事组成的机构中应该出现一个主席职位，如教会的长老。希腊语中的主教（监督）一词曾被用来指代长老，七十士译本的读者很熟悉，在那里它指的是监督者。同样的术语，似乎有时也被用来指代异教徒社团中的类似职务，包括自愿的社团和民事的政府。教派纷争和异端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更严格的纪律和统一行动的要求，将有利于基督教主教职位的兴起。主教作为教会慈善基金的管理人，也获得了重要性。他是执事们工作的监督者。这种财务责任与该职位的建立有一定关系。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牧师们的原始平等关系（即，长老们、或监督们，彼此在圣职地位上是平等的)的印象和记忆仍然长期存在。杰罗姆(Jerome)，第四世纪的大学者，作为对这一事实的说明，他提到了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特殊性。他说：″在古人那里，长老和主教是一样的；但渐渐地，所有的责任都被推延到一个人身上，以便将异端的丛林连根拔起″。他把对长老们的服从称为 ″教会的习俗″。杰罗姆说，一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当亚历山大城的一位主教去世时，其他十二位长老将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个人推选、安排在主教

的位置上。

在原始教会时代，使徒们被赋予了很高的重要性，他们是由教会的资金支持的巡回布道者，″先知 ″和 ″教师 ″也是巡回者，但可能定居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三类人在与教义有关的问题上是突出的指导者。主教和执事的职务主要是行政性的；但他们也从事这种先知和教师的工作。后来，这三类精神向导（使徒、先知、教师）逐渐（因使徒们的去世而）被取代，他们的工作召唤取决于圣灵的恩赐，他们不与特定的羊群挂钩。主教（监督），地方教会的常设官员，主要吸收了他们（使徒、先知、教师）的职能，在保留他们（主教们）的地方教会关系的同时，每个人（主教）的管辖权，被认为是站在整个教会的一般关系中。这样一来，主教职位就有了一个改变的方面和更大的尊严。

我们刚才提到的变化是教会合并的一个因素。它是基督教 ″大公教会 ″发展中的一个因素。当我们走过第二世纪中叶，推进到该世纪的结束时，我们发现了实现这一重要转变的途径。导致这一转变的动机是各教会因诺斯替主义的异端而陷入危险之中，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为防止信仰的堕落而建立保障措施是一种强烈的冲动，即使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保护机构之一是普遍采用 ″信仰规则 ″作为发现异端的试金石。另一个是新约圣经教规的形成。第三种方法是增加主教的权威，并赋予他们使徒的继承人的地位。除了这些联合的手段外，值得一提的是崇拜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主的圣餐被视为一个神圣的奥秘，除了圣餐者外，所有人都不能在场。此外，一种更明确的神学体系被召唤出来，作为对异端新事物的解毒剂。在这一复杂的进展过程中，我们现在要评论的具体特点是与神职人员的权力和职能有关。

比单纯改变教会政府和纪律更重要的是引入和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即牧师拥

有圣职的属性。这是一种从古老的犹太教体系中借来支持的思想，而基督教的制度被认为是与之相类似的。它的最初暗示也可能来自于异教徒祭司的例子。这种观念一旦被采纳，就产生了一种效果，即在大众的评价中提高了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监督、牧者）的地位；并将牧师（牧者、主教、监督）作为一种更高的秩序，与 ″俗人 ″（平信徒）分开。主教制在一开始就是一种教会政府安排。圣职者理论在第二世纪末之前并没有出现。特图良是第一个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但即使是他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很明显，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想法。在其他地方，他强调了信徒的普遍祭司身份。哈纳克说：″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必须推断出，在主后200年之前，祭司这个词并没有被用来指代迦太基的主教和长老。″Lightfoot主教也是这样断言的。主教职务的特权是逐渐获得的。在对长老的按立授职中，可能是主教和长老们一起行动。在某些情况下，主教可能会单独行动（即，主教单独按立教会长老）。

长老是否可以单独行动（即，长老是否可以单独行动按立其他长老）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记录显示，这种（由长老单独举行的）授职是不允许的，但在早期可能是允许的。在西方教会中，按手礼的确认与洗礼分离。早在三世纪中叶，随着圣职理论的发展，坚信礼（即，经过了婴儿洗礼而长大的成年人，要经过坚信礼，而在教会中得到正式接纳；主教、牧师有权执行对于坚信礼的批准仪式）成为主教的专有特权。在东方，这种变化并没有发生。婴儿洗礼、坚信礼和圣餐之礼仍然被联系在一起。坚信礼的权利仍然属于长老们。

罗马的克莱门特告诉我们，使徒们在教会中设置了长老和执事，并规定他们的位置应由他们任命的其他有资格的人填补，并由教会的官员们同意：其目的被认为是为了通过保持教会官员的不间断继承来防止混乱。这种继承的想法在市政管理和私人公司中很常见。在爱任纽和特图良看来，主教的链条--

环环相扣--是教会中真正的使徒教义传承的保证。甚至有一种〝真理的恩赐〞--一种魅力，使他们有资格从事这项工作。早些时候，我们在伊格内修的书信中发现，不是主教，而是长老，才是使徒的继承人；后来，在塞浦路斯学派，当圣职思想扎根后，这个新的因素修改了继承的理论。提名选举的特权使神职人员在选择继任者方面行使越来越多的代理权，直到除了表示赞同权之外，没有什么权利留给人民。主教是由邻近的主教以及他所主持的特定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共同选择的。

神职人员部分由会众的募捐和礼物支持。但他们从事社会职业的习惯性工作--耕地、开店、从事行业、担任文职等。西普里安抗议神职人员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并反对他们接受民事职务，因为这将占用他们的时间。几个世纪过去了，开始禁止神职人员从事世俗职业，首先在西方，后来在东方。即使在那时，他们也要学习一些手工艺。

教会之间的联系是活跃的。基督徒访问他们所属的教会以外的其他教会，有时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组织和习俗。基督徒弟兄们在旅途中受到其他教会的好客的款待，只要他们带着他们的主教的推荐信。这些信允许他们与当地基督徒加入兄弟般的共融。迫害与威胁的消息被从一个教会传到另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成员（因犯罪）被逐出教会，主教会将这一事实告知其他教会。

前三个世纪见证了一个等级教会组织的逐步发展。在这一点上，正如在早期的教会安排中一样，世俗和政治模式对教会等级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圣职者思想的传播，以及与之相伴的模仿犹太制度的趋势，都不免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乡村教会在邻近的城市教会的支持下成立，隶属于城市教会，其牧师是来自母会的牧师，受母会的主教管辖。独立建立的农村教会则有自己的主教。乡

村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但在第四世纪初之前，这些教会中的大多数都像前面提到的那类乡村教会一样，从属于邻近的城市社区。因此，每个城市的主教都有一个覆盖该镇和附近地区的管辖权。起初，一个城镇的主要教会的神职人员按照指定的顺序在几个礼拜场所主持工作。到了后来，通常会给每个教堂指派一名长老作为永久的牧师，当然，这要取决于该镇的主教，他与主教堂有特殊的联系。

每个罗马省的大都市的主教自然会在其范围内获得对其他主教的优先权。这是由于城市的等级，因为，一般来说，正是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更决定了主教的相对尊严。另一个考虑是，福音经常从省会城市传到其他许多地方。大都会的安排在西部地区推行得很慢，因为该地区的城市相对较少；在那里，大都会的特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确定。主教（监督、牧师、长老）的平等和独立的理论继续被坚持，并在一些场合被大胆地宣扬。

教会等级制度的趋势还导致几个主要城市的主教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此外，这些城市被认为是特殊意义上的使徒的曾经所在地。

“大主教 ”这一称谓最初适用于所有主教，后来逐渐成为这些一级大主教的头衔。在这个时期，他们是安提阿、亚历山大，特别是罗马的主教。帝国在政治上被划分为教区时，是为了界定更大的教会等级区的边界。

大主教的尊严通过教会主教会议得到加强，他们是主教会议的主持者。类似于希腊政治事务中熟悉的会议，在第二世纪开始举行。他们的行为被称为教规，并被认为对参加会议的人具有约束力。教会会议被认为是由圣灵引导他们的讨论。非专业人员（平信徒）逐渐被排除在他们之外。

第二世纪中叶以后，教会作为一个独特的机构站了出来。它自称是与异端和

分裂派相对立的，是〝普世〝教会。人们相信，加入这个唯一可见的教会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在教会内，而不是教会外，圣灵有他的居所。教会的统一性由主教制来保证和巩固，即由被视为使徒继承人的主教来确保。主教团，就像使徒团一样，是一个单位，在使徒团中，彼得是团结的中心。这个想法被塞浦路斯发展并坚持，他参与了与不同教派的激烈争斗。

可见教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加上彼得在使徒中的优先地位、居于教会首要地位的夸张概念，创造了一种无声的要求，要求继续保持这种首要地位。这一点应该在哪里找到——除了世界的首都（罗马）？在人们逐渐相信是彼得建立的教会，并且他是该教会的第一任牧师的情况下，主教权力的中心点应该在哪里被发现——除了在罗马？关于彼得与罗马教会的这种关系的说法最早出现是在主后170年左右。当时这是一个很容易被相信的说法。彼得和保罗与罗马的关系使那里的教会成为最崇高的使徒教区。罗马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它在城市中的超然名望，使它的主教有了无与伦比的尊严。罗马教会是最大的教会之一；它包括罗马的有地位的人；它积极地建立了许多其他的教会；它的奉献礼物流向许多地方的有需要的弟兄；它是第一个感受到残酷的迫害之手的人，而且往往是第一个让其他教会知道危险来临的人；它的教会官员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经常作为殉道者丧生。所有这些影响都加在一起，引导各地基督徒的目光投向罗马教会，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教会权威所在地。伊伦纽斯在一个显著的段落中给予罗马教会最高的地位，认为它是使徒教导传统的可靠守护者。甚至克莱门特（罗马教皇的主教），使徒之后的第一位作家，代表罗马教会发言，以一种几乎是命令式的告诫语气责备哥林多教会。然而，在爱任纽的时代，甚至在塞浦路斯的时代，罗马教会与后世罗马教皇的区别在于它是使徒教导的守护者，而不是阐释者。它没有支配或控制整个基督教会体系的权利，也没有在解释福音方面的无懈可击性、无误性；这些局限性本身也是它自己承认的。同时，赋予罗马主教的那种优越性，在西方（以罗马为中心）众教会中比在东方（即小亚细亚地区以及巴勒斯坦地

区）众教会中得到的更多。

开除教籍是教会纪律的第一步。被逐出教会的基督徒，如果表现出忏悔的迹象，就会组成一个 "忏悔者 "阶层。他们在礼拜的聚会中拥有一个特殊的席位，必须经历公开的羞辱过程，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由神职人员指定。这是忏悔的起源，并形成了忏悔者的 "满足"。然而，内心的忏悔总是被要求和暗示的，赦免是以其存在为条件的。当他们被完全赦免以后，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将手放在如此恢复的忏悔者的头上，并允许他参加主的圣餐。

对轻罪和重罪进行了区分。后者被认为是丧失了在洗礼中所赋予的恩典。对于那些因犯了弥天大罪而被切断教会关系的人--例如，那些屈服于恐怖并放弃信仰的人--是否应该在忏悔后重新回到教会中来,这个问题出现了广泛的、持续的意见分歧。这种激烈的争论引起了分裂；但总的来说，比较宽松的一方保持了其优势。这就是北非的费利西姆（Felicissimus）与塞浦路斯（Cyprian）的分裂；罗马的诺瓦蒂安（Novatian）的分裂；以及埃及的梅勒蒂（Meletius）的分裂，那是后来的事。

==========

第三章

基督徒的生活和敬拜

福音

基督教在改革人的生活方面的惊人效果得到了基督教作家们的充分证明。贾

斯汀-马蒂尔，在一个雄辩的段落中，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放纵情欲的人在道德上变得纯洁，贪婪和吝啬的人自由地施舍给需要的人，报复心强烈的人为他们的敌人祈祷。奥利问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这么多的人从淫乱、不公正和贪婪中恢复过来，是否能够完成。

基督徒之间的爱使异教徒感到惊讶。

异教徒卢西恩的调侃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位幽默大师自己也不明白——这种对陌生人的兄弟般的善意，以及对基督教徒的兄弟般的善意。—— 他说：″他们的主已经说服了他们，他们都是兄弟″。

招待和施舍在信徒中很普遍。教会定期为穷人募捐。新信徒有时会将他们的全部财产捐给教会。经常为处于困境中的同门--可能是在遥远的地方--进行特别捐助。对于那些被逮捕的人，或因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他们会在危险的情况下表达同情和帮助。当瘟疫爆发时，人们注意到基督徒没有抛弃病人，也没有忽视对死者的安葬。他们甚至照顾那些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异教徒。在异教徒中，慈善的概念并不陌生；但由于对 ″基督所赐的新诫命 ″（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顺从，这个词获得了新的含义：″彼此相爱″。

虽然早期的作家们称赞基督教所产生的影响，与异教的影响形成强烈对比，但他们对基督徒的缺点，如虚荣、不诚实和许多的抱怨，表明即使在教会相对纯洁的时代，也不能要求理想的完美。

福音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净化了家庭关系。在福音书下，妇女被提升为在家庭中的参与者。在与上帝和基督的交流中，妇女被提升为与男人平等的参与者。婚姻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神圣性。在民事契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宗教仪式，教会的官员们都在场。新娘和新郎在主的圣餐之礼上坐在一起，向教会

献上敬奉。在与圣餐仪式有关的祷告中，神圣的祝福被召唤到他们身上。与异教徒结婚是不被允许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信徒不可能不受干扰地履行基督教生活的职责。皈依基督教的人和他周围的异教徒之间必然会有一道鸿沟。存在着一堵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隔离墙。这就是〝分离〞。

教会内部有些人怀疑基督徒是否应该担任公职--这是否符合谦卑的原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反对担任一种使任职者必须对他人执行死刑的职务。许多人怀疑在战争中服役的合法性；但允许士兵在服役后改变信仰，可以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些切断了基督徒与各种有利可图的职业的联系。偶像众神的神话概念和某种形式的异教崇拜涉及许多赚钱行业的分支。这条规定本身就把基督徒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参与；甚至包括出席许多习惯性的娱乐活动、许多不同种类的节日，其中隐含着偶像崇拜的信仰或涉及偶像崇拜的做法。淫秽戏剧表演被禁止，因为与之相关的不道德行为，以及与成为基督徒的清醒相抵触。演员和那些训练他们的人被排除在教会之外。西普里安不同意这一类人在加入教会以后继续从事他们以前的工作。所有罗马角斗士的争斗在最高程度上都是与基督教的感情相抵触的。

基督教有一项消极和积极的工作要完成。一方面（消极的方面），它必须反对世界，因为世界是在邪恶的力量之下。它必须对所有与基督教精神相冲突的机构和行为采取积极的姿态。另一方面（积极的方面），基督教的任务之一是接受和吸收世界生活中真正自然的东西。净化和提升，而不是抵制或破坏，那些没有错的和值得保留的东西，是教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如果有松懈放纵（世俗主义）的危险，同样也有不健康的节制（禁欲主义）的危险。

禁欲主义是东方宗教的自然产物，特别是印度的宗教，那里的修道士很兴盛。在基督徒中，东方的影响在培养禁欲主义倾向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小。在罗

马帝国的异教徒中，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这是由于古老宗教的衰落，灵魂深处与邪恶的冲突，以及人们思想的绝望情绪造成的。

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主要是在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这（这种冲突）是基督的门徒必须进行的，尤其是在对盛行的感性和世俗的反应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要从字面上放弃这个世界，而每一种神圣的感情，不亚于主人的诫命，促使基督徒在精神上放弃世界的败坏。

教会里有一种初级形式的禁欲主义，表现在对禁食的重视程度提高，以及对独身主义的偏爱、而不是已婚状态。不仅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规定了禁食的日子；还确立了星期三和星期五禁食的习俗，直到下午三点。

斋戒日被称为″站岗日″或″哨兵日″，这时基督教士兵要站岗放哨。忏悔者在接受教会纪律约束时，实行禁食。对马利亚的永久贞洁、耶稣和施洗约翰的独身生活的信仰，以及有时属于未婚状态的优势，为行善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禁婚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自我否定行为。最受尊敬的作家，从塞浦路斯到贾斯汀-马蒂尔，都对那些从早期就选择保持单身并致力于行善的妇女给予特别的荣誉。通过庄严的誓言献身于处女之身，违反誓言是大罪，这是塞浦路斯时代的既定习俗。

在西方，支持独身神职人员的偏好比东方（小亚细亚）更加极端。神职人员的地位越是高于教友，民众对他们的特殊圣洁性的要求就越高。

_____

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他们的聚会需要更大的房间或建筑。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租用了或建造了普通的长方形建筑，没有中殿或过道。当这些建筑

不再足够时，他们就按照罗马大殿的模式建造教堂。大殿既是法庭，又是商业交易的交易所。它的形式通常是一个长方形，由一排排柱子分隔成过道，中间的过道最宽，一端有一个半圆形的天井，行政长官的法庭就设在那里。在富裕的罗马人的房子里，也有与之相同的家用大殿，但两端没有柱子，而且大殿的屋顶被抬高。一些人认为，教堂建筑与公共大殿的不同之处，意味着对私人住宅中类似房间的模仿。还有人认为，教堂前面的中庭表明，古代罗马人的房子曾经是这个结构的模型。但这些结论都没有得到证实。大教堂，包括中殿和过道，以及后面的天顶，为主教和长老提供了尊贵的位置，是为基督教订制的。

在教堂的台子前面，有一个额外的空间被封闭在一个略微抬高的地板上。这就是唱诗班的位置，那里有一个或多个阅读台。在过道之上，有时还有供陌生人和观众使用的长廊。圣餐者占据了主楼，而在通往中殿的前庭，则是慕道者和忏悔者。在前面的四角形中庭里，有一个水槽，用于进入教堂前洗手。在戴克里先的时代，有些地方就存在着庄严的教堂建筑。在尼科梅迪亚，教堂高耸于皇帝的宫殿之上。然而，在君士坦丁登基后，一个规模宏大的教堂建设时代才正式开始。他在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君士坦丁堡建造了辉煌的大殿。

饰画的异教徒习俗被基督徒所效仿，他们在高脚杯上画出了肩上扛着小羊的牧羊人，以及其他图画性的标志。普遍使用的符号是鸽子，代表圣灵；鱼，希腊人使用的图片和标志。鸽子，是以救世主名字和职务的首字母画出；船，是灵魂和教会向天堂航行的典型；琴，表示信徒的喜悦；锚，是他希望的象征。早在三世纪末，教堂里就出现了宗教标志的描绘。十字架在基督徒生活中是一种常见的标志，他们在许多场合，如早晨起床时和突然遇到危险时，都会打出十字架的标志。渐渐地，这种标志开始有了一种神奇的功效。然而，十字架并没有在教堂里被描绘出来。

罗马的地下墓穴是古代基督徒的埋葬地，是为此目的而挖掘的；因为基督徒并没有采用罗马人的火葬做法。这些地下墓穴的蜿蜒道路有几百英里长。它们包含许多小房间，在这些房间里有圣餐仪式，并举行agape，或爱的盛宴。这些房间都有壁画装饰。从这些古墓中取出了大量的物品，包括铜铃和其他儿童玩具、镜子、戒指、各种盥洗用品和无数的灯。这些东西是早期的习俗，与死者的遗体放在一起。地下墓穴中的绘画经常是圣经中的典型事件，如亚伯拉罕献以撒，洪水中方舟漂浮在水面上。在普里西拉的墓地里，有一幅马利亚和孩子耶稣的画像，时间相对较早--我们无法确定有多早。墓志铭很有启发性，也很感人。他们表达了对复活盼望的喜悦之情。

斋戒，起初是自愿的，后来被教会的法律所规定。基督教的节日与基督有关，并纪念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包括他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的荣耀。在主日，与平常日子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喜悦象征，聚会敬拜的人们以站立的姿势进行祈祷。被东方（小亚细亚）教会追随的犹太基督徒，不仅遵守星期日（主日），也遵守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相反，罗马的基督徒在星期六禁食。当我们到达特尔图良的时代，大约主后20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建议是在周日完全或部分地放弃世俗劳动。第一个普遍遵守的年度节日是复活节，它与古代的逾越节同在。小亚细亚教会在前三个世纪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犹太月的第十四天，即尼散月，无论在哪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复活节之后，是五旬节，持续五十天，纪念耶稣的荣耀。后来，第四十天被保留下来，作为对耶稣升天的纪念。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出现了两个新的节日。一个是主显节，起源于东方，并非不可能是犹太基督徒，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洗礼。另一个是圣诞节，这是一个源于罗马的节日，该节日在冬至或12月25日庆祝。

在后使徒时代，崇拜仍然是宗教感情的自发的、活生生的表达。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徒 ″合理的服务 ″的自我牺牲，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可以自

由地进行。这就是贾斯汀-马蒂尔时代（约主后150年）基督教崇拜的特点。后来，随着第二世纪的结束，从伊伦纽斯和特图良的时代开始，新的动机和另一种精神就很明显了。崇拜被看作是对上帝的一种服务，它是一种义务，并具有自身的价值，甚至是一种功绩、因为它可以为上帝所接受。在对上帝的公开崇拜中，除了周日，基督徒都是跪着祷告的。圣经被读得很长。从与这些读经有关的劝告中，发展出讲道。在亚历山大城，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劝告性的内容混合在一起，使布道具有更多的知识色彩。教会音乐，一开始主要包括唱诗篇，在叙利亚和亚历山大特别繁荣。这种音乐的特点非常简单。正如普利尼所描述的那样，在基督徒的崇拜中存在着某种交替的歌唱方式。传统上，在安提阿引入这种做法的是归功于伊格内修斯。在第三世纪，也许更早，天使之歌被扩展到后来的拉丁文赞美诗的希腊文版本，即《荣耀之歌》中。

在离主后96年不远的罗马教会主教克莱门特的书信中，发现了一个形式非常复杂的祈祷词，表明他可能在公共礼拜中习惯性地使用它。其中包含了在主的圣餐之礼上要重复的祷告形式。在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对基督徒在主日的崇拜的描述中，主席的祈祷似乎是即兴的；但人们在圣餐之礼前的祈祷，可能是按照固定的形式进行的。在一本称为 ″使徒宪法 ″的古书中，有一些简短的祷告形式，在第二世纪末之前就已经使用了，这并不奇怪。在戴克里先的迫害时期，很可能当时就有祈祷的形式，这些形式后来被体现在礼仪中，并被记在了记忆中。这种做法的一个原因是，在圣餐仪式上蒙上了一层秘密或神秘的面纱，或者说，在圣餐之礼仪式上蒙上了一层纪律。

在第二世纪末，我们发现在 ″圣餐之礼的纪律″中，不允许不相干的人在场，这是一种习俗。在主的圣餐之礼时，在初步仪式之后，即在主教和长老们的讲话结束后，未受洗的人被遣散。“弥撒”这个词就是从拉丁语中表示解散的词（Missa）演变而来的。迫害的危险起初可能导致了对圣事的这种隐私感

觉，但对其特殊的庄严性的想法和对亵渎的恐惧是主要考虑。异教徒的奥秘传统习惯，以及异教徒对入教者和未入教者的区分的例子也不无影响。准备即将接受洗礼的慕道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班级，并逐渐接受信仰奥秘的指导。在第三世纪的过程中，人们（基督徒们）认为在不信教的人和未受信仰教育的人面前保持沉默是一种义务，涉及到更深奥的教义，如三位一体和赎罪。甚至连受洗时的信仰忏悔（信仰告白）也不能用文字记载或公开。这种保留，一直延续到异教徒皈依（即君士坦丁时代以后），慕道班也随之消失。六世纪以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种神圣的缄默了--即所谓的 ″纪律″。

在北非亚历山大城，由于许多人的智力和成熟的年龄要为这一（信仰皈依的）仪式做准备，教义教学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就这样，在那座城市里出现了第一所神学学校，或称神学院。

指导：《使徒信经》。

培养神职人员。在洗礼时对基督信仰的简单忏悔（信仰告白），逐渐扩大了内容与适用范围，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西方教会中发展成为所谓的《使徒信经》。然而，不同的教会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正如鲁菲努斯在四世纪末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的那样。使徒信经这个名字最早可能是因为它是由福音书中记载的或由传统传播的使徒的教义组成的。在第二世纪中叶之前，罗马教会就有一个书面文字记录，包含了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大部分使徒信条，并由受洗者重复。此后出现了一个传说，说是使徒们共同编写的，每人贡献了一部分。不能把《使徒信经》与 ″信仰规则 ″混为一谈，后者是对它的解读和扩展。《信仰规则》 ″是对基督教主要事实的简短陈述”，爱任纽斯、特图良和奥利都提到了这一点。从第二世纪后半期开始，它在教会中普遍发挥了作用，但形式各异，是反对异端歪曲公认教义的盾牌。在东方，对其形式的变化没有什么制约，所以它没有被延续下来。五世纪时，在高卢（今法

国），这个可敬的象征达到了精确的形式，它在拉丁教会中流传到我们今天这里。在接受洗礼的过程中，受洗者放弃了对于撒旦的服务和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在第三世纪中叶，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在这个仪式中使用了驱魔的程式。主教将手放在受洗者身上，使用十字架的标志，并用油涂抹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特有的仪式，如分食牛奶和蜂蜜，象征着对信徒的祝福。这种习俗存在于北非。婴儿洗礼被伊伦纽斯和奥利承认为教会的一种仪式。

特图良（Tertullian）敦促推迟洗礼（即不要进行婴儿洗礼）。后来的教父们也这样做，理由是对于受洗后犯下的罪，更难获得宽恕。担保人（接受婴儿洗礼的孩童的父母）以孩子的名义承认信仰，并承诺给他一个基督教的训练。

关于圣餐之礼，在北非和其他地方，三世纪初以后，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个仪式具有神秘的功效，导致了带孩子来领圣餐的习俗。通常的做法是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领圣餐。在生活中，凡是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都要接受主的圣餐。在这些场合中，包括所爱的朋友的死亡纪念日。殉道者死亡的日子被当作他的生日，或他进入更高生活的日子。在这些殉道者的诞辰日，基督徒们聚集在他们的墓地；他们的善行和苦难被唤起，并接受圣餐。

我们有证据表明，早在第三世纪初，这种习俗就已经确立。在第二世纪，这些纪念活动大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第三世纪，人们开始高度重视殉道者的代祷，无论是在他们死前还是死后。

==========

第四章

基督教文学和教义

作品的特点

前六个世纪（主后一世纪以后、至主后六世纪）的基督徒作家们被称为″教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有的基督教著作都是用希腊语写的。教会的仪式，甚至在罗马，起初也是用这种语言举行的。【希腊语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直到第三世纪初才出现任何重要的拉丁文基督徒著作，即使如此，也不是在罗马，而是在北非的一个省份，首次用这种语言（拉丁语）写作基督徒作品】。

这些书中最早的是罗马的克莱门特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这封信是在主后96年左右发出的，当时那里（哥林多教会）普遍存在分歧；这封信是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争论。最近发现的书信的结尾部分是一段祷告，可能克莱门特习惯于在神圣的仪式上使用这段祷告。

安提阿主教伊格内修的（写给各地教会的）七封书信，以较长和较短的希腊文形式存在。存在于叙利亚语中的三封书信是对相应的希腊语书信进行删节的结果。这些书信是在作者（安提阿主教伊格内修）作为囚犯前往罗马接受殉道的途中写的。它们显示出对殉道者的冠冕的渴望。它们以冗长的文字反复强调教会秩序的必要性，通过服从主教来保证。然而在给罗马人的信中，没有丝毫暗示罗马的主教在当时存在。这是所有书信日期较早的一个论据。波利卡普致腓立比书信的日期大约是主后150年。

当基督徒受到地方官和暴民的迫害时，他们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说服他们的对手，并克服偏见。基督教的被称为″辩护士 ″的一类作家为基督教事业

进行了辩护。他们的一些作品是写给皇帝的，以劝阻他们不要进行迫害，还有一些是对异教徒或犹太人的呼吁。在第二世纪遗留下来的这类作品中，有贾斯汀·马蒂尔的三篇论文，"哲学家和殉道者"。他曾研究过希腊哲学的不同体系，最后选择了柏拉图式的哲学。在他皈依基督信仰之后，他仍然披着哲学家的外衣，没有在教会中担任任何职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通过与那些愿意与他交谈的人交谈来传授福音。在罗马，他向皇帝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发表了他的第一份道歉书（即辩道书），大约在主后138年。此后，在主后161年，他给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题写了第二份辩诉书。他的第三部作品《与特里波的对话》，试图说服犹太人相信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并回答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一贯反对意见。贾斯汀·马蒂尔的著作，除了将异教徒反对和诽谤的理由展现在我们面前外，还首次揭开了使徒时代后不久基督徒的教义观点的面纱。

塔蒂安，出生在叙利亚，是一个旅行的哲学家，就像贾斯汀一样；他是被贾斯汀改变的。他在 "对希腊人的论述 "中抨击了异教徒的神话，该论述是在距主后160年不久的时间创作的。他是第一个将四部福音书编织成单一叙事的人。主后177年，以前是雅典哲学家的阿提那戈拉写了一部“道歉书”（辩道书）的作品，标题是 "关于基督徒的大使馆"。安提阿主教西奥菲勒斯给一个叫奥托利库斯的朋友写了一部维护福音的作品。曾是哲学家的赫米亚斯写了一本讽刺性的书，题为 "对异教徒哲学家的嘲弄"。刚才提到的道歉书（辩道书）都是现存至今的。在失传的著作中，第二世纪中叶由犹太人出身的基督徒黑格西普斯写的使徒时代和后使徒时代的 "纪念"，也许可以归入这一类别。它是使徒时代之后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

有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辩护士，他的作品具有不小的活力和文采。这就是米努西乌斯-费利克斯。他的日期和居住地都无法确定。他被认为是罗马的一名律师；他在第二世纪末之前写下了一个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假想对话。

这一时期最出色的作家是亚历山大的教师们。北非亚历山大城是一所伟大大学的所在地，拥有大型图书馆、《亚历山大报》、及其博学的教授，以及一大批好奇心强、思想活跃的青年教师。在那里，在斐洛的犹太哲学中，柏拉图的教义与摩西和先知的学说相融合，通过寓言的方式，旧约圣经以一种易懂的声音重现了教义。

在这样的社区里，随着基督徒的增多，对慕道者的指导往往需要比普通教堂所需的更高级的理论解释。因此，慕道学校发展成为神学院，在那里处理神学的深奥问题，培养年轻人担任神职。亚历山大神学是那些坚持福音的伟大事实和真理的人中第一次认真尝试系统化地总结基督教教义与理性和哲学的关系。这是第一次试图在基督教和外邦人的智慧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就哲学而言，柏拉图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正如斐洛学派的事实。（犹太）拉比学校的寓言方法在解释《圣经》时得到了延续。

在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教师中，我们有记载的第一位是潘塔努斯。无论他有什么功绩，都被他的学生和继任者的名声掩盖了；这位著名的学生就是弗拉维乌斯-克莱门特——人们通常称他为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以区别于同名的罗马教会主教。这位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游历四方，勤于学习哲学，精通古代经典。他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一个丰富的、讨论性的天才智慧，以及一个既有深刻思想又有广泛同情心的头脑。他在辨别异教徒圣人的言论和新约圣经的教义之间的亲和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克莱门特很杰出，但他在构成一个伟大的神学家的素质方面被奥利根超越了。他被奥利根称为 "Adamantine"，因为他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奥利根，这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是系统神学的先驱；他写下了最突出和最有价值的早期抵御异教攻击、捍卫福音的作品--他的《回答塞尔苏斯》；他花了27年

时间准备他的《旧约》注释，即Hexapla；而且，通过他的注释，他在阐释圣经方面比任何其他早期教父作家做了更多的工作。并且，他以身作则，认可了我们所提到的寓言式与预表式的圣经注释方法。他作为教士的指导者和作者，影响非常广泛。

奥利根等亚历山大教师的思想倾向是灵性的，但也并非完美，而是有过分猜测的成分与错误。亚历山大的这些教师在向智力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信徒阶层传达真理时，在谨慎和谨守方面，做得不够完美；其关于神学方面的论述猜测与推论，有点超出了适当的限度。另外，除了有时对高于学生理解力的问题没有适当保持谨慎的沉默外，他们（错误地）认为对那些被认为无害的错误和迷信的信仰表示支持也没有错。

这一时期的一些作者，因为他们的著作几乎都是辩道的，反对异端的，因此被称为 ″论理学″。在这个名单中，最突出的是伊伦纽斯，他的长篇论文 《反对异端邪说—致西波吕托斯》，是第二世纪的主要基督教著作之一。伊伦纽斯出生在东方（小亚细亚），年轻时与波利卡普相识，因此与使徒约翰只有一线之隔；他的一生主要在西方度过，先是担任长老，然后作为波提诺的继承人，在里昂担任主教。他的作品是对诺斯底异端的详细驳斥；那些诺斯底主义者是当时教会和福音最可怕的对手。西波吕托斯是里昂的伊伦纽斯的听众，也是罗马附近的波尔图斯的主教；他也写了一部著作，名为《驳斥一切异端》。根据他（西波吕托斯）的判断，异端邪说的根源在于哲学家们不正当的猜测。

北非作家是创造拉丁语基督教文学的先驱。其中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也是这一时期所有作家中最杰出的，是特图良（本书译者注，或译特尔图良）。他熟悉罗马法，而且在皈依前似乎是个律师；在他皈依基督信仰之前，是一名辩护人。他将法律用语和罗马法律概念引入到神学讨论。他被赋予了天才，

是一个具有真诚和认真的基督教感情的人。他天生激昂，所以他的著作中充斥着某种奢侈和激情的语调。这些作品涉及多种主题，既有教义也有实践。他的热忱与塞浦路斯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西普里安，迦太基的主教，与特图良相反，主要写的是教会管理和纪律，风格清醒，符合他的本色，也符合他作为教会领导人的特殊活动范畴。

诺斯底主义刺激了正统基督教神学科学的发展。从它的反对者，如伊伦纽斯和西波吕特，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个方向上的觉醒影响。正是在诺斯替主义的主要阵地亚历山大和安提阿，正统系统神学首次出现并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诺斯底主义是一个永久的警告，使后世的正统神学家清楚地反对将身体上与道德上的邪恶混为一谈、以及将救赎还原为自然的过程。

==========

==========

==========

==========

==========

==========

==========

==========

第三阶段

从君士坦丁到格里高利一世（主后313-590年）

教会在罗马世界的至高无上地位

==========

第一章

基督教信仰的传播

君士坦丁的皈依

在第四世纪初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它是在尼禄时代，甚至是德西乌斯时代预言的，都会被认为是一种疯狂的幻想。即，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罗马帝国不再是教会的敌人和迫害者，从此成为教会的保护者和赞助者。教会与国家结成联盟，这在欧洲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硕果累累的，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基督教现在收获了人间统治者的友谊以及与民政当局的密切联系所带来的好处，也承担了危险。

君士坦丁生于主后274年。他是Constantius Chlorus（康斯坦斯一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海伦娜出身低微。她成为一名基督徒--是在他信教之前还是之后，并不确定。他长大后成为一个有气势的人，有敏锐的理解力，有很高的管理能力。年轻时，在为戴克里先和加利里乌斯服务时，他表现出个人的勇敢和军事才能。君士坦丁的父亲去世后，一场针对加利里乌斯的反击战增加了皇帝的数量，因此，在主后308年，不少于六个人声称要行使统治。君士坦丁的竞争起初是在西方，反对暴虐和放荡的马克森提乌斯。就在他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桥上战胜这个对手之前，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这一决定中，

就像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步骤中一样，掺杂着政治野心，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基督教团体的力量使他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一致支持。但他真诚地相信基督徒所崇拜的上帝，也相信上帝通过他（上帝）的旨意可以给他的仆人提供的帮助。君士坦丁后来以各种方式表明，旧的迷信在某种程度上仍在他的头脑中徘徊。他或许从未完全从阿波罗的崇拜中解脱出来。在一些场合，他下令向异教的占卜师咨询。然而，他直到死前一天才接受洗礼，并不是因为缺乏信仰，而是因为当时的流行观念（他也是如此认为），认为圣洁的洗礼能洗掉以前所有的罪孽。在他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前不久，他声称在正午时分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用希腊文写着："以此征服"。他采用了Labarum，或者说是十字架的旌旗，后来在他的军队中都是这样的。在后来与东方的统治者利西纽斯（Licinius）（他是异教的捍卫者）的较量中，君士坦丁更明显地成为了基督教事业的支持者。主后323年，利西纽斯的最后失败，使他（君士坦丁）成为整个罗马世界的主人。主后311年由加利乌斯、君士坦丁和利西尼乌斯签署的一项诏书宣布了宗教事务方面的自由和宽容。主后313年的米兰诏书是由后两者发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诏书发布的时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诏书中称良心的神圣权利是该诏书的动机；这意味着一个不得不等待许多世纪以后才能实际实现的学说。

君士坦丁本人并没有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压制异教徒的崇拜。然而，他禁止所有异教仪式涉及不道德行为、魔法或巫术的异教仪式。

他在新建的君士坦丁堡（"新罗马"），也就是他所建立并作为其首都的地方，只允许基督教崇拜。而他在许多方面利用他的个人影响力，通过劝说和分配职位和其他奖励，使人们皈依基督教。他甚至在他的宫殿里向鼓掌的听众发表劝人信教的演讲。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在与教会的关系上，他称自己为 "外在的主教"。这句话是以愉快的语气说的，但它表达了他对其教

会职能的实际看法。他不承认自己有权力干预教会正统的问题。他的工作是确保主教们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保护教会，且在反对分裂派的情况下保持统一性。然而，他在处理神学争端时并没有始终一直遵守这种自我克制的措施。在这样一个君主的统治下,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来自异教徒队伍的教会援军。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新的“基督追随者”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由利益动机驱动的。帝国的宠爱，而不是从前的帝国的敌意，现在成了教会的危险源。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英国的教会最清楚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读到，在主后314年的阿尔勒教会集会的会议上，约克、伦敦和林肯的主教代表英国教会出席了该会议。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时期，它（英国教会）的地位十分突出，成为迫害的对象，尽管在可行的范围内受到君士坦丁（Constantius）的保护。

早期英国教会的起源和发展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在罗马人在英国站稳脚跟后不久，福音就被带到了英国。由于军事定居点和野生居民之间的激烈对立，基督教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

主后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把帝国留给了他不称职的儿子们。在随后发生的分裂中，东方落入君士坦丁二世（老君士坦丁的一个儿子）之手；而后来，在他的兄弟们死后，整个帝国被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对他来说，古老的罗马偶像众神宗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父亲的温和政策（即，他父亲时代的政府保持中立立场）。他不仅重申了禁止（对于罗马偶像众神的）献祭的规定，而且下令对那些拒绝遵守其要求的人处以死刑和没收财产。许多人作为异教殉道者受苦，并通过他们的坚定和勇气为即将消失的古罗马宗教事业带来了荣誉。其继任者康斯坦斯二世，这位在西方独占十年的皇帝，以及在他之后的君士坦丁，不得不在该地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旧的（古

罗马偶像众神的）宗教在罗马很强大，特别是在父系家族。由于这个原因，古城的庙宇得以幸免，她的宗教机构得到了尊重。在整个帝国，主后346年之后，那些因艺术之美而受到重视的庙宇逃过一劫，而许多不太出名的庙宇则被拆毁。

基督教的纯洁性现在已经被它与国家的短暂联盟所腐蚀。仅仅是形式上的虔诚是通向职位和皇室宠爱的一个通道。社会的道德基调被虚伪所侵蚀。主教们对错综复杂的教义的争论，使那些热心的争论者的不虔诚的生活更加突出。这种情况为旧宗教的信徒们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辩护理由。在民众看来，政府采取的（对于旧罗马宗教的）迫害措施和（旧宗教）神职人员的推动，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一丝英雄主义。这种反动的力量继续增长，直到它在皇帝朱利安（被称为叛教者，即背叛基督教者）时期达到了高潮。

朱利安于主后361年获得了帝国。他的地位和教育适合成为这样一个倒退运动的领导者。他最亲近的亲戚被他表哥的嫉妒所毁灭，这让朱利安对康斯坦斯二世和他的宗教（基督教）都不信任。他那颗热切的心，天生具有想象力，并带有感情色彩，被堕落扭曲的、曲解的、基督教教义塞得满满的。他和他的兄弟接受了教会教育，以防止他们有野心。由于康斯坦斯的持续嫉妒，朱利安被送出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了在尼科梅迪亚继续学习的许可。他在那里成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利巴尼乌斯的学生，并秘密地接受了古老的信仰。此后，他访问了雅典，受到那里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影响。他们在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恢复古老宗教制度的计划，并教导他相信自己是重新维护被忽视的偶像众神的权利的天命之子。

他一登上王位，就对他认为自己被召唤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作为最高教皇（教会统帅），他亲自，甚至炫耀性地，积极主持仪式和献祭。他宣称对基督教的宽容，但为了使其蒙羞，他鼓励所有基督教派的争论。表面上是

为了正义，但也许是为了挑拨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召回了被他的前任皇帝所放逐的主教们。他下令重建被基督教狂热者破坏的（偶像众神的）寺庙，费用由他们（寺庙破坏者们）承担。他禁止基督徒举办修辞学、语法学和古典文学学校，希望以此来阻止基督教在受教育者中的进一步传播。在君士坦丁时期，（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一直受到压迫，因此在朱利安时期，他们受到了青睐。虽然他谴责他们（犹太教）的排他性，但他赞扬他们对民族神的崇拜。在他的命令下，工人们试图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却被从下面的拱顶中冲出的毁灭性大火吓跑了，人们认为那火是奇迹般地燃起来的。朱利安为扭转宗教进步的秩序所做的徒劳努力与他的生命一起逝去。

他的生命在两年后结束了，当时他被卷入了帕提亚的远征。

朱利安死后，基督教在国家中再次成为主导。接下来的几位皇帝的政策是宽容的宗教政策。约维安（主后363-364年）只禁止了朱利安之后的那些为魔术目的而举行的宗教仪式。他在东方的继任者瓦伦斯（主后364-378年）也没有走得更远。那些从事占卜和巫术的人被看作是政治上的危险，因此受到迫害。西方的皇帝瓦伦蒂尼安（主后364-375年）则是完全宽容的。然而，古老的偶像众神的宗教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迅速流失，以至于它现在被称为异教，或农民的宗教。格拉蒂昂（主后375-383年），继承了他父亲瓦伦蒂尼安的皇位以后，放弃了（对于古罗马偶像众神宗教的）温和的政策。他是第一个拒绝穿上马克西姆长袍的人。朱利安曾在罗马元老院中恢复了供奉胜利女神的祭坛，但他又将其拆除。他剥夺了祭司团接受不动产遗产的权利。他还剥夺了祭司和圣职者从国库中获得的支持，并没收了（偶像众神的）寺庙的财产；当罗马元老院提出抗议时，他拒绝听取这些抗议。格拉蒂安的继任者瓦伦蒂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主后375-392年)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敦促下，确认了这些条例。

异教（即古罗马偶像众神的宗教）不再能严重惊动那些捍卫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主政者）现在不得不面对来自帝国边界徘徊的国家的新危险。长久以来，罗马的英勇作为抵御野蛮人的堡垒的边界，终于被突破了。马略斯和凯撒、特拉扬和马库斯-奥勒留，这些众多的英雄，以及他们率领的军团对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攻击者所表现出的纪律严明的勇气，都已成为过去。北方的部落冲破了长期以来抵制他们前进的障碍。掠夺性的入侵之后，大量的团体被允许在皇帝管辖的领土上定居。这些人用大量的野蛮人新兵加强了他们（罗马人）虚弱的军队，其中一些人从队伍中升到了高级指挥职位。最后，大量的、没完没了的入侵者从不同的地方涌向古老的权力和文明的所在地。城市的战利品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关于这些城市的富足和辉煌的模糊传言，或者说，可能是生动的印象，已经经过遥远的森林传到了他们那里。现在，基督教的任务是用它的思想来征服这些野蛮人，用它的精神来提升这些野蛮人，现代欧洲就是通过这些野蛮人而产生的。

西哥特人，一个最近才皈依阿里乌派（或译为亚流派）基督教的民族，是这支强大队伍的先锋。有必要来叙述他们的皈依故事。他们是居住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通过他们的掠夺性探险，他们第一次认识了基督教。他们从卡帕多西亚带走的基督徒俘虏向他们传授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的雏形。但哥特人的伟大使徒是乌尔菲拉斯，他可能是那些卡帕多西亚家族中的一个后裔。他在主后343年被任命为主教，并在西哥特人中作为传教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由于东哥特人对西哥特人的敌意，他在东哥特人中几乎没有进展。早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乌尔菲拉斯就得到了任命，把他的哥特基督徒中的一队人马带过去，这些人正在遭受迫害。

遭受迫害的哥特基督徒穿越多瑙河，从而进入了罗马帝国的范围。他在离尼

科波利斯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在那里他作为主教又工作了33年。乌尔菲拉斯从一开始就是阿里乌派，因此他所有的皈依者都是阿里乌派（译者注，这个基督教派别在神学上的偏差是，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耶稣基督不仅是完全的人，而且是完全的神；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涌入帝国的几乎所有日耳曼民族都是从西哥特人那里接受基督教的，因此，一开始就信奉阿里乌派的教义。乌尔菲拉斯给哥特人提供了一种书面语言，在希腊语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字母，并为他们翻译了《圣经》，或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个摩西-哥特式版本的碎片是日耳曼语言中最古老的书面纪念物。

与此同时，仍然是异教徒的阿塔纳里克（东哥特人）对基督徒进行的迫害，扩大了这个民族两个部分（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之间的裂痕。大约在主后370年，匈奴人开始向东哥特人施压，并与其中一部分人一起将西哥特人挤到多瑙河边。西哥特人现在恳求罗马皇帝瓦伦斯在罗马领土上为他们提供庇护。据说，乌尔菲拉斯率领了这个使团。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并越过多瑙河进入了莫西亚。但是，腐败的帝国统治者的贪婪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随后的阿德里亚诺普尔战役中，瓦伦斯被击败并被杀害。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狄奥多西被格拉蒂安任命为东方的摄政王。狄奥多西以其强大的力量遏制了哥特人的发展。他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抵挡了哥特人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进展。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支持尼西亚会议的三位一体教义，并试图通过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阿里乌主义。主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总会议，会议重申了尼西亚教义。乌尔菲拉斯在这一年或主后383年被皇帝召到首都。他（乌尔菲拉斯）对反对阿里乌派教义的最终决定深感悲痛，没有活多久。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了一份信仰忏悔书，作为他的遗嘱留给了他的哥特人。二十七年后，在西哥特人的领袖阿拉里克洗劫罗马城期间，罗马市的基督徒们都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即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大

教堂，被保护起来，免遭普遍掠夺；这或许可以看出乌尔菲拉斯的教导的影响。

主后410年，阿拉里克和他的西哥特人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城，这是对罗马异教的致命一击。古代（罗马偶像众神）宗教（现在被称为异教）的圣地被洗劫一空，作为其最坚定支持者的罗马贵族家庭要么被摧毁，要么散落在帝国的不同民族中。罗马的异教党人曾希望从异教徒野蛮人的统治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些野蛮人在几年前曾进击过该城。但异教徒的拉达盖苏斯被打败了，而基督教的阿拉里克却取得了胜利。

第五和第六世纪见证了北方野蛮人的（对于罗马帝国的）大举入侵，因而也见证了帝国人口的重要变化。

西哥特人现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涌入高卢（今法国），然后进入西班牙、征服了阿兰人，把苏维人赶到西北部的山区，把汪达尔人赶到一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哥特人得到了在高卢西南的一个地区，以卢瓦尔河和罗纳河为界。他们很快通过征服将这块领土扩展到西班牙。与此同时，一个勃艮第王国也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

汪达尔人在西班牙并没有长期保持平静。主后429年，他们在根塞里克的领导下进军非洲。

为了保护自己的行动，根赛里克从北方召来了 ″上帝的祸害 ″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这股无情的、令人厌恶的野蛮主义浪潮威胁着基督教文明的存在。

为了将其击退，罗马和高卢国家在主后451年的夏隆大战中并肩作战。

他们赢得了胜利；但阿提拉和他的主人仅仅被削弱了，而不是被摧毁。第二年，他们向意大利平原进发，沿途带来一片荒凉。直到罗马的大主教和朝廷的使者进入他们的军营、劝阻他们，他们的怒火才被遏制。

罗马主教和朝廷大使进入阿提拉的匈奴营地，用黄金和劝说使他们退却。

但是，罗马主教利奥没能以同样的方式从汪达尔人的国王根赛里克手中拯救罗马，后者在主后455年带着他胜利的武器进入意大利。

主教利奥只成功地减轻了掠夺的恐怖。

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当罗马和基督教意大利因皇帝的软弱而屈服于野蛮人的蹂躏时，罗马主教在保卫城市和各地的基督徒方面无所畏惧；他们向他寻求保护。当霍诺留和他的继任者躲在坚不可摧的拉文纳时，他（罗马大主教）却在罗马，面对所有的危险，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样一位教长就是利奥。无论职责和羊群的利益需要，他都去了，不顾自己的安全。他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富有进取心，而且坚韧不拔。从皇帝软弱无力的手中掉下来的权杖被他和他的继承人抓住了。罗马在失去她的旧帝国后找到了一个新的、更持久的统治权。

早在霍诺里斯统治时期，为了满足帝国的需要，罗马军队就从英国撤走了。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基督教文明陷入了困境，没有得到保护，承受野蛮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侵袭。然后，从主后449年开始，大量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占领了英国，把不列颠人赶到了威尔士和康沃尔寻求发展。因此，该岛的大部分地区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被交给了特奥托尼奥的异教。

后来，撒克逊人皈依了基督教。在抵抗波斯人的侵略和迫害的斗争中，他们

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捍卫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尽管基督教在这一时期进展迅速，但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的大国以及日耳曼不列颠还没有收到福音的光芒。将福音传给他们是以后几个世纪的工作。

==========

第二章

组织的变化：罗马教廷的发展

教会与国家

基督教的纯洁性和其本质的简单性在之前的时期被神学思想的发展所掩盖，而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它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因为它与世俗权力的联盟和对帝国影响的服从，使它面临新的危险。君士坦丁登基后，发现教会在等级制度下组织得如此牢固，以至于它（教会）不会因为绝对地并入国家而失去其特性。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来界定教会和国家的各自领域，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和他的继任者在教会事务中行使了很大程度的控制权。他们根据自己的权力，担任最高的主教职务。他们召集总议会，由他们的代表主持，并公布协约法令作为帝国的法律。一些后来的希腊皇帝甚至还行使权利，对有争议的教义问题作出决定。这种僭越行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每个神学党派都热衷于争取政治权力站在自己一边，从而压倒其对手。

东方教会由于其特点和处境，更容易受到这些弊端的影响。它与朝廷的计划和官员密切接触。它的信仰力量被耗尽了，而西方则被不断的冲突和激烈的教义分歧所影响。

教士们的思想被野心和奴性所感染。他们求助于政治阴谋的方法来促进他们的世俗利益。相比于东方教会（东正教体系的前身），西方的教会在性格上更加清醒和坚定。它（西方教会）有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等级组织，再加上它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保护它免受帝国政府腐蚀的一些危险。因此，在这个时期、西方教会总体上更加独立，而东方教会则逐渐被国家所奴役。

皇帝们努力通过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来促进基督教的利益，并赋予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新的法律权利，这些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以前（古代罗马偶像众神敬拜体系的）异教徒神职人员所享有的权利。

君士坦丁建造的一些教堂从公共资金中获得收入，而其他教堂则得到了被没收的原偶像寺庙的财物。教会财产现在迅速积累。教会成为所有没有留下遗嘱的神职人员的财产继承人。由于当时的虔诚和迷信，接受遗产的权利成为教会财富的一个丰厚的来源。然而，这项权利被滥用，以至于瓦伦蒂尼安一世（主后364-375年）发现有必要制定一项法律，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免受基督教修士和神职人员的贪婪之害。教会的职务被许多人变成了个人致富的手段。

君士坦丁给神职人员提供的免除繁重的民事义务和各种形式的税收的救济，导致许多贵族阶层的个人既拥有财富、又争相担任教士职务（尽管其中有一些人的职位在教会中是次要的）。

君士坦丁看到这种做法对国家的危害，规定只能任命新的神职人员来代替即将去世的神职人员；而且这些新聘人员不得从贵族家庭或富裕家庭中选拔。这样的法律对教会的伤害必然不亚于以前的法律对国家的伤害。因此，在主后383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它允许任何人进入教士职位，但规定那些因财

富和等级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应首先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

自愿承认的——教会及其主教——对教会成员行使的管辖权，现在被置于法律基础之上。

在教会事务中，在经双方同意提交给他们的民事案件中，以及在神职人员之间的所有事务中，主教们的决定都是最终的。这些成倍增加的职责有可能成为有良知的教士们难以忍受的负担。他们中的一些人抱怨说，他们被迫花费太多的时间来解决争端；而另一些人，更有世俗观念，则享受着他们在世俗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确立教会法庭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案件的管辖权。这种趋势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下一个时期，即使是涉及神职人员的刑事诉讼，也被赫拉克利乌斯发回这些教会法院审理。

但宗教牧师们能够促进正义和人道的事业。教堂被变成了避难所和收容院，在那里，被追捕的奴隶或受难的国家职员可以在其中避难，直到神职人员能够出面调停，减轻司法的严厉程度，并以更高尚的方式保护无辜和不幸的人。神职人员被认为是公共道德的监督者，他们多次无畏地斥责粗鲁的狄奥多西的破坏性的专制主义和压迫的行为。甚至皇帝狄奥多西也被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强迫要求，下令为在塞萨洛尼卡进行的一次大屠杀做忏悔；在那次屠杀和暴乱中，一名军事长官被杀。在安提阿主教弗拉维安努斯的代祷下，该城得到保护，免遭同一皇帝（狄奥多西）的报复。

在其他情况下，在处理敌对统治者时，主教们被发现效仿施洗者约翰的例子。

在君士坦丁皇帝骑马经过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街道时，亚他那修毫不畏惧地对君士坦丁讲话；皇帝傲慢的精神被一个恳求他的正义和唤醒他的良知的主教的勇气和雄辩所吓倒。

凯撒利亚的伟大主教罗勒，对朱利安的威胁性信息作出了热情而严厉的答复；并且，很久以后，他以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面对了瓦伦斯的专员莫德斯特，然后是皇帝本人。

根据神权思想，神职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代表可见的教会，是地上的神国与它的神主之间的纽带，也是圣灵传达给世界的渠道。一种强烈的感觉正在形成，那就是神职人员应该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并表现出比普通基督徒所要求的更高的道德形式。神职人员就这样与普通人（基督教平信徒）对立起来：有两种基督徒生活的理想。这种对比诱惑着前一种人（基督教神职人员）对自己优越的圣洁性产生虚假的骄傲；而后一种人（基督教平信徒）则对单纯的外部道德产生危险的满足感（即，对于基督教平信徒而言，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安安分分地待在教会里面，就会安全地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从而，他们的信仰热忱逐渐冷却下来，并且不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心灵与信仰真实光景）。通过教会会议的影响，以及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其他领导人的影响，三个等级（主教、长老、执事）的神职人员的学说，以及三级以上（即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应保持未婚的教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在西方，独身主义受到反对，而在东方，它的进展则受到虔诚而受人尊敬的传统主教的论证和榜样的阻碍。

人们对神职人员的职责以及他们的生活的评判，过多地以一种外在的、非精神的标准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圣职是赋予所有需要的能力的神奇方式。这种想法在西方特别盛行，因此，尽管奥古斯丁等人在相反的方向上产生了影响，但神学教育还是受到了阻碍。

在西方，没有神学院，也没有什么回廊修道院，而且，除了北非主教的个别情况外，神职人员不必接受考试。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些缺陷，奥古斯丁和其他具有类似精神的人，把他们的神职人员聚集在同一个住所，在一个共同的圣餐之礼桌子上。

东方（君士坦丁堡以及小亚细亚等地）的神学教育景况更好。在那里，古希腊文化的传统还没有失去其影响力。那里还有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伟大神学院，以及许多回廊修道院，它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育，尽管往往范畴很狭窄。然而，总的来说，神职人员的普通学校是他在教会中的低级文职部门的实际训练。但这一优势并不总是被利用，尽管有各种法律规定，较高职位的候选人应该从预科生或学者的位置上一步一步地上升。

在神职人员的任命上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时，一些具有特殊声望或明显能力的人被直接从世俗生活中召入神职人员行列。虽然这违反了教会的一般规则，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害的。当拿撒勒人格里高利辞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时，拥有元老级地位的内克塔利斯在塔斯马尼亚等大多数主教的建议下，被狄奥多西任命为主教。他（内克塔利斯）甚至没有接受过洗礼，却穿着新教徒的白袍被宣布为主教。

偶尔，通过这种不规范的做法，人民（教会会众）能够行使他们古老的权利，参与神职人员的选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米兰的人民（教会会众）以鼓掌的方式选立安布罗斯为他们的主教。当时他（安布罗斯）只是个慕道者，没有接受过洗礼。但八天后，他就坐上了主教的宝座。

然而，会众的权利虽然在这一时期没有被剥夺，但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有一个空缺的主教教职时，其他主教的责任是提名。民众（教会会众）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主教往往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就任命低级职位。在皇帝不干预

的情况下，主教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省的神职人员，但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这在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形式。

许多神职人员，尤其是东方的神职人员，充满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渴望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获得一席之地，或寻求类似的殊荣。他们试图推翻禁止从一个教会转移到另一个教会的法律，这引起了许多纷争和苦恼。还有一些人经常离开他们的教区，表面上是为了怜悯的任务，而实际上是为了去皇宫宫廷，他们在宫廷中的生活是如此的快乐。这种主教缺席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安提阿会议（主后341年）和萨迪卡会议（主后343年）不得不通过严厉的法律来反对这种现象。

主教和长老的原始身份正在被迅速遗忘。主教，作为使徒的继承人、逐渐被认为是真理的支柱和见证者，是将圣灵传递给下层神职人员的管道。通过他们的权威和任命，下级长老们（牧师们）和执事们能够履行属灵的职能。他们（主教们）主持神职人员的集会，关注教会财产的管理。在他们下面是长老（牧师），在他们（长老们）下面又是执事。然而，在许多地方，执事，特别是“大执事”，因为更接近主教，所以努力占据着高于长老的位置。一般来说，他们（执事们）的职责是在宗教仪式中协助高级神职人员。某些祈祷词的复述和福音书的诵读被指派给他们（执事们），而其他部分的经文，作为附属品，则被指派给选民（教会会众）。在这一时期，女执事的职位失去了其重要性。它在西方被终止了，但在东方一直延续到12世纪。此外，还增加了各种下级职务，大大扩充了神职人员的队伍。其中第一个是Ceconomus，即管家。他的职责是保护教会财产不被盗用，对主教的管理进行一定的监督，并在主教职位空缺期间照顾教会财产。教会有时会被卷入的民事诉讼，迫使它雇用一名顾问；他起初是一名神职人员，但后来经常是一名律师。由于每个教会都希望对其殉道者的历史进行记录，这就产生了公证人或记录员的职位；公证人一般是执事，在后来的时代，他（公证人）的职责是对宗教议会

的程序进行全面报告。与神职人员一起被任命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的人也应被计算在教会职员队伍内。他们（教会职员）的人数迅速增加，以至于在亚历山大和安提阿这样的大城市，不得不通过法律来限制他们的人数。

教会体系等级制度的组织逐渐完善。不仅所有的主教都被提升到长老之上（译者注，即，本来，在新约圣经中，主教、或监督，与长老、或牧师，其实是同级别的、关于教会牧者或教会牧师的称呼，或者是同义词、近义词；但是，随着几个世纪的发展，这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权力等级制度，或金字塔式权力架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主教、大主教等等，居于高位，而长老等居于低位），而且某些负责管理的、掌管教会的主教因其处境而与众不同，或由于他们优越地宣称自己是使徒传统的法定继承者，——而被置于他们的相对而言地、不太受宠的弟兄们之上，拥有权威。

乡村主教们首先失去了他们的特权，然后是他们的存在。主后343年，萨迪卡会议规定，小镇上的主教（牧者）不应该被任命，理由是在那里长老们已经足够了。根据后来的一次会议的规定，要向这些乡村教会派遣访问的长老，照顾他们的福利。因此，这些教会成为邻近城市教会的附属机构，被称为教区。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最终只是表示乡村社区。随着基督教在城市的传播，一个教堂不可能容纳所有的崇拜者。然而，每个新教会都隶属于母教会，由母教会的主教主持。通常它（新教会）有自己的长老，服从于（母教会的）主教，但在某些情况下，它是由（本地）长老们轮流主持的。

每个省的主要城市的主教被称为大主教。他对本省的所有教会进行全面监督。在省内神职人员的协助下，他任命（省内各个城市教会的）主教。他的职责还包括召集和主持会议，以及在教会法庭上审判对各个主教的指控。在这些大主教中，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即使在前一时期，也因负责管理几个省而显得与众不同。虽然这种安排得到了尼西亚会议的批准，但各

省的主教会议仍被承认为教会的最高机构，作为最高的教会法庭。

然而，在关于阿里乌派（译者注，阿里乌派，或译为亚流派，没有正确而完全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争论中，这些省议会被认为太弱了，于是大型的教会等级组织就出现了。在东方，君士坦丁皇帝将帝国划分为几个教区的做法被沿用。因此，每个教区的主要城市的主教被提升到所有其他大主教之上（即，这些教区主教的权力与管辖范围，超过了原来省级主教的级别，而成为了更高的、教区大主教等级制度）、虽然他（教区大主教）的权利在不同的教区有所不同。埃及教区的权利最大，亚历山大城是其首都。在色雷斯教区，新成立的君士坦丁堡自然成了首都，取代了赫拉克拉。这种教区安排得到了君士坦丁堡议会的批准；而教区会议，作为最高的教会法庭，被置于省议会之上。同一个会议（教区会议）给了君士坦丁堡主教在这些教区的主教被提升中的首要地位，他（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在政治影响的支持下，建立了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包括对以弗所和新凯撒利亚主教的邻近教区的控制。

后来在主后451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承认了这一安排，并授予了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接受整个东方教会上诉和申诉的权利。“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因此在实际权力上与古罗马平起平坐，尽管在名义上比它（罗马）略低。迦克墩会议的这一行动是东西方敌对教区之间长期激烈竞争的根源（译者注，这在后来演变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欧天主教体系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欧东正教体系之间的竞争）。

大约在这个时候，“牧首”这个名字以前是对每一位主教的尊称，现在则专门用于罗马、君士坦丁堡、（北非）亚历山大、安提阿等大教区的主教。根据迦克墩会议的法令，耶路撒冷教区也被提升到这一级别，不是因为它的实际影响力，而是因为它的历史尊严。

虽然东方有四个大教区（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其中没有一个可以长期支配其他三个；但在西方的崇高教区只有一个（罗马教区）；甚至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它（西方的罗马教区）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罗马对十个郊区省份拥有教会上的优势，包括意大利、伊特鲁里亚北部边界以南，以及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和瓦莱里亚。但它的实际权力绝非如此有限。作为一个最崇高的使徒教会，它的建议在前一时期被所有西方国家以崇敬的态度接受，其中许多教会都是它建立的。它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和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辉煌。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强大，它的管辖权正缓慢但肯定地扩展到整个西方教会。

主后347年的萨迪卡会议赋予罗马大主教朱利叶斯特权，如果他认为被审查的主教的申诉值得考虑，他可以任命法官审理涉及他们（主教们）的案件。他甚至可以对主教会议的判决进行修改。事实证明，朱利叶斯大主教对使徒彼得的高调纪念，对教会的自由是危险的。根据所谓使徒指定的理由，给予朱利叶斯这种特权的法令，以及格拉蒂安皇帝对后来的罗马主教的授予，被认为是赋予了罗马主教的永久权力；而且由于错误，它们后来被当作尼西亚会议的法令，其影响力大大增加。在下个世纪的头几年，它们被引用为尼西亚法令，在与北非教会（以亚历山大为首都的埃及教区）的争论中被有效地使用。但北非人抵制了罗马大主教英诺森一世（主后402-417年）建立的司法权威的要求，并在之后禁止（本教区神职人员）向外国主教（例如罗马主教）提出一切上诉。然而，不久之后，汪达尔人（从西班牙）侵入北非以后带来的混乱和苦恼给了利奥一世（主后440-461年）一个重申罗马主教管辖权的机会。

尼西亚大公会议后不断激起的、东方众教会的教义争论，倾向于提升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地位。（在东方众教会中的、教义争论过程中的）每一方都向罗

马教廷寻求支持，并使用谄媚的语言；罗马主教对这些（谄媚的）语言进行字面理解，并在引起争议的事件平息后继续引用。在关于基督神性的争论中，（罗马主教）尤利乌斯支持亚他那修的事业（译者注，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著名教父，他坚决反对阿里乌教派、或译为亚流派的神学错误，并坚决坚持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即，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尽管他（罗马主教）的干预遭到了东方教士的不满，但罗马的影响仍然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因为罗马支持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关键时刻，罗马主教也以教义要理公式（信条）进行干预，这些要理公式（信条）得到了普遍接受。最令人难忘的例子是在迦克墩，当时信条中关于基督的位格的陈述的声明主要来自（罗马主教）利奥的信。

东方的主教们习惯于听从西方教长的建议，理由是罗马在历史上的优先权。但在罗马教会中，以使徒彼得的首要地位为基础的教会至高无上的观念正在迅速获得明确的形式和坚决的支持。这种想法完全占据了（罗马主教）利奥的心智，他是一位在确立罗马教廷地位方面有巨大影响的主教。当迦克墩会议在给予君士坦丁堡主教同等特权时，利奥认为，罗马主教的高位是由于罗马是帝国的古都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因此拒绝了这种想法（即拒绝与君士坦丁堡主教拥有同等特权）。他（利奥）声称，罗马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是使徒的首领和基督的代言人。在这一场合，他给皇帝写道：″如果没有那块石头[使徒彼得]，就没有罗马主教。我们的主已经奇妙地奠定了基础，除此没有任何结构可以站立。″

但利奥并没有放弃从罗马的政治地位中得到的好处。他巧妙地将这一点与刚才提到的更重要的考虑交织在一起。他声称，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为此，罗马被选为使徒首领的主教区。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预言她（罗马）的精神征服和统治将在荣耀上超过她的

世俗力量所获得的一切。利奥利用一切机会使这一预言早日实现。

他试图恢复一位被希拉里（Hilary）废黜的主教的职位，希拉里是东南高卢（今法国）的大主教。他对希拉里的顽固不服感到愤怒，于是越过了萨尔迪卡会议授予朱利叶斯的特权，未经审查就恢复了该被废黜主教的职位，并将该主教的权利从阿尔勒转移到维埃纳。然而，希拉里继续享有与以前一样的尊严。然后，皇帝瓦伦蒂尼安三世颁布了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律，罗马主教被宣布为西方教会的最高领袖。这项法律的理由是：彼得的首要地位，罗马城市的尊严，以及神圣的宗教会议的法令。抵抗罗马主教的权威被确认为是对罗马国家的犯罪。在高卢的主教们若没有得到罗马主教（Papa urbis æternæ）的同意，就不能进行任何活动。

利奥在另一个方面成功地维护了罗马的权威。在阿里乌之争中受到罗马保护的东伊利里亚主教们，对塞萨洛尼卡主教的统治感到不满，要求加入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区。利奥不仅使他们与他们的上司和解，而且还使他们的事务更直接地感受到他的影响。

意大利的政治变化与教皇制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主后404年，霍诺里斯将他的住所定在亚得里亚海边境的拉文纳（即，远离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边界，他的继任者们也在那里居住，这有利于哥特人国王和东方的君主，以及他们在哥特人国王和东方君主解散后的统治，即西方帝国解体后的统治。

从这时起，来自民事统治者的亲近和宫廷生活的影响的危险，即东方教会经常面临的危险，（在罗马）就消失了。除了查士丁尼在意大利的短暂统治期间，民事力量不再严重干扰罗马主教特权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罗马主教）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在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事务中都感受到了他的权威。

_____

蛮族王公，特别是狄奥多里克，给了罗马主教很大程度的自由；只要狄奥多里克不在，激烈的竞争则会将他们（历任罗马主教们）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分开。

他（罗马主教）没有理由害怕一个反对他的教会等级制度的组合。甚至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他也没有插手，直到被要求干预，然后允许西马库斯的党派在他们的宗教会议上宣布，不允许外行（平信徒）的一切干涉。在这场争论中，被召集来审核关于西马库斯所提出的指控的宗教会议成员、恩诺迪乌斯发表了重要的声明，即罗马主教应该由上帝单独审判（而不是由教会其他人员审判），这是神圣的意愿。通过对正统信条的稳定遵守，罗马主教们在教会中的地位继续上升，并为他们的主张赢得了更多的青睐。但是，他们（历任罗马主教）还没有要求获得新的或特殊的尊严；他们只要求承认他们在（其他）主教犯错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们）有审判权。

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对意大利的统治期间，罗马主教们暂时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和独立地位。在此期间，罗马主教们被皇帝查士丁尼视为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平起平坐，并被胁迫支持他（查士丁尼）的教义偏好。

他们（君士坦丁堡主教们）现在放弃了以前对正统会议决定的一贯坚持，卷入了基督一性的异端邪说(即，片面声称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否认他的人性)，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同时，另一方面，罗马似乎要失去她的好名声，失去她在西方的控制性影响。一些意大利教会甚至断绝了与她（罗马主教）的共融关系。正是伦巴第人挽救了罗马的正统性，使她未来的伟大成为可能。

他们（伦巴第人）通过打破希腊（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希腊主教团的权力而做到这一点。虽然罗马的主教们在名义上仍受制于东方的皇帝，但他们实际上已迅速变得独立。意大利现在学会了向他们（伦巴第人）寻求其名义上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堡皇帝）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保护。

起初，教皇（Papa）这个名字，在西方是对于所有主教的荣誉称号，在东方则是对于罗马大主教和亚历山大主教的特殊称号。

但早在六世纪初，在意大利，这（教皇）就成为罗马主教的专属称号。

教会法的编纂对罗马的主教们以及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增加了教会等级制度的力量。这方面第一个令人满意的教会法集合是由修士Dionysius Exiguus在主后500年左右制作的。他的书中包含了从西里奇乌斯时代开始的教皇的法令，一般或大公会议的法令，以及省议会最重要的教规。

关于教会纪律的强调性主张，在前一个时期由诺瓦提派坚持，在第四世纪初由多纳图派重新开始提出。他们宣称，总的来说，严格的纪律对于维护教会的纯洁是必要的，特别是，（不问青红皂白而）接受任何在迫害下否认基督的人回到信徒的团体中是错误的。这些观点伴随着对殉道者的奢侈崇拜，以及对他们的反对者是教会的腐败者的强烈信念。一群群狂热的修士和农民加入了他们的事业，成为非洲许多地区教会的恐怖。

在下一个世纪，在（北非）迦太基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奥古斯丁在会上徒劳地试图说服多纳图派中比较理智的成员。此后，他们又挣扎了许多年，直到最后被帝国的军队所压倒。赞成温和纪律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最坏的罪人，如果忏悔的话，现在也可以恢复到教会的关系中。忏悔过程中的步骤

被系统地安排。对私人罪行的忏悔是需要的，因此，一旦忏悔，就会被视为是悔改的希望，并得到减轻普通惩罚的奖励。那些生活中众所周知有罪的忏悔者要听从主教或（负责忏悔的）长老的指示，这在东方大城市中是很常见的。但在主后390年，由于某些丑闻，君士坦丁堡牧首废除了这一职务，从此忏悔就由个人的良心来决定了。纪律在西方也有些堕落，尽管人们仍然认为宽恕是以忏悔为条件的。外在的忏悔表现和内在的忏悔精神一样受到重视，而内在的精神至少在理论上是被认为会促使它的。

==========

第三章

基督徒的生活和敬拜

重要的基督教的衰落

形式主义的增长

当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宗教时，它也成为一个奢侈和腐朽的社会的时尚。随着时间推移，它以被削弱的力量面对其新地位所带来的特殊困难和诱惑。它的重要原则被不符合其本质的思想所覆盖，部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纯洁和稳定之光本应照亮世界的黑暗和混乱，但却被一种形式主义的、教会式的虔诚弄得暗淡无光，或被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弄得神秘兮兮。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生活，由于摆脱了迫害的束缚，得以自由地按照以前开始

的趋势发展。而这些趋势在之前已经开始使他们被感受到。它现在受到来自教会内外的许多微妙的、贬低的影响。在一种宗教衰落和另一种宗教兴起的过程中，无神论和士气低落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是很自然的事。对福音普遍存在的非精神性观点（即，外在的、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使众多的异教徒有可能从旧的宗教转向新的宗教，而仅仅是改变名称。对他们来说，基督徒的生活似乎只是一轮仪式和敷衍的义务。许多人试图通过施舍和参加圣餐来为罪恶的生活赎罪。他们在洗礼中看到了从灭亡中解救出来的简单手段，因此他们推迟了诉诸圣洁的洗礼，直到面临死亡的临近时才想到要受洗。像他们的异教徒祖先一样，他们嘲笑和迫害那些努力过着真诚虔诚生活的有良知的人。修士和神职人员所需的虔诚与普通基督徒所需的虔诚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这就助长了这些名义上的（徒有其表的）平信徒的错觉。

即使是第四世纪的伟大神学家和传教士，他们抵制了那个时代的邪恶倾向，也没有完全摆脱同样的非精神性观念（即，形式主义、教仪主义、礼仪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更崇高的基督教理想仍然在许多人的心中保持着活力。在一些最伟大和最优秀的教会教师的母亲身上，可以看到它最美丽的表现。本章就是以诺娜、安图萨和莫妮卡的生活为背景。

教会的源头要归功于格里高利-拿先、金口和奥古斯丁所做的和完成的事情。

禁欲主义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教会生活中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产生了高度发达的修行主义的各个阶段。

此前，修道院精神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它在犹太人中被发现，在埃塞尼人（主后一世纪时犹太人中的三个教派之一；这三个派别分别是，法利

赛人，撒督该人，和埃塞尼人）中达到顶峰。它后来以一种更先进的形式在佛陀的追随者和塞拉皮斯的崇拜者中传播。只要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对不间断地享受灵魂内在体验的神秘渴望，存在着自我埋怨的热情，存在着（误以为）对真正的宗教生活所需的隐居的不健康看法，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修道院主义。特别是在那些气候温和、有利于休息的国家，这种情况会更明显。

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发展的原因并不难找。时代的状况刺激了人们对禁欲主义、远离世事的渴望。世界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在崩溃。天空是黑暗和威胁的。教会的纯洁性因名义上的基督教的涌入而受到威胁。许多严肃的人产生了警觉的感觉。一些缺乏勇气与日益严重的堕落发生冲突的人，希望从普通生活的虚荣和不确定性中安全地撤退。另一些人，其中不乏思想高尚的人，错误地理解了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认为真正征服邪恶的世界是通过退出它来实现的。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修道院的原生地是在东方，特别是在埃及。那里的异教已经发展出类似的倾向。禁欲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求助于教堂附近或在村庄的边界徘徊。他们撤退到沙漠的孤寂中，或在山中的洞穴中寻找栖息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修士得到了〝锚定者〞的名字，它来自一个希腊词，意思是退休（即远离世事）。

他们的推崇者和著名的创始人是安东尼，他的生平据说是由亚他那修写的，现在还保存着。

安东尼的故事，无论其中有多少是由那个时代的想象力造成的，无疑都展示了第四世纪隐士生活的理想。安东尼从小就具有反思和宗教的天性。他的父母去世后，在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担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并且不得不面对照顾妹妹、以及照顾大庄园的事务所带来的烦恼。他被所有这些令人

心烦意乱的世俗问题所困扰，于是赶紧遵从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年轻人的命令（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只保留了少量的财产给他妹妹使用。圣经似乎又一次在诫命中对他说：″不要考虑明天的事″。因此，他处理了他剩余的财产，并将他的妹妹安置在一个处女的社团中。一段时间内，年老的苦行者成为他唯一的伙伴和老师。然后他来到山中的一个山洞，在那里虔诚地沉思，征服他天性中的邪恶倾向。随着这些年的孤独挣扎，他开始为人所知；为了避免公开，他一次又一次地退到更深的隐居处。许多人甚至在这些隐居地寻找他，并就苦行僧的生活向他请教。他警告他们不要犯自己早期经历的错误，告诉他们要用美好的思想和健康的工作来占据自己的头脑，从而摆脱邪恶的想象。在他的告诫中，他是明智的、慈善的。他在伟大的人面前不卑不亢，在卑微的人面前也不骄傲。他寄给皇帝们的话语是劝告他们伸张正义，记住穷人。在两三次特别危险的场合，他出现在亚历山大城，鼓励受迫害的信徒，或抵制阿里乌异端的发展。他的谦卑一直持续到最后。当死亡临近时，他吩咐将他的坟墓隐藏起来，以免他的身体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

安东尼的一生，都可以被看作是更好的淡泊者阶层所追求的路线的写照。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并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荒凉和僻静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细胞组织。他们将自己置于各种形式的身体匮乏和痛苦之中，经常设计出奇怪而奢侈的自我折磨方式。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斯蒂利特人西门，之所以被称为斯蒂利特人是因为他住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在这个距离地面60英尺的高处，他向那些因好奇心和敬佩之情而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传教。

许多因圣洁而受到广泛尊敬的隐居者，被杰出的人尊称为他们的精神伴侣。学生们听从他们的教诲，因此在他们周围形成了小型的修士团体。

修士团体在他们周围成长起来。但是，在这种影响之外，帕乔米乌斯（Pachomius）还发起了一场走向回廊修道院生活的运动。在上尼罗河的一个

小岛上，他将修士们组成了一个社团。这首先被称为cænobium--一个表示共同生活的术语。后来，它被应用于每个单一的回廊修道院。帕乔米乌斯和他的继任者成为主要回廊修道院的住持，或者像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主要回廊修道院的大主教，对所有与之有关的其他人拥有全权。修士们根据他们精神发展的程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被分配了其特殊的职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编织篮子和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工作成果由回廊修道院的管家接收；管家受整个组织的总管家的监督。他们出售商品的所有利润都给了穷人。这些回廊修道院的数量迅速增加。很快，类似的机构也为妇女建立起来。

东方修道院的推动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该撒利亚的主教巴西尔。在他年轻的时候，当他在雅典作学生的时候，他与拿撒勒的格里高利有密切的联系。

这两个朋友在思考他们应该遵循什么方针的问题时，决定接受天意，选择独身和贫穷的生活。然后，他们考虑了是应该成为隐士还是过一种更公开的生活、即 ″世俗 ″的生活的问题。他们决定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方式，如隐修会所采用的方式。他们早期生活中的这段经历在格里高利的诗句中有所描述，由红衣主教纽曼翻译：

″ 内心的争斗持续了很久，直到这样结束：
我看到，当人们生活在浮躁的世界中时
他们攻击其他的人，但同时也错过了
他们的平静和纯洁的心。
隐居的人则是更正直的职位，
抬眼望向天堂的安静力量；
但他们只为自己服务，不为别人服务。
就这样，在这些人和那些人之间，
我走上了我的道路、

与自由的独行者共勉、
但要过世俗生活，为人类服务。″

格里高利，部分是由于友善，部分是由于气质的特殊性，对社会的经验较少。但巴西尔实现了早期形成的理想。他成为其他被他的影响和榜样吸引到回廊修道院的人的向导。他的规则，或规章制度的特点是理智和节制。他谴责孤独的生活，敦促人们必须养成勤劳的习惯。隐修会的人所面临的危险和诱惑比隐居于沙漠的人少。

这些极端的禁欲主义者自然是修道者。他们相信，他们更多的苦难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赢得了更高程度的功绩。他们常常被孤独生活的寂静和阴暗所驱使，或被热带太阳的过度炎热所驱使，陷入精神错乱。科诺比人也有类似的遭遇，尽管程度要轻得多。许多修士经历了剧烈和病态的感情反应。他们从奢侈的自我否定的生活中，陷入了最狂野的情绪。

有些人成了无法无天的狂热分子，就像那些混入景教争论中的凶猛修士，或者像北非的circumcellions一样，是多纳图派受迫害的导因。某些神秘的教派出现了，声称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Euchites。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内在的祈祷状态摆脱了感官的支配。他们放弃了一切形式的体力劳动，像后世的修行者一样四处游荡。

隐居者的孤独生活所带来的弊端和过激行为导致许多人，包括杰罗姆（JEROME），对其进行谴责。他们（杰罗姆等人）提倡隐修院的生活，在那

里，修士们可以接受上级的有益劝告，可以更好地培养基督徒对弟兄们的爱的精神。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检查修士的违规行为，并使他们更多地接受主教的监督。

修道院在西方的发展比在东方要缓慢得多。它在杰罗姆、安布罗斯、修士主义和奥古斯丁那里找到了热心的倡导者。五世纪初，来自东方的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在马赛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在同一世纪，修道院主义出现在高卢的其他地区，以及英国和爱尔兰。在所有这些定居点中，最崇高和最有益的是苏格兰爱奥那岛上的回廊修道院。

由于西方国家的心理素质与东方国家不同，西方的修道院制度在某些阶段有所改变，而在其他方面则发展得更为充分。西方人对神秘主义的猜测较少。在西方，他们的迷信是以更粗略的想象力为基础的。

由于西方气候的严格要求，他们远离了东方禁欲主义的许多奢侈行为。然而，即使是西方的隐居者也会在意大利的火山岩的一些奇怪的裂缝中，或在孤独的海边居住。

本尼迪克特是西方的理想修士,他的弟子们乐于把他的生活故事编入主后480年努尔西亚丰富的超自然元素。在五世纪晚期，他（本尼迪克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被带到罗马接受教育。他对人类的恶行感到震惊，于是离开了这个城市。不久之后，他把自己藏在苏比亚科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在这里，撒旦用诱惑来折磨他，试图打破他虔诚的决心，但没有成功。在一些邻近修士的邀请下，他成为他们修道院的院长。但他们很快就因为他严格的纪律而憎恨他，只因一个奇迹使他没有被毒死。他现在回到了他以前的住处，他的圣洁的名声使那里从一个孤独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修道院群。他还不满足，转身向50英里外的亚平宁山脉高地上的卡西诺山走去。在那里，他结束了（当地

的）异教崇拜，建立了在西方具有如此普遍影响的修道院，作为对修道院生活的激励和组织的模式。本尼迪克特的规章制度要求他的修士们过着严格的沉默、谦逊和默默服从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饮食和宗教活动都被仔细而系统地安排。本尼迪克特的弟子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莫鲁斯（圣莫尔），将他的教团传播到高卢和西西里。它的修士们到处涌现。修士们向野蛮人传授农业技术，并保持着知识的光芒。对于疲惫的旅行者，他们总是提供随时随地的招待。然而，像西方的其他机构一样，回廊修道院在野蛮人的手中遭受了很多损失。

甚至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人反对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断言，逃到沙漠中的基督徒或修道院回廊的基督徒就会迷失在这个世界上。为此，修道主义者争辩说，虔诚修士的祈祷是有用的。他们的生活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为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理想的自我奉献的榜样。他们热情好客，善待他人，为穷人服务，并与所有处于困境的人结成朋友。对他们的圣洁所给予的尊重使他们有可能大胆地斥责有权势者的罪恶，即使这种话会使其他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即，如果不是这些修士、而是其他百姓来说那些斥责权势者的话语，那么，这可能会招致说话者的生命危险）。伟大的教会教师们为修道院主义进行了辩护。他们虽然谴责其许多弊端，但却为作为该制度基础的概念辩护，特别是赞扬了修道者（包括修道主义者与独身主义者）的美德。

约维尼安是这一时期少数抨击这些基本概念（修道主义与独身主义）的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他自己在生活中也是独身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但他认为所有这些苦行都是纯粹自愿的，并不涉及特殊的功绩。他坚持认为，普通的基督徒生活是神圣的。世界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信与基督有关系的人，另一类是没有关系的人。因此，他否认在真正的基督徒中要有任何区别。这些观点遭到了杰罗姆的强烈抵制，并被罗马主教西里奇斯和安布罗斯谴责了。还

将要再过许多个世纪，教会的思想才准备好进行那样一次改革（即认识到，真正的基督徒不仅应当是圣洁的，同时应当是为人服务、荣神宜人的；并且，在本质上，真正基督徒之间并没有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区别，也并没有普通基督徒和修道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即乔维尼安所主张的那种改革。

那些将神职人员和教友区分开来的思想，也将时间、地点和行为分为世俗的和神圣的。早期教会的信仰，即所有的生命都被奉献给上帝，在一种类似于旧约律法主义的精神面前让步。奥古斯丁和金口等人试图将这种趋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即使他们也没有摆脱类似的印象。崇拜被分解成形式主义和仪式主义，得到教会权威的认可。在许多人看来，它不是被认为是基督徒情感的自发表达，而是一轮任意强加的纪念活动。当思想世故的人因为在敬拜上帝方面缺乏努力而受到责备时，他们埋怨事务上的烦恼和参加教会的经常性服务所带来的不方便。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人们不仅能够接触到圣经，而且被敦促仔细研究它们。然而，有些人不识字，有些人太穷，买不起手稿。但是，由于圣经在教会的公共服务中被宣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不断地参与教会敬拜来熟悉它。那些愿意阅读或默想的人，可以退到长廊里的房间，专门供他们使用圣经，或提供经文副本。

当基督教成为富人而不仅仅是穷人的宗教时，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

对于崇拜中的艺术图片的原始厌恶就开始消失了，因为人们不太愿意在异教徒庙宇的华丽之外再加上严格的简单（即，当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变成基督教聚会敬拜的场所时，他们就不愿意再保持从前的、原始教会时代的、简单纯洁的信仰形式，而是倾向于在富丽堂皇的教会建筑物中增添各种各样的图画艺术装饰等等）。

更加雄伟的比例和更加昂贵的家具的教堂开始被建立起来。公共建筑和异教庙宇有时通过皇帝的慷慨解囊获得，并为基督教礼拜的用途稍加改造，为教会建筑的宏伟壮观增添了不少色彩。所有这些建筑中的大部分都和前一个时期一样，采用了大殿形式。它们被庄严地奉为圣物，从此，它们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现在，人们对内部的装饰更加关注。十字架符号在日常生活中被普遍使用，并在较早的时候进入了礼拜场所，用宝石进行了华丽的装饰。

图片，特别是那些代表圣经的场景和思想，如但以理在狮子坑中，或基督作为好牧人的形象，开始普遍使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在半信半疑的异教徒心中，取代了他们废弃的庙宇的艺术装饰品。为纪念殉道者而建造的教堂常常用描绘他们苦难的绘画来装饰。这种在基督教崇拜中走向感性表达的运动，与其说是来自神职人员，不如说是来自广大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王公。富人的衣服上经常可以看到描绘圣经中某些故事的刺绣，他们自然愿意鼓励用绘画和图像来装饰教堂。比较开明的主教，如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指出了这种愿望可能导致的弊端。他们特别抵制了引入基督形象的企图，而是敦促人们在生活中努力成为基督的样子。但到了第四世纪末，在教堂里使用图像的现象变得普遍。人们崇拜图像，并开始在它们面前跪拜，许多无知的人也开始膜拜。

这种做法的辩护人说，他们只是对不在的主和他的圣徒的宝贵象征表示敬意。神奇的力量被归于这些图像，关于它们的神奇疗效和奇妙预兆的传说也被提及。随着教会的英雄时代的过去，对逝去的圣人和殉道者的崇拜变得更加奢侈。教堂被奉献、作为对于他们的纪念。半基督教化的异教徒对他们（殉道者）的看法与他们以前对英雄与圣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人们祈求他们（殉道者、圣徒）的代祷，特别是为了治愈疾病；如果有谁似乎得到了帮助，他就想要在教堂里挂上治愈者（殉道者、圣徒）的金银像。圣人被选为教堂、社团、城市和地区的守护者。他们（殉道者、圣徒）的遗物开始创造奇迹。粗鄙的基督徒对他们的记忆的崇敬逐渐发展成为崇拜。这种新形式的偶像崇拜受到了教会教师的谴责，但其原因--对圣人的过度崇拜--却受到了他们（教会教师们）的赞扬。

对马利亚的崇拜开始盛行。教会中确立了她永远是处女的学说。在景教所争论的过程中，她得到"上帝之母"的名字，并在虔诚的教徒心中被提升到所有圣人之上。修士们特别热衷于促进这种对马利亚的崇拜。普通的基督徒向她，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向圣人，寻求他们不敢从基督那里寻求的中保的同情；而基督的人性似乎在他的崇高神性中消失了。巴勒斯坦和使徒们的教会已开始享有特殊的圣洁性，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的建立的历史关系；因此成为虔诚的朝圣者的目标。

从早期开始，教会就有通过特别的宗教活动和越来越多的禁止世俗生活的追求来纪念星期日的习俗。这一习俗被老底嘉会议（主后363年）定为法律。

主后321年，君士坦丁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一习俗，他禁止法院在这一天开庭，除非是为了给奴隶发放赎金这一人道的目的。在星期天，他还命令他的士兵不要进行惯常的军事演习。然而，公共游戏仍然继续吸引着许多人放弃对星期日和教会节日的适当遵守。但在主后425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这些日子里进行一切游戏。在许多东方教会中，安息日（星期六）仍像星期日一样被遵守，而在西方则有大量的主显节习俗。在东方，主显节与基督的洗礼有关；而在西方，主显节出现得较晚，它也是为了纪念迦拿的第一次神奇力量的展示。圣诞节起源于西方，并从那里传到了东方教会。许多基督徒仍然参加异教徒的新年节庆活动。为了结束这种做法，当时宣布了禁食，并逐渐发

展成为基督的割礼节。

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是复活节，及其相关的节日。在这之前有一段禁食期，之后是四十天纪念。这（一段禁食期）让那些几个月来一直沉浸在事务的烦恼或社会的欢乐中的人有时间为这一伟大的一周（受难周）的神圣职责进行深思熟虑和忏悔的准备。这个节日从棕树主日开始。在那个时候，为了增加人们的感恩之情，皇帝习惯于发布特别的慈悲法令。在整个星期里，每天都有早晚的礼拜。安静和节制的工作被要求。在星期四，主的圣餐被欢乐地庆祝（没有通常的禁食），以纪念其最初的（圣餐之礼）制度。耶稣受难日是非常庄严的，甚至不允许亲吻。然后是伟大的安息日，星期六，即复活节前一天。在那一天，许多人接受了洗礼，并穿上了白袍。傍晚时分，人们举着火把，挤满了教堂，在那里举行的仪式一直持续到黎明。复活节的庆祝活动按照犹太人逾越节的方式，在第八天，即白色星期天结束。然后受洗者放下他们的白袍，与教会的其他人一起聚会。节日的时间从白色主日延长到五旬节那天。关于复活节庆祝时间的争论由尼西亚会议解决。但由于东方的天文学知识更丰富，亚历山大的计算方法，以及整个东方教会的计算方法，都与罗马的计算方法不同，直到通过狄奥尼修斯--我们的日历是他的功劳--的努力，罗马也才采用了同样的日历计算方法。

那些正在准备进入信徒团体的人被分成几个阶段，根据他们在教育和洗礼方面的不同进展阶段来划分。洗礼，由于增加了补充性的仪式，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简单性，一般只在复活节和五旬节举行。

主的圣餐是教会敬拜的核心的伟大行为。早期关于圣餐的观点，对其性质的看法让位给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它是基督徒牧师的祭品。当时牧师提供的代祷被认为是特别有效的。因此，为死者的祈祷通常与它联系在一起，它开始被认为是为他们的祭品。

古代的礼仪是围绕着主的圣餐之礼服务发展起来的。礼仪崇拜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每个教会或其主教都规定了自己的崇拜或制定了自己的礼仪。随着人们对统一性的追求，大都市教会的礼仪逐渐成为权威。在主后第四和第五世纪，以及后来，出现了许多礼仪，其中大多数都有使徒的名字，但没有任何被声称是使徒的作者。

“然而”，引用沙夫的话说，"它们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礼仪传统，其基本要素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也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甚至是通过犹太基督教会的渠道从犹太教的崇拜中传下来的。" 在这个方面，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增长。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有四组礼仪：东方的、亚历山大的、罗马的和高卢的，所有这些礼仪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一般来说，礼拜的顺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宣读与年度划分相适应的圣经经文，为圣餐者和非圣餐者祈祷，以及讲道。然后所有不是教会成员的人都被遣散。第二部分是庆祝圣餐之礼，包括其介绍性的礼仪和仪式。

讲道的重要性，部分地取决于每个国家盛行的文化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对宗教性质的不同看法，或对牧师布道的性质所持的不同观念、以及对于牧师职务的不同想法。在西方，文化程度较低，对牧师的外在行为更加重视，讲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尽管像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这样的人是有效的讲道者。另一方面，在东方，精美的演说受到重视。主后第四世纪的讲道变得更有修辞性。它精彩的思想或诙谐的表达有时会得到热烈的掌声。虽然有一些真正伟大的传教士、布道家，如巴西尔、两位格里高利、等人，但也有许多人犯了注释不当、缺乏明确的讲道脉络和空洞的修辞手法的毛病。

原始的教会音乐是清唱和会众大合唱；并在下一个时期的早期，大格里高利在改善教会音乐方面很有影响力。最有名的作曲家是埃弗拉姆-西鲁斯

（Ephraëm Syrus）、希拉里（Hilary of Poictiers）和安布罗斯。有一些人反对使用这种赞美诗，理由是它们不是取自圣经；而这只能通过时间和习惯来克服。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歌曲有：《荣耀颂》是一首更古老的希腊赞美诗的译本（被认为是希拉里翻译的）；《三圣歌》（圣洁、圣洁、圣洁）；以及《颂歌》，可能是由安布罗斯从希腊原文转入拉丁文的。

没有任何关于神职人员在公共场合穿特殊长袍的记录。教会的服装没有象征性的或圣衣的意义。它们是罗马人在早期几个世纪的服装，在这种服装不再是人民的时尚之后，由神职人员保留。在拉文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的一幅马赛克图画中首次出现了牧师和世俗服装的区别，属于主后第六世纪；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另一幅同一时期的马赛克图画中也有这种区别。从古罗马服饰中的两件套，即外衣和托加，发展出了东西方教会的服装。

==========

第四章

教义的历史

在这一时期，在基督教教义的要点上出现了争论，这使教会陷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些争端和确定正统的观点，举行了大型的教会会议，称为大公会议。国家对教义问题的干预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事实。然而，柏拉图的哲学影响仍占主导地位：奥古斯丁和奥利根都沉浸在柏拉图的精神中。

当时有两个主要的神学流派，两个主要的神学影响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对圣经研究的热忱使亚历山大城成为最重要的城市。但安提

阿的学者们采用了比奥利根学派更清醒和历史性的解释方式；在奥利根学派中，寓言式的解释方式占了上风。亚历山大学派保持了对教义神学的兴趣，在这一点上，它保持了以前的声誉。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等）和西方（罗马、西欧）在神学讨论的主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东方）的特点是神学的推测性更强，问题涉及与三位一体和基督的身份有关的问题，在东方是最重要的。

相反，在西方，在这一特定领域的工作相对较少。在这里（西方），实际的问题--罪的教义和人因神的恩典而恢复的教义--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力。在拉丁人中，没有像主后第四和第五世纪那样的、在东方讲希腊语的城市中、甚至从商人和机械师那里听到关于形而上学神学的深奥问题的激烈争议。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性格的本土多样性。第四和第五世纪是教父的黄金时代。

在亚历山大的教师中，Didymus虽然是个瞎子，但他从小就很聪明，从小到大，他的学识都很突出。亚历山大这所学校最著名的老师是亚他那修，他在主后328年被任命为亚历山大主教；在半个世纪里，他（亚他那修）是基督神性论的不懈和无畏的捍卫者，反对阿里乌派（亚流派）的攻击。他曾五次被流放。甚至连吉本都对他赞不绝口，说他 ″表现出一种优越的性格和能力，比君士坦丁的那些堕落的儿子们更有资格管理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在写作和演讲方面，他都是 ″清晰、有力、有说服性″。他的许多论著主要涉及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和神性。

第五世纪的西里尔，亚历山大的牧首（主教），在教义争论中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卒于主后444年。他是一个尖锐的论战者。在他的各种著作中，有一篇针对聂斯脱里的详尽作品。

尼萨的格里高利，约主后332年生，约主后394年卒。在各种问题上广泛脱离奥利的人，都被他的精神所感染。其中之一是巴勒斯坦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他（尤西比乌斯）是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但也是嘉雅里亚的一位富有成果的神学作者。他与亚他那修一起，在希腊教会的后世中发挥了统治性的影响。

罗勒是卡帕多西亚凯撒利亚的主教，他年轻时曾在雅典与朱利安皇帝同窗读书。他把对修道院退隐生活的热忱和对公共生活的非凡才能结合起来。因此，当他带头在东方组织修道院时，他作为主教的行政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巨大影响更多的是由于他个人的分量，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然而，作为神学家，他有很大的权威。在他的作品中，有一本信件集，对时代的特征有很多启发。

尼萨的格里高利也许是上述三位教会博士中最深刻的神学家，他们的名字经常被联系起来。他是巴西尔的兄弟。约主后380年，他曾短暂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但他宁愿放弃这个职位，也不愿与反对他的党派抗衡。他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演说家，但他天生害羞和敏感。他在雅典曾是巴西尔的同学和室友，后来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在巴西尔生命的最后阶段，双方有部分隔阂，但格里高利对他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格里高利是个性情热忱的人，是个优秀的诗人，也是个神学思想家。

与杰出的卡帕多西亚人同时代，但精神完全不同的神学家是君士坦丁的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他是奥利神学的狂热反对者。他的主要作品，题为″药箱″，是对八十种异端邪说的描述和驳斥，他对这些异端邪说的起源和特殊性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它的历史价值因其研究中的偏执精神而大打折扣。

在叙利亚的教父中，主后第四世纪最杰出的人的名字叫Ephraëm，一般被称为Ephraëm Syrus。他继承了盛行的修道精神，以隐居者的身份生活在埃弗拉姆-赛勒斯附近。他是如此受人尊敬，以至于在希腊的一些教堂中，他的讲道稿在读完经文后立即被宣读。他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些赞美诗，表明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诗人。

安提阿学派有三位杰出的教师，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金口（John Chrysostom）；他之所以被称为 "金口"，是因为他在讲坛上的口才无人能及。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从他的母亲安图萨那里，他接受了强烈的宗教印象，足以塑造他的职业生涯。他是利巴尼乌斯的学生，他的修辞能力和熟练程度得到了这位著名大师的高度赞扬。他强烈的宗教倾向采取了禁欲主义的形式。他通过自我禁欲削弱了自己的健康。作为家乡的长老，他在传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主后398年，他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圣索菲亚教堂的讲坛上，他向广大鼓掌的会众讲道。起初，他的声望几乎是普遍的。但他简单的生活方式和公正严格的管理方式触犯了神职人员中较为松懈的部分人员。他对恶习，特别是对宫廷恶习的公开斥责，使阿卡迪乌斯的妻子、爱好享乐的皇后尤多西亚变成了一个劲敌。这位雄辩的福音派主教的敌人得到了一个嫉妒的对手--亚历山大主教西奥菲勒斯的支持；后者急于提升自己的主教权威。最后，不顾人民的热情爱戴，金口被君士坦丁堡皇室放逐了。然而，他又被召回，但又注定要被流放，并被故意置于艰难困苦的境地，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作为圣经经文的阐释者，他深思熟虑，同时又很实际，将圣经的真理带入人心和良知，并与人的生活接触；——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人比金口更出色。他的作品主要由讲道稿和演讲稿组成。

安提阿学派的一盏明灯是在西里西亚、苏斯提亚的Theodore。他的圣经注释著作，在其中受到健全的语法和历史评论原则的指导，标志着圣经注释学的进展中的一个时代。排名仅次于他的圣经注释家是西奥多里。他和Theodore

一样，是安提阿人，但却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镇、居鲁士的主教。

主后第四和第五世纪最突出的拉丁文作家之一是希拉里，高卢地区普瓦克蒂尔的主教。他的父母都是有地位的异教徒，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是正统基督教教义的积极捍卫者，反对阿里乌主义。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讨论那些让希腊神学家们更精妙的智力感到特别高兴的深奥问题的人。因此，他有时被称为西方的亚他那修。

关于安布罗斯，主后340-397年，米兰主教中最著名的一位，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这一时期教会的领袖之一。他出生在罗马，接受过律师培训，并成为米兰的一名行政官；但由于出现了紧急状况，导致人们以鼓掌的方式将他推上了大主教的宝座。

他以非凡的智慧和精力进行统治，将政治家成熟的睿智带入教会事务的管理。他的思想即使没有高度的独创性、也没有特别丰富的深度，但他的特点是很有道理、说服性。他的著作部分地是教义性的，部分地是禁欲主义和道德性的，深受巴西尔的教导影响。

这时拉丁人中最伟大的学者是杰罗姆（JEROME），他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东方度过的。他出生在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交界处的斯特里顿。他在罗马学习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他曾在安提阿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被梦中听到的警告声所引导，从文学研究转向教会研究。在罗马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到了圣地伯利恒，在那里他主持了一个修道院，度过了他的余生。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研究并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使他成为教会学者中的佼佼者，并几乎与奥利平起平坐；他的神学观点最终成为奥利的激烈反对者。在杰罗姆的各种作品中，被称为武加大的拉丁文版圣经是最著名和最有用的。他通过修改新约的旧斜体版本，以及从希伯来语翻译旧约

来制定这个版本。他是奥古斯丁的通讯员，并在当时的争论中表现突出。不幸的是，无论是他的学术和学识，还是他的宗教原则，都不能有效地抑制他的激烈脾气；这使他成为一个善于谴责的人。这涉及到关于奥利的争议中的一个对手，鲁菲努斯。他是意大利人，出生在意大利。他在把希腊学者们的著作翻译为拉丁文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还经过辛勤的研究，写了一部关于使徒信经的作品。

在上述被提及的所有作家中，甚至安布罗斯或杰罗姆、亚他那修或金口，都不能说能与拉丁教父中最重要的奥古斯丁在著名和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方面相提并论。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一本自传，其中忠实而坦率地讲述了他的罪孽和精神斗争的故事。他的自我贬低是如此深刻和发自内心，与现代上世纪一位著名作家--感伤派之父让-雅克-卢梭的同名作品的语气形成鲜明对比。奥古斯丁于主后354年11月13日出生在努米底亚的一个村庄塔加斯特。他的父亲帕特里修斯是该镇的一个商人，当时是个异教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如此。他（奥古斯丁的父亲）语气粗俗，脾气暴躁。他（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位基督教妇女，具有温柔、虔诚和高尚的精神；她的儿子（奥古斯丁）能从罪恶的道路上被拯救出来，这要归因于她的慈爱。

他（奥古斯丁）在塔加斯特和迦太基的学校学习语法和修辞学。他热衷并欣赏地阅读拉丁文作者，但他对自己早年忽视希腊语感到遗憾，因为他从未精通过这种语言。他的热情很高，他向感官的诱惑屈服。当他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非法的两性关系，并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给孩子取名迪奥塔斯。他首先在迦太基从事修辞学教师的职业。十九岁时，西塞罗的《霍顿修斯》中关于哲学的价值和尊严的一段话激起了他更高的思想和愿望。这是一场长期的内在冲突的开始，在这期间，他得到了他母亲不间断的祈祷

和认真而谨慎的劝告。他离开迦太基去了罗马，但过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在米兰住了下来。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摩尼教的学说。他自己灵魂中的善恶之争使他倾向于二元论（即，二元论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均等源头）。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后，他对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兴趣。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听了安布罗斯的布道，起初主要是出于好奇心。他受到的感动比他预想的要深得多，他信主了，并受了洗礼。这时他已经33岁了。他的母亲在米兰与他团聚。在奥斯提亚，当他们准备启程回家时，她去世了。关于她死亡的描述构成了《忏悔录》中最悲惨的段落之一。

他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教会，和几个朋友（其中一些是从意大利跟来的）一起隐居在离塔加斯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把时间花在学习和奉献的练习上。从这个安静的隐居地，他被召到希波，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牧师，然后成为主教瓦勒里乌斯的同事，最后在主后395年成为他的继承人。在汪达尔人入侵期间，希波城被围困；主后430年8月28日，他（奥古斯丁）去世，享年76岁。作为一个教师、传教士和作家，以及一个影响广泛的教会人士，他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而且主要是有益的活动。在他参与的争论中，与多纳图派和伯拉纠派的争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作家。他在哲学、神学、和许多其他重要主题上写作。

他的著作是关于教义神学的主题。他的《上帝之城》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作品。他创作了注释性的颂歌、布道和书信，更不用说其他不属于这几类的作品了。

在奥古斯丁的智力和精神发展中，思想和经验是相融合的。每一种的特点都达到了非凡的程度。他的智力清晰、敏锐、喜欢思想，但又对情感充满热忱。在他自己的时代，奥古斯丁对西方教会正在辩论的严重教义问题施加了主导性的影响。在中世纪的教会中可以看到他的持续影响--它的圣事理论和传统的权威，以及他的思想方法重新出现在学术界的哲学中。马丁路德，一个奥

古斯丁主义的修士，宣称自己在奥古斯丁著作那里，得到了比在其他任何基督教历史上的作家著作那里所得到的更多的收获。加尔文不断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并称赞他是教父中最好的。他的影响在西方的教会中被强烈地感受到，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

在主后第四和第五世纪，拉丁人中的其他几位作家也是特别杰出的。卡西安努斯（John Cassianus）是其中之一，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他在东方接受教育。他是金口的学生；但当金口被赶出他的教区时，卡西安努斯移居到西方。他在马赛建立了回廊修道院，并积极在西欧引入修道院生活。他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文章，同时他也被认为是这些修道院思想的阐释者和执行者。在他的题为 "Commonotories"的著作中，他阐述了天主教教义的标准，与有争议的观点相对立。

萨尔维安，高卢人，出生在高卢的初期，死在高卢的末期，即，生于主后五世纪初，死于主后五世纪末。他的主要作品是一篇关于神圣天意的深思熟虑的论文，他在其中提出的观点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观点相似。

利奥一世，罗马主教，作为一个教会领袖，他是众多书信和大量简短布道的作者。他是罗马教会中最早的讲坛雄辩家的例子之一。

在主后第六和第七世纪，在文化和学习快速发展的同时侵蚀下，作家很少。在此之前，在东方，尤西比乌斯作为教会历史学家的工作被西奥多雷特（Theodoret)继承,他的书涵盖了从主后325年到429年这一时期;被Socrates继承，他处理了从主后306年到439年这一时期；被Sozomen继承，他的作品延伸到了大约同一时期。Socrates是一个作家，他的评论能力完全等同于尤西

比乌斯的能力。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西奥多鲁斯叙述了主后439年至518年的教会历史事件;安提阿的埃瓦格里奥斯叙述了主后431年至594年的教会历史。

博埃蒂乌斯（Boetius），或称波爱修斯（Boethius），东哥特人国王狄奥多里克的信任顾问，是一个具有学术品味和渊博学识的人。他是强大敌人阴谋的受害者，这些敌人的不义之举虽然被他挫败了，但他们在狄奥多里克心中唤起了对他忠诚的错误怀疑。他被囚禁在帕维亚，并被处死--据说国王对这一行为感到非常懊悔。博伊特斯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关于 ″哲学的安慰 ″的有趣著作。他虽然是基督徒，但这本书中没有提到基督教信仰。博埃蒂乌斯通过他的翻译作品，并通过刚才提到的书，成为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联系纽带，他在中世纪受到了高度尊重。

卡西奥多鲁斯是在狄奥多里克和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的一位地位和影响力都很高的政治家；在生命的后期，他在他的故乡布鲁提乌姆（Bruttium）的维韦尔（Viviers）建立了一个修道院。他的作品涉及到历史和神学。

高卢地区的图尔主教格里高利，除了他的《奇迹》作品外，还创作了一部《教会史》，并撰写了《法兰克人格里高利的教会史》，是法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历史纪念碑，是法国历史上那段时期最宝贵的历史文献。他是一个可信的，但真实的记录者。

格里高利一世，或称“大格里高利”，与利奥一世一样，主要是作为一个教会统治者而闻名;但作为罗马教皇，他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神学论文，称为 ″莫拉里亚″，建立在《约伯记》的基础上；此外还有讲道稿和许多有历史价值的信件。

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卒于主后

636年。他的作品几乎涉及所有的知识分支，并被认为体现了当时的学问。

这一时期的三大教义争论是：（1）阿里乌派（亚流派），与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有关；（2）基督论，与基督的两个性质有关，或与基督的内在结构有关；和（3）伯拉纠主义，它的主题是神和人的作用、罪、和恩典在人的救赎中的运作。

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的一名长老。他被描述为身材高大，性格严肃，甚至朴实。他的智慧敏锐，但他在直觉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宽广的视野。他在安提阿接受教育。他提出了赤裸裸的教义，即基督是被造者--当然是被造物中的第一种，也是所有其他被造物的创造者，从而点燃了辩论的火焰。主后321年，亚历山大主教罢免了阿里乌的职务，但他却得到了有权势的教会人士的支持。君士坦丁试图平息这场纷争，但徒劳无功，于是召集了一个大公会议来决定这个问题，会议于主后325年在尼西亚(Bithynia的一个小镇)举行。

这是第一个大公会议。希腊和罗马教会认为有七个这样的会议。大公会议中的术语 ″大公 ″是指帝国的。它们不是由罗马主教召集的，而是由皇帝召集的。他们（主教们）或亲自出席，或由代表出席，参与监督会议的进行，尽管他们并不宣称对教义的结论发号施令。与帝国专员一起担任会议主席的还有教长或他们的代表，他们并不总是或不必然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在教义问题上，它被认为投票必须是一致的；在秩序和纪律问题上，多数票就足够了。由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纪律条例可以随后重新调整。但对教义的定义却不是这样的。理论上说，只有主教可以投票，但牧师和执事也参与了讨论。在尼西亚会议上，亚他那修只是一个执事；然而，（在该会议上）如果有的

话，也很少有其他会议成员是比他（亚他那修）更有影响力的。

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尼西亚会议由三百一十八名成员组成。另一些权威人士将人数估计减少到二百五十人左右。

其中有一些可敬的人，他们身上带着在戴克里先时代的迫害中遭受的酷刑所留下的伤痕。如同一般的教会会议一样，他们几乎都是东方的主教。然而，一位有影响力的成员，一位君士坦丁信任的顾问，是西班牙教士，科尔多瓦的霍西乌斯。

该会议的参会人员中有三个党派。第一派是阿里乌派。第二派是正统派，最终占了上风，我们可以称之为亚他那修派。第三派在一开始的时候占了大多数，他们对这两个对立的表达公式都不完全满意，但更喜欢不太明确的声明。它包括许多不同的信仰：公会是否应该确认〝同等〞观点--即圣子与圣父具有相同的本质（同尊同荣）？

经过会议的讨论和投票，圣子被宣布为与圣父同尊同荣；圣子的“被创造”被否认（即，基督是神，而不是受造者），而他永恒的圣子身份被肯定；阿里乌派的特色短语或警句被废除了。阿里乌和他的两个朋友被驱逐到伊利里亚。另外两位主教，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斯和尼西亚的特奥尼斯，拒绝接受会议条款，被废黜和放逐，但他们后来收回了（自己原来的）拒绝意见，并被恢复了他们的教区。

这样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君士坦丁本人就受到阿里乌派的影响，转而反对亚他那修的教义。他（亚他那修）被驱逐出他的教区，并且被迫在特雷韦斯居住了二十八个月。阿里乌本来会被接回君士坦丁堡的圣餐会，如果不是他在圣餐会前一天突然死亡的话。

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仍在各方之间肆虐。主后335年，半阿里乌派，或他们有时被称为尤西比派（尼科梅迪亚的尤西比乌斯是他们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东方兴起。亚他那修第二次被流放，在罗马主教康斯坦斯和朱利斯一世的保护下，在西方度过了三年。主后342年，西方教会宣布支持亚他那修。为了避免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可能出现的分裂，东方人在安提阿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制定了不少于五个的含糊不清的说法。在萨迪卡，西方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支持亚他那修。在菲利普波利斯，东方的主教们以较少的人数谴责了他（亚他那修）。康斯坦斯的死使亚他那修失去保护，并再次遭到康斯坦修皇帝的敌视，他现在是西方和东方的统治者。通过欺诈和贿赂，阿尔勒和米兰的西方议会被说服，宣布反对亚他那修。现在他（亚他那修）独自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在六年的时间里，他被忠实的修道士们庇护在位于Thebais的孤独的修道院里。

最后，尼西亚神学确立了它的优势。一些半阿里乌派的神学家们，把阿里乌派的神学推向了极端，而该党中比较保守的人则对此感到反感。明智而温和的神学家，特别是巴西尔和两位格里高利，建议支持尼西亚式的信仰，他们是尼西亚式信仰的忠实拥护者。西方的教会，除了在短暂的时间内被邪恶的影响扭曲了他们的真实倾向之外，都站在同一边。最后，主后381年，尼西亚信条的追随者狄奥多西大帝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在那里，《尼西亚信条》得到了重申，但被称为 "君士坦丁堡信条 "的较长的信条有另一个来源，并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很久以后，在西班牙的托莱多会议上，信条中加入了 "filioque"，使其确认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那里来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从圣父那里"。对信条的这一补充并不为东方教会所接受，这也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一个长期分歧点。

尼西亚信条是主后325年在尼西亚制定的,在 "君士坦丁堡 "形式中对其进行

了修改，在拉丁人中，主后589年在西班牙托莱多会议上进行了修改，其英文内容如下：

“我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父神，他是天地和一切有形无形事物的创造者。

又信一位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父在万世之前所生的，出自光的光，出自真神的真神，是被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本为一体；万物是由他造的；他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救我们，从天上降下来，由圣母玛利亚从圣灵感孕道成肉身，成了人； 为我们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埋葬，第三天照着圣经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带着荣耀再来，审判死人和活人，他的国度没有尽头。

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宰和赐予者；他从父[和子]而来；他与父子同受崇拜和荣耀；他通过先知说话。我还相信神圣的大公教会、使徒教会。我承认接受一次洗礼，使罪得赦；我盼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生活。阿门。”

在一直顽强地坚持神圣本质的统一性的拉丁教会中，属于当前对教义主题的这一神秘发展的概念，被从教义中消除了。在奥古斯丁的教导中，圣子的使命不是圣父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三位一体的行为；《旧约》中的神迹不是指圣子一个人，而是指三位一体的共同行为。

数目上的统一，或三位一体在实质上的一致，在尼西亚并没有明确的主张，虽然亚他那修教导过，但许多尼西亚教父（其中有很多东方主教）并不持这种观点;但这成为西方的既定信仰。拉丁人的想法在被称为〞亚他那修主义〞的信条的陈述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表达。

_____

迦克墩会议。

主后451年，迦克墩大公会议遵循利奥给弗拉维安的信中的建议，制定了一个信条，在这个问题上，其重要性与尼西亚的公式相似。迦克墩信条肯定了基督的两个本性（神性与人性），没有混乱、变化、分裂或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每个本性的属性都被保留下来。

奥古斯丁的崇高工作，"上帝之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哲学。主后410年，当哥特人阿拉里克攻占和洗劫罗马的消息传来时，帝国上下一片惊慌失措的景象。世界的根基似乎因永恒之城（罗马）的陷落而动摇。人们再次激烈地抱怨宗教，因为它的上帝未能保护罗马免遭骇人听闻的灾难，也抱怨它的门徒抛弃了古代制度的神性。为了应对这种攻击，奥古斯丁撰写了他的作品，其中还包括对基督教信仰的积极解释和维护。他提到了发生在共和国时代和早期凯撒时代的可怕灾难。他坚持认为，灾难可能有一个惩戒性的价值大于其成本。他致力于表明，有两个伟大的社区或城市，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前者包括他所有真正的崇拜者，后者的居民可能在今生繁荣，但在未来和永恒的幸福中没有份。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西班牙长老奥罗西乌斯，以同样的总体思路写了一篇更简短的作品。

在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和其他福音的捍卫者提出的证据中，有耶稣和基督教的性格，这排除了他们欺骗的想法；有神迹和预言的证据，以及基督教在面对几乎不可战胜的障碍时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神迹是一

个能引起人们惊讶的事件；尽管自然事件，因为它们也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意志，如果它们不是人们熟悉的，也会引起同样的感觉。

奥古斯丁提出了″信仰先于知识″的格言；即对福音的活生生的体验是了解其意义的必要条件。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理解真理，但对真理的实际运用是首先要做的。

奥古斯丁在驳斥多纳图派的观点时说，真正的教会的标志是其成员的圣洁，奥古斯丁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标准。他的意思是，教会是一个可见的社会，分布在地上，并且在它里面有使徒的影子。他声称，这个教会应被称为圣洁的，即使其中有不值得的成员，他们虽然在教会中，但不属于教会。

==========

==========

==========

==========

==========

==========

==========

==========

第四阶段

从格里高利一世到查理曼大帝（主后590-800年）

教会在日尔曼民族中的建立

==========

第一章

基督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发展

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古老民族和那些从北方下来并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定居的日耳曼人的宗教。现在，基督教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罗马人从未涉足的地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德国和多瑙河沿岸的新国家将被基督教信仰所覆盖。在这一时期，它还将在穆罕默德教的兴起和伊斯兰教对叙利亚、巴勒斯坦、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进军中受到可怕的打击。

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教会的调解，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而服从教会的法律往往是对皈依者的要求的总和。中世纪人民的宗教培训类似于犹太人在完整的犹太教等级制度下的培训。但是，福音的内在、活生生的原则仍然存在，而且尽管有遮蔽，也有足够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保留了净化反应的要素。基督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意志民族的宗教特征的影响。

德意志民族的特点，特别是那些居住在罗马传统范围之外的人，——在他们的个人独立意识中，在他们的勇气、信仰和纯洁性方面，日耳曼人超过了其他野蛮部落。日耳曼人的宗教反映了其所属民族的力量和好战的倾向。古典神话中妖艳和妩媚的一面是不存在的。日耳曼人的宗教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宗教密切相关，我们在《埃达斯》中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在一周四天的名称中回顾了比较突出的神灵：周二（由战神Thiu命名）；周三（由首席神Woden

命名，他是空气和天空之神，是果实的赐予者，喜欢战斗）；周四（由雷神Thor命名，他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Donar，是雷神和天气之神，拥有锤子和雷电）；周五（由Freyr命名，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Fro，爱神）。复活节这个名字也来自于奥斯塔拉，即晨光女神，或春天太阳的回归。对矮人、仙女和精灵的普遍信仰，历久弥新，使人们想起了较小的日耳曼神灵。德国人是异教徒国家的新教徒。深山老林往往是他们唯一的神庙。唤起人们敬畏的是神秘的，而不是感性的东西。他们把古老的树木献给他们的神灵。与凯尔特人不同，他们没有强大的神职人员。每个家庭的户主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崇拜仪式，而不需要社区的牧师干预。妇女被认为在学习神的意志方面具有特殊的智慧和技巧。这种感觉还表现在对女巫的信仰上，不幸的是，这种信仰在日耳曼宗教的衰落中长期存在。正如其他野蛮部落的习俗一样，人类受害者有时会在祭祀中被杀死（作为献祭品）。勇敢的战士们期望在死后能被接到瓦哈拉，在那里他们将与众神共进晚餐。

基督教在改变德国人的信仰时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它的目的不仅是要取代神灵(他们的父辈曾教导他们要敬重神灵,他们的国王的血统也要追溯到神灵)，而且它似乎威胁到他们的民族独立。它是由属于外国势力的教会人士带给他们的；它的仪式大部分是用拉丁文进行的；它的皈依者通常被要求在精神方面把罗马主教当作他们的主宰。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是禁欲主义者，而且往往观点狭隘）告诉他们，他们（日耳曼人）自己的神是魔鬼，崇拜他们是可恶的罪行，为此他们的祖先正遭受永恒的折磨。

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在欧洲大陆的弗里斯兰人和撒克逊人中，甚至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基督教被视为外国专制者奴役的标志，人们的所有爱国主义被唤醒，以保卫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神。

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德国人还是迅速皈依了基督教的原则。有人认为，

也许古老的宗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政治影响和王子们的通婚也与福音在各部落中的传播和进展有很大关系。在他们面前发生的奇迹，他们的幻想或恐惧，在传教士的故事的作用下，很容易被接受为新宗教真理的神奇证明。圣人可以创造奇迹，这一点从未被怀疑过。像博尼法斯和安斯加这样的传教士，尽管自己不承认有这种超自然的天赋，但相信其他人拥有这种天赋。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皈依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第一批成为教会传教工作对象的人。他们并没有从不列颠人那里接受基督教，因为在他们征服不列颠后的激烈斗争中，凯尔特人居民被一步步地赶回了岛屿的西部，他们的文明和宗教也随之消失。然而，在爱尔兰，"圣徒之岛 "正在准备各种影响，这些影响将有助于使英格兰的一部分再次受到福音的影响。主后第六世纪后半叶，哥伦布从爱尔兰出发，使北皮科特人皈依。在他们赠送的海岛上，他建立了爱奥纳修道院，该修道院因其居民的学习和虔诚而享有极高的声誉。

但基督教首先从罗马传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格里高利是当时罗马一家修道院的院长，他被奴隶市场上一些年轻俘虏的面孔所吸引。传统上流传说，当得知他们是盎格鲁人时，他（格里高利）惊呼："不是盎格鲁人，是天使"。他随即对使他们的同胞皈依信仰产生了兴趣，尽管他被阻止作为传教士亲自前往他们那里，但当他被召来担任圣彼得的职位（罗马主教）时，他没有忘记他们。

英国肯特郡的国王埃瑟尔伯特（Ethelbert）娶了法兰克人的公主贝尔塔

（Bertha），允许她自由地遵守她的宗教礼仪。

在这个合适的时刻，格里高利派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带着众多的追随者，作为传教士前往英国。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肯特郡东部的萨内特岛登陆了。在这里（英国），罗马帝国的军团已经撤走近两百年了，现在这群传教士来了，要把这个国家重新交给罗马，不过不是交给罗马帝国，而是交给精神权威。肯特郡国王急忙去见奥古斯丁，但由于害怕魔法，就在露天接待了他（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伴们。教士们简单而无私的生活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和尊重。人们的思想被神秘的仪式和他们认为传教士所创造的奇迹所打动。埃瑟尔伯特给了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的一个住所。他（埃瑟尔伯特）很快就屈服于他妻子和传教士们的影响。他的改变使许多人接受了基督教。奥古斯丁现在接受了主教的祝圣，执行了格里高利提出的温和政策。庙宇被改成了教堂，并配备了圣物。在教会的神圣日子里，用基督教的节日代替了异教徒的节日。在肯特郡皈依的时候，埃瑟尔伯特对埃塞克斯行使了某种管辖权。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基督教引入那里。大约在主后601年，奥古斯丁被任命为英国教会的大主教。他（奥古斯丁）仍然居住在坎特伯雷，而不是像格里高利最初设想的伦敦。

埃瑟尔伯特死后，基督教在他的领地内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它很快就在北方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此时，诺桑比亚国王埃德温成为英格兰最强大的统治者。他娶了埃瑟尔伯特的一个女儿，后者带来了一位主教保利努斯。埃德温国王虽然放弃了异教，但并没有立即接受基督教。他最终被感动了，召集他的智囊团在两种宗教之间做出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对他说：″国王啊，在我看来，人目前在地上的生活与我们不知道的那个时代相比，就像麻雀在冬天迅速飞过你坐着吃晚饭的房间。麻雀从一扇门飞进来，马上又从另一扇门飞出去，当它在里面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它在风雪中平安无事；但它很快就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了，进入了它曾经出现的黑暗中。

因此，人的这种生活在短时间内出现，但对于之前的事情，或之后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因此，如果这个新的教义包含一些更确定的东西，它似乎就应该被（我们）遵循。″

异教的大祭司是第一个宣布支持基督教的人。诺森比亚王国皈依了基督信仰，但是，几年前，它因麦西亚异教徒王国的崛起而失去了权力。保利努斯逃到了南方。不久，来自爱奥纳的科伦巴修道院的爱尔兰传教士们继续进行着保利努斯留下的工作。艾丹被任命为主教，并在林德斯法恩有了住所。但基督教并没有摆脱麦西亚的攻击，直到奥斯温的继任者，在主后655年打败了麦西亚人。在此期间，有志之士将福音传给了岛上的其他国家。

当北方的政治事务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时，英国人和罗马教会之间出现了纷争。

科尔曼，现在主持艾丹曾担任过的北撒克逊克里斯布里安教区的工作，和他的前任一样，也是苏格兰人。他和他的前任一样，都是苏格兰人的支持者。英国人或苏格兰人与罗马人之间在教会习俗上的分歧已经成为麻烦的根源，甚至在纪念复活节的日期问题上使王室产生了分歧。且不说英国人中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化妆方式，也不说他们的神职人员不遵守独身主义的规则；而复活节日期问题是最重要的冲突点。英国人坚持旧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曾一直在罗马使用，直到罗马皇帝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引入日历改革。此外，他们（英国人）毫不犹豫地将复活节定在犹太农历的尼散月14日，如果那一天是星期天；而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将节日推迟一周。为了调整分歧，主后664年在惠特比举行了 ″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国王奥斯温面对着不同意见的两个方面；以科尔曼和他的苏格兰朋友为一方；以后来的约克大主教威尔弗雷德为首的撒克逊人为另一方。国王决定支持罗马，可能是受对罗马所宣称的神圣权力的敬畏影响；他表示，他担心拥有钥匙的圣彼得会

将他排除在天堂之外。

科尔曼和他的追随者随即离开了圣艾丹的教区，回到了爱奥纳。这一决定对英国教会的后续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人更自由的精神被赶走了，而这种精神在抵制罗马的侵扰方面是很有力量的。然而，教会也许从危险的违规行为中获救，并与欧洲的文明和基督教的发展紧密相连。

爱尔兰的回廊修道院，仍然以学习而闻名，继续吸引着许多英国青年，直到西奥多，一个具有学术能力的人，被派往英国担任英格兰大主教。他被派往英国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以确认罗马的等级制度，并引进学校。约克大主教威尔弗雷德（Wilfred）也在促进同样的目的方面发挥了作用。西奥多建立的学校因其对学习的成功奉献而受到赞誉。在这些学校里，希腊语得到了培养。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是一位修士，他在亚罗的修道院里度过了他的日子。他就是尊贵的贝德，我们对英国教会历史的了解大多归功于他。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雏形已经形成。卡德蒙将《圣经》故事变成了简单有力的诗句，在老百姓中到处流传。

在英国全国各地兴起的回廊修道院，将人们通过修道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团结的意识；这种意识对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民族观念也在所有教会对坎特伯雷教廷的效忠中得到了体现。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对罗马的紧密依赖逐渐被削弱，因为它（英国教会）不再是一个传教士教会，而且英国国王也像他们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开始在教会事务中掌握权力。然而，罗马教皇在英国仍然比在其他德意志民族中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尊重（译者注，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意志古代民族的一个分支）。

德国的部分地区很早就宣扬基督教，这归因于诸如塞维林（Severin）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影响；他在五世纪中叶为德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主后第五世纪中叶曾在达城附近工作，向那些因野蛮人入侵和社会普遍瓦解而忍受苦难的人推荐了福音。

许多修士从英格兰和爱尔兰来到德国地区这里，其中科伦班是最有影响力的。在勃艮第时，他建立了几座修道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卢克索（Luxeuil）的修道院。法兰克教士的堕落使他（科伦班）与他们（法兰克教士）发生了冲突。他们把他（科伦班）在爱尔兰遵守复活节的习俗作为攻击他的借口。在随后与罗马的争论中，他（科伦班）表现出坚定而独立的精神。他毫不犹豫地斥责了勃艮第统治家族的恶行。为此，他被流放，并在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劳作，度过了他的余生。瑞士一个州的名字叫圣加尔，让人想起他最重要的弟子的名字。

通过撒克逊修士威利布罗德的努力，一项成功的传教工作最终在西弗里斯兰建立起来。他被任命为乌得勒支的主教，并以自我牺牲的热情投入到教区的工作中，直到主后739年去世。其他人也努力在这些地区传播基督教，但他们的工作缺乏方法，其结果是他们往往因一些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或弗里斯兰人的突然入侵而被驱赶。似乎有必要出现一个实际（务实）的人，为传教士的努力提供方向和持久性，并应组织基督教机构。

德国找到了它急需的使徒，博尼法斯，或称维尼弗雷德，一位英国修士。他的“缺点”对他面前的任务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他对教会的外部统一性和它的教规有一种夸张的推崇。他准备对教皇的职位表示虔诚的敬意。然而，这种时代特征的律法主义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他具有真正的基督教虔诚精神，而且他的道德观如此严格，以至于他没有隐瞒对罗马本身流行的恶习和迷信的指责。主后722年，博尼法斯在黑森人中取得了第一次

传教成功。教皇格里高利二世认为他是一个有用的器皿，可以促进罗马基督教在德国这一地区的利益,并抵制爱尔兰传教士带来的违规行为和异端邪说。因此，他（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任命他（博尼法斯）为主教，同时要求他对他（教皇）和他的继承人在圣彼得的椅子上宣誓效忠，并保证抵制一切背离教会秩序的行为。教皇向他推荐了法兰克人的宫廷官查尔斯-马特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他（博尼法斯）和他的修士们会经常暴露在异教徒的怒火之下。博尼法斯现在恢复了他的传教工作。

一棵被献给雷神的古老橡树被证明是他在上黑森州工作的一个严重障碍。在他们（日耳曼人）的民众集会中，人们习惯于以特殊的敬畏之心看待它，并聚集在图林根州附近的地方。在他（博尼法斯）的追随者的帮助下，博尼法斯当着这些惊讶的异教徒的面把它凿了下来，用木材建了一座教堂。

他在黑森州以及后来在图林根州的工作是如此成功，他对教皇的作用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格里高利三世任命他为大主教和使徒代表。他现在开始管理德国的教会事务。但在查理-马泰尔（Charles Martel）执政期间，并没有完全建立起他作为教皇传教士的权威。然而，卡洛曼和佩平在他的改革努力中与他进行了认真的合作。主后742年，他（博尼法斯）召集了第一届德意志议会。他还致力于改革法兰克人的教会。由于他努力使法兰克人阿德尔伯特和爱尔兰的牧师克莱门特等人屈服或受到惩罚，他在那里所做的良好工作的名声多少被玷污了,这些人在他们的观点和生活中保持着更独立的基督教精神。主后745年，他将门茨作为他的大主教总部所在地。主后753年，他被一种愿望所打动，想在他第一次传教时曾试图改变的人群中布道，于是他把自己的主教职责交给了他的弟子卢卢斯，而自己重新开始了传教士的生涯。两年后，他死在了仍然是异教徒的弗里斯兰人手中，成为一名殉道者。

博尼法斯在德国建立了许多回廊修道院。在他忠实的追随者斯特姆的努力下，

在一片荒野中出现了伟大的福尔达修道院。修士们在修道院院长的领导下所做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性质。博尼法斯和他的学生们在这些修道院中建立的学校对促进德国的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_____

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段，人们试图改变欧洲撒克逊人的信仰。他们是一个好战、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将基督教与讨厌的法兰克人的统治联系起来。为了保卫他们（撒克逊人）的国家和家园，他们抗击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的军队，保护撒克逊人自己原有的崇拜，反对教会的牧师，——这些是由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宗教的混合冲动所促使的。在查理曼大帝使他们屈服的同时，他（查理曼大帝）也强迫他们接受洗礼。他还颁布了最严厉的法律来反对恢复他们（撒克逊人）祖先的宗教。

这些粗暴的措施遭到了阿尔昆的反对；阿尔昆是查理曼大帝聚集在他身边的智者之一。路德格和维勒哈德的努力比查理曼的武器更能在撒克逊人中产生真正的基督教。维勒哈德的工作在布来梅附近；在那里，在镇压了威特金的叛乱后，被划出一个教区，他（维勒哈德）被任命为主教；然而，直到一系列持续了30年的战争之后，欧洲撒克逊人才在《塞尔兹和约》中，向法兰克人的权力和基督教屈服。

福音在居住在匈牙利的阿瓦尔人中传播的故事也是如此。它向北方和东方的进一步发展被斯拉沃尼亚部落的坚决抵抗所阻止。

_____

_____

_____

默罕默德教的兴起。

在主后第七世纪，东方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在默罕默德的热情和狂热的鼓舞下，一群交战的阿拉伯部落变成了一个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国家。他们信仰一个上帝并承认他的先知。

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可能是在主后572年，他早年的生活是默默无闻的。二十八岁时，他与一位富有的寡妇卡迪雅结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世俗的烦恼，获得了沉思的闲暇。

他的思想被阿拉伯人的宗教冷漠和堕落震惊了。渗透到这些地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教义上被扭曲和贬低，在精神力量上也被削弱。在大约40岁的时候，穆罕默德开始，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从上面得到了他的神圣使命的暗示。起初，他把自己奇怪的狂喜归咎于邪灵的影响，这可能部分是由于他患有歇斯底里和癫痫症的结果。然而，他的妻子劝他说，这其实是上帝的启示。他确信自己作为宗教改革者的超自然召唤，开始宣扬 "有一个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的信仰被命名为伊斯兰教--对神的旨意的屈服。慢慢地，信徒们聚集在他身边，其中第一批是他的妻子、他的表弟阿里和他的朋友阿布贝克尔。在麦加担任统治者的强大的Koreishites，现在开始虐待和迫害他。

为了躲避生命危险，在主后622年，他逃到麦地那。这一年就成了赫吉拉的日期，也就是先知逃离麦加的日期；而穆罕默德的历法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的。他是一个有威望的人，口才好，态度好，而且是一个热情的教师和顾问，

他很快就成为这个城市的政治领袖和宗教改革者；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是麦加的对手。他构思了一个武力计划，通过共同遵守他的事业的纽带来团结阿拉伯部落。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成功，以至于他在主后630年重新进入麦加，摧毁了那里的偶像崇拜，从而赢得了邻近的主要部落的效忠。两年后，他去世了。

穆罕默德一开始就相信他被召唤去消灭阿拉伯的偶像崇拜，并把他的同胞带回真正的对上帝的崇拜。他到麦地那后不久，遇到了犹太人的反对；他曾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此后他对他们充满了狂热的仇恨。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直在准备对希腊人的军事远征。他的计划已经改变。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先知，而是渴望成为反对世界偶像崇拜的激烈征战的军事领袖。在他身上出现了对神的旨意的崇高奉献和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狡猾和残忍的混合体。

穆罕默德的教义和教规法令被保存在《古兰经》中，这是他声称通过天使加百列给他的启示的记录，并被他的追随者接受为上帝的话语。他的目的是恢复他认为上帝向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的所有先知启示的纯粹的宗教。

在他的宗教思想和故事中，没有任何原创性。其中许多是来自犹太教拉比作家和启示录与福音书。他的上帝学说是犹太人的一神论，圣洁的概念被掩盖，而权力和意志的概念被强调。上帝以其无所不能的能量统治各地，而他（上帝）被无限地高举在被造物之上。没有中保向人揭示上帝，并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后来，对上帝不可抗拒的意志的重视导致了一种极端形式的宿命论。穆罕默德的先知使命被用于取代了正义与和平的弥赛亚统治。穆罕默德以生动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将受折磨的偶像崇拜者的地狱之苦，而对于信徒，他则描绘了感官天堂的欢乐。然而，他对未来生存的描述并不是没有一些更多的精神特征；他所允许的一夫多妻制比阿拉伯人无节制的骗局好得多。

他接受了许多他所知道的旧约圣徒，并承认基督的先知使命，尽管他轻蔑地拒绝了基督的神性学说。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大声谴责犹太人和基督徒不相信他们自己的神召而心硬的行为。

在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的统治下，他（哈里发）集皇帝和教皇的职能于一身。穆斯林的统治范围迅速扩大。根据穆罕默德先知预言的进展情况，异教徒、叛教者和分裂者将被消灭。而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则可以选择《古兰经》、进贡或死亡。

阿拉伯军队充满了永不熄灭的狂热，以及对掠夺和统治的渴望。他们在进攻时很可怕，但在胜利时却很温和。他们中的一位伟大领袖最喜欢的战斗口号是 "战斗，战斗--天堂，天堂"。胜利者和被杀者都会得到天堂的快乐。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将所有阿拉伯人团结在他们的旗帜下。（拜占庭）帝国的东部省份由于没有得到（拜占庭）皇帝的支持，很容易成为（阿拉伯人）愤怒的入侵者的猎物。到主后637年，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落在异教徒的手中。被教义分歧削弱的非洲，接下来被入侵和征服了。基督教的敌人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波斯分享了叙利亚和非洲的命运（即，被阿拉伯人征服）。八世纪初，撒拉逊人（Saracens）（穆斯林）进入西班牙，并在八年内完成了对该国的征服。然后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占领了高卢的南部。穆罕默德的力量似乎正在包围着基督教，并威胁要摧毁教会和基督教本身。

但在图尔和普瓦提埃之间的平原上，主后732年，查理（或译查尔斯）率领奥斯特拉斯的法兰克人与他们（穆斯林、即撒拉逊人）相遇，彻底击败了他们，以至于他（查理）后来一直被称为马特尔，或称铁锤。伊斯兰潮流被阻止了。欧洲摆脱了被阿拉伯先知的弟子们占领的危险。

阿拉伯人通过对艺术和科学的奉献，对基督教产生了间接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学校，其中两所建立在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非常出色，吸引了许多犹太和基督教学者。只要基督徒缴纳贡品，不侮辱穆斯林的信仰，并且不试图使其民众改信其他宗教，他们（穆斯林）的国家就会容忍他们。

==========

第二章

基督教的生活：基督教的崇拜：基督教的神学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新形成的各日耳曼民族中，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被每个民族的特点和崛起的机构所改变，但总体上与君士坦丁时代后的旧罗马帝国中存在的关系相似。

在法兰克人中，直到这一时期的后期，教会都被卷入国家的混乱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影响所支配。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虽然在名义上免于政治事务，但却被卷入了发展中的封建关系的范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或道德几乎与大的世俗领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当佩平--也许他的前任查尔斯-马特尔也是如此--希望加强他的军事力量时，他（佩平）毫不犹豫地收回了教会财产，就像它是由一个简单的封建领主持有的一样。法兰克人还侵犯了教会选举的自由，尽管宗教会议偶尔会进行抵抗。然而，这些弊端通过后来的改革，特别是查理曼大帝时期的改革得到了部分纠正。

在英国，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和谐的，教会和民事的职能并没有如此混杂。也许是由于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的神职人员都是修士，他们没有像他们的一些法兰克族兄弟那样，获得对其教区的世俗领主地位。

西班牙的历史还呈现出另一个特殊性。君主政体非常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因此，教会努力使它（西班牙君主政体）具有某种神权的神圣性。

在法兰克人中，多年来，省（主教）议会不再召开了。民事和教会法律在贵族附庸者们的“宗教大会”上不加区分地通过；参加大会的人员，既包括非宗教人士，也包括教士。在立法问题上的这种（教会与国家民事政府之间的）互动对国家来说比对教会更有利。博尼法斯和查理曼的改革旨在恢复早期更有秩序的做法。

在英格兰，举行了单独的宗教会议，王公贵族们都出席了会议，尽管他们唯一的作用可能是确认（而不是干预）教会会议的做法。教会对日耳曼人中普遍存在的粗暴的正义观念进行了有益的修正。良好的效果体现到实际的生活中。然而，由于日益增长的将神职人员从民事法庭的管辖权中撤出的趋势，部分中和了这种情况。

修士们的生活往往与世俗神职人员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革的需要，在英格兰和法兰克-德意志的传教士教会中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教会主要是由修士来服务的；但是，改革的需要在古老的社区中尤其明显，而在法兰克人中更是如此。在那里，下层神职人员主要是从江湖郎中招募的，这种做法是出于政府的需要，但也不可能不对教会的纯洁性造成损害。为了抵制牧师智力和品格下降的邪恶趋势，大约在八世纪中叶，有人试图引入教规式的生活方式。神职人员被聚集在一起，并被置于类似于本笃会修士的规定之下，只是神职人员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财产。在克洛德冈，建立教规式生活的领导者

是克洛德冈主教梅兹。

在许多情况下，教区太大，主教们无法有效地管理。不配的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被任命为主教，而不服务于特定的教堂，并且到处闲逛，通过行使精神职能赚钱。这也不是混乱的唯一来源。法兰克的君主们有他们的宫廷牧师，贵族们有他们的城堡牧师。其结果是，在许多情况下，主教的权威被置之不理，而教区教堂由于只有穷人经常光顾，也就失去了其受人尊敬的地位。

那些作为教堂创始人的人，这些人或他们的继承人，被赋予了对他们所受捐赠的财产的某种监督权，以及提名财产持有人的权利，他们常常浪费财产，出售职位，并试图使神职人员独立于主教。这种罪恶的事实导致了主教对之进行更严格和更频繁的查访的要求。召开了教会法庭，并对神职人员和教友的做法进行了详细调查。

在高卢长期以来的政治混乱中，大都市宪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大城市的存在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这在高卢已经被破坏了。作为教皇的代理人，（高卢主教）博尼法斯试图重新建立它（法兰克教区的大都市制度），但他并不像教皇西奥多在安排和确认英格兰的大都市制度那样成功。没有哪个法兰克教区能在名气和影响力上与英国坎特伯雷相媲美。

在各地，主教们宁愿选择罗马的遥远权威，也不愿意选择邻近的大主教；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在帮助一种权力的发展，这种权力最终将证明比任何单纯的省或国家大主教的权力更可怕。——这一时期的教皇权力不仅在政治和教会的混乱中幸存下来，而且还在混乱中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这主要是由于其（罗马教皇）历史的三个重要特点：（1）教皇的性格和远见，（2）不断赢得新臣民的传教热情，以及最后（3）与被加冕的法兰克人国王佩平的联盟。首先提到的特点在格里高利一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他（格里高利一世）是一个真诚地选择隐居的人，而不是看重财富和高尚出身而赋予他的地位和影响。从禁欲主义的隐居生活开始，他就被神呼召，很不情愿地担任一个又一个职务，直到最后他被安排在圣彼得的椅子上。现在，罗马教皇的宝座上坐着一位修道士。虽然他没有学识，但他在四大拉丁教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被灌输了一种深刻的道德热忱和热诚的精神；但他的观点往往很狭隘，把上帝的国度与教皇的统治混为一谈。在他的命令下，传教士们前往英国，为英国教会奠定了基础，并将其与罗马紧密相连。他成功地在西班牙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教会在主后589年因雷卡里德国王的皈依而摆脱了对阿里乌异端的追随。后来，西班牙的主教们出现了更加独立的精神。国王Witiza在主后701年禁止（西班牙教士）向罗马提出上诉。然而，这些程序的自然结果被不久后发生的撒拉森人（穆斯林）的入侵所阻止。

通过格里高利的努力，高卢与罗马的联系更加紧密，阿尔勒主教被任命为使徒代表。格里高利用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异端邪说和其可能潜入教会所会导致的混乱局面。在他（格里高利）自己的教区里，他特别积极，惩罚了出售教会职务的行为，并改革了神职人员和修道会。在意大利，这位教皇巧妙地处理了与东方（君士坦丁堡）皇帝关系的问题，并被后来的罗马教皇们成功效法。虽然在名义上受制于东方皇帝，但罗马教皇们并没有得到来自东方皇帝的真正保护。

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关系。

君士坦丁堡对（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的保护，使得他们（伦巴第人）即使在成为基督教徒之后，也不断地威胁着（罗马教皇）主教国和罗马本身。

格里高利和东方的关系很紧张。喜爱炫耀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取得了″普世牧首″的称号。格里高利抗议这种对彼得教区权利的侵犯，并从今以后采用了″仆人中的仆人″这一相反的头衔，他的所有继任者，无论是最傲慢的，还是最温顺的，从那时起都使用这个头衔。

麻烦并没有随着格里高利的生命结束而结束。在本世纪晚些时候，君士坦丁堡的一次会议通过了几条罗马特别不能接受的教规；君士坦丁堡会议允许牧师结婚，并巩固迦克墩会议关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的教规，并宣布反对使用画像（因为圣经十诫中反对偶像崇拜或形象崇拜）。罗马教皇谢尔盖一世禁止在西方宣扬这次会议的法令。这是这场运动的开始，它最终使东西方两个教会分离。当下个世纪上半叶，关于画像的大争论爆发时，它达到了第二个阶段。罗马教会激烈地捍卫这些神圣的标志，因此招致了东方（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敌意。伦巴第国王中最有能力的吕特普朗看到了他的机会。坚不可摧的拉文纳城因教皇利奥三世在主后726年发布的关于圣像的破坏性的公告而发生内乱。虽然城市很快就被夺回，但罗马主教区仍处于征服者的摆布之下。

罗马教皇现在发现自己与他在东方的合法统治者处于敌对状态，并暴露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图谋之下；伦巴第的势力非常危险，无论它是以公开的敌意出现，还是披着虔诚的敬意和友谊的外衣。

教皇焦急地将目光投向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法兰克人，他们是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的卫士。主后741年，格里高利三世不得不以几乎悲惨的措辞向查理-马泰尔求救。但同年查理的去世使这两个大国（法国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

由他（查理）的儿子（佩平）来完成。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佩平并不满足于（作为领主）仅仅拥有法兰克王国的主权；他希望得到皇冠，而这顶皇冠被墨洛温家族的堕落代表所佩戴，实在是不值得。然而，他（佩平）担心他的头衔会不安全，除非它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认可，比如说罗马教会为他加冕。

教皇很清楚一个法兰克人盟友的价值，他毫不犹豫地让圣彼得的权威在一个邻国的事务中发挥作用。教皇命令博尼法斯为佩平加冕为国王。两年后，当他（教皇）的继任者斯蒂芬到佩平那里寻求直接援助以对抗伦巴第人时，另一个更盛大庄严的加冕仪式为他（佩平）在兰斯举行。

这位新国王（佩平）两次从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的手中拯救了罗马，赢回了被征服的土地，并将它们交给了罗马教会。这是教皇们渴望已久的世俗统治的开始。

佩平死后，伦巴第人再次变得咄咄逼人。在教皇的号召下，查理曼越过阿尔卑斯山，推翻了敌对的伦巴第人的君主制，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法兰克人的统治，同时确认了罗马教会首脑的允准。意大利在名义上仍受制于东方皇帝，但查理曼凭借其拥有的实权和教皇赐予他父亲佩平、后来又赐予他自己的加冕头衔，行使了帝国权利；尽管这（法兰克人的君主头衔）原本只是一个等级名称，但现在已成为一个类似于拉文纳的执政官所享有的权力的头衔。这场伟大的历史剧的高潮被一场几乎夺去教皇利奥三世生命的叛乱所加速。教皇再次逃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法兰克人君主的宫廷。查理曼大帝来到罗马重新建立秩序。

在主后800年的圣诞节，人们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听弥撒。在仪式上，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教皇突然走到查理曼面前，给他加冕为皇帝。在这一行动中，利奥（教皇）作为罗马人民的代表出现。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因为（罗

马）帝国被（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女人艾琳篡夺了【译者注，此时在君士坦丁堡，一位女性担任皇位】；他们选择在西方拥有实权的查理作为君士坦丁六世的继承人。

尽管三百年来罗马帝国（译者注，或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在西方几乎只是一个（空空的）名字，但它对人们的思想仍有强大的影响，并被认为是真正的天主教会的必要对应物。上帝的国度是一个，但它在两个方向上表现出来：世俗的通过罗马帝国，精神的通过罗马教皇制度。在主后800年的这个圣诞节，出现了两个相互不协调的大国（罗马教皇体系，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它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和谐，而且它们为争夺世界而斗争。

他们为争夺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权而进行的斗争，当它到来时，灌注表现了欧洲三百年来的注意力。（教皇）利奥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后来的教皇断言，（罗马）帝国是通过圣彼得教廷的权威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的，这一点是可信的。

_____

（罗马）帝国的生活。

此时，基督教已经与迷信和律法主义的因素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它无法迅速彻底改变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思想和习俗的状况。太多时候，它似乎只是用圣人和玛利亚来代替神，用大量的图像和遗物（译者注，圣徒的所谓遗留品，被罗马教皇定位神圣之物；这显然是谬误的，是受到异教迷信的影响）来代替少数的偶像。福音的精神真理只能逐渐取代粗俗但根深蒂固的多神教思想。神职人员，他们的教导本应灌输这些福音真理，他们的生活本应体现这些真理，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却严重地无知和不道德。

关于作为救世主的基督的意识变得模糊不清。人们被道德上的邪恶所困扰，不如被身体上的苦难所困扰（即，人们看重身体疾病的医治，却不看重道德上的邪恶与更正）。他们从圣人的怜悯中寻求解脱，特别是图尔的圣马丁，他生前的影响遍及整个高卢。他们（基督徒们）向穷人慷慨解囊，建造和捐赠教堂，到罗马或其他有名的圣地朝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抚慰被唤醒的良知或消除对未来报应的恐惧。

新的节日被增加了；最重要的是玛利亚的升天节，或她奇迹般地升入天堂，正如图尔的格里高利所描述的神话般的传统。那些把基督教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忧伤而忏悔，并试图恢复教会的纪律，使其恢复在古代时期就有的严格的规定。但人们发现，在日耳曼人中执行忏悔规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为最严重的罪行支付金钱作为补偿。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规定的忏悔可以减为金钱罚款。从这个简单而又看似合理的安排中，发展出了赦免制度（即，通过缴纳罚金而获得神职人员对其罪行的赦免）。随着教会的外部观念（即，形式主义、礼仪主义）越来越盛行，神职人员的可见官方行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主的圣餐继续被视为一种祭祀，在这种祭祀中，为死者的祈祷特别有效。教士们在焦急的朋友们的馈赠下，为逝者做弥撒，以便他们的灵魂能更快地被拯救出炼狱的痛苦。这导致了私人弥撒的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主礼的牧师在场（译者注，这些所谓祭祀、为死者祈祷、以及炼狱、等等等等，都是不符合圣经、不符合福音真理的，是圣经中根本没有的东西，也是与圣经福音精神不一致、或矛盾的东西；它们是罗马教皇体系以及君士坦丁堡教会体系在后世漫长历史时期所逐渐发明和演变出来的谬误和教义上的堕落）。

虔诚的信仰和这个时代的迷信以一种最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异教的一种生存方式，并被教会采纳，并以额外的庄严仪式加以美化。当有必要决

定一个争端或侦查一个罪犯，而证据不足时，人们习惯于诉诸于上帝的审判。一枚戒指被扔进沸水锅里，争议者或被告，视情况而定，被要求把他的手臂伸进去并取出来。或者，他可能会被强迫蒙着眼睛走过间隔不远的一些烧红的犁铧。人们相信，通过神的干预，无罪的人可以逃脱一切伤害。这很可能是由于主持仪式的牧师有时是腐败的，而且事先得到了很好的报酬；或者如果牧师是诚实的，而且知道他是无辜的，他（牧师）就会费尽心思保护无知的受审者。

这些迷信需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来抵制，而这只能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有些神职人员不能理解教父们的讲道，他们被任命在教堂里宣读这些讲道，其他人甚至不能用生活中的普通语言解释信条和主祷文。一些主教和查理曼本人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队伍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这里不乏杰出的人，他们在学识和精神洞察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基督教的影响，只要它能够穿透律法主义（形式主义、礼仪主义）的外壳和迷信的泛滥，就能净化人们的生活，滋养出更高尚的文明的萌芽。

_____

这几个世纪在神学思想上比教会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贫瘠。

西班牙教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他的著作涉及各种神学，多种主题；他编纂了一本〝句子〝集，或称〝格言〝集，将教父们的内容安排在不同的标题下；这本书长期以来一直是神学研究的手册。

稍后，一位东方修士，大马士革的约翰，他在希腊和拉丁教会中都被尊为圣人；他将一部神学著作分为三部分，称为〝知识之泉〝。其第三部分是〝（东）正教信仰的精确阐述〝，这是一个从教父时代和第四届至第五届大公议会中得

出的神学体系。他的学说和论据都是从这些资料中借用的。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作品在三位一体和基督的位格方面的内容很丰富，但在实际问题上的内容很少，因为希腊教父在这方面的论述较少。这部大马士革的作品在东方教会中受到最高的尊重，并一直保持着它的地位，直到现在。

==========

==========

==========

==========

==========

==========

==========

第五阶段

从查理曼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主后800-1073年).

==========

==========

第一章

基督教的传播

英国人和德国人的皈依给了基督教一个机会，让它在北方和东方的同类（日

耳曼）部落中建立起传教站。福音往往是由冒险的旅行者、商人、渴望获得殉道冠冕的热心修士、或一些征服军的追随者首先带到那里的。

虔诚的路易斯（主后814-840年）利用他对日德兰君王哈罗德的帝国影响力，促进基督教在丹麦人中的传播。他在斯堪的纳雇用了科维的修士安斯加（Ansgar）作为传教士，他后来是汉堡的大主教。

基督教经历了各种变故，直到英国的征服者卡努特（Canute）的丹麦帝国时期。主后1014-1035年，基督教最终在丹麦建立起来。

安斯加对瑞典进行了两次访问，并在东海岸奠定了传教的基础。他是一个有勇气和虔诚的人，虽然充满了热情，但却很温柔和耐心。他对在战争中被俘的青年进行福音原则的指导，以便他们可以向同胞传教。他的传教努力被海盗诺曼人的入侵所扰乱；在一次攻击中，他们摧毁了汉堡，这个993年的罗马城市。

通过几个连续的国王的影响，瑞典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并隶属于布莱梅教区，大主教职位被转移到该教区。基督教在挪威的发展与最英勇、最爱国的诺曼人君王们的发展相似；哈康和两位奥拉夫，在旅行中熟悉了它，努力用武力引进它。他们的努力遇到了不同的成功。

异教的瑞典人、诺曼人中的异教徒没有被征服，直到托尔的圣像在一名基督教士兵的打击下摔成碎片，并从里面爬出许多老鼠、蛇和蜥蜴。在从异教到基督教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中间阶段，在此期间，基督与古老的神灵一起被崇拜。基督教从挪威传播到格陵兰岛和冰岛。有一段时间，冰岛人顽强地争夺他们生吃马肉的古老权利，并抛弃那些他们不重视的孩子的生命。

查理曼大帝在斯拉夫民族中进行的改变并不比他的征服更持久。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奴隶们反对基督教在斯拉夫语中与德国的任何联系，而他们对德语和拉丁语的无知使得他们无法受到来自那个方向的影响。

来自中亚的保加利亚人在东罗马帝国（译者注，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定居，并采用了斯拉夫的语言和习俗。在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战争中，他们开始认识了基督教。此后，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要断绝与东部教会之间的关系，并服从于罗马的体制和罗马教廷的权威。为此，他们与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进行了谈判；但最后，受（君士坦丁堡）巴西利乌斯皇帝的影响，他们永久地依附于希腊教会（译者注，即东方教会，或东正教）。

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西里尔和莫迪乌斯来到摩拉维亚人中间，将他们的口头语言创造成文字，并将教会的仪式传授给他们，用他们的母语来指导教会的服务，并给了他们一个版本的圣经。

主后868年，莫迪乌斯被任命为大主教。后来，他们与罗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仍然被允许使用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的礼拜形式，但由于德国主教的阴谋，莫迪乌斯建立国家教会的努力变得毫无效果。主后908年，摩拉维亚王国被玛亚人推翻，玛亚人是由亚洲的巴波希米亚人和野蛮人组成的部落，在其废墟中出现了波希米亚和匈奴。

在这些国家，基督教经过与异教的激烈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影响。他们的两位最著名的君王是波列斯劳斯二世(Boleslaus II.主后967年）和斯蒂芬（主后997-1038年）。福音从波西米亚传到波兰，在那里也成为国教。

这些教会臣服于罗马的管辖之下。他们（罗马教会）多次试图将居住在德国北部和东部的温德人--斯拉夫部落置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并将基督教加给他们。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大多数传教士不仅对斯拉夫语一无所知，而且还对在所有教会仪式中使用拉丁语的做法抱有固执的态度。主后1047年，温德人首领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在将所有部落统一到他的统治之下后，被感动了，重建了他在反抗德国人时摧毁的教堂，并建立了永久性的基督教机构。但随着他的死亡，他的人民回到了异教。直到破坏性的战争使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活着，而他们的土地又被德国殖民者重新定居之后，他们才接受了福音。

在此期间，俄罗斯人从东方（希腊教会）接受了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国王的皈依（主后988年）标志着基督教正式成立的日期。他主要是被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仪式的宏伟和令人印象深刻所吸引，正如他的大使向他描述的那样。幸运的是，西里尔的斯拉夫语版本的圣经就在眼前，国王并不满足于基督教的单纯外表，而是利用这个版本，使他的人民能够得到新宗教真理的正确指导。

福音在主后第十二世纪被传给了波美拉尼亚人，他们已经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内了。第一批传教士是具有禁欲主义习惯的人，穿着肮脏的衣服，只成功地引起了这个简单的、喜欢享受的民族的蔑视。然而，当班贝克主教、亨利四世皇帝的朋友奥托在波兰当局的支持下，以主教的风范来到他们中间，同时表现出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时，波美拉尼亚人逐渐被新的信仰所征服。

在试图使利沃尼亚人和普鲁士人基督教化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手段。从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热情中，涌现出一个骑士团，称为"剑之兄弟"。通过他们的军事勇气，利沃尼亚被征服，其新的主教区得到了保护。在13世纪，另一个起源相似的德国骑士协会与这些资深的精神战士进行了合

作。欧洲这一地区不太重要的部落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他们受到了比他们更强大的邻居的榜样影响或被其权威所胁迫。

在西班牙，尽管穆斯林的统治对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力量形成了制约，但直到主后850年，教会仍然没有受到干扰。基督徒在西班牙担任军事职务和政府文职，没有受到怀疑或冒犯。然而，在父母一方追随穆罕默德，另一方追随基督的家庭中，经常出现激烈的分歧。伊斯兰教徒经常对基督教表示蔑视，而作为回报，他们受到了基督教更多热血信徒的侮辱。关于对穆罕默德教的正确态度，基督徒分为两派。一些人主张大胆地承认基督，谴责假先知，而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更加安静和无害的行为。然而，后者在环境的引导下，并不隐瞒、表明他们的真实信仰；他们中的第一批殉道者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在其他人的心中，特别是在从山里出来的修士中，出现了对殉道的狂热渴望。更加清醒的基督徒反对这种奢侈行为；在主后852年，当出现全面迫害的危险时，科尔多瓦教会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在行政长官面前承认他们的信仰，除非他们被司法传唤。激动人心的气氛逐渐冷却下来，基督徒再次享有宗教自由。

_____

景教的传教士深入到北亚和东亚。在十一世纪初，他们成功地使一位鞑靼人或蒙古君王（名字叫做“古尔汗”）皈依。关于这位君王和他的国家的夸张报道在西方非常流行，以至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邀请他（古尔汗）接受圣彼得教廷的管辖。作为Prest John（他的名字的流行翻译，即古尔汗），他是传说和诗歌中的英雄。但他的部分神话般的伟大，很快就被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所掩盖了。

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可汗的领导下，于主后1202年成立。

他的继任者曾一度威胁到欧洲的安全。西方人对改变这些强大的势力寄予厚望。为此，罗马教会和法国的圣路易派出了门徒修士（前往蒙古传教）。

蒙古人的宗教很简单。它承认一个全能的造物主，认为大汗是他的儿子，是世界的指定统治者。蒙古人受其扩大影响的愿望所支配和征服，但不愿意接受穆罕默德教或基督教。他们建立了两个帝国，一个在波斯，另一个在中国。在前者（波斯），穆罕默德教取得了胜利，而在后者（中国），通过传教士约翰-德-蒙特-科维诺的努力，基督教曾一度取得了有希望的进展。他（科维诺）在北京工作了11年，努力教育儿童，并从人民中培养传教士。他试图促进对福音的真正了解，为此，他将《新约》翻译成鞑靼语言。但他在北京的教区小团体（他因此被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任命为该教区的大主教）在后来的中国叛乱战争中（译者注，即元末明初的中国混乱战争时代）消亡了。

_____

少数传教士随同十字军来到东方，在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向穆罕默德人（穆斯林）传讲福音。

在围攻达米埃塔的过程中，弗朗西斯被抓住并被匆匆带到埃及苏丹面前；说来奇怪，苏丹对他很尊重，听他讲道，几天后，他（弗朗西斯）带着荣誉离开了他的朋友。但传教的努力不能很好地与好战的目的相结合，基督教也不能因十字军的生命而得到很大的推荐。

雷蒙-卢尔（Raymond Lull，主后1236-1315年）提出了一个更有希望的计划。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人，他原先致力于享受世界的乐趣，但突然放弃了他以前的所有生活及其联系，而完全沉浸在基督教的哲学辩护中，以及对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转化计划中。为了让人们为

这项工作做好准备，他敦促教会的领导人建立教授阿拉伯语的学校。他的言论最终成功地从教皇那里赢得了一项法令，在西方的主要学校中设立东方语言的教授职位。他的计划在这部分实现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向撒拉逊人传播福音的愿望驱使下，他访问了非洲；此前他曾两次去那里执行同样的任务；在第三次去时，他在布道时被一群被激怒的穆斯林用石头砸死了。

犹太人大量散布在西方，他们被鄙视和憎恨。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通过放债和贸易来积累财富，作为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财富常常使他们受到有权有势和不择手段的人的觊觎。他们被指控犯有非正常的罪行；他们被折磨和谋杀。尽管教皇、有时是王公贵族努力阻止这些迫害之事，但这种压迫仍在继续。这样的考验与磨难只是证实了他们与其他人类的隔绝，并使他们更加顽强地坚持他们古老的排他性习俗，坚持他们的信条和希望。

==========

第二章

教会的政体，以及教会与民事政府当局的关系

在教会事务中的控制

帝国的尊严使查理曼强烈地意识到他作为教会及其成员的保护者和捍卫者的责任；但这对帮助他控制教会事务的作用不大，——因为查理曼本来就已经拥有了这种控制权。

他（查理曼）接受了历任教皇们的宣誓效忠（译者注，这些历任罗马教皇们虽然声称具有信仰方面的至高权威，但在民事政府事务上愿意、或不得不服从民事政府统治，正如同他们原来服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统治）、甚至在教义问题上也经常告诫他们的责任。无论他们（罗马教皇们）的眼前浮现出怎样的精神统治愿景，无论他们对实现这一目标怀有怎样的计划，当时都不是实现它们的时候。而是，帝国的力量和完整性更依赖于查理曼的天才，而教皇的统治权则取决于任何一位教皇的性格和智慧。查理曼于主后814年去世，几年后，他的帝国被其继承者们之间交战的派别分裂所瓦解。

虽然他的直接继承人在查理曼大帝之后在教会事务中保持了一些相同的至高地位，然而，教皇们利用时代的混乱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使自己更加独立。在这一愿望中，罗马人对法兰克人的统治的敌意使他们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罗马教皇）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消极优势，而是逐渐争取在帝国政治和司法行政方面的权力。逃到他们那里寻求保护的罪犯，在得到教皇的赦免后，可以藐视世俗法庭的权威。格里高利四世在主后833年大胆尝试在虔诚的路易国王和他叛逆的儿子之间进行干预，这引起了法兰克人主教们的愤怒抗议，但这有助于教皇支持的事业：国王们的王冠要服从教皇的命令这一原则。

这些王子们（未来的君王们）采用主教的专断作为废黜他们父亲的手段，而历代皇帝都希望获得教皇授勋所赋予的不可侵犯性，这最终都会促进教皇的主张。路易二世在给希腊（君士坦丁堡）皇帝罗勒的信中竟然说 ″通过按手礼和最高教皇的祝圣，我们被带到了这个显赫的地位″。

————————————

这个时代的运动是朝着教皇登基的方向发展。虔诚的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国家

分裂、派别纷争精神感到震惊。他们完全相信教会优于国家、并急于维护神职的神圣性和圣彼得继承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正是这种精神产生了《伪伊西多里亚教令》。以前的教会法编辑汇总者以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斯（Dionysius Exiguus）为榜样，从主后384年至398年的罗马主教西里奇斯（Siricius）统治时期开始收集；但这个版本（《伪伊西多里亚教令》）的作者大胆地引用了据称来自其前任的法令，一直到圣彼得本人的继承者克莱门特。虽然这些伪造的文件很笨拙，而且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但在那个不严谨的时代，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文件的虚假性没有被发现。

该《教令》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神职被宣布为不可侵犯的，并摆脱了世俗的控制。对其（神职）个人或财产权利的侵犯被宣称是对上帝法令的罪过。神职人员的官方行为和言论的有效性和效果被认为绝不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性格（而是取决于其神圣的职务）。为了完善等级观念，神职被视为包括明确的官方尊严等级，并通过下级神职人员、牧师、主教、大主教和教区主教，上升到彼得的继承人，每个下级都可以向他（罗马教皇）上诉，没有他的批准，任何判决都不是最终的。从他（教皇）这个源头，正义和仁慈流经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作为传递祝福的渠道。最有野心的教皇所提出或暗示的最先进的主张，在这里被明确而系统地阐述在虚假的信件和法令中，早期教会中受人尊敬的主教的名字被附在上面。它们所体现的思想逐渐成为教规、教法和教皇的决定。教会的统一性就这样在不同民族逐渐被各自纯粹的地方性目标所充斥的时候被强调了出来。

第一位明确理解并坚决主张这些观点、并引用该《法令》本身为其辩护的教皇，是尼古拉一世。他与废黜苏瓦松主教罗萨德（Rothad）的兰斯大主教发生冲突。罗萨德向罗马提出上诉，教皇命令他复职。他（教皇）遇到的反对

较少，因为他支持主教的事业，反对一个傲慢的大主教。大主教们在接受教职时，被告诫有义务服从教皇的命令。

法兰克人统治者，洛泰尔二世国王为了一个情妇的缘故想把妻子抛弃，并使他妻子受到诽谤和迫害。法兰克教区的主教和大主教是洛泰尔二世国王的罪恶附庸，支持国王在这件事上的决定。然而，教皇（尼古拉一世），作为洛泰尔二世国王妻子的支持者，不顾皇帝的威胁，废黜了特雷弗和科隆的大主教。尼古拉一世在公众舆论和洛泰尔（他的叔叔们是他的政治对手）之畏惧的因素下，成功地维护了其受伤妻子的处境，尽管他在麻烦结束之前就去世了。

但对尼古拉一世有利的事情，在他的继任者哈德良二世的时候，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他（哈德良二世）的干预下，可耻的是，他没能抵挡住秃头查尔斯和德国人路易对领土的不正当贪婪；以及他（哈德良二世）试图恢复被废黜的拉伊尔主教的努力，都失败了。

当查尔斯登上帝国宝座时，为他加冕的（教皇）约翰八世宣布，皇帝的王位只归他一个人拥有（即，教皇不得不屈从于查尔斯的政治压力，顺服于查尔斯）。与他自己的前辈们（前任的教皇们）的愿望相反，他任命桑斯大主教为法兰克和德意志教会的总主教和使徒代表（即，教皇不得不按照查尔斯的意愿行事）。

主后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后，意大利贵族的权力逐渐增加，直到他们独立。随之而来的是意大利各方的疯狂冲突，教皇也被卷入其中。正如罗马作家所表述的那样，圣彼得的位子在激烈争斗的派别的海洋中翻腾。许多年来，教皇们是三个贪婪而野心勃勃的罗马女人的奸夫，或者是她们的儿子和孙子。约翰十二世是所有这些教皇中最卑鄙的一位，他要求德国国王奥托一世保护

他，以对抗意大利的贝伦加二世。然后他很快阴谋赶走他最近邀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迅速采取了报复行动。他在圣彼得教堂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在会上，约翰被废黜，罪名是谋杀、亵渎神明和严重犯罪的性行为。但约翰在他倒台之前，为奥托加冕为皇帝，这一行为的意义不亚于一百六十二年前利奥（罗马教皇）的类似行为。

现在出现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与世界性宗教相对应的世界性帝国。它的疆域比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帝国还要狭窄。但它（神圣罗马帝国）与教会的理论关系，它的权利和义务，现在都被更清楚地理解。由于只有一个真正的天主教会，所以也只有一个神圣帝国。在理论上，这两个主权国度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冲突。上帝让教皇掌管世界的精神利益，而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掌管世界的世俗事务。教皇要引导和统治人们的灵魂，使他们获得永恒的生命；皇帝要管理他们的外部关系，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最有效的促进。这是两个伟大世界的统治者的和谐合作的理论，每一个个都在其独特的领域，在地上带来上帝的国度。这是一个美丽的想法，而对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做法往往形成了一个可悲的对比！但是，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中所体现的思想（除了教会的传教工作之外），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拯救罗马教皇的地位。

神圣的罗马在长期的腐败中被毁掉。奥托的皇帝生涯并不像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帝国的王冠是教皇赐给他的，比查理曼的王冠是由利奥授予的更清楚；但奥托积极地废除了同一位教皇（约翰十二世）；而且只有通过奥托的权力，（教皇）利奥八世和那些紧随其后的继任者才能在圣彼得的椅子上维持自己的地位。当奥托去世后（主后973年），混乱的精神再次在罗马爆发。

一个宗教会议无视罗马教皇的权威，罢免了兰斯大主教阿努尔夫，这导致了与法国教会中的独立党派的冲突。该党派在有学识、有能力的格贝尔的指导

下，支持宗教会议，反对教皇。然而，结果表明，尽管教皇多年来几乎是处于致命的腐败状态，但并没有失去其权力。约翰十五世的一系列法令剥夺了格贝尔的精神支持，即使它们未能削弱他和他的国王休-卡佩（Hugh Capet）、使其屈服。

在此期间，奥托三世在意大利建立了他的帝国权威，并在约翰十五世去世后促成了他的表弟格里高利五世的祝圣。格里高利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威胁要将法国教会置于禁令之下。休-卡佩的继任者罗伯特被个人的希望和对奥托三世的恐惧所驱动。

由于担心奥托三世，他（罗伯特）屈服了，（兰斯大主教）阿努尔夫得到了恢复。

格贝尔失去了他的事业和兰斯教区，但奇怪的是，他只是成为了罗马教区的下一个继承人。他引人注目的事业是这个时代的奇迹，无知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是通过与魔鬼的契约而繁荣起来的。

奥托三世于1002年去世，他的教皇也在不久后去世。德意志的统治权再次被抛弃，一个教皇堕落的新时代随之而来。

一个12岁的男孩，在犯罪方面很早熟，以本尼迪克特九世的身份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几年后，他的快乐被对手的觊觎打断了，于是他（本尼迪克特）厌倦了这个职位，将它卖给了约翰-格拉蒂安，后者取名为格里高利六世。格拉蒂安希望利用教皇的权力作为推行改革的一种手段。随后，本尼迪克特又反悔了他的交易。

在这个时候，亨利三世来到意大利，召集了苏特里的宗教会议，并废黜了三

个敌对的教皇。会议的一项法令规定，作为改革的倡导者，他有权选择继任教皇。亨利三世，现在被新当选的教皇克莱门特二世加冕为皇帝，在997年成为主人。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教会和国家都是如此。在他的保护下，急于结束教会罪恶的党派日益强大。1048年，皇帝的表弟布鲁诺，在沃尔姆斯会议上被任命为教皇。

随后，在沃尔姆斯会议上被任命为教皇后，布鲁诺被一位年轻的修士说服，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除非直到他在罗马正式当选，并穿着朝圣者的服装前往罗马；从而，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放弃了皇帝任命教会领袖的权利。

新任教皇，称为利奥九世，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位聪明的修士带去当副执事。这位热心的教士就是希尔德布兰，一个木匠的儿子，本笃会的成员，他和红衣主教彼得-达米亚尼（Ostia）一起，成为后来所有改革的伟大推动者。教皇在这些顾问的影响下，努力制止贩卖圣职，以及神职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包括在后一种情况下违反教规法的牧师婚姻。在利奥九世统治时期，希尔德布兰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教会的净化和教皇权威的提升。

他（希尔德布兰）选择了埃希施塔特（Eichstadt）主教盖布哈特（Gebhardt）作为利奥九世的继任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教士，也是亨利三世的有影响力的顾问，希望以此来赢得罗马的利益，让这个对罗马的主张有危险的（德国）党派中最强大的成员加入。1056年，亨利三世去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留给了他年仅六岁的儿子。这给了改革者一个机会来实施他们计划的第二部分。他们（改革者们）已经净化了教皇制度；现在他们决心摆脱它（教皇制度）对皇帝的依赖。斯蒂芬九世死后，他们成功地选出了一个致力于他们的政策的人，尼古拉二世，并迫使由反对党选出的对手教皇本尼迪克特屈

服。

根据同年通过的罗马宗教会议的法令，教皇的选举权被交到了枢机主教团的手中。该团由罗马教会的牧师和执事以及七个郊区的主教组成。

红衣主教在选举中采取主动（提名）；然后需要红衣主教和执事的同意；接着是教友的同意，最后是皇帝的类似同意。如果可能的话，教皇应从罗马的神职人员中产生，并在那里举行选举，除非因局势不稳而无法实现。一场伟大的改革革命开始了。亨利三世对教皇的权力已不复存在。

罗马与下意大利的诺曼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结盟，并在这个新附庸身上找到了与帝国抗衡的力量。希尔德布兰的改革党派开始工作，激起人们对那些通过私通得到职位或有妻子的神职人员的愤怒和蔑视。

米兰发生了巨大的骚乱，在那里，每个教士，从主教到执事，都为他所担任的教会职务付费（即购买圣职），而且那里还有许多已婚教士。罗马的胜利有一段时间是完整的，当时有罪的牧师们不得不在教皇的代表、达米亚尼枢机主教的手中接受赦免。

教皇尼古拉二世的去世为新的教皇选举法规提供了第一次检验机会。枢机主教们选出了亚历山大二世。帝国党在巴塞尔举行的会议上选择了帕尔马的主教，名字叫霍诺里斯二世。然而，由于强大的德国教士和贵族的阴谋，他们急于削弱皇权，因此，亚历山大在随后的斗争中获得了优势。他（亚历山大二世）战胜了他的对手（霍诺里斯二世），并得到了皇帝的承认。

希尔德布兰成为大执事。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抵制了（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行动目的。他（教皇）通过他的传教士拒绝支持亨利的离婚企图，并在心怀不满的撒克逊人的投诉下，将他（亨利）传唤到罗马，查询对他的贩卖圣职和压迫的指控。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突然去世，把这个麻烦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来解决。

_____

封建制度和神职人员。

在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对神职人员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管理迅速增加的教会财产的方式。

主教经常被任命为其教区的伯爵或公爵，享有与世俗领主相同的特权，履行相同的职责，并像他们（世俗领主）一样，利用阴谋和暴力来推进他们的野心计划。作为贵族附庸，他们按惯例向国王或皇帝宣誓效忠，并由国王授予戒指和法杖，虽然它们（戒指和法杖）是精神功能的象征，但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它们是世俗省份中行政权力的标志。德国国王把许多重要的封地给了他们的教士，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抵御强大的世俗贵族侵袭的堡垒。神职人员因此而被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虽然神职人员因此而与世俗权力紧密相连，但直到亨利四世时期，在德国出售圣职的情况比其他地方（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少。封建主义本身也因教会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它的瓦解趋势被教会特有的统一思想所应对。一些罪恶，如作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而出现的私人战争权，被基督教原则日益增长的力量所遏制。

在复活节，″上帝的休战″--从星期三的日落到星期一--试图通过禁止一切暴力来纪念基督的受难和胜利的日子。

教会的内部组织在这一时期被部分削弱了。主教成为大贵族，失去了对其教区的神职人员的控制。教规式的生活方式堕落为一个促进个人野心的社会。修士们不再为更纯洁的生活树立榜样。修道院到处都在堕落；富裕的基金会成了权贵们贪婪的猎物，他们利用修道院院长的地位作为个人致富的手段。人们一再尝试改革修道院的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修道院协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克鲁格尼的会所。

==========

第三章

基督教的生活和崇拜：基督教的教义

无知与迷信

社会、政治和教会的混乱，拉丁文的使用日益减少，以及新语言的不发达，都是造成当时无知的原因。

这导致了主后十世纪时期的普遍存在的无知。基督教的力量被迷信所削弱。

老百姓普遍认为宗教是由崇拜图像、收集圣徒遗物、听取和讲述奇迹的传说以及去朝圣组成的。圣人的数量迅速增加。此前，关于他们（历代圣人）的记忆主要是在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教堂和国家中被珍视；但现在，根据

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制度思想，他们（历代著名的圣徒）开始被教皇封为圣徒，并接受整个教会的敬意。奥格斯堡的乌尔里希是第一个被约翰十五世的法令提升到这一尊严的人。

在一些教堂里，对上帝的看法是如此低俗，以至于当维罗纳的拉瑟乌斯宣扬关于上帝的属灵真理时，他的某些神职人员提出抗议，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以为我们对上帝有所了解，但如果上帝没有头，他就什么都不是"。无知与不道德和犯罪有关。拉瑟乌斯为神职人员的愚蠢和放荡、人民的邪恶以及主教的疏忽而绝望地呼喊。强制执行独身主义规则的尝试对教士的道德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那些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教会一般都是最开明的，管理最好的。即使是达米亚尼，尽管他反对牧师结婚，但也不得不为卢卡和都灵的神职人员的诚实和智慧作证，因为那里的神职人员是被允许结婚的。

事实证明，禁令是对付那些不愿服从教会普通纪律的无法无天的贵族的有力武器（即，禁止那些违反教会纪律的贵族等人士参加宗教礼仪活动）。

领袖们和宗教议会都试图向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强调传播福音的责任和适当地作好人的必要性，指导人民了解基督教的真理。

在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国王，特别成功地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学习的兴趣。在同样的精神感召下，阿尔萨斯的修道士奥特弗里德（Otfried）在主后第九世纪为法兰克人创作了一部诗意的福音书译本。

虽然这个时代的记录充斥着广泛的无知和道德沦丧的证据，但我们绝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许多地方没有光亮。

不仅有忠实的教会官方人士，也有大量普通基督徒，他们井然有序的生活保

存了真正的虔诚精神，即使这些模范人物在论战或编年史中没有地位。

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

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破裂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彻底发生。在关于使用画像的巨大争议中，西方教会并没有站在圣像破坏者一边，而是对他们狂热的反对者表示同情（即，西方教会仍然保持了使用画像与偶像等做法）。伊斯兰教的胜利，使叙利亚、波斯、埃及和北非被征服，主要影响了东方（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在其专制王公的统治下，它（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帝国）保留了自己的政体，不受西方的影响。没有任何类似于教皇制度的机构能够在东方建立起来；然而君士坦丁堡宗主国的地位却成为罗马教会主权在该地区扩展的障碍。（罗马）教皇制度在西方的发展则是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继续保持统一的主要障碍。

第九世纪爆发了一场分歧，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Photius，他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和有才华的人，他从卫队队长的位置上被提升到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职位。他的晋升是由于伊格内修被逐出这个职位，因为他在与年轻皇帝迈克尔三世的不义叔叔巴达斯的冲突中表现得忠诚而勇敢。Photius寻求教皇尼古拉一世的支持；教皇尼古拉一世对伪伊西多里亚派特权的主张和决定，与篡位教长的意愿相悖，这激起了他（Photius）强烈的愤慨。主后863年，尼古拉在罗马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将其（Photius）驱逐。Photius则又颁布了一封通谕，他在信中指控拉丁教会为异端，因为它的独身主义规则，它对尼西亚信条的插手，以及各种仪式的特殊性。第二年，Photius导致罗马教皇被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宗教会议逐出教会。

在Photius和他的敌人之间的争斗中出现了各种转机，并曾一度恢复了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后，教皇重新颁布了对他的禁令，这一禁令再也没有被收回。

1019年，保加利亚人被巴西尔皇帝征服，此后近两个世纪，他们的教会一直受制于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沃尼亚民族接受了福音，扩大了东方教会的领土。十一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迈克尔-卡鲁拉里乌斯（Michael Cærularius）再次与罗马发生争执，在他的推动下，保加利亚的某些教堂和修道院废除了拉丁文礼仪；他给阿普利亚的特拉尼主教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抨击了拉丁人的错误、在惯例中加入了在圣礼中使用无酵饼的内容。

教皇的使者在圣索菲亚教堂的祭坛上留下了一份开除君士坦丁堡教长教籍的圣谕，这让他（教皇）也受到了同样的诅咒，开除他（教皇）的这一行为也得到了东方其他教长的支持。通过这一行动，希腊和拉丁教会被永久地分裂了。

我们已经有机会介绍了大部分这一时期的、与学习和神学有关的杰出人物。

盎格鲁-撒克逊修士，尊贵的贝德，他宁愿做一个勤奋的学生，也不愿意承担教士的职位；他的作品显示了对当时所有科学的掌握，并使他成为西方所有国家所尊敬的作者。与他的《英国教会史》相比，他的明显的神学论文价值不大；《英国教会史》一直写到73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四年。

在查理曼大帝的主持下，知识界的复兴产生了效果，使相当数量的有功劳的学者和神学家脱颖而出。

782年，英国人阿尔昆（Alcuin）在约克接受了教育，并在意大利第一次见到了查理曼大帝；他成为了皇帝迁徙宫廷时的宫廷学校的校长。他最有趣的作品是他的信件。他精通古典诗词；他自己的风格优于当代作家的风格；他在促进学习事业方面的影响比当时的任何其他知名人士都要大。他最后的日子是作为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度过的。

都灵的克劳迪乌斯，都灵的西班牙人，卒于839年。他的教会地位归功于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路易皇帝，在查理曼大帝去世前，他曾在阿基坦尼亚的宫廷中居住，担任宫廷学校的经文讲解员。在他的主教职位上，他不仅证明了自己是偶像崇拜的积极反对者，而且还证明了教义和实践中的许多其他弊端，以至于在一个遥远的时代之后，他值得被称为新教改革者的先驱者。他几乎对《圣经》中的所有书籍都写了注释；但不幸的是，他的著作只留下了一些片段。

卡洛温时代最出色的神学家是约翰-司各脱（John Scotus Erigena）。他为在中世纪的神学中引入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脉络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主要原创作品题为 "关于自然的划分"。他区分了信仰和理性，前者以权威为基础，标志着智力生活的早期阶段，后者则从事物的必要基础和关系中看待事物。宇宙是从上帝那里展开的，上帝是未被创造的、绝对的存在，我们对他的所有肯定都是表象的语言。在这个周期的最后一个运动中，所有的东西都回到了上帝那里。他（约翰-司各脱）无疑是一个虔诚的人，但他的系统在其真正的性质上是泛神论的。它与谢林和其他现代德国泛神论派哲学家的神学推测系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然而，它的真实特征并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清楚地察觉，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但当他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否认上帝有任何预知或预定的东西上时，正统派对这个盟友表示怀疑。最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被瓦伦斯会议谴责，不久又被教皇尼古拉一世谴责。

他大约在891年死于英国。司各脱被错误地列为 ″学者之父″。他对信仰和理性的看法更像是早期亚历山大教父的看法。他的位置是在神学推测性（臆测性）思想家的名册上。他在九世纪的存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希腊教会作家中，最有价值的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Photius。他的著作中最著名和最有用的是″Myriobiblion″，它是由不少于二百七十九本异教和基督教书籍的摘录、摘要或节选组成的，其中许多书籍已经灭亡。Photius死于891年。拜占庭历史学家的名单，我们对西方（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拜占庭历史的了解主要归功于他们（希腊作家）的努力，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开始，一直延伸到中世纪。在我们现在描述的这个时期，梅塔法斯特写下了圣人和殉道者的生活；而迈克尔Psellus，一个多产的作者，（且不说他笔下的其他作品）是一系列圣经注释者中最早的一个，他们对神圣的学习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

==========

==========

==========

==========

==========

==========

第六阶段

从格里高利七世到博尼法斯八世(1073-1294)

教皇制度在西欧的全面影响

==========

第一章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

从希尔德布兰的加入到协约的签订 (1073-1122)

1073年4月22日，当大执事希尔德布兰正在主持亚历山大的葬礼时，在教士和民众的呼声中，他突然被呼唤登上圣彼得的宝座。他取名格里高利七世。尽管他表面上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罗马教皇）职位的责任，但他在管理这个职位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活力和智慧。他是新的教会和国家理论的代表，这在他第二次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的诏书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他的话是这样的：“最神圣的父亲和王子（彼得和保罗）啊，我祈求你们，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们能在天上捆绑和松开，你们就能在地上根据每个人的功绩，拿走或给予他们帝国、王国、公国、侯国、郡国和所有人的财产”。

解释很简单。灵魂的生命比身体的生命更重要。人在地上生活的几年与来世永无止境的存在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因此，控制永恒命运的人，在这里必然是最高的。最强大的世俗君王和最卑微的农民都必须向他鞠躬表示敬意

和服从。格里高利认为自己既然被提升到这一显赫地位，既然基督的国度已经交付给他管理，那么，藐视他的权威就是抗拒上帝。

从他担任教皇之初，他从一开始就宣称罗马对西方大多数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世俗的统治，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更高的司法机构，赋予其神圣的特权，以纠正其弊端，从而使其从属于它（神圣统治）。在教会事务方面，他声称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不仅有权罢免主教，而且甚至可以不经听证就这样做。尽管他真诚地希望净化教会，使之摆脱对国家的腐败性依赖，但他在选择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时却不甚严谨。他的脾气和行为中混杂着狡猾、强硬和傲慢。在那个无知和迷信的时代，教皇的诅咒被他挥舞着，成为不公正和压迫的可怕武器。他最好的精力被浪费在试图在地上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上；一个诱人的理想，但却是不切实际的。

格里高利的第一次冲突是与已婚神职人员的冲突。在他的命令下，教皇的传教士们鼓动人们反对那些已婚的神职人员，从而迫使他们在外表上遵守独身主义的规则。随后，他统治时期的伟大斗争开始了。他认为必须废除圣职贩卖，以及在他看来是其主要根源的非宗教人士的授职权。但这两者的真正原因是教会的财富。只要拥有一个富有的教区就意味着过上轻松和有影响力的生活，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购买教会的职位，有需要的君王也会不惜以这些渴望权力和富裕的人为代价来补充他们的财库。

而关键问题是，如果神职人员能够拥有领地和特权，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臣民一样，向他们的君王致意，并服从他们的宗主（君王）授予的官职标志？格里高利从他的观点出发，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即使他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即，教会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也不会采用真正的补救措施。他想通过两种措施来结束腐败的圣职任命。他将罢免所有通过私通贿赂获得职位的人。他还将剥夺所有君主通过戒指和法杖授职（授予圣职）的权利，理

由是这种行为是对神的亵渎，并将恢复教会选举的自由。根据这项法令，与每个教区或修道院有关的财产和特权将脱离君王的封建监督，实际上转移到教皇的监督之下，因为教皇在教会事务上是至高无上的。这将使教会摆脱国家的腐败影响；否则，腐败将会把无政府状态带入国家，使教会世俗化。

格里高利很有政治头脑，他选择了一个斗争的对手（德国君主亨利），并有一些成功的机会。因此，他避免了与征服者威廉（即英国国王）的争吵，尽管教皇的使者不被允许在英格兰使用传教士的权力，甚至没有英国国王的允许就不能（在英国）登陆；英国主教们也不能收到来自罗马的信件，直到国王审查这些信件之后。

格里高利曾威胁过法国的菲利普（国王），但现在他也与他擦肩而过，并选择与亨利四世作战。这一选择的原因很明显。亨利是德意志的国王，因此需要教皇的加冕仪式来完成他对帝国的所有权。在长期执政期间，德国出现的分裂由于他的放纵和压迫而加剧。他的许多臣民，特别是撒克逊人，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来放弃他们对他的忠诚。亨利肆无忌惮地出售教会职务，这为他的软弱所招致的攻击提供了理由，而作为帝国的继承人，对他的斗争胜利比对西方任何其他统治者的胜利都更有意义。

在1075年的四旬期宗教会议上，格里高利禁止非宗教人士的授职，并将亨利的五位犯有贩卖圣职罪的顾问逐出教会。他给国王（亨利）写了一封信，敦促他避开那些受到精神谴责的人，遵守神圣的法令。随后，教皇又传唤亨利到罗马，要求他在1076年2月22日举行的教会法庭上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否则将被逐出教会。教皇的这些行为使亨利陷入了愤怒之中。为了避免受到教皇的诅咒，他（亨利）使格里高利被聚集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顺从于（德意志)帝国的教士们所废黜。然后他给〝不再是教皇而是假修士的希尔德布兰〞写了一封信，否认教皇有权审判国王，除非是叛教；并声称格里高利是通过

腐败的方法获得的教皇职位；并以这样的话结束：〞不要再让一个用宗教掩盖暴力的人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因为我，亨利，蒙上帝恩典的国王，和我所有的主教，对你说，滚下去！滚下去！〞

_____

一年以后，当沃尔姆斯会议的一周年到来时，亨利正在卡诺萨。第二天，他赤着脚，穿着忏悔者的服装，站在院子里等待，祈求进入教皇所在的城堡。当时正值一月，而这位国王忏悔者却在那里站了三天才被允许觐见教皇并接受赦免。

之前，教皇的一项法令使国王的命运发生了这种变化。他（亨利）被废黜，被诅咒，被抛弃，他的臣民被（教皇）免除了（向亨利国王）效忠（的责任），并公开叛乱；他（亨利）被迫放下王权，直到教皇在明年年初的奥格斯堡宣布判决。他（亨利）带着妻子和孩子以及一些随从越过塞尼斯山口来到卡诺萨，寻求和解，从而避免可怕的判决。

但卡诺萨给亨利带来了羞辱，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耻辱；它并没有让他恢复失去的统治权。

他现在召集了他的老谋士们，努力用武力赢得他未能通过屈服获得的东西。

此时德国的王公们选出了另一位国王，苏阿比亚的鲁道夫。教皇把两个君主（亨利与鲁道夫）都召到他的法庭上，但只有鲁道夫成功地赢得了教皇的支持，并证实了亨利的仇恨。然而，在1080年，格里高利（教皇）认为鲁道夫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二次将他的主要对手（亨利）逐出教会。但（教皇的）这一行动被证明是不成熟的。鲁道夫在战斗中被杀，而亨利很快取得了胜利。

格里高利被迫看到，另一个“教皇”（或称“反教皇”antipope）克莱门特三世在罗马任职，而被逐出教会的国王（亨利）被他（克莱门特）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格里高利的生命在他的首都（罗马）已经不再安全，他向他的诺曼人盟友罗伯特-吉斯卡德寻求庇护。他没有在敌人的胜利中幸存多久。1085年5月25日，他在萨勒诺去世，说 ″我热爱正义，憎恨不义，因此我在流亡中死去″。

教皇党很快在乌尔班二世身上找到了一个几乎不逊于格里高利本人的领袖。通过巧妙的政治阴谋，（德意志）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被削弱了，而亨利的儿子康拉德则被怂恿造反。乌尔班（教皇）变得足够强大，与法国的菲利普（国王）展开较量，并因他（菲利普）与贝特拉德的关系而将他逐出教会。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充分领导者，他（乌尔班）将自己置于一场运动的领导地位，这场运动很快使他在西方变得无所不能。

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受到了穆斯林突厥人的虐待。乌尔班派出一位热心人，隐士彼得，穿越北意大利和法国，宣扬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在信中和教会的会议上敦促它。1095年，他在克莱蒙特发表的令人难忘的演讲结束时，整个大会被一股情感的浪潮冲昏了头脑，喊道：″上帝的旨意。″

威斯丁人的宗教热情被征集到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中。基督徒们急于打倒亵渎他们主的坟墓的异教徒。教皇吸引了人类内心的每一种激情。对于那些即将献身于十字军东征的人而言，去忏悔的人将获得所有罪孽的赦免，而对那些堕落的人来说，永恒的幸福是应许的回报。骑士制度产生了宗教上的奉献精神，并导致了骑士精神。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神圣的事业因奇迹和预言而变得神圣。这还不是全部。当债务人或罪犯走上十字军的那一刻，他就避

开了法律的束缚。在巴勒斯坦，冒险家可能会寻求刺激和战利品，战士希望获得领土和声誉。在这个强大的运动中，众人以教皇乌尔班为领袖。“反教皇（antipope）”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他只是罗马派系的领袖。

亨利之死发生在1099年的夏天。亨利四世的最后日子被他的次子亨利的叛乱所搅乱，他（次子亨利，或亨利五世）的非正常叛国行为得到了乌尔班的继任者帕斯卡尔二世的祝福鼓励。

亨利五世，德国的新国王，以最专制的方式使用其不正当的权力来回报帕斯卡尔对其叛国行为的支持。

有一次，教皇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以至于他和亨利五世起草了一份条约的初稿，根据该条约，教会将交出其所有的世俗财产，从此靠什一税和献金来维持生计。作为回报，国王将放弃不再重要的（对于教会圣职的）授职权。对于富有的、野心勃勃的教士和希尔德布兰迪人（教廷高级神职人员）来说，这一举措似乎是一种极度愚蠢的行为，上帝据此对他们进行了惩罚。

帕斯卡尔二世（Paschal II.）被抢劫，他的教会被破坏。（亨利五世与教皇）相互间的猜疑使这些谈判告一段落，但亨利的威胁很快就使他从帕斯卡尔手中夺回了帝国王冠，并随后让出了（对于教会圣职的）授职权。教皇的这种屈服被教皇党人愤怒地蔑视；于是，他（教皇）不顾自己的誓言，被迫与皇帝展开了公开的斗争。这场斗争又拖了几年。它所带来的苦难逐渐冷却了争斗者的热情。亨利和新任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之间重新进行了谈判，导致了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议》；亨利放弃了通过戒指和杖的授职，取而代之的是（教会任职人员）对君主权杖的触摸。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皇帝面前选出，但没有皇帝的干预。这样，教会的精神尊严得到了保护，同时又不损害帝国的主权权利。

==========

==========

第二章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

教会的政体和世俗关系，从《沃姆斯协议》到英诺森（INNOCENT）三世的死亡。(1122-1216).

1125年亨利五世去世后，弗兰肯的皇室就灭绝了，撒克逊公爵洛泰尔（Lothair），一个教会党的领袖，被提升到高位。

但教皇制度的看似胜利是短暂的。

敌对教皇（pope 与 antipope）之间的争斗给了洛泰尔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恢复他当选时让给教会的那些权利。他坚持认为，由于教长是他的臣民，在他们被任命之前，（若没有皇帝的同意），不应该被（教皇）祝圣；因为如果他不得不为教会选择的任何一个人祝圣，那么皇家权杖的触摸将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而之前的两个亨利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伟大战斗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在另一个问题上，洛泰尔并没有那么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要求。在他的加冕仪式上，他同意承认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玛蒂尔达（Matilda）的土地作为罗马教廷的封地，她是格里高利七世的忠实朋友，曾将这些土地遗赠给教会，而这些土地一直是亨利五世和帕斯卡尔之间争论的焦点。

洛泰尔的死使教皇失去了一个对其主张有利的皇帝，并使一个注定要成为皇帝的家族登上了帝国的尊严高位。教皇与它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斗争。

当帝国和教皇陷入巨大的争论时，伦巴第城市逐渐获得了一个动荡的自治权。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威胁着教皇和皇帝的权威。

在它的影响下，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一位阿贝拉尔的学生，一位牧师和共和主义者，开始宣称神职人员必须将所有的财产和世俗的统治权交还给国家，并回到福音书中所规定的、由福音书最初的传教士所实践的简单性。他的话语在人民心中唤起了同情的反应。贵族和教士们开始感到震惊。他们四处寻找可能对他提出的异端指控。但他在教义上是正统的，在生活中是个苦行僧。

阿诺德被拉特兰会议谴责，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在1143年，突然出现在罗马本身。在那里，教皇的世俗权力一度被摧毁，一个共和国被宣布成立。虽然罗马人一开始向阿诺德示好，但他们很快就开始梦想着古代罗马共和国的辉煌。

在法国，1146年，在与他们（共和主义者）的竞争中，一位教皇被杀。另一位（教皇）不得不寻求法国和全能的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的保护。

与此同时，埃德萨的陷落揭示了威胁着圣墓的危险。此时，伯纳德火热的口才使法国和德国的国王们对他产生了兴趣。伯纳德的火热雄辩使法国和德国的国王们开始了新的十字军东征，即1147年的十字军。

这次远征所遭遇的灾难极大地考验了虔诚者的信仰；但他们想到有许多人在这次远征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而确保了立即进入天堂的机会，这使他们

感到安慰。

罗马共和国的末日正在迅速逼近。哈德良四世（1154-1159），曾经是简单的英国修士，尼古拉斯-布雷斯佩尔，但现在是最不妥协的教皇之一，将叛乱的罗马城置于禁制之下。罗马人把他们的宗教仪式看得比他们的自由更重要。阿诺德被放逐。但是，教皇几乎还没有成为其首都的主人，就不得不再次面对帝国和教皇的老问题。

腓特烈一世，意大利人称之为巴巴罗萨或红胡子，已经登上了德国的王位，并且正在向意大利进军，以平定意大利叛乱的伦巴第人，并使之接受帝国的命令。

米兰和意大利北方的其他城市对任何侵犯其高度重视和被滥用的自由的行为表示警惕，这对教皇来说是抵御霍亨斯陶芬家族强权的一种机会。但在这个时候，他们谨慎地避免了与腓特烈的冲突，后者正处于早年的活力期，不仅以其英勇的事迹震惊了世界，而且得到了统一的德意志的支持。他觉得自己是奥古斯都（凯撒大帝）和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他的所有伟大能力都被用来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建立起他的霸主地位。

阿诺德和他的弟子们的观念对他（腓特烈）来说和教皇一样令人厌恶，但在牺牲这位共和主义的使徒（阿诺德）和蔑视罗马人的挑衅时，他（腓特烈）使教廷暂时摆脱了一些最危险的敌人。哈德良（教皇）现在为腓特烈加冕。这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和平只能是短期的。

当与教皇的较量通过授予西西里岛的威廉的遗产之事而得到体现时，皇帝通过切断德国与圣彼得（教皇）的贫困国库之间的所有联系来报复这一所谓对其权利的侵犯。腓特烈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哈德良的抗议信，对1157年聚集在

贝桑松的贵族们来说，这封信似乎在宣称有封建制的优越性。一位名叫罗兰的传教士，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感叹道："那么，如果不是从教皇大人那里，他从谁那里获得了帝国？"皇帝好不容易才使这位大胆的教士没有被当场杀死。德国的主教们支持腓特烈对罗马教廷的态度。他们以腓特烈的名义宣称，他把帝国的王位仅仅归功于神的眷顾。哈德良不得不（从神学）解释这些令人反感的话。皇帝对伦巴第城市的胜利之后，他在隆卡利亚的田野上举行了著名的议会，在那里，罗马法的研究在意大利北部得到了恢复，他为自己争取到了原本属于凯撒的所有权力。

他（皇帝）对旧罗马的统治，以及他对已被教会控制的土地的收回，再次引起了教皇的反对。（皇帝与教皇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争论随之而来。教皇与米拉普及其盟友签订了秘密条约；皇帝接受并听取了罗马共和国主义者的建议。哈德良之死使腓特烈免于被逐出教会，并为教皇制的分裂开辟了道路。维克多四世是由那些害怕愤怒或觊觎教皇的人选出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是由那些相信西西里岛联盟并支持教皇分裂的党派选出来的。

政治上的影响而不是牧师的意见决定了谁是圣彼得（教皇）的合法继承人。

亚历山大很快就在除帝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大国，以及那些与腓特烈的权威作斗争的伦巴第城市中得到了承认。但在1162年，米兰被摧毁，皇帝和他的教皇在意大利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并不持久。两年后，维克多去世了，而新的"反教皇（antipope）"帕夏尔甚至没有赢得他的前任所享有的一点敬意。

世界的注意力被另一场斗争所吸引，这场斗争涉及同样的问题，其结果使亚历山大在欧洲的评价中更高。1162年，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使大法官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教区的主教。这位大主教，

以前是国王最信任的顾问，作为一个教会人士，他抵制了每一个触及教会利益的改革措施。王国通过了《克莱伦宪法》，其目的是恢复亨利一世在教会事务上的权威，特别是将犯罪的神职人员置于普通法庭的管辖之下。贝克特在他的兄弟教士的劝说下接受了这些改革，但他很快就忏悔并寻求教皇的宽恕。于是，争吵开始了。贝克特逃到了法国。亚历山大（教皇）的立场很艰难。他不能牺牲（英国）国王的友谊，因为英国国王的钱使他在意大利与皇帝的争斗得以继续，他也不敢放弃大主教（贝克特）的事业。（英国国王）亨利与（德意志皇帝）腓特烈谈判的消息让他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只有罗马人对他返回首都的热情，以及与伦巴第的反（德意志）帝国主义城市的紧密联盟才能缓解这种不祥的预感。但支持流亡教士（贝克特）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腓特烈开始收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入侵意大利。亚历山大匆忙地否定了贝克特的所有行为。皇帝（腓特烈）来了，享受了短暂的胜利，然后看到他的贵族和主教被一场致命的瘟疫击倒，他的军队像西拿基立的军队一样消亡（圣经《列王记下》18、19章），而他的敌人在伟大的伦巴第联盟中联合起来。教皇的事业因这次城市的叛乱而得到加强。现在他（教皇）不再那么需要英格兰国王的帮助了，于是开始大胆地支持贝克特。（英国）国王和他的教长显然已经和解了。但恢复的大主教（贝克特）并没有放弃他以前的积极行动。国王一怒之下，大喊道 ″难道我没有人可以让我摆脱这个动荡的牧师的侮辱吗？”在他能够收回这些致命的话之前，12月29日，骑士们匆匆赶到坎特伯雷，闯入大教堂，当贝克特站在通往大祭坛的台阶附近时，把他谋杀了。英国国王被他的贵族们的亵渎之罪所困扰，向教皇寻求赦免，甚至不惜以放弃《克莱伦宪法》为代价（即，英国国王放弃在英国教会事务上的权威，特别是放弃英国国王对于英国教会神职人员的审判权利，而由罗马教皇对此行使管辖）。

这场冲突刚刚结束，腓特烈就进军意大利，打破了伦巴第人的势力。但在1176年，经过两年的斗争，他（腓特烈）在莱格纳诺战役中被打败了。他有尊严地承受了他的不幸，承认亚历山大为教皇，并与伦巴第人达成了休战协议。在威尼斯，当腓特烈倒在亚历山大（教皇）脚下，被他扶起接受和平之吻的那一幕，几乎比一百年前亨利四世和希尔德布兰（教皇）在卡诺萨的会面更引人注目。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预示着教皇制度的力量，而这一意义要大得多。

双重教皇选举是现在和平结束的冲突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另一次分裂可能会给教皇制度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三分之二的红衣主教的票数足以选出教皇职位的候选人。

几年过去了，帝国和教皇似乎正处于另一场斗争的边缘。腓特烈的皇帝权力已经成为最高的权力。伦巴第城市对教皇的支持是冷淡的。但突然传来消息，耶路撒冷在1187年落入萨拉丁的手中。腓特烈带着法国的菲利普和英国的理查德匆匆赶往东方。但这位教皇专制主义的伟大反对者意外地淹死在皮西迪亚的一条小河里。这次十字军东征被证明是失败的。

接下来的几年，是对一个教皇的耻辱。皇帝亨利六世身上有很多他父亲的活力，却没有他的宽宏大量。他（皇帝）试图使帝国变得无所不能，而年老的教皇对他的诅咒也无济于事。

但他（皇帝）的去世使帝国被与他敌对的有志之士和他的幼子分割开来；而教皇的宝座即将由也许是教皇长河中最伟大的英诺森三世占据。

英诺森（教皇）正处于成年后的活力期。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对教皇特权的最崇高的想法。他认为基督把权力交给了彼得的继承人，不仅是对教会的权力，而且是对世界的权力。国王的冠冕和国家的命运都被神圣的法令寄托在他们

（彼得的继承人、即历任教皇）手中。他们被安排进行拔除和毁灭，建造和种植。在他们（教皇）的法庭前，君王和国家被命令将他们的争论提交审判。拒绝听从教皇的人将被切断与信徒们的联系。罗马法律大师们反对这些主张的理论，除了在巴巴罗萨的武装下得到加强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自格里高利七世以来，人们就熟悉罗马教皇的这些无限制的要求，并逐渐相信了它们。他们听过腓特烈在威尼斯屈服的故事，也听过亨利在卡诺萨受辱的故事。皇帝们对教皇们取得的短暂胜利，在世界大多数人看来，就像对上帝的正义仆人施以暴力。一个又一个“反教皇”（antipope，即另一个被声称是教皇的人）在圣彼得的真正继承者（教皇）的精神威严面前倒下了。十字军东征把巨大而不确定的特权扔到了他们（教皇）手中，他们用这些特权来打倒他们的敌人，而这些敌人也同样被认为是上帝的敌人，无论他们是异教徒土耳其人还是受洗的皇帝。现在，在英诺森登基成为教皇时，国家事务如此混乱，以至于他（英诺森教皇）能够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教皇都更彻底地实施所珍视的教皇神权理论。

亨利六世通过与西西里岛国王罗杰的女儿康斯坦蒂亚的婚姻，确保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英诺森三世所处的国家与（德意志）帝国的结合。英诺森三世首先关注的是打破这一联盟，以使意大利和教皇的领地不被（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土所包围。时机是有利的。

针对（德意志）皇帝对西西里王国的控制，教皇于1198年将其（西西里王国）降为罗马教廷的封地，由一个独立的君主统治。由于意大利摆脱了（德意志）帝国的束缚，他（英诺森教皇）把托斯卡纳的贵族们赶出了教会的领地，并在罗马城内建立了自己的权威。他（英诺森教皇）成立了托斯卡纳联盟，该联盟比伦巴第联盟更倾向于教皇的利益。

在德国发生的冲突为教皇的干预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有菲利普一党

的抗议，英诺森还是在1201年动用了他所有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来帮助奥托的事业；奥托是一个贵族，他承诺（在自己被加冕以后）会满足教皇的要求。但是，奥托刚一被加冕，就开始主张他的帝国特权。教皇毫不犹豫地让帝国再次陷入了困境。

（先王腓特烈的儿子）年轻的弗雷德里克的要求现在又恢复了。伦巴第城市改变了立场。古尔菲家族为皇帝而战，因为他（弗雷德里克）是古尔菲家族的人；吉贝里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反对他，尽管这使他们与教皇和他的托斯卡纳盟友为伍。腓特烈（弗雷德里克）取得了胜利，在1212年的法兰克福会议上，他被选为皇帝。

英诺森教皇的干预并不局限于帝国。他迫使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都与他心爱的梅兰的艾格尼丝离婚，并承认可恨的伊南-菲利普-格布尔加为他的妻子。法国的教士们已经同意与她离婚。当然，弱小的君主不可能寻求更温和的待遇。

1208年，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拒绝承认英诺森任命的红衣主教斯蒂芬-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此，他（约翰）被（教皇）废黜，他的王国被移交给了法国。他（约翰）对敌人（教皇）的实力感到震惊，于是卑躬屈膝地屈服了，并作为罗马教廷的封地收回了他的王国（即，在教皇的允准下，约翰恢复了英国国王的职位）。

但是，当教皇向英格兰的男爵们发出诅咒时（因为他们不愿放弃从他们屈辱的君主那里夺来的《大宪章》），他（教皇）的话引起了愤怒，他（教皇）的禁令受到了他们（英格兰人）的蔑视。

_____

英诺森三世在1202年巧妙地将十字军转向了征服扎拉，这是匈牙利国王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一个城镇，这也是英诺森统治时期的伟大目标。十字架的士兵们，尽管有愤怒的教皇的威胁，不仅推进了对一个基督教城市（扎拉）的占领，而且在被废黜的东方（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事业中，航行到君士坦丁堡，并将艾萨克-安格鲁斯恢复到他的失去的王位上。他们（十字军）对他（君士坦丁堡皇帝）对待他们的方式感到不满，于是袭击了这座城市（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自己的皇帝（安格鲁斯）。英诺森谴责十字军东征偏离了其神圣的目标，但他安慰自己，让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臣服于罗马，从而迈出了他认为是弥合（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第一步。

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会议特别责成教皇通过他们自己，或由他们指定的代理人，找出并惩处异端分子。1229年，图卢兹会议更严格地组织了这种主教式的宗教裁判所。1232年和1233年，这项工作被委托给多米尼克会（或译为“道明会”）的修士。他们与教皇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主教和地方议会不能被信任，不能行使所期望的严格性。这样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它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规则行使其权力，但它是人类智慧所设计的最可怕的不容忍和暴政的引擎之一。

==========

第三章

教会的政体和政治关系

从英诺森三世的死亡到继任的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主后1216-1294).

在英诺森去世前几天，即1216年7月16日，腓特烈二世承诺，当他获得皇位时，他将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交给他的儿子亨利,这两个地方是罗马教廷的封地，而教皇现在的政策是将它们交给亨利。

教皇的政策是不让它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再次与（德意志）帝国合并。英诺森的继任者霍诺里乌斯三世在心中是一个十字军战士，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向腓特烈要求，让他（腓特烈）带领基督教军队收复耶路撒冷；但他（教皇）只做了一个微弱的尝试，以阻止皇帝（腓特烈）在西西里王国建立权威。没过多久，教皇的土地就被（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所囊括，就像亨利六世时期那样，接下来的每一年都会增加皇帝的权力。德国被统一了。本应统治西西里的君王在1222年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从而成为帝国的继承人。在英诺森的保护下，西西里王国出现的混乱被镇压了。只有在伦巴第，帝国的权威受到了抵制。1226年，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新的联盟，教皇公开支持这个联盟的事业。

腓特烈以其庞大的王国的需要为借口，一年又一年地推迟十字军东征。

在霍诺里乌斯（教皇）统治时期，两大修会--多米尼克会和方济各会的章程已经完成。这些传教士忠实地支持教皇对抗地方牧师和君王，并在随后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次斗争中为教皇承担了一支常备军的工作。

霍诺里乌斯（教皇）的死结束了教皇和帝国的和平关系。腓特烈不可能希望在下一任教皇手中得到温和的待遇。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年）拥有灵活

的意志和旺盛的精力，即使到了晚年，他的精力也没有减退。他除了对教规法有深刻的了解外，还具有实际的经验；他（格里高利九世）在为英诺森和霍诺里斯服务时获得了对教皇事务的经验。

皇帝（腓特烈）出发（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时间到了。又出现了新的延误，然后是营地里的疾病。最后舰队起航了，但很快皇帝就回来了，他辩称自己生病了，并承诺一旦恢复健康就立即出发。但格里高利不听任何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宣布了开除教籍的判决，这给这个场合增添了特殊的恐怖。″所有的钟都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教士们各自拿着火把，站在祭坛周围。格里高利恳求上帝对皇帝进行永恒的谴责。教士们扔下他们的火把；现场一片漆黑″。教皇的判决被西方土地上每一个热心的教会人士和流浪的修士所宣扬。皇帝可以把罗马宫廷的野心和腐败举到世人面前；但一个被切断了与信徒的联系的人，一个宗教的服务必须停止的人，对基督的代理人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对他发出的诅咒来说，这句话（即，皇帝对于教皇的指责）几乎没有分量。

然而，教皇（格里高利）的法令并没有严重削弱腓特烈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和帝国权威，也没有使他改变计划。他做好了准备，开始了推迟已久的十字军东征。一想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君王要领导基督教的军队，格里高利就感到非常害怕。把主的墓穴留在异教徒的手中会更好。他禁止支付为十字军东征所征收的税款，禁止皇帝前往；当他（教皇）的命令和威胁都被置之不理时，他派了两名方济各会的修士乘快船超越帝国舰队，并宣布腓特烈受到教会的禁止、因此没有能力进行这项神圣的事业。但消息传来，尽管有教皇的诅咒，圣殿骑士团和福音派的嫉妒，以及耶路撒冷牧首的仇恨，皇帝（腓特烈）还是在1229年与撒拉逊人（穆斯林）达成了有利的和平。格里高利现在宣扬对腓特烈的十字军东征。德国的王公们被敦促起义。教皇的使者们被派往西方各地收钱（收纳捐款）。他们（教皇使者们）开始了那些英国在本世

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呻吟的征税。教皇（格里高利）的军队袭击了皇帝（腓特烈）在南意大利的领土。

但自从腓特烈对巴勒斯坦的远征成功结束后，公众舆论就逐渐站到了他（腓特烈）的一边。罗马使者的勒索和修行者的干涉使各地神职人员在这场争斗中变得冷淡。皇帝（腓特烈）回国后很快就把入侵他领土的军队赶走了。格里高利（教皇）再也无法拒绝谈判了。《圣日耳曼条约》挽救了教皇的尊严，而腓特烈只付出了一些不重要的让步。

在随后的和平岁月里，教皇（格里高利）似乎专注于完善教规法体系，为其（教会教规体系）主张永恒的有效性；而（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则在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国，其中君主被视为正义的源泉。尽管这些对手的目标彼此不可调和，但他们的措施并没有导致公开的争斗。

在Corte Nuova战役中，伦巴第人被击溃，损失惨重。格里高利感到震惊。如果北方的自由城市被征服，那么从西西里到波罗的海沿岸就没有能够抵抗皇帝的力量了。不仅是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它的独立，似乎也处于危险之中。

这位年迈的教皇（格里高利）并没有在这场不平等的斗争中退缩。他的格言是，圣彼得的小船可以在海浪中翻腾，但永远不会被淹没。

他（格里高利）再次将皇帝驱逐出教会。当弗雷德里克-埃里克（即，腓特烈

皇帝）指责他保护伦巴第异端分子、并以黄金为代价出卖正义时，他（教皇）开始为自己辩护。

他（教皇）以一个从《启示录》中借来的幻象开始了他的回答：″海中出现了一只野兽，它的嘴张开了，要亵渎上帝的名。″″这个害人的皇帝，″他（教皇）说，″已经确认世界被三个骗子欺骗了--基督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腓特烈也能引用圣经。他宣布教皇是那条引诱了整个世界的大龙。他（腓特烈）为自己不忠的指控辩护，呼吁上帝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作出裁决，因为他的敌人如此卑鄙地诽谤他。

腓特烈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理解力很强。他对以宗教的名义对他造成的错误有一种愤慨的感觉，这使他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他（腓特烈）的思想通过与经常光顾他的西西里宫廷的有教养的撒拉森人（穆斯林）的熟悉交往而得到了拓宽。然而，他不可能说出关于毁谤基督、摩西或默罕默德的言论。至少，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说出这句令人反感的话的人。他可能对神圣的宗教没有什么信心。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瞥见深深影响他道德行为的福音真理。并不是他自己的言论或美德使他免于被抛弃的命运（换言之，腓特烈自负地看待自己，认为自己凭着自己的言论、能力、美德而维持王位）。

巴黎的马修写道：″如果不是罗马的贪婪破坏了人们对教皇大人的虔诚，整个世界都会起来反对皇帝（腓特烈），认为他是教会和基督的敌人。″

格里高利（教皇）试图扶植一个冒名顶替者（来担任皇帝职位）的做法遭到了嘲笑。萨尔茨堡的大主教艾伯哈德喊道：″除非我们是瞎子，否则我们看到在教皇的头衔下，在牧羊人的外衣下，有一只最贪婪的狼。″

教皇召开了一个会议，但服从召唤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被皇帝（腓特烈）的

军队俘虏，关在那不勒斯的监狱里。腓特烈的军队已经在罗马城墙下了。死亡的介入使格里高利教皇免受进一步的羞辱。他于1241年8月21日逝世。

他（教皇）的继任者的选举被拖延了很久，随后英诺森四世和弗雷德里克（腓特烈皇帝）之间的谈判毫无结果。

英诺森（教皇）向里昂提出申请。英格兰、法国和阿拉贡的国王不愿意接待如此昂贵的客人。愤怒的教皇喊道〝龙被踩在脚下之后，小蛇很快就会被踩死〞。他（教皇）于1245年在里昂召集了一个总理事会。苏萨的泰迪乌斯出现在会议面前，为皇帝辩护。他的话语对一个被虚荣心蒙蔽并沉醉于自己权力感的教皇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英诺森教皇不愿意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聚集在一起的教士们投票。他宣布了对腓特烈的开除教籍和罢免的判决。听到这个消息后，皇帝集中精力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将教皇的事业与其他神职人员的事业分开。他对整个教会等级制度进行了打击。他宣称，他的目的是使神职人员回到他们在早期教会中所持守的古朴地位，使他们能够以适当的谦卑，按照使徒的方式生活。

在英诺森四世的眼中，腓特烈就这样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危险的罪名。他（腓特烈）疏远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信任他的、（教会神职体系里面的）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超越了他的年限--即使他的个人品格得到了宗教人士的尊重，他的地位也不可能无限期维持。英诺森现在对他和他的家族宣布了永恒的战争。英格兰和法国教会的收入被耗尽，以支付十字军东征的费用，并为与（德意志）皇帝敌对的行动购买信徒。有一段时间，腓特烈一切都很顺利。他的武器战胜了他的敌人。但是，突然间，他的家族即将面临的厄运的阴影似乎在他身上临到。

1248年，他（腓特烈）在反叛城市帕尔马遭遇了可怕的挫折。他的参谋萨迪

乌斯（Thaddeus）被俘并被杀。不久之后，他最喜欢的儿子恩齐奥在博洛尼亚的地牢里受尽折磨，而他的朋友兼宰相彼得-德-维尼亚被证明是个叛徒。弗雷德-埃里克（腓特烈）的思想似乎在他的不幸中崩溃了。又过了一年，这位曾被尊为″世界奇迹″的君主死了。他的死亡发生在1250年12月13日。

但英诺森教皇并不满足于这一希望的实现：他要消灭整个毒蛇集团。他（教皇）继续与（腓特烈的继任者）康拉德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战争，向所有愿意加入神圣事业的人承诺，用他们的武器或金钱来减免罪孽。康拉德死后，英诺森的继承人努力将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曼弗雷德赶出西西里岛。

教皇将王冠卖给了英格兰的埃德蒙王子；但现在他的父亲亨利三世无法再为夺取战利品而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王冠被献给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的查尔斯。1266年，查尔斯征服了曼弗雷德并夺取了这个（西西里）王国。年轻的康拉定，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从他在德国的祖居地来到这里，想赢回他父亲的西西里王国，但却落入了他无情的敌人手中，并于1268年10月29日死在了绞刑架上。

1273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被选为皇帝，教皇制度的胜利似乎已经完成。他（鲁道夫）放弃了——曾经对于教皇所宣布的、归属罗马教廷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领土的所有要求，并保证不打扰教皇附庸安茹的查尔斯对西西里王国的占有。在伦巴第，他（鲁道夫）的权力还不足以威胁到罗马，但对查尔斯联合罗马的计划起到了遏制作用。

现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在他（教皇）的统治之下。教皇通过摧毁霍恩施塔芬家族，缩小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直到它们几乎没有比德意志王国更广

阔的地方。他们（历任教皇）在世俗方面严重地削弱了中世纪的世界政府（或神圣罗马帝国）理论。这一结果不可能不对他们自己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们从帝国的一些碎片中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公国。他们有可能成为单纯的意大利君王，并失去他们作为世界精神主宰的崇高地位。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危险。英诺森教皇的继承者们为了把腓特烈的继承人赶出西西里，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快就会成为主人的盟友（即查尔斯，法国人）。他们（历任教皇）中的一些人，如格里高利十世（1271-1276），也曾经批评查尔斯对西西里的压迫，因为他正在破坏西西里。但马丁四世，一个法国人，完全致力于促进国王在西西里的统治愿望。在西西里，暴政变得如此频繁。

1282年复活节星期一的晚祷时分，发生了一场起义，岛上所有的法国人都被屠杀了。因此，教皇在西西里岛的权力被摧毁了。随后，阿拉贡的彼得三世娶了曼弗雷德的女儿，成为西西里的国王，安茹的查尔斯被限制在那不勒斯。

在随后的斗争中，教皇的权威受到了稳定的抵制。西方的国王们开始宣战和媾和，不顾罗马教皇的祈祷和威胁。

红衣主教中盛行着党派精神。有一次（1268-1271年），教皇的位置空缺了近三年。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宣布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除非红衣主教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选举，否则，若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会被饿死。但这一规则经常被中止或违抗，而不是得到遵守。在这一纷争时期结束时，红衣主教们厌倦了长期的争吵，最终选择了虔诚的隐士，穆尔隆的彼得。

1294年7月，他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很难说塞莱斯廷（教皇）是更彻底地受那不勒斯国王、还是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卡耶坦的控制。这位隐士教皇在山区的孤寂中更加自在，在他的记忆中，山区是他享受“宁静〞和〞良知〞的地方，而不是在围绕他的崇高地位的阴谋中。执政两年后，他在卡耶坦的劝说下，轻松地放下了他那繁重的职务。

当这些重大事件在西方发生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拉丁语帝国已经转变（即，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已经从拉丁语文化转变为希腊语文化），而希腊教会的牧首再次宣称他对拉丁帝国的独立。在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不断地失去了地位。路易九世，这位高贵而虔诚的法国国王，做了一次徒劳的努力来阻止这一趋势，但他的第一次远征以他被俘并被迫支付沉重的赎金而告终。

1270年，他（路易九世）对突尼斯进行了一次攻击。在那里，他和他的大部分军队被一场瘟疫所摧毁。1291年，埃及马穆鲁克人占领了基督徒（在埃及的）最后的城镇阿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欧洲的狂热已经冷却了。曾经属于东方远征的新奇魅力已经消失。教皇们滥用了他们宣布十字军东征的权利，以勒索钱财或筹集军队来对抗（西欧各国的）皇帝。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近在咫尺的事务所吸引，他们不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与遥远的敌人进行无用的战争上。

教皇为使教会摆脱世俗的控制而与几个君主进行的斗争，并不限于精神附庸与世俗的关系、神职人员与领主的关系等子问题。它还延伸到税收和司法程

序方面。

根据亚历山大三世1179年的一项法令，不仅征收税款的事务必须得到神职人员的同意，而且必须在征收前得到征收对象的同意。英诺森三世（教皇）甚至对这一条件也不满意；他希望（为征税而必须）征求罗马教皇的意见，因为为公众提供必需品是他的事。

1096年，乌尔班二世（教皇）要求免除神职人员在世俗法庭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中的责任。但是，各地君主们不愿意让一个庞大的团体，其中一些成员经常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的罪行，完全置于独立的司法管辖之下，即只让他们（教会神职人员）对那些可能因同情和利益而自然地倾向于他们自己的秩序的人（即教会体系中的上级）负责。正是这种信念促使（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在1164年进行了那些改革，并使他与他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发生了冲突。

1192年，Celestine 教皇的一项法令规定，教会应首先罢免犯罪的书记员；如果他不可救药，就把他逐出圣职；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就把他逐出教会，之后国家可以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他。然而，教士们常常试图保护被废黜的牧师不受世俗权力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一弊端，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国王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凡是犯有罪行的神职人员，在被教会废黜之后，就会被国王的官员抓走，而教会当局不应有任何干涉。

国王们对所有臣民施以平等的正义的热忱，使心态较好的教士们感到有必要尝试消除因纪律松弛而产生的丑闻。教会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犯罪的教士们被送进主教的监狱，为他们所犯的罪孽哭泣，并被禁止再犯。

有一个声音被提出来反对教皇的专制主义。那就是（英格兰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特斯特，他阻止了英诺森四世（教皇）在他的教区里让一个12岁的男孩成为教士。但（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对教皇的要求俯首帖耳，因此他的主教们几乎无法反对他们（历任教皇）。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269年，据说法国的路易九世颁布了他著名的法令，称为〝务实的允准〞（或译为“务实的制裁”）。它保护教会选举的自由和赞助人的权利不受教皇的干涉，并禁止教皇在未经君主同意的情况下征税。这份长期以来被视为高卢（法国）自由的伟大宪章的文件，其真实性已经受到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质疑，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它是真的。

各地的大主教们，作为罗马教皇的附庸，拥有某些临时性的特权和一定的管辖权，常常沉浸在世俗事务的烦恼中，以至于没有时间履行他们的精神职能。耶路撒冷王国（被伊斯兰）灭亡后，他们（主教们）开始将那些因该事件而被剥夺了在东方的教区的人与自己联系起来，作为助理或副主教。当这些副主教去世后，教皇就会选择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位置，而在异教徒地区的主教的继承权就这样一直保持着（而持续到后世）。

==========

第四章

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制度

新的秩序

在这一时期，修道院的精神得到了恢复，并积极改革旧的组织，创建新的组

织，然后在世俗和奢侈的诱惑下，它（再次）屈服（于世俗诱惑）了。

它（世俗诱惑）以前曾多次败坏了它（修道院）。一些人努力使自己接受更严格的禁欲主义。另一些人则试图照顾病人，以及救回落入异教徒之手的俘虏。在这些人中，有加尔苏斯派、加尔默罗派、普雷蒙斯派、圣安东尼教团和医院的弟兄们。较早的本笃会修道院，特别是克鲁格尼的修道院，得到了教皇的青睐，变得富有和雄心勃勃。修道院规则所要求的纪律被放松了。就在11世纪末，一小群热衷于更严格的禁欲生活的修士，为熙笃（Cistercium）修道院奠定了基础。

有一段时间，熙笃会并不兴旺，但在1113年，修道院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带着30个同伴。在他的影响下，修道会变得数量和力量都很大。

他就是伯纳德（1091-1153年）。他出生于第戎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骑士的勇敢与正义和对穷人的仁慈相辅相成。在他的热忱和奇妙的个人影响下，他的四个兄弟被从世俗生活中吸引到修道院来。"他的说教的效果是，母亲把儿子藏起来，妻子把丈夫藏起来，同伴把朋友藏起来，以免他们被他（伯纳德）这种有说服力的口才所俘虏"。

熙笃会的繁荣现在得到了保证；修士们被派去建立其他的修道院，不久，修道院院长斯蒂芬就成为一个在世界各地都有代表的伟大组织的负责人。《慈善宪章》，作为熙笃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所有修道院院长对熙笃修道院院长的适当服从；由他们中的一些人严格监督他的行为，并规定所有人不定期地在熙笃集合，商讨教团的事务。

1115年，伯纳德率领最早的一次出征。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他建立了克莱尔沃修道院。他的纪律是严格的。山谷的寂静只被修士们的诵经声和他们的

劳动声打破。彼得-德-罗亚（Peter de Roya）写道："从他们的外貌、他们的工具、他们糟糕而杂乱的衣服来看，他们似乎是一群没有语言和理智的傻瓜"。然而，伯纳德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克莱尔沃的生活也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当路易六世的儿子亨利访问该修道院时，他到达后不久就宣布他打算成为一名修士。亨利的随从、巴黎的安德鲁被他（亨利）的愚蠢激怒了，嘴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克莱尔沃；但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急匆匆地回来了，悔恨不已，急于效仿他的主人。

伯纳德对人的思想的支配是如此的完全，以至于他可以创造奇迹，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眼中，这些奇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为病人祈祷，他们就被痊愈。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伯爵在他严厉的责备下毫无知觉地倒在地上。克莱尔沃很快就变得比罗马本身更强大了。

伯纳德是西方教会的伟大领袖。是他扑灭了异端邪说，治愈了教廷的分裂。是他把法国和德国的勇士们送上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场。但他的伟大并没有毁了他：他的谦逊和卑微依然如故。

到目前为止，修道士们的目的是远离世界，用这样的条件包围自己，以利于其特殊形式的精神奉献的最高发展。它与这个时代的暴力和感性形成的对比往往是间接有益的，但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更积极的仁爱的时候。人们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不仅仅是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而是通过仔细的指导和认真的布道。

瓦尔多派与多米尼克派都对圣经非常重视。这两个教派都热衷于生活的纯洁性，反对教士的僭越和挥霍。

在阿尔比根派多米尼克引起的发酵中，在法国南部，来了一个西班牙人，奥斯马的主教，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多米尼克。这些认真的人会见了教皇的传教士；西托的阿诺德、拉乌尔和卡斯特尔诺的彼得，他们的主教式的盛宴团体没能压倒正在崛起的异端。多米尼克要求他们不要希望通过这种炫耀来获得成功，而是要了解异端领袖的情况，并为教导人民而无私地工作。他（多米尼克）现在想出了一个主意，要把其他人和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镇压异端的社团。他们要立下修道的誓言，但并不是住在禁欲主义的隐居地，而是要到处宣讲和教导教会的教义。他的计划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而这个组织则由霍诺里乌斯（教皇）正式成立。

四年后，多米尼克的修士们已经在意大利、西班牙、普罗旺斯、法国、德国和波兰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他们不畏艰险，与穷人同甘共苦。他们的自我否定为他们赢得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坚持不妥协的基督教正统观念，并热心地促进教皇的权力。渐渐地，他们进入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的大学。知名学者阿尔伯特大帝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1233年，格里高利九世把在法国根除异端的任务交给了多米尼克人。然后，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以前属于主教的权力被移交给了他们(多米尼克人)，因此，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庭形成了。

与多米尼克会并存的还有另一个会，即方济各会，他们的存在归功于阿西西的弗朗西斯（方济各）。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一个轻松愉快的年轻人，一个快乐伙伴俱乐部的负责人。在一次经历中，弗朗西斯一次重病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致力于照顾病人，选择那些因其疾病而特别被

人厌恶的人。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在来自天堂的声音的指引下，他开始工作，修复阿西西的一座破旧的教堂。然后，他成为一名传教士，并吸引了一帮忠实的追随者，他们与他完全一致。他把这些人两个两个地派出去，作为他传教、劝人悔改的工作的助手。他穿着一件粗糙的灰色外衣，严格遵守命令，既没有两件外套，也没有鞋子，更没有杖。

经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生活，是他心中最热切的愿望。除了最粗糙的食物和最简陋的住所、用一根木头做枕头，没有什么能满足他。他每天都在哭泣，以至于他的视力几乎被摧毁。在这一切中，没有任何不诚恳之处。他的性格是最善良和温和的。1209年，他获得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了一个教团。弗朗西斯给他的追随者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兄弟〞，以表示属于他们的谦卑。贫穷、贞洁和服从的修道誓言将被最严格地执行，但修士们并不回避世界：他们要征服它。

他命令他们宣扬基督的十字架，避免仪式性的浮华和学问的展示。他把他的弟子送到不同的国家，自己则远赴埃及，在那里向苏丹（穆斯林）传教。早在1219年，就有不少于5000名成员参加了该会的大会。方济各会抓住了他们领袖的神秘热情，在他身上他们看到了耶稣的生命再次接近人。他们虔诚的眼睛看到了基督的手和脚上有钉子的痕迹，在他的肋边有矛的印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方济各会）的成员显示他们更愿意崇拜创始人，而不是服从他的诫命。他们（方济各会成员们）变得既博学又富有。如果多米尼克人以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名字为荣，那么方济各会则可以夸耀博纳文图拉、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与多米尼克人一样，他们也拥有丰富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两个修会（多米尼克会与方济各会）的财富和知名度有助于激起世俗心态的神职人员对他们的仇恨。

与多米尼克会和方济各会相联系的是处于类似规则下的女修会。圣克拉拉修会，或称克拉里斯修会，是在圣弗朗西斯本人的指导下，由阿西西的一位年轻妇女建立的，她属于一个显赫的家庭，但她离开家，过着苦行和慈善的生活。与修行会有关的还有一些被称为 "Tertiaries "的平凡人协会，他们在不发修道院誓言的情况下奉献自己的生活。

方济各会中出现了关于他们拥有财产的权利的争论。相信严格遵守贫穷规则的一方最终与其他方面分离。分离者被称为 "精神派"。在他们对教会腐败的热切斥责中，他们没有放过罗马教会（即，他们也一般性地指责了罗马教会的腐败）。

教会对骑士精神给予了认可，这是中世纪的另一个伟大制度。骑士服役的雏形在古代日耳曼人的习俗中可以找到，正如塔西佗所描述的那样。

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它达到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并与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相联系。后来，贵族的年轻儿子开始依附于有钱有势的领主，并从他们那里寻求骑士的尊严作为对英勇行为的奖励。骑士精神成为一种独特的军事服务形式。这在十字军东征中得到了确认。由于封建法律并不要求诸侯跟随他们的宗主前往巴勒斯坦，因此贵族们不得不用骑士来充实他们的随行人员，而这些骑士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 "赞扬 "之外，没有其他的联系。在十字军东征中，骑士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异教徒开战和为收复圣地而战的责任，使它具有了宗教意义。骑士的授职几乎不比牧师的授职逊色。与这种宗教因素相结合的是忠诚，包括对所有诺言的忠诚；英勇，激励对女士们的奉献；

勇气，喜欢大胆的探索；以及礼貌，甚至对敌人也要表现出礼貌。骑士精神的理想是荣誉而不是仁慈。它对礼仪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伴随着许多残忍和挥霍的行为。它属于一个尚武的时代，并倾向于促进冲突和流血。耶路撒冷被征服后，在圣地逐渐形成了两个大的教团。

一个是圣殿骑士团，因其居住在圣殿附近而得名，由九名法国骑士于1119年创立。一个类似的组织，即福音会组织，是由圣约翰医院的兄弟会发展起来的，他们从1099年开始就在耶路撒冷照顾病人。

圣殿骑士和福音会以修道院的誓言约束自己，但他们不是在修道院而是在战场上表现出神圣的热情。他们被看作是一支永久性的十字军，并获得了重要的特权和豁免。他们的人数、财富和权力都在增长。他们成为独立的机构，能够藐视君王和教士的权威。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维护基督世界的事业，反对撒拉逊人（穆斯林），而是以自己的扩张为中心。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并没有毁了他们，因为他们在西方有大量的财产。医院兄弟会在罗得斯岛居住，在那里他们反对撒拉逊人的进一步推进。圣殿骑士团首先在塞浦路斯定居，之后迁往法国。

==========

第五章

教义的历史

在这一时期，属于学术性神学的明显兴起和全面发展，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思想的特色类型。术语〝学者〞或〝学术〞是对查理曼大帝所创办的学校中

的教师的称谓。它后来被应用于教授逻辑学的博士，并在讨论宗教问题时混合了哲学。按照这个公认的含义，我们可以把学术主义的开端放在11世纪中叶，并把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思想家视为其先驱。如果我们追溯到最遥远的来源，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学术主义。

十一世纪，西方与（与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帝国的交往重新开始；在那里（希腊），学习的光芒从未熄灭过。也有一种影响，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那里培养了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并通过翻译媒介研究希腊作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同时，对罗马法的研究和通过希尔德布兰迪运动恢复的教会纪律，对促进知识活动不无裨益。

学士主义是将理性应用于神学，不是为了纠正或扩大那些教会历史上所公认的“信条”，而是为了使其系统化和具体化。″以信求知 ″是其座右铭。它（学士主义）认为，真理是由教会的权威所验证的，不需要其他的凭证。此外，它可能是一个直接的精神体验的对象：它在自己的光芒中闪耀。哲学是宗教的 ″婢女″。它的职责是证明所得出的信念的合理性，这是一个从属的职责。学者们在思考和辩论中非常活跃，他们在他们所致力于的领域为人类思想的储备增加了不少东西。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尽管与古代或现代的知识领袖相比缺乏学识，但在敏锐性和逻辑辩证技巧方面从未被超越过。

学派神学的传播主要归功于大学。这种性质的机构在古代就已曾存在。在雅典和（北非）亚历山大，在罗马，在西斯姆和君士坦丁堡，以及在其他不那么出名的城市，都有繁荣的学习场所，一般由公共权力机构组织和维持。这些都随着古代文明的衰落而消失了。随后出现的学校，比如它们（中世纪时代所兴起的这些大学），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出现的，并得到了像查理曼大帝这样的基督教君王的扶植，他们（教会职员们以及君王们）知道如何重视学习。最有名的中世纪大学，也就是所谓的巴黎大学，是在12世纪发展起来的。

神学的教师们开始以自己的责任感来指导学生们。

他们开始在回廊修道院学校附近指导学生，并与这些学校--也就是与教授七门科学的 ″文科 ″学校--相互联合起来。渐渐地，医学和教会法的教席被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部门在固定的规章制度下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大学，其中的学生按照他们来自的国家进行分类。他们被授予学位，首先是学士学位，然后是硕士或博士学位。因此，在中世纪形成了一个学者的行会。牛津大学是在不久之后成立的。其他大学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兴起。早在十二世纪初，在萨勒诺就有了一所医学学校。在博洛尼亚，人们以极大的热情研究罗马法。巴黎是最著名的神学基地。巴黎大学被称为 ″大学之母″，因为根据它提供的模式建立的这些机构数量很多。具有好奇心的年轻人从西欧的所有国家涌向这些大学。有一种说法是，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学生一度多达三万人，这是一个严重夸张的例子。然而，毫无疑问，在主要的大学里，神学博士们向一大群热心的听众进行演讲。最有能力的学者属于两个修会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即多米尼克会和方济各会，这两个修会很早就在巴黎获得了神学教育席位。与之无关的大学成员对这两个修会抱有嫉妒之心，甚至与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最终，修会学者们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修道院兄弟会赢得了胜利。

_____

哲学帝国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瓜分。柏拉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奥古斯丁，并影响了神学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力量是通过他自己的著作来实现的，这些著作受到了无限的推崇。在学术时代，有一个哲学问题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名义主义或现实主义的问题。

表示属和种的词--例如，人--是指现实，是实体；还是它们只不过是组成这个类别的个体的名字？这两种观点中的前者被称为现实主义，然而，它具有

许多不同的类型。它曾是柏拉图的极端形式的学说；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温和的形式。这两种观点中的后一种被称为唯名论。它是古代斯多葛派（译者注，这是一种错误的泛神论主义神学观点）的观点。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以及对神学教义的重要影响，如原罪和三位一体。它甚至与人类知识的基础及其对象的现实性有密切关系。

学者们讨论的工具是三段论。通常的方法是提出问题或命题，首先提出一系列肯定的、然后是否定的论证，最后，在一个结论中解决这个问题。按照这种方法，最有名的学术论文被构建出来。

学术界的时代自然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中间部分包括第十三世纪，即学术主义的兴盛时期，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们讲课和写作时，现实主义正处于主流的时候，不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且他的其他著作也在使用，并帮助塑造了学术界的学说。而在第一个阶段，当人们只知道希腊哲学家的逻辑时，唯名论盛行。在学术运动的最后阶段，包括第十四和第十五世纪，唯名论重新获得了它在中间时期失去的地位。

兰弗兰，他与贝伦加尔的争论开启了学术派的时代；他不是多产的作家。他是意大利人，出身高贵，职业是法学家，但在中年时期移居诺曼底，并在阿夫朗什建立了一所学校。几年后，也就是1042年，他成为贝克的一名修士；他作为教师的名声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前往。后来，他成为修道院的院长，随后成为卡昂的住持。在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的计划中，他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在1070年被迫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

安瑟伦，一个更年轻的人、他（兰弗兰）的学生之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得到 ″学者之父 ″的称号。他是意大利伦巴第人，1033年出生在奥斯塔或附近。他的母亲埃门贝尔加（Ermenberga）是虔诚和美德的典范，但他父亲

的严厉态度使他在青年时期就离开了家。他在他的同胞兰弗兰（Lanfranc）所在的贝克（Bec），取代了他（兰弗兰）的位置，并于1093年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替他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在他与专横的诺曼国王威廉-鲁弗斯和亨利一世的交往中，他表现出了温和、柔顺与对良心的坚定忠诚的结合，这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

他所经历的劳作和冲突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英国数年，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思想偏离他所喜欢的深刻而虔诚的沉思。在他身上，两种元素--一方面是推测和逻辑的倾向，另一方面是虔诚和沉思--是如此均衡，如此彻底地混合在一起，他实现了学者型神学家的理想。他关于原罪和三位一体的著作具有非凡的价值；但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两篇短文，展开了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即 ″独白 ″和 ″箴言″，以及关于赎罪的小作品，题为 ″Cur Deus Homo″，″上帝为什么会变成人？″

在中世纪，没有哪个德国出生的神学家能与阿尔伯特相提并论。他是科隆的老师，也是德国多米尼克教团的将军。从他所获得的各种资料来看，他被称为 ″世界博士″。但是，阿尔伯特虽然受到了应有的尊敬，但在才能和名声上却被他的学生超越了，他是所有学校中最深刻的和最敏锐的学者，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家乡是阿基诺、离那不勒斯不远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在母亲一方，他是下意大利的诺曼公爵的后代。他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在科隆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沉默的牛″（bos mutus）。″ 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在听完他的一次练习后说：″这头牛有一天会用他的低吟声充满整个世界″。

托马斯阿奎那长大后成为多米尼克教团的伟大之光;尽管他的亲属极力反对，他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吸引到这个教团。他在巴黎和科隆、罗马和博洛尼亚任教，最后几年在那不勒斯度过。他的伟大著作是《神学概要》，该书当之无愧地在罗马天主教会保持着最高的声誉，直到今天。托马斯阿奎那以祈祷开始他的演讲和写作。他每天都会让人给他大声朗读一本虔诚的作品。在他的研究中，当他在某些难点上陷入困惑时，他习惯于跪在地上，祈求上帝赐予光明。

经常与阿奎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方济各会神学家约翰-司各脱，他曾在牛津、巴黎和科隆任教。他被正确地命名为"微妙的博士"。除了奥卡姆的威廉之外，他在区分的精细程度上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学者。为了表达这些细密的区别，司各脱不得不发明了许多新的拉丁语词汇，从而使他的风格具有繁杂的特点。他缺乏阿奎那的精神深度，并标志着宗教和逻辑兴趣的分离，以及后者的优势。司各脱在许多问题上与阿奎那不同。因此，出现了托马斯阿奎那派和司各脱派这两个著名的学术党派，他们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学术时期的结束。主要的分歧点是在恩典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托马斯阿奎那大部分时间追随奥古斯丁；司各脱则倾向于半柏拉图主义。可以补充说，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主义者；司各脱是一个更极端的柏拉图式的现实主义者。

十三世纪最崇高也是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是罗杰-培根。在一个研究方向几乎完全朝着逻辑学和哲学方向发展的时代，他带着对知识的无限渴求，转向了语言、数学以及自然和物理科学。他以一种超越一切障碍的热忱去寻找古代拉丁文作者的副本。当牛津大学的其他教师在争论属和种的性质时，他正热衷

于光学研究。他加入了方济各会，但结果是他不太开明的上司阻碍了他著作的出版。最后，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给了他支持，在18个月内，他写了三篇大论文，″大作品″、″小作品 ″和 ″第三作品″。后来，一个不同性格的教皇尼古拉四世给了他的迫害者以可乘之机，培根被长期关在监狱里。他了解实验科学的方法，并在实际调查中实施这种方法的能力方面超过了他在后世著名的同名者（译者注，即现代科学的开启者、现代科学方法之父、弗兰西斯培根）。他非常了解数学科学作为物理知识的关键的价值。同时，在那个时代，他还精通于独特的文学追求。他多才多艺，但并不肤浅。他配得上 ″神奇的博士″ 的称号。

另一位作家，他的名字没有罗杰-培根那么熟悉，他也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但同时也是一位认真的神学家，他就是雷蒙德-卢尔。他出生在马略卡岛。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所产生的泛神论的不忠行为的发展。他以不遗余力的热情投入到改造撒拉逊人（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工作中。为此，他在巴黎、牛津和萨拉曼卡设立了东方语言的讲座。他写了一本关于普遍科学的著作，旨在为反对穆罕默德人和异教徒提供一种不可战胜的论证方法。他两次前往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与阿拉伯哲学家争论，并安全逃脱。在第三次访问中，他成了狂热的暴徒的受害者（即成为殉道者）。

当我们越过十三世纪的界限，就进入了学术主义的衰落时期。有几个著名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杜兰德斯、布拉德沃丁、奥卡姆；但他们代表了神学中的一种精神和方法，而这种精神和方法正在进入陈旧的阶段。唯名论复兴并重新统治，它的统治是学术主义的坟墓。

十三世纪的伟大学者们被要求与一种微妙而可怕的泛神论抗衡，这种泛神论

归根结底是由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投机者思想家的头脑。

巴黎的教师贝纳的阿马利克和迪南托的大卫都是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泛神论以其最迷人的形式从阿拉伯作家那里渗透到了基督教学校。在阿拉伯哲学中，新柏拉图式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混合在一起。在这种哲学的代表中，最出色的是1198年去世的阿维罗伊斯。他的著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根据他的观点，在所有的人中只有一个智慧，而这个智慧是神性的表达或发泄。在这种观念中，上帝和人的个性（位格），当然还有个人（的灵魂）的不朽性，都会消失。与从阿维罗伊学派传来的泛神论思想模式有关，有神学家宣称基督教的教义只是更深刻或更准确的真理的形象化。也不乏那些自称通过信仰、接受他们所承认和肯定的、与理性相悖的东西的人。针对这种隐含的（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和明确的）不忠，雷蒙德-卢尔、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清晰而有力地宣称了有神论的原则。

西班牙犹太人受到他们的阿拉伯邻居的刺激，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和进行哲学推理。他们也对学术界的思想家们施加了强烈的影响，有时是怀疑主义的方向。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犹太作家，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困惑者的指南》中，他坚持有神论和奇迹，但以理性主义的口吻处理犹太教的信条，这使他被正统的犹太人视为异端而受到攻击。在《卡巴拉》这一庞大的犹太宗教神学推测性（即，作者不是凭着谦卑的态度、顺服于神的启示、以上帝之启示为终极根据，而是以自己的任意推测、甚至臆想为根据，面对和思考神学问题）著作中，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来自不同的来源。在《卡巴拉》的哲学中，就像在诺斯替主义中一样，发散性联想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经文的神秘解释比比皆是。雷蒙-卢尔熟悉卡巴拉；但在他的时代之后很久，人们才感受到它（《卡巴拉》所代表的神学推测性思考方式、以及泛神主义、以及卢尔的类似思想）对教会的影响。

学者们的学识不足以使他们有效地提出关于基督教神奇起源的历史证据。

不过，他们在举出道德证据和支持福音书的超自然作者的更抽象的考虑方面不乏能力。他们的定义往往是简明而准确的。托马斯-阿奎那将奇迹定义为超越整个自然界秩序的事件；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力量本身无法产生的事件。信仰对宗教科学的优先性是学派宗教哲学的基础。

安瑟伦把 ″我相信，以便我理解 ″作为统治格言。他告诉我们，″不相信的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理解″。心灵预示着理解力的分析工作。有一种内在的确信，建立在对福音内容的爱之上，而这种爱是灵魂的光。

阿奎那将宗教真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高于理性的，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另一类是可以为理性所接受的，如一神的存在的教义。但他认为，即使是最后一类真理，由于各种原因，让它们通过启示的权威性来验证，也有很大的好处。

阿奎那的美德分为两类。神学上的美德是信仰、希望和仁爱。它们是基督教特有的美德，以福音的恩典为前提。它们是对神性的某种参与，因为 ″我们与神性有份″。它们导致更高的祝福，比灵魂的自然力量所能产生的更高，即使当它们（即灵魂的自然力量）被正确地发挥出来。这就产生了自然美德--第二类美德，即谨慎、公正、坚忍、节制。

圣礼（圣事）在中世纪的宗教体系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圣礼的数量被确定为七项，即：洗礼、坚信礼、治病救人、主的圣餐、忏悔、婚姻、和（按立）授职。彼得-伦巴德将此作为正确的数目。1439年，佛罗伦萨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数字。圣礼被认为是与之相关的恩典的标志，是该恩典的象征--即表达性标志，同时也是载体，传递它们所代表的恩典。阿奎那认为，圣事的必要性在于，我们身处肉体之中，被物质所包围，而且罪孽使我们对感官的印象特别敏感，因此需要圣事，从而将恩典带到灵魂之中。神圣的存在屈尊于我们的需要。圣礼在教会的孩子出生时就与他见面，并陪伴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户。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他身上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洗礼、坚信礼和授职是不可能重复的，因为它们在灵魂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特征〞，一种不会消失的能力或机能。圣礼产生其合法的效果，即通过内在的效率。这并不取决于主持仪式的牧师的个人性格。如果他有意向按照圣礼的设计来执行，这就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圣事的效果也不取决于接受者的心态，除非他故意抗拒圣事的影响，或处于弥天大罪的状态，——尽管如果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圣事，圣事的益处会增加。婴儿洗礼的美德完全属于圣礼行为。洗礼带来了重生和赦免。以前的罪孽，包括原罪和实罪，都被抹去了。洗礼的权利属于牧师，但在没有主持洗礼的神职人员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员（平信徒）主持的洗礼是有效的。受洗者和担保人之间，以及坚信礼候选人和见证人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处于这些关系中的双方都不允许结婚。

主的圣餐给领受者带来持续的精神滋养。在十二世纪，允许儿童参加主的圣餐的习俗被废除。

学者们规定忏悔包括内心的忏悔、悔改和满足--最后一项由罪犯自己按照教

会的规则和牧师的判断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逃脱因弥天大罪而带来的永恒的惩罚。最后，神父不是为忏悔的罪犯提供赦免的祈祷，而是履行司法职能，宣布他被赦免。

==========

第六章

中世纪的宗教和崇拜的某些方面的反差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有机会顺便谈一谈中世纪宗教的许多特点。这里将补充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意见。人们对在中世纪的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强烈反差感到震惊。

在中世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并使其具有如画的特点。在君王和主教的华丽服饰旁边，我们看到了修士的粗布衣衫和农民的愤怒。在大教堂的附近，有机械师的简陋住所和农民的可怜小屋，大教堂的尖顶高过森林中最高的树木。与那些以战争为业、以战斗为乐的骑士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根据神圣的使命完全禁止使用武力的人。在城堡的视线中，城墙上的战斗此起彼伏，而教堂和修道院则在其范围内安静地统治着，所有的暴力都被打成了亵渎。当我们观察不同阶层的内在精神和脾气时，也有类似的对比。一方面，有公然的邪恶，一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害怕。另一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圣洁的例子，在最开明的时代，这些例子让所有重视基督教卓越性的人产生了最深的敬意。中世纪通常被称为〝信仰的时代〞。对神圣事物的真实性的怀疑是一个不常见的入侵者。当它到来时，它被当作撒旦的信使而被击退。超自然世界的接近感，以及属于它的生命、善和恶，占据了所有的

心智。一层薄薄的面纱将看不见的世界与看得见的世界隔开，而这层面纱随时都有可能裂开，让看不见的媒介自由进入。每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想法，每一个愿望，每一个恐惧，都在符号中体现出来。 然而，真实的祈祷和赞美，宗教仪式，神圣的节日，虔诚和庆典，形成了整个社区生活和呼吸的氛围。不幸的是，功德的概念与外在仪式紧密相连。人们过多地从为得到上天的怜悯而付出的代价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缺陷往往是它们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它们被当作一种赎罪的手段， --可能是一种替代物，而不是忏悔的标志和结果。然而，没有人能够在阅读安瑟伦和伯纳德等人给那些寻求指导的人的建议时，不感到基督的教义是多么深刻地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在最黑暗的时代，也不乏这样的领袖。865年，教皇尼古拉一世给保加利亚人写了一封信，并赠送了圣经和其他书籍。他敦促他们在对待偶像崇拜者的问题上保持温和。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告诉他们，基督教徒并不像古代犹太人那样被限制在任何特定的祈祷场所。他警告他们，他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特定的时间和季节上，或者向它们寻求帮助，而是要仰望永生的神。在紧急情况下，当人们被要求为保卫国家而备战时，他们应该中断他们必要的工作，即使是禁食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灌输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反对在他们中间经常出现的死刑，以及其他不人道的做法。他对他们的要求是改变 ″内在的人″--他们应该穿上基督。在第九世纪，教皇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作。从每个世纪的主教和圣徒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同样的基督教和灵性的劝告。可以说，″十诫″、″主祷文 ″和 ″使徒信经 ″已为所有人所熟悉。

在中世纪，良知的活动非常活跃。这是法律精神的影响，它被注入流行的教导和基督教的公认解释中。这种良知的生活在它所引起的多种苦行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但丁的诗中，它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与我们见面，这是中世纪伟大的文学作品。

在考虑这一时期的宗教时，我们必须记住，不时有知识和精神上的复兴发生。

以不同的方式，如希尔德布兰迪改革，圣伯纳德主持的修道院改革，学术主义的兴起，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热情爆发，修行者文化的形成；这些〞高尚精神情感的有益浪潮〞，无论其中夹杂着怎样的邪恶，都使许多人超越了他们所习惯的卑躬屈膝的思想和世俗追求。

在中世纪的虔诚体系中，天使的天体等级制度具有重要地位。天使的显灵被认为是经常出现的。他们是保护者，是对抗空中充斥着的许多恶魔之灵的人类保护者。那些〞蜂拥而至的、忙碌的、死缠烂打的、恶毒的灵〞把人的世界视为自己的世界。他们以怪异和令人厌恶的形式出现。撒旦被认为是有角、有尾巴、有脚的。与这种无处不在的迷信、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所受折磨有关的，是对魔法咒语和护身符功效的信仰。胆小的、受诱惑的、受迫害的灵魂依赖圣人的帮助、代祷、和对他们的崇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圣徒的数量不断增加。每个教堂，每个村庄，都有它的守护神。人们相信他们（圣徒）所创造的奇迹不计其数。圣人的传说被越来越多地阅读，直到后来爱情和骑士精神的罗曼史与他们分庭抗礼。这些传说填满了尚未完成的博朗德派文集的60个厚厚的对开本。它们包含了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可以通过筛选虚构的内容来获得，就像从沙堆中分离出金粒一样。然而，即使是那些无休止的神迹故事也是有趣的，尽管它们的可信度通常很低，因为它们以神话的形式体现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信仰，以及那些听了它们的故事或高兴地依附在它们的奇妙事件上的一代人。在民众的崇敬中，圣母玛利亚远远高于所有的圣人。从中世纪的黎明开始，对她的敬意就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接近于神圣的荣誉。骑士精神使她成为人们想象中的偶像。骑士们献身于对她的服务，在战斗中祈求她的帮助。每个大教堂和大多数规模较大的教堂都有一个圣母教堂。在众多的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诗中，她被以最光辉的赞美词描述，被抬高到几乎对圣子（耶稣基督）有控制性影响的地位。随着对殉道者和圣人的崇拜日益增加，人们对他们的遗物也越来越感兴

趣。每座新的教堂都需要有他们的遗物。它们通常被放在祭坛上或祭坛下面。甚至它们会被佩戴在身上。

装有圣人骨头或衣服碎片的遗物箱比其他所有宝物都要珍贵。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它们在创造奇迹方面的功效是毫无疑问的。在圣人遗物上发的誓具有可怕的神圣性。违反誓言是一种可怕的罪行。据说，哈罗德被诺曼人威廉诱骗来到一个箱子前面，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着诺曼底最神圣的遗物，于是他宣誓，使他成为英国王位的下一个继承者。为了争夺圣物的所有权，敌对的修道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若遗物被盗，而盗窃行为如果成功，则不会招致责难。其动机被认为是虔诚的。圣本尼迪克特的尸体被从意大利运到了法国。十字军提供了满足对遗物欲望的手段，这种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遗物的销售逐渐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贸易分支。大量的金钱，就像现在富人为最崇高的艺术产品所支付的那样，被用来购买据信曾经属于基督或圣母的服装或其他物品。据说玛利亚在拿撒勒居住的房子在1291年被天使从空中带到了达尔马提亚的特萨托。1294年，天使把它带过亚得里亚海，来到雷卡纳蒂附近的一个树林，1295年，它被移到洛雷托的山上，现在就在那里。在它的每一个栖息地，都有与它有关的奇妙奇迹的报道。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神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将对玛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意与对上帝的敬意区分开来，但实际上，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敬意实际上是一种多神论的现实表现。世界的管理，包括今生和来世对人的命运的处理，被归于众多超自然的人（逝去的众圣徒们），他们的能力有限，但对人类的苦难充满同情，并有能力缓解它。

教会的忏悔制度在约束粗鲁的天性和保持忏悔者的良知方面并非没有整体效果。然而，它也存在着大量的滥用。很难将一种错误的功利观念从自我折磨中剥离出来。悔恨和恐惧驱使一些人在禁食和鞭打中做出危险的过度行为。另一些人则急于得到宽恕，愿意接受金钱罚款上的补偿，或去罗马或耶路撒

冷朝圣。驱逐出教会的恐怖，以及更大的恐怖，即切断罪犯与同胞的交往，都是可能被严重滥用的武器，就像禁闭令一样，它禁止了整个社区对罪犯的施恩手段。

对于困扰社会的巨大罪恶，教会的态度是什么？一般来说，可以说是真实的，教会将其影响投向了和平的一方。治愈王公贵族之间的纷争，并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被认为是等级制度的教会首领们可以履行的最高职责之一。在这个方向上，宗教的影响是强大的。从法国路易九世这样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他的美德使他有资格获得同时代人对他的尊敬，以及包括伏尔泰在内的现代作家对他的赞美。当他主动将利穆赞和其他法国国王在他之前的征服地割让给英国的亨利三世时，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土地不属于他，而是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他们各自的孩子之间实现和平，他们是德国的表兄弟。

_____

在十二世纪末的时候，哥特式风格，或称尖顶式风格，已经展开，在十三世纪达到了它的威严和美丽的程度。在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巨大的哥特式殿宇被建造出来，至今仍值得一提。

这些仍然是一个光荣的过去的纪念碑，它将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体现在石头上，而且仍然给所有仰望其尖顶或在其拱门下行走的人留下难以形容的谦逊和敬畏的印象。在建造这些圣殿的过程中，教会挥霍他们的财宝，贵族们提供他们昂贵的礼物；更妙的是，各阶层的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真诚奉献的共同热情，每个人都给予或做他能做的事，把墙壁和塔楼往上抬，用精心的艺术来完善上帝在地上的住所的每一部分。大教堂是为在它们所包围的广阔空间内举行的仪式而建造和改造的。在牧师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时代，

当崇拜者看到远处的香烟从祭坛升起，听到〞响亮的管风琴〞，看到神职人员穿着华丽的法衣，在〞长长的过道〞上来回走动时，他的心是多么的敬畏和融化啊！

融合了艺术和宗教冲动的不仅仅是教堂。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其中许多修道院是如此的宏伟和宽敞，以至于它们的小教堂就像大教堂一样，往往具有独特的魅力。红衣主教纽曼描绘了中世纪天主教的一面，即其诗意和令人愉悦的一面。他特别提到了英国。〞基督教的美好形式从南到北，像一场美丽的庆典一样，不断地升起、成长和扩大；它是雄伟的，它是庄严的，它是明亮的，它是美丽而愉快的，它抚慰着人的悲伤，它驱动着人的希望；它既是一种教义，又是一种崇拜；它有自己的教条、神秘、仪式；它有一种等级制度形式。一个由圣洁的牧师组成的兄弟会，带着长袍和羊角帽，举起手来，走出来，祝福并统治着欢乐的人民。十字架引领着队伍，简单的修士们在那里心怀祈祷，甜美的圣歌响起，神圣的拉丁语被听到，男孩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摇晃着罐子走出来，香云升起，弥撒被唱起，圣人被召唤； 日复一日，在寂静的夜晚，在林立的山丘上，在宁静的平原上，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在天堂里不断出现一样，在地上，受祝福的仪式、盛大的节日、华丽的游行、舒缓的哀歌、经过的钟声和熟悉的晚间祈祷的呼唤，是如此有规律和庄严地进行着；直到回忆起旧异教时代的人认为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不真实，他认为自己只是看到了一个幻象，天堂和传道是如此奇妙地降临人间，黑暗的魔鬼被胜利地赶到了下面的监狱〞。令人遗憾的是，如此美好的画面不得不被学生脑海中不经意间出现的回忆所破坏，即如此严重的无知和社会苦难、祭司和迷信。

中世纪宗教仪式的一个主要错误是礼仪因素对说教的不适当的主导作用。

礼仪以弥撒为中心。在那些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拉丁文被接受，而且人

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拉丁文和方言的混合中产生的语言在形成过程中很缓慢。此外，前往新国家的传教士们在礼仪中保留了拉丁语，这是由于神圣的联系的力量。它是与罗马联系的纽带，是团结的来源和标志。因此，拉丁文确立了自己作为神圣语言的地位。但我们发现，每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都坚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风格向人们传教的重要性。神职人员的文盲，在某些时期比其他时期要多得多，是执行这些劝诫的主要障碍。我们已经看到，查理曼大帝敦促主教们履行布道的义务。他的朋友和顾问阿尔昆（Alcuin）对皇帝的努力给予了开明的支持。他希望在平民中传播基督教知识。九世纪的会议要求在小村庄和大城镇都要有传教。十二世纪初的复兴唤醒了人们对传教问题的新的、生动的兴趣。出生于1053年的Guibert of Nogent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中，要求传教士避免晦涩难懂，灌输有价值的真理，并根据自己对福音的力量和祝福的经验进行宣讲。传教士们以平实而通俗的风格向广大听众讲道，经常是在露天进行。在十五世纪，即教皇分裂时期，克莱曼吉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将时代的弊端主要归咎于对布道的忽视，以及从思想投机和科学的动机出发对神学的研究，而不是将其（神学）视为准备在讲坛上进行实际和有效工作的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阿奎那，这位中世纪最深刻的神学家，用意大利语（百姓的语言）向人们宣讲普通的马太福音5-7章。在中世纪的布道中，对恐惧的呼吁比比皆是。其目的是用最生动的色彩来描绘失落者的痛苦。耶稣的苦难和圣母的悲伤是最受欢迎的主题，在这些主题的展开中，传道者竭力激发听众的情感。

在教会的赞美诗中，古典韵律的束缚使它们具有僵硬和矫揉造作的特点，而这些束缚被逐渐抛开，直到拉丁诗词的古典框架被完全抛弃，数量被完全忽略，重音被取代，同时唤起了韵律的潜在力量，基督教拉丁诗词才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让所有有判断能力的人在思考拉丁歌曲的第二次诞生时感到惊讶。

米尔曼说：“作为一个整体，拉丁教会的赞美诗有一种奇特的庄严和雄伟的色调。毫无疑问，它的大部分内容与希腊人的抒情诗一样，是与音乐孪生的；它与音乐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它的节奏是音乐性的，而不是韵律。它暗示着，就像圣歌的严肃完整的音调，光荣的爆发，温柔的下降，风琴声的神秘萦绕。它必须被听到，而不是被读到”。

==========

==========

==========

==========

==========

==========

==========

第七阶段

从博尼法斯八世到路德论文的发表（1294-1517）

教皇制度的衰落和改革运动

==========

==========

第一章

从博尼法斯八世开始的教会和教皇制度，至比萨会议（1294-1409）

民族主义的精神

西方君主对教皇马丁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命令越来越漠不关心，这表明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教皇统治的新力量。这是民族主义的精神，是政治集中化的趋势，它涉及到智力的扩展，和宗教和教会利益的独家支配的结束。城镇的权利化，商业的兴起，欧洲社会在十字军东征影响下的结晶，以及对君主制的新概念，都是一个不同事物秩序到来的主要标志。

当博尼法斯七世（1294-1303），一位充分珍视希尔德布兰和英诺森三世理论的教皇，登上因塞莱斯廷辞职而空缺的职位时，所发生的变化变得十分明显。他的目标是将西西里岛归还给那不勒斯国王，通过推翻吉贝里家族，特别是他自己的敌人科隆纳家族来平定意大利,并在法国的菲利普-费尔和英国的爱德华-L之间的争吵中作出裁决。在西西里岛，他失败了。在意大利，他取得了足够的成功，吸引了人们对他的憎恨。而在他试图在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之间进行调停的过程中，他使自己陷入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将使他走向毁灭。

（英国）爱德华和（法国）菲利普都不愿意听从教皇的命令。博尼法斯于是决定迫使他们和平相处，通过切断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于1296年2月24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Clericis laicos″，其中，在宣布长期以来的传统显示平信徒对神职人员充满敌意和恶意之后，他禁止皇帝、国王或王公未经教廷授权对教会会众进行征税。在抵制这种对王权的攻击方面，菲利普起了带头作用。

当（教皇）博尼法斯以傲慢的语气给（法国国王）菲利普写信时，他（教皇）的抱怨和威胁得到了回应，他（菲利普）断言在有任何神职人员之前，法国国王就已经统治了他的王国。对此，他（菲利普）又补充说，″神圣的教会，

基督的配偶，不仅由神职人员组成，也由普通人组成；当神职人员试图将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获得自由的教会自由专属于自己时，他们就犯了滥用职权的错误，而且基督亲自命令要把属于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在这种抵抗教皇侵略的态度上，菲利普并不孤单。他甚至得到了法国神职人员的支持。博尼法斯因此被他的天然盟友抛弃，准备与国王和解，以便他能把所有的力量用于消灭他的罗马敌人--科隆纳人。皇家法令和教皇诏书现在都被解释清楚了，国王高贵的祖先路易九世被封为圣人。

没过多久，菲利普和爱德华就准备把他们的分歧提交给博尼法斯，只要他不以教皇的身份，而是以本尼迪克特-卡耶坦（Benedict Cajetan）这个私人身份行事。他（教皇）同意这样做，决心让他的决定使教皇权威得到认可，从而以巧计的方式赢得他没能得到的东西。但是，菲利普对裁决不满意，并对接受裁决的形式感到气愤。

他（菲利普）毫不犹豫地在宫廷里接待了被流放的科隆纳，也毫不犹豫地与阿尔贝特缔结了联盟。后者是罗马人的国王，博尼法斯曾废除了对于他的选举。他（菲利普）的身边有大律师，彼得-弗洛特、威尔等人；这些律师是王室特权的坚定捍卫者，他们不仅准备协助他打破封建主义局限，而且还准备在民事权力机构周围设置堡垒，以对抗教会的侵扰。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这里的教会等级制度也面临着一群有学问的人的挑战；他们（这些律师们）是一部古老（罗马）法典的守护者，他们为国王（菲利普）宣称拥有凯撒的特权，并可以提出更早的教会教规来反对教皇。

在此期间，苏格兰爆发了叛乱，当教皇试图在爱德华和苏格兰人之间进行干预时，英国议会在1301年愤然击退了他（教皇）的主张。

但在罗马，博尼法斯看到了一幕，这很可能诱使他对教皇的权力产生错误的

信心。

1300年被定为一个庆典，所有参观圣彼得墓的人都被许诺会得到宽恕和赦免。大量的人群从世界各地、西方各国涌向这座城市。他们是如此急切地想瞻仰圣物，以至于许多人在集会上拥挤丧生。大量的捐款被带到了祭坛上。

然而，教皇并没有在这些基督教国家人民的虔诚中高兴太久。他派往法国宫廷的教廷公使，帕米尔主教伯纳德，是一个对菲利普的敌意很强的人；他被法国政府指控为叛国，并使博尼法斯教皇与国王菲利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道又一道的法令从罗马传出，最后发布了 "Unam sanctam "的圣谕，该圣谕于1302年12月18日颁布，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信仰教皇，才能得救。法国的神职人员，甚至是民法的博士都被召集到罗马教廷，对叛乱的君主（菲利普）进行审判。当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博尼法斯将1303年9月8日定为宣布菲利普被废黜的日子，并将他的王国置于禁治之下（即禁止其他基督教国家与该国家来往）。

在这些攻击下，菲利普并不消极。他禁止法国神职人员服从罗马的传唤，否则将被没收财产。他对一封据称是博尼法斯写的信作出了答复，并以攻击性的口吻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民事政府地位。

这封回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菲利普，承蒙上帝的恩典，法国国王，致博尼法斯"。该信11月向全国发布。在信最后，他（菲利普）断言，所有认为国王在世俗事务中受制于任何人的人都是傻瓜和疯子。教皇的一位代表被羞辱地拒绝觐见国王；他（教皇代表）带来的（教皇）圣谕于1302年2月11日在菲利普圣母院被公开烧毁。

菲利普现在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向全国发出呼吁。在四月，他召集了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在这次王国的会议上，他（菲利普）得到了他们支持的保证。在次年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博尼法斯（教皇）被指控犯有异端邪说、亵渎罪、教会暴政和对法国国王的盲目仇恨；然后，他向教会总议会和未来的合法教皇发出了呼吁。

但这些口头武器并不是国王的唯一手段。诺加雷的威廉和科隆纳在意大利，9月7日，他们在博尼法斯自己的城市阿纳格尼强行闯入他的面前，用粗鲁的语言甚至是殴打来攻击他，并把他作为囚犯。他差点没有从菲利普使者的侮辱中逃脱出来；而当他终于逃脱、进入他认为是对他忠诚的首都（罗马）时，他又发现自己处于另一群劲敌的中间。

这位年迈的教皇在10月11日心碎而死。在本世纪晚些时候，他的职业生涯被精确地描述为："他像狐狸一样进入，像狮子一样统治，像狗一样死去"。

就这样，正如当年在卡诺萨，教皇制度通过一个伟大的戏剧性行为，首次显示了它的力量的强大（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赤脚在雪地里面等待了三天才能够觐见教皇、求得教皇的饶恕赦免）；如今，它的衰落也是以同样的戏剧性行为方式进行的。阿纳格尼的场景（在这里，教皇被攻击和羞辱）与卡诺萨的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吉贝利人对博尼法斯的愤怒在但丁身上得到了体现，但丁称他为"新法利赛人的首领"，并让圣彼得本人在天堂里给他打上了篡位者的标签。这位愤怒的

诗人指责他（博尼法斯）在犯罪之前就为自己开脱罪责，并为这一罪行使自己招致了灭顶之灾。塞莱斯廷在1313年被克莱门特五世封为教皇；但由于他放弃教皇职位，为博尼法斯腾出空间，但丁将他置于地狱之口，作为一个被仁慈和正义所唾弃的人：

“我看着，我看到了他（塞莱斯廷）的阴暗面
他因胆怯而做出了巨大的拒绝”。

《地狱》，三，59，60。

菲利普和博尼法斯的较量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愤怒。他们认真思考和调查教会与国家应有的关系。僵化的教会人士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主张的教皇至上的观点在文学上受到了抵制与反抗。

埃吉迪乌斯-德-科隆纳（Egidius de Colonna），一位修士，后来的布尔日大主教认为，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是不同的。他认为，属灵和属世的权力是不同的、独立的，每一个都是由上帝指定的。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他认为法国国王在民事方面不受制于任何人。

他的同时代人，巴黎的约翰，通过试图剥夺教皇的历史基础来抨击教皇的奢靡之举。他说，教皇不能从基督那里获得对平民事务的管辖权，因为基督本人并不声称让教会拥有这种管辖权。数年后，为了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君主制的政治思想，但丁写了他著名的关于君主制的论文。在这部作品中，他（但丁）认为，如果人类要享受和平、正义和自由的祝福，他们必须在一个人的统治下团结起来。从历史上看，这种必要的统一只有在罗马人以他们的英勇赢得的帝国中才能实现，而基督通过出生在它的统治下、并屈服于它的官员手中、而认可了它的合法统治权。

但丁否认后来的教皇诏书的权威性，以及那些对圣经的寓言式的解释；这些解释总是在教皇的支持者口中出现。在帝国中，教皇的职责是引导人们的灵魂；上帝任命（世俗）皇帝管理他们的世俗事务。除了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在意大利之外，帝国的起源和君主制的性质问题也引起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在德国，法学家和神学家们对民事权力的基础以及教皇对世俗政府的干预所宣称的理由进行了历史和批判性的调查。

与此同时，教皇本身也被置于法国的权力之下，并在阿维尼翁开始了它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博尼法斯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十一世，废除了针对菲利普及其国家的教皇法令，但拒绝加入诋毁已故教皇人格的计划。本尼迪克特死后，很快地，法国国王计划确保选出一个对他的利益有利的教皇。通过法国红衣主教的成功阴谋，菲利普以前的敌人--波尔多大主教贝特朗现在承诺：——若他被任命为教皇，将会使国王（和他的支持者）与（罗马）教会和解；并调查对博尼法斯的指控。协议中有一条是保密的，至今仍是一个猜测。

贝特朗被选中，并在里昂被祝圣为克莱门特五世。不久之后，他将教皇的位置移到了阿维尼翁，该城位于法国的边界上，属于那不勒斯国王。就这样，教皇的、在罗马城之外的、国外居住期开始了，也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时期。从这时起，教皇的威望开始减弱，就像它在前几个世纪中的增长一样迅速。这种衰落是由于社会的普遍变化造成的，这一点已经提到过，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教皇自身行为的影响而加速的。在“巴比伦被掳”期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罗马教廷被法国所奴役，并为了法国宫廷的利益动机而管理教会。这种有辱人格的顺从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克莱门特五世与菲利普的关系。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已成为法国国王（菲利普）贪婪和镇压的对象。圣殿骑士团的成员被拷打，并被逼迫招供。他们被逼迫承认奇怪和亵渎性的入

会仪式。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是否认基督，向称为巴弗灭的偶像致敬，以及非自然的淫乱。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烧死，另一些人被流放。教皇支持法国国王的（对圣殿骑士团的）诉讼，并在1312年的维埃纳会议上废除了该圣殿骑士团。

当菲利普要求谴责（前教皇）博尼法斯时，克莱门特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但使那些指控已故教皇的人（除少数例外）免受教会的谴责，并将对（关于博尼法斯的）指控的调查委托给维埃纳会议；他知道该会议将坚定地捍卫对基督牧师的记忆。

130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阿尔伯特皇帝去世后，教皇（克莱门特）不得不采取两面派的做法，以满足他的法国主人的要求，同时又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公开推荐菲利普的弟弟瓦卢斯的查尔斯当选，而私下里则敦促选举人选择卢森堡的亨利。但是，当克莱门特对法国国王采取这种畏缩的态度时，他对德国、英国和其他天主教国家采取了大胆而积极的立场。只要教皇仍是她的工具，法国就愿意放纵教皇的行为、奢侈地宣称自己的权威；而这只会加剧其他国家（对教皇）的反对。

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或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克莱门特教皇曾经推动了他当选皇位）在意大利取得了辉煌的进展。一时间，神圣帝国（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的荣光似乎又恢复了。教皇感到震惊，当亨利否认他（教皇）对世俗最高地位的主张时，他（教皇）宣布了对他的教会禁令。亨利皇帝在1313年的突然死亡结束了这场冲突，并给了克莱门特一个机会，让他在帝国皇帝职位空缺期间，作为霸主的教皇可以在摄政的理论上采取行动。

不久之后，克莱门特本人也去世了，随之而来的是法国和意大利两党在教皇

心腹内部的激烈争斗。

意大利党希望结束“巴比伦被囚”的状态（即，让教皇搬回到罗马）。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当选时承诺，除了去罗马之外，绝不骑马；并遵守承诺，只乘船前往阿维尼翁。约翰（教皇）利用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奥地利的弗雷德里克的双重选举，在意大利更彻底地行使其前任作为摄政王所要求的权利，并策划将法国国王提升到帝国的宝座上。

然而，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路易在米尔道夫克服了他的反对派之后，就开始在意大利恢复帝国的统治。他（路易）立即被传唤到愤怒的教皇面前，为他未经教皇批准而冒然取得罗马国王的头衔和行使权力的行为做出解释。路易没有出现，教皇就把他逐出了教会，并召集德意志诸侯召开会议，罢免他，选举法国国王查理。

帝国和教皇之间的这场新的冲突，如果不是引起了一些著名的文章，它只是对那些最强大的皇帝和最著名的教皇之间的古老战争的一种可怜的追忆。

这只是约翰的麻烦的开始。他敢于宣布方济各会的信仰，即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拥有一切共同的东西，是一种异端。骑士团的将军，切塞纳的迈克尔，写了一篇反对教皇错误的小册子,他在其中呼吁〞普世教会和一个总理事会(总议会)〞。最后，在他的领导下，修会支持巴伐利亚的（德意志皇帝）路易的事业。就这样，代表最高宗教信仰的人组成了反对（教皇）约翰的阵营。

方济各会中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奥卡姆的威尔撰写了一篇关于教皇的权力的论文。他超越了他的前辈们，论证了教会既然在基督里是统一的，就没有必要受制于一个单一的教长。他把皇帝和总议会置于教皇之上，作为（监督）他（即教皇）的法官。在信仰问题上，他甚至不允许大公会议拥有无误的权

力。"只有神圣的圣经和普世教会的信仰才有绝对的效力"。这就是从宗教和神学方面对教皇权威的攻击。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这个时代伟大的理论政治家，在《保卫和平》一书中为（皇帝）路易的事业和帝国的权利进行了辩护。他抨击了教皇的社会理论,并着手介绍了教皇自命不凡行为的兴起和发展历史。他通过宣布一项基本原则，即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全体公民，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扫除了神职和教皇的所有世俗权力和管辖权。国王根据他们（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君王根据他们（人民）的意愿发布正义的命令。只有他们（教会会众）才有权力在适当的时候开除教籍、免除责任，以及任命或剥夺神职人员的权利。每个人，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要服从他们选择的统治者。一个总理事会（总议会）如果要有效，就必须由他们（人民）召集，或由他（统治者）在他们的授权下召集，而且（这个总理事会）必须由牧师和平信徒组成。如此组成的议会属于教会的监督机构，制定必要的法律，解释有疑问的经文，这是信仰问题上的唯一权威。教皇制度习惯于将许多主张建立在旧约的法律之上，这不是救赎所必需的；而是，新约的法律才是救赎所必需的；甚至这也不能通过世俗的惩罚来强制执行。教导它（圣经，尤其是新约）的诫命，传扬福音，施行圣礼，是属灵祭司的唯一职能。在他（马西利乌斯）的历史调查中，他指出在早期教会中，长老和主教是同义词。他否认彼得的地位高于其他使徒，甚至否认可以证明他（彼得）曾经访问过罗马。罗马教会的地位和它对帝国的权力是在时代的需要、王公的软弱和教皇的僭越中逐渐形成的。圣彼得的主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监督教会事务和主持教会会议的官员。

这些观点在那些习惯于认为教皇和神职掌握着天国钥匙的人耳中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尽管它们可能会使那些第一次听到它们的人感到震惊，但它们有一种自我传播的力量，这将有助于为它们在未来几代人中赢得接受。

_____

德国人继续无视教皇的诅咒，支持他们国王的事业。1327年，（德意志皇帝、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进军意大利，接受帝国的皇冠，并享受了短短几个月的胜利。这次远征的结局是屈辱的；但在这个时候，教皇约翰又一次把自己卷入了神学争端，从而缓解了他的对手的窘境。死亡的介入使这位异端教皇免于受到他的教会和政治敌人即将召开的会议的调查。

他（约翰）的继任者本笃十二世（教皇）完全处于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的权力之下，以至于与他自己的真诚愿望相反，他不得不留在阿维尼翁，并与德意志皇帝继续争斗下去。德意志各邦现在更强烈地支持路易皇帝。他们肯定了他事业的正义性，并指出了教皇对他犯下的错误。1338年，选举人王公们庄严地宣布，罗马国王的任命和权力完全来自选举团。

但是，皇帝（路易）缺乏大胆抵御敌人的勇气，也缺乏审慎追求目标的智慧。他不是为了保护“神圣罗马帝国”不受教皇的侵犯，而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壮大。他取消了玛格丽特-莫尔塔什的婚姻，然后通过豁免权消除了她与自己的儿子结合的进一步障碍。这种出于明显的自私目的的、对教会权利的侵犯，使他（路易）失去了他在德国的许多支持者的信任。但教皇，这次是克莱门特六世（1342-1352），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干预。通过其（教皇）不合理的要求和建立一个敌对皇帝查理四世的阴谋，再次将路易从毁灭中解救出来，使他免于毁灭，并保证了他的臣民对他的忠诚度，直到他（路易）几年后他去世。阿维尼翁教皇们长期以来对皇帝进行的党派之争似乎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却削弱了世人对于教皇制度的尊重。

与此同时，欧洲在教皇的贪婪给它带来的负担下呻吟着。阿维尼翁教皇宫廷

的收入是通过敲诈勒索的方式来补充的。这超越了所有的先例。教皇在君主的帮助下，利用他们的干涉来为自己的宠儿争取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把自命不凡的东西转化为权利。教皇对教会职位，甚至是主教职位和教区职位的大量保留，这些职位被教皇赐予不值得的人，或给予已经拥有有利可图的职位的人；向新的受益人索取首期收益或年金，以及对所有级别的神职人员，特别是低级别的神职人员征收繁重的税收，这些都是为补充教皇的国库所采取的方法。当人们知道由此获得的财富被用来支持在阿维尼翁的一个极其奢侈和挥霍的宫廷时，这些不同形式的教会压迫（在人们心理中产生）的效果就更大了。彼特拉克作为一个目击者已经生动地描述了其中（教皇宫廷中的）无边的不道德（奢侈）行为。

在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反抗精神，现在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加快了。爱德华三世的两项重要法规是其结果--关于亲王的法规（该法规赋予了国王填补原由教皇保留的教会职位的权利），以及禁止臣民以直接起诉或上诉的方式向任何教会机构提起诉讼的præmunire法规（该法规禁止臣民通过直接起诉或上诉，将属于国王管辖的案件提交给任何外国法庭；即切断了罗马教皇对于英国国内诉讼案件的干预行为）。

几年后，英国拒绝承认（罗马教廷）基于当年（英国）约翰国王对（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敬意而提出的要求，即拒绝支付他（英国约翰国王）所曾经承诺的一千马克的贡品。教皇刚刚摆脱了（德意志皇帝）路易这个对手，就在另一个方面受到了威胁。法国国王再也无法保护他的教会盟友（教皇），甚至无法保护他（教皇）不被那些掠夺该国的强盗团伙所侵害。在意大利，前景更加糟糕。自从（教皇）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之后，罗马就一直被一些主要家族的争斗所困扰，这些家族为自己在城市中建立了强大的据点。1347年，罗马人在热心人里安齐的鼓动下，试图恢复罗马的古代自由共和国的形式。但是，罗马的人们很快从过去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处于更加混乱的状态。

教会国家（罗马）在小贵族的专制统治下呻吟着。在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兹的努力下，教皇在罗马的统治地位一度得到恢复；他（阿尔博诺兹）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名教士。

教皇乌尔班五世在他悲痛欲绝的红衣主教们的呼喊声中离开了阿维尼翁；但他在罗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在参加了一次空洞的帝国加冕仪式后，围绕着他的危险和他的教士们的恳求，说服他回到了安静的阿维尼翁。但其他教士们的暴政很快就引起了教皇城市的普遍反抗。似乎他们的忠诚将完全消失，除非教皇回到罗马。

（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不再理会他的红衣主教们的呼声，而是听从圣凯瑟琳的劝告；她是一位多米尼克会的信徒，她的禁欲主义和奉献精神使她具有如此的权威，以至于她可以向教皇提出建议（即请求教皇迁回罗马）。1377年，他（教皇）回到了罗马，一年后在那里去世，教皇的敌人仍未被制服。这样，“巴比伦的囚禁”时代就结束了。

在当时组成神圣学院的二十三位红衣主教中，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去世时有十六位在罗马。他们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以免他们从意大利逃到阿维尼翁，选出另一位顺从法国利益的教皇。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这两个派别--利穆森派和高卢派--彼此间都有强烈的仇恨，但他们被不断高涨的骚动吓得达成了一致，并选择了巴里的大主教普里尼亚诺。

新任教皇乌尔班六世，作为一个刻板和正直的修士，丝毫没有表现出谨慎和政治性，他很快就通过个人的侮辱和粗暴的改革尝试疏远了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当他们（法国红衣主教们）得知他不打算返回阿维尼翁时，他们的感情

更加恶化了。

他们（法国红衣主教们）退居到阿维尼翁，在那里，他们宣布乌尔班的选举无效，理由是乌尔班的选举是通过暴力获得的；他们选择了日内瓦的罗伯特（克莱门特七世，1378-1394年），这个人拥有乌尔班所缺少的那种领导素质。

乌尔班被所有的人抛弃了，但是他着手建立了28个新的红衣主教所组成的神圣学院（选举院）。现在有两个神圣的学院，因此，任何一位教皇的死亡都无法结束这场争斗。政治仇恨决定了每个欧洲国家对教皇竞争的立场；意大利站在她的同胞一边；法国支持克莱门特，希望重新获得她以前对教皇的统治权；因此，（与法国为敌的）英格兰服从乌尔班。苏格兰憎恨英格兰，佛兰德憎恨法国；因此，前者崇尚克莱门特，后者崇尚乌尔班。同样，政治动机使那不勒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站在了法国教皇一边，而德国、匈牙利和北方王国则站在了意大利人一边。就这样，欧洲被分裂了；伟大的分裂开始了。

乌尔班（教皇）的事业似乎是意大利的事业；正是一支由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诺领导的意大利队伍征服了克莱门特的布列塔尼雇佣军，迫使他（克莱门特教皇）退到那不勒斯，不久他（克莱门特）又乘船前往阿维尼翁。乌尔班着手废黜那不勒斯王后乔安娜，她坚持支持其竞争对手，并宣布王国被杜拉索的查尔斯没收，他是瘸腿查尔斯的旁系继承人。为了反对他（乌尔班教皇），乔安娜在克莱门特（教皇）的批准下，收养了安茹的路易，他是路易国王的女儿的后代。乌尔班盲目地寻求为他那无用的侄子弗朗西斯科-普里尼亚诺赢得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的最美丽的城市，而当现在胜利的查尔斯抵制他的要求时，教皇（乌尔班）决定毁掉那不勒斯国王、让弗朗西斯科登上王位。

这种无耻的裙带关系使他（乌尔班）无法认可拉迪斯拉斯为查理的继承人。

他（乌尔班）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家族的扩张上，而不是意大利的事业或教皇制度的真正利益。他（乌尔班）对红衣主教的残忍行为使他受到所有人的憎恨和不信任，但人们还是坚持他的事业，原因是他站在他们和一个屈从于法国的教皇（克莱门特）之间。

新任教皇、博尼法斯九世（1389-1404在位），乌尔班的继任者，没有他（乌尔班）的学识，也没有他的虔诚；但他和蔼可亲，富有智慧，而且特别需要的是，他（博尼法斯）拥有治理国家的本能。他（博尼法斯）立即承认拉迪斯拉斯为那不勒斯的国王；从而把那不勒斯的国家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通过任命在1386年拥有权力的贵族为教皇的代理人，将教会国家（罗马）团结起来。

在罗马，他（博尼法斯）奠定了教皇主权的基础。但作为一个教皇，博尼法斯有一个恶习是无法弥补的，即使他的私人生活再纯洁无法弥补。这就是他的贪钱；他不满足于通过1390年和1400年的庆典获得的巨额资金，而是诉诸于无耻的贩卖圣职。他的宫廷成员为这种做法辩护，理由是教皇不会犯罪。

但（教皇制度的）分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国和英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究罪恶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才能结束它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敌对的教皇——克莱门特在阿维尼翁不光彩地休息，乌尔班在意大利领导一场游击战——每个人都在咒骂对方，这种景象激起了（英国的）威克里夫宣布，教皇职位本身就是对教会的毒害。

英格兰民族是如此团结一致地抵制教会的侵犯，以至于这位反对教皇的、民事和王权的倡导者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的话。

几年后，当博尼法斯教皇试图将他的勒索计划带入英国，他（教皇）的企图遭到了更严格的法规的打击。

在法国，早在1380年，巴黎大学就开始努力弥合分裂的局面。它放弃了召集总理事会（教会总会议）的计划，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并主张教皇退位的计划。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阻碍了任何可能设计的计划的成功。当时有两位教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圣彼得的真正继承人，因此是所有精神权力的源泉，教长和议会的权力都来自于他们。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两个神圣的团体，其成员们分别为他们所选出的教皇辩护，因为如果他不是教皇，他们就不是红衣主教。

每一党派在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追随者，而各国当时正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劝说或迫使敌对的教皇同时退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职位，每个人都会担心，在他辞职后，另一个人会拒绝效仿他的做法。各国因相互不信任而分离，也无法加入任何一致的政策或方法来处理他们各自支持的教皇。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巴黎的神学家们还是向法国宫廷提出了邀请或迫使克莱门特辞职的必要性，希望依附于博尼法斯的国家能够追究本尼迪克特十三世的责任，对他采取同样的方法（即也迫使他辞职退位）。

这些努力得到了法国红衣主教的支持，加速了克莱门特的死亡；但在法国国王还没有来得及干预的时候，这些红衣主教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无论如何都能维护他们利益的首领，已经迫使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承诺，只要教会的福利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需要这样做，他就会在1394年辞去教皇职位。

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像本尼迪克特这样坚定的、教皇至高无上的信仰者和精通教会法的人，除了普遍承认自己是基督的真正传教士外，没有任何办

法可以弥合分裂的局面。他不会屈服，即使在大学中更激烈的一方的影响下，法国宫廷，连同西西里、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退出了对本尼迪克特的服从，而布西卡特元帅则围攻了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温和的人，彼得-德艾利和尼古拉斯-德-克莱芒吉，被巧妙地支开了，前者被推举为康布雷主教，后者则被推举为教皇秘书。

在此期间，博尼法斯九世满足于做出虔诚的承诺，以避免对自己采取类似的程序，并一直在稳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法国国王的疯狂以及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之间的争斗使法国的政策发生了动摇，很快，一种反作用就出现了，全国又回到了对于本尼迪克特的顺从。博尼法斯和他的继任者英诺森七世去世后，在达成协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所有各方都对这场争斗感到厌倦，决心迅速结束这场争斗。实现这一目标是罗马红衣主教最庄严地要求可敬而虔诚的格里高利十二世履行的唯一职责，1406年，他们选举他为教皇。法国，在大学持续不断的要求下，逐渐切断了本尼迪克特在法国教会中的权力。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教皇们被安排在萨沃纳会面，在那里医治困扰教会的混乱局面。但现在拉迪斯拉斯开始为他的王位的安全而颤抖，如果法国教皇偶然取得胜利，他的王位就会陷入危险之中。他试图在会议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格里高利的侄子小声地怀疑他的背叛。欧洲人看到这两个老人，每个人都自称是基督的代言人，每个人都担心另一个人在为他的毁灭而煽动一些阴谋，向对方走去。

本尼迪克特十三世和格里高利十二世缓慢地计划会面，而且是在非常惶恐的情况下。见面的地点一再改变。格里高利不会走得比卢卡远，而本尼迪克特则在沿海的斯佩齐亚。一个人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拒绝接近海岸；另一个人像鱼一样，不愿意离开大海。突然间，格里高利公开表示无意退位，并设立了四个新的红衣主教。他的老红衣主教们逃到了比萨，并向一个总理事会发出呼吁。

在法国，巴黎大学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国王受其影响，威胁说要采取中立的红衣主教立场。本尼迪克特对这一步骤进行了反击，将那些不服从他的人逐出教会，并召集了一次会议。他的圣谕的携带者因叛国罪而被监禁，文件本身被公开撕成碎片，中立的公告被送出。本尼迪克特逃到了阿拉贡地区的佩皮尼昂。两位教皇的红衣主教随后联合召集了一个总会议，并于第二年在比萨举行。

==========

第二章

改革会议： 教会和教皇制度
到庇佑二世的登基。(1409-1458)

一个会议被召集起来，但长期以来习惯于教皇专制主义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机构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许多比较保守的理论家们试图从教会法的规定中找到其行动的理由。

高卢教派在格尔森和德艾利的领导下，超越了这些规定，坚持教会及其会议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并努力为教皇的权力设定适当的限制。

格森和奥卡姆一样，认为教会在作为其首脑的基督里有其真正的统一性。在教会这个由他（耶稣基督）建立的神秘机构中，被赋予了权力和权利，无论是教会法的规定还是教皇的法令都不能使其失效，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结束分裂现象。如果象征其外部统一的主教已死，或失去了信徒的效忠，教会不

仅可以根据红衣主教的授权，也可以根据一个王子或任何其他基督徒的授权，召集一个总理事会，以获得一个真正的、唯一的主教。这也不是可以做的全部。如果公共和平和安全需要，可以抵制该牧师，甚至废黜和剥夺他的一切权利。

格森、德艾利和他们的朋友们的目的是将教皇从绝对的地位降低到君主立宪的地位，甚至将普世教会置于总理事会之上，因为只有普世教会才是无懈可击的，才是最高的。这种想法将为大公会议赢得那些认为教皇权力过大是困扰教会的许多弊端的根源的人的道德支持。

但1409年3月25日在比萨召开的大集会并不代表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在更强大的君主中，西班牙国王仍然支持本尼迪克特；而拉迪斯拉斯和鲁珀特，也就是文泽尔的帝国王位竞争者，则把坚持支持格里高利作为一种政治需要。议会成员的首要职责是弥合分裂。他们试图通过颁布法令使两个神圣的学院联合起来，并将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作为臭名昭著的分裂分子、作伪证者和异端分子而罢免，来实现这一目标。许多代表现在希望着手改革教会的 ″首领和成员″，以便结束教会的腐败，并遏制教皇权力的滥用，这些滥用在“巴比伦被掳”期间和分裂期间变得如此明目张胆。但还有一些人，而且这些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怀疑议会是否有权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除非在（此时尚未选出的）教皇的领导下。这一方的领导人是红衣主教，他们急于阻止自由主义运动，以免它变成革命。他们承诺，无论他们中的谁被选中，都将阻止会议的解散，直到天主教教会的改革圆满完成。然后他们一致选择了米兰的老红衣主教彼得-菲拉吉。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一登基，议会的许多成员似乎完全沉浸在寻求恩惠的过程中，而他肆无忌惮的挥霍却随时准备给予恩惠。他用一些不重要的让步来搪塞改革派，并以似是而非的承诺来拒绝召开另一次会议，不久就解散了会议。

会议开幕时的美好希望落空了。它的措施是冲动的结果，而不是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成熟思考。这就是格尔森的评论。此外，分裂仍在继续，有三个教皇而不是两个教皇在战场上。亚历山大完全受博洛尼亚的传教士巴尔达萨-科萨的影响，这个人先是个海盗，然后是个学生，最后，他成功地成为教皇的敲诈者，以至于博尼法斯九世给他戴上了红衣主教的帽子。这位教士被指控的罪行之多，无人能出其右。

他拥有如此大的政治权力，以至于他很快就被召来填补1410年5月17日圣彼得的空缺，并保护它免受拉迪斯拉斯的攻击。但意大利的政治风暴对约翰二十三世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他不得不向罗马人的国王西吉斯-蒙德求助，并同意了他的提议，召集了一个总议会。

教皇认为在一个他比皇帝更有权力的地方召开会议是最重要的，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的传教士的谨慎。他们屈服于西吉斯蒙德的要求，选择了康斯坦茨，一个帝国的城市。约翰现在不得不发出召集会议的传票，会议将于1414年11月1日召开；但他仍然希望在会议召开后能够控制它。比萨会议未能完成摆在它面前的工作，这使认真的人敏锐地意识到，需要结束教会管理中的弊端，并为危及教会联合的长期分裂找到一个即时有效的补救办法。此外，在波西米亚，有一场强大的宗教运动，由约翰-胡斯和其他人领导，并受到威克里夫著作的刺激--这场运动有可能导致一个新的强大教派的建立。在欧洲的东部边界，土耳其入侵者在盘旋，而在西方的基督教国家，纷争和混乱普遍存在。1414年最后几周在康斯坦茨召开的会议，直到1418年4月才解散，是中世纪最辉煌、最壮观的教会会议。如果说出席会议的主教人数不如其他一些教会的大会议那么多，那么这种差异就被众多的下级神职人员、博士和法学家以及无可比拟的君主和贵族的阵容所弥补了。教皇和西吉斯蒙德都出席了会议，每个人都带着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员和随从的护卫。不少于五万人的人群，受官方义务、好奇心、利益或快乐的驱使，

涌入康斯坦茨城，目睹议会的活动。

会议刚刚开始，约翰就与改革党发生了冲突。改革党由现在的红衣主教达伊领导。教皇的目的是促使皮桑会议的行为得到确认；该法案挫败了本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利，并为其前任的选举作了规定。这样，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得到加强，他就能把他们（本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利）当作“反教皇”（Antipope）来对付。在把这个危险的事情从议会手中弄走之后，他就会试图用胡斯和威克里夫的异端邪说来占据议会的剩余会议时间，并通过一些让步来阻挠所有认真的改革尝试。

在反对这一计划时，德艾利认为，只有当一个议会真正代表了普世教会，只有普世教会不会犯错，它才能摆脱陷入错误的危险，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比萨的会议很可能被认为是这样一个议会，但它也有可能犯错，就像其他这样的会议一样，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学者的陈述，它也会犯错。此外，也会使分裂现象更难结束。很明显，德艾利所代表的一方希望让议会自由地与本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利进行谈判。不久之后，格里高利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退位，如果他的两个对手也能这样做的话。现在，红衣主教菲拉斯特建议约翰仿效好牧人为羊群献出生命，应该辞职，并断言为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可以迫使他采取这一步骤。同时，由各国投票的决议粉碎了教皇通过意大利教士在人数上的优势来控制议会的计划。

约翰的处境开始变得危急起来。他被即将对他提出指控的传言吓坏了，在宣誓后郑重承诺，如果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也辞职，他就退位。为了避免将这一承诺付诸实施，他逃到了沙夫豪森，那里位于他的朋友、奥地利的腓特烈的境内。议会为了避免教皇的行动被认为是使其权威失效，颁布了一项法令，内容如下：“康斯坦茨会议，在圣灵中定期集会，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会议，并代表了积极的教会，它的权威立即来自上帝，每个人，包括教皇，都

有义务在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服从它，并消除分裂主义″。没过多久，腓特烈就顺从地与西吉斯蒙德讲和，而教皇在落入议会之手后，于1415年5月29日被罢免了职务。此后不久，格里高利辞职了。但本尼迪克特很顽固，当与他的谈判没有结果（而且除了西班牙的佩尼斯科拉镇之外，他被所有人抛弃）时，他被正式废黜。

就在议会致力于结束分裂的同时，它也在以无情的决心镇压异端。西吉斯蒙德一直渴望波希米亚新运动的领袖胡斯能来到康斯坦茨，把他的事业带到教会的代表面前。胡斯同意这样做，显然他不认为议会是一个他将被提审的司法机构，而是一个伟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反对他的敌人的指责。皇帝随后给了他一份安全协议，要求所有领主和大人物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前往和返回。尽管如此，在他到达康斯坦茨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监狱。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起初对这种公然违反他（胡斯）的安全行为感到愤怒，但议会的坚决态度使他不得不让步。很难找到胡斯的任何声明；从他（胡斯）的意图来看，这些声明可以被宣布为异端。然而，议会可以把自己的理由建立在他不承认教会的权威，并声称除了他所理解的圣经外，没有任何权威是最终的。此外，他的伦理学理论是统治者（非宗教人士或教会人士）统治权的基础，他在这一理论上追随威克里夫，引起了真诚的震惊。改革党的领袖们准备把犯错的教皇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但他们却拘泥于等级权威的学说。因此，他们觉得更有必要标明他们所期望实现的改革的界限。议会的暴力、暴民式的举止与他们的受害者的高尚的宁静和自持形成了非常不利的对比。当宣读对他（胡斯）的判决时，胡斯转过身来，把目光投向（皇帝）西吉斯蒙德。国王脸上泛起的红晕揭示了他良心的裁决，即即使是对一个异教徒，他也应该保持信仰。1415年7月，胡斯被烧死，一年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布拉格的杰罗姆也被烧死。

_____

到目前为止，议会一直在积极地、一致地进行着。但政治上的敌意开始加剧了困扰所有改革努力的困难。英国和法国正在处于战争状态。西吉斯蒙德在寻求调停无果的情况下与英国结盟，从而失去了他以前在议会中的〝真正的国际地位〞。

机构内部的运动也同样破坏了其效率。在奥尔良公爵被刺杀后，佩蒂特写了一本为弑君行为辩护的书，他（皇帝）的儿子由于坚持敦促谴责佩蒂特，而失去了对议会的影响力。德艾利成为红衣主教的领袖，并维护他们（主教们）作为罗马教会代表的权威。他试图加快教皇的选举，以免议会的改革精神变成革命。

德国人，以及起初的英国人，受到在比萨发生的事情的警告，急切地希望教会的领导和成员的改革应该在教皇选举之前进行。但他们的行动被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视为怀疑。红衣主教们利用这种民族嫉妒心，迫使自由党从一个妥协走向另一个妥协，直到他们在西吉斯蒙德那里得到了他对新教皇选举的同意。随后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教皇的某些勒索行为，并规定要经常召开大议会。所有其他的改革都由教皇在当时召开的议会的协助下，或在各国代表的帮助下进行。1417年11月11日，奥托-科隆纳被选中，并取名为马丁五世。

这位新教皇很快就表明了他对改革运动的真正态度。

他认可了约翰二十三世统治时期罗马宫廷赖以生存的弊端，并在议会解散前，以与第四届和第五届会议上庄严颁布的协和权威的理论相矛盾的措辞宣称教

皇的至高无上。议会成员对他们长期持续的、显然是徒劳的工作感到疲倦，没有心情抵制教皇的阴谋或傲慢。他们对体现他们一致同意的几项改革的法令感到满意，并投票决定将其余部分留给与几个国家达成的协议来安排。马丁在授予他们全体赦免权后，解散了议会，赦免权一直延续到死亡。这次会议在实现各地有思想的好人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方面的重大失败，证明必须找到一些更彻底的改革手段。

马丁在康斯坦茨会议上把教皇制度从威胁它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现在他承诺要恢复它失去的威信。

他在教皇国（意大利、罗马）恢复了教皇的权威，为教皇国带来了新的繁荣。

他恢复了教皇在各州的权威，给罗马带来了新的繁荣。在法国，他恢复了那些被1418年的皇家法令所剥夺的罗马教廷的特权。但在英国，他对provisors和præmunire的法规（即英国政府通过的限制罗马教会权力的法规）进行了热情的谴责，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情愿地在帕维亚召集了一个总议会，以服从在康斯坦茨通过的法令，然后，把它转移到锡耶纳，并在在场的少数人中煽动分裂，促使它解散了。

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在另一个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被消灭后，大部分波西米亚人都感到非常愤怒。胡斯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其背后是一种混合的民族和宗教感情。胡斯的改革，特别是对圣杯的要求（在教会传统中，在圣餐的管理中长期以来一直不允许教友使用），得到了斯拉夫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德国人的反对。康斯坦茨会议和马丁五世决心用武力镇压这个正在崛起的异端。波西米亚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西吉斯蒙德被分配了征服波西米亚异端的任务，这些异端被称为乌特拉基派（Utraquists），因为他们同时参加了两种形式的圣餐。很快在波希米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党派，该党派在教义上的创新和对罗马教会的反感方面远远超过了乌特拉基派。他们被称为 "泰伯尔派（Taborites）"，拒绝接受圣餐；他们以圣经为唯一的权威，拒绝服从教皇、议会或教父的决定。反对的声音只会使他们的热情变成狂热。在他们最著名的领袖齐斯卡身上，他们找到了一位凶猛而顽强的将军；在他的指导下，胡赛特人的力量变得几乎不可抵挡。1420年，温和的乌特拉奎派、或卡利克斯廷派，在著名的《布拉格四条》中体现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规定，上帝的话语应该自由地传讲，圣餐应该以两种方式进行，牧师和修士应该被剥夺他们的世俗财产，并且应该保持严格的教会纪律。Utraquists和Taborites相互猜疑，只有在发生了危及到双方的危机时才会联合起来。由教会授权和命令进行的十字军东征（针对这些“异端分子”），使波希米亚充满了战争的恐怖；但它们（十字军东征）完全没有制服异端分子；他们放下了自己的恩怨，与共同的敌人对抗。正是由于确信这些（镇压）努力是徒劳的，促使人们敦促马丁召集巴塞尔会议。

在红衣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Julian Cesarini）的建议下，在最后一支十字军的战斗期间，议会决定邀请波希米亚人对现有的分歧进行自由讨论。在此期间，马丁去世，他的继任者尤金尼乌斯四世对议会的这种危险活动感到震惊。他试图促使议会解散，但遭到了塞萨里尼的抵制；议会方面则重申了康斯坦茨的教义，并宣布当时在巴塞尔召开的宗教会议未经其本会同意不得解散、搬迁或中止。为了避免曾经阻碍康斯坦茨会议工作的民族猜忌，议会将自己分成四个委员会，其成员从代表各民族的各级神职人员和法学博士中按同等比例选出。

与波希米亚人的谈判是成功的。首先小心翼翼地获得了对他们人身安全的充分保证，并庄严地保证他们会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听证，代表卡利克斯廷派和

泰伯尔派这两个主要党派的乌特拉奎斯特代表在巴塞尔出现。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以及议会向波西米亚派遣了一个使团，波希米亚人获得了某些让步，这些让步在一份被称为″契约″的文件中列出。在这些文件中，对布拉格的条款进行了修改，以便尽可能地维护教会和等级制度的权威。

这种妥协只能使卡利克斯廷人和泰伯尔派人分裂成相互敌对的阵营。一场武装冲突接踵而至，在这场冲突中，泰伯尔派被彻底征服。此后，权力仍然掌握在乌特拉奎派手中，他们希望在自己的信念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接近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议会因此成功地解决了波希米亚问题，为它赢得了欧洲王公的支持，并使它能够迫使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1433年12月）承认它的合法性。

为实现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联合而进行的谈判使教皇和议会陷入了新的争吵之中。东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愿意与哪一方（议会一方或是教皇一方）进行谈判，哪一方就能更有力地影响西方君主，使其加入对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

巴塞尔的议会主导党派认为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的反谈判是对协约会权威的蔑视。他们废除了所有教皇的保留薪金，以及所有那些在教会任命之前和之后都习惯性支付的费用。他们也不满足于剥夺教皇的最大部分收入。他们改变了教皇的选举方法，使他完全受制于议会的权威。但他们顽固地坚持指定阿维尼翁作为与希腊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举行会议的地点，这使得议会中比较温和的成员发布了一项法令，支持佛罗伦萨或乌迪内。教皇随即将这一分裂现象转化为自己的利益，确认了少数派的法令，并召开了费拉拉会议。

希腊人在摇摆不定之后，教皇的使者赢得了他们（君士坦丁堡）的支持。1438年1月，第一次会议在费拉拉举行，一年后被转移到佛罗伦萨。关于教义分歧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圣灵、以及拉丁人在尼西亚信条中加入 "filioque "的问题，有可能是无休止的。

希腊（君士坦丁堡）皇帝约翰-帕莱奥洛格斯（John Paleologus）急于完成联合，这样他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援助承诺的实现，这些承诺曾使他的希望得到满足。在他的催促下，希腊人（东正教）同意签署教义声明，其措辞足够全面，足以覆盖他们自己的信仰，并同意宣布教皇的首要地位，但不侵犯东方四位元老（教长）的 "所有权利和特权"。尤金尼乌斯则承诺为保卫君士坦丁堡保留两艘大帆船和三百名士兵。这就是君士坦丁堡皇帝所能争取到的、（西方）向他的人民（东正教人民）提供的全部东西；他的人民对他（教皇）对（东）正教的基本抛弃感到愤慨。当东方其余的教派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臣服时，教皇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威望得到了提高。

在费拉拉会议开幕几天后，在达勒芒主持下留在巴塞尔的教士们暂停了尤金尼乌斯的职务，认为他是个懦弱的人，并宣布教皇的管理权归属那里的宗教会议。

欧洲比较强大的国家对议会的这些极端措施以及教皇采取的报复行为表示遗憾。法国的查理五世赶紧采纳了在巴塞尔颁布的改革措施，以使法国教会摆脱教皇的干涉和勒索。因此，在7月，这些法令被体现在布尔格宗教会议上起草的《务实的政策（制裁）》中。教会被宣布为中立。一年后，在美因茨议会上颁布了对巴塞尔改革的接受，其条款与《务实的政策（制裁）》相似。

_____

宗教会议的激进的主张引起了许多教士的流亡，现在罢免了尤金尼乌斯，并把萨瓦公爵阿马德乌斯八世从他舒适的隐居中拉了出来，他们选举他为教皇。这一行为为另一次分裂开辟了道路，它（宗教会议）失去了欧洲的道义支持，几年后与它的教皇（名字叫费利克斯五世）一起沉沦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国王腓特烈三世的软弱和不坚定，以及选举人的自私政策，为成功的阴谋提供了公平的场所。参加谈判的人中最突出的是西尔维乌斯。

他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有修养，有抱负，但不乏放荡不羁。他头脑灵活，能迅速察觉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任何转折，并立即加以利用。他先后依附于几个不同党派的教士，然后成为巴塞尔会议的官员和热心的支持者，最后被任命为腓特烈的秘书之一。他被派往罗马担任特使，与尤金尼乌斯和解，并承诺成为教皇的重要朋友，就像他以前是一个积极和可怕的敌人一样。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作为对国家教会权利的模糊确认的回报，1447年2月7日，德国恢复了对垂死教皇的服从。尼古拉五世毫不迟疑地收获了这个胜利的果实。

《维也纳协约》放弃了巴塞尔的改革，几乎没有给德国教会留下马丁在康斯坦茨授予它的那些自由。当1450年禧年到来时，教皇看到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涌向罗马，他可以感激地反思，教皇制度在分裂和改革的国家中幸存下来，现在它似乎正在恢复它在欧洲的古老地位和影响。尼古拉的目的是给教皇的权力以力量和稳定。他在教会的土地上建立了堡垒，加强了首都的城墙。他不仅用宏伟的建筑装饰了罗马，而且还装饰了其他城市。他收集了大量的手稿，并因此奠定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的赞助人，他与科西莫-德-美第奇和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竞争。按照他的计划，"罗马要成为欧洲的文化传教士，因此要解除猜疑，恢复威信"。但是，他为之做了这么多工作的罗马，几乎爆发了对他的公开叛乱。在他教皇任期的最后两年里，他

对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忧郁反思，以及他自己试图联合西方对土耳其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无效尝试，使他的教皇生涯受到了影响。

==========

第三章

五十年代后半期的教会和教皇制度。1455-1458.

德国人倾向于把十字军东征看作是充实罗马宫廷国库的一个借口。他们问道："当首席教皇把圣彼得的财富花在石头和灰泥上时，我们为什么要抢夺我们的孩子的面包，以便与土耳其人作战？"

他们的热情并没有因为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三世的呼吁而被激发出来。在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三世的脑海中，有一定程度的古老的十字军热忱，与对他侄子们的盲目喜爱混在一起。在这两种对立的冲动中，第一种冲动对异教徒的伤害不大，而第二种冲动则通过将罗德里戈-博尔基亚，即未来的亚历山大六世提升到红衣主教的位置，在教会中造成了巨大的祸害。

自从尤金尼乌斯死后，埃尼阿斯-西尔维乌斯就一直在向德国的王公贵族们兜售诱饵，让他们成为罗马教廷的支持者。他已经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只是保留了他对文学的喜爱。他接受了命令，被任命为主教，然后又成为红衣主教。现在，在教皇卡利克斯-图斯去世后，他被提升到了因此而空缺的职位。作为教皇庇护二世，他摒弃了他自己从前作为巴塞尔宗教议会的成员、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Æneas Sylvius）曾经为"协和权威"所做的辩护，并对任何妄想从罗马教皇那里向未来的会议提出上诉的人发出了教会的诅咒。

庇护二世拒绝将教皇制度卷入欧洲的王朝争斗中。他奉行安全的政策，承认那些实际掌握权力的人是君主，同时他保留对要求者的权利进行裁决。但这一做法并不能满足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他废除了（限制教皇权力的）《务实的政策（制裁）》，希望庇护二世能帮助他为安茹家族赢得那不勒斯。路易发现自己被骗了，于是通过重新制定条款来报复教皇。

没有人比庇护二世更清楚地看到，突厥人（或称土耳其人）的军事力量威胁着欧洲的安全。但促使他推动十字军东征的并不仅仅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精神。他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来恢复教皇的威望，从而能够压倒波西米亚国王波迪布拉德，后者曾抵制他破坏（限制教皇权力的）“协和契约”的企图。当所有其他资源都无济于事时，他决定，尽管他很虚弱、但他要让自己成为一支十字军的领袖。然而，他只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到达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并注视着他的威尼斯盟友的舰队。

民族的争斗和王公们的野心挫败了教皇将欧洲塑造成一个对抗共同敌人（土耳其人）的联盟的每一次尝试。这些反复的失败表明，教皇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道德力量已经无可救药地被削弱了。罗马宫廷在认识到其地位的日益弱化方面并不缓慢。但是，即使是像保罗二世这样正直的教皇，也无法为其争取到什么好处。

在意大利，保罗二世试图促进整个教皇领地的秩序，并远离周围王公的阴谋。他热爱辉煌，但拒绝靠敲诈勒索来发展。他希望与所有人和平相处，但他毫不犹豫地让欧洲陷入战争，以压倒异端的波西米亚国王。

西克斯图斯四世恢复了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但他了解到宗教感情和动机对人们的心灵没有什么影响。

他觉得他再也不能指望欧洲各国的服从，甚至也不能指望他们保护自己（教皇)不受那些不断威胁教皇国的不安分的冒险家和野心勃勃的王公们的侵害。他试图给教皇制度带来力量，不是通过改革它，从而恢复其古老的道德力量，而是通过给它一个与意大利各公国相近的地位，并通过用土地和其他财产充实他的亲属，使他们能够支持它。他激烈的精力不容许任何反对。当美第奇家族为他（教皇）的侄子吉罗拉莫-瑞阿里奥的扩张设置障碍时，他急于推翻他们（美第奇家族），以至于在谴责危害朱利安和洛伦佐生命的阴谋时只发出了微弱的抗议。朱利安在庆典期间被暗杀在祭坛的台阶上。参与其中的人在佛罗伦萨人手中遭到了即决的报复。

教皇立即将洛伦佐逐出教会，将该城置于禁令之下，并与那不勒斯国王一起向它开战。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公民（美第奇家族）的外交手段很快使教皇西克斯图斯失去了他的皇家盟友；是这一事件，加上1480年土耳其人攻占奥特朗托，迫使他接受佛罗伦萨仅仅是形式上的屈服。为了给他的侄子争取到费拉拉城，他首先与威尼斯联合起来对其公爵开战；但是，由于意大利联盟的持续敌意威胁到他的危险，他抛弃了他的威尼斯盟友，并将他们开除了教会，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进行和平。人们对这一行为并不重视，而教皇也未能在随后的对抗中获得任何好处，这加速了他的死亡。

继任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年，在与那不勒斯进行了一场毫无结果的战争后，与洛伦佐-德-美第奇结盟，并听从他的建议，赢得了〞意大利和平的永久守护者〞的称号。他每年都收到土耳其苏丹的贡品，因为他把自己的兄弟和对手作为囚犯关押在教皇的宫廷里，而没有派他率领部队去对付土耳其人，即基督教的敌人。英诺森带着父母的热忱，为他的孩子们寻找好的婚姻对象，并使梵蒂冈的大厅里响起了不习惯的庆祝活动的声音。

与此同时，西方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在英国，玫瑰战争随着亨利七世的登基而结束。

兰开斯特的亨利七世登基，并与约克的伊丽莎白结婚。

法国的查理七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合，王室对最后一个大封建王朝的权威已经确立。

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继承人在1469年通过婚姻契约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王国通过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得到了巩固。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衣主教博尔基亚-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名义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新任教皇奉行与西克斯图斯四世相同的政策，但更有胆识和技巧，而且运气也更好。在他的影响下，罗马教廷降到了其他意大利各公国的水平，并显示出它准备像他们（意大利各公国的王公们）一样，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和博尔基亚家族的高升，甚至牺牲意大利的福利。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亚历山大并不畏惧任何形式的外交阴谋，也不畏惧战争，甚至不畏惧暗杀。他比对手的各王公们更强大，因为他可以挥舞那些尚未完全钝化的开除教籍和禁锢的精神武器。他在统治之初就严厉镇压了在他软弱的前任领导下在罗马频繁发生的犯罪事件。他与那不勒斯国王结成紧密联盟，共同抵御法国的查理八世，后者作为安茹家族的继承人正向意大利进发，以寻求那不勒斯的王位。他（教皇）恳求土耳其的苏丹向他提供援助。但是，尽管他做出了种种努力，查尔斯还是到处取得了胜利。佛罗伦萨向他敞开大门，伟大的佛罗伦萨传教士萨沃纳罗拉在他身上看到了意大利的拯救者和教会的改革者。

教皇在风暴面前低头，但只是一瞬间。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由于害怕，法国君主不得不放弃他新赢得的王国。在他（教皇）的影响下，仍然鼓励佛罗伦萨维持与法国的条约的萨沃纳罗拉，被当作异教徒送上了绞刑架。亚历山大（教皇）并没有忘记他的孩子。他们有的获得了王公的头衔和领地，有的像凯撒红衣主教那样获得了丰富的福利。

教皇曾努力摧毁法国在那不勒斯的势力；现在，他在1499年帮助路易十二在米兰建立了势力。他的儿子凯撒放弃了他的教会地位，得到了一个法国头衔和一位法国公主的青睐。亚历山大抓住这个机会，将罗马涅各城市的小暴君驱逐出去，并将其整合为一个大公国，由他的儿子凯撒作为公爵直接从罗马教廷手中接管。没有人可以插手。米兰已经倒在了路易的怀抱中。威尼斯需要教皇的帮助来赶回土耳其人。在教皇的支持下，那不勒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被瓜分。

亚历山大（教皇）似乎已经达到了他所有目标的终点，但他却因发烧而死亡。他性格的卑劣，他的宫廷的淫乱，以及使罗马充满恐惧的神秘谋杀案，为他的敌人的故事提供了素材，这些故事把他以及他的孩子卢克丽霞和凯撒描绘成不公正的怪物。无疑，教皇和他的儿子已经够坏的了；但卢克丽霞可能是她父亲阴谋的无辜受害者，因为从她与费拉拉公爵结婚时起，她就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

亚历山大（教皇）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放在意大利政治上。凭借着从彼得那里得到的对使徒教区的权利，他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赠予了"纯粹的自由"，使之拥有所有即将被发现的（海外）土地。

西班牙拥有距亚速尔群岛100里格的子午线以西的所有领土，而葡萄牙拥有该线以东的所有领土。之后，两位国王同意将分界线定在距佛得角群岛三百七

十里的地方。

亚历山大教皇死后不久，他为儿子在罗马涅建立的公国就瓦解了。凯撒的利益被庇护三世（教皇）看得很淡，他无力阻止流亡的诸侯返回，因为他们（诸侯）得到了威尼斯的武器支持。庇护（教皇）的早逝使尤利乌斯二世，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尽管经历了明显的命运变迁，但他（尤利乌斯教皇）的精神仍未被驯服。他决心将教会国家从小暴君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并从威尼斯的侵占中拯救出来。"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为了让他的儿子致富而无知地做的事情，尤利乌斯二世将为了教会的荣耀而坚定地去做。"

他（教皇）首先占有了那些仍然忠于凯撒的城堡，并通过与法国和德国的谈判，吓得威尼斯放弃了除里米尼和法恩扎以外的所有其他城镇。然后他（教皇）亲自带队远征，推翻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的领主。威尼斯的力量仍然威胁着他计划的成功。为了永远摧毁其（威尼斯力量）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地位，他（教皇）推动了康布雷联盟的成立。在这个联盟中，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与教皇联合起来，共同瓜分威尼斯的领地。

尤利乌斯教皇在将威尼斯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不听任何不涉及绝对服从的提议。他不仅迫使他们（威尼斯人）放弃了他们所拥有的罗马涅的城镇，而且还交出了他们宝贵的教会特权和他们在威尼斯湾的航行权。既然他（教皇）已经获得了他的目标，他就试图阻止法国人的前进步伐。

他（教皇）无视法国的要求，试图将西班牙的斐迪南与联盟分开，让他拥有那不勒斯王国。他向路易十二的盟友费拉拉公爵宣战，并在隆冬时节率军攻打他的一个要塞米兰多拉。

但是，教皇在没有得到帮助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国王。他不得不从他在罗马涅的来之不易的财产中撤退。一些心怀不满的红衣主教站到了法国一边，并发出了在比萨召开会议的传票。尤利乌斯（教皇）在拉特兰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从而剥夺了这一挑衅的效力。

这两个会议（比萨会议与拉特兰会议）都不过是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战争的一个阶段。教皇（尤利乌斯）外交的最胜利的结果是，1511年，尤利乌斯、威尼斯和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英国之间形成了神圣的联盟，以恢复教会的财产。然而，直到德国的马克西米利安加入联盟后，教皇才为推翻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势力而欢欣鼓舞。

佛罗伦萨仍然保持着与法国的联盟关系。尤利乌斯教皇决心通过恢复在查理八世远征时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来打破这种联系。他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取得了这一结果。教皇顽固地决定不放过他计划中的任何部分，这使他使意大利受到一个又一个外国侵略者的影响。尤利乌斯作为艺术的赞助人，其成就不亚于作为一个战士的影响。他奠定了圣彼得教堂的基础。他召集米开朗基罗用壁画装饰西斯廷教堂，召集拉斐尔用美丽的设计装饰梵蒂冈的墙壁。

尤利乌斯死后，罗马人为他哀悼，因为他 "扩大了使徒教会，推翻了暴君，从法国人手中拯救了意大利"。然而，红衣主教中的主导党派对他的激烈活动，对他的暴力和好战的脾气感到厌倦，选择了美第奇家族、洛伦佐的儿子约翰-德-美第奇作为继任者，他性格和善，更喜欢文学、艺术和音乐，而不是政治阴谋和战争。

利奥十世在13岁时就被任命为主教，三十七岁时成为教皇。他没有坠入他的几位前任堕落的令人厌恶的恶习，但他对世俗的研究、打猎、比武和庆典的

投入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萨尔皮在他的《特伦特会议史》中，在赞扬了利奥的学识、品味和宽宏大量之后，诙谐地指出，″如果他能将这些品质与宗教事务的一些知识结合起来，并更倾向于虔诚，他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教皇，但他对这两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

尽管教皇（利奥十世）倾向于和平，但他发现自己不仅不得不诉诸于外交，而且还不得不诉诸于武器，以保护他的前任所取得的成果。法国人在意大利北部的失败，以及英国的亨利七世对法国的成功入侵，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不再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他（路易）是一个君主，他的安全对于维持欧洲各国之间的适当权力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利奥准备接受召集分裂会议的（法国党的）红衣主教的服从，并与试图推翻尤利乌斯的法国君主和解。

路易的死使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弗朗西斯一世登上了王位。

教皇试图通过与法国王室结成婚姻联盟来增加其亲属的财富。然而，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加入了一个欧洲联盟，其真正目的是挫败法国国王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为了赢得亨利八世的支持，他把沃尔西提升到了红衣主教的位置。弗朗西斯在马里尼亚诺的胜利迫使利奥同意与他签订条约，甚至不惜牺牲尤利乌斯的英勇赢得的罗马涅北部的那些城市。但教皇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放弃 （法国主教们的）″务实的政策（制裁） ″的机会，以前的教皇曾为废除该制裁进行了徒劳的努力。这似乎是教皇制度的一个巨大胜利。

但实际上，虽然高卢教会（法国教会）被剥夺了自由，但教皇只获得了年金--大福利院第一年的收入，而提名这些职位的权力却落到了（法国）国王手中。此外，为使议会接受新协议所需的胁迫，以及它在整个法国引起的愤慨，证明它并没有表明国家情绪的变化。利奥教皇虽然与（法国）弗朗西斯国王

和平相处，但却毫不犹豫地与他（弗朗西斯）的敌人进行谈判。他的一句话是″当你与任何一个君王达成联盟时，你不应该因此而停止与他的对手的交往″。欧洲的君主们并没有因为他（教皇）和蔼可亲的两面派而感到不安；但他（教皇）却希望从政治局势的每一次变化中获得一些好处；他发现自己的国际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而他自己也不得不同意那些很少考虑他的利益的安排。根据教皇的声明，拉特兰会议已经为基督教世界的福祉做了所有必要的工作，但在1517年，″在威胁到教会组织的最大爆发的边缘″，它（拉特兰会议）被解散了。

==========

第四章

改革前的改革者

最后的主义

在十四世纪末之前，学术运动几乎耗尽了它的力量。它被堕落的回声所破坏，特别是被 ″唯名论 ″的重新出现所破坏，——特别是被所有学者中最敏锐的一位，奥卡姆的威尔-伊姆、以及他的弟子们所破坏。

奥卡姆学派教导说，普通名词，即类的名称，就像代数的符号一样。它们是指称个体的一种方便方式；存在的，只有个体。一般的概念和它的名字都是有代表性的虚构；而这种不精确的双重来源将形而上学或神学科学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宗教的真理是由上帝在《圣经》和教会中直接启示的。它们远不能被证明，而是与我们所谓的科学的逻辑结论直接相抵触。因此，旨在通过

哲学来验证信条的学术主义的基础被砍掉了。奥卡姆对教皇无误的主张以及教皇对国王和世俗事务的权力的学说进行了攻击，为未来做了更多工作。他是他所属的方济各会的拥护者，在反对教皇的贫困规则的斗争中，他是方济各会的支持者。他是一群人的精神支柱，其中一个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他们在慕尼黑受到保护，并在巴伐利亚的路易与阿维尼翁教皇的冲突中站在他（路易）一边。奥卡姆断言，即使是一个总委员会（总理事会）也可能犯错；如果教会的利益需要，可以放弃教会等级制度；国王拥有教会人员的所有权力，除了因授职而产生的权力；如果紧急情况需要，皇帝可以任命或罢免教皇。

在他的晚年，奥卡姆和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之间达成了部分和解；但不知道他是否甚至收回了上述这个最后一个提议（即主张皇帝可以任命或罢免教皇）；教皇要求将其作为给予他赦免的条件（即，若他不放弃该提议，就得不到教皇的赦免）。奥卡姆的影响被威克里夫感受到了，并且在改革中的高卢（法国）宗教会议领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还在扩大。

路德是奥卡姆的学生，称赞他是最聪明的学者，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他对主的圣餐的概念--奥卡姆提出的概念是一种合理的观点，但它提供了一个信仰和理性可能不一致的例子。尽管奥卡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他是一个有意识的、正统的教会教条的信徒。他的整个讨论方法是学术性的，在神学方面，他在以前存在的托马斯派和斯科特派之外，又增加了第三派，即奥卡姆派。他被他的朋友们尊称为 ″最博学的人″、″无敌的博士 ″等等。

托马斯-布拉德文，在他去世前的短时间内，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是一位能干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以下立场辩护：所有人类的圣洁完全是神恩的结果。作为这一观点的对应物，他主张预定论。他被称为 ″深奥博士″。威克里夫是那些对布拉德文给予高度尊重的人之一。

十五世纪后半叶，奥卡姆的逻辑思想被加布里埃尔-比尔灌输，他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 ″最后一个学者″,而是坚持学术方法的非常杰出的人中的最后一个。关于教皇的权力，他坚持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的立场。

在介绍教皇的历史时,我们注意到某些宗教运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类型对立。其中较早的运动的目的是抛开深受世俗和不道德之害的神职人员的独占统治。出现的教派中最突出的是阿尔比根派，他们的教义带有与古代摩尼教相似的异端邪说，但其生活的特点是自我牺牲的奉献和对道德纯洁的热忱。同样的总体运动产生了瓦尔德人，这是一个没有摩尼教教义污点的党派，他们否认神职人员有传授福音的专属权利，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在人们中间燃起阅读圣经的愿望。圣方济各会的影响，以及被称为Bege和Béguines的祈祷者队伍的影响也趋向于同一方向。

高卢（即法国）神学家发起了一场不同类型的教育运动（以泛神主义为主要特征）。他们旨在取代教皇的等级制度概念，认为教会的权力存在于普世教会之中。但是，除了教派，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对中世纪事物秩序的极度不满，以及一种深深的渴望，尽管它与无知和迷信混在一起。

还有一些保守的神学家，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改革教会的管理和神职人员的道德，还有一些人被恰当地称为激进的改革者--他们在本质上预见了“新教运动”。虽然他们为引进更开明的教义和更纯洁的生活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但当改革的时机完全到来时，他们为更成功的努力准备了道路。

在宗教改革之前，所有这些改革者中最杰出的是约翰-威克里夫。他出生于

1324年。他早期在牛津大学赢得了荣誉，在大学里担任了几个荣誉职位后，成为神学博士。在他担任坎特伯雷堂的监督时，他是世俗神职人员中抵御有志于此的修行者的侵略的领导者（即主张，基督教人士应当面向真实的世界，面向福音的传播，而不是刻意地做苦行僧，或为了权力而在教会中争权夺利）--但最后证明是不成功的。在他的著作中，他多次抨击了修士们的做法，以及作为他们社团基础的优秀贫困学说（即以贫困为荣的苦行僧学说）。他以公民和王权的拥护者的身份站出来反对教皇的侵占。通过这种态度，他不仅向议会宣称自己是议会政策的重要支持者，而且还获得了国王的顾问、大贵族们的尊重和友谊，如高特的约翰，他们保护他不受罗马教会等级制度的攻击。因此，威克里夫没有受到伤害，尽管他大胆地教导说，教皇的法令除非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效力；而行使“捆绑和释放”的权力，除非符合基督的判断，否则就没有效力。他敦促禁止神职人员干涉民政事务和世俗权力。尽管有教会人士的努力，但是，他的伦理学说，即持有财产和统治的权利因不服从上帝的意志而应被剥夺（换言之，威克里夫主张，教会神职人员如果违背上帝的意志，那么，他们就应该被剥夺财产以及统治教会的权力），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可以肯定的是，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推测性的原则来主张。但是，当他抨击变质学说，即认为虽然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真的存在，但（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却没有变化时，他就失去了许多迄今为止对他有好感的人的热烈支持。他的教导在大学里受到谴责和压制，但他被允许在他的拉特沃思教区不受干扰地结束他的日子。

威克里夫对神职人员的精神统治的攻击并不限于针对——圣职者权力的主要支持，即（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的）变身的奇迹（换言之，在罗马教会中的圣职者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只有在神职人员主持的圣餐之礼中，教会成员才能够得到基督所舍的身体与所流的宝血的祝福）。他宣称，在原始教会中，只有两种神职人员，并反对神职的多重等级--教皇、红衣主教、教长、修士、大主教等的存在。他反对耳语忏悔（告解）的必要性，并怀疑坚信礼

和极度抹油施洗仪式的圣经依据。他还主张采用更简单的教会崇拜形式。神职人员的无能和对教区的忽视导致他派出传教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有需要的地方为传播福音而工作。

他对英国人民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圣经》，并公开捍卫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的权利。正是威克里夫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关系，使他能够在几乎所有预示了新教运动的特征上攻击中世纪和教皇教会，而又能活到最后。他的死亡似乎并没有一下子终止他所开创的运动的力量。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洛拉德派（歌唱者），他们大胆地向议会请愿，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激起了教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镇压他们。然而，直到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统治时期，国王与神职人员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才开始对他们进行迫害。洛拉德党逐渐瓦解；其创始人的原则除了在穷人和不知名的阶级中获得少数追随者，他们对社会和工业平等的渴望似乎得到了支持。

威克里夫对《圣经》的翻译是他为英国人民所做的最持久的工作。他的哲学和教义学说对波西米亚的宗教历史产生了影响，也许是间接的，但也是重要的。

_____

在瓦尔德豪森的康拉德的领导下，一场运动已经在波希米亚开始了。

他（康拉德）被（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四世皇帝从奥斯提亚召来协助神职人员的改革。康拉德火热的热情为德国人民做了什么，米利茨的神秘传教就为奴隶们做了什么。他们抨击了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恶习。他们都没有被神职人员的敌意，甚至没有被迫害的威胁所阻止。他们所宣扬的思想在波希米亚的改革者那里（亚诺的马蒂亚斯）得到了更系统的阐述。

相对于庞大的仪式和法规体系，他（亚诺的马蒂亚斯）把《圣经》和信徒心中的圣灵作为生活准则的充分保障。波希米亚改革运动很快就获得了全国性的甚至是欧洲性的意义。威克里夫的著作被带到了布拉格大学，并在那里找到了热情的阐释者。在这个崛起的党派的领导下，由于他们对教会净化的共同热忱，约翰胡斯被吸引到英国改革者身边。

1402年，胡斯被任命在新的伯利恒教堂讲道；该教堂的建立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够听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授上帝的话语。改革者的努力赢得了波希米亚人的同情，更因为改革者受到了德国人的反对。他们的事业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文泽尔的支持，他对帝国王位的要求使他与波希米亚的即有天主教教会等级制度对立起来。两党（改革者与天主教之间）的较量导致了大学章程的改变，使本地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因此，以前拥有控制权的德国学生纷纷离开。这次大逃亡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莱比锡大学。胡斯现在被任命为布拉格的校长，改革党的地位得到了保证。波希米亚的教会等级制度在教皇权威的支持下，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胡斯拒绝停止在小教堂布道，并向消息灵通的教皇发出呼吁。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不公正的赎罪券销售行为，并被教皇逐出教会。布拉格被置于禁令之下。在波希米亚国王的劝说下，他现在开始流亡，直到恢复和平。在他安全的隐居地，他向他的人民发出了信件，并为教会撰写了文章。

胡斯在神学上的敏锐度不如威克里夫。他同意这位英国改革家的观点，主张哲学现实主义和预定论。与他（威克里夫）不同的是，他至始至终都是（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变为基督的真实身体和血）“变体学说”的信仰者。他是一个清晰而狂热的传教士。他的言语和生活都表现出对实际圣洁的发自内心的热忱。他对神职人员的职能和职责提出了崇高的概念，并将圣经凌驾于教会的教条和法令之上。在这些特点上，胡斯是杰出的教会改革家先驱。在

流亡近两年后，他欣然接受了西吉斯蒙德的邀请，出席了康斯坦茨会议，并在那里、在大公教会的代表面前为自己和改革的事业辩护。就在康斯坦茨，他于1415年7月6日遇害，死因如前所述。胡斯的死刑，以及一年后与他一样具有改革精神的布拉格的杰罗姆的死刑，激起了波希米亚人的心，使他们更加热切和坚定地倡导改革。这一运动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了多年的重要地位，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威克里夫和胡斯更不出名，他们攻击了中世纪基督教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

在这些人中，有约翰韦塞尔（Wessel），他是几所著名大学的神学教师，他清楚而认真地阐述了唯有信心才能得救的教义，并反对所谓的主教和教皇的无误性。他宣布了许多后来成为改革者基本信条的信仰，以至于路德宣称，如果他早一点阅读韦塞尔的作品，他的敌人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路德的每一样东西都来自于它们（韦塞尔的作品）。

这些人中的另一个是杰罗姆·萨沃纳罗拉，他对教义改革的兴趣远不及对道德的净化。他出生在费拉拉，注定要学习医学，但他对身边随处可见的邪恶感到厌恶和震惊，于是进入多米尼克会（译者注，或译为道明会）。他于1482年前往佛罗伦萨，首次尝试在那里传教，但对该城奢华和爱好享乐的居民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他并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吓倒。随着他对社会腐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作为正义和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布道者站了出来。他不再使用学校的推理，而是像古代的先知一样，以至高无上的名义进行论述。佛罗伦萨人起初不愿意听他的演讲，但最后却在大教堂里充满了敬畏的听众。

1491年，萨沃纳罗拉被任命为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他的影响很快就对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威胁。他对在他们统治下盛行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最尖锐的谴责。然而，（美第奇家族的族长）洛伦佐对他很友善，把他叫到自己的病床前，接受他（萨沃纳罗拉）的劝告和告诫，并接受他的祈祷，使他感到振奋。洛伦佐去世后，萨沃纳罗拉在城市事务中迅速获得了统治性的影响。他成为新成立的托斯卡纳的多米尼克会的总主教。

他对即将到来的审判的预言在法国人的到来中得到了迅速的实现。通过他对国王查理七世的个人尊重，甚至是敬畏，他能够加速这个征服者的离开，他（法国国王查理）的持续存在威胁着城市的安全。现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被推翻了，他敦促人民通过一个民主的宪法。佛罗伦萨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狂欢节不再是无法无天和不道德的场面。沿着街道，孩子们带着橄榄枝，唱着神圣的歌曲游行。然而，尽管萨沃纳罗拉似乎在这个城市里掀起了一场宗教和道德革命，但他却为自己的毁灭准备了道路。他的预言性热情在他周围发生的政治变化中看到了上帝的旨意。他恳切地支持一项政策，而这项政策为他树敌，其中就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教皇发现他无法用红衣主教的帽子来贿赂这位强大的传教士，也无法通过反复劝告使他保持沉默时，就把他开除出教会了。

萨沃纳罗拉宣布这一驱逐令无效，因为它与上帝的智慧和公正的法律相抵触。他的敌人最终成功地使他在人民中一度失去信誉，并促使他被捕。在狱中，他忙着写了一篇关于诗篇第五十一篇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了关于公义的观点，与后来的改革者所阐述的观点如此相似，以至于路德在发表他（萨沃纳罗拉）的这篇文章时还写了一篇赞美的序言。他很快就被送上法庭并被判处死刑。1498年5月23日，他和他的两个追随者一起被绞死，然后被烧死，骨灰被扔进阿诺河。

_____

还有另一类人为即将到来的新教革命做了准备，尽管是不自觉地和间接的。

这些人是神秘主义者，他们虽然在教会中任职，但却反对盛行的教条式的虔诚，而推崇更内在、更精神的宗教。艾克哈特（1260-1329）将吸收上帝的思想带到了泛神论的边缘。鲁伊斯布鲁克（Ruysbroeck）、格鲁特（Groot）和苏索（Suso），都以自己的方式，将感觉凌驾于知识之上。尽管最优秀的学者们也有类似的倾向，但随着学者（学术）神学的衰落，神秘主义呈现出更独特的形式。自称 "上帝之友 "的社团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以及荷兰发展起来。他们中最著名的传教士是约翰-托勒。弗雷姆也是这一神秘学派的成员，他出了一本小书，叫做 "德国神学"。马丁路德在1516年重新出版了《德国神学》这本书。他（马丁路德）对其中的思想印象深刻，并说他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关于上帝、基督、人和万物的教导，比从除《圣经》和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之外的任何其他书籍中得到的都多。另一本著名的书,即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写的《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学派的特有精神，并在虔诚的书籍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传播和影响。

其他更间接但同样强大的力量，在迎来新的文明和净化的基督信仰方面给予了帮助。民族语言的发展和白话文学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对人的思想控制的衰退。现在开始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出现的许多著作都尖锐地谴责了神职人员的恶行和教会的腐败。其中最有趣的是威廉-朗格朗（William Langland）在1362年左右写的 "皮尔斯的犁人的愿景"。在这首诗中，他断言人类的灾难是由于神职人员，特别是修行者的世俗和富贵造成的。他认为，理性和良知才是灵魂的真正向导，而正直的生活比相信教皇的宽恕更好。与他同时代的乔叟，英国早期最伟大的诗人，在他对修士和高级神职人员的世俗侵占的影射中，让人想起了威克里夫。在意大利，但丁和彼特拉克谴责教

皇的恶行和暴政，而薄伽丘在他的幽默故事中对下层神职人员进行了无限制的嘲弄。同时，圣职者的理论没有被触及，那些对教皇和教士篡夺世俗权力进行严厉谴责的人仍然在他们（神职人员们）的精神权威面前屈服。

同一时期还见证了学习的复兴，这是一个对塑造新时代有着不可估量影响的事件。这就是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的重生--驱散了无知的迷雾、以及与之相关的迷信和偏执。意大利是这场伟大的知识运动的源头。学者们在她的学校里接受了培训，并被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热情所鼓舞，并在西方其他国家推动了这场运动。

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是第一个向人们展示研究古典作家的乐趣的人，并使他们（当时的人们）的头脑充满了对古代的热情。在下个世纪的前半期，西方的修道院被仔细搜寻，以寻找古代诗人、哲学家和演说家的手稿。

学者们并没有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拉丁文上。在14世纪的最后几年，希腊人Chrysoloras被说服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授课。学生们访问了希腊，并带着手稿回来，这些手稿经常是那些在意大利早已被遗忘的作者（希腊古典作家）的名字。

随着威胁东方帝国残余的土耳其人（突厥人，或奥斯曼帝国）的危险增加，希腊学者将目光转向西方，并开始在意大利的新学问的好奇和热心的信徒中寻求和平和好客热情的接待，并从东方流亡到西方来。这些希腊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贝萨里昂。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刺激了学问家和他们的财宝（珍贵书籍）的迁移。现在，人们对属于古代的一切都充满了热情，变得无所顾忌。王公们争

相成为新学问的赞助人。他们在收集手稿和建立图书馆方面花费了大笔资金。教皇尼古拉五世热切地参与了这场慷慨的竞争。

正当人们对书籍印刷的兴趣达到顶峰的时候，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这门艺术很快就达到了高度的完美，特别是在威尼斯的阿尔丁印刷机——阿尔杜斯-米努提斯的印刷机。通过印刷机，——用于指导古典学问的字典和语法、版本和评论，以及古代著作本身的副本，以一种真正奇妙的速度繁殖，并散布到很远很远。

这一运动对人类后来的宗教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人们的眼前展开了新的思想的领域。通过微弱和局部的瞥见，它为他们（当时的世人）打开了精神经文的清晰视野，为他们打开了对过去有天赋的国家的生活的清晰视野。它向他们展示了文化，使之（文艺复兴）成为最活跃的人长期以来几乎只对宗教感兴趣的一个对手（即，从前文化人士们只对宗教感兴趣，而现在他们很多人的兴趣转向了文艺复兴）。古代智力生活的产物与基督教接触，不是以其（基督教）原始的和更纯粹的形式，而是以中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迷信为基础。

在这种（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与中世纪的宗教形式主义、宗教迷信之间的）对比中，有些人产生了怀疑主义和冷漠，有些人则对宗教的基本真理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但也有其他更明显和积极的后果。（早期基督教历史上的）教父们的著作被从蒙昧中带出来，与教会的信条进行比较。旧约和新约的经文被用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研究。这种对基督教教义来源的重新认识，必须清楚地揭示出福音的原生单纯性与自称建立在它之上的（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会体系之间的差异。随之而来的广泛的知识热潮不可能让拉丁基督教（即

天主教）的结构不受干扰。

学术主义正摇摇欲坠。新学问的学者们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嘲笑学术派神学家们的狭隘、无休止的争论和过度的微妙，以及他们不加批判的方法和对历史的无知。学者们如此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现在被读成了原文，老一辈神学家的错误翻译和错误解释被揭露和嘲弄。然而，事实上，学术主义已经走过了它的历程，失去了它的活力。在奥卡姆和他的学派恢复了唯名论之后，不再可能仅仅通过发展理性的内容来寻求真理；有必要去研究自然和内在经验的事实。在为怀疑主义打开大门的同时，也为更有活力的信仰准备了道路。

但是，尽管学术理论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仍然得到了有力的捍卫，特别是在巴黎和科隆的大学。然而，有几所大学--尤其是海德堡和图宾根--率先接受了新的研究。1502年，撒克逊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在维滕贝格组织了一所大学，它成为古典学习和圣经研究的所在地。它注定很快会成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特别是在德国，学习的复兴具有与意大利不同的特点。在意大利，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宗教色彩、而更多的是思想投机性的，甚至是怀疑性的。在意大利的学者们组成了自己的学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立的学院。其负责人是马西利奥-菲奇诺，他是柏拉图的热心学生和翻译者，同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牧师。他写下了博学的神学作品，其中一篇是关于灵魂的不朽。他试图在他最喜爱的哲学家的教义中找到基督教教义的预示。

然而，尽管他经常将柏拉图式的幻想与基督教的教义混为一谈，但他完全不同情许多人文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新学问的爱好者们的——对教会和基督

教的冷漠甚至怀疑态度。 萨沃纳罗拉正是针对那些不信教的倾向，写了他的《十字架的胜利》。

最引人注目的是，庞波纽斯-拉图斯和他的罗马学院是那种广泛盛行的精神的一个例子。他对宗教漠不关心，鄙视神职人员。他只爱罗马和其古代宏伟的遗迹。他和他的同伴们使用罗马人的名字，并把异教神职人员的头衔互相套用。虽然人文主义者中很少有人像庞波纽斯那样把他们对古代的偶像崇拜推到很重要的地步，但他们（人文主义者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一种伊壁鸠鲁式的不忠所感染，这是从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的对话中得到的。他们倾向于怀疑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甚至是怀疑自然宗教的基本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拉特兰会议（1512-1517年）认为自己需要确认灵魂的不朽性和个体性。即使是那些相信教会教义的人，也喜欢把异教古代的英雄作为美德的典范或智慧的导师，显然是把他们提升到先知和使徒的地位，甚至高于他们（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伦理精神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马基雅维利创作的《君王》；在这部作品中，这位著名的意大利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应指导统治者管理国家事务的格言。他所倡导的原则与基督教道德的本质相悖。每一种手段，甚至是谎言和谋杀，如果适合于实现所考虑的目标，都被认为是值得的。这本书只是体现了这个时代最聪明、最娴熟的政治家所诠释的政治道德。它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谴责，尽管后世的所谓 ″马基雅弗利主义 ″的称谓，适用于歪曲和奸诈的外交艺术。

在德国，新学问从一开始就在宗教精神中得到了培养。人们渴望研究（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的）教父们的著作和研究圣经，这种愿望在德国主要不是出于

知识上的好奇心。约翰-鲁赫林(1455-1522)，一个真诚的宗教人士，曾在多所大学学习和讲学，在佛罗伦萨与诗人波利蒂安、哲学家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交往，是公认的德国人文主义者的领袖。他的主要作品是一部《希伯来语的语法》。他对希伯来语很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古代经文的语言，而且还因为它是犹太教的卡巴拉语言。他与皮科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可以找到基督教教义的证据和说明。

科隆的牧师们害怕潜伏在卡巴拉神秘传说中的神学错误，他们在皈依的犹太人普费康（Pfefferkorn）的煽动下，以无知的牧师胡格斯特拉顿（Hoogstraten）为首，指控鲁赫林为异端。对他的指控是，他不愿意加入他们的计划，即通过焚烧除《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语文献，来摧毁所有不包含在《圣经》中的犹太教义。在随后发生的激烈冲突中，人文主义者团结在他们的领袖（鲁赫林）周围。鲁赫林得到了西金的弗朗西斯和乌尔里希-冯-胡滕等骑士的有效支持；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也很愿意用他们的剑为他辩护。有一群拉丁诗人，他们的中心在埃尔富特，与穆蒂亚努斯（Mutianus）关系密切；他（穆蒂亚努斯）是哥达的教士，一个有修养的人文主义者，曾在意大利学习，受到宗教方面宽松观点的感染，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意大利学者中流行的宽松道德标准的影响。从克罗托斯-鲁比安努斯、胡滕和埃尔富特圈子里的其他人那里，产生了 ″Epistolæ obscurorum virorum″，这是一个假称的修士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用粗鄙的拉丁文写成，以卡通的形式展示了修士们的文盲、偏执和自由的聚会习惯。人们发现这些 ″书信 ″非常有趣，当利奥十世在一份诏书中禁止人们阅读这些书信时，人们就更想知道了。它们帮助鲁赫林更严肃的捍卫者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英国的文艺复兴呈现出与德国类似的特点。英国学者们去了意大利、并把对

新学问的热忱带回了牛津。1496年，在牛津，他们中的一个人，约翰-柯莱，他是伦敦一位富有的商人的儿子，曾是该市的市长，他开始讲授保罗的书信。他大胆地推开了学派的人为方法和大量的评论，并试图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使徒的生活和教义。他的讲堂里挤满了热心的听众。许多因好奇而来的人留下来学习。然而，那些坚守神学传统方式的人不能不对他们所认为的新式阐释的危险倾向感到震惊。在柯莱的工作中，有几个人希望得到他的积极同情，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一个注定要从事法律工作的年轻人。他温和的天性，加上聪明的头脑，使他在新学问逐渐聚集起来的小圈子里，得到了每一个朋友的喜爱。

第二年，伊拉斯谟加入了柯莱和莫尔的行列，很快成为人文主义者的王子，也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伊拉斯谟已经被严密的研究和因缺钱而不得不忍受的匮乏搞坏了身体。他很早就被急于得到他那点遗产的亲戚们推到了修道院。他对修道院生活的反感是长久的，既因为那些日子里的痛苦经历，也因为他在之后的几年里、当他成名后、为了摆脱他以前的修道院伙伴们倾向于叫他回修道院去的束缚而付出的麻烦。

直到亨利七世去世后，新的研究才在英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年轻的国王，也就是他（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身上，牛津大学的改革者们找到了一个对新学问很有兴趣的君主。在此期间，柯莱成为伦敦圣保罗教堂的院长。伊拉斯谟执行了他去意大利的夙愿，但听到亨利八世登基的消息后，就开始返回。

在返回的途中，他构思了一个讽刺人类愚蠢行为的计划，当他到达英国并成为莫尔家的客人时，他写下了这个计划，称之为 ″对愚蠢的赞美″。″在她（即，对“愚蠢”的拟人化的称谓）的信徒面前宣布关于人类事务的演说，她在其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时代的所有愚蠢行为都被嘲笑了。在这些生动

的篇章中，有病态的书虫；文法学家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教室里，对着他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并殴打他们；学术界的神学家们，在虚妄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对宇宙的结构喋喋不休，仿佛他们刚刚从众神的会议上下来--大自然对他们的猜想感到非常的有趣；修士，一个新的犹太人的种族，在审判日发现自己在羊群中，看到水手和马车夫比自己更受欢迎，他们会感到悲伤；国王不保护他们的臣民，而是抢劫他们，只寻求自己的快乐；教皇，虽然是老朽，但把剑拿在手里，把法律、宗教、和平和所有人类事务颠倒过来。 ——这里是对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的明确指称，没有人看不出来。

这就是伊拉斯谟所论述的人类的一些愚蠢行为，让莫尔和一些朋友感到很有趣。这本书很快就出版了，并迅速再版了几个版本。所有同情新学问的人都在读这本书，包括成千上万的教会人士——尽管他们并不欣赏这篇讽刺文章的效果，因为它削弱了大众对教会的敬畏之心。

伊拉斯谟有一段时间在剑桥定居，担任希腊语教授。与此同时，柯莱自费在伦敦建立了圣保罗学校，在那里，男孩们将被教导健全的学习基础。尽管现在有一些敌人试图将他（柯莱）定为异端，但他还是勇敢地推进他的工作，在宗教会议上恳切地请求对神职人员进行改革，并在年轻的国王亨利八世面前宣讲战争的野蛮性和无理性。

稍后，莫尔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在其中体现了类似的思想。这部作品充满了对劳动者、穷人和苦难者命运的同情。在他想象中的联邦里，所有人都有良好的住房和教育。乌托邦人在宗教问题上是自由的。他们互相辩论：——"被他们选为牧师的人是否因此有资格做属于这个角色的所有事情，即使他没有来自教皇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任何宗教，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崇拜的形式被精心安排，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有什么小的差异，都可以加入其中。莫尔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野蛮性的憎恶，这与柯莱

在他的布道中所阐述的相同。

伊拉斯谟离开英国，去了巴塞尔，在那里，他与印刷商弗罗本结成了联盟，这种联盟对他们俩来说是如此的幸福，而且对公众的写作也是如此的富有成效。在巴塞尔，他找到了一个住处，在那里他可以与他强大的赞助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并远离世俗和教会的暴政的影响。1516年，他出版了他的《希腊文圣经》版本，并附有一个新的拉丁文译本。在这项工作之后，又出版了（古代的）塞浦路斯和杰罗姆的著作的版本，以及（古代的）奥利、亚他那修和金口的拉丁文译本。

这样，伊拉斯谟为他那一代人打开了源头，使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更清楚地了解基督教的古代知识，以及更符合圣经的神学。

伊拉斯谟的其他神学著作，包括他的评论和他的传道论文，对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基督徒生活性质的启蒙观点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希望教友们（即教会会众）得到指导；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自己语言的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甚至最卑微的妇女也能阅读它们。他抨击教规的形式主义，反对犹太化的习俗和仪式，因为这些习俗和仪式成为教会的负担，以及成为为了使神职人员致富而压迫穷人的行为。

这些比较严肃的著作中夹杂着幽默和讽刺的作品，就像 ″对愚蠢的赞美 ″一样。在这些作品中包括《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宗教人士的无所事事、不务正业被展示出来。

在这些讽刺文章系列中，宗教人士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我放纵以及人为的、无用的禁欲主义都被表现得很可笑。此外，还有几个连续版本的 ″格言″，每本都比前一本大，每本都包含对这个时代的弊端的一些新的攻击。伊

拉斯谟绝不会写任何会给他所称的″法利赛王国″的捍卫者以帮助或安慰的东西。他对教会中的管理不善，对教皇以下的神职人员的恶行和压迫的评论，因为一般都是以幽默的形式进行的，所以更加有效。正如柯勒律治所说，它们都具有独特的优点，可以转化为论据。

伊拉斯谟的宗教观点是广泛而宽容的。他要废除罗马宫廷的暴政和贪婪，但要让教会的宪法不受干扰。他希望信条非常简短，只体现″圣经中的简单真理″。他为个人的判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并主张把困难的问题，不是交给″下一个总理事会（宗教议会）″，而是交给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他对宗教自由的喜爱，部分来自于他个人的善良和自由的文化，部分可能是由于意识到，如果教会和国家的统治者不实行相当广泛的宽容，他自己也会很惨。他很早就被中世纪制度的热心追随者们认为，他的影响力有可能摧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不是他的对手，但他们可以不顾他（伊拉斯谟）的正统职业（正统信仰），不断地用异端的指责来烦扰他。然而，其中一些指控，如巴黎大学对 《座谈会》的谴责，只能使他的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伊拉斯谟的影响不仅限于他的正式出版物。他与知名人士进行了大量的书信往来，这些人包括教会人士、政治家和学者，是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他迅速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在他的影响范围内，在大人物对他的尊重方面，除了伏尔泰外，没有人能够接近他，而伏尔泰在重要方面与他不同。他（伏尔泰）和他（伊拉斯谟）一样，是一位机智的、反对偶像的人，并且具有敏锐的、批判性的智力。但是，（与伏尔泰不同的是），他（伊拉斯谟）的名声部分取决于以拉丁语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语言的普遍使用。虽然伊拉斯谟曾在英国和意大利生活过，但他既不熟悉意大利语也不熟悉英语。他的拉丁文风格不具备许多人文主义者们的古典修养（他们对使用一个在西塞罗著作中找不到的词感到惊恐），或者至少是没有得到最好的古代权威的认可。对他来说，拉丁语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他的天才为它注入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活力。他写得很匆忙。他说：″我急于求成，而不是细心创作”。

伊拉斯谟有一项比书写优雅的拉丁文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的伟大目标是把人们的思想从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带来文化和自由的统治，带来更简单和更纯粹的基督教。但从他笔下流出的大量书籍和小册子，以及从巴塞尔的弗罗本出版社发出的大量书籍和小册子，对实现这一目的贡献不大。它们只是为宗教革命做了很多准备；这场革命在伊拉斯谟的工作结束之前就已经爆发了，而他却对其中的一些倾向不能不抱着焦虑和厌恶的态度。他与路德和新教事业的关系将在下一时期的历史中谈到。

==========

==========

==========

==========

==========

==========

==========

==========

==========

==========

第八阶段

从宗教改革的开始到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517-1648）

新教的兴起和发展：宗教党派的冲突

==========

第一章

德国的改革，从路德的论文到奥格斯堡议会（1517-1530）

进步的时代

宗教改革，像所有其他伟大的社会变革一样，是长期准备的。它是这种普遍进步的一部分，其性质复杂；其特点是以15世纪和16世纪的开端为标志。

十六世纪初是中世纪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教皇制度，即它在中世纪联邦帝国中的对应物，几乎已经沉沦到意大利公国的水平。与此同时，西方的所有国家都在逐渐巩固。一个欧洲的国家体系正在成长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15世纪，不同国家的宫廷都设立了驻外使馆。火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艺术，使农奴在战斗中与贵族平等。虽然这一发明使君主能够通过农民军队摧毁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但它也使人民掌握了一种工具，可以用来遏制国王的暴政。同样，在这一时期，古代雕塑的杰作和古代文学的宝藏被从历史灰尘中带出来。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通过新发明的印刷术，被远远地传播开来。

人们的思想被激发出一种新的智力生活。出现了文学大师，如伊拉斯谟；绘画和雕塑大师，如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这也是辉煌发现的时代。哥伦布借助当时开始普遍使用的磁力罗盘，揭开了笼罩在西方地平线上的面纱，并向

欧洲人民展示了另一个半球。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通过开辟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新的贸易通道，给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业霸主地位以致命的打击，并为西欧各国的海上力量奠定了基础。

但是，虽然宗教改革是延伸到整个人类知识和活动领域的变革的一部分，但它也有自己的具体起源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诚然，占星术已经是一门绝学，所以今天的人们不再像当时的一些人那样把宗教改革归结为 "某种不常见的恶性星位，把眩晕和创新的精神散布在全世界"。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法国历史学家吉佐（Guizot）和其他许多作家都把它描述为，在其真正意义上，是对牧师权威的一次叛乱。它被称为人类智力的起义，以打破强加给自由思想的束缚。吉佐区分了改革者的有意识的目的和他们工作的实际倾向和最终效果。毫无疑问，在自由方面，他们 "建造的比他们知道的更好"。然而，如果把宗教改革的起源和基本性质说成是宗教事业的运动，并且是由深刻的宗教信念鼓动的，那么，（在吉佐等历史学家看来），宗教改革的真正荣耀就不会增加（即，在一些文化人士们、例如吉佐看来，或在一些推崇中世纪天主教体系的人士看来，宗教改革的起源和性质并非单纯地是出于深刻的宗教信念所推动的）。罗马天主教作家在新教运动中发现了不忠和无神论的多产来源。理性主义者称赞它是人类理性从传统和教条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步。他们都肯定，需要时间来发展其固有的倾向。但是，无论在宗教问题上思想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怀疑论肯定不会比中世纪体系给智力戴上的枷锁更多地成为这种自由的成果（换言之，在宗教改革者看来，中世纪体系的束缚，其实比宗教改革、思想自由的运动，更加能够使人怀疑信仰）。改革者们自己也相信，他们的工作阻止了不信教的发展，并拯救了欧洲的宗教；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量潜在的怀疑主义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新教在接受它的人中带来了宗教感情的复兴，并通过反动的

影响，导致天主教团体内部宗教热情的觉醒。

宗教改革，不管它有什么神秘的倾向，都是一场宗教领域的运动。它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巨大力量的来源之一，是对罗马宗教体系的不满。它是对教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管理不善，以及对教皇干预民间事务的不满。早在1431年,在巴塞尔担任教皇大使的红衣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就给教皇尤金四世写信说，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教友们将为推翻腐败的神职人员而大举起义，而且会出现比波西米亚人更可怕的“异端”。

十五世纪后半期教皇们的不当行为并不比他们的前任在第十世纪的行为更明目张胆。但十五世纪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教皇们所做的事不是在角落里做的，而是在全欧洲的注视下做的。此外，现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特别是在日耳曼人中，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律法主义”的、犹太化（犹太教主义化）形式的基督教的监护，渴望一种更精神的宗教。福音的自由精神在他们心中保持着活力，逐渐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打破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在直接接触上帝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颠覆旧有信仰的不是毁灭的热情，而是更深刻的信念和对真理更纯粹的理解所产生的驱动力。宗教改革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权威标准改革旧的宗教。它是独特的基督教，因为它在圣经中找到了它的来源和规范原则。改革者们坚持认为，权威不在教会，而在圣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奠定了基础，即思想和探究的自由，这也是后世所享有的。

虽然有必要牢记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和意义，以及它在历史总进程中所占据的地位，但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了领导人的作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产生和塑造的。如果要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和感情习惯进行革命，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在这里，必须有一些人瞥见了一些伟大但被遮蔽的真理，他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它的价值，能够向他

们的同胞解释它，并且能够在他们身上创造和维持新的道德生活。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宗教改革。一方面，它是一场宗教革命，影响到信仰、仪式和教会组织，以及基督教生活的形式。另一方面，它是一场伟大的运动，牵涉到君主和国家；是战争和条约的场合；是文化和文明史上一个旧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引入。

德国，包括荷兰和瑞士，是宗教改革的据点。这样的运动自然会兴起并达到最高的力量。

在这个民族中，对独立的热爱与对相比于中世纪教会主义所鼓励的更加精神化的宗教形式的渴望交织在一起。黑格尔曾雄辩地指出，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去了美洲或印度，寻求财富和环绕地球的统治权时，一个简单的修士，远离空洞的形式和感官的东西，正在寻找门徒们曾经在石头墓穴中寻找的他（耶稣基督）。

毋庸置疑，宗教改革的英雄是马丁-路德。他的大无畏的决心是众多人的集结点，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开始一项与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误导者进行如此艰巨的冲突。他放在嘴边的号角声响彻远方。它在瑞士的群山中被听到；它在所有日耳曼的土地上唤起了同类的精神；甚至在欧洲的南方国家中唤起了同情的声音。如果没有路德和他强大的影响力，其他的改革努力，甚至像慈运理那样有一个独立的开始，也可能不会导致持久的结果。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指出的那样，路德的整个本性与他的伟大工作相一致，虽然其他领导人，甚至加尔文，可以在思想上与宗教改革分开，但 ″路德，如果脱离了宗教改革，就不再是路德了″。

他是一个普通矿工的儿子，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在艾斯莱本。他的父母相

当贫穷，但他们是有尊严的，并对他的早期生活给予了适当的智力和宗教训练。在经历了卑微的家庭中严厉而又善意的管教后，路德按照当时的习俗，在艾森纳赫市民的门前唱歌，以支付他在那里的学费；他去了埃尔富特，在进入法律专业之前完成了他的基础学业。在那里，他的灵魂深处的宗教焦虑由于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经书（圣经）而更加强烈。虽然他对教堂仪式上宣读的部分圣经很熟悉，但说来奇怪，整卷圣经他还没有拿在手里过。两年后，他违背父亲的意愿，放弃了法律职业，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1508年，他被任命为维滕贝格的传教士和大学教授，这所大学最近由撒克逊选帝侯弗雷德里克-怀斯建立。在那里，他很快就因其学识和对圣经的虔诚而闻名于世。

路德，尽管他有和蔼可亲和快乐的天性，但也不乏深刻的反思，甚至有忧郁的倾向。他早期的宗教生活充满了忧虑的经历以及他对良知的恐惧。他被教导要把基督看成是一个律法的制定者，他（基督）"在最后一天会审判我们，看我如何为己罪而做出赎罪补偿，以及我们做了多少善事"。他的教区总管约翰-斯陶皮茨（John Staupitz）的明智建议，以及他自己对奥古斯丁和陶勒的研究，使他看到了福音中更纯净的教义。但只有在思考了《罗马书》中"义人必因信而生"这句话之后，真理才闪现在他面前。这时他才意识到，基督不是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是作为救世主而来；通过他与人的结合，他把我们身上的全部负担都放在了自己的心上，通过我们与他的结合，他的一切都变成了我们的；信仰把信徒从法律关系中提升到恩典关系中，并使他（信徒）立即与上帝结合。因此，善行是信仰的果实，是自发的和必要的产物。从此以后，保罗的著作，特别是给罗马人和加拉太人的书信（罗马书与加拉太书），成为他永恒的伴侣。后者被他以幽默的方式称为他的妻子，他的凯萨琳-冯-波拉。

路德当时并没有想到，在他的新立场上会与教会的仪式和教规，以及教会权威的原则形成对立。是后来的事件才逐渐向他揭示了这一点。1517年，约翰-

特策尔出现在维滕贝格附近，他是一个兜售赎罪券的人，赎罪券的收入将用于支付圣彼得教堂的建设。为了说服人们购买他的精神商品，他告诉他们，正如路德自己所证明的，只要他们的钱在箱底叮当响，他们已故朋友的灵魂就会立即升入天堂。路德对这种交易而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他决定要阻止它。1517年10月31日，他在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内容是关于出售赎罪券的教义和做法。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教皇的所谓赦免最初是通过支付金钱来减免忏悔的。发放赦免的权利已逐渐成为教皇的专属特权。弥天大罪的永恒惩罚通过牧师的赦免得到了缓解或减免，教皇或他的代理人可以通过发放赦免令，消除可能延伸到炼狱的暂时或可终止的惩罚。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利用基督和圣人所储存的功德宝库。尽管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明确宣布，灵魂从炼狱之火中被释放出来的方式类似于祈祷的功效（即，需要人虔诚的祈祷），尽管理论上接受赦免的人需要忏悔，但在人们看来，它往往是一种简单的交易，根据这种交易，只要支付规定的金额，个人就可以完全解除罪恶的惩罚，或促使一个灵魂从“炼狱”的火焰中被释放。

路德的论文抨击了使这种有害的交易成为可能的学说。它们（这些论纲）否认教皇有权力取消——除他自己施加的惩罚之外的任何其他惩罚；并且否认教皇有权力申明——这些刑罚并没有达到死亡的程度。它们（路德的这些论纲）还认为，以这种有限的形式发布赦免令的权利属于牧师和主教，不亚于教皇。这些论纲是对托马斯-阿奎那所建立的赦免理论的攻击。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对它们的作者（路德）来说，它们不自觉地打击了罗马和神职人员的权威。路德并没有想过要放弃对罗马教会的忠诚。甚至他的论文也只是一些命题，按照中世纪大学的习惯，为学术辩论而提出的。他在论文的结尾处郑重声明，他什么也不肯定，而是把一切都留给教会的判断。如果教会权力机构允许他持有和传扬福音，而福音已经完全融入他的经验，那么他就

会继续做一个忠诚的臣民，而不会对他所成长的摇篮的基础进行任何审查（或挑衅）。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教皇的傲慢是多么没有根据，教会权威的传统理论与他对福音的解释是多么的不相容。"哦！"他感叹道，"我怀着怎样的焦虑和努力，用怎样的方式查考圣经，凭着良心为自己辩护，独自站出来反对教皇？" 这种反思，对一个聪明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对这种反叛的明显胆量的反思，在他的事业中偶尔会出现，甚至被最近的（现代）论战作家错误地称为悔恨的发作。

这些论纲在整个德国激起了骚动。对于修士迷信的终生反对者，鲁赫林和伊拉斯谟，对路德的大胆行为感到欣喜。

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政治希望经常被教皇挫败，他对选帝侯说："让维滕贝格的修士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有一天可能需要他。" 改革的新倡导者和赎罪券的捍卫者之间发生了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路德开始意识到人的权威对他不利，并看到有必要更明确地把自己植根于圣经。他清晰的论点和坚决的态度赢得了撒克逊选帝侯的尊重，尽管他（路德）经常（不成功地）试图克制他自己的激烈情绪，但（选帝侯）还是保护他不被敌人伤害。选帝侯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路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马克西米利安死后，他（选帝侯）被任命为北德的摄政王，这种重要性变得更大。

教皇利奥十世第一次听说撒克逊的骚乱时，认为这是一场修士间的争吵。他试图通过他的传教士卡耶坦，使路德屈服。这位警惕而有成就的意大利人（卡耶坦），也是思想自由的人，正如他在后来的事业中所证明的那样，发现他在奥格斯堡遇到的、他期望改变信仰的修士（路德），更愿意辩论而不是接受教诲。于是，利奥发布了一份圣谕，重申了宽恕的教义。而撒克逊的改革者从教皇那里上诉到一个总理事会会议。

教皇宫廷的第二位信使米尔蒂茨，出生在撒克逊，是一位态度和善的教士，如果不是″争论″，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他的神学对手之一约翰-埃克博士以某种方式迫使他在莱普西克进行公开辩论。路德去了莱普西克，由维滕堡的新任希腊语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顿陪同，他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已经因其造诣而出众。虽然梅兰希顿在性情上与路德截然相反，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辅助者。他有一个精细而谨慎的智力，以及精确而丰富的学识。他作为神学家和阐释家都赢得了名声。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奠定了新教注释学的基础。

只是在埃克和卡尔施塔特就恩典和自由意志这些困难的主题争论了几天后，路德才加入了讨论。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路德）也没有不表现出他对自然的喜悦。当他登上讲台时，他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他中等身材，当时很瘦，说话的声音清晰悠扬。在撒克逊的乔治公爵面前的这次辩论，证明是路德事业的转折点，乔治公爵已成为宗教改革的坚决敌人。他（路德）被他的对手吸引到关于教皇优先权的讨论中，在讨论过程中，他宣布教皇是由人指定的，因此不是必不可少的。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声称，在胡斯在康斯坦茨被谴责的条款中，有一些是彻底的基督教条款，这让大会感到震惊，并引起了公爵的愤怒感叹。

随着争论的继续，路德的研究使他越来越认为教皇的统治是一种可憎的僭越行为。他发现为贵族的改革向教会的统治者呼吁是徒劳的，他现在转向了人民。在他的″对德国基督教贵族的讲话″中，他敦促他们结束教皇对民间事务的暴虐干涉，并将改革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反对特殊的圣职思想，强调信徒的普世圣职，以及他们（教会会众）选择那些″掌管他们共同权力的牧师″的权利。随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教会的巴比伦囚禁″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抨击了超度以及通过规定朝圣、禁食和修道来侵犯基督教自由的教规条例。不久，一份教皇诏书被送到德国，将路德逐出教会，并命令选帝侯

弗雷德里克将他交出来。但选帝侯在首先征求了伊拉斯谟的意见后，宁愿选择保护他。伊拉斯谟对弗雷德里克说："路德在两点上犯了罪。他打了教皇的王冠和修士的肚子"。与此同时，路德也没有沉默。他称教皇的法令是 "反基督者的可恶的圣谕"。

1520年12月10日，他在维滕贝格的大门口，当着大学的博士和学生以及聚集在一起见证这一幕的一群人的面，把它（教皇法令）和一份教会法的副本一起烧掉。通过这一行动，他放弃了对罗马教会的效忠。从此，他就成了中世纪制度的公敌。除了这位伟大的选举人（选帝侯），路德还有许多朋友和同情者。法学家们准备为他辩护，因为他们在教皇的诏书中看到的只是教会权力干预民事管辖权的一个新例子。许多下级神职人员和修道会的人都被新的教义所吸引，这种教义不是基于人的教条和法令，而是基于上帝的话语（圣经）。年长的人文主义者赞同路德对时代弊端的勇敢攻击，但对他的激烈态度表示遗憾。但以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为首的年轻人却不这么认为。他（胡滕）以同样的狂热投入到维登堡改革者的事业中，就像他以前在为鲁赫林辩护、反对多米尼克蒙昧主义者时所表现的那样。他对教皇和他的代理人散布了暴风雨般的谩骂声。他呼吁德国人把自己从罗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火热的演说，因为是用人民的语言写的诗，所以更加有效。Hutten的朋友Francis von Sickingen是一位随时准备进行大胆尝试的骑士，他向路德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以备不时之需，在他坚固的Ebernburg城堡中。

因此，德国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宗教运动的前夜。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似乎预示着不是改革而是革命。

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争，和他倒台后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地削弱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权威。1356年查理四世的金诏书将权力的主导权留在了七个主要的王公、三个大主教和四个贵族手中，皇帝的选择权

交给了他们。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停止。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为伸张平等的正义和结束私人战争所做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王公们与主教以及骑士们的争吵变得更加频繁。各个城市抱怨帝国政府的暴政和不法分子的掠夺行为。贵族们对繁重的税收和公路的不安全表示不满。农民们被他们的艰难处境逼迫得几乎绝望，准备提高起义的可能性。

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1519年1月12日），帝国的王位被提供给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他拒绝接受一个需要比他拥有更多资源的职位；这留下了两个主要的继承人，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年轻的西班牙国王查尔斯。查尔斯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天主教徒斐迪南的孙子。因此，他继承了奥地利和低地国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纳瓦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王位，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土。选民们急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同时为帝国争取一个强大的防御者来对抗土耳其人。因此，他们放弃了聪明但专制的弗朗西斯，而选择了查理，他温和的脾气和巨大的世袭领地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目标。但他们首先通过一项〝投降协议〞来约束他，让他尊重议会的权利，并且不把外国军队带入该国。

查尔斯的当选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虽然他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但从他的教育和地位来看，他不适合成为一个对国家统一和改革充满憧憬的人民的领袖。他一生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促进德国的特殊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扩大他的领地和加强他的帝国权威，而德国只是他伟大王国的一部分。他认为，作为皇帝，他是基督教公国的世俗统治者，而公国的精神领袖是教皇，这种想法必然使他成为新教运动的反对者。然而，他对新教运动的态度实际上并不是由一贯的计划所支配的，而是由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他的广大领地的利益常常迫使他让改革者不受干扰。他经常与法国国王发生冲突，有时也与教皇发生冲突，他们都对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君主的手中感到震惊。查尔斯、弗朗西斯和教皇都想赢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路德教

派在某个时候都是有用的盟友。此外，基督教世界不断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面对如此危险的入侵者，查尔斯皇帝不可能疏远德国的大部分人口。

第一个政治组合似乎对路德的事业不利。教皇利奥十世反对查理五世的选举，因为他担心教会国家（意大利罗马）被帝国领土所包围。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教皇）在查尔斯成为皇帝后立即与他进行友好谈判。他（教皇）敦促他（查尔斯皇帝）把已经与教会断绝关系的路德置于帝国的禁令之下。查尔斯提议在沃尔姆斯会议上通过一项帝国诏书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德国的王公们并非没有意识到罗马宫廷的许多侵犯行为，以及改革者对其勒索和暴政的勇敢谴责，他们劝说皇帝不要不问青红皂白地谴责他（路德）。因此，路德被传唤到国会，为自己辩护。在前往沃尔姆斯城的路上，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埃尔富特，大学里的人排着队迎接他，并由校长发表讲话欢迎他。偶尔也有一些声音警告他不要相信皇帝的安全行为。选帝侯的一位议员提醒他胡斯的命运，他（路德）回答说：″胡斯已经被烧死了，但真理并没有被烧死。我将继续前进，尽管有许多魔鬼在瞄准我，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

4月17日，当他出现在国会时，大厅里挤满了王公贵族的大集会。这位年轻的皇帝（查尔斯）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兄弟，费迪南大公。在出席的大人物中，有撒克逊选帝侯和黑森州侯爵菲利普。当第一次被介绍到这个庄严的机构面前时，路德显得有些茫然，说话的语气很低沉，当被问及他是否会撤回他的书的内容时，他要求--毫无疑问，按照他的法律顾问的指示--有时间来准备答复。这是一个不能用简单的 ″是 ″或 ″不是 ″来回答的问题。他的书中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反对的，而有些东西，特别是关于“人”的东西，他本人可能不赞成。第二天，他向国会宣布，他不能收回他所写的任何东西，除非它被证明与圣经或正确的理由相悖。最后，当被问及是否会反悔时，他回答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根据一个早期的、值得信赖的传统，他最后说：″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做别的。上帝帮助我。

阿门。〞有一些人敦促查尔斯逮捕路德，理由是信仰不能与异端分子保持一致。这样的劝说只会激起格奥尔格人的愤怒。除了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之外，还有其他人准备为这位勇敢的修士辩护。像乌尔里希-冯-胡滕这样大胆的骑士向议会成员表示，如果他受到伤害，就会进行报复。

4月28日，他（路德）在返回维滕贝格的路上被选帝侯（弗雷德里克）的士兵拦截，并被带到了瓦特堡城堡的一个安全的隐蔽处。选帝侯先前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路德），但人们起初以为他（路德）的敌人已经把他（路德）抓走了。当时在安特卫普的阿尔伯特-丢勒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教会如此大的损失所感到的悲痛。5月26日，在教皇大使亚历山大的阴谋下，一项将路德置于帝国禁令之下的诏书被匆匆通过，这时国会已经开始解散了。同一天，查理五世（帝国皇帝）和利奥十世（教皇）签订了从法国人手中夺回米兰的条约。

查理皇帝还要求将伦巴第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一。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决心守住他在马里尼亚诺赢得的土地，此外，还要维护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利。然而，他（弗朗西斯）的军队很快被查理皇帝赶出了伦巴第，老公爵的次子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站稳脚跟。在罗马，对帝国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有消失，利奥十世就患上了致命的疾病。

他（教皇）的继任者阿德里安六世虽然以前是查理的导师，但只要他（阿德里安）有能力，就会对交战的君主们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新的危险驱使他（阿德里安教皇）站到了皇帝一边。（法国）弗朗西斯的事业在另一个方面受到了威胁。波旁王朝的查尔斯皇帝，这个王国最杰出、最富有的人，对他所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站到了帝国一边。然而，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莱门特七世，和利奥十世一样，是个世故的人，他看到西班牙的统治对教皇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于是急于结束它。他已经支持了法国人的事业，当时弗朗西斯本

人率领一支出色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却在帕维亚被打败并被俘。

法国国王弗朗西斯现在在查尔斯皇帝（或称查理皇帝）的控制下，为了获得释放，他不得不通过马德里条约放弃了他在意大利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领土的要求。如果他（弗朗西斯）忠实地执行了和平条款，路德派就会受到皇帝的摆布。但就在他（弗朗西斯）被释放以后，他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宣布条约是通过强迫手段获得的。

此时，查尔斯皇帝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解决西班牙的事务上，以至于德国被抛在一边。导致德国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对改革者们的事业的转变是有利的。

虽然路德现在在法律上是个逃犯，受到教会和帝国的谴责，而人们一直习惯于把这两个机构视为世界上的两个统治力量，但只要他留在撒克逊，他就很安全。然而，选帝侯认为谨慎的做法是让他在瓦特堡呆上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主要忙于翻译《新约》，这是整个《圣经》版本的第一部分，除了对人民的宗教教育有价值外，还在德语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崭新时代。他从小就熟悉普通生活的语言，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与任何能够提供流行短语和习语的人商讨。先知和使徒们，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必须让他们说德语（即，把圣经中的话语用德语表达出来）。他幽默地谈到他是如何努力使约伯书对普通读者变得通俗。在整个15世纪，特别是在该世纪的后半期，德国人对白话经文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除了特定部分的翻译，在1518年之前，不少于14个版本的《圣经》被印成了高德语版本，还有4个低德语版本。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版本；它们都是小版本，而且它们的范围也很有限（而不是全部《圣经》）。是路德把《圣经》交给了人们，而且是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形式，使人们渴望阅读它。

与此同时，维滕贝格出现了严重的骚乱。卡尔施塔特开始抨击教会的所有仪式和法规，他认为这与新教义不一致。1522年，某些来自伯格的狂热分子加剧了这一麻烦。

茨维考（Zwickau）的某些狂热者声称立即得到了启发，并预言将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路德看到，他所发起的运动有可能在狂热主义的疯狂爆发中结束。他深刻的基督教智慧使他坚决反对那些不是从对福音的真正原则的洞察中自然产生的教会变革。意识到危机的重要性，他忘记了自己的安全。他拒绝听从选帝侯的警告（选帝侯说，他不能保护他不受骚乱后果的影响）。

回到维滕堡后，他（路德）在几次有力的布道中灌输了基督教的节制原则。当骚乱平息后，他没有回到为他提供的庇护所，而是留在维滕贝格，作为传教士、教师和作家坚持不懈地工作。

与此同时，在皇帝缺席期间负责管理德国的摄政委员会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在沃尔姆斯颁布的（针对路德的禁令）诏书。此外，他们（德国摄政委员会）还确信，改革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如此强大的地位，如果试图粉碎它，就会引起危险的叛乱。因此，当渴望消除长期困扰教会的弊端的阿德里安教皇，在纽伦堡会议上通过他的牧师承诺实现所需的改革，并敦促议会履行帝国的（针对路德的）诏书时，他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德国必须对罗马宫廷提出的一百条不满意见。

但很快就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损害了宗教改革的事业，并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动。骑士们对帝国王公的持续侵犯感到不满，在弗朗西斯-冯-西金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运动与为纯洁的福音而激发的新热情结合起来。西金对选帝侯之一的特雷韦斯大主教的攻击被击退了，他很快死亡；这使叛乱结束了。路德曾多次努力劝阻骑士们不要采取战争措施，但改革事

业却因那些支持它的人试图引发一场国内革命而受到影响。然而，克莱门特七世的传教士坎佩吉奥在1524年于纽伦堡举行的会议上，只得到了一个 ″尽可能 ″遵守沃尔姆斯法令的不明确的承诺。通过这一行动，这件事实际上被交给了几位王公，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采取任何自己选择的政策--这是宗教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但坎佩吉奥在他的第二个计划中取得了更好的成功。在他的影响下，奥地利大公和南德的天主教王公和主教在拉提斯邦结成了一个联盟，根据该联盟的条款，维登堡的异端将被排除在他们的领地之外；他们将在他们的共同目标中相互帮助。 因此，迄今为止，从前这个国家在改革、天主教联盟、战争和拒绝压制新观点方面一直是一个整体，而现在正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派别。

这时，发生了一场社会震荡，它甚至比骑士战争更使人们对改革者的农民工作感到震惊。这就是农民起义。它于1524年爆发，并在第二年成为普遍现象。长期以来，他们（农民）在贵族和教士给他们带来的沉重负担下饱受折磨。他们不止一次地起义。他们的不满，他们对所受冤屈的感觉，因路德教派的基督教自由学说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而被煽动起来。他们还被革命传教士的喧嚣所激怒，其中一个传教士卡尔施塔特曾在维滕贝格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叛乱在斯瓦比亚开始。农民们把他们的不满写进了十二条。他们的许多要求都是公正的，而且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得到了圣经中明文规定的支持。他们认为，那些被基督救赎的人不应该再忍受农奴制的束缚。他们要求在教会事务中享有自由，恢复社区对森林和公地的权利，并废除其他形式的封建暴政。

但是，随着叛乱蔓延到图林根州，在狂热的领袖托马斯-明泽的影响下，它有可能推翻民政当局。农民们向路德寻求同情和支持。但是，尽管他（路德）认识到了他们处境的痛苦，并准备为他们说情，但他坚决反对一切诉诸武力

的做法。当农民最终起义时，他敦促王公们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斩首。贵族们只愿意按字面意思执行改革者的建议。大量的农民被杀，他们的几个领导人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路德对民政当局的毫不妥协的支持，阻止了这种混乱可能带来的强烈反应、及其对宗教改革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在起义结束的前几天，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去世。接替他的是他的兄弟约翰，被称为"坚定者"，他被证明是路德教改革的一个同样坚定的捍卫者。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撇开事件的总体进程，来描述某些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对改革的进程和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说明了路德的个人性格而特别有趣。

（1525年）6月13日，路德与凯萨琳-冯-波拉结婚，她以前曾是西多会的一名修女。他采取了这一步骤，甚至使他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也感到失望，部分原因是作为对教会独身法的实际反对，部分原因是他渴望家庭生活的幸福。事实证明，从长远来看，这对他的事业是有利的。这给了他一个家，当他被繁忙的生活中的强烈刺激和不断的劳作所累时，他可以在音乐和歌曲中，在孩子们的嬉戏中获得快乐。他给妻子写的令人愉快的信，以及他对孩子们的死亡所表达的悲痛，向我们揭示了他本性的一面。

在沃尔姆斯会议之后的几年里，路德一直致力于翻译《圣经》，并撰写了教义、布道、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以利于教会的建立和发展。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他参与了许多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亨利八世和伊拉斯谟的争论。改革者的激烈脾气常常使他使用最粗暴的谩骂方式。在这一点上，他有很多话要为自己辩护。他是激烈反感的对象。然后他觉得他的战争必须毫不妥协。退缩就等于投降。这种疾病是无法用缓和剂来治愈的。此外，他确信他在中

世纪的体系中看到了同样的法利赛神学和伦理学，这些神学和伦理学曾引起了保罗和基督本人的严厉谴责。然而，必须承认，在路德身上，除了深厚的感情和诗意的感性之外，还有一种更粗暴的脉络。他有一种平民式的粗鲁，当他受到反对意见的怂恿时，就会用辱骂，甚至是无耻的语言来发泄。亨利八世在1521年写了一本书，反对路德关于圣礼的工作。它为亨利从利奥十世那里赢得了″信仰捍卫者″的称号，这个称号在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被保留了下来，此后他的继任者也一直沿用这个称号。路德在他的答复中毫不犹豫地嘲笑皇室的紫色，也许是想消除欧洲最重要的君王之一的论点在神学辩论场上自然会有的威望。

撒克逊神学家（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逐渐产生的敌意是不幸的。他们都热爱学习，痛恨迷信，因此（路德）不能不以敬意对待这位文坛元老（伊拉斯谟），这位修士们的强烈反对者。伊拉斯谟也无法避免对他们（路德等人）勇敢地倡导他自己最赞同的原则表示同情。但他（伊拉斯谟）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反叛法定权威的人。此外，他（伊拉斯谟）觉得和平对于推动他毕生致力于的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哀叹人们的思想正在远离文学，而被神学争论所吸引。路德的粗暴对他来说越来越令人厌恶。此外，虽然他试图避免冒犯改革者，但他急于与教会的统治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赞助人。路德看穿了他的心思，并且太明显地显示出他对这种在他看来只能是懦弱的、为世俗服务的政策的蔑视。伊拉斯谟拒绝会见在巴塞尔拜访他的乌尔里希-冯-胡滕，这是这位伟大的学者（伊拉斯谟）与改革的使徒疏远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最后，屈服于他的天主教朋友的劝说，人文主义者的首领（伊拉斯谟）抨击路德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改革者的奢侈语言使他（路德）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伊拉斯谟和他的伙伴们更喜欢希腊神学，而路德，正如莫尔曾经说过的，″以牙还牙地坚持奥古斯丁的教义″。

伊拉斯谟的书引起了路德以其最严厉的风格作出的答复。他认为伊拉斯谟是在为建立在整个功德救赎体系的基础上的原则辩护。随之而来的争论彻底导致了他们的疏远。路德后来把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说成是卢西恩和伊壁鸠鲁的弟子，是所有宗教的敌人，尤其是基督教的敌人。这样的待遇只会激怒伊拉斯谟，使他更明显地成为新教徒的对手。路德虽然被他自己一贯的热情吸引到错误和不道德的断言中，但他认为（伊拉斯谟）对修士们的愚蠢行为进行消遣性的讽刺虽然是正确的，却永远不可能改革教会。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攻击错误的基础，整个体系的错误基础，而修道士仅是这个体系的一个分支。这就是，针对教皇党日益高涨的热情，必须以同样不妥协的能量相抗衡。

如果没有路德发起的激烈竞争，文学改革者最终肯定会屈服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但伊拉斯谟属于（为宗教改革做）预备的时代。不能因为他晚年的缺点而贬低他当时所做的辉煌工作。这两个人的自然素质有多大差别，可以从他们的肖像画中看出。霍尔拜因所描绘的伊拉斯谟精细、锐利的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在冲突中的武器是锋利的笔锋。而在克拉纳赫的画布上看到的路德的粗犷面孔，适合被称为″现代海格力斯″的人，他清洗了奥吉安马厩，并带着他传说中的原型的棍子参加战斗。

在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这场争论接近尾声的时候（1526年），改革者的事业受到了许多危险的威胁。皇帝在与弗朗西斯的战争后期所采取的敌对态度，以及他在《马德里条约》之后决心镇压路德派的异端邪说，导致那些支持宗教改革的王公在托尔高联盟中联合起来。宗教改革再次受到欧洲大国的政治计划的保护。克莱门特七世与弗朗西斯、威尼斯和米兰公爵结成联盟，以遏制德意志皇帝日益增长的权力。因此，（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不得不改变他对路德派的政策。在斯皮尔斯议会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每个国家都要参照沃尔姆斯诏书行事，因为它可能对上帝和他的帝国陛下有所交代。这项法令使路德教运动有了合法的存在。

因此，它是德国宗教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皇帝很快就战胜了他所有的敌人。罗马被攻破，教皇成了囚犯，法国人的军队被摧毁。查理在意大利的胜利以及他随后与教皇签订的条约使天主教党人更加胆大妄为、在1529年的斯皮尔斯议会中占多数、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宗教改革在未接受宗教改革的邦国取得进展，同时在已改革的邦国给予信奉罗马教会的人以充分自由。撒克逊选帝侯和其他几位王公以及14个城市对该法令提出的抗议，使路德党被称为〝抗议者〞。他们宣称，新的法令与庄严确立的政策背道而驰；这一政策是基于王公贵族和城市的信仰。

赞成福音派事业的人已经开始塑造他们的宗教政体和崇拜。

与此同时，路德和瑞士改革者之间就圣礼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1529年，双方代表在马尔堡举行会议，以弥合威胁中的破裂，但没有取得成功。在宗教改革的敌人最强大的时候，它的朋友却无望地分裂了。如果说路德把教会关系限制在太狭窄的范围内（而没有认识到宗教改革的众教会的广泛团结的重要性），那么在捍卫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时，他总是表现出对单纯的权宜之计的崇高漠视。皇帝现在可以自由地处理德国的事务了。与弗朗西斯的冲突已经通过《康布雷和约》结束；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可怕攻击已经在奥格斯会议上得到解决。查理来到奥格斯堡议会，充满了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元首的责任感；他刚刚在博洛尼亚从教皇手中接过皇冠。他决心要恢复教会的统一性。

但新教徒们同样决心维护宗教改革的事业。他们提出了由梅兰起草的著名的

"忏悔书"，虽然在精神上是和解的，但明确界定了改革者的基本信条。他们试图通过各党派的神学家委员会来安排妥协。但这些谈判没有成功，这让路德很高兴，他不相信双方在教义问题上有可能达成一致。他认为去奥格斯堡是不安全的，因此，他被留在选帝侯辖区内的科堡城堡。然而，他与奥格斯堡的撒克逊神学家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并知道国会的所有情况。他的信以玩笑和恳切的混合方式，劝告他的朋友们对上帝对正义事业的关怀有更坚定的信心。这些信中所流露的崇高精神，在他最受欢迎的赞美诗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中也有体现。议会下令恢复旧的教会机构，并威胁说，如果新教徒不服从，将采取强硬措施。但宗教改革的朋友们仍然坚定不移。选帝侯约翰，在所有世俗利益都被毁坏的情况下，由于对皇帝和帝国和平的依恋，不免有最深的感触，决心坚持 "上帝的不朽之言"。新教的王公们，连同南德意志的某些皇室城市，在斯马尔卡尔德联盟中联合起来。

在皇帝努力压制新观点的过程中，迄今为止一直反对诉诸武力的路德现在宣布，当他们的王公受到非法攻击时，基督徒有义务保卫他们的王公。支持宗教改革的王公联盟通过与法国、丹麦和巴伐利亚公爵结盟来加强自己。皇帝的领土再次受到索利曼领导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在奥格斯堡决定的镇压措施。因此，《纽伦堡和约》于1532年缔结，其中规定宗教事务应保持原状，直至由新的议会或总理事会来安排。

==========

第二章

瑞士的宗教改革；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国家以及匈牙利的宗教改革：德国的宗教改革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德国的改革直到奥格斯堡和平（1555年）

在路德的论文发表和纽伦堡和平之间的几年里，瑞士人口最多的几个州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其类型有点特殊。不仅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被重新修订，而且受改革影响的瑞士社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得到了净化和提升。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人的可塑性影响：乌尔里希-慈运理。

慈运理于1484年出生在维尔德鲍斯的山村，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主要行政长官。他头脑聪明，热衷于追求知识。与路德一样，他也喜欢音乐。他首先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然后去了巴塞尔。在这个人文文化的中心，他获得了对经典的热爱，并将这种热爱带到了他在格拉鲁斯的第一个教区。当伊拉斯谟出版《希腊文圣经》时，他成了一名认真的学生，并亲手抄写了保罗的书信，以便把它们放在一个可携带的书卷中，并把它们记在心里。他对《圣经》研究得越多，就越倾向于遵从它的权威。但慈运理是个爱国者，也是个学者。他看到了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苏黎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当时流行的军队中的雇佣兵制度而受到威胁。贿赂、薪资和教会特许权被挥霍在有影响力的人身上，以使坚韧的瑞士人能够为教皇或法国国王的战斗而战。因此，对国家的热爱被削弱了，对教会统治者的敬畏被消除了，人民的道德被士兵们从战役中带回来的恶习和无法无天的精神所败坏。慈运理仍然视教皇为教会的领袖，因此没有谴责为他服务的征兵。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接受了教皇的薪资。在马里尼亚诺战役后，他极力抨击与弗朗西斯一世在弗赖堡达成的军事联盟，以至于他被迫离开格拉鲁斯。当他住在艾因西德恩时，他对一个叫萨姆森的放纵者进行了布道，并制止了他那破坏士气的事情。1518年，主要通过法国党的主要反对者的影响，慈运理被转到了苏黎世大教堂。他现在不再接受教皇的薪资，并宣布反

对所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外国纠葛。

他说：″锡滕的红衣主教戴着红帽子和披风是很好的，你只要拧开它们，就能看到你最亲近的亲属的鲜血从上面滴下来。″ 他认识到，这些民间弊端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灾难的根源，就是自私。对于这种罪恶，唯一的补救措施是上帝的话语。正是慈运理对圣经的力量和权威的日益崇敬，使他成为一场安静但彻底的宗教革命的领袖。他的个人品质使他适合于这样的职位。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又喜欢和他的同胞们交往。他正直、无畏，是一位令听众激动的传道人。他的一个听众说，在他看来，慈运理在讲台上讲话时，像是在拽着他的头发牵着他。他在苏黎世没呆多久，就得到了镇议会的许可，允许牧师们只讲他们在圣经中找到的东西。1523年，在一次公开争论中，尽管他提出了67条主张，抨击了罗马天主教体系的所有特点，但他还是成功地为自己辩护，反驳了异端邪说的指控，并从议会获得了一项法令，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教授任何圣经上没有的内容。同年，他获得了另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图像和弥撒的祭品。

路德对过去有更深的敬畏之心，他不寻求保留《圣经》没有禁止的中世纪教会的那些仪式和典礼。凡是在他看来与迷信有关的东西，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尽管是大刀阔斧的，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是在公共权力下进行。

苏黎世现在放弃了对康斯坦茨的普罗提斯主教的效忠。在这个独立教会的领导下，慈运理认为，他们是会众团体的适当代表。在短短的几年里，苏黎世的宗教机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世纪教会的所有显著特征都消失了。独身主义的规则被废除了。慈运理本人于1524年结婚。宗教革命伴随着社区道德生活的提升。1525年，慈运理出版了他的主要神学著作《真假宗教评论》。尽管在大多数方面他都持有普通新教的观点，但在圣餐的教义上他与他们不

同，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解释。他坚持把预定论作为一个哲学信条，但教导说，基督已经救赎了整个种族。他认为原罪是一种失调，而不是一种涉及犯罪的状态。他认为古代的圣人都是由神灵照亮的，在他的圣人目录中，苏格拉底、塞内加、卡托斯，甚至还有海格力斯。

宗教改革并不局限于苏黎世。1528年，它在伯尔尼取得了胜利。第二年在巴塞尔，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圣加仑和沙夫豪森取得了新教。在每个地方，它都伴随着寡头政治的衰落；寡头政治赞成外国联盟和神职人员薪资，而共和党的崛起则支持道德和政治改革。慈运理的追随者坚持使福音不仅成为个人光明和生命的源泉，而且成为政治机构中有益的酵素。

将慈运理和他为瑞士人所做的事情与路德和他在德国人中的工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明显区别，以及慈运理和路德作为先锋的运动之间的差异。

他们是其中的先驱者。经过长期的宗教斗争，路德才摆脱了对罗马教会的忠诚，并抨击了它的教义和权威。相反，慈运理没有花费任何冲突就拒绝了拉丁教会流行的教义或教会体系中任何在他看来与《圣经》相悖的东西。

路德不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无论他多么同情他的人民，以及他们的痛苦。他的一生都致力于阐述他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福音真理。另一方面，在慈运理心目中，把瑞士人从不道德和错误的政府中拯救出来，与他让福音在其纯洁性中被教导的决心是分不开的。然而，无论瑞士的宗教改革在开始时多么独立，其目标多么特殊，它都要归功于这位狮子般的撒克逊改革家（路德）和他的同伴们的工作。教皇当局为了从农民中招募军队，准备对所有的创新视而不见，以至于在路德发动的战斗的喧嚣传到瑞士的山谷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慈运理的教义的倾向。

但是，新教党的这两个分支几乎还没有开始他们的事业，他们就在主的圣餐的教义上发生了冲突。

随之而来的冲突，就在德国路德教运动的敌人联合起来抵制它的进一步发展时。这对宗教改革的事业来说是一个最不幸的事件。不用说，改革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对他们来说并非不重要。弥撒自古以来就是教会崇拜的核心行为。它在教会的教义和仪式体系中获得了最崇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受到了变体学说的影响，即（在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神奇地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当两派的改革者都拒绝了这一教条，以及与之相关的关于礼拜的赎罪性质的学说时，制定一个更正确的观点的重大任务就被迫摆在他们面前。路德肯定了基督荣耀的身体和血与面包和酒的客观存在，因此身体和血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领受者实际接受，无论他是否是信徒。这种学说经常被称为 ″同体″，尽管路德教派的神学家们一般不赞成这种称呼。另一方面，慈运理否认基督在任何这种意义上的真正存在，并使主的圣餐仅仅是对他赎罪之死的纪念。路德一听说慈运理的学说，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而且用极其严厉的语言来斥责 ″圣餐派 ″的宗旨和人。这种厌恶的原因不难理解。

他（路德）最深切地感受到客观的施恩方式的重要性。在圣言和圣事中，基督仍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被提供。路德的宗教感情与 ″这是我的身体 ″这句话的字面解释交织在一起。他害怕一切倾向于将宗教和宗教经验解决为一个人自己的思想过程的东西。像斯特拉斯堡神学家马丁-布克和黑森州州长菲利普这样无私的人，为医治有可能给新教事业带来巨大灾难的分裂而作出的努力，证明是徒劳的。

1529年，两党的领导人（路德与慈运理）在马尔堡会面。当他们在私人会议或公共集会上未能达成协议时，慈运理眼含热泪，向路德伸出了兄弟般的友

谊之手。但这位撒克逊改革家（路德）拒绝接受，因为他不能与一个否认他认为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条款的人加入基督教团契。

然而，在他们分开之前，他们签署了一份他们所认同的教义要点的声明，并承诺以符合良知的所有宽容态度对待彼此。

瑞士宗教改革的大灾难即将来临。仍然坚持罗马教会的五个森林州对新教建立起来的城市的敌意越来越大。他们与奥地利的斐迪南结成联盟，抵制新教的发展。他们已经开始迫害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改革教义的传教士（当时苏黎世的公民向他们进军，想要迫使他们撕毁与奥地利的契约）。这种敌对关系仍在继续。慈运理敦促各城市联合起来，推翻五个森林州在联盟事务中对城市州享有的优势，这些城市州虽然数量较少（相对于森林州而言），但人口却多得多。但他（慈运理）的努力因各城市的互相嫉妒而失败了；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成为拟议中的邦联的大都市。天主教一方联合他们所有的力量(森林州），突然向苏黎世进发。匆忙聚集起来保卫城市的勇敢的士兵们被制服了，在卡佩尔，作为他们的牧师前去的慈运理被杀了。森林各州取得了一场明显的胜利，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城市。然而，他们从他们那里争取到的和平条件对新教徒来说是一种羞辱，并阻止了改革的进展。

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命运，这些国家通过1397年的卡尔马联盟统一在一个君主之下。

路德运动开始时，克里斯蒂安二世正在王位上。在丹麦，他试图通过改善人民的状况来推翻非宗教人士和教士贵族的统治。他提出了一部法律书，其中包括重要的教会改革。在瑞典，他的目的是要摧毁贵族政党的权力，并支持

神职人员的事业。但他的背叛和对瑞典领导人的处决，即所谓的斯德哥尔摩大屠杀，激起了人们对丹麦的持久的仇恨。现在，克里斯蒂安在丹麦本身是如此的害怕和不被信任，甚至连他所促进的利益的人民也不愿意出面阻止他下台。1523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弗雷德里克一世被立为国王。他发誓不对路德派给予任何宽容。但是，改革的教义首先在公国建立起来，那里盛行温和的政策，逐渐进入全国，并在1526年赢得了国王本人的公开承认。那些急于占有教会财富的贵族们赞成新的皇家政策。次年的欧登塞议会规定，路德教应被容忍，教士们应向国王而不是教皇寻求对其选举的批准。虽然弗雷德里克没有剥夺主教们的权力，但新教的教义很快就占据了上风。1533年他去世后，教士们努力恢复旧的秩序，并拒绝批准他儿子克里斯蒂安三世的选举。同时，1523年被废黜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在吕贝克人的支持下，试图重新获得王位。吕贝克是汉萨同盟中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其中（同盟中）许多城市都对路德教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在那里，改革学说的引入伴随着民主制度的兴起。吕贝克人发现，丹麦不再倾向于支持他们的商业霸权，因此，他们试图将一个重视他们利益的君主扶上王位。但克里斯蒂安三世很快就战胜了他的所有敌人。随着他的胜利，曾威胁要与宗教改革结盟的民主运动被制服了。在丹麦，克里斯蒂安重新组织了教会宪法，并根据路德体系建立了主教和监督者。作为这场宗教革命的结果，新教在挪威被接受，挪威现在成为丹麦的一个省。它也很快在冰岛海岸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在瑞典发生了一场涉及宗教革命的巨大政治变革。古斯塔夫-瓦萨，一个年轻的贵族，他的父亲在斯德哥尔摩大屠杀中丧生。

他决心把他的国家从丹麦人可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农民们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个又一个城镇落入他的手中。当克里斯蒂安二世被废黜的消息传到瑞典时，古斯塔夫被加冕为国王。他赞成路德教，与其说是出于深刻的宗教信念，不如说是出于打破几乎独立的教会贵族制度的稳定目的。他让路德教派在教会

和国家中担任高级职务。在所有这些措施中，他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那些帮助他获得王位的农民坚定地依附于旧有的教会。1527年，一场危机来临了。

如果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君主制，就必须为其提供足够的收入。除了没收教会的巨额财富外，没有任何办法获得这些收入。因此，他决心通过民政当局来推行宗教改革。他向聚集在韦斯特拉斯的议会提议，议会应将教会财产交给他处置，并应赋予他管理教会事务的权力。还将给予〝传教士宣扬上帝的纯正话语〞的自由。他试图通过允许一大部分被没收的财产落入贵族手中来调和他们的关系。当他的提议遭到激烈的反对时，他立即放弃了王位。得知这一消息后，由于对威胁国家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恐惧，议会召回了古斯塔夫，并颁布了一项体现其要求的法令。为满足国王的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新教，很快就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在约翰三世（1568-1592）的努力下、在耶稣会的帮助下，为恢复温和的天主教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失败的。在1593年的乌普萨拉会议上，奥格斯堡忏悔录（信仰告白）被接受为国家教会的信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在路德教改革开始之前，波希米亚就已经参与了建立国家教会的斗争。撒克逊改革者的教义受到欢迎，特别是被团结的弟兄们所接受。该党派大约在15世纪中期出现在波希米亚。然而，很大一部分卡利克斯坦人仍然保持他们的保守立场。然而，当斯马尔卡尔德战争爆发时，两党中的大多数尤特拉基人都支持选帝侯的事业，并分享了他失败后的灾难。他们中的许多人逃到了波兰和普鲁士。留下来的人的命运越来越糟，直到下个世纪初，他们不得不屈服或离开这个国家。

那些因早期胡斯派被迫害从波希米亚赶出来的人，为宗教改革在波兰和普鲁士的传播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宗教改革首先进入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一个

是封地，另一个是现在迅速发展的波兰王国的一个省。它从这里进入利沃尼亚，在1561年的条约中被并入波兰王国。宗教改革在这些邻近社区的推进使得它不可能被排除在波兰本身之外，在那里，许多居民和有权势的贵族都对它（宗教改革）有好感。在接下来的议会中，国家的代表们越来越倾向于对那些接受福音信仰的人给予宽容。改革的事业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数量而受到阻碍，而是因为朋友的不和。新教党派分为加尔文派、路德派和一神论者（即否认基督的神性），即福斯图斯-索西诺的追随者。弥合这些分歧是约翰-拉斯科（John à Lasco）的目标，他在巴塞尔与伊拉斯谟（Erasmus）关系密切，在英格兰与克兰默（Cranmer）关系密切，他在晚年致力于此。他发现不可能按照伊拉斯谟的方式进行宗教改革，于是在新教方面采取了更加坚定的立场。1556年，他（约翰-拉斯科）从异国他乡回来，一直到1560年去世，都在努力促进加尔文派和路德派之间的团结。在此期间，宗教改革已经牢固确立。但是，尽管皇家权威保证了王国所有教会的平等权利，但新教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贵族们的态度。耶稣会想要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天主教反动派在波兰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他们的影响，以及新教徒的分歧。

新教运动通过波西米亚兄弟会和瓦尔德人的影响扩展到了匈牙利，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定居，而匈牙利学生则把维滕堡的教义带回了匈牙利。

路易二世于1526年去世后爆发的内战，使得奥地利的费迪南和扎波利亚的约翰这对王位的竞争者不得不采取宽容的做法。福音教义在人民中悄悄地、迅速地传播。但在这里，就像在波兰一样，新教徒们被分成了不同的教派，特别是在圣礼问题上。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的党派都有各自的追随者。然而，尽管有这些麻烦，新教仍在继续发展，直到本世纪后期，在耶稣会的支持下，强烈的天主教反应开始了。

在纽伦堡和约之后的十年间，查理五世因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和与弗朗西斯一

世的战争而被迫无法分心，因此让新教徒不受干扰。无论是新教的进步，还是其敌人的反对，或是其在德国的错误的热情，都无法阻止新教的快速发展。

对于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共产主义者的疯狂行为，路德教派并不同情他们；他们（再洗礼派）很快就被邻近的天主教王公们制止了。流亡的符腾堡公爵的武装复辟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带建立了新教。斯马尔卡尔德联盟现在因王公和城市的加入而扩大。

天主教徒对路德党的日益强大感到震惊，他们表面上是为了相互防卫而联合起来，成立了纽伦堡神圣联盟。皇帝需要新教徒的军事支持，以便使他的战争取得成功，他急于弥合分裂德国的教会分裂。最显著的尝试是在1541年的拉蒂斯邦议会和会议上进行的。两党的温和派人士在此举行会议，制定了和谐的条款。路德派的代表是梅兰，皇帝的代表是格罗珀和普夫勒格，教皇的代表是红衣主教孔塔里尼，他是天主教会中反改革的领导人之一。会议就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人的本性、原罪、救赎和公义--达成了实际协议。关于圣餐和教皇权威的分歧还有待调整。但由于法国国王的阴谋和教皇的恐惧，所有进一步的协调努力都被阻止了。

和解政策已经失败，但只要皇帝被外国战争缠住，他就不能诉诸武力。因此，他不得不批准纽伦堡的和平，并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来粉碎新教党。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在各方面都有了进展。在撒克逊选帝侯和黑森公爵驱逐公爵后，它（宗教改革）在勃兰登堡、撒克逊公爵府和不伦瑞克建立起来。它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获得了追随者。甚至教会的科隆选帝侯也采取了措施，在他的领地内采用了这种做法。

但新教党被内部的分歧所困扰。各个城市都在抱怨王公们的武断行为。撒克逊公爵莫里斯，不止一次与选帝侯处于战争的边缘，并最终在1542年放弃了

斯马尔卡尔德联盟。因此，新教徒在力量被削弱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皇帝抗衡，而皇帝在1544年与弗朗西斯一世媾和后，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处理德国的事务。然而，他们（皇帝与弗朗西斯）拒绝参加特伦特会议；教皇终于被说服召集了这次会议。查尔斯仍然继续通过新的联合建议，让他们看不清他的真实意图。他对选帝侯的头衔和领土的渴望比他的宗教信仰要强烈得多。皇帝声称要攻击斯马尔卡尔德联盟的两位领导人--选帝侯和黑森州长--不是作为新教徒，而是作为帝国和平的破坏者。

当这场重大斗争的时间迅速临近时，路德去世了（1546年2月18日）。他最后的日子是充满了疲惫和痛苦的最后日子。但他对上帝的崇高信仰和对真理最后胜利的保证从未离开他。他的教条主义在他所发动的战斗中，以及在健康不佳和年龄增长的日子里，变得更加喧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与梅兰的关系部分地被神学上的分歧所蒙蔽。梅兰修改了他的预定学说，并逐渐相信意志在转化中具有协调作用。同样，在圣餐的问题上，他也倾向于持有介于路德和慈运理之间的观点，即加尔文所主张的--基督在主的圣餐中被真正接受，但却是精神上的，而且是由信徒单独接受。虽然梅兰每天都担心这些意见的变化会激起改革者激情的爆发，但他从未失去对路德的尊重和敬意，认为他是一个虔诚而英勇的人，具有高贵的心灵和思想品质。路德也从未停止过对他年轻伙伴的爱。没有人会质疑，路德尽管有缺点和缺陷，但在世界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深具思想的独创性和表达的活力；对精神深处事物的洞察力；不经意间与最深刻、最严肃的思考相融合的幽默脉络；想象力的发挥--这些品质，是路德言论的特点，构成了一种不朽的魅力。一位本身就是诗人的柯勒律治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位诗人，确实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任何时代或国家都是如此；但诗歌的形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它们掌握了诗人自己的思想；″″路德没有写作，他演的是诗。″ 关于他对德国人民的深刻影响，没有人比现代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流派中最有成就的人、旧天主教徒的首领杜林格博士说得更有说服力。

这位终生反对新教的人详述了路德对德国人本性的完全理解:"德国人的心和思想在他手中，就像音乐家手中的琴"。他谈到了路德不可抗拒的口才，它把一切都带到了它面前。他补充说，"即使是那些憎恨他作为民族的主要异端和诱惑者的德国人也无法逃脱；他们必须用他的话语进行讨论，他们必须用他的思想进行思考。"

1546年爆发的斯马尔卡尔德战争，由于选帝侯的糟糕将领，造成了灾难。选帝侯本人在1547年的米尔堡战役中被俘。侯爵很快就被迫屈服了。但皇帝的胜利却因他与教皇保罗三世的争吵而受到影响。查尔斯的计划是让新教徒服从于天主教的统治，并通过实行某些外部改革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颁布了一个临时计划，称为"奥格斯堡临时计划"。

但他既不能指望教皇，也不能指望特伦特会议给予合作，而这正是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需的。尽管他一再提醒，理事会首先不是采取改革措施，而是宣布对新教教义的谴责。

对查理有利的尤利乌斯三世教皇的登基，以及他在特伦特重新召集的会议，似乎向皇帝保证了他长期以来无法获得的成功。但天空中的乌云正在聚集。土耳其人在匈牙利重新点燃了战争的火焰，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正在意大利与查理的敌人联合起来。德意志王公们对西班牙顾问受到的青睐感到嫉妒，并对外国军队的持续存在感到愤怒。莫里斯对自己的阴谋诡计的结果感到不满。他为查尔斯争取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头衔和领土，但他也赢得了那些被他背叛的人的仇恨，他们把他看成是另一个犹大。他很懊恼地发现，他在皇帝那里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争取释放他的岳父黑森州侯爵。他不得不忍受来自西班牙人的侮辱，这进一步伤害了他的感情。他决心把德意志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而他自己却把她送到了压迫者的手中。他以围攻马格德堡为掩护，深藏不露地制定了他的计划，突然向南进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迫使查理从因

斯布鲁克匆匆飞走。被俘的王公们被释放了，新教徒们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直到国民议会或总理事会解决分歧为止。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宗教和平得以达成。它体现了著名的格言：Cujus regio ejus religio--人民的宗教是他们王公的宗教。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教会保留条款，规定如果教会的一位王公成为新教徒，他就应该辞去他的教职。作为对天主教徒这一让步的回报，规定新教徒在教会王公的领地内享有宽容。在这场和平的条款中，埋下了纷争的种子，这种纷争将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着德国。在一段时间内，它并没有阻止宗教改革的进展。他为恢复德国教会的统一或粉碎新教党的努力完全失败了，这对查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拒绝亲自参与导致和平的程序。在他放下帝国的忧虑，退居尤斯特修道院后，他对自己允许挑起所有骚乱的人和平地离开沃尔姆斯议会表示遗憾。

==========

第三章

约翰-加尔文和日内瓦宗教改革

在约翰-加尔文开始撰写 "教义"，并将日内瓦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之前，路德已经在德国牢固地建立了宗教改革，慈运理在卡佩尔的战场上已经倒下了。

加尔文属于第二代改革者，他的工作是更清楚、更系统地阐述新教的原则。他是一个法国人，1509年出生在皮卡迪区的诺昂。他年轻时没有经历过许多

德国和瑞士改革者不得不经历的、与贫穷的粗暴冲突。他的父亲是诺昂领地的财政代理人和教区的秘书，以及他受到贵族们的尊敬，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世俗的优势来源。

他与莫莫尔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牧师，收入足以支持他。几年后，这个教区又增加了一个牧师。从一开始，他就注定要成为神职人员。在巴黎，他被送去继续学习，他因其不寻常的智力和某种严格而严厉的性格而出众。然而，他在那里没呆多久，他的父亲出于野心勃勃的动机，改变了他的计划，决定让他成为一名法学家。因此他去了奥尔良和布尔日，并参加了著名法学博士的讲座。他通过深夜工作，整理和消化白天听到的内容，来缓解他天生虚弱的体质。清晨，他就会醒来，在脑海中复习他所整理过的内容。他在法律研究方面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当教授们缺席时，他经常被邀请代替他们的位置。同时，受一位亲戚彼得-奥利维坦（Peter Olivétan）的影响，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圣经上，他是第一位将圣经翻译成法语的新教徒。在他的希腊语教授梅尔基奥-沃尔马（Melchior Wolmar）的恳切请求下，他对《新约》原文进行了研究，从而使他的思想更加准备好接受新教的教义。但在他的第一份出版物中，即塞涅卡关于″宽恕″的论文的注释版中，他不是作为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对他的书应该找到一个现成的销售渠道非常焦虑。在这本书发行后不久，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即他的″突然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发生了。他对上帝的圣洁和神圣律法的卓越理想的认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罪孽和错误似乎像一个深渊，他在其中挣扎。教会的忏悔和安慰都无济于事。他必须求助于上帝的怜悯，他必须凭信心进入基督的团契。加尔文的整个灵魂现在都沉浸在对圣经的研究中。然而，他并没有忽视他的其他追求，也没有打算进入一个改革者的积极生涯。他更愿意在隐居中继续他的研究。但他刚回到巴黎，就成了新教徒公认的领袖，所有希望得到宗教咨询和指导的人都在找他。迫害很快就把这个小团体打散了。加尔文的朋友，

尼古拉斯-科普，新当选的大学校长，在他的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改革者的核心教义。他的正统听众都感到震惊。神学博士和方济各会开始工作，要把科普和加尔文--很快就发现他是演讲的真正作者--绳之以法：但两人都逃出了城市。加尔文现在访问了贝阿恩，在那里，在弗朗西斯一世的妹妹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宫廷里，他遇到了年迈的勒费弗尔，尽管他从未放弃过旧教会，但他有权被称为法国新教之父。在放弃了他的良心不再允许他保留的施惠权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却又被改革派轻率的热情所带来的猛烈的迫害赶了出来。

改革者张贴反对群众的标语牌，使他们受到了激烈的迫害。他经过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受到了布克的热情接待，并在巴塞尔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找到了他非常珍视的退隐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他在法国的弟兄们的悲哀。国王开始了迫害，这些迫害使他统治的晚年变得黑暗。为了平息德国路德教派对其改革者的残酷待遇的愤怒，他指责法国新教徒具有再洗礼派的所有无法无天的狂热。为了向弗朗西斯证明这些指控的虚假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他与新教义产生共鸣，构成了加尔文撰写《基督教教义》的部分目标。在献给弗朗西斯的信中，他为国王受压迫的臣民的事业辩护，最后说：″但是，如果你的耳朵被恶人的耳语所占据，不给被告人留下为自己说话的机会，如果那些无耻的暴徒在你的纵容下，继续用监禁、鞭打、折磨、没收和火刑进行迫害，我们确实将像注定要被宰杀的羊群，被降到最极端的地步。然而，我们要耐心地安静我们的灵魂，等待主的大能之手，这只手无疑会及时出现，并为解救穷人的苦难和惩罚对他们的轻视者而展示自己的武装，这些人现在在如此完美的安全中感到高兴。愿主，万王之王，以公义建立你的王位，以公平建立你的国度！″这部杰出的作品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的作品。

《基督教要义》不仅是对神学的贡献，也是对文学的贡献。拉丁文版也因其语言的古典纯正而与众不同。加尔文是一位精确而完整的学者。他的话语没

有像路德那样打动普通人的心。他在文化和脾气上更像一个贵族，向更高和更有教养的阶层讲话。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他人到达社会的低层。他的《基督教要义》为宗教改革所做的工作是把它的教义思想浓化为一个系统的形式。在此之前，只有梅兰的一篇简短而不完整的论文是那些同情新教义的人可以求助于指导的唯一手册。加尔文很有资格完成摆在他面前的特殊任务。他有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逻辑思维，受到法律研究的约束，而且他具有法国民族所特有的组织天才。他与其他伟大的改革家不同的是，他的观点从他皈依到去世都没有改变。《基督教要义》虽然在后来的版本中得到了很大的扩充，但完全保留了其最早教义的特征。它们的卓越价值立即得到了承认，不仅是新教的朋友们，而且还有它的敌人，他们把这本书称为〝异端分子的可兰经〞。在加尔文的体系中，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标准；神的灵给了人们对那里所阐述的内容的洞察力，以及对福音真理的深信不疑。加尔文从未失去对教会的崇敬；不是罗马等级制度所统治的教会，而是按照新约圣经的模式建立的教会，并通过正确的圣礼管理和圣言的教导而为人所知。退出这个团体的人，就是与基督隔绝。在这个团体中，有一个无形的教会，由选民或所有真正的信徒组成。被认为是加尔文体系的主要特征，即预定论，是他的观点最初被其他改革者所认同的一个点。他们都坚持奥古斯丁神学（即强调上帝的恩典），反对伯拉纠主义（即强调人的优点），在他们看来，伯拉纠主义与中世纪体系的错误有关，特别是与功绩学说有关。但加尔文在其他人允许它（奥古斯丁思想）退居幕后后，继续强调这一思想。在这一特点中，他不仅受到他对上帝的崇高感的影响，而且受到他对宗教实际利益的关注。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完全受制于罪，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他们。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在亚当的堕落中，种族被卷入了一场共同的灾难中。人的意志可以自由地犯罪，但完全不能成为圣洁。所有的人都被公正地定罪，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其中一部分人被他选为永生；其他的人则被他抛在一边，遭受违反法律的公义惩罚。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走得更远。他似乎宣布，即使是亚当的罪也是有效法令的对象，是神圣机构的结果。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在这一

点上的表达有所缓和，并将自己限制在许可性法令的主张上。在拣选中，加尔文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的工作，它使人免受诱惑的攻击。与奥古斯丁和路德不同，他认为真正的信徒永远不会堕落。请注意尽管他强调人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但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肯定了人的道德和责任性质。预定和拣选的奥秘，他并没有假装去探究。他相信，全能者的每项命令都有明智和美好的理由，尽管对人的思想是隐藏的。

加尔文不仅是一个神学家，而且是一个评论家。如果说梅兰奠定了新教释经学的基础，那么加尔文做了很多工作来建造这座大厦。他对这种学术工作的偏爱，因其结果的清晰、彻底和简明而得到证明。他在讨论某段经文时是坦诚的、有正直品格的。他从不回避困难，而是与它们进行斗争。路德是圣经的翻译者，而加尔文是圣经的解释者。作为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加尔文不是一个轻率的圣像破坏者。虽然他要扫除因中世纪迷信的影响而滋生的腐败，但他要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不屈服于异想天开或狂热者的叫嚣。

在他生活的所有活动中，都表现出某些明显的性格特征。他强烈的信念使他对不同意见缺乏耐心。甚至他写给朋友的信中也不乏批评的语气，这种语气有可能威胁到像梅兰这样性情温和的人、并使之与他疏远。他天生的易怒性由于身体上的痛苦和不断挤在他身上的众多忧虑而加剧。

有时〝他愤怒的野兽〞，用他自己对自己的说法，不受控制地肆虐。在加尔文的虔诚中，注入了大量的旧约精神。对他来说，高举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吸收性的目标，使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使教会和国家都服从于它。凡是似乎对全能者造成羞辱的事情，例如，对真理的攻击，他都觉得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敌视。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对对手的怨恨之情误认为是对上帝事业的热忱。加尔文没有像路德那样在许多地方触及人类生活。他不具备那种对自然的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对撒克逊改革家来说是一种永久的安慰。虽然他（加

尔文）多年来生活在世界最美丽的风景中，但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任何由风景所暗示的东西。他沉浸在巨大的精神冲突的事务中。他忘记了自己身体上的痛苦，忘记了自己身体上的胆怯，忘记了自己对隐居和对学者的安静追求的热爱，他投身于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动荡之中，也陷入了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教的更大斗争之中。难怪在他死后，知道他是多么无私、果断、无畏的日内瓦元老院谈到了他性格中的〝威严〞。

在《基督教要义》出版后不久，加尔文访问了意大利，并在有成就的费拉拉公爵夫人的宫廷里呆了一段时间。她是法国路易十二的女儿，也是新教徒的保护者。在他（加尔文）返回巴塞尔的路上，他不得不经过日内瓦。就在他在那里停留一晚，期待第二天早上继续前往巴塞尔的时候，发生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件。

卡佩尔之战后，森林各州一直忙于将新教赶出那些不直接依赖城市的地区。然而，新教在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最近又在日内瓦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与他们的主教和他的盟友萨瓦公爵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日内瓦人在伯尔尼和弗赖堡的帮助下，实现了政治独立。

1532年，威廉-法雷尔，一位大胆有力的传教士，也是一位认真的改革者，来到了这座城市。与加尔文一样，他被迫害赶出了他的祖国--法国。他过分的热忱常常使他的生命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有一次，他从游行队伍中的牧师手中抢走了圣物，并把它们扔进了附近的河流。起初，他被赶出了日内瓦，他的生命归功于一把向他发射的枪的爆裂（从而躲过了死亡）。但伯尔尼的影响开始在那个城市（日内瓦）显现。法雷尔回来了，这一次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新教通过公民投票得以确立。除星期日外，所有的教会节日都被废除了，各种娱乐活动，如跳舞和化妆舞会，都被禁止了。人们庄严宣誓，要按照福音的规则生活。但是，一个热爱享乐甚至放荡的城市不可能轻易地被置

于如此严格的纪律之下。不满的迹象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党派出现了，他们叫嚣着要恢复古老的习俗和以前的自由。1536年8月5日，加尔文到达日内瓦时，日内瓦正被内部的纷争所困扰。法雷尔听说他来了，就去拜访他，并恳求他留下来协助他的工作。但加尔文辩称，他致力于更隐退的学者的工作。这位热心的改革者（法雷尔）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法雷尔）告诉他（加尔文），他可以把他的研究作为一个借口，但如果他拒绝从事他的工作，上帝的诅咒就会照在他身上。加尔文对这些以先知的热情说出的话语感到恐惧。他觉得仿佛万能的上帝之手从天上伸出来，把手放在了地上。

这样的召唤他不敢违抗。他的工作立即开始。他编写了一本教义来指导年轻人。纪律的带子被拉得更紧，围绕着这个已经叛逆的群体（日内瓦百姓）。人们被禁止佩戴虚荣的装饰品，或从事令人厌恶的运动。反对这些创新的党派被称为 ″自由派″，他们很快就占了上风，加尔文和他的伙伴们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公民，甚至与政府本身发生了冲突。

他们不顾地方官的禁止，在复活节主日布道，而且还拒绝停止传教，因而被逐出城外。

加尔文去了斯特拉斯堡。他说，他摆脱了困扰他在日内瓦工作的麻烦，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地继续他的研究，他的喜悦比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大。但在斯特拉斯堡，布克敦促他负责一个法国难民的教堂。在这里，同样不是恳求，而是从先知约拿的生活中得出的预言性警告，征服了他的不情愿。在他离开日内瓦的三年里，他认识了一些撒克逊神学家。他没有见到路德，他对他很尊敬，但他（加尔文）与梅兰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们因死亡而分离。梅兰逐渐接受了他对圣事的看法，但从未接受他的预定论。当波尔塞因宣扬反对这一教义而被捕时，梅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们在日内瓦把一个人扔进了监狱，因为他不同意芝诺的观点。

加尔文尽管性情特殊，却形成了强烈的依恋。他对他的妻子怀有温柔的关怀，他在斯特拉斯堡与她结婚，并与法雷尔和日内瓦的另一位牧师维雷特关系密切。贝萨像父亲一样爱他。加尔文与慈运理的追随者们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是不稳定的。他们起初怀疑他试图引入路德派的主的圣餐学说。他对预定的看法也让他们感到厌恶，因为慈运理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推测。加尔文好不容易才成功地缓解他们的恐惧，并通过接受共同的教规来实现联合。

日内瓦并没有因为传教士的放逐而恢复平静。暴力和淫乱的场面经常发生。天主教徒们正在努力恢复旧的宗教。卡彭特拉斯主教萨多勒（Cardinal Sadolet)给日内瓦元老院写了一封谄媚的信,敦促他们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对这份文件，加尔文以如此高超的方式进行了回复，以至于该市再次向其被放逐的传教士寻求帮助。人们派代表去劝说他回来。他们从斯特拉斯堡跟踪他到沃尔姆斯。对于他们的恳求，他用眼泪而不是用语言来回答。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并再次在日内瓦住了下来，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在他的影响下，一个新的教会和民间秩序被建立起来。国家有责任促进教会的利益，执行教会的要求，并为其提供支持；对那些不遵守教会规则的人进行惩罚。教会纪律掌握在主教团手中，主教团由六名神职人员和十二名教友组成。它对城里的每个人都进行道德审查。高层和低层，富人和穷人，都要服从它的灵活的法律。它拥有开除教籍的权力；而开除教籍的行为如果持续超过一定的时间，就会受到民事处罚。热那亚教会的传教士是由已经在职的牧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不过，会众们有否决权。他们组成了 ″可敬的团体″，为了保持专业服务的高标准，每个月在一起开会，互相督责。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工作并不局限于教会系统的安排。市民们对他的尊重使他在民法的制定中具有控制性的影响。

尽管他在奥尔良和布尔日接受的法律培训使他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但他的措施在构思上却过于偏重希伯来神权的精神。不仅亵渎和酗酒，而且无辜的娱乐活动和教授不同的神学教义，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还不是全部。琐碎的罪行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如此严格的纪律和如此严厉的规定下，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城市不可能感到满足。加尔文回国后不久，不满情绪的因素就暴露出来了。如之前，他的主要反对者是自由派。他们由两派组成，一派是灵性派，这是一个泛神论的教派，除此之外，还主张一种类似于现代〞自由恋爱〞的宽松婚姻关系；另一派是爱国者。这些人嫉妒涌入城市的法国人，他们急于把在加尔文的影响下逐渐落入少数行政长官手中的权力恢复给人民。但是，新的事物秩序给勤劳、守法的公民带来的繁荣，为加尔文赢得了许多支持者。这一党派的人数因外国移民而增加，其中许多人被接纳为公民。这场冲突是漫长而激烈的。自由主义派的成员试图恐吓加尔文。他们晚上在他的窗户下开枪；他们在街上放狗咬他。没有人不尝试任何手段来瓦解他的决心，但都是徒劳的。

在一个以日内瓦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联邦里，直言不讳的宗教异议被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还没有出现国家职能的现代理念。在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体系中，异端被认为是一种罪行，民政当局必须予以惩罚。旧约中的神权观点被认为仍然适用于公民社会。虽然改革者们偶尔会提出宽容的请求，但他们的总体立场在加尔文的话语中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看到教皇制度的捍卫者为他们的迷信如此痛苦，以至于在他们残暴的愤怒中流淌着无辜者的鲜血，基督教的行政长官们在保护某些真理方面完全没有精神，这应该令人感到羞愧。〞这种信念没有多久就结出了适当的果实。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具有聪明的、好奇的、不安分的心态。他很早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神学问题。他关于〞三位一体的错误〞的书于1531年出版。在书中，他主张一种与萨伯利亚理论密切相关的观点，

以及一种关于道成肉身的想法，在这种想法中，关于基督的两个本性的普遍信仰没有任何地位。在试图将加尔文卷入一场争论的努力失败后，他去了巴黎，致力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他在这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在法国南部的维埃纳居住了很多年，从事他的专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外表上符合天主教会的要求，没有被怀疑为异端。他又写了第二本书；他把这本书的副本寄给加尔文；这使他（塞尔维特）自己陷入困境。在这部作品中，他（塞尔维特）主张关于世界和上帝的理论，这些理论具有泛神论的倾向性。当人们发现塞尔维特是作者时，他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他否认自己写了这本书或关于〝三位一体的错误〞的书。但他寄给加尔文的《教义》注释本中的一些页面，以及一包信件，都从日内瓦得到。看到定罪是不可避免的，他成功地逃走了。不久之后，他去了日内瓦，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没有被认出来。但当他的存在被人知道后，加尔文立即将他逮捕。在随后的元老院审判中，塞尔维特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大胆而尖锐的辩护，但却有一种奇怪的猛烈的谴责。他讽刺了三位一体的学说。他把物理理论和神学推测混为一谈，他的听众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危险的，甚至是亵渎神明的。当他阐述他对万物参与神性的看法时，他轻蔑地告诉加尔文，如果他只了解自然科学，就能理解这个问题。当他的审判正在进行时，维埃纳的教会法庭派来了信使，要求逮捕他们的囚犯。塞尔维塔斯宁愿留在日内瓦，也许是依靠自由派的支持。但他们没能救他。被判刑后，他派人去找加尔文，请求他赦免对他的侮辱。他以英雄般的毅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于1553年10月27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毫无疑问，加尔文曾期望，而且从塞尔维特过去的表现来看，有理由期望他能放弃他的错误。当这一希望落空时，他试图让执行判决的方式有所缓和。但他认为，像塞尔维特这样对宗教基本真理的攻击应该受到死刑的惩罚。他与慈运理的继任者布林格，甚至与改革者中最温和的梅兰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塞尔维特死后两年，自由派做出了最后一次坚决的努力，要推翻加尔文建立的教会体系。当阴谋没有得逞时，他们诉诸于武器。叛乱的彻底失败是对他

们党的致命一击。加尔文并没有为他的敌人的倒台而高兴，尽管他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对他的许多诽谤。在提到他的地位所带来的烦恼时，他曾说：″为了他们所羡慕的我的权力，啊，如果他们是继任者！″

尽管照顾城市的民事和教会事务给他带来了重担，但加尔文还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即作为一名教师和教会成员，以及政治家、改革者的顾问，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在隔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讲道，此外还每周进行三次神学讲座。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手中没有一张废纸，就能解释先知们最复杂的经文。学生们蜂拥而至，到日内瓦听他讲解。像诺克斯这样的人，在日内瓦那里寻求躲避迫害的避难所，走的时候完全被他（加尔文）的思想所熏陶。在加尔文的指导下，日内瓦对罗马民族来说，就像维腾堡对德国人一样。一所神学学校在那里成立，贝萨被安排在那里。加尔文的影响不仅因其著作的流传而扩大，而且因其大量的书信，其中有君主、王公和贵族以及神学家的名单。在法国的宗教改革事务中，他的作用尤其突出。在（法国）那里推动新教事业的人向他寻求指导和支持。日内瓦是受迫害者的避难所，也是传教士前去继续战斗的堡垒。从它的印刷厂，《圣经》和许多其他法语出版物被散布到国外。

当加尔文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有幸看到日内瓦从派别纷争中解脱出来，他所创立的学习机构处于繁荣的状态。

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按照他的习惯，在白天繁重的公务结束后，他继续在晚上投身于他最喜爱的研究和写书。当他变得虚弱得无法坐起时，他就在床上向一位传令官口述。虽然他的身体因疾病而消瘦，但他的头脑直到最后还保持着活力和清醒。当他感到末日来临的时候，他叫来了元老院；他经常在元老院的审议中提供帮助。当他们聚集在他的床边时，他感谢他们给予他的荣誉，并希望他们原谅他的愤怒，因为他们曾如此忍耐地承受过。他向他

们保证，他在他们中间阐释上帝的话语是真诚的，诚实的，并敦促他们谦虚谨慎地保护国家免受仍然威胁着他们的邪恶。

然后他做了热切的祷告，并拉着他们每个人的手，因为他们带着眼泪与他分开了。两天后，他把城里和附近的牧师叫到床边，以类似的方式对他们说话。"与他分别时，"贝萨说，"我们的眼睛沐浴在泪水中，我们的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痛。" 他于1564年5月27日去世。

加尔文被赋予了一种奇妙的理解力。然而，他的想象力和情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他有一种组织的才能，使他不仅有资格成为一个教会系统的创始人，而且有资格成为一个持久的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在神学史上，就其影响的特点而言，他与托马斯-阿奎那站在同一高度。他在对他所认为的全能者的意志的奉献中忘记了自己。他对上帝的敬畏，也就是希伯来先知们所感受到的敬畏，在他的灵魂中没有为对人的敬畏留下空间。他的品质的组合是这样的：他在一些人中引起最深刻的钦佩，在另一些人中引起同样深刻的厌恶。然而，没有人能够仔细回顾他的生命历程和他影响的持久性，对他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卓越地位提出质疑。

加尔文的神学和教会体系所依据的原则，是公民自由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然而，在他在日内瓦制定的宪法中，教会的管辖权被扩大到对行为细节的管辖，达到了不适当地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赋予民政当局的强制力颠覆了宗教观点和崇拜的自由。但是，尽管加尔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他还是维护了教会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履行其自身职能的权利。教会因此成为自由的托儿所。无论加尔文主义在哪里传播--英格兰、苏格兰、荷兰或法国--人们都学会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反对民事统治者的暴政。此外，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是宗教自由发展的第一步。在迈出这一步后，国家将逐渐停止向作为其法律执行者的教会借出权力。在加尔文主

义体系中，平信徒在神职人员的选择和教会事务的管理中发挥了负责任的作用。他们在基督教社会中享有的管理自己的特权，很快就会在国家政府中要求得到。

加尔文神学的主导原则--上帝的主权思想--也在同一方向上产生了影响。与这位全能的统治者相比，人的生命和财富都取决于他的意志，所有世俗的统治者都变得微不足道。同时，个人的尊严也因意识到他是被上帝选中而得到加强。在这种思想和由此产生的愿望的鼓舞下，人民能够谦卑地对待国王的权力。

==========

第四章

法国的宗教改革

法国改革的来源

在新教兴起之前，法国已经见证了两次改革运动。十五世纪时，高卢雄鸡的神学家们曾试图消除教会滥用权力的现象，并阻止教皇的侵占行为。但是他们希望纠正的不是教会的教义，而是教会的管理。当他们把约翰-胡斯送入火坑时，他们标明了他们希望实现的变革的界限。没有人比他们在索邦学院、巴黎神学院和议会的继任者更敌视所有的教义创新。在高卢改革者崛起的两个世纪前，一场更为激进的运动在法国南部开始了。在这里，反天主教的教派--瓦尔德人--曾一度兴盛一时。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他们当时遭受的可怕迫害中幸存下来，并继续珍惜他们祖先的简单信仰。十六世纪最早的改革运

动不是从他们身上产生的，而是从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通过与意大利的密切交往而唤醒的文学和科学精神上产生的。弗朗西斯特别急于吸引天才人物到他的宫廷。法国人访问了意大利，并把在那里获得的古典文化带回来。在国王的恩赐和对西班牙暴政的恐惧的诱惑下，横跨阿尔卑斯山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来到法国，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复兴。但新学问的引进，特别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遭到了索邦大学在辛迪克-贝达领导下的激烈反对。于是，形成了两派，一派致力于新的学习，另一派则嫉妒地守护着中世纪的神学。

雅克-勒费弗尔，在人文主义者中被尊称为大学哲学和科学的恢复者，也是法国宗教改革之父。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深刻的宗教精神促使他认真地研究圣经。1509年，他出版了《诗篇》的注释，1512年出版了《保罗书信》的注释。在这些书中，他明确教导因信称义的教义，并将圣经视为宗教的最高和充分的权威。他认为，教会的改革近在眼前。早在1512年，他就对后来在法国和瑞士成为杰出的新教领袖的法雷尔说：″上帝将革新世界，而你将成为它的见证。″但他（勒费弗尔）的著作起初并没有引起反响。他的著作是写给有学问的人的，而且在性质上是神秘的而不是论战的。然而，当撒克逊运动的声音传到巴黎时，索邦大学的博士们就开始震惊了。他们决心不容忍任何偏离阿奎那教义体系的行为。异端被他们污名化，并被最高司法法庭--议会作为危害国家的罪行加以惩罚。1521年，也就是他们宣布路德为异端和亵渎者的同一年，他们谴责了勒费弗尔关于福音史的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上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他（勒费弗尔）和法雷尔、热拉尔-鲁塞尔以及其他传教士一起，与莫城主教布里科内（Briconnet）达成共识，后者与他们的莫城主教维埃纳（Viena，1616）的教义观点相同，并认真地参与了教会的重建。

他（勒费弗尔）认真地参与了他所在教区的教会管理。勒费弗尔（Lefèvre）

现在提出了一个从武加大译来的新约圣经，并比以前更清楚地阐述了福音教义。似乎莫城将成为另一个维登堡。但巴黎议会决定粉碎感染该地区的异端邪说。莫城主教布里科内在风暴面前屈服了，放弃了新的观点，甚至支持迫害那些他自己指导过的人。勒费弗尔逃到了斯特拉斯堡，但后来被弗朗西斯一世召回，最后住进了国王的妹妹纳瓦拉女王玛格丽特的宫廷。

法国宫廷里有两派。 国王的母亲，萨瓦的路易丝，以及与她一起的大法官杜普拉，准备帮助索邦大学迫害异端分子。路易丝被这个狡猾的教士（杜普拉）说服了，认为这样做可以弥补她私人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

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多纳公主，她赞同改革者的许多教义，并努力使他们免遭迫害。渗透到她所有宗教信仰中的神秘主义的深层脉络使她没有脱离（天主教）教会，也没有贬低大众。然而，她的诗作《罪恶灵魂的镜子》却以新教的口吻，引起了索邦大学的愤怒。在她与纳瓦拉国王亨利-阿尔布雷特（Henry d'Albret）结婚后，她继续在自己的小宫廷和公国里宣传福音教义，保护其信徒。

弗朗西斯一世本人对新教运动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热情，促使他支持伊拉斯谟式的改革。他不喜欢索邦大学，不喜欢议会，也不喜欢修士；但政治形势的需要常常迫使他接受路易丝和大法官的政策。在他在帕维亚战役中被俘后建立的摄政期间，异端分子在巴黎和各省被烧死。只有弗朗西斯突然从西班牙回来，才使路易-德-贝尔金（Louis de Berquin）--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和受人喜爱的朝臣--免遭火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神学家们也在他们的第二次攻击中获得了成功，贝尔金因此丧生。他们也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甚至冒险在一出学术喜剧中嘲笑国王的妹妹，对她提出了异端的指控。这种对王室的侮辱激起了弗朗西斯的愤怒。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惩罚罪犯，而是授权热拉尔-鲁塞尔在巴黎自由布道，并监禁了贝达，后者对他的布

道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此时（1534年），基督教的日耳曼部分已经被教皇统治，而新教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人们怀着急切的好奇心和关切之情等待着法国国王的行动。黑森州的侯爵亲自来与他谈判。但实际上，弗朗西斯反对任何冲击罗马天主教体系基础的改革。他不同情对圣事和等级机构的攻击。他不赞成在他的王国里搞宗教分裂的运动。他珍视古老的格言：″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教皇党试图用各种方式说服他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忙着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宗教变革之后必然会有一场公民革命。但最终诱使国王迫害新教徒的并不是他们的论点。1534年10月，某些激进的改革者不顾一切地将标语牌贴在巴黎街道的墙上，甚至贴在皇室寝宫的门上。

巴黎人的愤怒几乎没有比国王的愤怒更大。他立即参加了庄严的宗教游行，并以残暴的方式焚烧了18名异教徒，以此来显示他对天主教的虔诚。然而，他并没有中断与德国人的谈判。他甚至敦促梅朗雄到巴黎来参加宗教会议。他声称，那些遭受死亡的人是狂热分子和煽动者，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有必要将其消灭。但是，尽管他继续帮助德国新教徒的事业并培养他们的友谊，以削弱（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权力，他对法国改革者的政策却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他批准了一项严格的教义声明，索邦大学以指导传教士的形式提出了这一声明。他甚至没有进行干预，以使他的无罪的瓦尔登湖臣民免于被屠杀。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在他死后几年，他的国家陷入了内战，在此期间，它 ″不是欧洲的仲裁者，而是欧洲的猎物″，它的土地 ″成为教派和民族斗争的可怕战场。直到他的王朝在鲜血和泥沼中灭亡″，它才从这种战争中得到喘息。

在此可以就受苦的瓦尔登湖基督徒补充几句话。他们从未失去通过瓦尔多的影响而获得的精神。他们在1497年与波西米亚教友交流，并从那里得到了许多光亮和振奋。他们抛弃了对圣人的崇拜和炼狱的教义。通过与巴塞尔和斯

特拉斯堡的改革者交往，他们向他们派出了使者；他们被引导抛弃了七项圣礼的教义，并在1532年的一次会议上采纳了新教原则，但没有公开放弃罗马教会。正是由于他们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才引发了1545年在普罗旺斯的血腥迫害，当时有22个村庄被烧毁，四千人被无情地屠杀。在科提安阿尔卑斯山的东侧，瓦尔德人的教会受到迫害，但没有被瓦解。在卡拉布里亚，当接受新教传教士时，他们的会众被毫不留情地屠杀，如果被卖为奴隶后还能幸存下来。

新教最初以路德宗的形式传入法国，但由于日内瓦的影响，很快就变成了加尔文主义。

在本书前文中已经说过，从日内瓦的印刷厂送出了《圣经》和许多其他书籍。改革者们收到了加尔文的建议和鼓励信。在他的指导下接受教育的传教士前往散布在法国王国各地的小会堂，这些会堂在南方尤其多。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日内瓦越来越多地成为被宗教不容忍赶出本国的法国人的庇护所。在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新教受到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的青睐。但是，尽管宫廷内外的许多男女都不同情罗马天主教的偏执，但他们还是拒绝了加尔文主义，因为它要求对生活进行如此彻底的修正。

1547年继任其父的亨利二世，虽然与撒克逊的莫里斯签订了反对（德意志）皇帝的条约，但亨利二世并不是新教的朋友。但是，尽管新教信徒的书籍和个人被烧毁，新教徒的人数仍在稳步增长。1558年，据估计，他们有两千个礼拜场所。第二年，他们在巴黎秘密举行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们通过了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忏悔（信仰告白），并按照长老会的形式组织了教会。但法国国王并不准备允许异端在他的王国里如此增加。为了使他能够将武器转向自己的臣民，他与菲利普二世达成了一项和平，条件是对法国的羞辱。他〝以许多省份为代价，买下了西班牙国王在天主教党内的首领地位〞。他开始了

镇压工作，把两个主张温和政策的议会议员扔进了巴士底监狱。

在一次为纪念与萨伏伊公爵和西班牙国王的新婚联盟而举行的比赛中，他被偶然杀死。

到目前为止，迫害没有达到其目的。"一个殉道者消失在火焰中，就有一百个殉道者出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唱着马罗的诗篇或西门的颂歌走向他们的惩罚：——大多数受害者在死亡时都将目光投向那座新耶路撒冷，那座阿尔卑斯山上的圣城，一些人曾在那里寻求，另一些人则从那里接受上帝的话语。没有一个传教士，不从远处向加尔文致敬，感谢他为他准备了如此美好的结局。他们没有想到责备加尔文没有跟随他们进入法国，就像士兵责备他的将军没有投身于混战一样。"

亨利二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登上了王位，一个16岁的男孩，身心都很虚弱。他完全在他的妻子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叔父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的控制下，他们都是不妥协的天主教徒。王后凯萨琳-德-美第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狡猾女人，她希望通过玩弄一个党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她与吉斯家族结盟，以打破君士坦丁-蒙莫伦奇及其家族与波旁和夏蒂永家族的关系。

这一举措的结果是，新教徒不再仅仅是一个受迫害的教派，而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党派，由有血缘关系的王公和最高级别的贵族领导。在波旁王朝的王子中，最著名的是旺多姆的安东尼，他与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女儿让娜-阿尔布雷特结婚后成为纳瓦拉的国王，另一位是孔戴王子路易。在夏蒂龙家族中，最能干和最尊贵的成员是海军上将科利尼。这三个人都支持新教徒的事业，尽管他们的信念并不那么坚定和深刻。纳瓦拉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直到最后还在犹豫不决。孔戴是个出色的军人，但也不免有朝臣的恶习。科利尼，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一位能干的将军，一个

有着纯洁的生活和认真的虔诚的人。我们不能指望这些人静静地看到政府的控制权被他们认为是新起之秀的人篡夺；他们夺取了根据王国的法律和习俗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向受迫害的加尔文教徒寻求支持，而后者会通过他们寻求解救，这是自然的。他们并不希望放弃对国王的忠诚，而是要把他的邪恶谋士们的影响赶出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有力的联合行动。大胆地展示武力可以使王国摆脱篡夺者，使国家免于内战。但这一补救措施是不可能实施的。

安布瓦兹的阴谋流产，在大贵族中只有孔戴一个人知道，这使凯瑟琳和吉斯家族感到害怕，但也只是一时的。

严酷的迫害法令又重新开始了。然而，这并不妨碍科利尼在枫丹白露的一次贵族大会上向国王提交新教徒的请愿书，请求给予他们聚会做礼拜的自由。主张对胡格诺派（此时的新教徒开始被称为胡格诺派）采取更温和的政策的人占了上风，总督府被召集起来审议王国的事务。吉斯家族现在制定了一个计划，以粉碎胡格诺派领导人，并迫使总督府以及全国所有官员和牧师严格遵守天主教的规定。纳瓦拉国王和孔戴被引诱到奥尔良的法院。孔戴被逮捕，并因参与昂布瓦兹的阴谋而被判处死刑，纳瓦拉被卫兵和间谍包围。1560年12月，年轻的国王突然去世，新教的事业似乎失去了意义，政府的控制权落入了凯瑟琳-德-美第奇和纳瓦拉的手中，他们是亨利的次子查理九世的监护人，查理九世是凯萨琳-德-梅迪奇的次子，他还未成年。

如果纳瓦拉的安东尼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一个有自尊心的王子，他就会要求摄政，并会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对受迫害的胡格诺派实行更明智和更人道的政策。但他却卑鄙地将他的所有权力交到了凯瑟琳的手中。然而，在查尔

斯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宽容的程度有所提高，王后和她那思想开明的宰相L'Hospital明显希望弥合宗教上的分歧。它最大的支持来自于聪明的中产阶级，即城市里的工匠们。尽管有吉斯公爵的反对（他现在又加入了蒙特莫伦奇的行列），还有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阴谋，但宗教联盟的希望仍在继续增长。

1561年秋天，两个教派的代表在普瓦西举行了会议。在本笃会的大厅里，年轻的国王查理九世坐在法国贵族的中间，还有凯瑟琳-德-美第奇，纳瓦拉国王，孔戴亲王，以及宫廷里的大老爷和大小姐。天主教徒的代表是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索邦大学的博士。西奥多-贝萨和几位最杰出的胡格诺派传教士出现在这个辉煌的集会面前，阐述了改革者的教义。贝萨是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在公开会议之前，他已经赢得了许多在社会交往中遇到的宫廷成员的尊重。但是，分隔天主教和新教的裂缝太大，无法用学识和争论的技巧来弥合。在圣餐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次座谈会，无论其道德效果如何，都未能达成妥协。

翌年年初，圣日耳曼敕令颁布，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新教徒们要尊重天主教的仪式和典礼，交出他们已经拥有的教堂，并且不再建造。但他们可以在空旷的地方举行集会，并享受警察的保护。这一让步受到了胡格诺派和加尔文本人的欢迎。他们希望能够在它的保护下，使全国人民皈依，因为所有这类法令都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但天主教党人甚至不准备放弃这种有限的宽容。他们引诱软弱的纳瓦拉国王放弃了新教事业。这样一来，王公贵族和王后的联盟就被打破了，洛希尔的宽容政策也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这个时候，吉斯公爵的士兵在瓦西屠杀了不听话的胡格诺派信徒，而且是在公爵的眼皮底下。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法国各地的新教徒将这一暴行视为对宗教和平的肆意和残暴的侵犯，于是，内战开始了，直到亨利四世登基

才结束。胡格诺派采取的是自卫行动。直到政府证明自己无力履行其庄严的承诺，并纵容大量谋杀无辜的人，他们才起来造反。即使在那时，科利尼也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拿起了武器，而且只是在他妻子的眼泪和恳求下才被说服。这场第一次内战因昂布瓦兹敕令而结束。其条款对贵族们比对人民更有利。科利尼拒绝批准其中的规定，并同样反对孔戴在第二次战争结束后于1568年缔结《隆朱莫和约》的行动。

腓力二世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说服凯萨琳采取镇压措施，这些措施在西班牙粉碎了新教，在荷兰似乎也在努力实现同样的目标。天主教的反改革正在进行，耶稣会传教士激起了天主教徒的热情。然而，王后不会因为毫无保留地支持任何一方的事业而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天主教领导人的背叛行为导致了第三次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勇敢的孔戴在雅尔纳克战役中被杀。但是，尽管新教事业不断遭受挫折，科利尼还是能够保持他的军队，并重新开始敌对行动。和他一起的还有纳瓦拉的年轻王子--安东尼已经死了，还有孔戴的王子。这时，菲利普二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引起了法国人的警觉。他们认为，他参加对胡格诺派的战争只是为了促进自己的私利。因此，尽管已经取得了对新教徒的优势，宫廷还是与新教徒达成了协议，缔结了1570年的《圣日耳曼和约》。圣日耳曼和约延续了昂布瓦兹和约，并在他们手中留下了四个坚固的城镇作为条约规定得到履行的保证。这样一来，法国就陷入了自我分裂。有一段时间，似乎凯萨琳会不断地采取反西班牙的政策。她的一个儿子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结婚，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二个计划被证明更为成功。纳瓦拉王子亨利将与凯瑟琳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而孔戴将与克莱夫家族的一位公主结婚。新教徒的希望如此强烈，以至于科利尼本人也来到了宫廷，并受到了凯萨琳的热情接待。

但是这种好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她见到了圣巴托罗--国王被科利尼的高尚品格所吸引，已经听从了他的建议。科利尼敦促向西班牙国王宣战；当凯萨琳反对这一措施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担心伊丽莎白会从荷兰召回她的军队。她可以通过消灭胡格诺派的首领来阻止战争的发生。他的死对头，吉斯家族和安茹公爵，即后来的亨利三世，急切地在8月22日加入了这个阴谋。但刺杀科利尼的企图失败了。他受了伤，但并不危险。国王的怒火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点燃了，他去看望了受伤的老兵。科利尼把他叫到床边，告诫他不要听信凯瑟琳的劝告，也不要听信她所结成的派别。在场的王后本人无法听到这段以低沉的语调进行的谈话，但事后说服查尔斯告诉她科利尼说的话。她现在决定对胡格诺派进行全面屠杀，其中许多人被邀请到巴黎参加婚礼庆典。阴谋家们让国王满脑子都是新教徒要推翻他的阴谋的故事。当他最后让步，同意谋杀科利尼时，他用一种疯狂的语气要求把所有胡格诺派教徒都打倒，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对这一行为提出异议。8月24日晚上，大屠杀开始了。科利尼和其他著名的胡格诺派教徒首先被吉斯公爵和他的同伙杀死。然后，该市的一个大钟向其他阴谋者发出了信号。偏执的天主教民众被催促着去做血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毫不留情地杀害了。

异端的种子必须被摧毁。信使们被派往全国各地，在其他城镇也出现了同样可怕的场面。在巴黎，不少于两千人被杀，而在法国其他地区则有两万人之多。纳瓦拉和孔戴为了保命，不得不归顺天主教会。当这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教皇下令唱起了《圣歌》。这在马德里引起了类似的欢呼声。但在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人们都对这一残暴的罪行感到惊恐，对其肇事者感到憎恶。如果它的目的是粉碎新教徒，那么它是失败的。他们只是从苦难中获得了新的决心。自由派天主教徒，他们与狂热的兄弟们分开，并在1576年海牙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宽容政策。这个联合党派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576年，两年前继承王位的亨利三世给予了完全的宗教宽

容。在巴黎之外，权利平等。吉斯派在西班牙的帮助下，现在成立了天主教联盟，以维护天主教，消灭新教。在它的影响下，无用的国王放弃了他的宽容政策。内战再次在法国肆虐。阿朗松公爵死后，纳瓦拉的亨利成为王位继承人。在西班牙和罗马的支持下，联盟决定让他永远不戴王冠。1586年，第三次战争，即〝三个亨利〞的战争爆发了。国王厌倦了吉斯家族的统治，终于使公爵和红衣主教都被暗杀了。天主教徒的仇恨被这一行为激怒了，以至于他（国王）不得不在亨利三世的营地里避难。但即使在这里，他也不安全。他被一个狂热的牧师杀死了（1589年8月1日），这个牧师闯入了营地。

亨利四世现在通过继承权成为法国国王，但联盟的力量挡在他和王位之间。即使在它与西班牙联合的计划失败后，以及在它的3月14日的军队被法国人打败后，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联盟。

宗教的障碍仍然存在。许多支持亨利事业的自由派天主教徒绝不会同意他戴上王冠，除非他遵从其父辈的宗教。在他们看来，天主教和君主制是紧密相连的。有很多东西可以促使亨利屈服于他们的愿望。只有这样，他才能结束他的国家正在遭受的灾难。此外，他（亨利）还认为，作为国王，他可以保护新教徒不受迫害。

受这种放弃的心态的影响，他（亨利国王）走进了圣丹尼斯教堂，并于1593年7月25日，跪在布尔日大主教面前，宣布他将在天主教会中生活和死亡，他承诺将保护和捍卫天主教会。他的观点没有改变。他拒绝签署具体的信仰条款。他的行为只是外表上的服从。对科利尼来说，这样的原则性放弃是不可能的；但对亨利来说，他在营地长大，没有摆脱营地的恶习，也没有深刻的宗教信仰，这甚至可能是有功的。新教徒们被这一步骤吓坏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事业的背叛。

但亨利是真心实意地要保护他们。通过1598年的《南特敕令》，他们获得了他们所争夺的宗教自由，几座坚固的城市被留在他们手中。

南特敕令是对他们安全的保证。在亨利的对外战争中，他们的主要敌人--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被打倒了，王国的古老疆域也得到了恢复。

但是，尽管新教因此享有相对的安全，它却不再取得进展。它的追随者们不再被征服整个国家的信仰的目的所激励。他们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的政党，肩负着维持一个政治和军事机构作为对敌人的防御的必要性。

==========

第五章

荷兰的宗教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在荷兰，它几乎与目前包括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领土共存，并且构成了查理五世的大王国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新教迅速传播，尽管其信徒在早期受到迫害。人民的精神和职业，以及整个国家的气氛，都对接受福音教义极为有利。他们清醒、勤奋、热爱自由。他们的智力非常出色，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是居住在弗里斯兰地区小屋里的渔民，都能阅读和书写，并讨论对圣经的解释。低地国家离德国、英国和法国都很近，这为新观点的引入提供了便利。〞引用

耶稣会历史学家斯特拉达（Strada）遗憾的语言，″来自德国的莱茵河和来自法国的默兹河也没有向低地国家输送更多的水，而路德的传染病和加尔文的传染病分别由这两条河传入同一比利时省份。″ 随着新教徒人数的增加，以及法国和日内瓦的影响开始显现，路德派的教义让位于加尔文派。再洗礼派和其他迫害、淫乱和狂热的教派为数众多，他们的过分行为为严厉惩罚所有背离古老信仰的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但是，在荷兰镇压异端的第一份法令，即 ″标语牌″，以及随后的几份法令，都没有得到完美的执行，原因是查理在长期缺席期间将政府交给了摄政者，他们的态度很宽松。然而，1550年，另一项 ″加尔文主义 ″的发布令全国震惊。它不仅更新了以前的诏书，而且还提到了信仰的审问者，以及主教的普通法官。人们担心，可怕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将被引入。外国商人准备离开安特卫普，价格下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被中止。在摄政王的斡旋下，皇帝用 ″教会法官 ″取代了信仰裁判员。尽管在查尔斯的漫长统治期间，迫害法令并没有以其规定所要求的所有严厉程度得到执行，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异端分子而被处死。

1555年，荷兰的政府交给了继承其父亲西班牙王位的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的主要信条是政治和宗教专制主义。他对所有偏离既定信仰的行为都抱有不可抗拒的敌意。他把罗马教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除了他自己的自私野心的对象。在荷兰，他就像他的父亲被爱戴一样被人厌恶。查尔斯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贝尔格莱各省的古老特权进行任何直接攻击，但菲利普决心在那里引入同样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曾粉碎了西班牙的自由。由于他顽固地试图实施这一计划，他为受迫害的改革者的事业拉起了新的盟友，并引发了荷兰的叛乱，在北方，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新教国家。他选择摄政者的精神激怒了贵族阶层，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埃格蒙特伯爵和奥兰治的威廉。这两个人都曾为皇帝和国王本人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这使他们有资格得到菲利普的感激。埃格蒙特是一个具有杰出品质的贵族；奥兰治亲王，他的国家

未来的解放者，是一个明智的政治家。腓力不仅越过他们，选择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为摄政王，而且将事务的主要指挥权交给了格兰维勒，一个致力于他的政策的教士，1561年，他被任命为红衣主教。不久之后，人民和贵族们开始不满，因为西班牙军队继续驻扎在这片土地上，而且还建立了几个新的主教区。后一项措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主教人数太少，而该国的教会事务是由主教负责的，但它显然是用来收紧教会纪律的绳索和消灭异端的机器的一部分。这一政策遭到了抵抗，加深了违背人民--甚至是天主教人口--的普遍感受。公众舆论站在自由一边，反对强行镇压宗教异端。促使埃格蒙特和奥兰治的威廉等大贵族抵制菲利普的政治和教会暴政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而不是个人野心。

尽管新教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尽管查理的迫害政策激起了人们深深的不满，但以前的迫害法令现在又恢复了其所有的严厉性。一个普通人甚至读圣经都被宣布为异端。所有的激励措施都是为了鼓励告密者从事其不义之举。为被告说情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了使这些措施得以实施，查尔斯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并得到菲利普的确认，它不仅独立于神职人员，而且对他们有管辖权，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人民对持续斩首、焚烧和活埋众多同胞的行为感到愤怒，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国王的大臣格兰维勒。但是，即使在他被免职之后，宗教裁判所的工作仍然以更加无怜悯心的热情向前推进。作为议会成员的贵族们，尽管他们无能为力，但还是觉得他们对这些残酷的行为负有部分责任；当菲利普决定颁布特伦特的法令时，奥兰治亲王就政府正在推行的不义和危险的政策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使议会感到震惊。埃格蒙特去了西班牙，但却被国王的虚伪承诺所欺骗。许多贵族现在决心进行更公开的抵抗。他们中大约有500人联合起来达成了一项协议，被称为"妥协"的协议，以抵制西班牙的暴政和宗教裁判所。

虽然大领主们都不愿意参加，但拿骚的路易伯爵，比他的兄弟奥兰治的威廉

更激进，加入了这个联盟。联盟成员自称 ″乞丐″，摄政王的一位参谋曾轻蔑地将这个名字用在他们身上。这时，大量的人群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开始聚集在空旷的乡村，聆听加尔文教派的传教士，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礼拜。玛格丽特发现自己无力抵制民众的运动。甚至连国王也似乎要放松这些令人厌恶的法令，但这只是为了让人们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他更隐蔽地准备好最终征服他们的道路。

当国家处于这种兴奋状态时，1566年夏天，一场圣像崇拜的风暴从土地的一端肆虐到另一端。被迫害激怒的暴徒们闯入了大教堂和教堂，毁坏图片和图像，以及一切他们认为是天主教崇拜的偶像崇拜的东西。这种破坏图像的行为受到了新教牧师、奥兰治亲王和其他自由党领导人的谴责。这不能不说是疏远了许多认真的天主教徒的同情心，他们迄今为止一直支持爱国主义事业。虽然在威利安亲王和埃格蒙特伯爵的努力下，这个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菲利普决心对所有以任何方式阻碍恢复教会权威的人进行报复。他派遣阿尔瓦公爵，一位娴熟的将军，一个与国王本人一样狡猾无情的人，率领一万名士兵，前往荷兰。他的目的是通过消灭大贵族来粉碎荷兰的抵抗精神。威廉已经明智地退回到他的祖居地，但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对他们的危险视而不见，仍然留在那里。他们被扔进了监狱，不久后被斩首。阿尔瓦成立了一个 ″解决骚乱委员会″，人们将其命名为 ″血腥委员会 ″更为恰当。刽子手们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特别是在富人中寻找受害者，以使国王的国库得到充实。但是，尽管他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在发现阿尔瓦的政策并没有达到其目的之后，宽大的建议开始盛行。1570年，一项大赦令在安特卫普庄严宣布，虽然它保留了所有的法令，但规定那些没有被指控的人可以不受惩罚，只要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请求宽恕并从教会获得赦免。

斗争继续进行。奥兰治亲王不遗余力地捍卫着他的人民的事业。荷兰共和国的基础是由这些省份根据奥兰治的建议通过了一部自由宪法。然而，菲利普

仍然在形式上被认为是国王。人们对阿尔瓦的仇恨与日俱增。1573年，他（阿尔瓦）由雷克森斯（Requesens）继任，他的和解脾气对荷兰的自由比阿尔瓦的血腥行径更危险。但这位新摄政王的成功仅限于南方，在那里天主教终于占了上风。在他死后，他的士兵们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叛乱，导致佛兰德斯和布拉邦特的贵族们寻求与北方省份的联合，即根特和平协议。

雷克森斯的继任者唐-约翰不得不默许了这一安排。但是，威廉对它所给予的有限的宽容措施感到不满，并且不相信西班牙的承诺，拒绝接受其条款。战争再次爆发了。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在唐-约翰和继他之后担任摄政的帕尔马的亚历山大的带领下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然而，1579年1月，北方七省组成了乌特勒支联盟，这是荷兰共和国的雏形。第二年，菲利普宣布威廉为逃犯，并悬赏他的头。在六次尝试都失败后，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于1584年7月18日暗杀了他。但威廉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把他的同胞们从西班牙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尽管南方各省在乌得勒支联盟之后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条件，并同意新教徒必须在两年内离开该国或成为天主教徒，但威廉在北方创建的共和国继续增强实力和繁荣。在腓力三世的统治下，西班牙不得不与之签订停战协议，最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中，被迫承认其独立。

加尔文教派虽然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异端应受行政长官惩罚的教义。

他们和菲利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如何定义异端。

但他们没有能力实施这种非人道的残酷行为，而这正是他（菲利普）一贯乐于实施的。奥兰治亲王和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特点是要求对所有人，甚至对再洗礼派给予平等的宽容。而加尔文教派自己在与西班牙国王斗争的最后几年里，了解到 ″由于他们的罪过，他们（混乱的再洗礼派）不可能都被看为

同一宗教″。

教会与民政当局的关系是一个在改革派中引起分歧的问题。有些人赞成维持日内瓦的思想，即教会独立于政府。其他人，其中包括奥兰治的威廉，则认为民政当局应该在任命牧师和管理教会方面拥有权力。

争论的结果是，教会被限制为一个省级组织，各省被细分为若干等级，每个会众都按照长老会的秩序进行管理。

==========

第六章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及其原因

英国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相比，从大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政治性的改革。

它是英国君主制与罗马教会的联系的断裂。

发生的教会变革是这种国家独立宣言的自然结果。一开始，它们既不涉及教条，也不涉及仪式，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政体。在塑造新制度的过程中，都铎王朝君主的个人权威、政策和偏好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然而，神学原则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我们发现，教义和宗教因素混合在一起，而且效率

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逐渐转变为一个新教国家。

虽然我们读到一些团体秘密聚会，一起阅读英文的福音书，但没有明确的机构可以归功于洛拉德派（即那些追随和继承威克里夫思想的人；他们热衷于传扬福音）。显然，威克里夫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结出果实，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的乡村人口中。作为他的劳动成果，人们对圣经的内容更加熟悉了。新的学习为独特的新教观点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并在受教育阶层中传播。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停止在他们被柯莱（Colet）和莫尔（More）引导的地步；而沃尔西对学术的自由赞助，为激进地偏离中世纪的信条铺平了道路。路德的著作很早就在牛津和剑桥的年轻人中找到了认可的读者。

在这两所大学学习的威廉-丁道尔构思了向普通人提供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的计划。"如果上帝允许我的生命，"他对一位争论不休的神职人员说，"我将使一个从事耕作的男孩比你更了解圣经"。他活了够久，足以实现他的目的。

另一个年轻人约翰-弗里斯（John Frith）在剑桥取得学位后，被沃尔西邀请到牛津的红衣主教学院（现在的基督教堂）。他曾作为异端被监禁，但被沃尔西释放，逃到欧洲大陆，并在安特卫普与丁道尔会合，安特卫普有一段时间是一些年轻的英国学者的聚集地,他们一心想在自己的祖国种植路德教义。丁道尔和弗里斯都注定要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牺牲。

"一个年轻的国王，大约18岁，身材、力气、气质和美貌，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之一。虽然他喜欢享乐，但他也渴望荣耀；因此，在他心中有一条由荣耀到美德的通道。他也不是没有学问，虽然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兄弟亚瑟差了不少。" 这是培根勋爵对亨利八世的评价；他（亨利八世）在1509年继承了他的父亲--亨利七世；通过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结婚，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结合在一起。他的儿子是 "白玫瑰家族谱系和红玫瑰家族谱系的第一

继承人″。

当时，一切都有利于英国皇室权威。内战削弱了贵族的队伍，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位年轻的君主（亨利八世），除了使他受到臣民欢迎的个人优势外，还继承了他父亲积累的财富。他给王位带来了无限制的自我意志，一种顽强的性格，在这种性格上，争论和恳求就像羽毛落在岩石上一样。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为自己谋求一个绝对的权力。

他的王位归功于他哥哥亚瑟的早逝；亚瑟的遗孀阿拉贡的凯萨琳是斐迪南的女儿，因此也是查理五世的姑姑，亨利（八世）通过亨利七世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那里获得的豁免而得以结婚--与已故兄弟的妻子结婚是教会法律所禁止的。但直到他父亲（亨利七世）去世，婚姻才得以完成。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在欧洲争夺权力和统治权的主要竞争者之间的竞争中，亨利受到了吸引，因为他的外国野心迅速膨胀。

1520年6月，他在法国国王的陪同下度过了三个星期。沃尔西通过查尔斯的推动而升任红衣主教，并受到他对继承教皇职位的雄心勃勃的鼓励，对维持这一联盟有强烈的兴趣。但在随后查尔斯和弗朗西斯之间的战争中，英国人逐渐发现，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鲜血和金钱，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首先是阿德里安六世，然后是克莱门特七世晋升为教皇，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促使沃尔西将他的主人从一个盟友那里撤回，因为这个盟友没有为他们的服务提供任何补偿。1527年，亨利和弗朗西斯同意联合起来，将德意志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驱逐出意大利。

亨利与凯萨琳离婚的问题很快就成为讨论的主题，而从教皇那里争取取消婚姻的努力也持续了数年。亨利宣称，也许他是真诚的，他长期以来一直对这桩婚姻的有效性感到困扰，因为它违背了神圣的法律，因此不在教皇的权力

范围之内。他的几个孩子的死亡，只留下一个女儿玛丽，被一些人解释为是上帝不高兴的标志。同时，英国人民在对长期王朝斗争的新的回忆中，由于缺乏王位的男性继承人而感到焦虑。凯瑟琳王后方面声称，教皇有权批准与兄弟的遗孀结婚，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任何疑问，因为根据她的证词，她与亚瑟的婚姻从未完成。随着亨利对安妮-波利的热情日益高涨，他急于促成离婚。与罗马的谈判拖得很慢。凯萨琳比他自己大六岁，而且已经失去了她的魅力。他迷上了这个刚从法国宫廷出来的年轻英国姑娘。他决心打破与西班牙公主（即凯瑟琳王后）的婚姻关系，这位公主已经做了他近20年的忠实妻子。国王对教皇的拖延和摇摆不定的做法越来越愤怒，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教皇自然不愿意谴责其前任的行为，因此同时也不愿意削弱教皇的特权，而且同样不愿意冒犯皇帝。当教皇与查尔斯发生分歧时，红衣主教坎佩吉奥被任命与拥有遗嘱权的沃尔西一起，在英格兰对此事进行裁决。坎佩吉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拖延，并进行了调解。

查尔斯与克莱门特达成和解后，又将此案提交给罗马。这种做法耗尽了国王（亨利八世）的耐心。亨利决定把他的婚姻的有效性问题提交给欧洲的大学，他这样做了，在国外肆意使用贿赂手段，在国内使用威胁手段。同时，他还采取措施削弱教皇和神职人员在英国的权威。在这些行动中，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反对外国教会干预和教士控制民政事务的情绪。沃尔西的垮台是由于他未能促成离婚，以及安妮-波利及其家人的敌意造成的。甚至坎佩吉奥的巧妙拖延也被错误地归咎于他的伙伴。为了给这位被他提升到最高权力顶峰的大臣判处叛国罪，国王不顾一切地利用古老的præmunire法规，沃尔西被指控违反了该法规，因为他未经皇家许可，不诚实地担任了教皇在英格兰的代理。1531年初，国王指控全体神职人员因屈从于沃尔西的传教士身份而招致同一法律的惩处。

教士们聚集在一起，不得不恳求他的宽恕，并以一大笔钱作为回报才获得宽

恕。在他们的请愿书中，顺从他的口令，他被称为″英格兰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保护者和最高首脑″，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在沃勒姆大主教的建议下，又加上了″在基督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字样。教会虽然匍匐在专制国王的脚下，但在插入这一修正案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尊。议会禁止将教皇的圣谕引入英国。

国王被授权，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从教皇那里收回年金--第一笔收益。禁止向罗马提出申诉。亨利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使教皇放弃他的立场。大约在1533年1月25日，国王与安妮-波利私下结婚。在与教皇的斗争中，亨利得到了托马斯-克朗默的建议和支持，他建议亨利求助于大学，并向他保证国内的当局完全有能力对离婚问题作出最终裁决。沃勒姆去世后，克朗默于1533年3月30日被祝圣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亨利私下结婚11周后，新任大主教被授权和指示对离婚问题进行宣判。他和他的陪审员（在1533年5月）宣布（亨利八世）与凯萨琳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1534年，亨利被克莱门特七世有条件地逐出教会。直到1538年，保罗三世才颁布了将他从王位上废除的教皇令，并免除了他的臣民的效忠。克莱门特的圣谕是在3月23日发出的。11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至高法》。没有神职人员在投票时附加的限制性条款。此外，国王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和权威，以镇压和修正所有这些错误、异端和弊端，因为″通过任何方式的精神权威或管辖权，应该或可以合法地进行改革″。因此，一个广泛的监督职能被确认为属于他。1532年，议会被迫承诺在没有皇家许可的情况下不″制定、颁布或执行″任何措施，并承诺改变或废除任何″他认为与他的特权不一致的省级宪法″。教士们因此被剥夺了制定法律的所有权力。议会为修订整个教会法而设立的混合委员会，在这个统治时期没有被任命。

国王的婚姻解体，从而解除了英国与教皇的结合。如果不是因为亨利得不到教皇的支持，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不是亨利得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的支持,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君王的霸权意志似乎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魔力，并使任何可能被自然唤起的抵抗精神陷入瘫痪。议会很快就提出了他选择的任何要求，以扩大他的权力。教士们沦为卑微的服从，无奈地交出了所有独立行动的权力。值得称道的是，议会敢于对国王在教会中的至高无上地位表示同意，并设法阻止了对现有教会法的彻底废除。虽然神职人员在沃尔西的耻辱之后感到胆怯，但英国圣公会的等级制度从罗马分离出来的措施是由教会会议和议会的共同行动产生的。然而，神职人员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行动的，这一点也不无道理。民事统治者对 ″精神 ″和 ″世俗″，对神职人员和教友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解决帝国和教皇之间争议的一种方式，在中世纪的争论中曾被提出过。起初，克朗默和众多教会人士与他一起推动了国王之首的概念，以至于（在1540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基督教统治者任命，不需要授职，就能使神职人员有资格行使其属灵职能。但政府在通过《至高无上法案》时，起草了一份文件，其中宣布该法案表明，君主只拥有 ″上帝法律赋予国王的权力；而不是从属灵牧师手中夺取福音赋予他们的任何属灵权力。″ 在伊丽莎白时期（1559年），明确宣布，王室的拥有者并不 ″挑战教会中神圣服务的权威和权力″。这基本上是由权威机构发布的两份出版物中提出的观点，即 ″基督徒的制度 ″、″人的制度 ″和 ″一个基督徒必要的教义和博学″。国王的权力授权神职人员在他的领域内从事教会赋予他们的行为。在制定教会法律时，至少在名义上，主教团保留了其权力，但要得到他（国王）的许可才能行使，并且要得到他对所做事情的批准。名义上由教会选择的主教，实际上是由国王任命的；现在不用担心来自任何方面的对这一特权的行使的制约。毫无疑问，亨利本人倾向于将赋予他的权力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到与灵性有关的方面。斯塔布在他关于 ″英格兰宪法历史 ″的博学著作中提到了雷金纳德-菲茨-厄斯和托马斯-贝克特在被谋杀前的对话。在回答他从谁那里得到大主

教职位的问题时，托马斯回答说："我从上帝和我的教皇大人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东西，从我的国王大人那里得到了暂时的东西和财产。"雷金纳德问道，"你承认你从国王那里拥有全部财产吗？""不"教长的回答是，我们必须把属于国王的东西交给国王，把属于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大主教的话体现了普遍接受的观念；雷金纳德的话虽然不代表亨利二世的理论，但包含了亨利八世制定的学说的萌芽。值得补充的是，亨利八世不仅掠夺了贝克特的宏伟圣殿，还将他指控为叛徒，传唤出庭，判处死刑，烧掉他的骨头，并将灰烬抛向空中。对于熟悉奥卡姆学派的著作，特别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作品的人来说，所提出的作为国王头衔基础的理论失去了其新颖性。

在两个明显的例子中，人们对国王与教皇的最终决裂表示不赞同。1532年5月，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去了职务。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勒姆在临终前，当他病得无法用笔时，口述了一份抗议书，反对议会所有减损教皇权利或限制教会或他自己教区的权利的行为。国王为了吸收教士们在过去对教皇的所有效忠，他在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身上找到了一个称职的、心甘情愿的仆人，他任命他为总主教。

克伦威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晋升为国家的最高职位。他的早期历史并不十分清楚。甚至连他出生的确切年份也不清楚。他曾在欧洲大陆的不同国家待过很久，有时是个商人，有一段时间是个士兵。他在意大利的不同地方居住过。最后，他进入了沃尔西的麾下，为他收集被没收的修道院的财产，并为他做了有效的工作，这位慷慨的红衣主教用这些财产捐赠给他的学院。他在主人倒台时没有抛弃他，从而赢得了赞誉，尽管不能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一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带来了风险。亨利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能干的人，他既顺从又精力充沛，在使教会和神职人员无奈地服从他的意志的任务中，他可以依靠他，就像议会已经被降为奴役性的服从一样。

在这个时代的宗教争论中，英国处于一个中间位置。在主教区和议会中，有两派并肩作战。

丁道尔对《新约》的高尚翻译，是后来新教英语版本的基础，于1529年发行了第五版，而他对《摩西五经》的翻译则于1530年印刷。尽管有法律的禁止，还是有大量的丁道尔的新约圣经被带入英国。人们对获得和阅读圣经有一种急切而广泛的渴望。在这种影响下，新党--赞成向路德教方向进行教义改革的党派--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攻击性。克伦威尔的政策使自己，只要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安全和谨慎的，成为它的支持者。

它在神职人员中的领袖是教长克兰默。他曾被派往德国推动离婚事业，并在那里与路德派神学家奥西德的侄女结婚。由于之前的一次婚姻(大约1514年)，他失去了在耶稣学院的奖学金，在他妻子去世后，他又恢复了奖学金。毫无疑问，当他不情愿地接受大主教职位时，他是倾向于路德派的观点的。克兰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学家，自然倾向于和平与妥协，部分原因是由于某种胆怯和不自信，据说这些胆怯和不自信是在童年时受到一位学校校长的严厉对待而形成的。与这种和平的脾气有关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柔弱性格，这使他无法承受像亨利八世这样专横的君主的要求。在最高权威的支持下，他可以凭借活力和智慧，出于值得称赞的动机采取行动；但正如兰克所指出的，他的天性中缺乏英雄的因素，这使他最适合 "在困难的情况下挽救一个更有利的时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宗教启蒙和改革。他的目的常常被他的意志所阻挡，或被他脆弱的反对力量所抛弃。当障碍被清除的那一刻，它又恢复了它的方向。

成为伍斯特主教的拉蒂默，是由更坚固的材料制成的。他可以在国王面前大胆地说话。另一边是温彻斯特的主教托马斯-加迪纳，他支持国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是旧神学的一贯和坚定的追随者，正如他后来在下一个统治时

期通过愿意为它受苦而证明的。正是加迪纳称伊拉斯谟为 ″可憎的鸟″，它为路德孵化的鸡下了蛋。

诋毁国王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和否认超自然现象的人都被判处死刑。弗里思的生命本来可以幸免于难，但他关于圣事的手稿，有利于瑞士教义，落入当局手中，他于1533年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他当时只有三十岁。克朗默和克伦威尔一样，以前曾主张对他宽大处理，他也参与了这一行动。亨利八世以恶毒的手段追索的丁道尔，1536年在安特卫普被勒死并烧死。另一方面，加尔苏斯派的修士们被从伦敦塔拖到泰本，穿着长袍被吊死。导致弗里斯被捕的托马斯-莫尔和可敬的费舍尔主教被当作叛国罪送上刑场,尽管他们只是拒绝对判处他们死刑的法规的序言宣誓，从而确认国王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一个像莫尔这样因其美德而闻名的人被处决,在国内外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英国统治者决心不放过他的制度中最温和的反对者,即使需要实行恐怖统治。莫尔在1535年被斩首。就在这个时候，国王倾向于新教党。他觉得有必要与德国的新教势力保持友好关系，这些势力在预期与查理五世的斗争中已经加入了斯马尔卡尔德联盟。亨利不止一次地邀请梅兰来英国。经过克兰默的不断努力，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1539年发行了英文圣经，在扉页上写有铭文，从国王的口中发出：″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它是对1537年约翰-罗杰斯以T.马修的名义印制的圣经进行修订的结果。这实际上是科弗代尔对他自己和丁道尔的圣经的修订。这样，亨利在促使丁道尔死亡的三年后，将使这位殉道者丧生的作品散布在英国各地。

莫尔，随着路德教的传播，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不宽容，他曾写信反对丁道尔。莫尔抱怨说，他把 ″教会 ″写成了 ″会众″，把 ″爱 ″写成了 ″慈善″，把 ″牧师 ″写成了 ″长老″。但在莫尔的反对意见被听到之前，他自己就修改了最后一个译本，使用了 ″长老 ″一词。

1536年--在安妮-波利被处决和国王与简-塞缪尔结婚后不久，在他的命令下，苏特莱恩会议通过了教义条款，王国里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接受这些教义。圣经和三个古老的信条被作为教义的标准。据称，救赎是由信仰决定的，没有人的功绩；但有必要做善事。祭坛的圣事被谨慎地定义，但其用语是路德不会拒绝的。图像的使用和其他各种仪式、耳语忏悔（告解）和对圣人的祈求都得到了批准，但对这些做法的滥用提出了警告。炼狱的存在得到承认，但教皇拯救灵魂的权力，以及类似的迷信，都被否认。

制止修道院的两项伟大法案，第一项是在1535年，第二项是在四年后，是由克伦威尔计划并实施的。它们将大量的教会财产置于君主的支配之下。其中一小部分被用于捐赠新的主教区和大教堂。贵族乡绅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产，并因此被置于新确立的王权的约束之下。国王的国库得到了补充；但是，对英国的自由来说，幸运的是，王室由此获得的财富很快就被挥霍一空，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中，议会制政府是无法被免除的。戴着长袍的修道院院长被排除在上议院之外，该机构的统治权被留在了非专业（平信徒）的领主手中。这些措施刺激了天主教的反动。北方的一场叛乱被镇压了；但国王现在开始倾向于支持反新教党。1539年，违背克朗默和克伦威尔的意愿，《六条》被写入法规。这些条款规定了，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贞洁誓言的义务，私人弥撒的必要性和价值，以及耳语忏悔。拉蒂默拒绝接受这些条款，并被关进了监狱。教长向风暴低头，把他在兰贝斯的妻子送到了德国。他曾大胆反对新的信条，但当信条通过时，他没有再做任何抵抗，也没有失去国王的宠信。克伦威尔的垮台很快就发生了。他曾以绝对的权威治理英格兰，服从于他的皇家主人。他把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以及最高级别的平民都送上了脚手架。他的计划是将所有新教国家和法国联合起来，以英格兰为首，组成一个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大联盟。

为了推进这一计划，他（克伦威尔）曾一直在进行谈判--有时是在亨利不知

情的情况下与德国王公谈判。最后，他引导国王与撒克逊选帝侯的小姨子克莱威斯的安妮签订了婚约，她一到英国就被证明与霍尔拜因的画像大相径庭，而且她的长相和人品都令国王厌恶，所以他很快就从议会中获得了废除婚约的机会。国王对在这件事上对他实施的欺骗感到愤怒，使天平转向有利于加迪纳和大臣的众多敌人。

克伦威尔于1540年6月10日以叛国罪被捕、尽管有克朗默的说情，以及他自己热情的求饶，他还是在次年7月28日被斩首。他的性格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一类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另一类历史学家则认为他具有宗教的真诚和广泛的政治家式的政策。到了统治的末期，他还被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尽管国王和迫害派没有受到直接的抵制，但克朗默努力做着他所能做的事情，以促进对神职人员的教育和对礼拜的改善。从克伦威尔被处决到亨利去世之间的这几年，在新教历史上是多事之秋。1541年，在德国举行了会议，这些会议是为教会的团聚所做的努力。当时，查理五世在政治形势的驱使下，在路德教和教皇的极端要求之间采取了看似中间的立场。克伦威尔的倒台可能与亨利和他的保守派参谋们心中的这种团聚的希望有关--预计这种团聚将不包括实际放弃王室的最高权力。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之死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之间的联合开辟了一个前景。一项关于婴儿玛丽-斯图亚特与国王的儿子爱德华结婚的条约已经签订。这一计划被红衣主教比顿和法国在苏格兰的游击队推翻了。结果是与查理五世结盟，并由英格兰向苏格兰和法国发动进攻。

查尔斯对新教的迅速发展感到震惊，向斯马尔卡尔德联盟开战，该联盟宁愿与法国结盟，也不愿意与亨利八世在1545年提出的联盟结盟，亨利在特伦特会议的程序中看到，除了倒向克伦威尔的外交政策，他没有其他办法。他认为政治独立（包括他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宗教统一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

的两件事。他（亨利八世）在最后的日子里审视着英国，看到了阅读《圣经》和这个时代的大争论所产生的探究。在他去世前不久，在对议会的讲话中，他不无悲怆地抱怨说，"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分歧和缺乏爱，其原因仅仅是观点和为支持这些观点而设计的名称。" 补救措施，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从这样的来源开出的药方，被宣布为是慈善。因此，"他说--无疑是真诚的--"要像兄弟一样彼此慈善。"我非常遗憾，"他补充说，"知道和听到那颗珍贵的宝石--上帝的话语，在每家酒馆和小酒馆里是如何不敬地争论、镶边、歌唱和喧闹。"

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登基时还不到10岁，但作为精神早熟的典范，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被超越。他对新教的信仰非常虔诚。亨利性格中的力量，他在与外国势力的关系中的有利地位，通过镇压腐败的天主教修道院宗教团体获得的巨大财富，以及众多热衷于两种相互冲突的信仰的阶层的支持，使他能够维持一个既非天主教也非新教的教会。

在这种限制下保持两党的关系已经不可能了。国王的舅舅萨默塞特在摄政中取得了最高控制权，并被任命为各王公的保护者和总督。他为了个人利益而掠夺教会财产的行为非常明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他急于实施亨利八世的计划，将年轻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嫁给爱德华，并希望将两国统一为一个伟大的新教政权，因此他入侵了苏格兰；但是，尽管他的武器很成功，苏格兰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感太强烈了，无法克服，玛丽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与王储结婚。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爆发了一场天主教叛乱，诺里奇附近也发生了一场叛乱。叛乱被镇压了；但对萨默塞特的敌意，由于他在把他的兄弟作为叛国罪而带入监狱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加剧，给他带来了同样的命运。沃里克被封为诺森伯兰公爵，他的主要敌人，现在站在事务的顶端。他与法国缔结了一项条约，在该条约中，爱德华与玛丽结婚的计划实际上被放弃了。诺森伯兰的错误统治甚至没有体现出宗教的真诚，而这正是萨默塞特的一个优

点。"克伦威尔所建立的专制制度被一帮冒险家抓住了，在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兵的支配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 不仅在新教的反对者中，而且在整个国家中，都存在着一种恼怒，除了掌握权力的新贵族寡头所激发的恐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爆发公开的叛乱。

正是在这个危险和混乱的季节，英格兰新教教会的教规被制定出来。《六条》被废除了。克兰默的手，现在已经准备好宣布他所陷入的独特的新教主义。他的手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外国神学家们的加强，他好客地接待了这些神学家。

他带来了彼得-马蒂尔和奥奇诺,其中第一个人在1549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布克被召到剑桥大学担任同样的职务。梅兰的建议和存在，在布克死后，他被邀请担任剑桥大学的神学教席，在教长的恳切信函中被寻求。有人说，克兰默在四旬斋期间在他的餐厅里公开吃肉，这是事物新秩序的一个标志。绘画和图像被命令从教堂里拿出来。主日在教堂里宣读布道词。强制执行独身主义的积极法律被废除了。教会和议会指示，圣餐应以两种方式进行。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二大步骤，即正式放弃“变体”教义（即宣称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会神奇地、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新的礼拜手册被发布。这本礼拜手册的基础是古老的礼拜书，特别是索尔兹伯里（Sarum）的那些。新教的资料中也有一些补充，包括梅兰和布克为科隆大主教赫尔曼准备的礼拜仪式中的一些段落；还有一些援助来自于在英格兰的法国和德国难民的礼仪。不久之后，人们要求对祈祷书进行修改，以使其具有更明显的新教色彩。外国神学家们的影响就投向了这个方向。外国教会的简单形式被允许在英国拥有他们自己的礼拜方式，这并非没有效果。国王迫切要求进行这种改变。修订后的《祈祷书》没有提交给议会，于1552年发行，当时使用圣油、为死者祈祷和耳语忏悔（告解）都被废除了。

同年，宗教条款被制定出来，起初有42条。这些条款的主要来源是《奥格斯堡忏悔录》；但路德派的圣餐学说被放弃了。在新教徒中，主的圣餐是探究和争论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在瑞士，在这个问题上，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一个温和而明智的神学家，以及其他慈运理派的牧师，与加尔文达成了协议，并在《苏黎世忏悔录》中得到了体现。慈运理早先的极端言论在后来的补充解释中得到了一些限定。瑞士的教义现在与路德派的观点相对立。在制定《祈祷书》和修订《祈祷书》之间的间隙，教长本人已经转而明确采用了瑞士的观点。在提到爱德华执政之初时，他自己说："我曾陷入真实存在的错误中"--也就是路德派的观点--"就像我多年前陷入其他许多错误中一样，如'变体'"。爱德华国王颁布的一本供所有校长使用的教义，绝对是反路德教的。因此，1552年的条款中包含了对基督的身体在圣餐中的局部存在这一教义的正式否定，这并不奇怪。

新教改革者的运动对国家的普遍意识来说太快了。由此激起的反对声浪，以及诺森伯兰统治下的弊政，使得成功反对玛丽登基的希望破灭了。（此前，他说服爱德华把亨利八世和议会确定的王位继承顺序推到一边，把王位分配给诺森伯兰与他儿子结婚的简-格雷夫人）。玛丽很狭隘，拥有她父亲的顽固意志，而且迷信于她母亲的信仰。她在宗教和种族上的亲缘关系是西班牙人。她以最快的速度开展工作，因为她有更多的天主教顾问，其中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是主要的顾问；她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了旧制度，并撤消了前两任统治者的工作。加迪纳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在女王的议会中担任大法官一职。被罢免的主教们被带回了他们的教区。拉蒂默和克兰默被送入伦敦塔监狱。弥撒被恢复了，亨利八世颁布的礼拜形式也被议会重新确立。如果女王到此为止，全国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支持她。但是，放弃王室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英国再次置于教皇之下的提议是不可取的。它涉及到放弃亨利的制度，尽管加迪纳和其他人改变了对该制度的坚持，但该制度仍很受欢迎。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反对玛丽与菲利普的婚姻，她是出于个人原因

而希望这样做的，也是出于政治原因，她的王位需要保护，以抵御玛丽-斯图亚特的觊觎，自从她与法国王室的继承人结婚后，人们更有理由担心她。

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在1554年被任命为教皇的传教士，并将在大主教职位上接替克兰默，他是女王的精神顾问。现在开始了迫害，这场迫害使″血腥″这个词被贴在玛丽的名字上，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它比所有其他措施都更能在英国人的头脑中植入对″天主教会″的仇恨，并使新教的根基深入土壤。不少于800名生命受到威胁的英国人逃往德国和瑞士，在他们的新教兄弟中寻找庇护。据了解，留在国内的近三百人作为迫害的受害者丧生。主教霍珀、拉蒂默、雷德利和其他众多殉教者以崇高的毅力忍受了这场大火，使他们为之献出了生命。它打破了玛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在那些依附于旧有宗教、但对西班牙的偏执感到厌恶、并能欣赏受难者的美德的人群中。圣保罗教堂的教士约翰-罗杰斯--他曾协助丁道尔翻译圣经--当他被带往史密斯菲尔德时，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被他的坚毅所感动，纷纷欢呼。他把自己的手放在火焰中洗澡，″就好像是冷水一样″。″胡伯拄着一根棍子兴高采烈地走着″--他因坐骨神经痛而跛脚--″当他看到木桩时露出了笑容。″″扮演好这个角色，雷德利大师，″拉蒂默说，当他站在火焰中时；″今天我们将在英格兰点燃这样一支蜡烛，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它将永远不会被熄灭。″ 焚烧雷德利和拉蒂默的事件发生在牛津，地点是克朗默从他被关押的监狱塔楼上可以看到的。从这时起，他的精神，部分是由于身体的疲惫，部分是由于天生的胆怯，似乎完全没有了。在玛丽登基时，他曾拒绝逃亡，并坚定而有尊严地保持了自己。但他被争论、恳求和承诺所迷惑，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直到他被说服，在一连串的六次卑微和羞辱性的反悔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被带到了圣玛丽教堂，走上了火刑架；但在那里，他回顾了从他的软弱和恐惧中获得的对他的信仰的否认，并重新宣称他曾为之奋斗的新教信念。他的忏悔和彼得的忏悔一样真诚，如果他在勇气上比不上彼得，那么他在自以为是地相信自己有能力经受住诱惑方面与彼得很相似。他

曾用自己的右手签下了对信仰的否认，现在在火焰中伸出来，直到被烧毁。克朗默地位崇高，一个曾站在英格兰两位国王的床边向他们传授宗教最后的安慰的教士，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仁慈和温柔，正如波尔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证实的那样，吸引了人们对他的尊敬； 他在最后时刻的安静和可悲的尊严；他受到的残暴对待--一个现在年事已高的人--共同产生了对这些不人道行为的制造者的憎恶印象。但有必要提醒读者，克朗默本人并不是宗教宽容的倡导者。他参与了1533年对弗里斯的谴责，因为他否认基督在圣餐中的肉体存在，而1552年的条款也同样否认了这一教义；他参与了对让-布歇，即肯特的琼的处决，后者被称为再洗礼派，在爱德华时期因对化身的异端观点而被烧死；在爱德华的最后日子里，他和他的同僚们正在修订教规法，并制定条款来惩罚那些他自己不久前还坚持的教义的信徒，因为他拒绝了这些教义，所以他后来把弗里思和其他人都判处了火刑。他的脾气里没有天生的残忍，但他已经完全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左右，即在信仰和礼拜方式方面，君主的意志就是他的人民的法律，在这些方面的统一性要通过痛苦和惩罚来保证。

克朗默的殉教被称为〝对英国天主教的致命一击〞。但其他事件也有助于使女王不受欢迎。天主教反动派的支持者卡拉法被提升为教皇，取名为保罗四世。他不满足于将修道院的土地恢复到原来的教会所有者手中，以及在英国恢复修道院。玛丽自己也愿意满足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但她不能带着议会一起去。与之相反的是，她违背了国家的愿望和她自己选择的顾问的意愿，在菲利普与法国的战争中向他提供了英国的帮助，而当时西班牙的胜利只能使奥地利家族在西欧成为至尊。英国的自尊心因失去加来而受到伤害。在爱尔兰，集体的恢复并没有阻止英国定居者和他们所取代的世家之间的战争。法国与苏格兰的联盟带来了麻烦，在那里，新教因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以及与西班牙的联合而得到了帮助，而不是受到阻碍。保罗四世对新教有着狂热的敌意，他憎恨西班牙，而且对波尔没有好感，他一直同情孔塔里尼及其学派的较温和的神学。女王的整个灵魂都与天主教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她被迫目睹教

皇与她丈夫的对立，并看到她在宗教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教长被剥夺了代表教皇的枢机职务。她于1558年11月17日去世。第二天晚上，红衣主教波尔去世。

之前迎接玛丽的国家，现在欢迎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她年仅25岁，当时她的形象很好。她的生命曾因伊丽莎白的登基而受到威胁；因怀特的叛乱而受到威胁，据说她事先对此事有所了解；在玛丽的继承人的希望落空之后，她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她在罗杰-阿斯查姆的指导下接受教育，是一位优秀的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学者。她遵从天主教的仪式，但她对新教的倾向并不是什么秘密。一开始，她并没有做出急剧的改变；但很快她就把弥撒从她的小教堂里放弃，随后就恢复了王权至上，尽管她放弃了 ″教会之首 ″的头衔，而选择被称为 ″总督″。她将自己的当选通知了保罗四世教皇，但他傲慢地回答说，她是私生子，必须将她的要求提交给他决定，以对抗玛丽-斯图尔特的主张。之后，庇护四世提出做出重要的让步，如允许教友使用圣杯和使用英国礼仪；但他的提议来得太晚了。事实上，伊丽莎白的王位与亨利八世离婚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如果她愿意的话，她不可能放弃新教的宗教。她研究圣经，阅读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培根勋爵说：″如果她碰上了我，即使是在普通的谈话中，谈到上帝，她几乎总是把他称为她的造物主，并把她的眼睛和面孔组成一个谦逊和敬畏的表情，这是我自己经常观察到的″。然而，尽管她在显著的紧急情况下显示出她有一种宗教感，但在她的普通生活中，这一点却不那么明显。她缺乏女人的细腻，狡诈，亵渎，喜欢阿谀奉承，吝啬到极点，使最重要的事业陷入困境。但她无所畏惧，精力充沛，具有她父亲的坚强意志，并乐于接受皇室的辉煌和展示。她具有成为一国之君的公共美德，选择了最有能力的顾问，其中伯莱勋爵塞西尔是首席顾问，并控制了她自己的愿望--如放弃与莱斯特的婚姻--当它们与王国的福利发生冲突时。她在神学上是路德教派，对仪式并不反感。在她自己的私人小教堂的祭坛上摆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支燃烧的蜡烛。由于她的保守倾向和对王权的崇高理念，她不同情加

尔文主义，而加尔文主义在她自己的王国里正迅速兴起。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她不仅被迫向国外的加尔文教徒提供援助，而且还向反抗其君主的加尔文教徒提供援助--法国的胡格诺派，荷兰的新教徒，以及苏格兰的诺克斯的追随者。

这种干预首先是在苏格兰要求的。在那里，封建主义的精神还没有被削弱，对宗法制的感觉还很强烈。贵族们的做法极为粗暴，除了在少数情况下；他们的举止因与法国的交往而有所缓和。在詹姆士五世时期，国王和教士们因共同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以遏制动荡的贵族。没有什么地方更需要进行宗教改革。教士们愚昧无知，挥霍无度。他们从对贵族施加的没收和惩罚中获利。非宗教人士看到亨利八世在英国的所作所为，以觊觎的眼光看着他们的教士对手的巨大财产。

推进詹姆斯政府的主要代理人是红衣主教比顿，这个人性格不羁，但很有能力，是法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他证明自己有能力挫败亨利的努力，使他的侄子模仿他，与罗马断绝关系。与英国的战争随之发生。1542年，詹姆斯的军队在索尔韦-莫斯被英国人打败，他很快就死了。他在各派争斗的混乱中离开了王国，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母亲一方的公爵的侄女。

尽管比顿努力将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阿兰伯爵还是被任命为摄政王。在这里和那里，一种认真的宗教新教表现出来。早在1528年，曾在马尔堡就读的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就被当作异教徒处死。关于他，有人说他的异端邪说的烟雾 "已经感染了所有被它吹过的人"。1543年，曾是剑桥大学学生和校长，并在苏格兰各地宣扬福音教义的乔治-维萨特，被比顿下令在圣安德鲁烧死，比顿从窗口看到了他的痛苦，也看到了他承受痛苦的勇气。

我们第一次听说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苏格兰宗教改革的领导者，是

作为他的同伴。诺克斯在布道时，为了保护他，带着一把双手的剑。正是从维沙特的布道中，他得到了深刻的宗教印象。人们对他的父母亲知之甚少，他的父母亲是不明显的。他在格拉斯哥学习，他的老师是索邦大学的博士约翰-梅尔，他从法国带回了教会政府的高卢理论，以及关于王权的起源和弑君美德的民主思想。然而，如果有的话，他对他的学生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诺克斯可能在25岁时被任命为牧师。维沙特死后，他成了一个男孩的私人家庭教师。1546年，比顿被阴谋家暗杀，阴谋家是出于对他的残忍行为的憎恨和对私人伤害的怨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的敌意。诺克斯没有参与这一血腥事件，但他并不感到悲伤。

比顿的敌人在圣安德鲁的城堡里避难。一段时间后，诺克斯和他当时指导的学生们一起加入了他们。在那里，他被召去讲道，并勉强服从了他的弟兄们几乎是强制性的召唤。城堡被法国人攻占，他作为俘虏被带到法国，被迫在大帆船上划船。1549年获释后，他受到克朗默的热情接待，在英格兰北部传教，但他对爱德华的教会制度不够满意，没有接受向他提供的主教职位。在玛丽统治时期，他是个流亡者，先是在法兰克福，在那里他是反对使用英国祈祷书的党派的领袖。在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日内瓦度过的，与加尔文和其他与他有联系的传教士在一起。

吉斯的玛丽是詹姆斯五世的遗孀，现在是摄政王，她暗地里想让苏格兰臣服于法国；但她对英格兰的玛丽和菲利普的敌意使她甚至让这个国家成为她新教敌人的庇护所。诺克斯于1555年返回，在全国各地传教，效果很好。他不仅赢得了大量卑微阶层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许多贵族和乡绅的支持。他在讲坛上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偶像崇拜，人们的反应是把圣人的形象打碎，把寺院拆掉。他谴责弥撒是对一个假神的崇拜。不久，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这个国家，并接受了日内瓦的召唤。但这项工作获得了如此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在他鼓舞人心的影响下，甚至从远处看，它也在向前发展。已故国王的私生

子詹姆斯-斯图亚特勋爵是加入这项工作的主要贵族之一。

在1557年，"会众的领主们 "在第一个庄严的盟约中联合起来。据此，他们放弃了 "撒旦的聚会，以及其中所有的迷信憎恶和偶像崇拜，"并承诺捍卫整个基督的聚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诺克斯于1559年回到了苏格兰。在北方王国，有一个反对摄政王所代表的既定权力的臣民组合。然而，情况迫使伊丽莎白帮助起义者，并代表加尔文主义和叛乱进行斗争，她对这两者都很厌恶。

在与新教徒的冲突中，苏格兰摄政王取得了胜利。苏格兰摄政王请求法国军队的援助。1558年，玛丽-斯图亚特嫁给了弗朗西斯二世，并通过一项秘密协议放弃了她的王国。根据秘密协议，在她死后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将她的王国交给了法国。弗朗西斯和玛丽自称是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西班牙的菲利普预计，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伊丽莎白很快就会需要他的帮助，而英格兰也会因此落入他的掌控。但这位斗志昂扬的英国女王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勇敢面对一切危险。她把她的军队派往苏格兰。她取得了成功，1560年，在《爱丁堡条约》中，双方同意法国人应该撤退，苏格兰的政府应该交给一个上议院来负责。摄政王于同年6月去世。议会于8月召开会议。根据苏格兰议会的法案，加尔文主义新教被定为苏格兰的既定宗教。

玛丽的年轻丈夫弗朗西斯二世于1560年12月6日去世。凯萨琳-德-美第奇现在获得了权力，并着手在法国的敌对各方之间进行调停，并压制住了贵族的野心，尤其是抑制吉斯家族的野心。

玛丽回到了她自己的王国，坐上了她的王位。她人长得漂亮，思维敏捷，讲话引人入胜，而且精力充沛，有无穷的能量。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在苏格兰恢复古老的宗教；但如果试图立即这样做，就会使她面临一定的失败，

而且会使她从未停止过的另一个计划--为自己争取英格兰王位的计划落空。她把事务的主要领导权交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她封他为默里伯爵。在她自己的小教堂里做弥撒是她好不容易获得的特权，因为这遇到了诺克斯严厉的公开谴责。

诺克斯在圣贾尔斯的讲坛上宣布了所有这种偶像崇拜的行为。他从一开始就猜到了女王的最终目的，而她对几乎所有接近她的人都有效地施加了魔法的力量，但这个明察秋毫的传教士却没有发现。他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史》生动地叙述了他与女王的会谈，以及他作为女王主要对手的冲突的进展。她很谨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建立新教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法国内战爆发后，玛丽的希望随着她的叔叔们和他们所领导的极端天主教派别取得的每一个优势而上升。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吉斯的胜利将意味着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的垮台，然后将是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崛起和伊丽莎白的毁灭。但是，玛丽在这方面的希望由于伊丽莎白和凯瑟琳-德-美第奇在1564年达成的和平而破灭。然后，她放弃了与唐-卡洛斯或欧洲大陆其他强大的王公联姻的希望，部分是出于爱的冲动，部分是出于政策，作为拉拢英格兰北部的大伯爵和英国一般的天主教徒的一种手段，她把自己的手交给了她的堂兄达恩利。他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格丽特的孙子，在詹姆士四世死后，她嫁给了安格斯伯爵。与达恩利的婚姻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新教，以及对伊丽莎白的王位和生活都是一种威胁。

在这一时刻，有一种担心，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担心会有一个联合的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在各地粉碎异端。达恩利的无用性格是避免大不列颠的新教遭受巨大危险的方式。他的傲慢无礼激怒了贵族们；他的酗酒和其他低级恶习使他的妻子感到厌恶。Rizzio，一个意大利人的宠儿，促成了这场婚姻。他的谋杀是一个阴谋的结果，其中达恩利和一些新教的领主是合伙人，里齐奥对他们很讨厌。

即使在那时，玛丽在宗教政策上的明显节制，与她的孩子，即后来的英格兰詹姆士一世的出生有关，给她继承、甚至取代伊丽莎白的前景带来了光明；但导致她将自己置于博特维尔的影响之下的痴情对她的期望是致命的。无论她是否与谋杀她丈夫有关，她都与博特韦尔结婚了。在卡伯里山，博特韦尔的军队和苏格兰诸侯为消灭他而组建的军队之间避免了一场战斗，因为玛丽投降了。

玛丽作为囚犯被带到了洛赫勒文，在那里，她放弃了王位，在她儿子未成年时任命默里为摄政王。她从洛赫勒文逃脱后，她的军队在朗塞德被打败，她仓促地逃到了英格兰，在那里她得到了伊丽莎白的保护。

詹姆斯加冕后，苏格兰议会确认了1560年关于建立新教的法案。这一结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诺克斯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诺克斯的精神，他在抵制贵族的贪婪和野心，以及他们对妥协的过多准备方面，比在抵制女王的诱惑和威胁方面的决心不小。

在苏格兰教会的宪法和政府中，教友长老团占据了突出的位置。1578年，″第二部纪律书″体现了苏格兰教会完整的长老会组织，从教区会议到长老会和省议会，层层递进。长老会和省议会，直至大会，后者是最高的。监督员被保留下来，其职能是执行大会的措施。在法兰克福，诺克斯编写了一本用于公共礼拜的奉献书，他在日内瓦的教堂里使用了这本书：″祈祷的形式和圣事的执行等，在日内瓦的英国教会中使用，并由著名的、虔诚的学者约翰-加尔文批准″。

这一点，加上一些修改，导致苏格兰教会的″公共秩序书″问世。它不包含

赦免的形式。它包括一份信仰告白，与议会和大会通过的信仰告白不同。这部新的忏悔书源自加尔文与使徒信经有关的慕道书。圣礼的教义与加尔文的教义相同，区别于路德派和早期慈运理派的理论。有一种普遍的形式是将不配的人从主的桌子上驱逐出去，与圣事的传授有关。婚姻和洗礼都是在周日在教堂举行的。这本〝公共秩序书〞持续使用了大约一百年，后来在与英国祈祷书的较量中，它被放弃了。长老会制度由大会确立后，教会的旧政体作为法律问题仍然存在。教会有主教，也有修道院院长和牧师；1560年后，这些职位由新教徒担任，有时也由平信徒担任。1572年，教会和民政当局之间达成协议，大主教和主教的旧名称和头衔应继续保留，尽管现任者没有比监督者更大的权力，并且在灵性方面受制于教堂和大会，正如他们在世俗方面受制于国王一样。教会的世俗事务大多流向了非专业人员的手中。这就是诺克斯所谴责的：以刚才描述的朦胧形式出现的主教制的复兴，似乎很少或没有引起他的反对。大约二十年后，在安德鲁-梅尔维尔的主持下，长老会制度，纯粹而简单的制度得以建立。随后，詹姆士六世试图确立王室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引入英国圣公会的政体，开始了王室与教会之间的较量，这也是下一个统治时期的标志。

英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变化是由伊丽莎白谨慎地、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的。牧师们，即使他们有能力，有活力，在大城镇的宗教政策中也很强大，但在她的臣民中仍然只占少数。

教士们在会议上抗议宗教的改变，并肯定了圣体的教义和圣彼得的继承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起初，教区的牧师们并没有严格要求服从她的至高地位。她冒险恢复了祈祷书，并通过《统一法案》来强制使用它；但在伊丽莎白的修订中，它的修改显然是为了通过删除令人不快的段落，来调和罗马天主教徒。直到玛丽-斯图

亚特在苏格兰开始了她的阴谋，而吉斯家族在法国获得了权力，才对所有的神职人员严格要求走上了至高无上的道路。同样，它也被强加给各个级别的文职官员。

同时（1562年），宗教会议修改了条款--这些条款从四十二条减至三十九条，神职人员被要求签署这些条款。这些最后的措施是伊丽莎白与教皇争斗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女王通过《最高法》和《统一法》所拥有的权力的使用情况，以及通过高级委员会法庭，该法庭拥有充分的权力。

该法院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以使这些法律付诸实施。除了更好的动机和政策考虑外，她本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使她不屑于探究其臣民的意见，也不屑于为单纯的信仰施加惩罚。在她的统治下，所谓的宗教迫害几乎都是间接的。所要求的是遵守有关外在崇拜的法律，并放弃对所有外国教会权威的效忠。伊丽莎白的政府采取了所有路德教新教徒所采取的立场，并在德国用格言来表达，即cujus regio ejus religio：一个国家的宗教就是君主的宗教。只有加尔文教派拒绝接受这一教义,因为他们否认地方政府有如此广泛的特权。即使是他们，当他们能够控制国家的行动时，如在苏格兰或在日内瓦，也会强制执行统一性。此外，需要记住的是，在宗教事务中控制民政当局是中世纪与教皇的长期斗争中所争夺的目标，也是反对神职人员篡权的目标。

除了上述意见之外，还应该补充说，不管是什么伤害和其他罪恶，都是在中世纪与教皇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

对于上述意见，应该补充说，无论亨利八世的专制主义和伊丽莎白的专制主义产生了什么伤害和其他弊端，在这个不和谐的时代，只有通过英国的一个

强有力的政府，才使这片土地免于内战的难以言喻的灾难，在内战中，就像在法国一样，这种竞争的自然仇恨会因宗教敌意而变得加倍激烈。

在这个统治时期，对罗马天主教徒采取的严厉措施不是因为与他们的神学有任何对立，而是因为经常与之密不可分的政治敌意、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的严重性，王室和王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女王的新教被当作外国势力攻击她的理由，并被用来谋害她的生命。

1569年，在法国战胜胡格诺派之后，英格兰北部发生了天主教叛乱。他们要求玛丽的继承权应得到承认。1570年，皮乌斯五世颁布了他的圣谕，将女王逐出教会，罢免了她，并解除了她的臣民的效忠。教皇鼓励北方的英国天主教徒造反。西班牙的菲利普只是出于谨慎的动机，才没有派部队到英国去帮助他们。事件的发展逐渐导致与西班牙的直接冲突。为了自己的安全，她暗中向荷兰的菲利普的叛乱臣民提供援助。她还暗地里向胡格诺派提供援助。最后，荷兰新教徒的绝望状况使她不得不公开派兵援助他们。不久之后，德雷克出现在圣多明各前，并占领了该岛。随着英国渐渐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国内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568年，艾伦博士在杜埃（Douay）建立了一所天主教学院，以教育牧师在英国服务。在格里高利十三世的鼓动下，他们于1576年开始工作。他们自然被伊丽莎白和她的参谋们认为是叛国的煽动者。培根勋爵将他们描述为"神学院的牧师，他们在外国长大，由外国王公的钱包和慈善机构支持，他们是这个王国的公开敌人，他们的时间是在一些地方度过的，在那里，除了被驱逐和被诅咒的异教徒，从来没有听说过伊丽莎白的名字；"他们 "用自己的艺术和毒药使整个天主教徒堕落，并以一种新的恶毒的酵素使之变质，而这些人以前是比较温顺和无害的。" 最后，牧师们被禁止上岸，否则将被处以死刑，而庇护他们也被定为叛国罪。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被扣押和处决。伯利向世人解释了女王是如何被迫背离她

开始统治时对罗马天主教徒采取的仁慈和宽容的政策的。但她对这一变化的辩解并不能作为在后来西班牙入侵的危险结束后对牧师实施惩罚性法律的借口。玛丽-斯图亚特是新教英国的敌人和伊丽莎白的希望。她的顾问们认为玛丽的生命是一个永久的人。当她在巴宾顿的阴谋中的共谋被证实后，她的死刑令被签署、她在福瑟林盖被斩首。

西班牙征服英格兰的舰队的航行，是主要在海洋上进行的长期的、不稳定的战争的高潮。这是天主教反动派为消灭新教力量而作出的最大努力。这支强大的舰队被英国海员的英勇行为所摧毁，再加上暴风雨的加强，对新教英国的敌人的希望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理解清教徒的争论，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圣公会的总体特征，因为它是在伊丽莎白登基后确定的。那场争论并不是因为神学教义上的任何分歧而产生的。不应忘记，新教徒产生分歧的主要问题是主的圣餐。英国的改革者们采用了瑞士的主的教义，其形式是布林格和加尔文所持的。

在这两类神学家之间建立了完全的和谐，这种友好关系通过不断的通信得以体现和保持。关于克朗默皈依瑞士教义，以及将其纳入《四十二条》，我们已经说过了。1562年，在修订条款时，省略了对路德派观点的尖锐和强调的谴责，并撤销了对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存在（于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的否认；但修订后的条款（二十八和二十九）中的陈述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朱厄尔主教写信给彼得-马蒂尔：″至于教义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删掉了，与你们的教义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因为对于普世主义理论″路德宗的观点--″在这个国家没有危险。那种观点只有在石头有感觉的地方才能得到认可。″ 在被派往教堂宣读的教义中对该教义的解释与加

尔文的教导完全一致。

- 胡克写道：″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正存在，″″不是在圣餐中，而是在值得接受的人身上″。在1552年的祈祷书中加入的圣餐仪式结束时的标语，在伊丽莎白的祈祷书中被取消，但在1661年又被恢复。

在预定的问题上与欧洲大陆的新教教会没有任何冲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教徒们共同持有奥古斯丁预定论信条的基本观点。英国的改革者们，包括克兰默和雷德利在内，都信奉无条件的拣选学说。克兰默--且不说其他证明--在《大圣经》的注释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坚持的是奥古斯丁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体系的主要特征。这一教义在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了。在爱德华的整个统治时期，加尔文的个人影响力在英国是巨大的。在伊丽莎白统治开始后，它的影响力更大了。″他的《要理问答》，″布朗特说，他是高等教会意见的捍卫者和加尔文主义的反对者，″一般都在神职人员手中，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神学教科书。″ ″哈德威克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成为大学学生的一种神谕和教科书。胡克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写道，加尔文的权威性与 ″句子大师 ″彼得-伦巴德的权威性相当，在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因此，最完美的神学家被认为是最精通加尔文著作的人。″ 胡克本人也赞扬了加尔文的《要义》和评论，并对他的教义体系没有异议。他宣布他是 ″法国教会自享受他的时候起，无可比拟的最聪明的人″。同样，布林格的著作也受到了最高的推崇；因此，早在1586年，南方议会就指示没有传教执照的年轻牧师为自己配备一本圣经和布林格的拉丁文或英文《十年》。在英国，和国外的改革派教会一样，在预定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更高的加尔文主义者，也有更温和的加尔文主义者。

这在与 ″兰贝斯条款 ″有关的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些条款中，预定是以一种光秃秃的、僵硬的形式提出的。在这些条款中，保证被宣布为拯救信仰

的必要条件。这些条款是由剑桥大学的某些人对预定的攻击而产生的。它们由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特、哈顿、约克大主教、以及伦敦和班戈的主教们签署。哈顿对这些条款的修正，以及胡克对这些条款所涉及的问题的表述，都表明了一种上升的倾向，即避免更极端的预定论神学的类型。然而这种倾向与布林格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对加尔文主义不同意见的首次表现，唤起了兰贝斯宣言，富勒说它表达了 ″那个时代英国普遍接受的教义″，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从一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者们在主教制问题上没有争议。路德派在《斯马尔卡尔德条款》中宣布主教制度是一个统一的机构，并宣称当普通主教成为教会的敌人或拒绝按立时，他们可以被免除。梅兰想要主教，作为保护教会不受混乱和担心的王公暴政的手段；路德也不会反对他们。路德派在瑞典保留了主教，在丹麦则以监督者的形式保留了主教。加尔文建议波兰国王保留主教，并认为不反对由一位牧师行使主席职责，他应该由教会任命。当瑞士神学家来到英国时，他们通常会发现许多他们希望看到改革的东西；但对主教本身，他们并不反感。当英国神学家前往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或日内瓦时，他们对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建立的神职人员的平等地位没有丝毫的顾虑。

直到我们接近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在英国圣公会中，没有任何关于主教制度的神权思想的痕迹，即——主教是主教制度的必要条件，在教会中，如果没有主教的任命，牧师的职能就不能合法地履行。这些条款显然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教会都要决定自己的教会政体和仪式这一普遍的想法制定的。按照条款中的定义，主教制不在教会的说明之列。″命令不允许被称为圣经意义上的圣礼，因为对于这些圣礼，必须有可见的标志或仪式，或由上帝制定的″。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主教和牧师之间的区别是职务上的区别，而不是秩序上的区别。″秩序 ″的决定性特征是执行一种特殊行为的权力，涉及在灵魂上

留下某种不可磨灭的特征的观点。牧师，作为能够执行圣餐奇迹的人，除了职务或职能外，在一切方面都与主教平起平坐。这种观点甚至被贝拉明所持有。它在英国圣公会的改革者中很流行。在1537年由权威机构出版的《一个基督徒的体制》中就有这样的教导。主教Jewel在他为英格兰教会所作的 ″辩解 ″中，以及在他对 ″辩解 ″的 ″辩护 ″中都宣称了这一点。

这些作品中的第一部，由尼古拉斯-培根爵士的妻子翻译成英文，伊丽莎白下令将其拴在英格兰的每个教区教堂里，以便人们可以自由阅读和查阅。诚然，《祈祷书》中的序言肯定了 ″从使徒时代起，在基督的教会中就有这些牧师的命令：主教、牧师和执事″。可以说，这种观点认为，主教和长老的区别是职务上的区别，而不是秩序上的区别，不能认为这只是学派人士的遗产，没有经过审查就接受了。后来，像菲尔德院长和乌舍尔大主教这样有学问、有名望的主教制辩护人都持有这种观点。

1548年由克兰默批准的教义，据说主要是对路德教派作品的翻译，教导人们从使徒那里继承 ″主教和牧师 ″的职责;但没有提到这两类牧师之间的关系。布朗特说，″直到16世纪末，主教和牧师之间的区别才被宣称出来。″在爱德华统治的末期，克兰默写信给梅兰、布林格和加尔文，希望能促成一次新教教会的集体会议，以构建一个共同的教义基础。在这些信中，除了主的圣餐这个大问题外，没有暗示任何重要的问题要被考虑作为团契的基础。伊丽莎白法规为在国外授职的牧师提供了空间,他们根据祈祷书中规定的其他形式，被允许进入英国的教区。正如许多无可争议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牧师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甚至在下个世纪都被大量接纳。一直到劳德和查理一世的时代，当主教制的圣职理论扎根时，外国教会的牧师所接受的圣职的有效性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也没有中断过他们与英格兰教会之间的关系。即使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大反动中，1661年的《统一法案》要求所有在职的施惠者接受主教的任命，并增加了一个但书：″本法案中的惩罚不应扩展

到国王陛下、他的继承人和继任者在英国允许或将要允许的外国改革派教会的外国人或外人。″

清教徒的争论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争论的主题是神职人员的法衣的使用问题和某些仪式的使用。在第二次争论中，第一次争论所导致的，教长制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争论的主要问题。从一开始，英国就有一些人希望引入比政府--更不用说现在人民的脾气--所允许的更彻底的变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英国的宗教改革符合它在欧洲大陆的改革派或加尔文主义教会中的类型。这种趋势由于克兰默在爱德华统治时期吸引到的杰出的外国神学家的存在而得到加强。由于流亡者的回归，它获得了新的和强有力的刺激，这些流亡者曾受到路德教派的冷遇，他们主要求助于苏黎世和日内瓦，或莱茵河沿岸的城市，在那里建立了加尔文主义。在伊丽莎白登基后，空缺的主教职位有13个，自然由新教的坚定捍卫者填补，他们当时（在血腥玛丽时期）宁愿流亡也不愿屈服于她的前任所恢复的教皇制度。留在英国的帕克在某个安全的隐居地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神职人员中的新领导人希望抛开帽子和法衣，以及大陆上的新教教友们已经普遍放弃的其他仪式特征。反对这些东西的理由是，它们在民众心目中被认定为″教皇制 ″的标志。当有人回答说，这些习俗在性质上是无所谓的，在福音书中没有被禁止，有人反驳说，这些习俗是误导性的，而且，即使不违背圣经的诫命，民事裁判官也无权强迫人们遵守这些习俗。在这最后一个命题中，显然包含了一个关于王权至上的想法，这可能最终导致严重的冲突。

当我们回忆起以下情况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当我们想起最近在英国因礼仪方面的争论而引起的热潮时，考虑到现在与过去相比，这些争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就不必对清教徒辩论的爆发感到惊讶，因为它与同一领域的主题有关。在制定祈祷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尽可能少地冒犯天主教系统的信徒，以及那些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礼拜方式有着近亲关系的人

们。他们是在这种崇拜方法下长大的。保守派在《祈祷书》中找到了他们在宗教思想方面的倾向性的理由。

在广大的教区牧师中，只有极少数人在伊丽莎白上台后被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在习惯的形式上突然引入激进的创新，并通过法律强加于人，对最近一直使用他们的念珠和小册子的九千多名受恩惠的神职人员会有什么影响？除了安全和权宜之计外，神职人员中正在兴起一派新教神学家，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从加尔文回到奥古斯丁，并从前三个世纪的教会中汲取他们的神学和教会原则。然而，反对继续使用法衣的一方在人数上很强大，而且由于其成员的能力和地位，影响力更大。

在爱德华统治时期，胡珀在1550年被选为格洛斯特主教时，起初拒绝在祝圣时穿上主教的服装。在他被关进监狱后，这个难题通过妥协得到了解决。1555年在法兰克福的英国流亡者中出现了麻烦、诺克斯是一个党派的领导人之一，该党派要求修改祈祷书中的圣餐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改动。当这一党派在人数上超过了刚从英国移民过来的人，而他们又依附于另一方时，他就撤回了日内瓦。在伊丽莎白执政之初，她新任命的主教们普遍赞成取消法衣和其他令人反感的仪式，如在圣餐时下跪，在洗礼时签署十字架等。这是朱厄尔的愿望，他把教士的服装污蔑为 "亚摩利人的遗物"，并在给彼得-马蒂尔的信中高兴地表示，在苏格兰，"戏剧性的服装 "等已被扔进火堆。他同意诺威尔、桑迪斯（后来的约克大主教）、格林达尔（跟随帕克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许多神学家的意见。即使是帕克，在一开始，似乎也对法衣的看法是不赞同的。伯利、沃尔辛厄姆、莱斯特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平民都有同样的看法。

但在这个问题上，女王是坚定不移。朱厄尔和他的伙伴们所咨询的瑞士神学家们，一般都建议对她的愿望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不是冒着使伊丽莎白更接

近教皇党的风险而拒绝就职。然而，许多神职人员并不遵从仪式中令人厌恶的部分。一种混乱的敬拜方式随之出现了。伊丽莎白决心结束这种混乱和对她的法令的不服从。强制使用法衣的是伊丽莎白，而不是她的主教们。帕克被要求对违法者进行起诉。最后，清教徒开始在独立的 "修道院 "中组织起来，他们的聚会被他们的对手称为 "修道院"，以便以他们认可的方式进行崇拜。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神职人员学识渊博，是有效的传教士，神职人员和人民都愿意为良知的缘故而受苦。无论今天对礼仪之争的是非曲直有什么样的看法，清教徒反对掠夺和支持教会更严格的纪律，以及用受过教育的、认真的牧师来取代成千上万不值得的和严重无知的神职人员的热情，是不可能不被认可的。

如果说胡珀是清教主义的雏形之父，那么与清教主义的关系类似，作为一个成熟和发展的体系，属于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赖特。然而，清教主义在他的主持下，与长老会联系在一起，并与长老会的制度作为一种专门授权的政体制度，冷却了不少以前可能属于其信徒的人的热情。

卡特赖特体系中的第一点是，圣经不仅是信仰的准则，也是教会管理和纪律的准则。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它们规定了一个教会不能随意偏离的政体体系。第二点是，教会事务的管理属于教会本身及其官员，而不属于民事裁判官。因此，加尔文主义在英国宣称其教会独立于国家控制的教义，也宣称其教会控制国家的教义；在他看来，宗教必须是统一的，由民政当局强制执行。此外，他认为圣经规定的政体是长老会的。

反对这些观点的是女王本人，她倾向于推行她未定义的监督权，甚至于禁止神职人员为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举行会议，而且，当它被保持在较窄的范围内时，所有支持王室至上的人都和她一样。此外，反对卡特赖特观点的还有所有维护教会政府的圣公会制度的人。这些人，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

Whitgift，即卡特赖特学说的主要反对者，即使在当时也远远没有主张jure divino理论，也没有主张主教的必要性，即教会没有他们就不能存在。他们除了坚持主教组织的古老性和便利性之外，没有走得更远。″怀特吉夫特说：″我们在哪里与教皇党人意见一致？ 或者我们在哪里与改革派教会意见不同？我们与这些教会在教义和内容上都有共同点；我们与其他教会在教义和仪式上大多有分歧。″

但一个极端往往会带来另一个极端。班克罗夫特，他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排他性理论的人，这种理论会把其他新教教会赶出天主教教会；但他1589年在圣保罗十字教堂的布道是否能证明这一指责是值得怀疑的。1610年，在苏格兰主教的祝圣仪式上，他们只接受了长老会的任命，他遇到了安德鲁斯主教的 ″疑虑 ″或询问，说在没有主教的地方，由长老会任命就足够了。当时设立的主教被派去主持长老会的神职人员。

大约在十六世纪末，胡克的关于 ″教会政体 ″的论文著作出版后，清教徒的争论有了新的转机。他宁静、不激情的精神，他的活力和雄辩，似乎把争论带到了更高的氛围中。他相信使徒的主教制度，并承认他与他尊敬的主人和指导者朱厄尔不同，他认为主教是与长老不同的教派。但他进入了对法律的性质和权威的起源的讨论。虽然他声称主教制是教会政府的原始形式，也是最好的形式，但他申明，″整个可见的教会是所有权力的真正原始主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并非没有必要放弃普通的方式，″他说：″这是由必要性的要求 ″决定的。他告诉我们，虽然主治权是神授的，但没有必要 ″让主教永远持续下去″。他告诉我们，主教职位对于圣礼的有效性来说并非必要。他说：″可能有，一个非常伟大和充分的理由，允许在没有主教的情况下进行非主教式的授职″。

他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安排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因此，胡克为外国

新教教会在教会上的全面承认留出了空间,并为 "那些 "引用凯布尔的话说，"在英国被接纳为教会的牧师的人数，没有比长老会更好的仪式"。在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外国新教教会一般都得到了兄弟般的承认。这一点可能足以提及三位杰出的教会人士的名字,他们都是主教制的杰出捍卫者。第一位是理查德菲尔德，格洛斯特的院长，他在他著名的《教会》一书中，为外国教会和他们的大厅的充分性辩护。第二位是约瑟夫-霍尔主教，但他热情地驳斥了对外国新教教会不友善的指控，他说，这些教会由于缺乏主教资格，"完全没有失去教会的真正本质"。霍尔是参加多特会议的代表之一。第三个名字是Ussher，主教制的最有学问的拥护者Ussher，那个时代，他坚持同样的观点。很久以后，复辟和随之而来的主教制大反动之后，甚至直到现在，在英国教会中，许多有名望的神学家都坚持类似的原则。

威克大主教在1719年写给Le Clerc的信中谈到大陆的新教教会时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铁石心肠，以至于因为这个缺陷"--没有教区政府--"我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从我们的圣餐中切断；或者，和我们中的一些疯狂的作家一样"--furiosis inter nos scriptoribus--"我不应该肯定他们没有真正有效的圣礼、甚至他们很难被称为基督徒。"

但从班克罗夫特的时代开始，另一个学派成长起来，它倾向于使主教制成为必不可少的，不仅是对教会的福祉，而且是对教会的存在。这是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它是哈蒙德和劳德学派的特点。它的发展部分归因于清教徒对教长制的攻击所产生的感情，以及长老会对其制度的专属权利的主张；部分归因于在教义和其他方面与德国路德派的疏远，以及阿米念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从而削弱了与国外加尔文主义教会的同情关系； 部分原因是来自罗马天主教方面的危险减少了，这使得英国的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外的弟兄们的联合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但是，除了这些导致高级教会教义发展的具体原因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被称

为原始和普世教会元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些元素与新教元素一起，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英国国教体系。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可称为教父精神的东西--希望尽可能地遵循早期教父的教诲，以及第一世纪的教会组织模式。引用教父的话来支持和说明教义的习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仅举一例--体现在伊丽莎白指定在教会中宣读的颂词中。

卡特赖特的长老会原则，以及他所提出的不宽容的理论，使伊丽莎白更容易抵制对改变仪式的日益增长的要求。

然而，在英国与西班牙发生致命冲突的所有年月里，清教主义的基本精神的进展是稳定的，一直到她统治的结束。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体现在她的议会越来越有勇气和独立。她看到什么时候有必要对他们的要求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谨慎地做出让步。在教会本身，清教主义也取得了同样的进展。格林先生写道：″在她统治的一开始，″″由于需要用坚定的新教徒取代马利亚主教，她不得不用几乎每个人的信条都是加尔文主义的人填充英国的教区。下层神职人员的大部分确实没有变化；但随着老教士的去世，他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大部分由清教徒的继任者填补。大学为新的神职人员提供报酬，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时，大学的基调是激烈的清教徒。甚至连女王心目中的外部统一性也采用了清教徒的形式。祈祷书的使用确实得到了强制执行；但英国教堂和英国礼拜的面貌却越来越倾向于日内瓦的模式。在新的祈祷书中，需要更多的光线来跟随礼拜，这成为从教堂窗户上拆除彩色玻璃的一个借口。圣餐桌几乎无处不在地矗立在教堂的中间。如果说礼拜时一般穿的是法衣，那么传道人往往是穿着日内瓦长袍登上讲台的。我们在元老们自己的小教堂里看到了这种变化的进展。兰贝斯宫的小教堂是当时教会建筑中最显眼的一个；它是许多贵族、法官、神职人员和各种人，以及陌生人和本地人都要去的地方。但所有的崇拜盛况都逐渐从这里消失了。在克兰默时期，彩色玻璃被从窗户上砸掉了。在伊丽莎白时代，圣餐桌被移到了小教堂的中间，圣餐

桌也被毁了。在詹姆士时期，阿博特大主教对所有试图举行高级仪式的行为进行了终结。盖头不再作为圣餐时的特殊礼服使用。教长和他的牧师们不敢再向基督的名字鞠躬。管风琴和唱诗班都被废除了，礼拜仪式也简化到可以让加尔文满意的程度″。

有两类持不同意见的人，《统一法》对他们毫不留情地执行。第一类是独立派，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他们的起源。另一个是浸礼会，他们被不公正地与德国无政府主义的再洗礼派传教士混为一谈，他们提供了在这个统治时期被烧死的唯一殉道者。

如果不注意到在爱尔兰建立新教的尝试，那么关于大不列颠宗教改革的简述就不完整了。

爱尔兰是最后一个完全服从于罗马教廷的国家之一，它对罗马教廷的虔诚程度无人能及。

虽然在阿德里安四世的谕令下，爱尔兰的独立被夺走了，并将其交给了亨利二世，但它对罗马教会的虔诚却无人能及。新教与讨厌的外国人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并按照那个时代公认的对征服者来说是合法的方法进行传播。侵略者与一个臣民种族几乎永远处于冲突之中,冲突的过程以可怕的屠杀为标志，他们很难希望让敌人皈依自己的宗教信仰。亨利八世在自己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后,开始在邻近的岛屿上建立他的宗教优越性。这是由爱尔兰议会在1537年颁布的法令，但遭到了以阿玛大主教为首的大部分神职人员的抵制。乔治-布朗，一个国王的自愿代理人，曾在英格兰担任奥古斯丁修士的省长，被任命为都柏林大主教。

新教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但人民仍然是天主教徒。试图使这个国家英语化

的错误政策得到了执行，宗教服务是用他们不懂的语言进行的。1551年推出的祈祷书没有被翻译成爱尔兰语，而是被翻译成了拉丁语，以便教会人士和其他不熟悉英语的人使用！在玛丽登基后，亨利八世和他的儿子所建立的新结构毫无抵抗力地崩溃了。随着天主教反动派在欧洲组织起来，并开始与伊丽莎白女王展开较量，在某种程度上参加英国服务的爱尔兰人普遍抛弃了它。新教在苍穹之外没有立足之地，或者在没有英国士兵保护它或把它强加给人民的地方。

爱尔兰的圣公会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清教徒的外衣，并在其教义中突出地阐述了加尔文主义神学。被《三十九条》取代的《信仰条款》是在1615年制定的，可能是由当时在都柏林的神学教授乌舍尔大主教制定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包括兰贝斯关于预定的条款。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概念，对主的圣餐的教义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爱尔兰条款是威斯敏斯特大会的信条的主要来源。《新约》直到1602年才被翻译成爱尔兰语；《祈祷书》虽然翻译得比较早，但没有得到公共权力的认可，也很少使用。培根勋爵在1601年写的题为″关于女王在爱尔兰的服务的考虑″的小册子中提出了各种明智的建议，其中包括建议注意″将《圣经》和教义以及其他教学书籍的版本翻译成爱尔兰语″。他以同样的敏锐和良好的感情，劝告说建立殖民地或种植园，派遣热心的、受欢迎的传教士，以及虔诚的、博学的主教，并促进教育。他建议采取温和和宽容的态度，而不是使用世俗的剑。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

第七章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天主教议会改革

保守主义并不局限于欧洲北部和中部。它很早就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延伸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但在这里，意大利人逐渐组织了一些力量，以阻止其原则的发展，甚至将其赶出意大利的土地，把他们赶出了他们显然已经站稳脚跟的土地。宗教改革的事业自然会在意大利人中找到追随者。教皇的世俗野心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他们熟悉教皇的教会政府的腐败，因为离罗马更远的国家不可能熟悉这种情况。神职人员的恶行，罗马宫廷的傲慢和腐败，已经被他们最伟大的作家，从但丁开始揭露了。由于新学问的影响，迷信，甚至对教会权威的适度敬畏，在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心中几乎消失殆尽。但是，虽然这些情况有利于新教的引入，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情况，阻碍了新教的最终成功。

意大利人认为教皇制度是一个国家机构。因此，他们对所有来自国外的削弱其特权的企图都很嫉妒。它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带来了崇高的地位、财富和影响力。

古老的自由和爱国主义精神已经让位于个人膨胀的欲望。即使是那些通过人文研究将思想从中世纪的摇摆中解放出来的人，也往往要么持怀疑态度，要么无动于衷，而且远不愿意为了自己的观点而做出牺牲。此外，和其他国家一样，这里也有许多人不屈不挠地坚守着传统体系的每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传统制度的坚持。

新教的原则最初是通过路德和其他改革者的著作传入意大利的。虚构的名字，广为流传，甚至在梵蒂冈本身，对新教的阅读也是毫无怀疑的。许多意大利

人被梅兰的名声所吸引，梅兰受到各地学者的推崇，他们来到维滕贝格，在那里学习新教义。其他人则从查理五世反对教皇的运动中涌入意大利的路德派士兵那里听到了这些教义。然而，新教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自己而不被立即扼杀的地步。那些完全赞同其思想的小团体只能作为秘密社团存在；因为，尽管没有中央政府在整个半岛上实施镇压措施，而且还没有有效的宗教裁判所，但不同的州都受到天主教传统和罗马教廷的彻底影响。赞成改革运动的人并非都有相同的目标。有些人只是想结束那些阻碍教会正常管理的弊端。另一些人则珍视改革者所倡导的公义观，但却坚持等级组织以及现行的崇拜形式。因此，意大利的新教是一种程度不同的东西，在其早期阶段，它与各种倾向一起发展，最终分化为反动的、防御性的和侵略性的力量，而天主教会的恢复正是得益于此。

甚至在利奥十世去世之前，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在意大利非常盛行的社会的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基调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基调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在意大利非常盛行，并开始让位给一种更加严肃的宗教精神，即〝修道院〞。五六十个人在罗马联合起来，在罗马，他们被称为〝神圣之爱的修道院〞，并举行崇拜和相互教育的会议。他们当中有卡拉法、康塔里尼和萨多勒，他们后来都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尽管卡拉法和孔塔里尼这样的人因其对消除教会弊端和对教会首脑及成员进行道德改革的共同愿望而走到一起，但他们在对待新教的态度上注定要有很大的分歧。孔塔里尼主张与改革者密切相关的公义观点，并在著名的拉蒂斯邦会议上起了带头作用；而卡拉法则重新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并作为保罗四世，成为天主教反动派的化身。

还有一些同情福音派思想的人。其中有诗人弗拉米尼奥，佛罗伦萨的圣经翻译家布鲁乔利，以及拒绝支持亨利八世在教会方面的革命措施的英国教会人士雷金纳德-波尔。他们的成义学说，或多或少地带来了对其他教义的倾向性，在整个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中传播。加尔文曾访问过费拉拉公爵夫人雷尼的宫

廷，法国诗人克莱门特-马罗（Clement Marot）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它得到了保护和培养。它曾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并在摩德纳的学院里进行过辩护。它在摩德纳的流行程度之高，以至于主教莫罗内枢机主教曾因教皇的任务而离开德国，他在1542年写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从各方面来看，我都听说这个城市已经成为路德教。" 在威尼斯，那里的图书贸易很繁荣，而且内部警察也不那么严厉，许多人接受了新教。皮特罗-卡内塞奇（Pietro Carnesecchi）在这里工作，后来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在那不勒斯，福音教义在查理五世总督的秘书胡安-瓦尔德斯（Juan Valdez）那里找到了一个认真的、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在同情它的杰出的意大利人中，有维托利亚-科隆纳和其他几位杰出的女性。伯纳迪诺-奥奇诺，当时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可敬的外表和雄辩的演讲吸引了前来听他演讲的人群的注意力；还有彼得-马蒂尔-维米格利，他虽然不是奥奇诺那么有力的演说家，但却是一位更出色的神学家。在意大利，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城市不拥有一圈珍惜新观点的有教养的人。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教会组织了牧师，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改革者的书籍被热心地购买。梅兰在一份可能写于1540年的资料中说："整个图书馆都被人从已故的展览会上带进了意大利"。一篇关于 "基督的好处 "的小论文，以前被错误地归功于Aonio Paleario，现在已经发行了数千份。到目前为止，新教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卡拉法不得不对保罗三世说，"整个意大利都被路德教的异端所感染，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都广泛地接受了这种异端。"

但反改革和天主教反动的力量已经开始发挥作用。1534年接替克莱门特七世的保罗三世，在他本人和他的政策中结合了过去和未来教皇的特点。他被亚历山大六世提升为红衣主教。他和亚历山大六世一样，也有自己的孩子，他和严格意义上的教皇都想赋予他们财富和高位。另一方面，他对天主教的改革党很友好。他的第一个行动是任命康塔里尼为红衣主教，并在他的建议下，将卡拉法、波利、萨多勒和其他一些性格相似的人提升到同一级别。他要求

他们起草一份他们认为可取的改革声明。

他们的 ″silium ″或意见得到了他的批准，并任命了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消除教皇教会中的弊端。不久之后，发生了拉蒂斯邦会议，这是福音派天主教徒在康塔里尼的领导下，试图通过妥协来恢复教会的统一。会议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卡拉法和持类似观点的人的影响，他们虽然急于在等级制度中注入严格的、甚至是禁欲主义的纯洁和热情的精神，但却对教会的教条和组织的所有变化持顽固的敌意。这一方恢复了天主教会的基调，聚集了其分散的力量，并以新的和可怕的能量转向其对手。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在西班牙保留了宗教裁判所，在意大利重组了宗教裁判所，在特伦特的法令中建立了R nanism的堡垒，并创建了宗教团体，特别是耶稣会。

与教会以前的时代一样，热忱的复兴是以修道士精神的新发展为标志的。一个名为 ″Theatins ″的兄弟会，由卡拉法和他的朋友Thiene组织。其主要目的是改革神职人员。其成员都是有修道誓约的牧师。他们致力于布道、主持圣礼和照顾病人。但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其他类似社团的重要性，很快就被更著名和更有影响力的耶稣会所掩盖了。耶稣会的创始人是伊格内修斯-罗耀拉，一个出身高贵的西班牙人。在早年他在围攻潘佩鲁纳时与法国人作战时受了重伤。在随后的疾病中，他开始梦想骑士般的冒险，不是为他的国王和夫人服务，而是为基督和圣母服务。他把 ″阿马迪斯 ″的浪漫故事换成了圣徒的生活。多米尼克和弗朗西斯的荣耀吸引了他的想象力。康复后，他把他的盾牌和长矛挂在圣母像前，然后隐居到一个修道院，他在那里过着艰苦的苦行生活。他的灵魂受到折磨，无法安宁，直到他把这些折磨当作邪灵的启示赶走。他放弃了禁欲主义，但保留了对狂喜经历的不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往往伴随着禁欲主义。1528年，伊格内修在巴黎学习神学，他把两个同伴的思想带到巴黎；法布尔和弗朗西斯-泽维尔的思想，完全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在圣巴巴拉学院的一间房间里成立的小社团，很快就因七个新成员的加

入而扩大了。他们发了修道的誓言，并承诺如果可能的话，将在耶路撒冷度过他们的一生，照顾基督徒或努力使撒拉逊人（穆斯林）皈依；或者，如果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承诺将自己献给教皇，为教会服务。

在威尼斯，他们被任命为牧师，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他们要对抗的最可怕的对手是在欧洲，而不是在巴勒斯坦。他们的教团在1540年得到了保罗三世的批准；在1543年得到了无条件的批准。他们选择了伊格内修作为他们的主席。新教团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传教，听取忏悔，引导个人的良知，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教育。在适当地完成这些职责的同时，不允许有任何修道院的苦行来干扰。成员们的内在生活是通过学习伊格内修斯的〝精神练习〞来塑造的。这本手册规定了一个严格而漫长的反省过程，以及对某些主题的强迫性持续关注，这些主题大多取自福音书；整个过程的目的是使灵魂脱离每一个世俗欲望的对象，激发并同时奴役想象力，并将意志牢牢束缚在宗教献身的道路上。在开始时，这种精神训练一般要花四个星期的时间。这个社团有四类成员--见习生、学者、副教士和教友--组织得如此紧凑，甚至连总主教，尽管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但也像最卑微的见习生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督，而且可以以充分的理由将其罢免。每个成员都必须对他的上级给予无条件的服从。他可能被命令去拜访地球上最偏远地区的一个野蛮人部落，但他必须立即离开，而且不能有任何杂音。正是这种由单一意志指导并致力于为罗马教廷服务的组织，不仅抵御了新教的推进，而且把天主教的文件带到了新的土地上，甚至重新征服了几乎被新教教会夺走的领土。他们以教师或忏悔者的身份进入了王公贵族的法庭，并能在政治事务中发挥很大的影响。他们以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致力于对年轻人的教育。但耶稣会士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古籍研究或精确科学的部门，而不是在智力运动的自由或想象力的发挥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方向。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长期以来教皇们所惧怕的总理事会，却是恢复罗马教

会的第二大机构。在拉蒂斯邦会议失败后，保罗三世同意了这个愿望，并发出了召开特伦特会议的传票。

这是防止查理试图通过议会来调整德国的宗教困难的唯一方法。教皇遗嘱于1545年12月召开会议，并很快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控制，以至于没有教皇的批准，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会议决定，成员应以个人而非国家的名义进行投票--这一点如果不在贫穷的主教中分配金钱，就无法获得。传教士们决定讨论的主题，并选择审议这些主题的会议或委员会。以卡拉法和耶稣会为代表的反动派战胜了福音派的天主教徒。议会首先审议的不是改革，而是教条。它申明，传统作为知识的来源，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在查理五世在斯马尔卡尔德战争中获得成功的鼓舞下，它开始宣称旧的教义，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在称义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方对福音派的教义表示同情，但在定义中却肯定了相反的观点。公会主张变质（即圣餐之礼中的面包和酒真的变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和弥撒的献祭。它的工作曾两次被打断，最终在1563年皮乌斯四世的教皇任期内结束了。对教皇权力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巧妙地回避了。特伦特会议的冲突使罗马教廷比以前更加强大。"Professio Fidei"，即所有教师和教会人士都必须同意的对Tridentine信条的简短认信信条，包含了对教皇的服从的承诺。但是，大公会议完成了一项积极的教育工作,神职人员的教育以及教会更好的组织和纪律。它规定要出版教义、教规、弥撒和授权的武加大版圣经。特伦特的信条清楚而简明地阐述了天主教信仰的不同点，从而提供了一个正统的标准，远比教父们大量的、往往相互矛盾的著作更令人满意。大公会议通过其教义公式和改革性的教规，对教会的巩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其成为一个紧凑的机构。

但是，天主教反动派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大公会议的权威将异端的污名固定在新教上。

他们决心用武力消灭新教。甚至在特伦特会议召开之前，宗教裁判所就已经根据卡拉法的建议进行了改组，卡拉法将成为其负责人，并且作为保罗四世，将成为其主要赞助人。它是以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为模式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设立了神圣法庭，首先是为了发现和惩罚那些从犹太教皈依到他们以前的信仰的人。但事实证明，它是世俗和教会暴政的有用工具，以至于斐迪南和他的继任者甚至不顾教皇的反对和投诉，为其令人厌恶的程序辩护。它在托克马达和跟随他的审讯长们手下犯下的暴行，构成了西班牙历史上黑暗而令人厌恶的一页。它在偏执和狂热的民众中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藐视教皇，甚至国王本人。意大利宗教裁判所与之相似，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法庭，有自己独特的程序方法，但它更直接地依赖于教皇的意志，而且没有宗教狂热的阴郁精神的特征。六位红衣主教被任命为审讯官-将军，有权组建下级法庭，并有权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监禁和审判所有嫌疑人，无论其级别或地位如何。这个法庭的可怕机器逐渐在意大利的所有州里启动。公开的新教信仰被立即镇压。逃亡者开始涌过阿尔卑斯山。奥奇诺和彼得-马蒂尔已经走了。1548年，曾受雇于教皇的重要使团的卡波-德-伊斯特拉（Capo d'Istria）主教韦尔格里奥（Vergerio）的逃亡引起了人们的惊诧。那些没有逃跑的人遭到了酷刑、监禁和死亡。在这些人中,为他们的信仰而受苦的人有帕拉里奥和卡内塞奇。宗教裁判所试图摧毁书籍和新教徒的人身。在许多地方，图书贸易几乎被毁。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如此警惕，以至于在成千上万本"关于基督的好处 "的书中，只有少数幸存下来，而这些书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被发现。

卡拉法还推出了 "索引"，其中包括被禁书籍的名称，以及一份60多家印刷商的名单，这些印刷商的出版物都受到了谴责。卡拉法急于让教会的忠实信徒远离一切带有异端色彩的东西，以至于他把他和萨多勒等人建议保罗三世制止某些明显的教会弊端的 "共识 "放在了索引中。后来，在西克斯图斯五世的主持下，出现了 "驱逐索引"，它谴责的不是整部作品，而是允许的书籍中

的特定段落。反动派进行的全面迫害并没有放过福音派的天主教徒。甚至红衣主教波尔，教会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在耻辱中死去；红衣主教莫罗内被囚禁，直到1559年僵硬的保罗四世去世，他才获得自由。这就是激烈的偏执，在意大利扼杀了异议的火花。

甚至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狂热主义的故乡西班牙，新教也并非没有信徒。西班牙的教会人士和贵族们在德国参加了查理五世的活动，并出席了国会。

在德国出席奥格斯堡会议的西班牙教士和贵族，或在腓力二世与玛丽结婚后在英国旅居的人，都熟悉新教教义，并有不少人倾向于采纳它们。路德的著作和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圣经》被秘密地引入西班牙。持改革观点的人在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特别多，并在那里被组织成秘密教会。塞维利亚最杰出的传教士约翰-埃吉迪乌斯（John Egidius）博士和曾任皇帝牧师的君士坦丁-庞塞-德拉-冯特（Constantine Ponce de la Fuente）都加入了新运动。同样，在巴利亚多利德，新教徒拥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就是帝国牧师奥古斯丁-卡扎拉。事实上，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有地位和有学问的人。在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发现的这些秘密团体，刺激了宗教裁判所加倍警惕。一些人的逃亡促进了对那些留下来的人的侦查。监狱很快就被填满了，可怕的酷刑工具也随之出现，用来逼供，不仅是对男人，而且是对娇弱而高雅的女人。1559年和1560年，在“异端邪说”扎根最深的两个城市举行了autos da fé，即 "信仰行为"，其安排是为了让受难者本人和聚集在现场的大量人群感到恐惧。被判刑的人身穿San Benito（一种粗糙的黄色连衣裙，上面有红色的十字架、火焰和魔鬼），被活活烧死，除非他们认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特权在火被点燃之前被勒死。国王、皇室和宫廷的重要人物都在场，为这些不人道的场面提供支持。类似的 "信仰行为 "也发生在其他城市。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教士们也没有逃脱迫害。

托莱多大主教和西班牙总主教，是一位福音派天主教徒，是波利、莫罗内、弗拉米尼奥和其他知名意大利人的朋友。他曾在特伦特会议上倡导无偿公义的理论，并在垂死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床边举起十字架，感叹道："看哪，为所有人辩护的人。再也没有罪了；一切都被宽恕了"。他在神圣的职位上被指控，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18年后，他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禁闭之中。指控的借口是他笔下的一篇教义，该教义是三一节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批准的。被怀疑持有类似观点的主教和神学博士也被传讯，并被迫作出一些反驳或接受公开羞辱。就这样，新教的观点被消灭了。西班牙成为自己宗教狂热的受害者。几个世纪的智力束缚和昏睡是对其不宽容的沉重惩罚。

天主教反动的力量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一直在前进，尽管有一段时间它的自然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嫉妒。当卡拉夫掌权时，他最强烈的激情似乎是对查理五世和西班牙人的仇恨。为了把他们赶出意大利，这位严厉的改革使徒把官职和爵位授予他不配的侄子，把德国新教徒征召入伍，甚至恳求土耳其人向他提供援助。只有腓力二世对教会领袖的虔诚敬畏才使罗马免于再次被洗劫，而保罗四世也免于在西班牙君主手中遭受类似的查尔斯曾对克莱门特造成的羞辱。教皇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消灭“异端”和净化他的宫廷上。他把他那些没有原则的亲戚从他面前赶走，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作为教皇统治中最严重弊端之一的裙带关系。人们闯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释放囚犯，并放火烧毁建筑物，以此来表示这位不宽容的改革者的死亡。但是，反动的精神超过了其精力充沛的领袖。它继续充斥着罗马宫廷，尽管保罗的继任者皮乌斯四世，对正统的微妙区别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同情宗教裁判所。由于他与不同的君主进行了巧妙的谈判，教廷从特伦特会议中脱颖而出，没有丧失任何有价值的特权。他的侄子卡洛-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出现在罗马宫廷中，给宫廷带来了一种清醒的基调，而这是皮乌斯本人无法给它带来的。虽然出身高贵，但博罗梅奥抵制了挡在他面前的各种诱惑，并以坚定不移的忠诚献身于宗教生活。他忠实地履行了教皇强加给他的重要职责，

并出色地完成了在米兰的大主教职位的要求。他的叔叔去世后，他没有提出自己对教皇职位的要求、但他促成了皮乌斯五世的当选。

他是正统派的坚定追随者，同样热衷于教皇制度的改革和对异教徒的消灭。庇护五世同情并与西班牙合作，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新教进行斗争。庇护五世于1567年发布了新版的〝多米尼克〞圣谕，该圣谕最初制定于1370年，但直到1627年才发展成完整的形式，庇护五世下令在所有国家的天主教堂中宣读；但在一些国家，他的命令没有得到遵守。在这份著名的圣谕中，对所有类别的异教徒和教皇特权的攻击者都宣布了大赦。在被诅咒的名单上，继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等之后，在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之前，是侵扰教廷国家周边海域的海盗。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智力生活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对古代的古老热情让位于独立研究的热情，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直到这种研究反过来受到教会统治者的遏制和压制。例如，在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心目中，对古代建筑的崇敬也被建造可与之匹敌的建筑的愿望所取代。诗歌、绘画和音乐都被社会的宗教气质和对教会的忠诚精神所渗透。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耶稣会的影响而实现的，青年的教育，特别是那些较高等级的人，很快就落入了他们的手中。他们的努力并不局限于意大利。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他们的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教皇的这支伟大的常备军从这两个半岛向欧洲其他国家推进，以恢复天主教的力量。它获得了对维也纳大学的控制权；科隆、英戈尔施塔特和布拉格是其成员；在奥地利领地、莱茵省和德国其他地区工作的中心，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劝说天主教王公们帮助推进反动运动。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在德国南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兰和匈牙利这些新教总体上取得优势的国家，反对新教的浪潮被扭转了。在他们（罗马教）没有占上风的地方，他们更尖锐地划定了两个教派（新教与罗马教）之间的界限，并加剧了他们的相互对立。

看起来很奇怪，新教起初发展得如此迅速，而且似乎要遍布整个欧洲、忽然间停滞不前，甚至被发现，从它已经站稳脚跟的土地上被推回。

新教是一场在教会内部产生的改革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还没有决定对它采取什么措施。但随着发酵的冷却，人们开始站队，而一旦党派精神（即纷争精神）被唤醒，它就会成为新观点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还有一些障碍是通过政治安排建立起来的。在德国，它是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格言和 "教会保留 "的应用；在法国，将人民分为两个交战的派别，即天主教和胡格诺派；在荷兰，将瓦隆省与其他州分开。通过罗马教会的反改革，曾经成为人们抱怨的主要理由的严重弊端被消除了，天主教徒们充满了捍卫教会的崇拜、政体和教义的热情。与此同时，新教徒们在彼此的争斗中浪费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世俗领袖，如撒克逊的莫里斯和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被同样崇高的事业心所感动，而这种事业心曾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弗雷德里克和约翰选帝侯，甚至黑森州的侯爵都被撼动了。

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要好得多，也更能摆脱内部的分裂。在它的范围内，有空间容纳脾气和目标最不同的人，这些人在新教的土地上会像后来的卫斯理一样，成为新教派的创始人。

在天主教反动最成功的南欧，人们比日耳曼民族更坚定地依附于传统制度。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新教并没有深入到民族生活的源头。即使在法国，它的追随者也大多来自社会的中层和高层阶级。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并不倾向于抛弃旧教会的政体和崇拜。这些都是阻止新教前进的原因，并最终将其封闭在固定的范围内。但天主教党并没有摆脱内部的不和。耶稣会激起的神学冲突，加上其他不利的影响，最终合力瘫痪了天主教的反动，并阻止了反改革

的进展。

==========

==========

第八章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基督教。查尔斯一世：三十年的战争： 教皇制度：东方教会

詹姆斯一世的登基使我们进入了英国历史的清教时代。当时，清教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主教制教会政府的特点或对英国礼仪的敌视。一般来说，虽然清教徒反对罗马教廷暴政，但他们与主教制本身并无争执；虽然对祈祷书的某些修正被认为是可取的，但没有多少人倾向于完全抛弃它。在詹姆斯登基时，清教主义意味着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和统治体系的彻底和僵硬的对抗--对〞教皇制〞一词所包含的一切都感到厌恶。它通常意味着神学中的加尔文主义。它总是意味着对教会等级制度方面的专制政府的抵制精神，意味着对更认真、更勤奋和更有能力的、受过较好教育的神职人员的要求。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清教徒在等级和社会地位、财富和文化方面通常都不如他们的对手。自然，都铎王朝创造的新贵族，与主教们一起构成了上议院的大多数，他们大多致力于宫廷和教会政策。但是，下议院里坐着这么多的地主阶级和众多的富商，在詹姆斯的整个统治期间都是清教徒。清教主义从乡绅、商人和专业阶层中获得了主要支持，尽管其追随者中也不乏最高级别的贵族，比如在与查理一世的战争中指挥议会军队的宫廷派埃塞克斯。〞哈钦森上校的回忆录〞由他的妻子撰写，显示了在一个清教家庭中可以发现多么高贵的礼仪和精致

的文化。在这个聚会中，像弥尔顿这样具有天才和成就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清教主义成为一些人的特权时，它吸引了不真诚的寻求地位的人加入它的行列，他们夸大其词，同时出于自私的目的，模仿清教徒的方式。许多人认为酸溜溜的面孔是虔诚的标志。后来，在失败的失望和迫害的压力下，清教徒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堕落了。它的男子气概的清醒变成了一种禁忌的肃穆。它对社会上的恶习和轻浮的推崇，变成了对无辜的欢乐和无害的娱乐活动的近乎嘲讽的厌恶。但是，即使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衰落时期，它也保留了高尚和有价值的特征，在讽刺家们乐于呈现的、供所有道德严格性的暴发户们娱乐的漫画下，这些特征很难被识别。有人说，由于阅读《圣经》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伊丽莎白死后，宗教和神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也失去了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本-琼森和罗利时代的那种多才多艺和自由快乐的精神，这是事实。但即使是这种损失也有补偿。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更大的和蔼可亲"，"取而代之的是家这个较小范围内的强烈的温柔。我们现在所设想的家，是清教徒的创造。妻子和孩子从单纯的依赖丈夫或父亲的意志，上升到了信赖，因为在丈夫或父亲身上看到了像基督一样的圣人，被神圣的精神所感动的灵魂，受到来自于他（基督）的神圣召唤"。

1572年11月24日，苏格兰宗教改革的英雄约翰-诺克斯去世。他的精神和道德能量并没有因为身体的虚弱而受到影响。据一位听过他讲道的人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虽然他不得不由两个人抬到讲台上，但 "在他讲完道之前，他是如此活跃，以至于他想把讲台敲成碎片，然后飞出去"。在诺克斯去世的大约三年前，摄政王默里被暗杀。王位的继承人詹姆斯还不到四岁，这个曾使不同敌对派别服从的人（诺克斯）就这样被击倒了。在他们激烈的争斗中，年轻的国王成长起来。詹姆斯一世值得被称为 "聪明的傻瓜"。他很精明，头脑灵活，有丰富的计划来逃避当前的困难，而且在神学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

但除了是个学究外，他还缺乏常识，对一个大问题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看法，而且自以为是地膨胀。他所吹嘘的 ″王术 ″并没有超过表面上的聪明才智。在苏格兰，他一直在与神职人员进行斗争，并撰写了《Basilicon Doron》，以便向他的儿子灌输他所珍视的国王有随心所欲的神圣权利的学说--这种学说最终会给他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他曾大力推行主教制，以此来控制他的祖国的独立和顽固的牧师们，他的大会是一种下议院，负责监督君主，确保他不侵犯教会的权利，或做任何事来玷污王国中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在苏格兰，长老会成立后，旧的教会政体仍然作为法律问题存在。仍然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他们只具有名义上的职能。1560年后，这些职位由新教徒担任，而且往往是由平信徒担任。人们曾期待这些旧的职务会消亡，但贵族们希望吸收收入，议会在1572年投票决定，这些职务应该继续存在--主教只拥有监督者的权力，并在精神方面服从大会的安排。他们被人们嘲讽地称为 ″Tulchan ″主教。尽管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le）进行了积极的抵抗，他追随诺克斯成为长老会党的领袖，并且在敌视主教制方面比诺克斯更加不妥协，但实际的司法权还是存在。

1584年，主教们被授予了实际管辖权。但在英格兰与西班牙的较量中，詹姆斯不得不站在伊丽莎白一边，并将他在与大臣们的冲突中赖以支持的天主教领主赶到国外；1592年，刚才提到的法案被废除。长老会被重新建立起来。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王和教会之间的斗争又重新开始了。梅尔维尔甚至揪住詹姆斯的袖子，称他为 ″上帝的愚蠢的附庸″。1597年，议会投票决定，教士们应该在他们的机构中拥有一个席位。詹姆士只成功地促成了三位主教的加入，以填补空缺的教区，他们也将拥有这种特权。他在自己国家的经历的结果是他对长老会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因为其中包含了对他的王权理论的破坏性力量。他（詹姆士）的观点仍然是加尔文主义，在他登上英国王位之前和之后，他对罗马教会的调和态度主要是由政治动机决定的。

在前往伦敦的路上，詹姆斯遇到了 ″千禧年请愿书″，上面有来自25个郡的大约8位千禧年牧师的签名。他们不是分离主义者；他们不反对主教制。他们抱怨不驻会、多党制和类似的弊端，抱怨洗礼中的十字架、帽子和法衣，以及汉普顿的一些其他仪式上的特殊情况。在随后举行的汉普顿宫廷会议上，国王召见了四位主要的清教徒神学家，其中雷诺兹博士是最著名的，与九位主教、七位院长和其他两位神职人员会面。在那里，清教徒的抱怨被讨论了三天，国王本人是最积极的争论者。詹姆斯说，苏格兰的长老会 ″与君主制以及上帝和魔鬼达成一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这是他最喜欢的格言。雷诺兹建议发行新的圣经译本，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因为詹姆斯反对当时普遍使用的《日内瓦圣经》的注释，其中一些内容触犯了他对国王的神圣性的看法。圣经授权版本的计划，后来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大约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好结果。詹姆斯对他所展示的推理能力感到高兴，也同样感到欣慰。

在主教们对他的崇拜中，他们对他意外地彻底支持他们的事业自然喜出望外。班克罗夫特跪倒在他面前，说 ″自基督时代以来 ″还没有这样的国王。年迈的惠特吉夫特喊道：″毫无疑问，陛下是在上帝之灵的特别帮助下说的。″ 清教徒神学家提出的将《兰贝斯条款》纳入英国圣公会信条的建议，与国王更温和、更宽容的加尔文主义相抵触。他拒绝服从，″反对增加条款的数量，或用神学上的细枝末节塞满它们″。在会议的过程中，詹姆斯说 ″我将有一个教义，一个纪律，一个在实质和仪式上的宗教。″ ″如果这就是你的党派所要说的，″他感叹道，″我会让他们服从，否则我会把他们赶出这片土地，否则会更糟。″ 不久后，惠特吉夫特去世，班克罗夫特继承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职位。在国王的批准下，他促使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教规，这些教规禁止对祈祷书有丝毫的偏离，或对教会中既定的政府和崇拜制度有任何贬损，否则将被开除教籍。与国王的冲突发现，下议院根本不同意他的反普鲁士政策，也不同意他作为主的受膏者所继承的绝对权威理论。在他对议会的演讲中，他把罗马教会说成是 ″母教会″，尽管它并非没有腐败，并希望他能成为联合这两

种宗教的渠道。

詹姆斯的政策是一个不可能执行的政策。他并不希望严厉对待罗马天主教徒。同时，他认为让他们的人数增加是不安全的。因此，他一开始对他们采取了值得称道的温和态度，但随后又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这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并导致1605年火药阴谋的失败。他在谈论罗马教会时的宽容，加上他对清教徒的猛烈谴责，不能不引起热心的新教徒的焦虑和愤慨，他们还没有忘记伊丽莎白和西班牙舰队的阴谋。从詹姆士执政之初，他与下议院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下议院决心阻止他篡夺绝对君主的特权，并抵制屈从于他的教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以牺牲议会的正当权力和臣民的自由为代价，扩大他们的精神管辖范围。科克，普通法的伟大捍卫者，抵制了班克罗夫特的主张。

只要塞西尔在位，詹姆斯的对外政治就不会缺乏精神。塞西尔去世后，詹姆斯在谈判中屈服于个人宠信的影响。他任命罗切斯特为萨默塞特伯爵，然后是白金汉伯爵。他放弃了伊丽莎白奉行的政策，即帮助荷兰人争取自由，并通过与最可怕的对手作战来维护新教事业。他反而寻求与西班牙结盟，他自诩这是确保欧洲和平的最佳手段，并努力促成他的长子查尔斯与一位西班牙公主结婚。为了实现这最后一个目标，他对罗马天主教徒作出了大量的宽恕承诺，并为将〝反基督者〞一词用于罗马而进行了某种道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埃莱克托-帕拉廷。向选帝侯提出的波希米亚王冠的提议，以及他努力维持自己对奥地利家族的地位而引发的巨大争论，不仅使他（詹姆斯）本人，而且使整个新教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处于极端危险之中。西班牙宫廷设法阻止詹姆斯为他的女婿进行干预，办法是抱着欺骗性的希望和承诺，直到它能够揭开其真正的设计，即不是把公主嫁给查尔斯，而是派兵攻占帕拉丁，从而开辟一条通往比利时省份的道路，同时为奥地利家族的分支和新教进行有效打击。1610年，詹姆斯成功地促使苏格兰接受了主教制，并限制了主教的权力。

长老会的其他无畏的领导人被监禁和放逐了。国王通过包装神职人员的集会和其他胁迫手段，完成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这一措施。1618年，珀斯的议会被迫通过了″五项法案″，其中要求在圣餐时下跪，以及其他一些在苏格兰教会中被衷心反对的仪式。1610年，在祝圣苏格兰主教的几天后，班克罗夫特去世。他的继任者阿博特，很倾向于清教徒。他们的反对者对他的宽大和他在执行统一性方面的松懈感到愤怒。在兰贝斯的小教堂里，管风琴和唱诗班被废除了，这是他清教徒倾向的一个标志。1611年，《圣经》的授权版本完成。它是对以前译本的修订。它在风格上有无与伦比的优点，它将成语的活力与节奏的和谐结合起来，是所有读者都熟悉的。

一位皈依罗马教会的人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这样评价英语圣经的魅力:″它就像一种永远不会被忘记的音乐，就像教堂的钟声，皈依者几乎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放弃。它的美妙之处往往似乎几乎是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文字。它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也是民族严肃性的支柱。”

关于查理一世的性格和行为，哈钦森上校的高贵妻子--一个对自己党派的错误并不盲目的女人--这样写道：

″宫廷的面貌因国王的更替而大为改观，因为查尔斯国王是有节制的、贞洁的、严肃的：因此，精神和以前的宫廷中的傻瓜和酒鬼、模仿者和娈童，都变得不时兴了；而贵族和朝臣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放荡行为，但却对国王如此敬重，以至于退到角落里。在所有艺术领域有学问和智慧的人都受到尊重，并得到了国王的鼓励，国王是一个最优秀的法官，也是一个绘画、雕刻、雕塑和其他许多独创性作品的大爱者，比起宫廷里唯一的运动--放荡不羁和亵渎神明的机智，这些东西更不令人讨厌。

″但是，正如在原始时代，人们注意到，最好的皇帝有的被撒旦煽动起来，成为教会最严厉的迫害者，所以这位国王对其人民的公民和精神自由的侵犯远远超过他的父亲。他娶了一位教皇党人，一位法国女士，精神傲慢，聪明美丽，他成了一位最令人厌恶的丈夫。通过这种方式，宫廷里又多了一些教皇党人，许多希望通过这种变化提高自己地位的人转而信奉这种宗教。王国里所有的教皇党人都受到了宠爱，并在国王的榜样作用下，被配到了最好的家庭里；清教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歧视和迫害，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放弃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最亲爱的亲人，退居到任何外国的土地或种植园，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所有外在的不便中自由享受对上帝的敬畏。那些无法逃离的人在主教的法庭上受到折磨，被罚款、鞭打、罚站、监禁，不得安宁，所以对他们来说，死亡比生命更重要；尽管他们耐心地忍受着所有这些事情，但国王仍不满意，直到整个国家沦为完全的奴隶制。有人向他介绍法国国王的例子，他认为只要他的意志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他就不是君主；但他知道英格兰的人民不会屈服于一个专横的统治，所以他谋划用外国的力量使他们屈服于他的枷锁，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顾良心地给予人民任何东西，他决心不使他的义务超过他的利益；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或真理、正义或慷慨的王子。他是有史以来自我意志最顽固的人，一心想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控制的君主，所以他决心要么成为这样的国王，要么不做国王。他坚定地坚持传教士制度，并不是因为一种宗教的良知多于另一种宗教，因为他的原则是，一个诚实的人可以在任何信仰中得到救赎；但他有一个错误的原则，即国家的国王政府没有教会的主教政府就不能成立； 因此，当主教们谄媚地宣扬他的主权特权，并对清教徒进行谩骂，认为他们多疑和不忠诚时，他就保护他们的浮夸和骄傲，以及对所有敬虔和清醒的人的无礼行为。″

查尔斯决心成为一个绝对的君主，而且他习惯性地不遵守他的承诺，这是最重要的两个事实。没有理由怀疑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确是一个真诚的新教徒，尽管他的行为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不是。他对待教皇党人的态度，正

如詹姆斯一世一样，是摇摆不定的。反对他们（教皇党人）的法律将被执行，而现在，这些法律的执行将因国王的命令而被非法中止。他的特点是，在与西班牙决裂后，他于1625年派兵协助路易十三攻占罗谢尔，从而极大地冒犯了新教徒，同时他还安排在他的船只出航时发生针对船长的叛变。这种两面派的行为被发现后，是导致英法战争的原因之一。1627年白金汉解救罗谢尔的远征失败后，出现了权利请愿书，这是议会对专制政府的巨大抗议。这项措施的支持者之一是温特沃斯，即后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他站到了国王一边，并在爱尔兰着手组建一支军队，用来维护查尔斯的僭越行为。

宗教与政治纷争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教会方面的主要代理人、劳德于1628年被任命为伦敦主教，五年后被提升为坎特伯雷主教。在某些方面，劳德的反对者并没有完全公正地对待他。谁要是读一读他的主要作品--他的 ″会议，回答耶稣会士费希尔″--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有鉴别力的神学家。例如，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那段话是一个明显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神学家。他认为，只要有 ″对一般教义条款的同意 ″就足够了。他说，通过 ″要求对特定条款的同意″，教会 ″已经被租用″。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他的新教职业中也很诚实。在他的阐述主的圣餐的教义时，他的神学在（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存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超越加尔文的立场，他把加尔文作为一个与他意见相同的人来呼吁。他说，贝拉明歪曲了加尔文的观点。 他真实地确认，″葡萄园主坚持最真实的存在″。他说，我们所献的只是对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纪念。除了对基督牺牲的 ″纪念″，对赞美和感恩的奉献，以及领受者对上帝的自我交托，圣礼中没有任何奉献。劳德不愿意把罗马称为 ″反基督″，这也是对他审判时的指控之一。他认为，罗马教会是一个腐败的教会，但不是一个叛教的教会。但他的这一观点与新教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当今大多数新教神学家的观点是相同的。劳德的缺点是，首先是脾气。他的智力很狭隘，而且在缺乏广度的同时，还有一种坚硬、不

灵活的性格。在所有的仪式问题上，他都是一个严厉的人。他非常重视宗教中的外在表现、崇拜仪式的统一性。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好地促进内在的虔诚。与这一固定观念相联系的是关于使徒继承的圣徒理论，这使他与其他新教教会的距离比与罗马教会的距离更远。他在给霍尔主教的信中说，在谈到外国新教教会时，他们 ″比我们现在的情况要好一点″。神职人员的平等，他认为是 ″混乱之母″。在他热衷于崇拜的统一性时，他承诺要拆散那些长期以来被好客地允许以自己的方式在英国做礼拜的外国教会。

他的仪式主义的神学，比改革者的神学更接近罗马的拥护者。他的所有程序似乎都是向中世纪制度倒退的一部分。他的格言是：″当团结被关在教会的门外时，团结就不能在教会中长期存在″，这被认为是他的暴政。

他认为自己有权通过警惕和无情的迫害来执行，哪怕是对指定秩序的轻微偏离，包括他自己引入的仪式。清教徒的牧师们因为没有在教堂里宣读 ″体育书 ″而受到惩罚，″体育书 ″建议人们在周日礼拜结束时进行游戏和消遣，其中一些游戏和消遣是独立于当天的，很多宗教人士都不赞成。这就是詹姆斯一世在1618年要求兰开夏郡的神职人员向他们的羊群公开宣读的 ″宣言 ″的放大版。高级委员会法庭，一种新教的宗教裁判所，为教长提供了执行其暴虐措施的手段。这种迫害所引起的对教士和教权的攻击，往往具有愤怒和辱骂的性质。攻击者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残酷的惩罚。星室法庭和高级委员会是教会和民间暴政的象征，因为它们是有效的工具，英国人民受到了这种暴政。

试图将英国祈祷书以及主教的完整政府强加给苏格兰--这是一个既不明智又不公正的计划。导致在1638年通过了苏格兰人捍卫长老会的《国家公约》。一股虔诚和爱国的热情席卷了整个苏格兰大地。曾在古斯塔夫-阿道夫领导下为新教信仰而战的苏格兰士兵匆匆渡海回国，加入他们的同胞，他们一致拿

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宗教。谈到苏格兰，詹姆斯曾这样评价劳德：″他不知道那个民族的胃。″

1640年，漫长的议会召开了。斯特拉福德被弹劾，查尔斯的大臣们被赶出了他们的位置。当国王写信给外国的新教教会时、他对自己和劳德说的都是实话。然而，教皇党人和热心的新教徒都认为国王和主教在有效地工作，即使是不自觉地，代表罗马教会。盎格鲁-天主教神学--由劳德和安德鲁斯主教等人代表的思维方式--及其关于在任何教会中行使牧师职责必须由主教授职的教义，其对圣礼在施恩手段中的崇高重要性的感受，以及它所浸透的仪式主义精神，自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日子以来一直在成长。对众多的英国圣公会新教徒来说，罗马仍然是神秘的巴比伦，教皇是敌基督，这种宗教是可憎的。正是由于他试图将自己的体系强加给国家，并愿意打破自由的保障，推翻议会政府以确保达到预期的目的，才使劳德遭到了毁灭。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主教的暴政使″主教″这个名字变得令人厌恶。这种反感在被激发了自由热情的头脑中变得多么深刻，这一点从弥尔顿雄辩的、即使是粗暴的谩骂中可以看出。然而，在长期议会开幕时，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将教会恢复到伊丽莎白时期的状态，并废除劳德带来的″创新″，而不是走得更远。

但随着冲突越来越激烈，由于教士们坚定地站在国王一边，人们（百姓）认为把他们从上议院中驱逐出去还不够。长老会党的人数越来越多。它的最后胜利归功于苏格兰人拒绝与议会联合起来反对国王，除非在英格兰采用长老会的政体，从而在两国建立统一的教会制度。1643年，议会宣誓通过《庄严联盟与盟约》，并承诺反对″教皇制、贵族制、迷信、分裂和亵渎″。斯特拉福德在两年多前被处决。苏格兰人无情地要求惩罚劳德，1645年1月10日，他被送进了监狱。尽管他的职业生涯令人厌恶，但在阅读这位老人的最后讲话和祈祷时，不可能不产生尊敬和怜悯的感觉。

1642年，在通过盟约之前，议会召集了威斯敏斯特大会，就重建英格兰教会的问题向他们提出建议。一百二十一位神学家，其中许多是学识渊博和有分量的人，被邀请参加会议。

乌舍尔和其他几位教士被任命为这个机构的成员，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以及长老会中长老派的控制，使他们除了一两个例外，无法出席会议。该机构中的另一个党派是独立派，人数不多，但由于组成该机构的个人品格高尚而值得尊敬。独立派最初被称为布朗派，在之前的统治中被赶出了王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定居点是由约翰-罗宾逊的流亡教会组建的。在马萨诸塞州定居的清教徒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派。这个党派的人现在正从荷兰回到英国，有些人，包括休-彼得斯，正从新英格兰回来，在家乡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中发挥他们的作用。独立派反对建立专制教会，主张会众有权管理自己，而且通常主张比长老会批准的更大程度的宽容。威斯敏斯特大会开始修订《三十九条》，在修改中引入了更明确的加尔文主义主张；但议会与苏格兰人的联合使他们放弃了这项任务。建立一个温和的主教制度的前景现在已经消失了。

《威斯敏斯特忏悔录》（信仰告白）、《长篇教义》和《短篇教义》，以及《礼拜指南》一起被制定出来，并得到了议会的批准。虽然长老会制度被采纳了，但它从未在英国完全付诸实施。议会坚定地拒绝放弃自己作为最终上诉法院的最高地位。它不允许教会有完全的权利将其成员逐出教会，或禁止共融。由于独立派的力量不断壮大，以及克伦威尔获得的权威，长老会在其政体的主要特征方面从未在米德尔塞克斯和兰开夏这两个郡完全确立。在他们的教义定义中，威斯敏斯特大会提出了加尔文主义体系，它把上帝的法令放在首位，但与上帝与人订立的行为和恩典之约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只有〝选民〝被说成是被基督〝赎回〝的人。清教徒对遵守主日的义务的理由的看法得到了肯定。基督教的民事行政长官无权管理话语或圣礼，也无权行使钥匙的权力;但他有义务镇压一切异端邪说以及亵渎神明的行为，

并可以召集宗教会议，对其进行一定的监督，以确保其事务符合上帝的心意。″大会发布的《指南》包含了关于公共礼拜的禁令，以及关于祈祷的适当主题的大量建议。新信条的大多数制定者都相信长老会的神圣权利。他们认为国家有责任强制执行统一性，不准备对独立派作出任何重要的让步。

1658年，在克伦威尔的最后日子里，他允许独立派或公理会召开会议，并制定了《萨沃伊宣言》，说明他们教会的信仰和秩序。它的教义部分主要等同于威斯敏斯特信条。关于宽容，其立场与序言中的声明一致，即″对于那些在信仰或秩序方面遵守并坚守信仰和圣洁的必要基础的各种派别的圣徒，应该给予宽容和相互宽恕。″对那些″坚守基础″和″不干扰他人的方式或崇拜″的人来说，要求宗教自由。

十七世纪初，当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势力越来越集中的时候，新教却因激烈的内部冲突而被削弱了。

法国，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奥地利家族的野心的反对，是新教与对手斗争的一个主要依托。1610年，亨利四世被暗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希望和帮助的来源被剥夺了。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参与了与议会的争吵，参与了对清教徒的迫害，参与了通过与西班牙的联系来获得个人利益和政治影响的欺骗性计划。在荷兰，加尔文派和阿米尼亚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后者被多特会议（1618-19年）谴责，并在1619年5月13日处决了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者巴尼维尔德的约翰，他是阿米尼亚派的国家控制教会原则的捍卫者。通过他，奥兰治亲王莫里斯获得最高权力的愿望被挫败了，并且违背莫里斯的意愿，与西班牙达成了为期12年的休战协议。格劳秀斯被判处永久监禁，只是通过他妻子的聪明才智和英雄气概才逃出了禁锢。路德派对加尔文主义的敌意使德国的路德派王公们在与西班牙的长期斗争中，他们的荷兰邻居和弟兄们请求援助，他们却充耳不闻。在德国，所谓的隐蔽卡尔文主义，即梅兰神学弟子

的信条，他们拒绝接受由其对手在1576年制定的《协约》，被许多严格的路德教派谴责为可恶的异端。撒克逊州宰相尼古拉斯-克雷尔（Nicholas Crell）曾试图在那里引入这种改良型的加尔文主义;1591年克里斯蒂安一世去世后，他（克雷尔）被解除了职务，被关进了监狱，最后于1601年在德累斯顿被斩首。德国两党之间的教义之争的结果是，包括帕拉丁在内的几个州永久地脱离了路德教，并与新教的改革派分支相联系。在这一时期，神学辩论在德国进行的痛苦精神可以从以下情况推断出来：在梅兰希顿死前几天留在桌上的一张纸上，写着他不太想死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希望摆脱神学家的愤怒--"rabie theologorum" 。在他死后半个世纪，维滕贝格的主要神学家听到一个学生把他说成是某些教义声明的权威，非常愤怒，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画像从墙上撕下来，踩在上面。

新教和天主教国家都没有严格遵守《帕绍条约》的规定。新教徒们不承认 "教会三十年保留 "的有效性。不仅在不同的新教国家的教会财产被没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在教会公国中，新教的 "管理人 "被任命为天主教主教的位置；并为他们要求在议会中享有主教的权利。有一段时间，皇帝们在对待敌对的教派时是不偏不倚的。斐迪南一世（1556-1564）如此，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更是如此，他对煽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等罪行的天主教狂热分子没有任何同情。但他的继任者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1576-1612），他是在西班牙长大的，完全同情耶稣会和天主教的反动。继承他的马蒂亚斯（1612-1619）和下一任皇帝施蒂利亚的斐迪南（1619-1637）也具有同样的精神。斐迪南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是天主教反动派的忠实拥护者。

天主教反动派的追随者们之间爆发了暴力事件。在帝国的一个自由城市多瑙沃特，一支天主教游行队伍受到了侮辱。该城被皇帝下了禁令。巴伐利亚公爵出兵攻打它，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土。没有被纳入帕绍条约特权的帕拉丁和其他加尔文教派国家，越来越觉得有必要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他们有理由

担心的攻击。他们最积极的领导人是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1608年，在多瑙沃特事件发生后，一个新教联盟成立了，但其组织与天主教联盟的组织相比是很弱的，后者是在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导下成立的，以反对新教联盟。三十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帕拉廷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五世接受了波希米亚的王位，而波希米亚拒绝承认费迪南德为国王。

斐迪南是耶稣会士的养子，他很早就发誓要在自己的领地内消灭异端，他投入了天主教联盟的怀抱，这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选择。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分支，即奥地利和西班牙，现在又一次因宗教同情心而联合起来。选帝侯在波希米亚不受欢迎，而且他几乎没有得到英国和路德教王公的帮助，他被失败冲昏了头脑。其后果是波西米亚被遗弃在火与剑之下。帕拉特被蒂利的军队所征服和破坏，选帝侯的尊严被转移到巴伐利亚。1625年，英国、丹麦和荷兰的干预也无济于事。

天主教徒现在在选举团中占了多数。但马克西米利安和斐迪南的利益不再相同，他们成了竞争对手。通过华伦斯坦的完美能力，皇帝得以摆脱对联盟的依赖。德国成了无数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军队的猎物。

斐迪南嫉妒华伦斯坦的权力和野心，将其调离指挥岗位。此外，斐迪南还通过1629年颁布的《恢复原状诏书》削弱了他的事业；其中宣布了天主教解释者对《帕绍条约》提出的最极端要求。很明显，没有什么比完全消灭新教更重要的了。包括勃兰登堡和撒克逊选帝侯在内的不冷不热的王公们被唤醒了对自身危险的认识。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悲剧。这场战争戏剧的第二幕把古斯塔夫-阿道夫带到了舞台上，他对新教信仰的真诚依恋是不容置疑的。这位瑞典英雄的胜利迫使华伦斯坦回国服务。1632年，古斯塔夫在胜利的时刻倒在了卢

岑。

法国伟大的政治家黎塞留的影响是，他恢复了亨利四世的反奥地利政策。法国对哈布斯堡家族建立普世君主制的努力的传统抵制，现在变得非常突出。1633年，法国在《海尔布隆条约》中与瑞典和德国的新教国家结成联盟。1634年帝国在诺德林根取得胜利后，法国的援助变得不可或缺了。勃兰登堡和撒克逊由于对瑞典的敌意，与皇帝单独签订了条约。在撒克逊，对加尔文主义的敌意中和了对这种安排的厌恶感。

这十年间，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新教国家站在帝国一边作战，并为其前盟友的遗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1648年，维也纳宫廷的顽固态度才被军事上的挫折所克服，《复国诏书》也被放弃了。

在这场战争中，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所造成的残酷是无法形容的。据说，德国的人口在30年内减少了20%到50%。符腾堡州有四十万人，到1641年只剩下四万八千人。在肥沃的地区，由于庄稼被毁，很多人死于饥荒。比饥荒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暴力统治所带来的不道德行为和道德败坏。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的一项重要协议。协定规定，在德国，无论王公的信仰如何，每个州的宗教都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根据其在1624年的地位，天主教或新教，1624年被确定为 ″正常年份″。在帝国事务中，两种宗教之间建立了平等。宗教自由和公民平等被扩展到加尔文教徒。通过赋予国会对所有重要事务的决定权，以及允许其成员相互结盟和与外国结盟，帝国被削弱为一个阴影。

权力的和平，只有一个徒劳的条件，即不应该因此对帝国或皇帝造成损害。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了承认。持续了80年的荷兰大战争就此结束了。瑞典

在波罗的海地区得到了加强，并在德国议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天才在北方创造了一个新的新教力量。法国的收获包括三个主教区：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以及上、下阿尔萨斯。德意志帝国从此只在名义上存在。法国扩大了自己的疆域，并训练了自己的军队。新教的损失确实很严重。关于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的争论，以及公爵和选民的小争吵，给新教在德国的利益，以及整个祖国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也许可以把瑞典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奥地利和西班牙则部分丧失能力看作是某种补偿。

尽管有天主教反动派的统治，以及由其发展起来的狂热主义，教皇们发现不可能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恢复中世纪教皇们的权威。

西克斯图斯五世（1585-1590年）在管理自己的国家方面精力充沛，在扩大教会范围的宏伟计划方面也很丰富，当他倾向于对亨利四世宽大处理时，却遇到了来自西班牙的强烈抗议。正如兰克所说，分裂世界的因素 "使他的灵魂充满了冲突的混乱"。他建立了梵蒂冈的印刷厂，为学习事业做出了贡献。在那里，七十士译本于1587年出版，不久之后，按照特伦特会议的指示，又出版了武加大译本；但它被发现含有如此多的错误，以至于不得不在他的继任者的主持下准备一个更正版。

克莱门特八世（1592-1605）免除了亨利四世的诉讼。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和西班牙于1598年缔结了《韦尔维耶和约》，两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得以恢复。

保罗五世（1605-1621）在执行教会教规时，将教皇权威的最高理念与严厉结合起来。他承诺在与威尼斯的关系中坚持这一点。当他的命令被忽视时，他将元老院逐出教会，并将威尼斯共和国置于禁治之下。威尼斯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屈服于这一点，当1607年通过法国的调解与专横的教皇达成和平时，威尼斯并没有放弃任何实质性的要求。

格里高利十五世(1621-1623年)确立了选举和祝圣教皇的方法。他为支持和指导传教士的宣传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嘉布遣会的保护者，并将耶稣会的创始人洛约拉和泽维尔封为圣徒。

乌尔班八世(1623-1644)，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西班牙和奥地利有敌意。在德国的大战中，他支持法国和黎塞留。教皇再次帮助新教事业，使皇帝和他的盟友感到非常厌恶和不快。此后，乌尔班和英诺森十世（1644-1655）对条约中对新教徒作出的让步提出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正是在乌尔班教皇时期，詹森纽斯的观点受到谴责，而伽利略也被迫撤销了他的科学学说。

1618年在法国成立的圣莫尔本笃会，它通过与之相关的学者和出色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教会教父的版本--而显得与众不同。

新教徒对希腊教会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不承认教皇制度。然而，他们的努力被东方的教会人士击退了。希腊基督徒西里尔-卢卡（Cyril Lucar）曾试图将加尔文主义形式的新教嫁接到东方教会中。他是克里特岛人，在欧洲广泛旅行，并在瑞士接受了新教信仰。回到东方后，他于1602年被任命为亚历山大牧首，并于1621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他与欧洲的新教神学家通信。1633年，他写的信仰忏悔书出版了，其中有新教的神学内容。但耶稣会对他进行了积极的阴谋活动。他的印刷品被毁。他几次被罢免，又被恢复职务，最后在1638年被苏丹以叛国罪处死。他的工作没有取得永久的重要成果。

俄罗斯教会逐渐独立于君士坦丁堡。1589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宗主国；但是，直到17世纪中叶，该职位的现任者都必须由古老的东方首都的宗主确

认其任命。为使俄罗斯教会与罗马联合起来所做的努力是无效的，除非是在波兰获得的省份。作为对抗罗马和新教的盾牌，″莫吉拉斯的东正教忏悔 ″是在1640年左右由基辅大主教起草的，随后得到了东方四位大主教的认同。1672年，耶路撒冷宗教会议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忏悔书，其中对希腊正统教义进行了定义。它包括对转世的主张，以及对炼狱的教义，与罗马教会的教义没有本质上的不一致。

==========

第九章

新教教会的政体和敬拜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期望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能解决与教会和国家关系有关的问题是不合理的。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些问题是由宗教和公民社会的性质产生的。

即使是 ″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 ″的 ″现代理想″,也没有解决民事权力的适当界限问题。例如，教育问题今天为不容易调整的争议提供了材料。当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如罗马教会，声称有权界定国家权力的界限，并控制团结在其等级制度下的众多公民的良心时，其他困难就可能出现。摆脱教皇制度的桎梏，其直接结果是带来了独立的国家教会。有思想的人一直认为，宗教

是道德的基础，而宗教和道德则是国家的基础。西塞罗说，他知道的是，如果虔诚被消灭，"善意，人类的社会联盟，以及正义，最高的美德，也将同样灭亡。"普鲁塔克说，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假设一个没有房屋或地面的城市存在，而不是一个没有神灵信仰的国家。但宗教的指令是至高无上的。当它的提示与民事统治者的政策和法令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此外，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不能被地理上的界限所限制。任何一个特定的民间团体的有组织的基督教与整个教会的关系是需要确定的。

避免政教冲突的一种方式是在教会和国家两者的绝对融合中找到的，如在伊斯兰教中。在那里，《古兰经》是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法律书，哈里发在国家和宗教两个方面都是最高的。在古代犹太人的制度中，也有神权政治。有一部关于信仰和崇拜的法典，以及属于国家法律范畴的所有问题。在中世纪，人们在教会对国家的控制中寻求解决办法，其理论是，世俗和精神权力都来自教皇。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制度的理论，如在古埃及和东方国家存在的那样。相反，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保证了统一性。宗教是国家的一个部门。只要在信仰和崇拜方面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宗教被认为是纯粹的国家事务，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当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异见者出现时，当宗教被视为具有普遍性时，希腊-罗马的理论就被动摇了。

改革者们普遍同意摒弃等级观念，认为教会的主体是教会的原动力，教会权力的原初位置。它是由教友的权力组成的政府，与由牧师阶层组成的祭司阶层的政府不同。路德说，“人的发明发现了教皇、主教、牧师和修士等被称为精神或教会国家；而王公、贵族、公民和农民被称为世俗国家或俗人。真是个好故事；但不要被这种虚构的东西吓坏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属于精神状态；除了他们履行的职能外，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其他区别。我们都有一个洗礼，一个信仰；只有这个才是属灵的人或基督徒的国家"。路德宣称，"信徒的钥匙，或行使教会纪律、圣礼和政府所有权力的权利；神职人员被委托

执行属于所有人的共同职务、但不能所有人履行这些职责。授职只不过是一种仪式，人们据此进入牧师行列；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牧师团。教会（教会会众集体）拥有自治权，包括召唤和任命牧师的权利，以及开除教籍的权力。”

这些抽象的学说如果得到实施，就会把民事权力限制在比撒克逊改革者实际规定的范围更窄的范围内。路德认为，给予德国人的权力太过粗暴和动荡，在自治方面太不成熟，因此不能立即将教会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王公们，即教会的主要成员，必须在教会的安排上起带头作用，而人民必须顺从他们。农民战争和与再洗礼派的争斗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使人们反对任何旨在剥夺行政长官权力的做法。虽然《奥格斯堡忏悔录》将民事统治者的管辖权限制在世俗事务上，但在出现特殊问题时，路德和梅兰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惩罚违反十诫法律第一表的罪行，并使这一职务包括赶出教会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撒克逊的两位领导人—路德与梅兰，都非常强调--预测了统治者可能会对教会行使的暴政。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每个社区的宗教由王公的宗教决定，持异议者的唯一出路是移民的特权，在它之后，路德教社区大量实现了这些贤明的预言。地方统治者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他的顾问是一个教士会议。因此，无论是在行政长官权力的扩展方面，还是在神职人员与会众的适当关系方面，都与路德的原则有了本质的区别。在选举牧师方面留给教会的唯一权利是确认或拒绝赞助人的提名。

在黑森州，弗朗西斯-兰伯特（Francis Lambert）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尝试，建立了可称为公理会制度的制度，并注入了长老会的元素。该计划是在1526年的洪堡会议上制定的。路德被征求了意见，他抽象地赞同这一计划，但认为它不可行。他说，这样大量的新法律不可能被引入：法律必须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黑森州的宪法从未完全付诸实施。

路德宗政体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监督者和主教团。1527年，应神学家的要求，撒克逊教会的来访者被任命为路德教会主席。由选帝侯指出。通过他们，一个统一的教会政府和崇拜系统被引入，该系统由梅朗雄起草。监管人被任命，他们在各自的区域内行使某种主教式的监督权。这些的原因是，需要有合格的法庭来裁决与婚姻有关的问题。

教会法的废除，其中许多条款与新教的原则相抵触，以及旧的主教法庭的丧失，给路德派的牧师们带来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经常就这类问题写信给路德和他的伙伴们。

教规法在合法婚姻的道路上设置了如此多的障碍，以至于教士们很容易找到解除婚姻的借口。天主教法庭在批准宽恕和宣布婚姻无效方面的渎职行为，以及改革者起初在伦理问题上发现自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们不能再遵循教会的传统惯例，在判断他们偶尔陷入的错误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其中最严重的是允许黑森州州长的第二次婚姻，尽管他的妻子和她丈夫之间已经停止了一切夫妻关系，但她仍然活着。路德否认婚姻是一种圣礼。因此，如果仅仅通过民事契约，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缔结婚姻，它是有效的。但宗教仪式被认为是适当的。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伦理问题。因此，混合法庭成立了，一部分是神职人员，一部分是法学家；整个教会管理，包括开除教籍的权利，都交给了这些法庭。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主教制度一直持续到1587年。在丹麦，主教们在1536年让位于由国王任命的监督员。在瑞典，主教的职位被保留下来。

德国的事态发展使教会的管理权落到了新教王公的手中，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神学家和法学家向教会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或证明这一事实。

在十七世纪初，"主教制度 "得到了提倡。据此，人们认为，根据《帕绍条约》和《奥格斯堡和约》，统治者从皇帝那里获得了他们的教会权力。一些人认为，这些权力是通过 "移交 "临时授予的，直到对立的教会重新统一；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权力现在被恢复到它们最初和正确的归属地。在十七世纪末，"领土制度 "被建立起来，在这个制度中，主教权力jus episcopale与王公们被承认的改革宗教弊端的权利--jus reformandi相一致。这一制度使教会的管理，不包括对教义争端的裁决，成为王公作为国家统治者的适当职能的一部分。这一理论是由托马斯乌斯提出的，他的观点在实质上得到了格劳秀斯的认同，而英国人塞尔登则是这一理论的捍卫者，他否认教会的自主权，并以埃拉斯蒂安主义的名义闻名。起初，"领土制度 "是为了宽容而宣称的，但后来却成了暴政的有力工具。另一种理论，即 "合议制"，是由普芬道夫和普法夫阐述的。这使得教会原本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它通过契约将主教的权力移交给民间统治者。国家对教会的压迫--德国人称之为 Cæsaro-papismus--一直是路德教派社区的一个多产的罪恶之源。

在苏黎世，教会和国家实际上是一致的。教会的权力掌握在大议会的手中、它管理着这座城市。神职人员由行政长官提名或推荐，并由为此目的召开的人民大会接受或拒绝。开除教籍也是基督教行政机构的一项职能。慈运理认为，一个基督教政府可以惩罚违反上帝话语的行为，尽管他起初拒绝在宗教问题上实行强制原则。他认为，任何非基督教政府都可以被人民推翻--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和平地推翻；如果不可能的话，就用武力推翻。1525年，一个由牧师和平民组成的法庭成立，负责裁决与结婚和离婚有关的问题。苏黎世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伯尔尼和巴塞尔被采用。加尔文抵制了教会应被纳入国家的学说。他教导说，教会的官员应该由会众在已有官员的领导和同意下选择，并得到现有官员的同意。国家无权闯入教会的管辖范围、通过任命官员或实施责罚。然而，国家有义务与教会合作，并使其纪律行为生效。行政长官有义务消灭可恶的异端邪说；而对宗教的冒犯，如各种亵渎和偶像崇拜，

他也有义务加以惩罚。这种关于政府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天主教会所持的观点。在日内瓦的宪法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形势，并允许议会在教会事务中拥有比他的主要原则更多的权力。日内瓦的两类官员是长老和执事。他首先建立了充满活力的长老制度，将教义和纪律的管理交给一个由教士和非专业牧师组成的机构,董事会中非专业人员的人数是牧师的两倍。

苏格兰、法国和荷兰的新教教会都采用了长老会的章程，但形式上有一些不同。在苏格兰，有两类不同的长老--执政长老或平信徒长老，以及传道长老--他们共同组成了长老会，即当地教会的管理机构。会议中非专业部分的空缺由该机构本身根据牧师的提名来填补。最高法庭是大会。在法国，传道人与平信徒的长老和执事组成议事会或元老院，是地方教会的管理机构。空缺由执事会自己提名填补。牧师由长老和执事提名，提名由人民批准或拒绝；但如果被拒绝，可以向省议会上诉。总主教会议由同等数量的教友和教士代表组成。1572年后，在主教团和省议会之间有一个 "座谈会"，由一个地区的主教团的代表组成，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有权谴责教会官员。

根据英格兰教会的章程,它属于 "在教会中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也就是在教会的主体中--召唤和派遣牧师到主的葡萄园中。

我们已经了解了对等级机构的限制。主教的存在--然而，他们是由政府挑选出来的--在上议院，使神职人员在立法行动中有一定的份额。人们对教会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英国教会和国家的关系。

胡克的理论认为，教会和国家是同一个社会，在与世俗事务和除真正的宗教之外的所有事物相关时，它是英联邦；在与宗教相关时，它是教会。托马斯-

阿诺德（Thomas Arnold）博士是近代这一假设的忠实倡导者，他在国王的至高无上地位中发现了一个象征，并实现了教友有权管理教会这一真理。沃伯顿否认了教会和国家的这种同一性，他用两个性质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盟的理论来代替它。柯勒律治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提出了这种观点，即在英国的制度中，教会和国家是有区别的，但两者是结合的。他说，在英国，基督的可见教会与国家或既定教会是有区别的；但前者的牧师受雇于后者，有固定的条件，以促进人民的道德和宗教文化。但这种联系是可以割裂的。格莱斯顿先生在其早期的《教会与国家》著作中，支持一种与柯勒律治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观点。在德国，杰出的神学家理查德-罗特主张基督教国家的概念，其基本假设与胡克和阿诺德持有的概念相同。

在新教徒中，在与崇拜有关的问题上，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有一种倾向，即打破与中世纪教会的联系，而回落到圣经的指示或使徒时代的习俗上。总的来说，这种倾向在瑞士教会和英国清教徒中占了上风。在其他地方，有一种倾向，即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保留现有的习俗，并保持与过去的联系。这就是英国的主导思想。这些条款在规范仪式方面给了教会一定的自由度。据称，教会可以颁布不违背圣书的仪式和典礼。此外，"每个特定的或国家的教会，"在刚才所说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 "规定、改变或废除 "这些形式，只要所考虑的目的是为了造就羊群。路德教派是以同样的精神为动力，遵循同样的一般原则。然而，如果认为礼仪崇拜与主教政府有任何必要的联系，或者认为改革派或加尔文派的教会对它有任何异议，那么，也不尽然。相反，在宗教改革时代，所有的新教教会都有礼仪，而在今天，欧洲大多数新教教会都在使用礼仪。有两件事是新教徒们一致坚持的。一件是崇拜应以人民的语言进行；另一件是人民应参与其中。

1523年和1526年，路德编写了公共礼拜手册，这些手册建立在古老的仪式之上，许多古老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圣餐前的私人忏悔，他既没有拒绝，也没

有规定必须进行。他保留了与洗礼仪式有关的仪式，但在几个路德教会中被排除。坚振礼的形式有时也被保留。在更晚的时候，它被视为洗礼誓言的更新，在路德教派社区中被普遍采用。直到1543年，在维滕贝格才取消了在主的圣餐中抬高主持人的习俗。祭坛上摆放着蜡烛和十字架。在路德教派中，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作为公共崇拜的一部分得到了高度认可和珍惜。管风琴仍在使用；尽管对会众唱歌很重视，但唱诗班仍然存在，既是为了它在礼拜中的作用，也是为了帮助人们的音乐训练。路德说：″所有的艺术，″″都不会被福音打倒″。教堂里用图画来装饰，主题是圣经。- 他说：″如果在心里有基督的形象不是罪，而是正确的，为什么在眼睛里有它就应该是一种罪？″同时,这位改革家还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和所有与基督教圣地的奉献有关的功绩观念。如果不是在精神和真理上敬拜，那就比白费力气更糟糕。此外，他还要求在宗教的公共服务中，传道应该有最突出的地位。我们必须成为仪式的主人，而不是让仪式成为我们的主人，这是他的座右铭。他宣称，他的仪式书若被强加给崇拜者，那么这与他的愿望相去甚远。他希望在这些书不再具有教育意义的时候就把它们扔到一边。维登堡手册是大多数路德宗国家所采用的仪式形式的基础。路德派改革了 ″教会年″，但没有放弃。与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有关的重大节日--降临节、圣诞节（包括割礼和主显节）、复活节、纪念使徒的日子、施洗者约翰的日子、圣母领报节、净化节和圣母探访节也被保留下来。甚至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日子和第三世纪殉道者圣劳伦斯的日子也没有被废除，尽管从这些日子里，就像从所有其他神圣的季节里一样，寓言和迷信要被仔细地清除掉。

慈运理并没有提议拒绝仪式，如果它们能起到教化作用；即使圣经没有要求它们。然而在苏黎世，崇拜的变化是彻底的。崇拜的新方式被引入。风琴的滥用产生了广泛的反对意见，反对在教堂里保留这种乐器，因此，即使在特伦特会议上也有一派人赞成将其废除。它在苏黎世被排除在外，唱诗班被废除，有一段时间没有歌唱。考虑到慈运理个人对音乐的喜爱，这一事实表明

了他对福音崇拜的性质的看法。在巴塞尔，管风琴于1561年得到了修复。在苏黎世的礼拜中，有很多对圣经的阐述，在新教城市中，没有哪个城市比苏黎世对研究圣经有更普遍的热情，或对其内容更熟悉。

在日内瓦，法雷尔已经完全废除了礼仪。加尔文在《礼拜》中编写了一本简单但足够完整的礼拜书。在工作日，传教士们没有规定的祈祷形式。诗篇是用马罗和贝萨的法语版本唱的。在随后的时间里，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礼仪在范围上有了很大的缩小。日内瓦的礼仪成为其他地区加尔文派教会构建礼拜书的自由模式和指南。诺克斯为苏格兰教会准备了一份礼仪。

新教的特殊恩赐--由无偿宽恕的教义所激发的自由和欢乐的精神，以及由教友们承担的责任所激发的精，——教会事务的管理--体现在〞诗歌和音乐的爆发〞中，这是德国的特别特点。路德本人发表了36首赞美诗，其中21首是原创。其余的是翻译的，或改编自早期的德国歌曲。音乐方面，由于他的榜样和努力，也有了相应的进步。他毫不犹豫地将世俗的旋律用于神圣的用途。

在他的时代之前，特别是在十五世纪，就有许多赞美诗被写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圣母玛利亚有关。在弥撒中引入唱赞美诗的压力一直被稳定地抵制。但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齐声赞美上帝了。众多的赞美诗作者出现了，但路德站在了他们所有人的前列。他的赞美诗被海涅称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马赛曲〞。他最激动人心的歌词之一是在1523年布鲁塞尔两名路德派殉道者被烧死后写的：

“抛向无知的风、
　或抛在水面上、
他们的灰烬将被注视
并在最后聚集〞等。

路德的赞美诗不仅在教堂里传唱，而且在家庭、工场、市场和军队行军中也被传唱。福音乘着歌声的翅膀，以这种方式向外传播，几乎与传道人的声音一样多。当代的其他赞美诗作者包括保罗-埃伯，他的赞美诗开头是

"当在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援助"。

写于1547年，当时查理五世的军队正在围攻维登堡。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著名的德国赞美诗作家，其中保罗-格哈德（1606-1676）可能是最好的。他写了一百二十首赞美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这样的开头：

"哦，头，如此充满伤痕!

眉毛，它的生命之血失去了！"

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家和其他作者，如西德尼和唐恩，都写过圣诗；稍后，乔治-赫伯特（1593-1632）写了他的古朴诗篇，其中一些仍在教堂里传唱。他是周日赞美诗的作者：

“天最平静，最明亮、

今世的果实，来世的花蕾，"等等、

以及关于美德的诗句，其中第一句是

"甜蜜的一天！如此凉爽，如此平静，如此明亮、

大地和天空的新娘"。

但直到后来，英国才出现了类似 "人民赞美诗书 "的东西。

==========

==========

第十章

教义的历史

拉瑟派和改革派

_____

新教家族的两个主要分支，路德派和改革派，都在两个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因信称义，以及圣经作为信仰和行为准则的唯一权威。

英格兰教会尽管对教父和前几个世纪的教义敬而远之，但还是强调了这些教义的主张。它接受古老的信条，明确的理由是这些信条可以由 ″最确定的圣经证据 ″来证明；它宣布罗马教会以及东方的教会在信仰问题上都有错误，它也肯定了大公会议的情况。改革者们在圣经中听到了基督的声音。他们对《圣经》的解释通过接受《圣经》所带来的光明和平安，向他们的内心进行了验证。由于罗马教会的教义与圣经中关于救赎方法的明文规定相悖，罗马教会权威的传统信仰不得不让步。路德派和改革派之间最初的分歧点涉及到主的圣餐。加尔文主义的区别还在于它强调上帝在赐予恩典方面的主权，以及它更不愿意举行圣经没有明确认可的仪式。继路德之后，梅兰是路德派的主要教义阐释者。他的作品 ″Loci Communes″，是新教最早的教条式神学论文。他所写的 ″奥格斯堡忏悔录 ″和 ″道歉书 ″继续成为路德派的权威。但梅兰在主的圣餐的问题上，以及在人的意志在皈依中的作用上，背离了路德，这引起了严格的路德派的强烈敌视。这些人，即 ″反菲利普派″，体现在被称为 ″协约形式 ″的信条中。

路德在1536年起草的 ″斯马尔卡尔德条款 ″和他的教义，在路德教派的符号中有着光荣的地位。路德教会还不时地受到其他辩论的干扰。例如，由约翰-阿格里科拉（John Agricola）的学说引起的反悔派争论，即悔改必须不是通

过宣讲法律而是通过宣讲福音产生的；由奥西恩德（Osiander）的信仰引起的奥西恩德争论，即耶稣神性的公义在通过信仰接受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传达给了灵魂； 路德派和菲利普派之间的Adiaphoristic争论，关于国家规定的、本身并无错误的仪式是否可以被教会采用的问题--这种争论类似于英国清教徒和教会人士之间的争论；Flacian争论，由反菲利普派的Matthias Flacius的教导引起，其大意是：原罪已经腐蚀了灵魂的底层。--这是路德派普遍反对的一种奢侈的观点。在路德派神学家的名单中，梅兰最博学的追随者凯姆尼茨和十七世纪的昆斯泰特位居第一。

在宗教改革之后兴起的教派中，没有一个教派像再洗礼派那样产生了如此大的热潮。这个名字意思是重新受洗者，是他们的对手给他们取的名字，原因是他们拒绝接受婴儿洗礼者,并对他们中所有在婴儿时期接受过圣礼的人重新进行洗礼。再洗礼派是宗教改革中的激进派。他们认为改革者们的工作完成了一半。他们的兴起，部分是由于新教对罗马的反抗，但不是全部。但是，正如多尔纳所指出的,"所有不同的反教会趋势在中世纪暗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在维滕贝格发出的改革热潮后得到了宣泄，并在新的运动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扩展。" 早些时候，在瓦尔德人和其他教派中，以及在布鲁日的彼得和克鲁格尼的亨利等人中，也有反对婴儿洗礼的情况。但这一信条并不是再洗礼派的唯一特征，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连续性。

他们坚持认为，教会必须完全由重生者组成，而宗教不是由民事统治者来规范和管理的问题。在再洗礼派的名义下，包括了不同类型的教义和基督徒的生活。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指控的狂热和破坏性的狂热归咎于他们所有人，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正。这个狂热的阶层最早出现在德国，在托马斯-明泽的领导下，他于1521年以先知的身份出现在茨维考，并在1525年的农民战争中试图建立他的革命教义。这些理论涉及废除所有现有的教会和国家当局，并建立一个圣徒的王国，他将成为这个王国的首领。他和其他领导人在镇压叛乱

时被处死。然而，与明泽的门徒截然不同的是，格雷贝尔和其他在苏黎世组织起来的再洗礼派。他们拒绝城市对教会的管理，并拒绝承认婴儿洗礼。他们是爱好者，但不是狂热者。他们的精神是和平的，而且，看起来，他们是真诚的虔诚。然而，这些特点并不能保护他们不受严厉的、无端的惩罚，因为他们是公共秩序的破坏者和有害错误的倡导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以死刑。人们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行政机构。然而，他们没有走得更远，只是坚持认为任何基督徒都不能成为行政官，也不能参与死刑的执行。但是格雷贝尔，如果他自己不赞成叛乱，但由于他在一个农民武装起义的地区向农民传教，使自己被指控同情他们的煽动性计划。流动的传教士将再洗礼派的和平观点在南格州传播得很远很广。

在明斯特（Münster）进行了第二次暴力尝试，试图在现有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神权，在那里，狂热的领导人行使了极端的暴政和许可，直到该镇被占领，他们在遭受残酷的折磨后被处死。在十六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再洗礼派像一场燃烧的热潮传遍了整个德国；从斯瓦比亚和瑞士，沿莱茵河到荷兰和弗里斯兰，从巴伐利亚、中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和撒克逊，一直到荷尔斯泰因。″在查理五世时期的荷兰，再洗礼派犯有违反礼节和道德的罪行，受到了野蛮的惩罚。此后，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受到了《圣经》的指责。

一个种类同名、但精神完全不同的人群，在门诺-西蒙尼的指导下组织起来，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和良知的人。这些人的目的是严格按照福音生活。在德国也有同教派的兄弟会与他们相交。门诺派没有制定正式的信条，他们摒弃了宣誓、使用武器和报复，虽然他们赞同文官政府，但拒绝在国家中担任职务。他们在教会中有严格的纪律；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极其严格的党派和一个比较宽松的党派。来到荷兰的英国布朗派或独立派被带入门诺派的行列。他们共同反对国家教会，要求先重生再加入教会，这就形成了一种共鸣。

1535年后，许多再洗礼派教徒来到英国，在诺里奇和其他地方成立了教会。他们得到了某些在荷兰支持再洗礼派观点的布朗派的支持。1605年，曾担任甘斯伯勒牧师的约翰-斯迈思牧师和他的一个同伴在阿姆斯特丹脱离了独立教会。斯迈思不承认他在婴儿时期接受的洗礼，自己给自己洗礼，因此被称为"再洗礼派"。由他组建的教会出现了分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先是在赫尔维斯的牧养下，然后在默顿的牧养下，于1611年穿越到英国，几年后（1612-1614）在伦敦成立了一个浸礼会。在瑞士，人们认为格雷贝尔和他的伙伴们在一段时间后采用了浸礼的做法。斯迈思是否以这种方式受洗，以及英国浸礼会中何时开始采用浸礼的形式--是在1641年，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还是在那之前--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在不满足于路德教义的神秘主义者中，有卡斯帕-施温克菲尔德的追随者，他是一位虔诚的贵族。他在1525年认为自己从上面得到了启示，知道了主的圣餐的真正含义，关于这一点，人们有很多争论。他的观点更接近慈运理的观点。但他的特点更进一步。他教导说，如果没有基督这个内在的道对灵魂的更新，法学上的公义是没有意义的。他并没有抛弃圣经和圣礼，而是把它们放在次要地位。他的主要观点与"道成肉身"有关。他认为，基督的人性，虽然是真正的人，但却是上帝的后代，因此，与一般人的本性不同。它被高举为神性的一部分。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荣耀的基督，他是真正公义的来源，也是包括参与神圣完美的生活的来源。施文克菲尔德在西里西亚和其他地区有许多门徒。由于在德国受到迫害，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于1734年移民到宾夕法尼亚。

一个不太重要的教派是"爱的家庭"或"家庭主义者"。大卫-乔治（David George），或称约里斯（Joris），代尔夫特人，在巴塞尔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并在1556年去世，他声称自己是第二个大卫，预言将通过他得到完全的实现。一个同类人，亨利-尼克拉斯，或称尼古拉斯，即家庭主义者的真正创

始人，于1533年在西弗里斯兰定居下来。摆脱所有的律法主义和精神上的完美，是这个教派的理想。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他们在英国引起了轰动。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是纯洁和虔诚的。其他人则被指责为松懈、放荡的行为，是神秘的反律法主义的结果。

新教团体中的改革派分支的符号比路德派的多得多，因为改革宗的教会是在如此多的符号和不同的社区中建立的。我们有信条--巴塞尔忏悔录--它是在慈运理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在加尔文获得影响，瑞士神学传播之后，忏悔录（信仰告白）成倍增加。其中有《海德堡教义》，它是在帕拉蒂纳州创作的，在那里梅兰的神学盛行，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离开路德派，加入了改革派。这部《教义》和后来的《赫尔维蒂忏悔录》是德国归正教会的象征，它是以上述方式产生的。其他著名的加尔文主义信条有：胡格诺派的信条；荷兰加尔文主义的象征《贝尔吉特忏悔录》和《多特会议法令》；诺克斯撰写的《苏格兰忏悔录》；英国长老会制定的《威斯敏斯特忏悔录》和《教义》；英国独立派采用的《萨瓦忏悔录》。在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名单上，除了慈运理和加尔文这些杰出的名字，以及同时代的一些声望很高的人，如埃科兰帕迪乌斯、布克和布林格，在欧洲大陆还有一大批属于16和17世纪的加尔文主义教师，他们有能力，有学问，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已经不再为其他学生所熟悉。他们对加尔文主义进行了精确的逻辑定义和辩护，但其风格过于枯燥和学术化，不适合后世的口味。

德国归正会，由于其起源的环境，在其预定论的信条中相对温和。它将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归入盟约计划--三位一体的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通过引入这些契约关系，该体系中一切以神的契约为基础的方面得到了缓和。信条的方面，被软化了。Cocceius是1603-1669年联邦神学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将解释《旧约》的典型方法引入流行。一个反对派坚持以赤裸裸的法令为基础的旧形式的加尔文主义，由博伊特乌斯领导。维特修斯（1636-1708年）是联邦制

的一位博学的阐释者。它不仅在荷兰，而且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加尔文教徒中获得了青睐并迅速传播，取代了加尔文主义教学中生硬的、学术性的形式。

在法国的索米尔学校，也就是胡格诺派的神学院之一，出现了偏离当前加尔文主义声明的学校。约翰-卡梅伦，一个苏格兰人，是第一个提出创新的人。他的学生阿米劳特（1596-1664）教授了所谓的 "假想的普遍恩典 "的学说，这实际上是对普遍赎罪思想的一种接近。他不止一次在法国教会的全国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但每次都被宣告无罪。他的一位同事拉普拉斯（Placeus），因为教导亚当的罪并不立即归咎于他的后代，而是人的本性堕落是他们被定罪的第一个理由，而引起了一场风暴。第三位教授卡佩尔(Cappel)使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感到震惊，他指出希伯来语旧约文本的元音点是比基督教时代更晚的发明，并没有神的权威；而古代圣经的公认或masoretic文本是可以修改的。针对索米尔学院的这些观点，"赫尔维蒂卡共识公式"，即瑞士神学家们制定的最后一个信条，受到了抨击。

与伟大的阿米念派叛乱的兴起相比，加尔文主义的这种修改只是小巫见大巫。阿米尼乌斯是一个有能力、有成就的人，他曾在意大利旅居过，他的老师中就有贝萨，他是阿米念派的朋友，也是加尔文的学生。他是荷兰人，1603年被任命为莱顿的神学教授。此前，他在阿姆斯特丹担任传教士，并参与准备驳斥对法令至上主义的攻击，但他在整个问题上陷入了怀疑，这导致他完全拒绝了无条件选择的学说。在莱顿与他对立的是高尚的加尔文主义者戈马罗斯。阿米尼乌斯的追随者成倍增加，两派的争论在荷兰蔓延。这是一场关于加尔文主义基本观点的辩论。阿米尼乌斯的继任者是埃皮斯科皮乌斯，一位能力出众的神学家。在阿米念派的组织中，乌伊腾博格特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信条在他们写给荷兰和西弗里斯兰议会的《抗议书》中得到阐述；这给他们起了一个 "反驳者 "的名字，他们在荷兰通常以此为名。在这份文件中，他们肯定了基于预知的信仰的有条件选择、普遍的赎罪、圣灵的重生（然而，

圣灵的影响不是不可抗拒的），以及信主的灵魂普遍持续保守的理论的可疑性。一条巨大的政治分界线将两个争论的政党分开。阿米念派是共和党人。加尔文主义者追随奥兰治亲王莫里斯。

多特会议旨在成为加尔文派教会的一种总理事会，对阿米念派的神学进行审判。实际上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詹姆斯一世从英国派来了几位代表。这次会议没有批准戈麦斯的极端教条，但它谴责了阿米念派的特色信条。它主张无条件的选择、有限的赎罪、不可抗拒的恩典、所有重生者的坚忍。在这之后，阿米念派有一段时间被禁止行使他们的宗教。他们的200名传教士被废止。当亨利王子成为执政者时，他们首先获得了宽容，然后获得了建造教堂和学校的充分自由。在阿米念派的成员中，有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是同样著名的学者、外交家和神学家，他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赎罪的论文和对圣经的评论；林伯希（Limborch），也许是阿米念派学说体系的最佳阐释者。

阿米念派在对圣经和教会早期历史的批判性研究方面做了先驱者的工作。他们不喜欢严格的教义检验，自然主张宽容。他们倾向于将基督徒联合的要求降到最低。因此，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许多加入他们的人在否认公认的教义方面比阿米念走得更远。索西尼派被赶出波兰后，来到荷兰，在那里与向加尔文主义信条的异议者敞开好客之门的党派融合在一起。在英国，在加洛林时期，阿米念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圣公会的普遍信仰。它以其学术性但不温不火的精神浸润了十八世纪的英国神学。在卫理公会的复兴中，它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和热情，这在它的故乡或被移植到英国后都不属于它（即，阿米念主义者往往没有热情）。

关于索西尼派的起源，我们必须转到意大利。迈克尔-塞维图斯的著作无疑在融合反三一教派的观点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最早出现的明显的一神

论者（即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都出生在意大利。在那个国家，作为文艺复兴文化的伴随物，理性主义信仰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广泛传播。出生于锡耶纳一个贵族家庭的福斯图斯-索西努斯（Faustus Socinus）就是这样的人。他为一神论的信徒们提供了自己的名字。他首先学习法律，然后学习神学。他继承了他叔叔拉里乌斯-索西努斯的论文，他是一个具有探究精神的人，在他与加尔文和他所访问的其他新教领袖的交往中，表明他对一神论学说的同情。在佛罗伦萨住了很久，又在巴塞尔住了三年，福斯图斯去了波兰，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在那里发现了在他之前的一神论者。他劝说他们恢复他们已经抛弃的婴儿洗礼习俗，并被他们接受为指导者和教师。通过索西努斯和在波兰学校接受培训的学者们，一神论得到了定义和精辟的辩护。它在上层社会中传播，直到其信徒在天主教反动时期受到迫害。索西努斯把《圣经》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教科书来研究，与其说是为了满足他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为了平息内心的道德斗争，不如说是为了他的研究和交往中所产生的特有的理性主义气质。他的体系在《拉科夫教义》（由拉科夫传教士编写）中有所阐述。他们信条的中心点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和满足。他（基督）的职务被定为教师和立法者。他揭示了灵魂的不朽，并通过从死里复活验证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督教的证明中，神迹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位的。理性主义的倾向在这里导致了极端的超自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福音的内部证据的力量算不上什么。普通的原罪和天生堕落的教义被拒绝。人们认为，撒旦和不可救药的恶人最终会被消灭。

英国宗教改革的特殊性以及教会人士和清教徒之间争论的问题上文已经描述过。在十六世纪，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新教--如克兰默、拉蒂默、雷德利、胡珀、朱厄尔--是著名的传教士和神学作者。理查德-胡克的名声主要在于他的《教会政体》；但他关于圣餐和预定的零散文章，就能力而言，与那篇更详尽的论文相当。在十七世纪，有一长串的知名神学家和牧师的目录，包括在固定教会和清教徒的队伍中。有几个名字在这里可以方便地组合在一起，

使我们超出了本期的篇幅限制。在教父的传说中，乌舍尔大主教的坦率和虔诚与他的学识相当。他是一个最温和派的圣公会成员。值得一提的是，与《圣经》授权版本有关的年表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对Bishop Bull来说、他是正统的三位一体学说的博学支持者，下文将提到他。在旺盛的丰富的想象力方面，"传教士中的莎士比亚 "杰里米-泰勒胜过所有其他当代神学家。他的《神圣的生与死》一直是英国灵修文学中的经典。他的 "Ductor Dubitantium"。他的《怀疑者指南》是那个时代产生的相当数量的关于案例分析的论文中的一篇。对清教徒的神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主题。有一次，在牛津大学，当清教徒处于上升期时，有一个办公室，在良心问题上可以咨询牧师们。泰勒，就像那段神学研究和纷争时期的许多其他神学家一样、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者。艾萨克-巴罗，除了是一位传教士外，他充满活力的风格还赢得了最好的文学评论家的最高赞誉。他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数学家。他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老师。爱德华-斯蒂林在与洛克的争论中显示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敏锐性，在关于基督教的证据、赎罪和三位一体的书籍中显示了他作为神学家的技巧。在他的主教制度理论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的教会人士。夏洛克将作为一神论（否认三位一体）的反对者和推崇三位一体学说的作者受到我们的关注。沃特兰是仅次于布尔的这一信仰条款的捍卫者。约翰-皮尔逊，切斯特主教发表了《（使徒）信条的解释》，该书作为英国教会的神学手册，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实至名归。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三位一体的讨论很有学问，很有启发。伯内特主教以他的 "宗教改革史 "和其他作品而闻名，其中之一是 "三十九条的解释"。在他的历史第一卷出版后，他得到了议会两院的感谢，并要求他继续工作。早年，他在荷兰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在许多不同的宗教团体中发现的不折不扣的虔诚，激发了他的公教精神。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历史学家所受到的尊重，已经被麦考利在他的《英国史》第二卷中证实。

罗伯特-莱顿（Robert Leighton）、格拉斯哥的大主教，是一位圣公会的教

长，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 ″彼得第一书信注释″，以灵性的洞察力和慈善为标志。罗伯特-索斯的布道以其思想的活力而闻名，更以其饶舌的风格而著称。他的句子一个接一个，就像连枷的击打。在表达的力度方面，很少有传教士能超过他。在查理二世的时代，他乐于向清教徒的首领倾吐嘲讽性的言辞，使他的听众感到非常高兴。有三位神学家因其学术造诣而受到了应有的尊重：约翰-莱特福，一位博学的学者。他曾参加威斯敏斯特大会，并撰写了《希伯来语》；汉弗莱-普利多，《新旧约的联系》的作者。以及约瑟夫-宾汉姆（Joseph Bingham），他的不懈研究在他的 ″基督教会的历史 ″中结出了硕果。

在众多的清教徒神学家和作者中，有几个人可以被挑出来特别注意。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年）太穷了，无法在大学学习，但他积累了大量的学问。在他写的168本书中，有三本是大型对开本，其中最有名的两本是《圣徒的永久安息》和《对未皈依者的呼唤》。在这些书中，他的宗教热情给每个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大量的神学论著相比，这些书没有花费他多少精力。巴克斯特是长老会成员，曾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但决不是他的政府的忠实支持者。在政治上和神学上，他的命运是走中间路线，虽然完全正直和无私，但还是要接受争论各方的打击。他愿意接受主教制，但更希望有更多的主教，并将主教的权力与长老会分割开来。他的目标是在阿米念派和加尔文派之间进行调停，因为他是一个真诚的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神学中的纷争主要是由术语的模糊性造成的。他自己的信仰类型可以被描述为温和的加尔文主义。他认为有足够的恩典给所有人悔改，但圣灵的恩典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同等程度地给所有人。如果恩典被赋予更多的量，部分原因是人们更容易接受，部分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好理由。伯内特这样评价巴克斯特：″他的写作方式非常感人，富有哲理，他一生都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朴实的人，但最不幸的是，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很微妙，而且是形而上学的。″ 他的讲道具有最高程度的煽动性和说服力。在詹姆士二世时期，他被臭名昭著的杰弗里斯送进监狱，但后来被释放，并在1688年的革命中幸存下

来。在基德明斯特，他作为牧师的持续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一座纪念他的雕像于1875年揭幕，上面刻有铭文：″在1641年至1660年间，这个城镇是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工作场所，他因其基督教的学识和对牧民的忠诚而闻名。在一个风雨飘摇、四分五裂的时代，他倡导团结和理解，指出了通往永恒安息的道路。″

约翰-欧文是独立派的领袖。他的《对希伯来书信的评论》，他关于″神圣的正义″和″公义″的论述，以及他的论战性著作，反对阿民念派和索西尼派的论战文章，都是他博学多才的纪念碑。欧文是一个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他有时反对巴克斯特，并在关于赎罪的争论中与他比试剑术。他还写文章反对约翰-古德温（1593-1665），古德温是一位博学的独立人士，但却是一位阿米念主义者，主张普遍赎罪。古德温认为，异教徒只要有虔诚的种子和对救赎仁慈的信心，就能得救，这在当时是一个令加尔文教徒厌恶的学说。他不应与托马斯-古德温混为一谈，后者也是1630年的独立信徒，地位很高，是加尔文主义者。约翰-豪（John Howe）是《活的圣殿》（The Living Temple）的作者。该书讨论了有神论的基础，还有其他博学的神学著作，是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中最和蔼可亲、最有吸引力的一位。他曾一度是克伦威尔的牧师，但他受到各方的推崇。罗伯特-霍尔说：″我从约翰-豪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我读过的任何作者那里学到的都多″。清教徒的神学家们是出于充分的思考，并怀着对基督教的热情而写作。因此，他们写得很冗长，并受到忽视的惩罚，这种错误通常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清教党内有两个平凡人因其才华和作为作者的名声而引人注目。约翰-塞尔登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成就既深刻又多样。《希伯来人的妻子》是他的一篇关于犹太国家的婚姻和离婚问题的论文。他的″餐桌谈话″充满了金玉良言。塞尔登是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成员。他被格劳秀斯称为″英国民族的荣耀″。约翰-米尔顿，1608年，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杰出表现并没有掩盖

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优点。他辞藻的华丽与激励他的感情的升华和光辉相称。他是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是一个独立的人，对长老会的反感几乎不亚于对主教制的反感。他说，人们发现，"新的长老会不过是旧的牧师"。他在争论中与主教制混为一谈，反对霍尔主教和乌舍尔。他的遗著《基督教教义》在1823年被曝光，两年后出版。这篇论文，虽然他很早就开始为这样一部作品收集材料，但却是在他的晚年写的。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中，他明确主张阿里乌派和阿米念派的观点。他对离婚的看法与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样宽松。他否认遵守主日是基于第四条诫命或任何其他圣经法律的约束。他认为浸礼是适当的洗礼形式，对婴儿的洗礼没有圣经上的证明，但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时期接受过洗礼，他就不需要再接受洗礼--即使约翰的洗礼被认为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已经足够。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罗马教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确定和维护其立场，反对新教主义。特伦特会议的信条在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关系上为不和谐的意见留下了空间，但提供的教义声明总体上是足够明确的。由神学家委员会制定的《罗马教义》更有利于教皇的利益。耶稣会士们不喜欢它的神学，并经常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卡尼修斯撰写的《教义》。在宗教改革时期，伊拉斯谟是代表罗马教会的最重要的作家，尽管也有著名的论战者，如约翰-艾克。红衣主教卡耶坦，也就是在奥格斯堡遇到路德的那个人，成为圣经的彻底学生，并在他的评论中毫不犹豫地对教父和学者的经文作出不同的解释。在Tridentine时代，作为对 "马格德堡世纪 "的间接回应，即路德作家的作品，巴罗尼乌斯在1538-1607年写下了长篇大论，学识渊博。

"巴罗尼乌斯在编写《教会年谱》时，曾接触到梵蒂冈的档案。教义神学的主要权威是罗伯特-贝拉明（1542-1621）的作品，它为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们提供了一个武器库。他对教皇相对于世俗统治者的特权提出了崇高的看法。保罗神父Sarpi，在他的 "特伦特大公会议史 "中，对教士和教皇权威的看法

是如此自由，对教会中的人和程序的批评是如此尖锐，以至于他在自己的教会中受到的敌意多于恩惠。有人甚至企图暗杀他。他被逐出教会，但当他的家乡威尼斯（他坚定地维护着威尼斯的事业）与教会讲和后，他被解除了禁令。

帕拉维西尼从教皇的角度写了另一部相当详尽的 "大公会议史"，这让新教徒非常高兴。弗朗西斯-苏亚雷斯（Francis Suarez）是耶稣会的一名西班牙神学家，他以罕见的微妙方式阐述了半柏拉图式的学术神学。他传授了他所属教团的伦理原则。他反对英国圣公会异端邪说的著作得到了教皇保罗五世的特别感谢，并被詹姆斯一世下令在圣保罗教堂前烧毁，在巴黎也被议会投票谴责，因为它反加里安人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主张。苏亚雷斯和贝拉明一样，肯定了教皇废黜国王的权利。现代的神学教义史科学要归功于贝塔维乌斯，一位博学的耶稣会士，他是其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卷的特点是学识渊博，而且有不小的文学技巧。他清楚地把握住了教义发展的理念。在这部作品和他的其他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与知名的新教学者的友谊使他受益匪浅，其中之一就是艾萨克-卡索邦。

罗马天主教会中的神秘主义和虔诚派中，弗朗西斯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在日内瓦附近，他积极并成功地说服了新教徒。1602年，他被任命为该城市的主教。他是一个简单、尖锐、令人印象深刻的传教士。他作为一个宗教指导者受到高度评价。作为一个教士和政治家，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他的著作和榜样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静默主义，莫利诺斯、费内隆和盖恩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的范围内，属于伊普尔主教詹森纽斯的生活，奥古斯丁神学在他那里得到了复兴，他的观点后来被帕斯卡尔和保皇党人采纳。因此，在法国历史上如此有影响力的詹森主义党就有了它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学院派神学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在对它的攻击中，他也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路德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名字，并经常对哲学进行谩骂。正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让这位撒克逊改革家特别厌恶。他在其他科学领域的论文路德承认是有用的。梅兰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编写了几本教学手册。哲学的两位革新者是培根和笛卡尔。培根指责他们忽视了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并且他们的方法在应用于这一类的调查时是不成熟的。他们忘记了寻找物理的原因，并轻视了耐心调查的道路。但培根坚持认为，最终原因是值得探究的，因为它们被保留在自己的领域内，即形而上学和神学。他 ″宁愿相信《传奇》、《塔木德》和《阿尔科兰》中的所有寓言，也不愿相信这个普遍的框架是没有思想的。″如果思想着眼于第二个原因，″联合起来，联系在一起，它必须飞向天意和神灵″。哥白尼的发现使那些接受它们的人，如果他们是在罗马教会的管辖下，就会受到异端的惩罚。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一个聪明的人，哥白尼理论的信徒，亚里士多德的攻击者，提出了泛神论的理论，并于1600年在罗马被烧死。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强迫放弃了他的观点。

在形而上学方面，现代学校的创始人是笛卡尔。他用尽一切办法避免冒犯教会人士，但他也没能逃脱索邦大学的责难。他认为哲学不再从大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陈述开始，而是要求它的独立性。它不再是神学的婢女。笛卡尔尔提议从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开始：″我思故我在″，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于逻辑，建立起整个形而上学的结构。心灵与物质的分离、灵魂的非物质性以及先天的观念等学说，构成了他的体系的精神特征。它的发表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现代泛神论的创始人是斯宾诺莎。他的父母是犹太人，有葡萄牙血统，但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他对思想和研究有一种深刻而安静的热情。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出于良知的动机，他拒绝了海德堡的教授职位，宁愿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斯宾诺莎认为，有一种物质，而且只有一种，万物都是它的现象表

现。它有无数个无限的属性，其中只有两个，即思想和延伸，是向我们揭示的。所有单独的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这些属性的模式；它们没有实质性的存在。神性的自我意识和预想被否认，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仰被称为一种幻觉。世界就这样与上帝相提并论，并被解析为他无限但非个人的本性的一种表现。在他的《神学政治学论》中，斯宾诺莎进入了对圣经的研究，是德国理性主义批评家的先驱。他认为，宗教是对上帝的爱，是与教义无关的。国家可以管理宗教的外部，但必须让思想自由。

这一时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地位属于文学家，但哲学史却不能忽略他们。

其中一位是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的孩子，一位名叫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幽默大师，他的信条仅限于纯粹的有神论，甚至没有明确承认灵魂的不朽。蒙田，通过他的散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部门，尽管普鲁塔克的散文提供了一种模式；而他是普鲁塔克的学生，他对普鲁塔克非常钦佩。在蒙田关于各种主题的和蔼可亲的论文中，没有对基督教真理的敌意，但有对理性能力的贬低，以及将宗教归于无根据的信仰领域，相当于一种友好的怀疑主义。

新教徒在反对罗马天主教认为使徒教义的传统与圣经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时，有时低估或忽视了传统作为一种历史证据的形式，并默许地将接近使徒时代的传统与后来的传统相提并论。在这个问题上，阿米尼乌斯和格劳秀斯做出了更有鉴别力的声明。特伦特会议对《旧约》中的伪经给予了正常的权威。在这一点上，新教徒们有分歧。伪经是与早期新教版本一起印刷的。三十九条说，这些书，″教会阅读这些书是为了树立生活的榜样和指导礼仪，但并不应用它们来确立任何教义″。

路德倾向于根据每本圣书的教义与通过基督进行无偿救赎的教义的关系来衡量其价值。这条 ″站立或倒下的教会的条款 ″是衡量自称是使徒的著作的真

实性或价值的标准。对灵感学说的讨论很少。这不是与天主教徒争论的焦点之一。路德认为，圣经中存在着历史性的差异。甚至加尔文也说，在一些小问题上的明显不协调是没有意义的。阿米念派和索西尼派对灵感的性质和程度提出了比当时更宽松的观点。制定〝赫尔维蒂卡共识信条〝的瑞士神学家则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他们声称希伯来语文本的元音点有灵感，至少就其潜力而言。他们是杰出的语法学家布克托夫所灌输的语言学方法的拥护者。在英国神学家中，巴克斯特与传统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他把圣经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其中的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具有更高的价值和尊严。他指责那些把基督教的兴衰建立在〝历史、家谱、数字或文字的每一项〝真理上的人。〝他宣称，〝意义是圣经的灵魂，而字母只是身体或载体〞。随着与罗马天主教徒的较量，新教徒们普遍倾向于将自己建立在对圣典的固定看法上，以及对圣经的无误性的理论上。在这个问题上，十七世纪神学家的语气与路德及其同时代人的语气有很大不同。

作为解释的一个指南，新教徒们采用了〝信仰的类比〞。也就是说，假设圣经中的在教义上是一致的，他们把〝注释〝作为一项规则。根据其他明确的经文的含义来解释一段有疑问的经文。寓言式的注释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盛行。其趋势是，只要有可能，就在旧约中找到对弥赛亚的预言。

改革者们教导说，虽然自然的理解力有能力判断启示的外部证据--例如，从经文中发现论证的力量，然而，为了对经文内容进行精神上的辨别，为了对其中所展示的福音的真实性有一个内在的、活生生的感知和确信，圣灵的见证是必要的，它直接传到人的心里。路德以严厉而夸张的措辞抨击了理性在神圣真理领域的判断力；但他的抨击实际上是针对被罪蒙蔽和被无端的偏见所左右的理性。然而，可能是对奥卡姆关于信仰和科学的矛盾的教导的回忆，可能有其影响。索西尼派不承认道德邪恶的这种盲目影响，他们在宗教调查中放大了理性的能力。他们不仅坚持认为任何违背理性的东西都不能被接受；

他们还很容易把在他们看来不符合理性的经文教义，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归于错误的解释。

包括梅兰和加尔文在内的宗教改革家们认为，对上帝的一些模糊认识和对上帝负责的潜在信念是新教的本源。

笛卡尔（Des Cartes）在哲学家中，重新尝试证明神性的存在。他说，我们对一个无限和完美的存在有一种先天的想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存在，这个想法就是虚假的和虚妄的。笛卡尔还有一个先验的论证。我们有一个关于全然完美的存在的观念，其中包括必然存在的因素，就像三角形中的三个角与两个直角的平等性必然包含在其观念中一样。哲学家们在这些论点的有效性问题上仍有分歧。

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认为亚当身上的神性形象包括他的完美，自然的和道德的，统统都有。

阿米念派和索西尼派则不同，他们认为他（亚当）最初的完美并不包括性格，那是他自己导致的。根据旧的新教神学，堕落的后果不仅包括丧失恩典，以及由此产生的 "自然的创伤"，而且还包括人的本性的完全堕落或腐败。亚当的后裔生来就是有罪的，并被认为是第一次犯错。从这一教义中，不仅索西尼派，而且阿米尼亚派也有异议。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倾向，他们否认在正确的意义上是有罪的。阿米尼亚派教导说，作为堕落的结果，人生来就处于盲目和软弱的状态，如果没有恩典，他们就不能做任何公义的事，也不能为上帝所接受。人的罪性是这种先天残疾的后果，而恩典是其补救措施。一般来说，在十七世纪的加尔文主义者中，亚当的罪归于人被认为是原罪的第一要素；但Placeus，跟随加尔文本人，认为先天的堕落是排在第一位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归罪是中间的。但所有的人都在奥古斯丁式的现实概念

中团结起来，认为人类参与了亚当的堕落。“慈运理并不承认我们的本土腐败”是个谎言。

艾萨克-巴罗，除了是一位布道者，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赢得了最好的文学评论家的最高赞誉，他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数学家。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老师。爱德华-斯蒂林，伍斯特主教，在与洛克的争论中显示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敏锐性，并在关于基督教证据、赎罪和三位一体的书籍中显示了他作为神学家的技巧。在他的主教制度理论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教会人士。夏洛克将作为一神论（即否定三位一体）的反对者和三位一体学说的作者受到我们的关注。沃特兰是仅次于布尔的这一信仰条款的捍卫者。约翰-皮尔逊，切斯特主教出版了《使徒信经的解释》，该书作为英国教会的神学手册，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实至名归。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三位一体的讨论很有学问，很有启发。主教伯内特因其〞宗教改革史〞（1643-1715）而闻名。

十七世纪初，在德国的两个学派之间爆发了关于〞神性〞的争论。图宾根博士认为，耶稣在肉体中时，只在管理世界方面放弃了对神性属性的使用。吉森博士则把这种放弃扩大到他的整个活动领域。

安塞尔思想是旧新教对赎罪的表述的根源。路德强调耶稣战胜了撒旦、罪恶和死亡。他提出了深刻而有趣的观点，类似于更深层的神秘主义者的想法，关于耶稣与我们在爱中的认同，他〞在上帝他的父亲面前贬低自己，就像他自己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罪行，就像他应得了我们所应得的一切。〞人们普遍认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全部惩罚。然而，阿米尼亚派同意〞接受〞的观点，即司各脱的理论，教导说，基督的死亡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全部价值，但由于上帝的怜悯，被当作一种等价物，或被接受为赎金。加尔文主义的学说是，虽然耶稣的死足以拯救所有人，但它只为选民的利益而设。神学区分

了救世主的主动和被动的顺从；最后一种顺从是为积极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做平衡，第一种顺从是为消极的不履行义务做平衡。

索西努斯（Socinus）对安瑟尔的观点，或对赎罪的普遍司法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说，罪和惩罚都是个人的，都不能转移。他还否认，如果惩罚的债务得到了偿还，那么在宽恕中就不会有任何恩典，或者在要求罪人做更多的事情--例如，忏悔和信仰--中会有任何正义。

著名的阿米念派法学家格劳秀斯（Grotius）上场反对索西诺。他修改了已接受的理论，引入了政府的观点。索西努斯的推理假设，违法者的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格劳秀斯否定了这一点。他的关系是臣民与统治者的关系。现在，统治者有权减免惩罚，只要惩罚的目的得到保证。这个目的就是维护秩序和防止未来的违法行为。基督的死保证了这一结果，因为它是 "刑罚的榜样；"也就是说，它表明了罪的后果。确切地说，它显示了罪的后果，以及如果真的实施了惩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体现了制定法律者对罪的憎恨。它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惩罚，上帝可以决定什么是进一步的惩罚。赦免的条件是适当的和必要的。格劳秀斯的观点基本上是 "接受 "理论。它与安瑟尔学说的基础不同，安瑟尔学说认为完全执行刑罚是神圣的正义不可抗拒的要求，或者说，在犯法者本人或替代者完全客观地承担刑罚之前，上帝放过他是不公正的。

新教徒争辩说，公义是法学的。它是对罪人的无罪释放，并通过随后的接受采纳，以基督的功绩为基础。对于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成义 "的意思是使其成为正义。第一个要素是公义原则的注入。赦免随之而来，作为一个附属品。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肯定了基督的公义归于信徒，但天主教派和阿明教派都不承认这一点。后者教导说，信仰是通过上帝的恩典行为被算作义的。新教徒认为，成义只靠信仰，而信仰本身就能产生善行。此外，他们一般认为，

信仰称义，不是因为其中有任何道德上的优点，而是作为一种工具将罪人与基督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阿民念派和索西尼派有分歧。他们认为信仰在上帝面前有内在的价值，上帝接受它作为不完美的公义程度，由于基督的缘故，它被计算为完美。罗马天主教徒在信仰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的心态，如忏悔、改革的目的等等，作为救赎的条件。在他们那里，信仰与慈善或爱混合在一起，使人称义。对他们来说，信仰是历史的和教义的。因此，爱必须是额外的。由于在天主教神学中，洗礼能洗净灵魂的罪孽，所以称义是通过洗礼而不是通过信仰。对于洗礼后犯下的所有罪行，犯罪者必须自己做出补偿，否则基督的功劳对他毫无用处。

在宗教改革的早期，新教徒们认为无偿救赎的教义是一个宝贵的收获，因为它使信徒的心得到了安宁。由于他只需接受一份礼物，他就能从对自己的宽恕的怀疑中解脱出来，并摆脱随之而来的自我折磨。

中世纪的人类功绩救赎学说造成了这种折磨。改革者们起初倾向于把保证作为拯救信仰的一个基本要素。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尔文明确表示，信徒的安慰可能会被因胆怯和自我批评而产生的疑虑所干扰，因此，他的信仰有时甚至会被恐惧的乌云所遮蔽。威斯敏斯特信条明确指出，保证不是〝拯救信仰的本质〞。

加尔文主义者在关于坚忍的教义中与奥古斯丁有一点不同。他们认为，真正皈依的人没有一个会堕落和失去救赎。路德派追随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并非所有重生的人都是被选中的。阿米尼亚派和索西尼派对信徒的统一持久性的教条提出质疑。新教徒拒绝接受天主教徒对福音戒律和劝诫的区分，并拒绝接受附在禁欲、顺从和贫穷等修道美德上的卓越功绩。他们还否认誓言是崇拜体系的一部分，并教导说，个人所发的每一个誓言都必须与他有能力履行的事情有关，而且必须是自由和故意的。在新教体系中，除了与行使福音

信仰不相容的习惯和罪行外，没有任何致命的罪过。

改革者们否认教会应与教皇为首的可见团体相联系。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话语（圣经）得到传扬。新教的教义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可见教会的成员如果不是真正的虔诚，就应该与信徒区分开来，而信徒就是无形的教会。这种区别首先是由加尔文派明确提出的。罗马教会的格言，即〝在教会之外没有救赎〞，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新教徒所采纳，他们普遍认为，救赎的手段被限制在基督教教义和机构的范围内。新教徒拒绝将神职人员视为神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与教友分开，而只是将其视为负有某些官方职能。教会有权召集其牧师并任命他们，这与神职人员是在一个可见的头目，即罗马教皇的监督下任命自己的成员的说法相反。新教的纪律和开除教籍的观念与这种教会概念相一致。

在英国圣公会中，对教职的修正观点的兴起和传播已经得到了解释。新教徒自然要废除独身主义的规则，这种（独身主义）规则在罗马教会中继续盛行，在希腊教会中也是如此。

宗教改革后，贝拉明和其他天主教神学家倾向于更多地讨论某些心理状态的优势甚至必要性，以使圣物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忏悔和其他情感，除了免于弥天大罪之外，据说也是必要的。然而，圣礼被宣布为本身是有效的--从本质上说是有效的。这一点新教徒并不承认。他们把它们看作是与之相关的恩典的标志；但就成年人而言，他们主张，按照他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信仰必须存在于接受者的心中，这样才能得到任何好处。同样，他们将圣礼的数量限制在两个，即洗礼和主的圣餐。阿米尼亚派不愿意把它们看作是恩典的载体，或者看作是象征性的东西。改革者们以他们对圣礼的看法，起初并没有发现对婴儿的洗礼进行定义和辩护是非常容易的。人们同意，洗礼将他们纳入教会，使他们成为教会特权的一部分。旧约下割礼的类比被提出来，

洗礼被宣布为新约下的替代品。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在这一点上非常强调。慈运理将婴儿洗礼解释为父母将孩子献给上帝。但他也呼吁用割礼来作类比。加尔文断言，选民婴儿的洗礼是他们重生的象征。他说，上帝对他所收养的人有其不同程度的重生果效。英国圣公会的礼仪教导说，婴儿的洗礼是″一种神秘的洗罪″。祈祷的内容是祈祷水被圣化以达到这一结果。该教会的神学家与大多数新教领袖一样，认为通过这一仪式，世袭的罪孽污点被消除。但人们常常解释说，婴儿的重生需要在他通过自愿行使信仰和悔改而皈依之后。在洗礼中播下的种子可能会落入贫瘠的土壤。《奥格斯堡忏悔录》允许洗礼对于救赎的必要性，就像天主教徒所认为的那样；但后来这种观点被大多数新教徒所摒弃。《苏格兰忏悔录》中强调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谴责蔑视，而不是剥夺圣礼，认为这对灵魂有危险。通过宣称恩典是不与圣礼挂钩的，加尔文主义者使之有可能认为婴儿，甚至是异教徒的幼年后代都可以得到拯救。这种仁慈的观点实际上得到了慈运理和布林格的赞同。但大多数加尔文主义者除了相信″选民婴儿″的救赎外，没有走得更远。他们甚至不确认所有在婴儿期受洗的人都属于这类人，也不对那些因疏忽而没有带他们去洗礼的基督徒父母的孩子作出任何承诺。胡克教导说，即使是基督徒父母未受洗的后代在婴儿期死亡，也有很大的可能得到救赎。但他没有对异教徒的后代说过这样的话，不管他在这一点上有什么看法。

新教徒对主的圣餐所采取的主要观点已经说过了。他们都摒弃了变质和献祭的教义。基督的身体和血与面包和酒的共同存在，以及信徒和非信徒对基督的实际接受，仍然是路德派的宗旨。在改革派方面，加尔文关于仅由信徒在精神上接受基督的观点战胜了慈运理派的意见，并被普遍采纳。它在英国教会的章程中被明确指出。在这一时期的希腊教会的信条中，首次明确宣称了变体。

在新教的信条中，民事裁判权是一个突出的话题。民事权力机构有权利和义

务维护教会，为公共教义作出规定。

教会，为福音的公开教学提供条件、并镇压危险的错误和派别，是新教徒的共同教义。在新教盛行的地方，政府承担了对教会事务的管理。对教会内部行使国家控制权的抵制通常来自加尔文派。但加尔文主义规定国家有义务站在教会一边，并在执行教会的纪律方面进行合作。独立派，特别是浸礼会，提出了将政治行动限制在较窄范围内的理论。

在遵守主日方面，改革者，包括诺克斯以及路德和加尔文，拒绝将新约的制度与旧约的制度相提并论。一般来说，他们把第四条诫命作为在福音下授予基督徒的全部休息和平安的典型。这就是加尔文的解释。多特会议将这一诫命的道德部分归于有效，从中推断出遵守 ″指定用于敬拜的特定日期 ″的义务。胡克灌输了同样的观点；在他的时代之后，乌舍尔、皮尔逊和其他著名的英国圣公会神学家也是如此。清教徒的学说认为，遵守第四条诫命是一项道德禁令，因此是针对全人类的，据说是在1595年首次明确阐述的，在一份出版物中被Whitgift压制了。但早在1562年，苏格兰的一个大会就提到，违反安息日是对神圣法律的违反，国家应该予以惩罚。第四条诫命的永久义务被纳入《威斯敏斯特忏悔录》。这一观点在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中被普遍采纳。在欧洲大陆，改革者的观点和实践继续占上风。

新教徒拒绝接受炼狱学说。在他们的主要圣经版本中，他们将《旧约》中的 ″Sheol ″和《新约》中的 ″Hades ″用 ″地狱 ″一词来表示。

威斯敏斯特信条断言，天堂和地狱是唯一的 ″灵魂与身体分离的两个地方″。

然而，英国神学家提出了中间状态，不涉及任何悔改的机会，其中包括伯内特和皮尔逊。后来，某些德国神学家宣布了同样的信条，苏格兰神学家乔治-

坎贝尔博士在他的《福音书论文集》中为其辩护。新教信条中普遍肯定了最终审判和奖惩的永恒性。像洛克这样的人宣布了无望的恶人被消灭的教义。索西尼派说，这就是〝第二次死亡〞的含义。

==========

第十一章

基督教传教士

在宗教改革开始的一百多年前，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暂停。福音的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尽管除拉普兰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在名义上都是基督徒，但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北非，这些基督教最早的家园，早已被伊斯兰教束缚住了。在这些地区曾经繁荣的许多信徒群体中，只有少数薄弱的教会或异端教派幸存下来。其中最突出的是亚美尼亚人、景教人和科普特人。穆罕默德教派从亚洲向东南欧推进，并威胁要进一步缩小基督教的范围。但教皇和王公们都太过专注于世俗野心的计划，以至于无法认真寻求福音对其敌人的胜利。然而，在西班牙半岛，在与穆斯林不断斗争的地方，一些古老的传教士的热情在人们心中燃烧。

十五世纪的伟大海洋发现主要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持下完成的，这两个国家掌握着海洋的统治权。作为他们探险的动机，他们将好奇心、冒险精神和贪婪之心混在一起，希望在未知地区传播天主教信仰。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到达马拉巴尔海岸。这一伟大的成就为葡萄牙的殖民化，以及在印度和东方岛屿种植十字架开辟了道路。探险家们的贪婪和残忍使方济各会的工作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而欧洲殖民者本身存在的宗教，在半

个世纪的时间里，变成了一种无生命的形式，对最坏的那类行为没有任何制约作用。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为了在这些地区传播罗马天主教信仰，人们进行了一项新的事业。

哥伦布在踏上航程的时候就充满了宗教感情，这使他来到了西印度群岛，而不是他所寻找的东方印度。在西班牙航海家和征服者夺取的土地上的早期传教士中，多米尼克教团的传教士是最有效的。如果说在旧大陆，多米尼克人挥舞着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工具，那么在新大陆，他们则被更多的人道情怀所驱使。在他们当中，以及在当时所有的传教士当中，最杰出的，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巴塞洛缪-德-拉斯卡萨斯，他是塞维利亚人，1474年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陪同哥伦布进行了第一次发现之旅，但他的儿子在1502年第一次随奥万多来到伊斯帕尼奥拉。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牧师，是第一个在美洲接受牧师任命的人。他的职业生涯是漫长而多事的，其特点是最艰苦和最顽强的努力，把土著人从压迫性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他们被西班牙人设立的分封制度所压迫，这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他们不习惯艰苦的劳动，在野蛮的主人手下被迫在矿山和珍珠渔场工作，他们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拉斯-卡萨斯得到了伟大的红衣主教西门尼斯的合作，他在费迪南死后担任摄政王；但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不得不与那些因共同的贪婪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对手抗争，即使他们不能直接推翻他的计划，也经常能够阻挠。他并不总是谨慎的，在调整两个种族的关系时，他也许对那些无法克服的困难考虑得太少。但他的目标的高尚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十二次漂洋过海；他走遍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美洲地区和岛屿；他从西班牙到佛兰德斯和德国反复旅行，就他的使命事务会见皇帝；他的文学创作即使对一个在学院大厅或安静的环境之外没有任何使命的学者来说也是了不起的。拉斯-卡萨斯的声誉上有一个污点。他不是发起人，但他批准了用从奴隶制进口的黑人来代替西印

度群岛的土著人的计划，而这些土著人正被打成奴隶。因此，他帮助推进了非洲奴隶贸易和将黑人奴隶制引入美国。他的理由是希望免除皈依者，以及非洲人可以在那种气候下劳作而不会对健康和生命造成同样的危险。但在他晚年写的《印度史》中，他对自己的错误表示遗憾。他说，如果他 ″理解了事情的性质″，他 ″就不会为自己的一切提供这个建议。因为他一直认为，他们是被不公正地、暴虐地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们和印第安人的理由是一样的″。在发现美洲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在非洲海岸进行奴隶贸易。1495年和1498年，哥伦布从西印度群岛将一批批奴隶运回国。是伊莎贝拉禁止了这种做法，并命令将所有被不公正抓获的奴隶送回伊斯帕尼奥拉。但她的法令允许在正义的战争中被俘的印第安人被奴役，从而为地方当局滥用这一特权而可能选择抓捕的人数打开了大门。

在宗教改革的第一个时代，传教士的热情主要局限于罗马天主教徒。新教教会正在处于自我组织的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可以补充说，有一些改革者，其中包括路德本人，他们期待着主的第二次降临很快就会发生。敌基督的力量已经达到了高潮。那些要接受救赎信息的国家已经聚集到教会中。现在，在纯洁的福音被传开之后，末日就要来临了。因此，异教徒的皈依在这位宗教改革的伟大领袖的思想中没有占据任何位置。在这方面，他远远落后于伊拉斯谟，后者以真正的福音精神雄辩地敦促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甚至向其最不妥协的敌人--穆罕默德人派遣传教士。一个多世纪以来，路德的追随者们对传教士抱有同样的偏见。1664年，冯-韦尔茨男爵向 ″所有信奉奥格斯堡告白的正确基督徒发出呼吁，内容涉及新教徒与传教士的关系”。他的计划被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指责为 ″梦想″，而将 ″上帝的圣物 ″扔在异教徒这样的 ″狗和猪 ″面前的想法则遭到了愤慨的嘲讽。对传教工作缺乏同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人没有参与这个时代的海洋事业，因此没有与新发现的东方和西方民族接触。其他新教国家--英国人在他们的美洲殖民地，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尝

试，使本地部落基督教化。然而，他们的工作直到17世纪才开始。在新教兴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天主教国家的海上优势并没有被颠覆。就这样，罗马教会获得了最早的传教事业机会。

随着反宗教改革的进行，在欧洲出现了改造叛教者和赢回失地的热情，同时也出现了对传教的强烈渴望，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传播教会的教义。在这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的各个部门中，耶稣会士是最热心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是弗朗西斯-泽维尔，他把基督教带到了印度和遥远的东方，他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被尊为另一个使徒保罗。他是依纳爵的室友，也是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在威尼斯的医院里，他通过强迫自己为病人和伤员提供不必要的、令人作呕的服务，来克服他对接触令人厌恶的疾病的本能厌恶。为了顺应葡萄牙国王的要求,即伊格内修为他提供葡萄牙在东方的定居点的传教士，被教皇任命为印度使徒传教士的泽维尔从里斯本出发，在接触了莫桑比克、梅林达和索科特拉之后，于1542年5月6日在果阿登陆。在航行过程中，他致力于照顾生病的水手们。无论他在哪里布道，在他所停留的地方，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泽维尔是个禁欲主义者，他对任何苦行都毫不畏惧，反而对自我折磨的机会感到高兴。他愿意代为忏悔，以最严厉的方式鞭笞自己，以打动他想感动的人。他意志坚定，不为反对意见所动摇，天性善良。他的宗教感情并不缺乏某种升华，从他的赞美诗可以看出，开头是
"耶稣！我爱你！我爱你，
不是因为我希望由此得到天堂"。

在果阿，他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传教工作，他在该地区名义上的基督教定居点和当地人中实施了这项工作。他在半岛最南端的低种姓民族帕拉瓦人中赢得了众多的皈依者。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到马六甲、摩鹿加群岛和东部群岛的其他岛屿。他的方法，如在特拉万科推行的，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当我到达任何一个异教徒村庄时，他们派我去施洗，我就下令把所有的人--男人、女

人和孩子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从基督教信仰的第一要素开始，我教他们有一个上帝，我让他们每人做三次十字架的手势；然后，穿上法衣，我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声背诵一般忏悔的形式、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圣母经。两年前，我把所有这些祈祷文翻译成该国的语言，并把它们背下来。我背诵它们，使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和条件，都跟着我背诵。然后我开始用该国的语言解释信条和十条戒律的条款。当人们在我面前出现，被充分指示接受洗礼时，我命令他们都公开请求上帝赦免他们过去生活中的罪过，并在他们仍然敌视基督教的邻居面前大声地做这件事，以触动异教徒的心，确认善良的信仰。所有的异教徒都对神的律法的神圣性充满了敬佩，并对自己长期生活在对真神的无知中表示出最大的羞愧。他们愿意听取基督教的奥秘和规则，并以最大的尊重对待我这个可怜的罪人。然而，许多人以坚硬的心肠将他们所熟知的真理抛弃了。当我完成了我的指导，我一个接一个地问所有希望接受洗礼的人，他们是否毫不犹豫地相信信仰的每一条。所有的人都立即举起他们的手臂，以十字架的形式，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们完全相信。最后，我以适当的形式为他们施洗，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票上给每个人。这些新基督徒回到他们的家里，把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带到我这里来接受洗礼。当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洗礼后，我命令摧毁他们所有的假神庙宇，并将所有的偶像打成碎片。我无法让你知道我看到这件事时的喜悦，见证那些最近还崇拜偶像的人对偶像的破坏。在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里，我把基督教的教义留给他们。我把基督教教义用当地的语言写下来，同时规定了早晚课的教学方式。当我在一个地方做完这一切后，我就去另一个地方，这样依次到其他地方。我以这种方式走遍全国，把当地人带入耶稣基督的怀抱，我为此感到的喜悦远非一封信，甚至口口相传所能表达。″

1549年，在巨大的困难和危险中，他来到了日本。他通过调解获得了佛教宗教指导者的善意，他们中的少数人被征服了。三位有权势的贵族接受了基督教。关于日本人，他写道：″他们通常因无知而犯罪″。″为改变一个如此理性、

如此渴望了解真理和得到拯救的民族而付出的努力，给灵魂带来了非常甜美的果实"。他对新教徒为改变他人信仰的热忱特别高兴。他偶尔被允许通过翻译向广大的集会者传教。泽维尔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就在他即将进入该国时，他的生命结束了。他于1552年12月2日在圣陈岛去世。在他大约三周前（11月13日）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自信的希望，即他将"最后踏上中国的土地"。关于他认为撒旦对这一神圣目标的抵抗，他的论述让人想起路德在谈到恶者对上帝子民的计划发动的战争时所说的话："魔鬼对耶稣会进入中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在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次努力似乎都在伤害他的眼睛；这使他无力地愤怒，激情沸腾。我最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的呼声已经在地狱的阵营中响起，黑暗的灵魂，都在惊愕中，对我们列队，好像要保卫他们最后的战壕。"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传教士使更多的人自称皈依了基督教信仰。关于众多的神迹，其中一些具有令人震惊的性质--他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出于谦虚的动机--他对这些事保持沉默。1619年，他被宣布为受祝福者之一，1622年被封为圣徒。

在印度，耶稣会士罗伯特-诺比利（Robert Nobili）于1606年开始接触婆罗门种姓，他自称属于婆罗门种姓，甚至不与基督教徒交往。皈依者一般都是最低种姓的人。他也通过这种顺从的方式成功地赢得了较高阶层的改信者，但他的政策的结果是遭到了其他教派和教会当局的强烈反对。这最终导致了耶稣会传教团的解体。

在中国，1582年，利玛窦（Matthew Ricci）也采取了类似的包容政策。利玛窦是同一教团的成员，他以官吏的身份，通过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政府的重要服务，为罗马天主教系统在该帝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异教徒习俗的迁就使耶稣会士在中国陷入了与他们在印度的兄弟一样的困境。在日本，由于泽维尔对语言的无知，他的皈依者并不是很多。但后来的耶稣会教父们却在他播种的地方收获了。他们赢得了众多的信徒。神道，

日本的本土宗教，在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苦难中，没有提供任何安慰。佛教，以其炫耀性和华丽的仪式，只不过是一种毫无生气的传统。它华丽的服装和仪式，以及它的等级组织，即使不是被现在与它竞争的罗马天主教体系的相应特征所掩盖，也是可以与之匹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环境对耶稣会传教士有利。他们的事业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据说在本世纪末，日本的基督徒人数不少于60万。但致命的灾难笼罩着这个新成立的教会。基督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强大的将军信长的支持，他在与佛教首领的较量中雇用了基督教皈依者。在两位指挥官秀吉和伊耶雅斯的帮助下，他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天皇的管辖之下。

但在后来，伊耶雅斯对基督教徒产生了敌意，因为他们敢于武装抵抗大名，即他们的封建上级，佛教的捍卫者。他怀疑基督教农民是被外国人唆使来抵制领主的。1606年，从江户颁布了一项反对基督教崇拜的法令。1611年，Iyéyasŭ获得了证据，他认为是本地皈依者和外国人合谋推翻了日本的独立。这些外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从事奴隶贸易，并将他们为此而购买的数千名日本人出口到澳门和菲律宾群岛。作为新教徒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随时准备相互指责；进入该国的敌对教会的传教士与耶稣会士发生争执。当地政府颁布了反对基督教的新法令。支持耶稣会的酋长们被打败了。这导致在1615年发生了对本地皈依者的大规模屠杀。1624年，除荷兰人和中国人外，所有外国人都被驱逐出该国。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迫害，在这些迫害中，日本基督徒表现出了毫不动摇的毅力。最后，在1637年，基督徒起义，但被幕府将军的军队打败了。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其结果是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彻底灭绝。但是，1860年来到长崎的法国传教士发现，该地区有不少于一万名基督徒，他们是那些在17世纪血腥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人的后代。耶稣会士和罗马教会的其他传教士在日本种植的基督教，没有在日本人的道德和精神品格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墨西哥的征服者科特兹（Cortez）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骑兵一样，热衷于使他所侵略的异教徒成为改宗者的愿望。实现这一结果的手段是传教，与武力相结合。两位教士随同他出征，其中一位叫巴托洛梅-德-奥尔梅多（Bartolomé de Olmedo），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他尽其所能抑制了征服者的凶残行为。在这个国家被征服后，科特兹促成了12名方济各会士的派遣，他们于1524年到达墨西哥。他急切地要求他们应该是生活虔诚的人，他们的榜样会加强他们的戒律，而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落空。他们热心地从事他们的工作。在20年内，墨西哥部落被说服或胁迫遵从其主人的宗教。"阿兹特克人的崇拜因其繁琐的仪式而引人注目，并为其选民准备了罗马仪式的华丽和辉煌。从一种宗教的斋戒和节日转移到另一种宗教的斋戒和节日并不困难；将他们的敬意从自己创造的梦幻般的偶像转移到装饰基督教大教堂的美丽的雕塑和绘画形式上。皈依的墨西哥人对基督教的教义知之甚少，他们可能很少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但用罗马教会的 "纯洁的仪式 "取代 "阿兹特克人的野蛮的憎恶"，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方济各会还试图在巴拉圭建立传教会，那里在1536年后一直被西班牙人占有。但是他们的工作被巴拉圭人的劳动所掩盖了。耶稣会士在居住在巴拉那河两岸的印第安人中工作。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授权该会成员在那里建立一个民间团体，该团体独立于殖民地总督，所有西班牙人都可以被排除在外。每个新定居点的精神和世俗命运都掌握在父亲手中，他是该定居点的首席行政官，除了传教士的上级外，他不服从任何其他人。他指导新教徒的劳动，并根据他们的需要，将他们辛勤劳动所得的产品分配到共同的仓库里。他们不拥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是在上天派来的向导的统治下，处于一种共产主义的状态--在这期间，他们的灵魂为永恒的幸福做准备。仇恨使欧洲罗耀拉的追随者身败名裂，同样也结束了这个耶稣会的乌托邦。

十六世纪上半叶，多米尼克人、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才开始在生活在加拿

大南部和现在美国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中工作。卡地亚和尚普兰沿圣劳伦斯河的探索为在那里开展类似的工作开辟了道路。魁北克在1615年（成立七年后）和蒙特利尔在1641年（定居当年）成为传教士中心。东北部各州和加拿大所覆盖的地区当时居住着两个伟大的印第安人家族，即阿尔冈昆人和易洛魁人。与此相关的是在起源和语言上与后者相关的是休伦族，他们居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湖泊附近。试图改变这些部落的信仰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他们正在进行激烈的相互残杀的战争。休伦人和易洛魁人是竞争对手和劲敌，他们在能力和智慧以及物质文明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印第安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珍视的习俗，与基督教最基本的原则相悖。此外，他们充分享受着野蛮人的繁荣，对宗教的慰藉毫不关心，而且讨厌宗教的束缚。耶稣会士们在他们中间，特别是在休伦人中间的工作，具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耐心，面对无数的困难和危险，毫不畏惧地坚持下去，平静地接受印第安人的凶残常常带给他们的可怕命运。在加拿大，他们接手了1629年英国人攻占魁北克后迫使方济各会放弃的工作。但是，尽管他们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的努力却没有产生什么永久的结果。他们在塔杜萨克（Tadousac）为居住在萨格奈河畔的阿尔冈昆人开始的繁荣的传教活动被瘟疫和易洛魁人的武器所摧毁。在圣劳伦斯河上游的其他阿尔冈昆人定居点也同样遭遇了灾难性的结局。

在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634年由布雷伯夫在休伦族中建立的。他和他的教友们在这里耐心地工作，但除了在孩子们中间没有什么成就，他们聚集在小教堂里学习教会的诫命和祈祷。不久，随着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国家的进展，可怕的瘟疫随处可见，这使休伦人的骄傲变得卑微，并使他们对牧师的信息保持关注。但这种谦卑的态度持续的时间很短。在巫师的煽动下，他们指控耶稣会士施展巫术，并决定杀死他们。传教士们的无畏态度使他们的敌人失去了信心。虽然神父们经常被赶出病人的小屋，并在街上被人叫喊，但他们的生命不再有危险了。渐渐地，他们获得了一些皈依者。

1640年，休伦族的基督徒有100人。随着部落遭受的苦难--战争、饥荒和瘟疫--的增加，他们更乐于向耶稣会士寻求指导和教导。但这个民族和阿尔冈昆人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1648年，一群易洛魁人摧毁了圣约瑟夫，并杀死了丹尼尔神父，他是布雷伯夫在休伦教区的第一批助手之一。随后在这一年里，许多其他城镇要么被同一无情的敌人烧毁，要么被其居民抛弃。在圣路易斯，布雷伯夫和拉莱曼特被俘，在遭受了最可怕的折磨后被处死。休伦教团就这样灭亡了。1649年12月，烟草民族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加尼埃神父，一个出身高贵、天性敏感的人，在努力把自己拖到一个垂死的印第安人身边，以便对他进行天主教信仰的最后安慰时，被战斧砍伤。几年后、易洛魁人在不断的战争中疲惫不堪，与法国人达成和平，并要求传教士。耶稣会士们毫不犹豫地前往这个国家，他们的几个兄弟曾死在这个国家的手中。在他们发现散落在征服者的部落中的休伦人中，他们形成了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核心。但这些传教努力在被新的战争反复打断后，于1687年停止了。在此期间，该教团的其他成员已向西推进，追随休伦人撤退的脚步，或寻求将福音传给生活在密歇根湖沿岸的部落。1673年，马奎特神父陪同约利埃沿密西西比河航行。这次令人难忘的旅行的结果之一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印第安人中建立了一个传教所。因此，耶稣会士们继续努力。他们从来没有远离那些在这个时候热衷于探索美洲荒野的大胆的人。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埋下了十字架，并试图向当地人传授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知识。他们的工作由于下个世纪法国对他们的教团的镇压而告一段落。

==========

第十二章

新教在美洲的定居点和社区

西班牙人占领了美洲的南部海岸。法国人的定居点在北方。大西洋中部海岸的气候温和健康，留给新教国家，特别是英国，进行殖民。

新英格兰的创始人是清教徒，但清教徒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成为共同的移民。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过来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是独立派。他们属于从英国圣公会中分离出来的人，他们放弃了英国的建制，并完全放弃了国家教会的理论。另一方面，马萨诸塞湾和康涅狄格的定居者是清教徒，他们在祖国不是为了废除，而是为了改革国家教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也就是与欧洲大陆上一般的加尔文教徒的想法一致。在他们迁徙之前，尽管他们反对英国圣公会政体和仪式的某些特点，但他们从未放弃与法律规定的圣公会的联系。

也许早在1567年，就有迹象表明伦敦有一个由虔诚的人组成的小型聚会或社团，对他们来说，不仅教权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整个既定或国家教会体系也是如此。拥护这一信条的人被称为 "独立派"，他们在诺里奇教区引起了敌对的注意。1583年，之前被关在监狱里的两名神职人员萨克尔和科普平被以叛乱的罪名处死；他们的罪行是暗示否认女王的至高地位。在此之前，另一位神职人员、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是女王的大公爵的亲戚。他在诺里奇至少被关过一次后，于1582年逃到了荷兰的米德尔堡，在那里他聚集了一批和他一样的独立派教徒，并发表文章支持 "不加拖延地进行改革"。布朗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人。1591年回到英国后，他通过服从法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并接受了教会的资助。他成为一个教区的牧师，过着无所事事、挥霍无度的生活，但在他去世时，也就是1630年，他还是一个受资助的神职人员。“布朗派 "这个名字长期以来被他们的敌人附在独立派身上，因为他在独立派中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突出地位。精神完全不同的是巴罗威和公理会的殉道者亨利-巴罗威和约翰-格林伍德。他们在1593年被处决。两人都是剑桥大学

的毕业生。巴罗威属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学习法律，"在他的时代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朝臣；"但是，在皈依后，他的行为的清醒和宗教的认真让他的朋友们吃惊。在兰贝斯，他在惠特吉夫特和高级委员会法庭的其他成员面前接受审问时，否认国家形式的英国教会是真正的基督教会。他否认女王可以为教会制定任何不是由基督首先制定的法律。他宣称，每个特定的教会都应该管理自己，并有自己的长老团。他宣布教会中祈祷形式的构成是错误的，并超越了普通的清教徒，反对每一个 "预言性的礼仪"，认为这是 "教导上帝的精神并剥夺他的职务"。巴罗威对待他被提审的教友是文明的；但对于教士，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显然，他对他们的看法就像诺克斯和路德对牧师或教皇审讯员的看法一样。他当面告诉大主教，他 "没有真正的学问和虔诚"。在他身上，就像其他早期独立派的拥护者一样，炽热的热情产生了谩骂性的言论风格，以及在意见领域的异想天开，这些都在时间的进程中和更明智的领导人的指导下逐渐消失。

约翰-佩里是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人、他也在剑桥大学取得了学位，并在自己的国家和苏格兰传教，偶尔也向伦敦的独立派传教。他于1593年被绞死，因为他是一个煽动性的扰乱者，是巴罗威和格林伍德的同情者。他曾恳切地抱怨不传教的在职者不是真正的牧师。这被认为是他的主要罪行之一。他被错误地指控参与了马普雷勒教派小册子的出版。佩里在脚手架上丧生时已是34岁。他真正的基督徒脾气，以及他的死亡对一个年轻妻子和一群孩子造成的残酷打击、使他的命运变得特别悲惨。弗朗西斯-约翰逊、被任命为独立教会的牧师，被投入监狱，在格林伍德死后，被终生驱逐出王国。他是一名牧师，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被赶出英国后，成为阿姆斯特丹一个分离派教会的牧师，博学的亨利-安斯沃斯是该教会的教师。此时，据估计约有两万名斯克罗比独立派教徒散布在英格兰。在诺丁汉郡斯克罗比，这个简陋的教会的成长，注定要为第一批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提供帮助。在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所居住的庄园里，应他的邀请，举行了一些聚会，供这些人做礼

拜。布鲁斯特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曾隶属于女王的外交事务秘书之一戴维森，当时是他居住地的 "职位主管"，即邮政局长。后来，他成为该协会的一名执政长老。成员中有威廉-布拉德福德，他是那些从邻近村庄的奥斯特菲尔德来庄园聚会的人之一。这个独立教会的教师是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剑桥大学的一名文科硕士，他曾是基督教圣体会的研究员。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被认为是独立教会的创始人，因为它是一个成熟和有组织的系统。在法律官员的骚扰下，斯克罗比的教会最后决定集体离家出走，到荷兰去定居。在经历了许多危险和痛苦之后--因为他们登船的尝试被政府的代理人所阻挠--他们于1608年成功抵达阿姆斯特丹。那里的独立人士之间存在分歧，其中许多人比罗宾逊更激进，更没有智慧，这使他和他的一群人在1609年下定决心、决心再做一次改变。他们搬到了莱顿，在那里，布鲁斯特成为一名印刷商和教师；在那里，英国乡下人的会众从事他们从未习惯过的职业，但这使他们获得了来之不易的生计。罗宾逊是一个具有不寻常的智力天赋和罕见的性格美德的人，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是如此受人尊敬，以至于他被大学选中与阿米念主义的能手埃皮斯科皮乌斯进行辩论。他的思想越来越自由化了。在不改变其基本立场的情况下，他放弃了以前与他的弟兄们共同持有的某些观念--例如，罗马天主教徒使用的教堂建筑应该被放弃和拆除。他承认英国的教区教堂是真正的教堂，尽管在纪律方面存在着可悲的缺陷；他不认为偶尔听取他们的牧师的意见是错误的，而且与他的人民一起不拒绝接纳虔诚的荷兰基督徒与他的教会进行交流。他发现并指出了在宗教问题上强迫的无用性，以及宽容的责任和好处。大约十年后，他和他的会众（将保持其作为天路者教会的特征）得出结论，荷兰不是他们应该留在那里并养育他们的孩子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孤立的群体，在他们面前的是解体而不是发展的前景。他们不可能回到英国，否则就会放弃他们的原则，或者被当作反对现有教会和国家秩序的叛徒而被打倒。会议决定，教会的一部分人应该前往美国，开始定居，在那里他们将与罗宾逊和其他教友汇合，一旦可以克服他们迁移途中的困难。根据与某些英国商人达成的安排

（他们期望在这项事业中获得最大的利润份额），天路者在经历了重重危险和延误之后，终于在1620年12月20日在新英格兰海岸的定居点登陆了。

他们在″五月花″号的船舱里制定了一份公民政府契约。他们所占有的国家属于普利茅斯公司的管辖范围，该公司通过皇家授权与弗吉尼亚公司划分了大西洋沿岸和向西直至太平洋的地区。然而，这些土地是由天路者--正如新英格兰清教徒一般--向印第安人购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在荒凉的海岸上建造木屋的这群英勇而有耐心的基督徒所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几乎是无以复加的艰难困苦。没有一个人的心不是石头的，在阅读他们中的一个人--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的简单记录时，会不由得感慨万千。他们只有一百一十人。在春天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雪地里埋葬了这支小队伍中的一半。有一次，只有六、七个人足够强壮，可以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在这一小部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的弟兄们的人中，有担任教师的长老布鲁斯特和他们的军事领袖迈尔斯-斯坦迪什。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展缓慢。它在数量上从未变得强大。但是″老殖民地″，正如它在后来被称为的那样，从物质的角度来看，通过其基督教勇气和卓越的榜样所产生的道德影响，以及通过其在宗教差异方面更大的慈善，弥补了其相对的弱点。

普利茅斯定居点开始后不久，劳德作为查理一世在教会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以及作为对其制度的异议者的警惕和无情的压迫者，开始掌权。这些情况导致了清教徒向马萨诸塞州的大规模移民。1628年，″马萨诸塞湾公司 ″从 ″新英格兰委员会 ″那里购买了梅里马克河和查尔斯河之间的土地。第二年，该公司从查理一世那里获得了特许状。他们派出了由约翰-恩迪科特领导的殖民者队伍，在塞勒姆定居。1630年，该公司采取了大胆的措施，将自己和他们的特许证，以及根据特许证建立的定居点的政府转移到新英格兰。这一年，近一千五百名清教徒移民，分乘十三艘船、与总督约翰-温思罗普一起来到这里，并在查尔斯敦、波士顿和附近的其他地方设立了清教徒大学。马萨诸塞

州的定居者是对英格兰教会不满的成员，他们的〝亲爱的母亲教会〞，正如他们不停地称呼它。陪同他们的牧师，或后来加入他们的殖民地的牧师，如希金森、科顿、胡克，都是被任命的神职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英国国教的既定教会中受到尊敬，并且很出名。然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新英格兰的海岸上，并且不受约束，他们就开始组织一个教会系统，其基本细节与他们在普利茅斯的邻居以及一般的独立人士的系统并无差异。罗宾逊曾告诉天路者：〝当他们离开英国王国来实行教规时，顺从国教的牧师和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区别。地方教会只由那些提供可信的重生证据的人组成。它选出自己的官员--一位灌输教义的教师，一位劝勉和安慰的牧师，以及一位执政的平信徒长老。这些人共同组成了教会的内部长老会，与教会成员的身体有共同的权力；但所有重要的行为都需要大部分教徒的投票，他们通过一个盟约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在塞勒姆，在英格兰教会中受命的牧师们首先被一个在简单盟约基础上形成的教会选举为其牧师，其中一人担任〝牧师〞，另一人担任〝教师〞。牧师的选举之后是任命，因为他们不被视为一种秩序，而只是作为当地教会的官员。他们的职能受到教会的限制，也受到他们担任职务的时期的限制。没有教会的同意和邀请，他们甚至不能在任何其他教会主持工作。此外，礼仪和所有书面的祈祷词都被抛弃了。这是那个变革时代所发生的快速运动的最显著说明之一。波士顿的牧师科顿在1635年写信给他以前在英国的会众，说如果他和他们在一起，就再也不敢〝以书本祈祷为乐〞。英国的一些清教徒牧师写信给新英格兰的牧师，抱怨这些意见和做法的改变。在马萨诸塞湾，以及后来在纽黑文殖民地，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新英格兰的创始人并没有采用现代的普选权学说。卢梭还没有《社会契约》，洛克也还没有写关于公民政府的论文。清教徒移居海外，主要是出于宗教动机。他们希望将政治权力掌握在好人手中。因此，刚才提到的限制在这两个殖民地的民事政体中得到了确立，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神权社区。民事当

局、总督和助理，以及成立的众议院，都由教会成员组成。这部宪法的通过并不是基于一种理论，即政府权力的行使完全属于教会的权利。这种理论被达文波特否定了。请注意，该制度的特殊性并不在于要求将教会成员作为享受政治特权的资格；因为同样的要求在英国也存在。相反，它在于将教会中的教徒人数限制在被认为是重生的人。在康涅狄格州的政体中，即在目前以该州为名的范围内形成的第一个殖民地，选举权并不限于教会成员，但在其宪法中，以公认形式存在的宗教利益受到了严格的保护。一开始，在纽黑文殖民地，摩西的法律 ″既不是预表的，也不是仪式性的、也没有提到迦南，″被暂时作为民法采用，″直到它们被细分为具体内容″。一个结果是避免了英国的遗赠和长子继承法。另一个结果是死罪的数量，当时在英国是31项，根据麦金托什的说法，在1819年达到了二百二十三项，现在一下子减少到12项。在除罗德岛以外的所有殖民地，政府都有权利和义务进行干预，以纠正教会行为和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并镇压异端和分裂行为。清教徒的创始人不是，也从未自诩为普遍宽容的倡导者。他们来到荒野，是因为他们看到英国没有希望使其教会制度符合他们对新教和圣经教义的真正原则的看法，而且他们一心想要建立与这种看法相应的制度。当时，还没有一个政治团体承认宗教自由，清教徒的设计也不包括建立这样的团体。

虽然地方教会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教会机构，但在宗教活动和职能方面的关系，公理会制度被认为是强制性的，并由代表四个邦联殖民地教会的会议制定，该会议在剑桥举行，并于1648年制定了 ″剑桥纲领″。当时的危险来自于在英国及其附属地建立长老会的企图。在新英格兰，有一派人同情这些企图。剑桥会议取代了属于长老会系统的权威性教会大会，这些理事会只有权提供建议，并在极端情况下向各教会建议放弃与任何一个被指控犯有严重错误或行为不端的教会的关系，并避免兄弟间因争吵而不可救药。康涅狄格和纽黑文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在1665年完成了。1708年，联合社区各教会的 ″长老和信使 ″在赛布鲁克举行了一次会议。在那里，一种介于剑桥平台体系和长老

会体系之间的公理会形式被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在政府的主持下，该会议被召集起来。由牧师和代表组成的协会或常设理事会在殖民地划分的每个地区都被建立。但对于这些地方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只是咨询。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会制度逐渐被削弱，自本世纪初以来，康涅狄格州公理会的教会制度一直趋向于与剑桥纲领中规定的制度同化。

1640年长议会的召开，阻止了向清教徒殖民地移民的浪潮。当时，或在温斯洛普和他的公司移民后的10年内、超过两万名英国人在新英格兰定居下来。他们中大约有八十名牧师,其中不少于二分之一是剑桥或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一些能力突出的神学家，如约翰-科顿和托马斯-胡克，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已经取得或有能力取得名声。当威斯敏斯特大会即将召开时，一些新英格兰的牧师被急切地要求返回英格兰，参与英国教会的重建工作。然而，他们更愿意继续进行他们在美国如此吉祥地开始的工作。

除宗教之外，教育也受到新英格兰清教徒定居者的重视。早在1636年，在他们与贫穷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在新英格兰的剑桥建立了学院，后来将其命名为哈佛。由公众资助的文法学校很快成立，1642年和1643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普通学校也开始了。向印第安人传教的努力是认真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与这些努力有关的最令人尊敬的人是约翰艾略特（1604-1690），他是罗克斯伯里的一名牧师，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土著人的皈依和宗教培训。在纳蒂克和其他地方形成了〞祈祷的印第安人〞的定居点。他的皈依者中有24人成为本地部落的传教士。他的仁慈和慷慨，不亚于他对福音的热忱。他的主要工作成果是将《圣经》翻译成印第安语。新英格兰清教徒在其教会习俗中以最强调和最实际的形式反对教会中的圣职主义。在早期，婚姻是由民事裁判官主持的，而不需由教士主持。死者被埋葬在没有圣地的地方，没有祈祷或任何其他宗教仪式。凡是被认为有〞意志崇拜〞的味

道，或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明，在圣经中没有得到认可的，都被抛弃。基督教年中的斋戒和节庆，凡是不能以圣经的明确证明为理由的，都被废除了。斋戒或感恩的日子由行政长官不时地特别指定。确立了这样的习俗，即通过公开声明指定每年秋季的感恩节，以及春季的禁食日。器乐不允许出现在″集会所″，即公共礼拜场所，也不允许出现在宗教仪式的任何地方。甚至在公共礼拜中也不允许读圣经，除非它伴随着讲解。根据清教徒的观点，主日被严格视为安息日，清教徒认为安息日的遵守是十诫中所规定的。根据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法，安息日从星期六的日落延伸到星期日的日落。在一般的加尔文教徒中，特别是在清教徒中，人们对旧约圣经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敬畏之心。一般来说，人们对启示并没有明确或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系统，其中较高和最后的阶段是福音。

新英格兰的早期刑法典经常被指责为对那个时代来说非常严厉。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只要比较一下同期的英国法律，在一长串死刑罪中，包括价值12便士以上的盗窃罪，并对各种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烙印惩罚。关于清教徒法典异常严厉的错误印象部分来自于1781年出版的《康涅狄格州史》中的″蓝色法律″，这是一部由事实和虚构组成的奇怪的混合体，作者是塞缪尔-彼得斯，一个来自该殖民地的无赖难民。这些虚构的法规是彼得斯的发明，甚至在近代，也有不少受人尊敬的作家将其作为真实的法规来引用。我们只需指出，新英格兰的法律在严格程度上并没有超过美国其他殖民地的现行法规。在马里兰州，一个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的议会于1649年通过了一项禁止亵渎的法律，这一罪行包括否认三位一体教义或对其使用任何责备性的语言。对于第二次犯罪，惩罚是在额头上烙印。在荷兰政府统治下的纽约，有记录显示，在一些案件中使用了酷刑来获取口供。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其他法典能像1610年和1611年为弗吉尼亚州通过的法典那样严厉。法律规定，第二次犯有亵渎罪的人应″用小刀刺穿其舌头″。当时，在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都有要求参加公共礼拜的法律。在弗吉尼亚州，对违

反类似法规者的惩罚比在清教徒殖民地更加严厉。杰斐逊在他的《弗吉尼亚州笔记》中说："[弗吉尼亚州]的第一批定居者是来自英国的英国教会移民，当时正值英国教会完全战胜所有其他宗教的时候。由于他们拥有制定、管理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他们在这个国家与移居北方政府的长老会[即公理会]的兄弟们一样表现出不容忍。"

弗吉尼亚议会1659年、1662年和1693年的几项法案规定，父母拒绝让子女接受洗礼是一种惩罚；禁止教友派（贵格会）教徒的非法集会；规定任何船主将教友派教徒带入本州是一种惩罚；命令将已经在这里的人以及此后到来的人监禁起来，直到他们放弃这个国家--规定对第一次和第二次返回者的惩罚较轻，但对第三次返回者则是死刑。如果这里没有发生像新英格兰那样的死刑，那不是因为教会的温和，也不是因为立法机构的精神，这可以从法律本身推断出来；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情况，这些情况没有传给我们。杰斐逊的上述陈述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在弗吉尼亚州，统一性的执行情况随着英国党派的波动而变化，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容忍的精神都处于不被记录状态。

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的所谓不容忍，引起了许多真诚的遗憾，也引起了不少不甚明智的言论。诚然，对国家的危险一直是对宗教异见者行使强制力的普通借口。但应该记住殖民地和一个成熟的联邦之间的区别。在一个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新生定居点，有些事情可能是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而在一个成熟的社区，这些事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正的。在一个社区里，排斥精神至少是一种轻罪，而在另一个社区里，这将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新教徒看来，教会是国家的，或者说是领土的。马萨诸塞州的殖民者认为可以自由地组织教会和国家，以适应他们自己的观点。1629年一开始，有两个叫布朗的人就抗议塞勒姆教会的形式，并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礼拜，使用祈祷书。他们拒绝屈服，被运回了英国。殖民者的处境无疑是一个考验。

1631年，罗杰-威廉斯抵达马萨诸塞州。他当时大约30岁，毕业于剑桥大学，罗杰-威廉斯可能已经接受了牧师培训。不过，他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独立人士。他是一个有明显能力的人，而且具有慷慨、无私的精神。认识他的人都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宗教诚意。必须承认的是，他在判断和行动上是不安分的，有争议的，而且很急躁。在考虑导致他被驱逐出殖民地的争论时，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一个最激进的分离主义者。他迈出的第一步是拒绝在波士顿担任牧师，因为该教会没有公开放弃与英国教会的关系，他认为英国教会是反基督教的。他认为，听英国的教区牧师讲道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意味着与一个腐败的前教派教会的关系，而新英格兰的基督徒有义务为他们在英国时没有完全与之断绝关系而忏悔。接下来，他写了一篇论文，否认英国国王有权授予殖民地政府赖以生存的专利。他肯定地说，该专利应该被送回。他宣称的另一个观点是，皇家徽章中不应该有十字架；而威廉姆斯被选为教会教师的塞勒姆的恩迪科特则被说服将其从国旗中剪掉。

许多人对这一行为的动机表示同情，但他们认为这在最大程度上是不合适的和危险的。此外，威廉姆斯还否认对殖民地中不承认自己是教徒的非自由人进行宣誓在道德上是合法的：他在这一声明中还补充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即政府无权惩罚违反十诫法律第一表的行为--其中包括作伪证和亵渎神明以及违反安息日的行为--除非这种行为导致了民间动乱。这位年轻传教士的真诚和口才为他赢得了门徒，特别是在塞勒姆，那里的大多数教会都愿意跟随他。殖民地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已经开始建立的整个社会结构正面临着被内部分歧和威廉斯所倡导的原则和措施不可避免地在英国当局手中引起的干涉而推翻的危险。他们对殖民地心存疑虑，只需要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来剥夺它在作为贸易公司的特许状的基础上悄悄承担的自治权。因此，殖民者行使了他们在其他场合与其他殖民地社区共同行使的特权，要求他离开。他甚至不是该殖民地的自由人，没有进行过允许他加入殖民地的宣誓。为了防止他们把

他送回英国，他逃走了，穿过森林，建立了一个定居点，为了表示感谢，他把这个定居点命名为普罗维登斯。

他被放逐的主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他对分离问题的极端看法和对专利权的谴责。他的对手们的陈述与他自己的证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陈述清楚地表明，他被驱逐的原因是，第一，他对专利权的攻击，第二，他对誓言的谴责，因为这意味着基督徒与未重生的人有关系。英国政府的威胁态度使地方官员认为有必要要求这个小社区的所有居民做出忠诚的保证。与行政长官的有限职能有关的理论，或宗教自由的学说，是放逐威廉斯的一个次要动机，在他自己对此事的叙述中也没有突出表现。在殖民地局势的危险危机中，他的存在被认为涉及巨大的危险，特别是考虑到他对专利和宣誓的〝动荡〝反对。用现代的说法，威廉姆斯被称为政治上的教条主义者。他的良心权利学说本身不会导致他被驱逐；然而，当这一学说在他的头脑中成熟到一个明确的形式时，并在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中实现它，在那里，不是宽容而是充分的宗教自由。他在历史上的杰出表现归功于他的基本法律。他后来的事业既体现了他内心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也体现了他智力上的不安分的活动和争论不休的习惯。1639年，在普罗维登斯，一个叫霍利曼的杰伊人用浸泡的方式给他施洗，然后威廉斯又给霍利曼施洗，大约有10人受洗。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步骤,因为罗杰-威廉斯在他最喜欢的〝灵魂自由〝的信条方面已经被浸礼会成员预料到了，他们是主张宗教自由学说的先驱者。但他很快就从浸礼会中退出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所有的教会团契敬而远之。他完全抛弃了洗礼仪式，并等待着精神使徒的复兴。像他的朋友维恩和其他性情相投的人一样，他成为寻找新天堂和新地的〝探索者〝之一。他从马萨诸塞教会分离出来，因为他不以任何方式承认英格兰的教区教会；他从自己在塞勒姆的教会分离出来，因为它没有放弃与其他马萨诸塞教会的共融；最后,他与自己组建的浸信会教会和所有其他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脱离了关系。然而，在所有这些分歧中，他带着不慌不忙的甜美脾气，以真正的基督教精

神进行写作和讨论，由于他的天才，他的服务，甚至对那些把他赶出去的殖民地，他冒着生命危险结交的人，以及他为自由事业所做的一切，他有资格在美国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在那个时代，当英国处于教会和政治革命的边缘时，对宗教新思想深感兴趣的人自然会启程前往清教徒的殖民地。1634年，安-哈钦森夫人来到波士顿，产生了比罗杰-威廉斯对皇家旗帜和专利的讨伐更严重的骚乱。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在英国曾是科顿的教友，令人钦佩。在波士顿站稳脚跟后，她每周在自己家里举行两次妇女会议，讨论她们在教堂听到的布道。很快，整个社区都因她新颖的观点和她对神职人员的教导的自由评论而热闹起来。她曾向来自英国的同路人表明过她的观点，现在她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些观点。她认为，圣灵亲自与人的灵魂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圣洁与圣灵的圣洁是一致的，成义不是通过成圣来证明的，而是通过更直接的见证或内在的启示来保证信徒的接受。她指责牧师们，除了科顿和她的姐夫惠莱特之外，都在宣扬 "行为之约"，而不是 "恩典之约"，或者说，都是法律主义者。她的学说被斥为反传统，但她本人和她的追随者并没有被指控从学说中得出不道德的后果。与她的神学的神秘和主观倾向相一致，她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而是灵魂通过与基督的结合而上升为新的精神生命，而且它是在皈依时发生的，因此，年轻的州长Vane和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都同情她，而波士顿教会的教师Cotton本人起初也没有反对她的信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惠莱特为她作了一次激烈的布道，对方和地方官都认为其具有煽动性，甚至还威胁要使用暴力。但她的对手对她的支持者来说太强大了，而她的支持者大多被限制在波士顿，因此她被放逐了。此前，在不久后成为纽黑文创始人的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参加的教会牧师们对她的审查中，她部分撤回了关于复活的言论；但有理由相信，对她的指控只是基于她可原谅的记忆混乱，因此在异端的指控中又加上了虚伪的指控，她被驱逐出教会。她起初去了罗德岛，据说她在那里肯定了民事

裁判所的非法性。从那里她进入了荷兰人的领地，1643年，她和她的全家在那里被印第安人杀害。在马萨诸塞州，保守派的胜利已经完成。维恩被温斯洛普取代了总督的位置，并回到了英国。他们所担心的无政府状态是由这位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聪明女人对神职人员和他们的教义进行的攻击。值得记录的是，在冲突的热潮中，她的一些盟友实际上威胁要向国王上诉，反对地方当局，这将是对这个新生的联邦的独立，甚至是生存的打击。

与教友派（贵格会）教徒的纠纷是马萨诸塞州殖民地与来自国外的异议人士冲突史上的第三章。许多福克斯的早期弟子的怪诞行为和狂热的前马萨诸塞州的贵格会教徒的旅行，在清教徒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在马萨诸塞州总法院于1657年通过的针对他们的法律中，他们被描述为〝最近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被诅咒的异端教派，通常被称为贵格会，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立即派来的、并在圣灵的帮助下发表和撰写亵渎神明的观点，蔑视政府和上帝在教会和公共领域的秩序，恶语相向，指责和谩骂行政长官和牧师，试图使人们背离信仰，并为他们的恶行获得改信者。〞在教友派教徒到来之前，他们在其他地方因不守规矩而获得的恶名让殖民者们感到震惊。四个殖民地的专员建议普通法院（马萨诸塞州总是最容易受到教派人士的侵扰，并因其政府在宪章下的不稳定性质而处于最危险的状态）--继续制定法律。人们担心〝咆哮者和贵格会〝的到来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的行为被认为与德国那些狂野的、无政府的明斯特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举行了公开的自卑和祈祷日。然而，规定被放逐的教友会成员返回殖民地为死罪的法规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并在众议院仅以一个多数票通过。毫无疑问，人们认为这项法律会引起恐怖，从而阻止任何人暴露在其惩罚之下。这条法律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尽管排除任何一类令人厌恶的移民进入其领土无疑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合法权利。1660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圣公会殖民地通过了一项同样的法律，规定贵格会成员第三次回来就是死罪。在那里，在一个人的家里招待一个贵格会成员，进行布道或教学，将被处以500磅的烟草。在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大约

在同一时间，贵格会成员被监禁、鞭打，并被放逐。但在马萨诸塞州，他们坚持第二次和第三次返回；可悲的是，其中有几个人被绞死。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此极端的措施既无效又残酷，于是就放弃了。Palfrey说：″起初，″在停止死刑后，教友会的滑稽行为变得比以前更荒唐。远远近近，他们在做礼拜时扰乱了会众的秩序″。一位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地走过塞勒姆镇，作为一种标志。″另一位赤身裸体地进入纽伯里的会议厅，″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标志″--也就是对那个地方的教会。不用说，这种半疯狂的热情发展只限于公谊会（贵格会）历史上的最早阶段，而公谊会对宗教和道德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弗吉尼亚州的第一批定居者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英国的固定教会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他们中有几位生活虔诚的牧师。其中一位罗伯特-亨特是最早的移民之一，也是第一个在詹姆斯敦举行公共礼拜的人，他被称为 ″虔诚而勇敢的神职人员″。与他一起过来的公司是由没有家庭的人组成的，其中有48名绅士和4名木匠。这支队伍的特点决定了神职人员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一开始，他就在一个帆布屋顶下宣读祈祷文和讲道。一段时间后，一座小楼被建起来供人们做礼拜。我们读到，在1610年特拉华勋爵到来后，″小教堂把乡下的野花修剪得整整齐齐″。另一位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期历史中光荣出众的牧师是亚历山大-惠特克，波卡洪塔斯就是在他那里受的洗礼。殖民者被专利权人警告要避免清教主义的 ″新事物″。1619年，来自11个种植园的代表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英格兰教会被确认为该殖民地的既定教会。法律要求所有的人在主日上午和下午都要去教堂。有一项计划是在亨利科建立一所学院，并为印第安青年的教育建立一所学校。英国人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提供了大量的捐款。

但由于送来了大量的弃儿和重刑犯，殖民地的性质被削弱了。1622年3月，发生了一场印第安人大屠杀。这些事情使居民的人数从四千人减少到两千五百

人。教育机构的计划被放弃了。

1624年，该殖民地只有四名常驻神职人员，其中只有一人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反对异见者的法律管理比法律本身更温和。清教徒进入了这个国家。在英国内战开始时，议会中有些成员赞成不服从命令。一些人向波士顿的清教徒牧师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进入殖民地。但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对不从国教者充满敌意。1643年，所有牧师都必须遵守 ″英格兰教会的秩序和章程″。总督和议会要注意，″所有不服从命令的人在接到通知后，都应被强迫离开殖民地，并提供一切便利″。一些独立派的牧师被罚款，其他人被监禁。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赶走了。前面已经提到了弗吉尼亚政府对教友派的待遇。浸礼会教徒被指责为 ″充满了他们异端发明的新奇概念的分裂分子″。所有拒绝把孩子带到 ″合法的牧师那里接受洗礼 ″的人都要 ″被征收2000先令的烟草″。

在新英格兰，人们被划分为多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不同的政治组织。镇上的会众，或者当镇子很大时，教区的会众，即有一个以上的礼拜场所的会众，在选择和解雇牧师方面与教会同时进行。会众或 ″协会 ″持有财产，并为支持宗教服务支付摊款。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教会或圣餐者团体保持着赞助人的关系。在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们自己住在他们的大庄园里。执事会 ″行使这一职能，而在新英格兰，这一职能属于会众和教堂。”

罗德岛的两个殖民地定居点根据罗杰-威廉斯在1643年获得的特许状而联合起来。罗德岛是所有心怀不满或被放逐的周边殖民地居民的避难所。鉴于这种情况和其政体的无限制自由，那里存在的混乱并不比预期的大。马萨诸塞州对浸礼会的不友好接待促成了威廉斯所建立的社区的发展，他们在那里变得很多。出于同样的原因，公谊会在那里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弗吉尼亚和康涅狄格之间的中大西洋海岸被其他定居点所占领。荷兰人把

新尼德兰的教义和政体带到了新尼德兰，即改革派教会的教义和政体，因为它存在于他们的祖国。他们表现出对宗教和教育事业的关注，这也是沉默的威廉的同胞的特点。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和他们的新英格兰兄弟的信条一样严格；但他们对基督教生活的看法不那么严格，而且从他们殖民地的情况来看，他们较少受到那些适合激起排他性或不容忍政策的危险。来自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难民，如哈钦森夫人，被允许居住在他们的范围内。然而，一种不同的精神有时占了上风。当斯蒂文森担任主任时，法律禁止路德教派按照他们自己的形式举行礼拜活动。1656年，法律规定所有教区都不得举行与多特会议规定的既定宗教不一致的聚会。对每一个违反这一法律的传教士，以及每一个参加这种被禁止的会议的人，都要进行罚款。但阿姆斯特丹公司的董事们斥责了斯图维森特的″过分精确″，并阻止了这一狭隘路线的实施。除其他原因外，他们还认为这种不容忍会阻碍移民的发展。对教友派（贵格会）的敌意爆发了。如同在马萨诸塞州一样，由于担心他们的到来会给殖民地带来祸患，人们举行了禁食和祈祷日。英国人征服新阿姆斯特丹后，依法成立了圣公会。1693年规定，所有居民都应被征税，以支持牧师的工作和教堂的建设。然而，要严格或统一地执行这一要求是不现实的。1674年规定，″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宗教，″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犹太人不得充当士兵，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其他殖民者处于同等地位。荷兰牧师和英国圣公会牧师之间的关系往往具有友好和兄弟般的性质。

马里兰的创始人巴尔的摩勋爵是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国务卿之一，并支持他的专制政府措施。他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但并不倾向于不容忍新教徒的做法。第二任巴尔的摩勋爵，在他的统治下，马里兰得到了定居，他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殖民地被设计为罗马天主教徒的避难所。但第一批殖民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教徒，而且在国王的拨款中规定，英国教会的宗教应受到保护。无论是出于倾向还是政策，创始人都确立了充分的宗教自由。殖民地中的清教徒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并与克莱伯恩结盟，克莱伯恩是弗吉尼亚人，被马

里兰人剥夺了他在切萨皮克的岛屿。巴尔的摩的同情心自然是倾向于国王而不是议会，在英联邦体制下，议会专员于1652年罢免了他的官员，并将该省的政府置于一个清教徒委员会手中。天主教徒甚至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些麻烦在1655年的内战中结束，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徒被打得很惨；但五年后，旧的自由被恢复了。在1688年的革命中，由于巴尔的摩没有放弃对威廉和玛丽的支持，殖民地发生了叛乱和革命，他的权力被剥夺了。圣公会现在已经建立，并对罗马天主教徒施加了民事障碍。

1681年，威廉-潘恩为了偿还英国政府欠他父亲（英国海军上将）的债务，从查理二世那里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块领土的授权。他在国王的领导下，作为所有者和统治者，拥有这块名为宾夕法尼亚的领土。第二年，费城成立。潘恩寻求这样一个定居地的主要动机是为他自己信仰的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一个庇护所。他允许特拉华河以西的荷兰人和瑞典人保留他们的土地。瑞典人于1638年在那里定居，并于1655年向荷兰人投降。瑞典人的定居点是根据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建立殖民地的目的而形成的，该目的是在奥克森斯蒂尔恩的主持下进行的。荷兰征服后，他们一直受制于荷兰，直到1664年新尼德兰向英国投降。潘恩在所有的宗教事务中建立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通过公平对待印第安人，他奠定了持久和平的基础。因此，他能够吸引大量的移民，除了他所领导的宗教团体外，还有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移民。

==========

==========

==========

==========

==========

==========

==========

第九阶段

从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到现在（主后1648-1887年）

文化和科学的新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和冲突

文化和科学：社会改革：传教士征服的新阶段

==========

第一章

十七世纪后半叶的教会事件

在英国君主制垮台和查理一世被处决之后，独立派，其中克伦威尔是首领，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他自己教派的成员，都更支持宗教自由。

他说：″要求自由而不给予自由，这是不是很聪明？″然而，在英联邦时期，罗马天主教徒被剥夺了投票或任职的特权。祈祷书的使用被禁止。但正如肯尼特主教所说，无论保护者对圣公会神职人员做了什么，都是因为他们是保皇派，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教会人士。长老会被阻止全面建立。一个由″特里尔″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牧师候选人。在这个委员会中，有长老会和浸礼会的成员，尽管大多数是独立派。尽管有反对使用《公祷书》的条例，甚至圣公会也被接纳为成员。另一个委员会是为了驱逐那些生活丑恶的牧师

而设立的。在克伦威尔时期，宗教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扶植。牧师由什一税支持；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是有一个既定的教会。保护者宣布，他不会让一个基督徒践踏另一个基督徒的脚跟，也不会谩骂他。他抵制了长老会行使统治权的努力，并在独立派表现出类似的脾气时对他们进行斥责。他写信给法国首相马扎然，说他已经并希望对天主教徒表现出所有的宽容，只要这种行动的阻碍因素允许。亨利-范恩爵士是一位共和主义者，拒绝默许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他在倡导宗教自由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656年他发表了《治疗问题》，在其中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对于那些在人与人之间的外在行为、交谈和今生的事情上作恶的人，治安官 ″要成为恐怖和报复的大臣″，但除此之外，他没有权利去做。这种观点在任何党派中都没有得到同情。圣公会教徒被禁止在公共仪式中使用他们自己的奉献书，他们有时违反法律，秘密地使用它，有时在举行仪式时不使用公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那些被禁止重复的基础上写祈祷文。在谴责这种迫害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宗教分歧与政治目的是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成为 ″教长″就是与政府为敌，急于推翻它。保护者的精力使英国在国外有了指挥性的影响。″她是新教利益的领导者。散布在罗马天主教王国的所有改革派教会都承认克伦威尔是他们的监护人″。马考利说，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被从压迫中解救出来，″仅仅是由于这个伟大名字的恐怖。 他被迫向教皇宣扬人性和节制；因为一个很少白白威胁的声音宣布，除非对上帝的子民表示好感，否则英国人的枪声就会在圣安吉洛城堡里响起。″

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人民对军队的控制感到厌倦，渴望恢复君主制。老百姓怀念他们熟悉的节日和运动，并普遍不喜欢清教徒统治的严格性。在恢复查理二世的过程中，长老会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们过于依赖公正的言辞，而没有正式的保证。

1661年，在21位英国圣公会和众多长老会神学家之间举行的萨瓦会议，只是

凸显了圣公会党的不屈不挠的对立。他们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失去了一个理解的机会，而这种理解本可以将英国最优秀的牧师保留在固定教会中，并使它免于灾难和危险的威胁。主要的长老会成员，如巴克斯特，会满足于按照乌舍尔的模式建立一个温和的主教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副主教的数量应该增加，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主持一个长老会的工作。

1662年通过的《统一法案》要求所有统一的牧师接受圣公会的任命，并声明对祈祷书和英格兰教会的整个制度表示无条件的赞同和同意。此外，还要求他们宣誓服从教规，放弃庄严的联盟和盟约，并放弃在任何情况下拿起武器反对国王的合法性的教义。由于拒绝遵守这些严厉的考验，有两千名虔诚的牧师在一天之内被赶出了他们的住所。当长期议会对圣公会神职人员采取类似的措施时，他们收入的五分之一已被给予他们，作为他们即时生活的准备。此外，在他们的情况下，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他们站在了议会的对立面。被《统一法案》赶走的大臣们都是君主制的忠实支持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查理二世很可能会继续流亡。胜利派的复仇心切，对政治犯穷追不舍。在这些人中，有国王曾答应饶他一命的范恩。在他走向断头台的路上，房顶上和窗户里的人群都在迎接他。他听到的喊声是：″主与你同在，天地间伟大的神在你身上显现，为你而来″。他举起帽子，鞠躬回应。他到最后的态度是高贵的，甚至是欢快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表达的：感谢上帝，他被认为有资格受苦。

主教制是强加给苏格兰的。克伦威尔在邓巴的胜利之后，苏格兰实际上一直依赖英格兰。

苏格兰人对查尔斯的登基感到高兴，正如他们所期望的，这将使他们获得自由。但他们派往伦敦以确保重建长老会的两位大使劳德代尔和夏普背叛了他们的事业。夏普作为圣安德鲁斯的大主教回国了。劳德代尔废除了1640年议

会通过的所有法规，随后又恢复了圣公会制度。阿盖尔（Argyle）在查尔斯复辟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但由于他以前的做法，人们对他既害怕又憎恨。他以叛国罪的罪名被送上法庭。一系列残酷的措施完成了对苏格兰的征服。所有公职人员都被要求放弃公约。所有有驻地的牧师都要接受主教的任命。这一措施的后果是，350名牧师被赶出了他们的岗位。一项 "五英里法案"禁止任何拒服兵役的牧师居住在其教区的20英里内或皇家行政区的3英里内。成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法庭，目的是粉碎所有在行为或言论上不服从这些教会安排的行为。查尔斯本人没有宗教原则。他的喜好是站在罗马天主教会一边，在临终前，他加入了这个教会。他想以绝对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就像路易十四一样。如果通过对不从国教者的帮助，他可以为罗马天主教徒争取到同样多的利益，他就会愿意给予宽恕，或免除部分法律。但是，下议院不愿意为救济它所厌恶的任何一方提供援助。1664年，《修道院法》获得通过。该法案禁止任何有五人以上参加的宗教集会，除非按照圣公会的惯例。大量的非圣公会教徒被关进了监狱。在1665年伦敦的大瘟疫期间，这类人的勇敢和慷慨行为对掌握权力的顽固派没有任何影响。《五英里法案》禁止任何未签署《统一法案》的神职人员在学校任教，或进入任何公司镇或议会区的五英里范围。此外，他还必须宣誓忠于消极服从君主的教义，并保证不试图改变政教合一的政府。克拉伦登变得不受欢迎了。

法国人的愤慨被唤醒了。荷兰人在海军上对英国人的胜利使这种情绪百倍地强烈起来。苏格兰的圣约者们奋起反抗，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因为失败而被压制。所有善良的人都对宫廷的放荡行为表示深深的不满和厌恶。与憎恨清教徒的紧缩政策有关，放荡的闸门被打开，其程度在英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高调的保皇党人伊夫林和合格的证人佩皮斯的日记表明，国王和他的宫廷的道德堕落到了何种程度。大量的公共资金从议会指定的目标中被挪用。克拉伦登既没有满足议会的要求，也没有满足专制主义的倡导者的要求，他于1667年被解除职务，受到弹劾并被放逐。第二年，对法国的屈从被换成了与荷兰

和瑞典的联盟。但这只是查理的一个暂时的、不情愿的让步。

1670年，他与路易密约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其中约定在适当的时候，查尔斯应宣誓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并在路易的帮助下，在英国建立天主教和绝对政府。作为回报，查尔斯将帮助路易实现他在荷兰的计划。1672年，对荷兰宣战。在战争开始之前，查尔斯试图通过一项非法的宽恕宣言来调和异议人士。在因这一声明而被释放的囚犯中，有一位在实用宗教领域最有名的英国作家，埃尔斯托的工匠和《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他的监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放松一下，已经持续了12年。为了保证他的盲童和其他贫困家庭成员的生活来源，他学会了制作长线花边，在贝德福德监狱里，他耐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写道："我在这里看到了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在另一个世界与耶稣在一起的甜蜜情景。我在这里看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无法表达的东西"。他的不朽之作是在后来的一次监禁中写的，这次监禁是在他获释三年后开始的。

在荷兰人取得胜利后，议会迫使查洛斯收回《赦免宣言》，并通过了《测试法》，要求所有官员在英格兰教会中参加圣礼，并声明他们不相信变质学说。国王的兄弟詹姆斯，迫害公爵（Duke of Persecution）。约克公爵是罗马天主教徒，他放弃了他的高级将领职位。查尔斯继续成为法国的附庸，除非他被议会挫败和推翻。苏格兰的压迫导致夏普大主教被谋杀，他是这些压迫的主要制造者之一。1679年，盟约者在博特韦尔桥被蒙莫斯击败。之后，约克公爵取代了他的位置，并实施了一些残忍的行为，而蒙茅斯较为宽松的脾气并不倾向于此。

1685年开始执政的詹姆士二世的目的与他的哥哥一样，都是要按照专制制度进行管理。他更希望在詹姆斯统治下的英格兰重新效忠于罗马教会，而他是罗马教会的公开信徒。然而，他不愿意成为法国和她的君主的仆人，除非情

况的压力迫使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选择这种屈辱的地位。对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审判和定罪，以及坐在审判席上的杰弗里斯对他的无耻辱骂，表明即使是最虔诚、最忠诚的异议人士也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巴克斯特写道：″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清醒和虔诚的人，当他们有心想要出人头地，在法庭上被人注意，被教士们注意时，也会落井下石，传教或写文章反对我”。他的教士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在新门监狱。在记录这一事实时，他平静地说：″监狱里有这么多人，使年迈的牧师们精神窒息；但愿上帝保佑，给他们这么长的时间，以更便宜的价格传道。″ 在苏格兰，仅由圣公会成员选举产生的圣公会议会规定，在有屋顶的修道院传教，或在露天的修道院传教，都是死刑。克拉弗豪斯和其他人对圣约者实施的残酷行为，以及受难者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其中一位殉道者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aret Wilson）在索尔维峡湾（Solway Firth）被淹死，当她被水淹没时，被问及是否会放弃圣约，她回答说：″绝不会。我是基督的人；让我走吧。″渐渐地，詹姆斯由于热衷于自己的宗教，疏远了他在英格兰的圣公会支持者。不仅对持异议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而且还试图通过法律机制将罗马天主教徒引入英国的慈善机构。1686年，国王重新建立了高级委员会法庭，并让不公正的杰弗里斯担任其负责人。在爱尔兰，他竭力用爱尔兰天主教徒取代英国新教徒的地位和影响力。1687年，国王试图赢得非新教徒的支持，发表了一份非法的宽恕宣言，废除了刑法和宗教测试。该宣言被命令在教堂中宣读。七位主教请愿，反对被强迫公开宣读非法宣言。他们的请愿书被刊登出来。他们因被指控发表煽动性诽谤而被提审,这引起了人们对他们普遍而热烈的同情。当他们被无罪释放的消息传来时，这种同情又加倍了。奥兰治亲王威廉收到了一份邀请，他是国王玛丽的侍从。

他是国王的女儿玛丽的丈夫，1688年带着一支军队进入英国，把国家从暴政中解救出来。由于国王的明确目的是推翻国家的自由并建立教皇制，各党派的联合产生了1688年的革命。詹姆斯出逃，王位被宣布空缺，威廉和玛丽上

台。《宽容法案》免除了针对教会的法律惩罚，这些教会应宣誓效忠并认同《三十九条》的教义部分。对没有这个条件的贵格会成员给予宽恕。会堂如果经过登记，则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宽容并没有扩展到教皇党人或否认三位一体的人。

十七世纪中期，一个新的因素突然出现在英国的宗教生活中。在政治竞争和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们的辩论中，爆发了一种用当时的语言称之为″热情″的东西。这个名字继续被赋予任何对超自然、神圣影响的奢求，或被认为是这样的奢求，特别是如果它涉及到对神圣事物的直觉，或情感的高尚状态。在″热情″的标题下，不仅包括超过普通或认可限度的热情，还包括现在被称为神秘主义的东西。这种类型的宗教的第一个表现是贵格会的崛起。贵格会的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他的父亲是德雷顿的一名织工。他的儿子接受了宗教方面的训练。然而，福克斯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他的主人放羊。1643年，他的思想突然被世俗追求和享乐的虚荣所震撼，并感到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必须″抛弃一切，无论老少″。因此，他离开了他的亲戚，几年来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社会。1646年，他开始有了新的启示，在他的灵魂中，福音的光和恩典；并在第二年开始了他的巡回讲道生涯。1649年，在诺丁汉的一个教堂里，他感到很感动，在布道的过程中打断了传道人，并宣称需要从上而下的照明来理解圣经和确定神圣的真理。他因这一罪行被关进了监狱，这次短暂的拘留是一系列因类似骚乱而被监禁的开始。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福克斯一直笔耕不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并访问荷兰和美国。1656年，与他一起作为巡回助手的传教士人数不少于56人。他很早就采用了贵格会成员特有的服饰和语言。这个名字是他们的敌人给他们起的。至于这个称呼的确切来源，有不同的说法。

福克斯得到了两个能人的支持。其中一位是公谊会（贵格会）的第二位创始人，他更愿意被称为称为威廉-潘恩。潘恩是英国威廉-潘恩的儿子，是海军

上将。他的家族在克伦威尔垮台后，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并赢得了他们的青睐。麦考利对潘恩的指控已被驳斥。他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多事之秋。他在大洋两岸都发挥了重要而有益的作用。1667年，他成为贵格会教派的一名牧师，并从那时起发挥财富和社会地位高的优势，为他受迫害的弟兄们服务，传播他们的教义。通过他在创建宾夕法尼亚州的行动，他为这个他是如此强大的领袖的机构的力量和成长增加了很多。他多次因自己的观点和将其付诸实践的一致性而遭受监禁。他出版了小册子和论文，其中《没有十字架，没有皇冠》是最有价值的。贵格会中最杰出的作家是罗伯特-巴克利。他部分时间在巴黎受教育。他的《为真正的基督教神性辩护》是一部超越普通神学能力的作品。它对贵格会的观点作了有启发性的阐述。

贵格会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内光学说。该学说认为，圣灵不仅向人们的头脑中打开圣经的精神内容，而且使人们形成对圣经的灵感和福音的真实性的活生生的信念--新教徒一般都这么认为，而且还传授了对圣经教导的补充真理。这种额外的真理不能与圣经相矛盾。因此，圣经是争议中的裁判员。为了与该体系的总体特征保持一致，圣礼被抛弃了。牧师的使命是一种内在的召唤，可以给女人，也可以给男人。在原罪的问题上，采取了与阿米念派没有本质区别的观点。公义是无偿的，是因信而得的，但如果没有对基督的内在接受和与他的神秘结合，则是不完整的，也是没有益处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它的拜访时间，当圣灵带着启蒙的力量来到它面前，如果不加以抵制，就会给它带来圣洁和平安。贵格会遵循《登山宝训》的内容。发誓被认为是错误的。灌输了言语、衣着和礼仪方面的简朴。

贵格会的传教士使许多人皈依。一些人的不体面行为，特别是打断公共船只的工作和谴责神职人员，引起了对贵格会成员的反对，他们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教友会（贵格会）的传教活动中经常出现的抽搐和其他身体表现引起了反对。但是，许多早期教友派教徒所陷入的奢侈行为，更不用说他们拒

绝缴纳什一税和遵守其他教会要求，都不能成为追捕这些古怪而虔诚的基督徒的无情迫害的借口。他们被关在有瘟疫的牢房里。据说有一次，英国有四千名教友派教徒被关在监狱里。许多早期的传教士死在监狱里。妇女和男人都受到野蛮暴徒的攻击。他们的聚会所被拆毁，有时是由教会当局下令拆除的。他们被勒索了很重的罚金。1656年，贵格会成员从巴巴多斯来到马萨诸塞州。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一位妇女，在上述情况下被绞死。在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来反对他们。在英国，直到1687年詹姆士二世发表《赦免宣言》，对他们的长期迫害才告一段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基督徒气质和积极的慈善工作解除了对他们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痛苦。

贵格会被组织在〝会议〞中，这些会议彼此之间相互隶属，并有仔细的纪律规定。在他们的礼拜集会中，男人和女人分开坐。会众静静地等待个人〝被圣灵感动〞而发言。人们认为，要想说出有意义的话语，就必须有直接的灵感。

对胡格诺派的迫害。

亨利四世去世后，法国的胡格诺派经常受到迫害。他们的教会一直处于激动和惊恐的状态。1621年，胡格诺派发生了一次起义，被镇压了；但蒙托邦和罗谢尔仍在他们手中。在他们中间，对王室的敌意自然会增加，尽管当时正值这种情绪比任何时候都要危险的时候，因为君主制正在进行征服封建主义的工作。这项工作被著名的国务大臣黎塞留枢机主教成功地推进了。胡格诺派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组织，被他镇压了。1628年，罗谢尔，他们最后一个设防的城镇，落入他的手中。新教徒的移民现在开始了一个过程，法国通过这个过程将其人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赶出了国界。在路易十四时期，马扎然采取了黎塞留的政策。马扎然死后，国王对他在弗朗德战争中对胡格诺派的

支持所负有的责任并非一无所知，但他转而反对他们。这是因为他的良心受到了煎熬，而他的无耻和迷信的心灵试图通过迫害异教徒来减轻这种煎熬。他秘密结婚的曼特侬夫人劝他这样做，尽管她自己曾经是胡格诺教徒。此外，国王在他的傲慢中被激怒了，因为诱使他的新教臣民自愿放弃其特许特权的阴险努力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他的教父拉夏斯和他的战争部长卢瓦刺激他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1679年，一个广泛的改宗系统被组织起来。每一个转入新教的罗马天主教徒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两个教派的信徒之间的婚姻被禁止了。胡格诺派的人逐渐被排除在所有的职位和尊严之外。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众多苦难之一。最后，人们采取了残暴的计划，即把士兵安置在胡格诺派家庭中。在这里不可能列举出法国统治者的狂热对一个无辜的宗教民族所造成的各种难以忍受的残暴行为，他们是在撤销《南特敕令》、在他们所属的教会的怂恿和支持下，法国统治者的狂热行为使无辜和宗教的人民受到影响。在三年的时间里，五万个家庭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屈服于恐怖的人主要是来自下层社会或贵族。包括大量熟练的工匠在内的中产阶级一般都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尽管有种种阻碍，移民工作仍在继续。近25万难民从法国逃出，用他们的工业成果充实了英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在这些人中，有当时最优秀的将军之一肖姆伯格。伏尔泰说：″法国人，″″像犹太人一样广泛分散″。法国陷入了贫困，不仅因为这一直接损失，而且还因为他们留在后面的受苦的兄弟们的灰心丧气和精力萎靡。

路易十四决心将他的绝对权力扩大到教会和国家。这一目的导致了他和教皇之间发生了争论。他的真正目的是在法国行使亨利八世在英国所拥有的教会事务的权力，但不是要与罗马彻底决裂。争端的起因是路易试图要求法国一些地区的教会人士进行附庸宣誓，而这些地区以前并没有进行过附庸宣誓；路易还试图管理这些地区的空缺教区，并占有它们的收入。国王的这一要求遭到了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抵制。

法国教士大会支持国王的紧张局势，并颁布了高卢人在教会事务中的自由的四项条款。这些条款否认教皇对国王的权力，或在精神事务方面的权力，并声称教皇受教规法以及法国教会的法律和惯例的约束；教皇在教义方面的决定并非不可改变，除非它们得到整个教会的同意。在英诺森十二世时期，出现了一种调和。路易保留了引起争吵的特权，但放弃了四个令人厌恶的主张。在与教皇的这场令人难忘的较量中，为了高卢雄鸡的自由，路易的支持者是博苏埃，他是高卢雄鸡的主教。

路易的支持者是莫城（Meaux）的主教博苏埃（Bossuet），他是最有能力和最有说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是当时最能干、最善辩的神学家和最有权力的教士之一。他于1627年出生在第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精通古典作家。以赛亚的预言在他心中燃起了对《圣经》研究的浓厚兴趣。作为巴黎的学生和牧师，他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他熟悉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在担任王储的导师时，他写下了《世界历史论》。在讲坛上，他的演说能力引起了普遍的掌声。博叙埃是一个最成功的论战者。他的知识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他并不畏惧与最有学问的对手进行口头辩论。他的《天主教信仰阐释》以一种自由的、合理的形式介绍了罗马的教义。他的〝新教变种〞一书巧妙地试图表明，新教不过是一扇通向意见冲突混乱的大门，除了服从教会的权威之外，没有人可以从无望的意见冲突的混乱中逃脱。他对改革者的引文经常是乱七八糟的。有人提到博苏埃对不义之人和不公平之事的看法；对路易为改变和消灭胡格诺派而采取的不公正和野蛮的措施给予了支持。博苏埃的另一个污点是他反对费内隆和神秘主义者的行为。

神秘主义在法国的发展与罗马天主教会的早期运动有一定的联系。莫利诺斯（Molinos）的名字被认定为与此有关。莫利诺斯是神秘主义者，1640年出生在阿拉贡的一个贵族家庭。在罗马，他作为一位精神导师受到高度尊重，他的咨询很受人欢迎。1675年，他出版了《精神指南》，其中阐述了他关于虔

诚的生活和内心平静的真正来源的想法。这个避风港要在灵魂的退休和沉思中寻找，在放弃所有自我的欲望中寻找，在完全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寻找。禁欲、浸泡身体、忏悔，只有在开始自律的过程中才有用处，这将导致内在的平静状态。莫利诺斯的书的影响是巨大的。书中所推荐的〝安静主义〞被称为奉献的类型，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赢得了大量的选民。但耶稣会士的怀疑被唤起了。审问者检查了这本书，逮捕了作者，并谴责了他的学说。1687年，他被判处永久监禁，并在狱中一直到死。据称，他放弃了他的教义，或归咎于他的教义；但这还有待证明。在这些指控中，有影响他行为纯洁的指控。这些都是不可信的。它们可能是由于对莫利诺斯的错误理解而产生的。

当灵魂与上帝结合时，外部行为的冷漠是一种表达，这在神秘主义者中并不罕见。但他的教导是否是这样的，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敌视静默主义的真正原因是它倾向于导致完全免除耳语忏悔、忏悔和外在仪式。

与莫利诺斯的想法不一样的是，法国贵族血统的盖恩夫人所珍视的思想。她生于1648年，1717年去世。盖恩是一个坚定的宗教和禁欲主义者，她在童年时就倾向于戴上面纱。但她的婚姻违背了她的意愿，因此无法实现她所珍视的愿望。然而，在她丈夫去世后，她投身于基督教活动，与虔诚的沉思交织在一起，先是在日内瓦附近的Gex，然后在Thonon，之后又在巴黎。与莫利诺斯一样，她教导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完美的。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人的意志绝对地吸收到神圣的事物中去，使灵魂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息。博须埃和其他教士研究了她的著作，并宣布它们是异端。相反，已经成为她朋友的费纳隆拒绝加入这个反对神秘主义教学的判决。他与之共鸣，并在他的《圣徒格言》中灌输了其特有的思想。费纳隆生于1651年，卒于1715年。当这场争论出现时，他当之无愧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普瓦图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通过劝说和善意的方式收回了新教徒。他是一位能言善辩、充满灵性的传教士。他曾是国王的孙子们的家庭教师，他以这种身份写下了《忒勒马科

斯》。1695年，他被任命为坎布雷（Cambray）的大主教。他和博叙特是朋友。由于对盖恩夫人的教义和神秘主义体系的价值存在分歧，他们产生了分歧。费内隆向罗马提出申诉。博苏埃在那里对他的请求做出了答复。索邦大学谴责了费内隆的主张。然后，教皇在1699年宣布，他书中的教义是错误的。他立即公开收回了这些理论。在文雅、温和和基督教性格的所有恩惠方面，他比他的伟大对手更胜一筹，后者强大的智慧和论战技巧使他在教义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

乔治-格劳秀斯，梅兰学派的路德派。格劳秀斯成为教会团聚的热情倡导者，并发表了几篇著作，他试图缓和新教徒对罗马教会的反感，并为一个所有党派都有代表参加的普世议会做准备。17世纪后半叶，居住在维也纳的西班牙教士斯皮诺拉（Spinola）与路德教派的神学家莫兰努斯（Molanus）一起，努力制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联合计划。在这一努力中，莱布尼茨和博叙特之间就同一主题产生了有趣的通信。莱布尼茨赞成根据格劳秀斯的想法成立一个总理事会。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将信仰的基本内容减少到一定程度，以便在同一屋檐下为对立各方的分歧留下空间。

==========

第二章

欧洲大陆上的教会事件

法国复兴前的十八世纪的教会事件与解决办法

十八世纪的标志是，在思想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打破了过去的传统。

德国人通常把它称为十八世纪的〝照明主义〝时期。

他们认为，以前笼罩在人类心灵上的无知和偏见的乌云现在已经散去，因而感到欣慰。他们可以仰望无云的天空。据称，常识终于有机会行使其特权了。盛行的合理化精神到处带来了与既定观点和传统的冲突。

文学的基调发生了变化。在文化问题上，教士的控制被摒弃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得到了恢复，但却缺乏深度和想象力。

文化呈现出辉煌但肤浅的特点。导致许多暴政和苦难的迷信被破除了。但是，与这种健康的进步相联系的是，自由探索的精神，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愿望的约束，反而被怀疑主义和不信的偏见所感染。随之而来的是对神论不忠的文学讨伐，首先在英国兴起，在法国移植和扎根，并从那里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结果是出现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在上层社会，冷漠主义和嘲弄性的不相信与挥霍无度结合在一起。在神职人员中，冰冷或冷淡的脾气占了上风。作为文学和哲学新思想先驱的作家们与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和俄国的凯萨琳二世等君主私下关系密切。他们听从于那些在公共事务中掌舵的政治家，如葡萄牙的庞巴尔、法国的舒瓦瑟尔和西班牙的阿兰达。巴黎是舆论和社会习俗的时尚在欧洲传播的中心。

法文的传播是法国影响力扩大的象征，它不仅在礼仪、家具、园艺和建筑方面，而且在实际的道德和宗教猜测领域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难找。前期长期的神学冲突已经被宗教方面的精神倦怠所取代，以及对任何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信仰的反应。人们已经厌倦了信条的争斗。十七世纪的内战使虔诚的精神受到冷落。十八世纪

的冲突是王朝的争斗，主要是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腓特烈大帝建立普鲁士政权的努力引起的。一般说来，它们没有唤起高尚的爱国热情，也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情感。牛顿的伟大发现，在一个世纪前培根勋爵的哲学教学之后，开创了物理科学研究的新时代。许多充满好奇心的人正从学校里的讨论转向新鲜而诱人的经验领域。

尽管十八世纪有明显的缺陷和过失，但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果说它是博林布鲁克和伏尔泰的时代，它也是艾迪生和约翰逊的时代。与巫术信仰有关的妄想和迫害已经结束了。刑事法学方面的有益改革工作开始了。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伟大的宗教运动，特别是德国的摩拉维亚教和英国的卫理公会，其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一个本身就非常重要的事件，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变化特征，那就是耶稣会的衰落，并在所有天主教国家暂时消亡。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个著名的机构拥有近两万名成员。他们在世界各地忙于工作。他们自己拥有大量的财产。许多国家的青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有几所大学--例如，维也纳和布拉格--完全受他们的控制。作为国王和王公的教父，他们在欧洲国家的民政管理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他们曾在法国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对他们的精神终于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们的作者之一、西班牙人马里亚纳的教导，即弑君是合法的，被认为导致了法国亨利四世的谋杀。他的前任亨利三世以及奥兰治的威廉被暗杀，许多人认为是由于耶稣会教师的有毒学说。耶稣会博士们属于半柏拉图学派，其宽松的神学在更加正统的多米尼克会中激起了对抗，他们（后者）顽强地坚持阿奎那的体系。特别是在耶稣会中流行的松散的道德格言，给他们带来了应有的指责。在有疑问的责任问题上，一个权威博士的意见就可以成为他宣布为无罪的行为的保证，这种〝道德可能性论〞的学说特别令人厌恶。这一理论并非由耶稣会发起的：它的历史更早。然而，他们

对这一理论的利用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被认为是他们体系中的一个独特部分。他们的一些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们使救赎的手段变得更容易，并为那些在审判时诉诸忏悔的人开辟了一条更便捷的赦免之路。

耶稣会士能够从一个残酷和迷信的君主那里调用力量来帮助他们的事业，从而推翻了保皇党人；但帕斯卡尔在《省志》中的讽刺，继续感动着众多有教养的人的钦佩和同情，而埃斯科巴、桑切斯和其他耶稣会当局，在他的书页上，却被视为混合了仇恨和蔑视。在17世纪后半叶，不止一位教皇插手谴责了该组织成员所颁布的道德戒律。不止一位教皇直接或间接地试图遏制他们的野心,将他们对利益的贪婪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被认为是〝蒙昧主义〞的拥护者，受到了所有自由思想倡导者的坚决敌视。

耶稣会士在一开始，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服从于教皇，致力于建立他们的权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他们教团的利益和教团总长的授权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早期，当他与罗马发生争执时，他们向国王提供了帮助。耶稣会与教会当局之间第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与他们的行为有关。

在所谓的〝马拉巴尔习俗〞或仪式中，耶稣会在放纵他们的皈依者保留异教徒的习俗和信仰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引起了其他教会的传教士的敌意，最后甚至引起了教皇本人的敌意。甚至连著名的耶稣会神学家贝拉明也不赞成他们在对待异教徒方面的迁就政策。但方济各会大声抱怨；1631年在中国的多米尼克会再次发出这样的声音。1645年，英诺森十世禁止了中国的祭祀活动，但大约十年后，亚历山大七世又批准了这些活动。在新世纪之初，长期的冲突再次爆发。耶稣会坚持不顾教皇的禁令，不放弃令人厌恶的习俗。教皇派往传教区视察的安提阿主教德-图尔农（De Tournon）在中国受到了他们的虐待，被关进监狱，并在那里死去。当克莱门特十二世颁布禁止马拉巴

尔人的法令时，印度的耶稣会士用拉丁语颁布了这一法令，而他们的皈依者当然不懂这种语言。卡普钦教派的代表诺伯特神父将他们的抱怨带到了罗马，这使得本尼迪克特十四世在《耶稣会传教士行为准则》中禁止了这一做法。

罗马教廷的多次法令被东方的耶稣会士顽固地无视和抵制，直到1741年，他们终于让步了，本笃十四世的圣谕产生了效果。传教士们被迫不情愿地服从教皇们重申的法令。

导致耶稣会衰落的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干预，以及他们从事贸易和商业投机的方式。他们的传教站实际上是工厂，是利润丰厚的商业中心。在西班牙半岛，该组织在教会和国家中的势力最强。在葡萄牙，他们首先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庞巴尔侯爵卡瓦略(Cavalho)，一个有魅力、有气势、有能力的人，获得了约瑟夫-伊曼纽尔一世国王的无限制信任。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地震，伴随着火灾和洪水的灾难，里斯本的三万居民因此丧生，庞巴尔的智慧和有效措施证实了国王对他的尊重。大臣对这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充满了同情。他一心想把国王从耶稣会和与他们结盟的高级贵族的过度影响中解救出来。1753年，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一项条约，南美洲的某些省份被交换了。巴拉圭的一部分落入巴西手中。占领巴拉圭的企图遭到了当地人的抵抗，他们是在耶稣会向导的煽动下进行的。人们发现，一个社区已经形成，耶稣会士在所有民事和宗教事务中行使绝对统治权，而且他们训练他们的皈依者使用武器。

这些情况引起了最严厉的不满。庞巴尔决心平息耶稣会在葡萄牙的影响。1757年，他首先解雇了王室的耶稣会牧师，并以普通牧师取代他们。随后，本着同样的精神设想了其他措施。

有人企图刺杀国王。他受了伤，但不是致命的。一些最高级的贵族，不管是

女人还是男人，都被逮捕并被带到了绞刑架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被指控为阴谋的同谋，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整个社团都被指控为叛国罪。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他们被剥夺了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职位，并被集体驱逐出葡萄牙及其附属地。他们被装在拥挤的船上运往意大利，在那里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在法国，路易十五的女主人蓬巴杜夫人对这个教团怀有敌意，这也许是出于对教团不信任的原因。

他们被驱逐出法国的直接原因是耶稣会管理人拉瓦莱特神父的破产，他是马提尼克岛的耶稣会管理人，由于法国商人支付的某些满载货物的船只失事，他无法支付沉重的债务。该协会拒绝为这个大胆的投机者的损失负责。诉讼的结果是，法国的民事和教会当局要求修改教团的章程，并削弱总主教的权力。对于这一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回答说："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让他们保持现状，或者让他们根本不存在"。随后，针对该社团的法令接连不断，直到1767年，其成员全部被驱逐出法国。同年，西班牙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既针对本国也针对其殖民地。仅仅从西班牙，就有近六千名牧师被立即驱逐，其间必然会有巨大的痛苦。那不勒斯和帕尔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波旁王朝的法院联合起来取缔了这个教团，并共同在罗马要求废除它。1769年，在他们的影响下，方济各会的红衣主教甘加内利被选为教皇，名字叫克莱门特十四世。他花了一些时间来考虑人们要求他接受的建议。他最终决定取缔耶稣会，尽管据说他曾在7月21日说过，教皇在发布消灭这个协会的法令时，是在签署自己的死亡证书。

事实上，在法令颁布后大约一年内，即1774年9月22日，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世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做准备，但这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克莱门特的圣谕--Dominus ac redemptor noster--为废除该教团的圣谕是最仔细和精心编写的。没有留下任何漏洞来规避，或以任何方式规避其严格而全面的规定。该法案所依据的理由是，耶稣会士已成为多种纷争和动乱的源头。如果对他们的具体指控没有明确的认可，那么，教皇对指控者的同情是非常明确的暗示。只有在不承认教皇的土地上，即在俄罗斯和由弗雷德里克二世统治的普鲁士，该教团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在普鲁士，它被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废除了。在随后的教皇诏书中，耶稣会被授权在北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拿破仑垮台时，正式恢复了该组织，并撤销了针对它的法令，这是代表〝王位和祭坛〞的反动的一个成果。

耶稣会的衰落归因于他们自身的严重错误，以及对耶稣会创始人所珍视的理想的实际放弃。他们已经被世俗和对葡萄牙的渴求深深地感染了。他们渴望成为葡萄牙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但其他原因也有力地促使他们被镇压--当时的自由思想精神，对教会控制和影响的不耐烦，以及政治家和王公们想统治而不是被教会统治的倾向。耶稣会士被驱逐后的十年里，葡萄牙政府一直在与教廷发生冲突。庞巴尔的改革包括一些措施，如禁止在没有国王授权的情况下发布针对任何国家官员的公文，以及废除众多的修道院和监狱。为了教育人民，各种类型的学校纷纷成立。王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正向高度繁荣迈进。但君主的去世，使他对庞巴尔的信任达到了顶点以后，随之而来的是这位大臣的倒台，以及他的许多最有利的工作被破坏了。

在其他地方，类似于国家独立和减少外国教会影响的改革也在积极进行。

巴瓦-约瑟夫二世的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三世是一位虔诚而忠诚的天主教徒，他制定了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改革。但他在位时间太短，无法保证这些变革的持久性。最显著的是教皇制度。

在奥地利的约瑟夫-伊尔皇帝的主持下，在这个方向上发生了运动。这场运动的准备工作是通过出版一本关于 ″教会状况和合法性 ″的杰出著作来完成的。这部作品以Febronius的名义出现，但真正的作者被证明是特雷弗选帝侯的副主教Nicholas von Hontheim。这部作品主张高卢教派的学说，即大公会议的地位高于教皇，以及主教的平等地位，在这些主教中，教皇只有简单的首要地位，而且他可以被剥夺这一地位。它否定了教皇在自己教区以外的其他教区的权力，并将他对其他主教的职能限制在提供咨询和训诫上。公会的法令不需要教皇的批准，也不需要教皇来召集它。非布罗尼乌斯的书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它在罗马被立即谴责。经过巨大的努力，1778年，年事已高的作者被劝说撤回了书稿，随后他又写了一篇评论，其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没有改变。

约瑟夫二世于1780年继承了他母亲玛丽亚-特蕾莎的职位。第二年他颁布了《宽容法令》。在它的庇护下，许多新教教会在奥地利各州成立。继这一措施之后，又有一些与费布罗尼乌斯的思想相一致的激进的立法行为。在所有对外管理和崇拜的问题上，教会都要由君主来管理。教皇的管辖权被缩小到最窄的范围。未经皇帝同意，他不得向皇帝的臣民授予任何头衔，未经皇帝的明确许可，也不得在其境内公布任何教皇文件。修士们不受制于任何外国上司。在婚姻问题上不得向罗马上诉。约瑟夫甚至下令发布In coena domini圣谕，在该诏书中，乌尔班八世（1627年）宣称圣彼得教廷的特权，以及克莱门特十一世颁布的反对詹森派的指令，被从仪式书中撕去。不久之后，国王废除了所有不积极从事教育或慈善工作的教会,并将其财产转为教育基金。

他要求教会的服务以白话文进行（1774-1799）。

由于这些创新，约瑟夫曾一度想模仿教皇的做法。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切断了奥地利与罗马的联系，从而使亨利八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由于明智的政治家们的建议，使他相信他的行动对他的人民来说太快了，他在没有废除他的法律的情况下，努力避免与教皇的决裂。他试图在荷兰引入并执行类似的法规，但遭到了抵抗，并在1789年导致了一场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约瑟夫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废除了他的一些条例；在他的继任者弗朗西斯二世的领导下，奥地利领地内以前的宗教地位逐渐得到恢复。

约瑟夫二世的榜样是有感染力的。1786年，在埃姆斯召开了一次天主教大主教大会或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 "标点 "方案，确定了对主教和大主教权利的改革，以反对一切伪伊西多尔式的特权是由罗马行使的。如果对德国教士的判决提出上诉，必须由教皇任命的法官进行审查，但必须是德国人，并在德国开庭。对寄往罗马的钱财设定一个限制。这样进行的改革受到了阻挠，部分原因是教皇的精明管理，部分原因是马扬斯选帝侯的自私政策，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人们的思想转向其他渠道。1780年，托斯卡纳大公彼得-利奥波德（Peter Leopold）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努力，他想效仿他的兄弟约瑟夫二世，通过扫除罗马的僭越行为，改善教育等，但由于托斯卡纳的主教们拒绝与他合作，因此证明是失败的。前面提到的不同国家的各种改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思想精神的产物，与深刻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且完全是王公和内阁的工作，无法在土壤中深深扎根。它们表明，教皇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崇敬中只有微弱的地位。

在十八世纪德国教会事务的记录中，一个显眼的位置崛起，或者说、摩拉维亚人的改组。摩拉维亚人，或称 "联合兄弟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来自于"波西米亚弟兄会"，是胡斯派基督徒的一个分支。这些人既不属于卡

利克斯廷派，也不属于泰波尔派，这两个主要党派在其领袖去世后被分成了两派。

根据他们的知识程度，他们以简单的忠诚珍惜基督教的精神。当新教兴起时，他们与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都有来往，但对后者更有同情心。1722年，以及随后的七年里，相当数量的这些 ″弟兄们″，在克里斯蒂安-戴维的带领下，由于在他们的家中受到迫害，因而被津岑多夫伯爵在他位于撒克逊州贝尔特斯多夫的庄园里接收。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Herrnhut的村庄，或者说，″主的守望″。在那里，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加入了他们，一段时间后，津岑多夫在他们中间住了下来，并成为他们的主要向导和牧师。他的祖先曾在奥地利拥有财富和地位。他于1700年出生在德累斯顿。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由祖母抚养长大，祖母对被称为 ″虔诚主义 ″的宗教运动充满了同情，而斯佩纳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年轻的津岑多夫在哈勒的文法学校学习，师从同一学派最虔诚的领袖之一弗兰克（Francke）。在维滕贝格，他继续学习法律，因为他的亲戚反对他进入牧师行列，而他又强烈倾向于此。他不失时机地通过激励他人重新认真对待基督教生活来行善。在德累斯顿，他在撒克逊政府下的一个职位上，主持了斯佩纳所建立的那种宗教集会。最后，在1737年，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与摩拉维亚定居点有关的上帝的服务，并被按立为主教--他们中的尼奇曼（Nitschmann）在他的影响下，曾于1735年被居住在柏林的摩拉维亚主教中最年长的雅布隆斯基按立为主教。在此之前，津岑道夫已被接纳为路德教派的牧师。他的宗教工作所特有的狂热，以及他教学中的某些细节，使坚持路德教传统方式的撒克逊政府将他排除在撒克逊州之外约十年之久（1736-1747）。他在法兰克福继续他的宗教工作，在荷兰和英国旅行，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并在1741年再次航行到美洲。他在他所访问的国家建立了摩拉维亚机构的新分支。他不仅通过口耳相传，而且还通过大量的摩拉维亚著作，指导和激励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教导的组织。然而，他的主要才能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摩拉维亚人通常聚集在城镇，并拥有其范围内的土地。在

当地教会或镇上，他们被分成若干班级或 ″唱诗班″，每班由一名长老或女执事领导。他们的教会事务由一个精心设计的委员会和会议系统来管理。主教们没有各自负责的教区，而是集体看管整个团体的精神福利。津岑道夫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教会中的教会。他的目的远不是要建立一个与国家教会对立的教派，摩拉维亚社团就是在国家教会中产生的。他的神学，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福音派的路德宗。但更多的热情和宗教情感的注入，使当前正统观念中较为僵硬和冷淡的表现者感到反感。他所采用的用抽签来决定有疑问的重要问题等做法，被视为迷信。奢侈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津岑道夫的赞美诗中，关于信徒与耶稣的交流，以及在崇拜者的沉思和祈祷中偶尔将天父推向背景的倾向，自然使一些人，如杰出的神学家本格尔，感到不快。他们并没有被指控缺乏真正的奉献精神。由于宗教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将热烈的情感与安静祥和的类型相结合，津岑道夫的团体与当时任何其他新教团体都无法比拟的传教热情联系在一起。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向全球各地派出了他们的福音使者。同时，他们在唤醒路德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昏睡状态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为传播更加活泼的虔诚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学校吸引了大量与摩拉维亚教会没有关系的人；″在漫长而沉闷的理性主义时期，他们为古老的福音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以及它神圣的承诺和光荣的希望。″

十八世纪的一个宗教现象，具有相当反常的性质，就是瑞典堡主义的出现。

伊曼纽尔-瑞典堡是路德教派主教杰斯珀-瑞典堡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有修养、正直、虔诚的人。他在幼年时就对宗教感兴趣。他成为厄普萨大学的学生，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且非常精通数学和物理科学。他游历了很多地方。三十年来，他在梅佩斯学院担任重要职务，并与国王查理十二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写了不少于七十七篇论文，内容涉及他对科学课题的研究，显示了他不懈的努力和对这些研究的非凡能力。就在1743年，他第一次相信自己看到了基督的异象，并被带入了与天使的直接交流，对超自

然的存在状态有了直接的精神直觉。天堂和地狱向他揭开了面纱。他与离世的人进行了实际的交谈。这种交流和感知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结束，是一种非常频繁的经历。瑞典堡的追随者认为这是真实的；不相信他所提出的主张的人认为他是受到幻觉的影响。如果怀疑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是一个天才，那就错了。

在他临终前，他证实了向他透露的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性。瑞典堡的体系在许多出版物中得到了阐述，其中 "天文学 "是其中之一。"Arcana Coelestia" 是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以及大量仍未印刷的手稿。该体系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自然与宗教、自然科学与宗教教义或猜测的联系。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其中外在的和可见的是内在的和精神的对应物。在这一点上，他让我们想起了诺斯替派和其他神学流派。他在许多方面与普通的教会神学有分歧。他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上帝是无限的，他的本质是智慧和爱，但他以人类的形式存在，当然，是非物质的形式；因此，人实际上是按上帝的形象存在的。有一个对应的法则，具有广泛而多样的应用。外部世界与人的本性相对应。人是一个微观世界；他在外部自然界中被模仿和预示。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事实上，在新约里有三重意义--字面意义；属灵意义，指的是主的国度；以及属天意义，与主本身有关。创造不是从无到有，而是来自上帝的爱，通过他的智慧的作用。这是对物质的理想理论的一种接近；但瑞典堡对泛神论保持清醒。人类的堕落带来了精神感知力的丧失，以及遗传性的邪恶，然而这并不都是来自于我们最初的祖先。"它包括愿意，然后思考，邪恶"。

瑞典堡在其一生中曾在英国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那里和德国，以及在瑞典，他都有追随者，他们以社团的形式联合起来。1788年，他们中的一个团体开始在伦敦进行公共礼拜。瑞典堡认为，主的第二次降临发生在1757年，当时精神世界向他揭开了面纱。天堂和新地，以及《启示录》中预言的新耶

路撒冷，在1771年出现，当时瑞典堡教会诞生。瑞典堡的追随者们，根据这一想法，将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新耶路撒冷教会″。

==========

第三章

十八世纪英国的宗教和美国的复兴

在十八世纪，直到卫理公会的兴起，英国的宗教状况是这样的，迫切需要进行一次大改革。福音下各党派的活生生的信仰的衰落并没有减轻教会争斗的苦痛。

只要威廉三世还在世，坚定地坚持主教制的低等教会党就一直在进行改革。辉格党人，即使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的革命的作者和支持者，也倾向于支持《宽容法》的原则。但是，温和的或偏激的教会人士，在威廉政府的支持下，没有能够使理解的政策合法化。安妮女王于1702年作为她姐夫的继承人继承了王位。她倾向于站在高级教会人士和托利党一边。虽然主教们站在对立面，但大多数神职人员和大学都热衷于反对这种做法。对被废黜的斯图亚特家族的依恋是广泛的，是辉格党政治家们必须经常考虑到的一种潜在但危险的力量。1709年，Sacheverell博士的案件体现了高级教会人士和托利党情绪的力量，他性格软弱，才能低下，但由于上议院谴责了他的两篇布道，其中谴责了《容忍法》并主张消极服从的学说，他一度被提升为英雄的地位。

在他暂停传教的判决期满后，他收到了来自上议院和女王的荣誉证书。对反对派的压迫性法律的反应表现在更多的攻击性和恶作剧上。

根据1673年通过的《测试法》，所有被允许担任民事或军事职务的人都被要求按照英国教会的形式接受圣礼。非教徒偶尔与圣公会教徒一起参加圣餐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他们认为法律要求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但他们在当选为公职人员时还是愿意这样做。为了切断这类人的公职，1711年通过了《偶尔顺从法案》，根据该法案，对那些这样做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两年后，《分裂法案》获得通过，禁止行使校长或私人教师的职能，除非有符合规定的声明和主教的许可。在″教会处于危险之中″的呼声下，这些压迫性的法规直到下一个统治时期才被废除。即使在那时，《测试法》和《公司法》也不得不留在法令书上，因为反对废除这些法律的声音是如此激烈，而且许多赞成废除这些法律的人也很担心会在圣公会中发生分裂，或者爆发对汉诺威王朝的敌意。随着乔治二世的统治，宽容度有所提高。通过每年的赔偿法案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救济。直到1828年，这些法律才从法令书中被删除。乔治三世时期，教会完全与国王结盟。刑法典开始逐渐放松，因为它影响到罗马天主教徒和不符合规定的团体。然而，这是一个″停顿和不稳定的进展”，梅先生在他的″宪法历史″中是这样描述的：″有时，天主教徒得到宽恕；有时，某个特定的不服管教者的教派。先是一个冤案得到纠正，然后是另一个冤案；但议会在广泛宣称宗教自由是英国臣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政策方面继续退缩。对异见的容忍和纵容已经取代了积极的迫害；社会已经超越了法律；但在刑法典被抹去和宗教自由被确立之前，还需要经过一个世纪的争斗和鼓动。”

与此同时，在我们所提到的争斗中，实践宗教的事业正处于低潮期。

在上层社会中，不忠是一种时尚。巴特勒主教在 ″类比 ″的序言中说，它已经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但现在终于发现它是虚构的。″ 在其他地方，他在1751年写的一份指控中确认，那个时代的 ″可悲的区别 ″是 ″一些人公开蔑视宗教，而大多数人则越来越无视它。″ 斯威夫特院长（Dean Swift）是一类人的例子，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影响爬到教会中非常高的位置，甚至是最高的位置，他在170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 ″促进宗教发展的计划 ″的文章。他说，″在我们的有身份的人或贵族中，一百个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按照任何宗教原则行事的；″他还说：″低级道德的情况对普通人来说要好得多″。他对无宗教信仰的补救措施是让当权者将 ″宗教作为获得青睐和晋升的必要步骤″--这意味着宗教是指有礼貌的行为和去教堂！他认为，宗教必须成为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人！他敦促，必须使宗教成为 ″这个时代的转折和时尚″。沃尔波尔和许多其他政治事务中的杰出领导人在私人生活中都犯了不光彩的不道德行为。在下层阶级中，无法无天和恶习盛行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从霍加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道德和礼仪的公平画面，他是社会生活不同阶段的密切观察者。大城市因商业的发展而增长，但却没有为人民的宗教教育作出相应的规定。除了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创办的学校，没有新的教堂，也没有学校。犯罪阶层如此大胆，以至于生命和财产都不安全，而法律的残酷严厉和大量的处决，对激发他们的恐惧没有作用。教士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主教疏远，除了少数高贵的例外，他们都是无知和无能的。″那些读过一些书的人，″伯内特主教说，″却似乎从未读过圣经。″ 多元化的制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最微薄的支持，并使他们的社会地位降到了低点。可以说，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教士们不再被允许在会议上进行辩论。这是 ″班戈之争 ″的结果。在这个教士大会的下议院谴责了班戈主教霍德利的一篇布道，该布道明显倾向于自由的原则，而这些原则被不顺从国教的人认为是有利的，之后，1717年的会议被中止，从那时起直到1854年都没有处理任何事务。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的习惯是更多地谈论道德的细节，而不是福音的独特教义。讲台上的语

气是谨慎的平静和温和的。讲道的风格和讲法都是以传统的礼仪为主导。阿里乌主义（亚流主义）甚至是索西尼主义（否认基督的神性）在固定教会内外的神职人员中广泛传播。一种松散的订阅理论被采纳，为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接受《三十九条》开辟了道路；《三十九条》不仅强加于神职人员，而且强加于所有大学成员。对神论的驳斥经常提到基督教教义与自然神学的基本原则的基本统一性，而对启示的特点则轻描淡写。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伯克利、巴特勒、拉德纳和其他具有非凡才能和虔诚典范的作家都写过捍卫基督教的作品。然而，关于上个世纪的英国教会，有人说得很对，"它的主要特征是突出的可敬性；它的讲道具有那个辩证时期的温和口音"，正如约翰逊所说，"传道人们每周都会因被指控犯有伪造罪而定期受审。" 在大学里，形式主义和不信的状态，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虔诚的表现是一种嘲笑的主题。吉本于1752年被录取为马格达伦学院的学生,在他的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那个学习场所普遍存在的懒散、欢愉的习惯和冷漠、不精神的语气。"的确，在内心深处，英国仍然是宗教的。" 宗教在社会的中产阶级中根深蒂固。清教徒的精神并没有消亡。在许多教区的教堂里，在许多持不同意见的会众中，福音被忠实地宣扬并被实际接受。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生命气息，一种对旧真理的更有力的宣扬，这种宣扬可能会说服许多人的理解力，塑造许多人的行为，但却不再能深深地激起人们的情感，或在社会的怀抱中发挥一种革新的力量。

如果说十八世纪初英国的宗教呈现出平淡无奇的一面，那么也不乏精神反应的症状。有一些神学家倾向于在实际的宗教中给予感性和情感一个重要的部分。异教徒中的多德里奇和沃茨就是这样的人，在固定教会中，还有虔诚的托马斯-威尔逊主教，他是《Sacra Privata》和其他灵修书籍的作者。在所有其他作家中，导致所描述人物的精神觉醒的是威廉-劳。约翰逊博士说，他"认真思考宗教问题 "的第一个契机是在牛津大学读到了威廉-劳的《对神圣

而虔诚的生活的严肃呼吁》，他称这本书是 ″任何语言中最好的劝诫性神学作品″。吉本在谈到作者时说，他是一名家庭教师；″他说，″如果他发现读者心中有虔诚的火花，他就会很快把它点燃，″而且 ″他相信他所宣称的一切，并实践他所要求的一切″。约翰-卫斯理承认《严肃的呼召》和威廉-劳的另一部作品《基督徒的完美》播下了卫理公会的种子。威廉-劳是一个不顺从国教的神职人员，在乔治一世登基时不同意进行必要的宣誓。他是一个尖锐的神论者，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绝对必要性和神迹证据的充足性。但他的神秘主义倾向，是由雅各布-伯姆（Jacob Böhme）培养起来的，他是伯姆的忠实学生，导致了他思维方式的改变。洞察力，精神的照亮，神圣的恩典在灵魂中植入的新生命本身，他现在认为是福音的一个充分的验证。他赋予公义一个主观的、个人的特性。他教导说，基督受苦不是为了 ″平息愤怒的神性″；他承担了我们堕落的本性,克服了堕落带来的所有罪恶;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 ″一个出生，一个本性，一个成为上帝之子的能力″。除非无限的爱发现他们不可救药，否则没有人最终会失去（这能力）。他的主要论文的高尚品格和实质性的优点已经被不同学派的最有能力的评鉴者发现了。

在伊丽莎白时代结束时，戏剧的道德观开始沉沦。对戏剧的禁止伴随着对捕熊、斗鸡和赛马的禁止。1642年，议会规定舞台剧是非法的，因为它不符合英国的混乱和困境，而且 ″太常表现出淫荡的欢笑和轻浮″。复辟后，部分是由于英联邦时期妄图通过立法使人们变得神圣，戏剧又回来了，而且在喜剧作家的手中呈现出一种无耻的不雅。在威彻利和康格里夫等作家的主持下，戏剧蓬勃发展,在杰里米-科利尔最有力和有效的出版物中受到抨击。他的《英国舞台的不道德和亵渎的简短看法》于1698年印刷。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位雅各布派教徒和非法学家，不能被指控为清教徒的狂热分子。他的书不仅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而且产生了非常有益的结果。他轻而易举地拆穿了康格里夫的答案，并触动了德莱登的良知。威廉-劳的原则是比较禁欲的，因此他对舞台的谩骂比对舞台的尖锐指控更不分青红皂白。在这整

个问题上，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活泼的文章--"戏剧与清教徒"--揭露了许多当前的错误观念。

卫理公会是在圣公会的范围内产生的。由于形势所迫，而且与创始人的初衷和偏好相反，它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由于卫斯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组织天才，加上他的宗教热情，是它作为一个独特而有影响力的机构的存在的主要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八世纪，因为他生于1703年，卒于1791年。他是埃普沃斯校长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他母亲的精力和她对众多家庭成员的系统培训对发展和塑造这位未来使徒的能力和卫理公会改革的统治精神产生了影响。兄弟三人都是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学生，约翰首先被送到了特许学校。取得学位后，他被按立为执事，并被选为林肯学院的研究员。有两年时间，他协助他的父亲担任教区长。1728年，他被任命为牧师，不久后回到牛津，并成为林肯学院的导师。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小型社团，以培养个人的虔诚和行善。其中一个是他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另一个是怀特菲尔德，他比他们俩都年轻，是格洛斯特一个旅馆老板的儿子。他于1732年以仆人身份进入彭布罗克学院，在那里他发现他对公共场所的熟悉对他的勤工俭学很有帮助，因为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他靠这个谋生。这群年轻人阅读了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威廉-劳的《严肃的呼召》和泰勒的《神圣的生活和死亡》等著作。他们的虔诚带有强烈的苦行主义色彩。他们的规则之一是要求他们经常 "审视自己，是否已经简单和反省；是否在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中午进行了狂热的祈祷；是否在九点、十二点和三点进行了集体祷告；是否在周日三点到四点适当地思考了托马斯-肯皮斯;或在周三和周五十二点到一点思考了激情。" 他们经常吃圣餐。他们还访问救济院和监狱，并努力指导和安慰受苦的人。由于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卫理公会 "（译者注，英文methodist意

思是“方法论者”，或“循道者”）一词被他们的同学们作为绰号附在他们身上。1735年，约翰-卫斯理在其兄弟查尔斯的陪同下，作为传教士前往乔治亚。船上有一些摩拉维亚人，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斯潘根伯格，后来成为主教。卫斯理--他的禁欲主义倾向使他在航行中承担了不必要的不适--被这些人在暴风雨中的平静所打动，而其他乘客都因恐惧而激动。上岸后，他向斯潘根伯格咨询了关于他要在奥格尔索普的殖民地开展的宗教工作。″我的兄弟，″这位摩拉维亚牧师说，″我必须问你一两个问题。你的内心有见证吗？上帝的精神是否与你的精神作证，你是上帝的孩子？″卫斯理被这些询问所困扰，并被内心的疑虑所打动。他在教会纪律问题上采取了不太明智的做法，在那里有可能被指控受到个人怨恨的影响，这加速了他在离开两年后返回英国。在回国的航程中，他又一次受到折磨，因为他在一场风暴中发现自己并没有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到达英国后，他寻求摩拉维亚人的帮助，并从伦敦的摩拉维亚传教士彼得-伯勒那里得到了许多精神上的帮助。卫斯理一生都在追求″圣洁″，正如他真实地承认的那样；但他未能达到心灵的平静。他的兄弟查尔斯在精神进步的这一步上比他早了几天。但在1738年5月24日下午，这位兄长从圣保罗大教堂的一首国歌中得到了安慰，晚上，在摩拉维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聆听了路德对《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的宣读。路德关于自由救赎的话语唤醒了他内心的转折点，他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快乐的保证，他认为自己的罪已被赦免。他认为自己到现在为止对公义的问题还一无所知。他与摩拉维亚人建立了联系，并在赫恩胡特进行了为期几周的访问。回到伦敦后，他开始在该市和附近地区不断传道，不仅在教堂，而且在救济院和监狱。他在布道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火力，他对未悔改的人的直接呼吁，他对立即皈依信仰的呼吁，以及他对信仰的全能力量的介绍，作为摆脱罪恶和恐惧的基础，以及罪恶的解药。

怀特菲尔德的经历，就其本质上的魅力而言，与卫斯理的经历并无不同。在他内心的挣扎中，有一个时刻，他敢于相信上帝的怜悯，并突然发现压迫他

的负担已经消失。他的目标是在别人身上重现类似的经历。就在卫斯理从路德那里学到和平之道的同一年，怀特菲尔德开始在布拉格附近的金斯伍德露天讲道。他开始了在半农半牧的佃农中传道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向他们宣扬福音。他开始时是小规模的集会，但很快所有阶层都涌向山坡，在那里，有史以来最有说服力、最感人的演说家之一，以其悲怆的论述激起了所有人的心。″树木和篱笆上挤满了谦卑的听众，田野被密集的人群遮盖。伟大的传教士的声音以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传遍了这群人的外围。″″很快就可以看到泪水在被煤矿熏黑的脸颊上形成白色的沟渠。然后呜咽和呻吟声告诉人们，坚硬的心被他的话语融化了。一把火在金斯伍德的弃儿中被点燃了，这把火烧得又长又猛，几年后注定要烧遍整个大地。″约翰-卫斯理对 ″体面和秩序 ″的天生热爱，起初对这些在教堂墙外传教的试验感到震惊。这种偏见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在布里斯托尔加入了怀特菲尔德，并开始亲自向广大听众讲道。他很快就开始组织那些因布道而皈依的人。那些依附于新传教士的人组成了社团。这种做法一点也不新鲜。以前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与英国教会有关的祈祷和宗教改良协会。这些新的组织也是如此，目的只是为了辅助教会的工作。摩拉维亚社团向卫斯理提出了他的秩序和纪律体系中的几个主要特点。这些社团的成员被分成几个小组，或几个班级，在领导人的主持下，相互监督，促进灵性。然而，卫斯理任命了非专业的助手，并最终允许他们举行布道会。这是另一项重要措施。这些传教士成倍增加，全国终于被划分为 ″巡回传道区″，以使所有人口都能得到帮助。在伦敦的 ″铸造厂 ″开办了一个布道所，布道所的数量迅速增加。然后，卫理公会成员结合成一个明确的组织，被称为 ″联合协会″，这个名字是从摩拉维亚人的名称中抄来的。1740年，卫斯理完全脱离了他们（摩拉维亚人），原因是逐渐产生的相互反感。他抱怨他们有所谓的反传统的倾向和其他一些奇怪的教义，以及某些令人不快的习俗和仪式的特殊性。实际上，摩拉维亚人在 ″静默 ″中等待保证的恩典的方法，以及他们所珍视的那种情绪、那种安静主义，都与卫理公会更积极、更热情的脾气相抵触。

建立一个教派，或以任何方式打破与英国教会的联系，这不是卫斯理的设计。他以真诚的态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放弃了这种意图。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说：″我再次声明，我生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死也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任何重视我的建议的人都不会脱离它”。这只是众多相同目的的声明中的一个。查尔斯-卫斯理更坚决地坚持这一立场。但约翰-卫斯理，令他的兄弟非常反感，感到不得不采取一种在法律上和实际上涉及分离的做法。他开始相信长老和主教是同一等级的，他有权利按手礼，也有权利主持圣礼。他按立了科克，并授权他按立阿斯伯里，作为美国卫理公会的监督人或主教。他还按立了传教士，在苏格兰和其他外国地方服务。此外，根据《宽容法案》的规定，他最终不得不对他的小教堂进行登记，以保护它们。他通过一份信托契约，将它们交给一百名传教士负责。他因此赋予卫理公会一个独立的法律地位。最后，他拒绝允许他委托的传教士在英国主持圣礼；但1793年卫理公会会议授予他们这一权利。因此，起初作为英格兰教会的附属和补充而设立的工具，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而紧凑的教会机构。

卫斯理的所有合作者中最圣洁的是马德利的弗莱彻。他在瑞士出生并接受教育，年轻时去了英国，并于1755年在教会中受命。他选择了马德利的约翰-弗莱彻教区。在那里，他以罕见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投身于传道和牧养工作。他近乎天使般的优秀品格给所有见到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西写道：″没有一个时代或国家产生过一个更热切的虔诚或更完美的慈善的人;没有一个教会拥有过一个更有使徒精神的牧师。”在他死后，卫斯理本人也这样评价他：″我与他亲密接触了大约三十年；在几百英里的旅程中，我从早到晚与他交谈，没有丝毫保留；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从未听到他说过一句不当的话，也没有看到他做过一个不当的动作。如此无可指责的人物，在各方面都是如此，我在欧洲和美洲都没有发现；我也不指望在永恒的这一边再找到这样的人。″弗莱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热切的感叹：″上帝就是爱！″他在神

学观点上与卫斯理完全一致。他的《对反传统主义的制衡》仍然是卫理公会的一部经典作品。

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的名字将永远光荣地与改革联系在一起，在这场改革中，他们是卫斯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但在1741年，怀特菲尔德第二次访问美国，并在那里得到了爱德华兹对他的加尔文主义观点的确认之后，他们（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两人）之间的教义分歧使他们的道路发生了分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事业都与对方不同。卫斯理在神学上倾向于阿米念主义。他对圣灵的需要的强调，以及弥漫在整个卫斯理运动中的热忱，使卫理公会的阿米念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体系，与荷兰和英国的旧阿米念主义之间产生了最广泛的差异。卫斯理派的信仰是火热的阿米念主义。但也许没有人比约翰-卫斯理更强烈地反对加尔文主义的拣选原则。在卫斯理的教导中，还有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就是他关于基督徒完美的学说，他认为信徒在今生就可以达到，而且是瞬间达到。信仰是完全的圣洁和完全的宽恕的来源。卫斯理所说的完美并不是指那种绝对的法律上的纯洁，因为它免除了每天为赦免罪孽而祈祷的需要； 他指的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爱在心中的不间断统治。卫斯理派的布道使一切都转向对基督作为救主的接受或拒绝。它的教义是将希望的保证作为所有人的特权，并将完全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它在宣布向每一个犯罪者提供免费的、完全的救赎时，也包含了这一教义。无论对福音的这种解释有什么看法，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始终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信息的使者。

拥有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亨廷顿夫人，成为怀特菲尔德所领导的运动传道分支的女赞助人。在离〝铸造厂〞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会堂〞，作为布道的场所。她在巴斯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并在大不列颠的不同地区建造了其他小教堂。她在特雷维卡建立了一所教育传教士的学院。她非常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将它们与固定教会分开，因此不得不将它们登记为不同的礼拜场所，以便持有财

产。她个人的努力主要是针对有地位的人的改变。对一些人产生了印象；另一些人则对传教士的朴素教导感到震惊。白金汉公爵夫人在参加了巴斯的礼拜堂后写道：″有人告诉你，你的心和地上爬行的普通人一样有罪，这太可怕了。这是非常令人反感和侮辱的；我不能不奇怪，你的夫人会对任何与高尚的地位和良好的教养相抵触的情绪感兴趣。″ 怀特菲尔德卫理公会的相当一部分人最终被吸收到独立团体中。″威尔士加尔文卫理公会 ″接纳了许多教徒。怀特菲尔德的布道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感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冷静和谨慎的典范，为了乔治亚州孤儿院的利益，掏出口袋里的硬币，尽管他并不赞成募捐的目的。像休谟这样冷血的哲学家，以及像博林布鲁克和切斯特菲尔德这样的世外高人，都很欣赏他的行为。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听他讲道时，整个讲道过程中都在流泪。怀特菲尔德13次穿越大西洋。他最终在纽伯里波特结束了他的生命。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在通往他寝室的楼梯上，有一群人出于对他的渴望而来到他家门口。他讲道，直到他手中的蜡烛的灯芯燃尽。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没有得到体制内的权贵们或大多数神职人员的青睐。他们不得不在大厅、谷仓，或在室内布道和露天布道之间做出选择，并保持沉默。约翰-卫斯理，被拒绝进入埃普沃斯的讲坛，在一个星期内，每天日落时分，站在他父亲的坟墓上，在教堂院子里讲道。他的讲道经常在许多听众的心中激起难以控制的情绪。尖叫声，痛苦的痉挛，以及尖叫和身体的扭曲，有时与福音书中记载的鬼魂现象并无不一样。这样的表现让他的兄弟查尔斯和怀特菲尔德感到不快。它们是在粗鲁和未受教育的人中经常出现的认真和激昂的布道。早期皈依卫理公会的人，不完全是但主要是来自这个阶层。没有一点可能自然地引起不利的批评。卫斯理和其他领导人采用抽签的方式，或随意打开《圣经》中的一段文字，以此来确定未解决的责任问题，这种习惯被谴责为一种迷信。许多头脑清醒的基督徒不赞成对那些不涉及在某个明确时刻改变心意的虔诚证明感到满意的倾向。对于那些气质使他们无法被激

发出热情的人，有时会以审查的精神来评判他们。简而言之，卫理公会是宗教感情的一次大爆发。正如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预料的那样，邪恶与善良交织在一起。这场运动的优点和好处远远超过了随之而来的邪恶和错误。在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脚步声中，道德的改革和犯罪的减少都证明了这一事实。如果这种精神生活的巨大振奋没有在歌声中得到表达，那就太奇怪了。卫理公会的诗人是查尔斯-卫斯理。他的赞美诗的显著优点表现在与他自己的神学信条不同的宗教团体对它们的欢迎上。

在这两位领袖中，怀特菲尔德的自然脾气更加和蔼可亲，更有吸引力；在悲情的卫斯理和演说方面，他没有任何对手；口才方面没有人可以比拟。无论是在学识上还是在思想的丰富性上，他（怀特菲尔德）都没有超过普通人的水平。我们在他的布道中徒劳地寻找任何原创性的标志。他对情绪和冲动的尊重，近乎于幼稚。约翰-卫斯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拥有丰富的学术知识。他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逻辑学家，但他身上的品质、道德和智力的结合，使他在宗教创始人中享有杰出的地位。他把某些明确的努力目标摆在面前，并以清晰的目光、无畏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步伐向实现这些目标前进。

卫斯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的工作成果比之前的五十年还要大。当会议在1790年举行时，联合王国有115个巡回区。循道卫理公会，294名巡回传道人，以及71,568名成员。不同国家的巡回区总数为240个；传教士为541人；成员为134,549人。在国外有19名传教士。在传教士会议中，卫斯理和他的兄弟查尔斯是唯一的负责人。然而，他建立了与他们进行协商的习惯，因此，在他死后，他们准备成为一个自治机构。鉴于他的工作在许多地方所产生的效果，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我的教区就是世界"。

如果怀特菲尔德不是既定教会中福音派的创始人，那么他为发展福音派和促进其成长做了很多工作。这场运动被描述为清教主义在英国教会的复兴。在

与之相关的传教士和作家中，有威廉-罗曼（1714-1795），他的加尔文主义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严格；亨利-文恩（1724-1797），他和罗曼一样，隶属于亨廷顿夫人的关系，直到她在1781年采取 ″分离 ″或分离行动，他写了《人的完全义务》，这是一部真诚而有力的实用虔诚的作品； 约翰-牛顿（1725-1807），奥尔尼的牧师，他自己从极端堕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经历使他有资格向所有受悔恨折磨的人提供建议； 诗人考珀（1731-1800），他的病态精神没有被蒙蔽，而是得到了福音派宗教和牛顿的同情的帮助和安慰；托马斯-斯科特（1747-1821），牛顿在奥尔尼的继任者，《真理的力量》和《圣经注释》的作者，这两本书都广受欢迎，其中第一本书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精神经历；约瑟夫-米尔纳（1744-1797），福音派的教会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是为了描述基督教所带来的好处，以便他的读者可以通过叙述得到启发。作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汉娜-莫尔（1745-1833）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崇。随着十八世纪接近尾声，福音派在英国教会中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结构紧凑的团体。演说家和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对他们的事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除了他的榜样作用和他在议会中的慈善工作外，他在1797年出版了《对本国中上层社会盛行的宗教制度的看法，与真正的基督教的对比》。这部作品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不顺从国教的团体以及英国教会都感受到了卫理公会复兴的气息。在本世纪前半叶，三个主要的异议（即，不同于英国国教教会、或圣公会）宗教的教派，即长老会、独立派和浸信会，其中前两个教派的人数最多，他们的牧师队伍中都有当之无愧的杰出人物。卡拉米（1671-1732）是长老会成员，也是伦敦不从国教的神职人员中的领袖。瓦特（1674-1748年）和多德里奇（1702-1751年）是独立教会中闪耀的光芒。很少有实用的书籍比多德里奇的 ″宗教在灵魂中的兴起和进步 ″更被阅读和重视。在浸礼会中，约翰-盖尔（1680-1721）因其圣经和东方学问而享有盛名。不从国教者的布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教徒时代的虔诚，尽管布道的形式和风格有所改变，以适

应后来的文学品味标准。阿里乌派的推测在长老会和独立派的圈子里得到了一些青睐。在公开和严格共融的问题上，浸礼会成员并不完全一致。绝大多数人支持后一种观点。他们中的主要分歧在于普通浸信会和特殊浸信会之间。前者是阿米念派，后者是加尔文派。1770年，普通浸信会中较为正统的那部分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新连接″的协会。在安德鲁-富勒（1754-1815）著作的影响下，特定浸信会的加尔文主义呈现出一种缓和的形式。

在英国，公开共融的信条随后得到了传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杰出的传教士罗伯特-霍尔（1764-1831）的雄辩教学所促成的。卫理公会受到了不顺从国教的牧师和教会不同程度的同情。卫斯理派对加尔文主义的攻击，有时采取严厉的谩骂形式，阻止了许多人的合作，而这些人基于其他理由，对复兴并不友好。对于怀特菲尔德的一些程序和方法，甚至像沃茨和多德里奇这样的人也自觉地不予赞同。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许多在卫理公会聚会上信主的人都进入了异议教会（即长老会、独立教会、浸信会），而这些教会，特别是独立教会，在本世纪后半叶，由于灵性的提高和人数的增长，都要归功于卫理公会的改革。

一场宗教复兴，虽然起源稍早，但与英国的复兴有着共同的重要特征、发生在美国。在新英格兰，如同在新国家的旧教中一样，阿米念主义已经广泛传播。讲台上的教导是说教，而不是鼓动人心。它的语气是庄重的，但更多的是对理解力的呼吁，而不是对感性和情感的呼吁。它主要讲述了人对上帝和他的同胞的几种义务，并突出了基督教的道德层面。新英格兰定居者把要求证明重生作为加入教会的一个条件。因此，已皈依和未皈依的人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这一点在布道的特点中显而易见。 在马萨诸塞和纽黑文殖民地，公民的特权仅限于教会成员。只有他们可以投票或担任职务。但这与扩大教会范围的运动没有关系，该运动允许那些可能没有自称经历过灵性改变的人与教会有部分联系。“半途之约″最终被广泛采用，根据这一规定，

在婴儿期受洗的人的孩子被允许接受洗礼，条件是他们的父母同意教会的盟约，并同意服从教会的纪律。对以前制度的另一项创新是接受未信主的人参加主的圣餐，作为一种〝恩典的手段〞。这两种做法都在具有认真性格和加尔文主义观点的牧师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倡导。1727年，乔纳森-爱德华兹成为北安普顿的牧师，先是作为他祖父斯托达德的同事，1729年他祖父去世后，他成为唯一的牧师。爱德华兹出生于1703年。他于1720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在年轻时，他就表现出很高的智力，尤其是形而上学方面的天才。他告诉我们，他读洛克的时候，就像一个守财奴数着他的金子一样热切。他的虔诚是最深刻和真诚的。他将神学研究中最敏锐的逻辑和最大的热情与神秘主义者特有的虔诚和沉思的心态融为一体。他的日记记录了天上的异象，或几乎配得上这个名字的经历，关于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美丽。他确信半途之约和接纳未信主的人加入圣餐是错误的，因此公开反对这些习俗。他的布道是深思熟虑的，有论据的，但又是平实的，有探究的。他的讲道，几乎没有任何行动，都是根据手稿进行的，但却带有明显的信念和感情的深度，被比喻为〝白热化〞。1734年，他的教区开始出现宗教兴趣的觉醒，这种兴趣充斥着所有阶层的人。教堂里增加了许多皈依者，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非常多。类似的复兴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大约在同一时间，新泽西州也出现了宗教觉醒。1739年，在宗教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重新开始了。就在1740年10月，新英格兰，怀特菲尔德，当时还是一个25岁的青年，在他第二次访问美国时，在中部和南部各州以及新英格兰东部进行了巡回宣讲，效果明显，他在北安普顿拜访了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夫人于1740年10月24日写信给她在纽黑文的兄弟：〝他比我们美国的传教士一般不讲教义，而是更注重影响人的心灵。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你们已经听说过他那深沉而又清晰悠扬的声音。它是完美的音乐。看到他通过宣讲《圣经》中最简单的真理而对听众产生的魔力是多么美妙。我曾看到一千多人屏息凝视他的话语，只有偶尔半压抑的抽泣声打破了这种沉默。他给无知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不乏受过半点教育的人和文人。”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和其他人的努力，在新英格

兰的许多地方都有复兴的迹象。在复兴的传道人发表演讲时，有时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表现--幻觉，以及类似的情况。 其他强烈的情感表现--如眼泪和可听到的赞叹声并不罕见。

怀特菲尔德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推动复兴的主要工作是由特南特家族的三位传道人承担的。他们中最年长的威廉-特南特（William Tennent）在费城以北20英里的内萨明（Neshaminy）建立了新泽西州的一所 ″木制学院″。这所神学院是普林斯顿学院的前身。他的儿子吉尔伯特和威廉都是强有力的传教士，两人--尤其是前者--在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工作中积极开展合作。在那个地区，就像在新英格兰一样，教会分裂是复兴运动的一个伴随因素。长老会，其中苏格兰和爱尔兰元素的影响很普遍，指责——复兴的传教士是狂热分子，为重生设立了情绪化的标准，并宣布他们认为不符合这种主观测试的牧师和人民未被皈依。保守派还抱怨巡回传道人闯入他们未被邀请的教区，并指责他们煽动分裂和争论。这一方的追随者被称为 ″旧派″。复兴的拥护者，在新英格兰的影响下，被称为 ″新派 ″或 ″新光″。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它在各教会之间造成了分裂，这种分裂从1745年持续到1758年。

在新英格兰，出现了严重的骚乱和分歧。声称他们没有受到教区教堂讲道的启发的 ″分离主义者″，在东康涅狄格州形成了不同的聚会，特别是在东康涅狄格州。有人试图通过法律来镇压这些分裂的运动。对那些被认为是虔诚冷淡的牧师的不公正的谴责，以及类似的奢侈行为，给复兴的著名发起人带来了指责。怀特菲尔德本人也被不公正地认为是要取代旧派的正规牧师，用国外的牧师来代替他们。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新英格兰期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各种牧师协会，以及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都抗议神职人员和教会方面不再支持他。然而，他摆脱了这种不满，在他后来的访问中，在第二次访问之后，受到了许多以前对他冷淡的人的欢迎。对于复兴的成果，爱德华兹本人并不完全满意。他看到有许多不健康的兴奋。他悲痛地发现，

许多皈依者离开了。然而，他从未停止过认为这场运动总体上是上帝恩典的真正和最有利的工作。

==========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马天主教教会

法国革命至拿破仑垮台期间的罗马天主教教会

教会的状况；教会和神职人员在法国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反对特权阶层--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起义。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控制着众多的农民，还有来自什一税和其他来源的大量收入。他们充分享受到了贵族的深刻腐败，这也是大起义的主要诱因之一。教士们住在远离教区的地方，把他们的收入花在懒惰和奢侈的享受上。一般来说，普通教士都是无知的，而且工资很低。教会掌握着教育的全部管理权。教会支持波旁王朝国王的暴政。教会统治者缺乏对宗教的热情，为自由思想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开放的道路。在他们的统治下，宗教在法国的中下层民众中几乎失去了力量。教会帮助把胡格诺派赶出了国土，并以这种方式使国家失去了道德和保守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本可以阻止革命党陷入过度的行为中。许多主要的教会人士自己也沾染了不忠的精神。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脱下他们的长袍，成为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拥护者。

正是由于国库的枯竭，才使得1789年召开的总议会成为必要。教会，以其巨大的财富，不可能不成为一个问题和直接关注的对象。在对教会财产进行初步征收后，最终在奥屯主教塔列朗的提议下，教会财产被全部没收。根据规定，教会人士应从国库中领取固定的津贴。精明的塔列朗在随后发生的所有政治变化中，直到1830年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吸收教会财产之后，又废除了回廊修道院。教区被彻底改造，其边界与王国划分的新部门相一致。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主教，独立于其他教区。主教和牧师都由人民选择。然而，法国教会与教皇之间的联系不会断绝。对于这些措施，教皇和很大一部分神职人员自然是持反对态度的。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于新宪法的做法带来了一场冲突。教皇在1791年发布了一项圣谕，将所有已按要求宣誓的牧师置于禁令之下。这项谕令没有在法国公布，也没有被政府注意到。神职人员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遵守法律并进行了宣誓的人，另一类是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和牧师，他们和贵族们一起大量地从国内移居国外。1792年9月21日，国民大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1793年1月，他们宣判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死刑。贵族和教士的移民，以及外国势力为镇压共和国而采取的侵略性措施，在热心的革命者心中注入了狂热的暴力。天主教被正式废除，因为它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宗教是敌对的。

一个新的日历被制定出来，从新共和国的诞生日期开始。时间被划分为十天（而不是一周七天）的时段。因此，主日不再作为休息日或宗教纪念日而继续存在。

当一个代表理性女神的淫荡女人在古老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众多人群中被奉为敬仰的对象时，这些反基督教的程序被推向了高潮。民众在这种不虔诚的狂欢中走得如此之远。无神论是感性的。在这些运动中，神职人员也参与其中。巴黎主教戈贝和他的牧师们出现在国民大会上，并宣称他们以前欺骗

了人民，但以后他们将在自由和平等的崇拜者中占有一席之地。非宗教的狂飙突进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遏制。在恐怖统治时期，作为神论者的罗伯斯庇尔颁布了一项法令，大意是法国国家承认最高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和其他人的上台使政府暂时停止了对宗教事务的干涉。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即使宗教机构被踩在尘埃里，促使人们崇拜的本能也不能完全被扼杀。一个被称为神论者的教派兴起了，他们在巴黎有两万人，在其他城市也有。在巴黎，他们占据了十座教堂。他们的信条是有义务爱上帝和人类。但他们的热忱很快就消失了。1802年，他们被领事们排除在国家教会之外。

1791年，国民议会将阿维尼翁和维纳辛的教皇区并入法国统治区。教皇皮乌斯六世对这一攫取提出抗议。他与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盟国君主联合起来。

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胜利迫使皮乌斯在1797年同意了《托伦蒂诺和约》，在那里他放弃了对从他手中夺取的国家的所有权，将博洛尼亚、费拉拉和罗马涅等地交给了拿破仑建立的新的西萨皮纳共和国，同意支付3000万利弗尔，并允许法国人将罗马的珍贵手稿和艺术作品拿走。这些东西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被运往巴黎。教皇王国的共和情绪被法国人用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目的。1797年，罗马发生了一场叛乱，一位法国将军在这场叛乱中丧生，被法国当政者抓住作为占领教皇领土的借口。第二年，罗马共和国宣布成立。教皇被作为俘虏带走，不久后（1799年8月29日），他在法国的瓦朗斯去世。

法国当政者开始在宗教机构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宗教机构。他在所有的措施中都小心翼翼地保护民事权力和他本人作为其首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教皇的特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1801年，他与教皇庇护六世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宣布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因此受到政府的保护。移居国外的神职人员将放弃对他们所离开的职位的所有要求。为了结束两类教士之

间的区别，所有教士都要辞去他们的职位，并被重新任命。大主教和主教将由政府任命。教皇将向他们授予教规制度。属于法国国王的权利将归于执政官。第二年（1802年），拿破仑颁布了某些教会组织法。这些法律是根据古老的高卢自由原则制定的。教皇的命令，甚至是总理事会的命令，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都不能在法国公布。作为对教会法庭的辩护，可以诉诸于民事法庭。修道院被废除了。神学院的所有教师都必须签署1682年法国神职人员的宣言。尽管教皇反对这些法规，但他还是在1804年来到巴黎，为拿破仑加冕。

当几年后（1808年），法国皇帝甚至要求设立一个由他自己任命的法国牧首，要求将他的法典引入教皇王国，废除回廊修道院和教士独身制的规则，并要求教皇与他一起加入反对英国的联盟，关闭他的港口以对抗敌人时，庇护七世拒绝遵守。作为惩罚，1809年，他（教皇）的国家被并入法兰西帝国。教皇针对所有不义的教廷攻击者发布了逐客令，拿破仑被私下告知他也在其中。教皇被作为囚犯，先是被带到萨沃纳，然后被带到法国。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庇护七世坚定地保持了他的立场。法国有27个主教职位空缺。一个 ″纯正的天主教徒″，即教皇的追随者，正在兴起，他们不得不秘密地举行仪式。拿破仑剥夺了庇护七世的红衣主教，甚至剥夺了他的私人秘书。1811年6月17日，皇帝召集了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并在被这位专横的君主解散后重新召开，皇帝的这一行动促使教皇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他被带到枫丹白露，1812年从俄国回来后受到了拿破仑的粗暴对待。最后，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但他（拿破仑）违反了一项规定，在教皇与他的红衣主教商讨之前就公布了该协议。这引起了教皇的警告，不要相信有关协约的报告。结果是对教皇的再次迫害，最终以拿破仑的倒台和盟国的胜利告终。1814年，庇护七世再次进入罗马。

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德国教会国家的世俗化。

它们（德国教会）被转化为民间统治下的社区。莱茵河省被并入德国。1810年，最后一个教会国家被废除，改为大公国。除奥地利外，德国的回廊修道院被废除了。在这一时期的冲突中，空缺的主教职位一直没有得到填补。当德国甩掉拿破仑的枷锁时，只有五位罗马天主教的老主教还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王公和教皇之间达成了协议，空缺的教会职位被填补。

在那不勒斯，它于1806年被法国人征服，并被交给约瑟夫-波拿巴，修道院一般都被废除，其财产被政府占有。拿破仑法典中有关民事合同婚姻的原则等，教皇非常反感，因此他拒绝向主教们提供教规。1808年，约瑟夫成为西班牙国王。宗教裁判所被废除了。1809年，回廊修道院都有了同样的命运。1813年，代表反对党或民族党的议会宣布，宗教裁判所与国家的民事宪法不相容。在欧洲的任何地方，拿破仑的影响都被认为是最高的，教皇的权力被削减，并从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像中世纪特有的修道院机构被扫除。中世纪被改造成了现代国家。

==========

第五章

拿破仑一世倒台后的教皇制度：基督教在欧洲国家

拿破仑的倒台使庇护七世回到罗马，并使他能够恢复行使教皇的权力。他回到了专制主义者的身边，成为普遍同情的对象，这是他的忍耐所值得的。

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现在，在欧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时，教皇可以自由地选择它将采取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了波拿巴并因此给予教皇自由的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并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俄罗斯是希腊人，英国和普鲁士是新教徒。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心中都渴望在君主制的形式下获得宪政自由。这种对专制政府的厌恶之情在法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它在德国盛行。它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南被热切地珍视着。不幸的是，在专制主义的方向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对潮流。革命时期的过度行为使人们对共和政府的一切感到恐惧。“王位和祭坛〞必须以其以前的尊严和力量重新建立起来。大陆的君主们在这种感情上是一致的。俄国一心想要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支持自由的运动。奥地利在精明的梅特涅的建议指导下，也有同样的想法。普鲁士在犹豫不决之后，与她的德国对手携手合作。三位君主之间的神圣联盟，大陆上的其他统治者也加入了这一联盟，虽然它包含了一个保证，即正义的治理和促进正义和宗教，但它是基于古老的合法性原则--国王的权力是上帝的直接恩赐，而不是来自他们的臣民的理论。人们一致认为，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平息任何地方的民众叛乱。

教皇支持绝对主义的事业。在中世纪，教皇被认为是人民的拥护者、教廷站在地方教会的一边，是人民的保护者。他们曾将自己置于伟大的运动之首，如十字军东征；在这些运动中，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激情被激发出来。当年，他们（罗马天主教人士）对这些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罗马教廷）在自己的父辈指导下，接受了盛行的尚武精神和民众对异教徒的仇恨的洗礼。但现在，他们的立场发生了逆转。他们（罗马教廷）完全不愿意交出他们地位的任何旧特权，以适应公众思想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新特点。他们（罗马教廷）在革命时代的痛苦经历，对自由主义的疯狂过度的回忆，压制教皇王国的反抗精神的愿望，法国和南欧的罗马热心支持者的报复性和不容忍的保守主义，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愿望和斗争的主流反应一边的额外理由。

在教皇院里有两个党派；一个是由红衣主教帕卡领导的泽兰蒂党派，主张废除法国在罗马国家的宪法，恢复教会教皇院。另一个党派，即自由党，由贤明的康萨尔维枢机主教领导，主张保留在革命时期被纳入政治制度中的有益的改进。他在这一值得称道的努力中取得了非常适度的成功。诚然，行政管理的统一性得到了保留；但职位却从普通人手中被夺走，落入神职人员手中。除了神职人员管理不善的弊端外，恢复教会财产还切断了公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此外，还涉及到一笔沉重的公共债务的产生。宗教裁判所和调查表，这些教士不容忍的旧武器，再次被拿出来。

对于整个教会，庇护七世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反动政策。

他的第一项反动措施是在1814年8月7日发布了一项圣谕，授权恢复耶稣会的活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民间和教会统治者的脾气改变了。新的耶稣会士具有严酷和狂热的脾气。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将年轻人的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甚至公开宣称那些松散的伦理格言，而这些格言在以前曾给他们带来过如此沉重的指责。另一个有特色的措施是在1816年发表了一份公告，其中谴责了圣经协会，并将其视为害虫。

南欧国家的政府表现出与罗马教廷合作的意愿。撒丁岛、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西班牙，斐迪南七世召回了被他祖父驱逐的耶稣会士，并恢复了宗教裁判所的暴政。被镇压的修道院被恢复了。政府的缰绳实际上掌握在偏执的神职人员手中。难以忍受的暴政激起了一场叛乱。议会迫使君主改变其政策，赶走耶稣会士，并废除宗教裁判所。神圣同盟现在进行了干预。路易十八不顾威灵顿公爵的建议，将法国军队开进了西班牙，推翻了其政府。西班牙国王在此事件后采取的严格措施并不足以满足狂热的党派，他们聚集在他的弟弟唐-卡洛斯身边，并试图让他登上王位。在法国，教会通过

在全国范围内派遣传教士，通过公开的宗教游行和各种炫耀性的仪式，以及通过发明新的奉献方式，如对耶稣圣心的崇拜，努力唤醒人们对旧的教会制度的依恋。那些在1790年参加国民议会规定的宣誓的牧师们被强迫进行忏悔，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生活。暴徒们被允许在尼斯姆和其他城镇袭击新教徒，其中有数百人被杀。这是在1815年。政府终于进行了干预，但没有惩罚罪犯。耶稣会建立了一些学院和神学院，这些学院和神学院在下一个统治时期变得越来越多。反动的宗教党派的活动重新点燃了对教会的反感。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被唤醒，获得了新的活力。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在不容忍的偏执方面远远超过了国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是绝对主义政党的领袖，于1824年登上了王位。

庇护七世于1823年去世，康萨尔维不久后也去世了。在罗马，教皇专制主义的道路上没有任何障碍。利奥十二世投身于泽兰蒂党。他的追随者们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世俗统治者。耶稣会受宠并被抬高。宗教仪式，包括1825年在罗马举行的庆典，都是以浮夸的方式进行庆祝。与此同时，教皇的王国被治理得很糟糕。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奥地利人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他们的军队随时准备扼杀第一次爆发的叛乱。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卡博纳里和其他秘密社团的组织，其目标是意大利的自由和统一。

在法国，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下，教会中的统治者热衷于对教皇的超自然观点的支持，并以敌意和蔑视的态度对待高卢人的理论，而这正是法国教会的骄傲和荣耀所在。

法国国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并在一段时间内，向正在崛起的自由主义势力屈服，这种势力既敌视政治专制主义，也敌视对耶稣会反动派的控制--例如在教育问题上。1830年的革命带来了彻底的改变。路易-菲利普的政府结束了教士党的统治。耶稣会被剥夺了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任何试图使教皇制度

与现代自由精神相调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一点在拉门纳和他的伙伴们所做的流产试验中得到了体现。

De Maistre是一位学者和外交家，是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反对者，但对宪法约束下的君主制并非不友好，他在一系列有能力的著作中努力为教皇的精神权威的极端理论辩护。他把自己的立场建立在知识和精神世界的秩序需要上，而这种秩序只有教皇的专制才能保证。他的论点类似于霍布斯在政治领域中代表专制主义的论点。在法国，同样的倾向在路易-菲利普早期，由拉门纳与拉科代尔、蒙塔伦贝尔和其他伙伴一起进一步推动。拉门纳主张扩大选举权、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和新闻自由，与此同时，他还主张教皇的精神至高无上的超宗派思想。这种奇怪的观点组合在《未来》杂志上被热情洋溢地阐述出来。这些学说受到了教士党的抵制。他们被1831年接替利奥十二世的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谴责。这本杂志被放弃了。为协调不和谐的体系而做出的慷慨而又奇特的努力归于平淡。拉科代尔成为法国天主教会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传教士之一。蒙塔朗贝尔并没有放弃他的自由精神。

1830年巴黎革命的后果之一是荷兰王国的起义，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比利时天主教国家的建立。意大利的起义在奥地利军队的帮助下被镇压。马志尼成为共和派爱国者和策划者的首领。

1846年，庇护九世被选为教皇。在他的前任领导下，管理不善，以至于他（其前任）去世时，因政治罪被关押和流放的人数不少于两千人。新教皇是一位出身高贵、举止庄重、谈吐得体的意大利人，他一开始就采取了宽松的措施。他释放了政治犯，并宣布对这一类的罪犯实行大赦。他授权建造铁路。他任命了一个国务委员会（Consulta），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政管理的职能委托给非专业人员（平信徒）。这些举措给自由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希望。1848年法国的革命激发了欧洲各地对现有政府的不满情绪，而在意大利更是如此。

庇护九世在为他的王国提供宪法制度的工作中走得更远。然而，共和党人对最高权力继续掌握在红衣主教手中并不满意。教皇拒绝对奥地利人发动战争。一场民众骚乱随之而来。他的首席部长罗西被暗杀了。教皇再也无法控制民主运动，逃到了盖塔。他被法国军队带回了罗马。这就是庇护九世作为自由主义改革者的生涯的结束。他和其他与他一样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想法：以教皇为首的联盟的形式联合意大利。这一计划在法国得到了支持，甚至像吉佐这样的政治家也赞成。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意大利可以在不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统一、而奥地利的影响也能得到遏制。这是一个远远不能满足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观点的计划。

意大利的统一将在萨伏伊家族的领导下实现，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是取消教皇王国和意大利的消失：失去教皇的属地主权。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伴随着教皇的世俗权力的逐渐消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他（教皇）在教会中的权威达到了最高点。

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帕尔马，以及属于教皇的罗马格纳，都被吞并了。加里波第为意大利王国增添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维克多-伊曼纽尔，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盟友，获得了威尼斯的奖励。直到1870年拿破仑在色当被推翻，才为占领罗马开辟了道路。现在，整个意大利被纳入一个王国，政府所在地从佛罗伦萨转移到这个古老的首都。这个结果是在庇护九世不断的愤怒抗议下完成的，他现在被剥夺了他的公国，只能将他的权力限制在他的精神职务范围内。

但他的这一（精神）职务却被放大了。1854年，他在罗马召集了一大批教会人士，颁布了圣母无原罪的教条，没有经过任何议会的批准。他因此承担了权威性地决定一个教会的博士们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1864年，他发表了《通谕》和《错误提纲》，其中除了谴责教

义上的错误，如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的观点外，还庄严地谴责了现代国家的基础思想，如民事契约婚姻的有效性、不受教士控制的教育、良心自由和对各种宗教观点的宽容。1870年，在他的号召下，梵蒂冈的大公会议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七百六十四位主教聚集在圣彼得教堂，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来自意大利。教皇和他任命的专员们在会议前后对事务的处理进行了安排。不管这是否是召集会议的主要目的，宣布教皇无误的计划终于被提出来了，并得到了教皇本人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的支持。耶稣会士在庇佑九世参谋部中的地位上升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议会中的辩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像博学的托里安、德国的海弗勒、法国的杜潘鲁和美国的肯里克这样的主教，努力劝阻议会批准这个项目，但都是徒劳。少数派人数众多，但由于发现抵抗无果，并考虑到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最后表决前退出了。五百三十五位主教投了赞成票。只有两位投了反对票。与以往的大公会议不同，天主教国家世俗政府在该机构中没有代表。他们曾想在讨论过程中提出抗议。但法国的情况，以及路易-拿破仑与教会的关系，使他的政府无法采取这种做法。其他国家并没有选择单独行动。议会的法令遵循了《提纲》的路线，宣布了对当前各种类型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咒语。主要的法令是宣布教皇在他向整个教会发表的有关神学或道德的任何教导中都是无懈可击的。

一直反对颁布新教条的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学派的立场是处于高卢教派的理论与教会的权限之间。他们的学说是，教皇和大公会议的一致意见，即联合主教团的声音，是教义定义有效性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一个议会本身在与教皇一致的情况下确认了相反的观点时，他们能说什么呢？甚至连莫勒的杰出学生之一、一部关于大公会议历史的博学著作的作者海弗勒，在拖延了五个月后也屈服了，同意了教皇的无误论。他曾说过，他宁愿放下他的职务，也不愿在这个程度上放弃他成熟的、有良知的信念。但他被对分裂和孤立的恐

惧所征服。1871年6月25日，他给波恩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相信我是在为天主教会服务，而我是在为罗马主义和耶稣会主义对它的讽刺服务。直到我到了罗马，我才完全明白，他们在那里追求和实践的东西（treibt und übt）只有基督教的假象（schein）和名称，只有外壳；内核已经消失：一切都完全外化了”。他见过罗马，它（罗马）对他的影响有点像路德。但海弗勒并不是路德。写完这封信的六个星期后，他就下定决心接受新教条了。

然而，相当多的神学家，其中以德国天主教神学家中最优秀、最博学的伊格内修-冯-多林格为首，拒绝服从。他们声称，（罗马天主教）议会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其结果是通过不公平的手段获得的。在 ″旧天主教徒 ″的名义下，单独的聚会被组织起来。与杜林格和他在慕尼黑的伙伴们的初衷相反，他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党派发生了分离。他们的第一任主教Reinkens是由荷兰的一个老詹森主义教会的主教任命的，在那里主教的继承权被保留了下来。一个类似的运动在瑞士发展得相当强大。旧天主教徒举行了几次会议或代表大会。旧天主教徒的组织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承认。分离的机构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促进教会的联合，参加会议的有俄国人和希腊人，以及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圣公会教徒。会议于1874年在波恩举行，其结果是废除了强制性的禁食和忏悔，决定在公共礼拜中使用白话文，允许牧师结婚，并允许英国圣公会的成员享受两种圣餐。对这个教会和希腊教会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在1875年也是在波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就圣灵降临的问题达成了与希腊教会观点基本一致的协议。在巴黎，一位雄辩的传教士，Père Hyacinthe Loyson，成立了一个旧天主教会。旧式天主教运动得到了一些有教养的人的高度认可。但它在普通人中没有深厚的根基。在德国的几个州，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支付，而国家又对他们的《福克法》教育进行监督。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授予了天主教团体大量特权。在欧洲各地，梵蒂冈会议的法令唤起了人们对罗马教会可能侵犯国家特权的忧虑。格莱斯顿先生在小册子中强烈表达了这种信念。俾斯麦认为，超自然党派威胁到了德意志帝国

的稳定。因此，德国政府保护旧天主教徒，普鲁士通过了严格的法令，被称为″福尔克法″，这源于提出这些法令的部长的名字。这些法律是在1873年制定的。后来，这些法律在天主教徒中引起了不满，他们抱怨受到压迫，加上德国政治的紧迫性，促使总理同意废除这些规定中最令人厌恶的部分。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帝国议会中需要″中心″或罗马天主教政党的支持，与财政措施有关，促使俾斯麦与教皇利奥十三世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在与西班牙关于加罗林群岛的争端中选择了教皇作为公断人。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基督勋章″的表彰。具有崇高君主权威观念的德国新教徒，对罗马超自然主义来说，可能比法国共和党人、神学或唯物主义的弟子更不可怕。

在1848年革命之后，当社会主义暴民被卡瓦尼亚克镇压时，这个″第四产业″，即工人阶级，向路易-克里斯蒂安-拿破仑打开了通往总统的道路。

拿破仑开辟了一条通往总统职位的道路，并成功地篡夺了皇帝的最高权力（1851年12月3日和4日）。他被誉为社会的救世主。教士们对他青睐有加。他宣称要采用拿破仑三世的1801年协约的原则。但在宗教问题上，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被当时的紧急情况所左右。他一提议支持高卢教会，就招来了包括奥尔良主教杜潘卢在内的教士们的谴责。他被称为″第二个彼拉多″。政府禁止出版教皇的通谕和教学大纲。查理-阿尔伯特在诺瓦拉战败后（1849年），时任总统的拿破仑为了防止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取得完全的胜利，派法国军队到罗马、由欧迪诺指挥，加里波第和他勇敢的共和派追随者被赶了出来。现在，罗马被法国士兵占领，教皇也在那里受到保护。这使拿破仑遭到了自由党的愤怒。

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1859年），他去拯救意大利的事业，但《维拉弗兰卡和约》使他所承担的工作完成了一半。意大利人为自己征服了除威尼斯和罗马之外的整个意大利；而路易-拿破仑则为罗马辩护，反对他们。他承担了罗

马教廷的保护者的角色--在这一角色中，他不仅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还得到了法国教士党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所有法国人的支持，这些人从总体上讲是反对意大利在萨沃伊家族的统治下统一的。在拿破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超蒙党在欧仁妮皇后的热心支持下，行使了太多的权力，而欧仁妮的政治影响是致命的。为了马克西米利安的登基而进行了灾难性的墨西哥战争，之后又与德国进行了致命的战争。拿破仑在色当被推翻了。随后，在甘贝塔和他的爱国辅助人员进行了徒劳的斗争后，巴黎投降了。当与德国人的和平条件得到解决后，又发生了与共产党人的可怕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黎大主教达尔博伊是他们凶残的受害者之一。在这一危难时期，法国像在其他灾难和绝望的场合一样，似乎向神父寻求咨询和安慰。1871年的国民议会就体现了这一点。教会党很强大，并且拥有超蒙精神。巴黎大主教吉贝尔(Guibert）未经政府许可，就颁布了教皇无误的新教条。即使是杜潘卢，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也成了超蒙派阵营中最积极的领导者。他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建立由国家管理的普及教育的学校的法律被否决，随之而来的是义务教育。1873年梯也尔下台后，麦克马洪上台，在财政状况的压力下，甚至连教士们都不得不依赖他的高超智慧。在布罗格利和巴菲特（1875年）的领导下，教士主义保持了其优势地位。政府批准建立天主教大学，并允许其授予学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反动，它的力量越来越大，直到1877年，元帅-总统被迫接受国家的裁决，并组成了一个共和党内阁。1880年，儒勒-费里和他的伙伴们在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被采纳。

天主教大学的学生被要求在州立大学注册，接受考试，并获得学位。当甘贝塔成为政府首脑时（1881年11月），关于解散耶稣会和其他不被国家承认的教会的″三月法令″得到了执行。部长保罗-贝尔（Paul Bert）的学校法规定，公立学校实行强制入学，并将其完全世俗化。在反教会多数派的其他措施中，有一项是1881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了赋予民事法庭对离婚问题的全部管辖权。

法国天主教会中的高卢教派的毁灭和超蒙教派的摇摆，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在本世纪，法国教会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国家的民事政府中得到一个集结点的力量。它把罗马作为力量的源泉。它认为，以无神论或唯物主义形式出现的不忠，是国家世俗化和推翻教权的共和运动的根源所在。天主教主义的统治是带来了迷信的统治。迷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发展。对耶稣 ″圣心 ″的崇拜唤起了广泛的神秘主义和感性的奉献。据称的奇迹，如卢尔德和拉萨莱特，被用来吸引众多的朝圣者到这些地方，并以圣母的幻觉为荣。对教皇的超然颂扬，人们不乏真诚的抗议，但完全没有效果。

蒙塔朗贝尔在其中看到了与国家不干涉教皇明显的精神职务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为之争辩。1852年，他谈到 ″在庇护九世的教皇统治下，对夸大的教义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使人类的理智和荣誉受到损害″。他提到了法国神职人员在对罗马的新奉献中 ″不可思议的兜圈子行为″。巴黎大主教Sibour在给Montalembert的信中（1853年9月10日），谈到了 ″超蒙教派的双重偶像崇拜--对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偶像崇拜″。后来，在1870年3月7日发表在《伦敦时报》上的一封信中，蒙塔朗贝尔责备那些 ″在一场大屠杀中把正义和真理、理性和历史都烧给了他们在梵蒂冈为自己树立的偶像 ″的人。

没有哪个基督徒团体比法国的胡格诺派教会更有资格成为殉道者教会。

路易十四巧妙的野蛮行为并没有摧毁胡格诺教会。幸存下来的残余信徒被驱赶到几乎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做礼拜，而且是在 ″地穴和洞穴中 ″做礼拜。为这个软弱无力、一蹶不振的门徒队伍注入新生命做得最多的人是安托万-考特（1695-1760），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农民家庭，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熟悉圣经，具有成为领袖和指导者的思想和心智资格。他成为″沙漠中的教会

"的负责人。1730年，当他被赶出法国时，他以生命为代价，在洛桑建立了一所神学院，胡格诺派的传教士从那里被派往法国，一直到拿破仑一世建立第一个帝国的时候。迟至1762年，图卢兹的新教商人让-卡拉斯（Jean Calas）作为严酷不公审判的受害者丧生。伏尔泰在促成凡尔赛的国王和议会推翻判决方面发挥了作用，并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可能的补偿。

第一任拿破仑通过镇压总议会对改革派教会进行了打击。第二任拿破仑也对省议会进行了同样的打击。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大约在1820年，在诺曼底长期存在的卫斯理教派的影响下，宗教的复兴在胡格诺教会中蔓延开来。这种影响在福音精神中得以延续，这种精神在这些社区中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在法国的改革派教会中，半个世纪以来，甚至更久，存在着两派，即正统派和自由派。阿道夫-莫诺（Adolf Monod）担任院长的蒙托邦学院代表了正统的观点，没有任何过度或掺杂偏执的内容。在巴黎，科克勒尔是理性主义政党的领袖。在1848年巴黎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弗里德里克-莫诺（Frédéric Monod）和加斯帕林（Gasparin）伯爵（福音派观点的倡导者）退出了会议，然后成立了一个 "自由福音派教会联盟"，大约有30人。它依靠各教会的自愿原则来支持。1864年，根据Guizot的动议，教区会议或非正式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福音基本真理的信仰宣言。这是福音派与理性主义之间出现分歧的契机。

1872年，归正会第三十次全国会议获准在首都举行。会议批准了一份简短的信仰忏悔书，该忏悔书的采用是由吉佐提倡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员站在保守的一方。反对派极力反对这一程序，理由是任何信条都不应由宗教会议规定为强制性的。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字被从投票名单中删除。然而，这一行为后来被费里部长裁定为非法；但根据有关主教会议的新安排，保守派在巴黎意外地获得了多数。由于这种分裂，政府不再允许总议会召开会议。但会议

具有非官方会议的性质，而且经常被这样指定。他们只能提供建议。持有福音派观点的会众不超过六百个。

从1830年起，巴黎的″福音协会″通过传教士和其他类似机构，在传播福音派真理方面发挥了广泛的影响。1854年，这种努力在斯特拉斯堡引起了来自耶稣会方面的侵略。主要由英国和美国基督徒提供和支持的″麦卡勒传教团″没有建立任何教堂，但通过传教服务和其他方式做了大量工作，使人们皈依福音信仰。

马志尼和共和党人认为，除了推翻所有现有的政府，以及与之相关的教皇，没有任何办法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哲学家乔贝尔蒂、构思了一个得到许多人赞同的计划，即在教皇的主持下建立一个由五个意大利政府组成的联盟，撒丁岛将成为主要的世俗政权。当庇护九世与自由党决裂时，教皇担任总统的梦想消失了。在达泽里奥和其他开明的政治家的领导下，尽管教皇提出了抗议，但还是采取了措施，摒弃了教皇对民政事务的干预，并使国王在撒丁岛王国中享有最高地位。加富尔在其″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的格言中，抓住了意大利自由和联合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像拿破仑一世在1813年所珍视的那种使教皇成为臣民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在教皇的世俗统治权被剥夺后，他将如何管理他作为教会领袖的职务？这个问题在《担保法》中找到了答案，根据该法，教皇在个人和官方方面的不可侵犯性得到了确立，他在与外国的交往和处理精神事务方面获得了自由。梵蒂冈及其附属机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了确保国家的真正自由，意大利政府面临的任务是执行和扩大已经在撒丁岛进行的教会改革。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如取缔修道院，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并从修道院的财产中形成一个基金用于人民的教育，以及要求在任何宗教仪式之前举行民事婚姻，都是由意大利的开明统治者一步一步地实现的。1884年，当有关修道院的法律扩展到宣传协会的财产时，引起了不寻常的骚动--对其征收重税。

意大利的统一给新教徒带来了自由。1848年后，《圣经》和小册子开始自由流通，特别是由英国旅行者传播。弗朗西斯科和罗莎-马迪亚伊，在托斯卡纳因信仰而被监禁。在1853年，由于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强烈要求，他们获得了自由。1848年，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瓦尔登湖教会，并积极从事宗教工作。其成员之间发生了分裂，意大利的 ″自由教会 ″是由那些对所有传统的瓦尔登湖习俗不满意的人组成的。路易吉-德-桑克提斯（Luigi de Sanctis）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人，也是一位皈依的牧师，他在自由教会工作了十年，然后在1864年与瓦尔登湖人联系在一起。佛罗伦萨成为他们神学教育的主要场所。雄辩的演说家加瓦兹（Gavazzi）为自由教会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他是一位皈依者，曾属于巴拿巴会。1870年，来自32个教会的代表在米兰召开大会，成立了第三个新教组织 ″自由基督教会″。在意大利政府的保护下，新教在罗马城内由几个基督教教派传教。

在荷兰，不同教义的信徒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个国家也没有躲过基督教的冲突，理性主义和正统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在1834年形成了分离主义的 ″基督教改革派″。该教会有几百个聚会点。国家归正会中的教义争论的进展产生了鲜明的党派。1853年，总议会不承认任何超越旧忏悔录的精神和立场的协议。出现了三派：严格的加尔文派；比较自由的加尔文派，其中著名的神学家冯-奥斯特兹教授是教条主义神学论文的作者，他是该派的领袖；以及理性主义派，其中包括库能教授和肖尔腾教授。1856年，所有的教义式宗教教育都被法律从荷兰的学校中禁止了。1876年，法律规定大学中的旧神学教席被宗教史教授职位取代，由国民议会从授予它的资金中安排专门的神学教育。当神学教授职位由议会设立并由理性主义者担任时，加尔文主义党派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自由改革大学，该大学于1880年开办。在已建立的教会中，中央的、最高的权威是一个小的宗教会议。会议的控制权被指责为倾向于自由主义，最近被以阿姆斯特丹的凯珀教授为首的一些教

会所拒绝，这些教会声称忠于多特信条。然而，这些教会并没有脱离与国家教会的联系。

比利时的宪法包含了对宗教自由的最充分保障。但是，激进主义和超宗派之间的斗争很快就出现了。1834年，超蒙特党人创办了鲁汶大学，并以最大的努力和热情，努力在人民中传播他们的制度。1878年，随着致力于他们事业的牧师被推翻，比利时开始了德国人所说的 "文化斗争"--与教会要求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但没有任何地方比比利时更激烈或更持续，任何一方都是胜利和失败的交替出现。

在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1840-1858年）的统治下，在1848年革命时代之前和之后，罗马天主教教会被允许获得特权，这些特权与超蒙教的传播有关，为普法战争结束时爆发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在丹麦，极度热心的旧路德教义倡导者与国家教会中盛行的自由主义宗教之间进行了长期争论。在国家教会中盛行的自由主义制度，1848年后，由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引起的对德国的共同敌视消失了。1849年，丹麦政府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主要宗教团体置于法律特权方面的平等地位。1857年，所有儿童都应接受洗礼的法律规定被废除了。这是由于浸礼会观点的传播，这些观点是从汉堡传入丹麦和其他邻国的。在那里，1834年，巴纳斯-西尔斯牧师在昂肯先生的牧养下成立了一个小型浸礼会。

在瑞典，1803年后，"读者"--"Läsare"--因其阅读《圣经》和路德著作的习惯而得名，他们举行会议，以促进一种比固定教会所认可的更生动的献身精神。他们受到当局的骚扰，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公众对异见者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1877年，所有基督教异见者，甚至是犹太人，都被允许参加选举，并有资格担任所有民事职务。不从国教的宗教团体被允许成立。

1877年，格夫勒的一名教师瓦尔登斯特伦发起了一场具有实践性质的宗教运动，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在他的教义教学中，虽然他的精神是福音派的，但他对赎罪的阐述与安塞尔思想不同，而倾向于所谓的〝道德观〞，从瑞典到美国的移民与他有共鸣，他们组织了会众教会。在瑞典，瓦尔登斯特伦的追随者组织了许多不同的教会，他们的讲话和著作非常有影响力。虽然他们不参加既定教会的崇拜，也不接受教会的圣礼，但至少在名义上，他们仍然与教会有联系。

1828年后，耶稣会士在瑞士的天主教各州获得了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了这些州的独立联盟(Sonderbund)，并引发了内战。在1848年的瑞士新宪法中，规定了科学自由、信仰平等和排斥耶稣会士的原则。但耶稣会不能被拒之门外，他们在日内瓦特别多，而且很活跃。

瑞士政府被罗马教廷派的侵犯行为所激怒，并与其倡导者进行了坚决的冲突。1873年，教皇派驻的大使被驱逐出境。自从利奥十三世成为教皇后，与罗马建立了更加和平的关系。瑞士的德语新教徒与德国的新教徒一样，都有不同的意见和波动。在巴塞尔，自由派福音派的代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苏黎世，尽管人们拒绝允许施特劳斯担任他被任命的神学教席，但理性主义学派在神学教育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许多州，公证结婚已经合法化，学校也与教会脱离了关系。在几乎所有的新教州，趋势是废除体现在信条中或间接体现在礼仪书中的教义检验。在本世纪初，瑞士的法国新教徒的宗教觉醒主要来自于大不列颠。César Malan（1787-1864）牧师是最早接受这种性质的新精神推动力的人，他在唤醒其他人的基督教生活和希望的努力中，热情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832年，在日内瓦成立了一所由德国新教徒、法国新教徒和奥地利新教徒组成的神学学校，并建立了一个与国家教会并列的自由教会。日内瓦福音派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是神学教师和作家梅尔-德奥比涅

（1794-1872）。他的《宗教改革史》是一部详细、生动的叙述，以崇高的宗教精神写成，在不同的国家广泛流传。在洛桑进行的类似运动不得不遭遇许多迫害。由于1845年政府的激进措施，发生了分裂。一个自由教会成立了。洛桑福音派事业的主要领导人是当代法国新教神学家中最有创意和最杰出的一位，他就是亚历山大-维内特（Alexander Vinet）。他是良心权利的倡导者，也是教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的倡导者。他作为神学家的深刻洞察力与他对法国文学的深刻了解和文学批评的技巧有关，这一点得到了圣博夫等艺术大师的赞赏。

在奥地利，维也纳会议之后，新教徒仍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因1848年的宗教革命而得到扩大。但是，通过1855年的协约，超自然党获得了它所渴望的所有权力。教士们被允许与罗马进行最自由的交流，并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行使等级权力。他们被授予对所有学校教学的完全控制权，以及对婚姻案件的完全管辖权和对书籍的审查权。下级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对这些特殊规定感到不满。意大利战争的结果，特别是1866年与普鲁士的战争，带来了一种宪法制度，它废除了协约中最令人厌恶的条例。1868年通过的这项改革，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完全废除了这种安排。通过民事契约的婚姻被批准。除宗教教育外，教育的控制权由国家承担。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结婚的情况下，男性子女将根据父亲的信仰接受教育；女性子女则根据母亲的信仰接受教育。

在本世纪发生在英国的最重要的教会事件都发生在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后。1829年通过的 "天主教解放法案"，它允许天主教徒进入议会和其他公共机构。1833年，约翰-凯布尔（John Keble）的一次布道标志着英国天主教神学在牛津的复兴。纽曼和普西是其主要作者。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将在《教义史》中找到一个位置。在纽曼和沃德分离之后、他们与其他神职人员一起进入了罗马天主教会，在他们所属的学校中，出现了一个礼仪派。除了牛津大

学领导人鼓励的忏悔习俗外，还在各种细节上恢复了中世纪的礼拜仪式。这些引起了认真的抵制。福音派或低等教会党表现出了新的活力。1836年，他们建造了埃克塞特大厅，作为大型宗教集会的场所。1874年通过了《公共礼拜管理法》，根据该法，五名有仪式感的神职人员被送进了监狱。总的来说，在试图从法律法庭获得关于教义问题的判决时，双方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尽管高教派强烈反对、汉普顿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神学的注册教授，并于1848年成为赫里福德的主教。自由党或广义教会党的某些追随者所持的极端观点被列入题为 ″散文与评论 ″的书中。

但其中对《圣经》的启示和对未来惩罚的永恒性所表达的观点被枢密院宣布为英国牧师的合法权利。科伦索主教被裁定，由于他在1862年发表的关于摩西五经的观点，南非主教们决定将其罢免；但他们的决定被同一个法庭宣布为无效。1867年，一个由泛圣公会的主教组成的泛圣公会理事会，包括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们，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持下，泛圣公会理事会在兰贝斯举行了会议。1878年又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类似的大会。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就他们的共同工作进行会议。1854年，坎特伯雷和约克的主教团获准恢复他们的会议以处理事务。坎特伯雷主教团通过了修订圣经授权版本的计划；该计划由委员会与美国为此目的而挑选的学者组成的公司合作执行。修订版于1885年完成。1861年，第一届年度 ″教会大会 ″在英国举行，公开讨论对基督徒特别重要的问题。在其程序中，平信徒参与其中。

英国的立法慢慢地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施加在异见者身上的障碍和负担。这些变化不是朝着理解的方向，而是向持异议者作出让步，因此倾向于解除教会与国家的联系。1828年废除了《测试法》和《团体法》。经过长期的斗争，持不同意见者的婚姻被允许在他们自己的教堂举行仪式，并由民事官员登记。1871年，最后一项法案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非教徒可以在平等条件下进入大学并获得学位（神学学位和教授职位除外）。经过长期的争论，议会终

于在1868年通过了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废除教会税的法案；异教徒不再为支持他们不参加的礼拜活动而被征税。1880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在教堂院子里下葬，″可以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可以举行基督教和有秩序的宗教仪式″，只要负责埋葬的人喜欢。1845年，犹太人被允许担任市政职务，1858年，在一场巨大的竞争结束后，他们甚至有资格进入议会。直到1833年，贵格会成员才被允许在法庭上使用告白代替誓言。1869年，爱尔兰教会通过一项法案解散，并在1871年完成，终止了在改革法案通过后开始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冲突。1870年召开了一次神职人员会议，以重组爱尔兰的新教圣公会。在这一类的所有措施中，就其与英国有关的部分而言，变革受到了抵制，这一般不是出于任何精神，当然也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不公正的精神，而是出于一种信念：维持一个机构有利于国家的宗教福利--因此，它必须得到一贯的维护，而且教会不能合理或合法地受制于犹太人或其他反对它的人的管理。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被敦促并得到执行，理由是格莱斯顿先生表示，″在一个根据民众原则治理的分裂国家里″，这种排他性的要求是不公正的。一些被废除的做法，如要求在教堂院子里进行埋葬仪式，是许多神职人员以及持不同意见者所反感的；正如一位英国神职人员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一篇关于宗教和教会的文章中所说，″它们的长期保留，″是英国人性格中不合逻辑因素的有力证明″。令人高兴的是，英国教会的收入再分配法案对主教和教区牧师的收入平等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1850年，庇护九世的法案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该法案将英国分为一个大都市和十二个主教区。英国议会通过了（1851年2月7日）《教会头衔法案》，禁止新头衔，并包含其他严格的规定。骚动逐渐消失了。梅先生说，这项法律 ″是对教皇的一项行为的抗议，该行为伤害了英国人民的感情；但作为一项立法措施，它是一纸空文″。

十七世纪后半叶，长老会放弃了在他们的体系基础上建立国家教会的希望。

被打败和削弱的两类清教徒（长老会与公理会），自然而然地相互接近了。1690年，伦敦约有八十名小浸信会的异议牧师制定了 ″协议书″，包括九条，涉及教会政府和纪律。这并不是一个教会契约，而只是表明了组成协议的人赞成和认可的条款。长老会的成员将更紧密地联合各教会。长老会放弃了任何宗教会议或其以外的其他机构对某一特定教会的控制，并同意每个教会可以选择自己的官员。公理会做出的让步没有那么大。在教会事务的管理上，人们认为，只要人民同意官员的行为就足够了。还允许一个人被按立为牧师而不负责某个特定的教堂。在按立牧师时，相邻教会的牧师应予同意。1708年，萨伊布鲁克纲领对 ″协议首脑 ″的认可是其中的一项措施，当时的采用使康涅狄格州的公理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有长老会的色彩。在英国，教义上的分歧使长老会和公理会的联合无法实现。许多长老会的会众逐渐接受了一元论（即否认三位一体）的观点。在本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长老会与苏格兰教会重新建立起来；但在1876年，″英格兰长老会 ″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成立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的公理会有许多重新焕发活力的迹象。1833年，公理会联盟成立。它开会讨论，但没有立法权。它的讨论一直在加快，在它的主持下，有价值的出版物已经发行。最近，在牛津建立公理会神学院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上个世纪的异见学院提供了良好的培训，并从这些学院中走出了有名望的学者和作家。随着这些学院的衰落，教士教育的标准也在下降。在公理会的神学家和作家中，有约翰-佩-史密斯（1774-1851），他写了一篇详尽的论文《圣经对弥赛亚的见证》和其他一些作品；拉尔夫-沃德劳（1779-1853），长期担任格拉斯哥的牧师和神学家；以及罗伯特-哈雷（1796-1876），《圣礼讲座》和其他作品的作者。

一个自称 ″弟兄们″,但一般称为 ″普利茅斯弟兄们 ″的教派在1830年找到了一位领袖，他就是曾在爱尔兰担任圣公会牧师的普利茅斯人J.N. Darby牧师。

他们1827年左右首次在该国出现。弟兄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有组织的教会脱离教会关系，并完全拒绝官方的各种类型的牧师。当然，他们对已建立的教会充满敌意。他们采用每周庆祝主的圣餐的习俗。他们坚持基督提前到来的观点。除了这种性质的几个特点外，他们的信条与其他大多数福音派信徒的信条是一致的。主要是通过达比的影响，他们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法国瑞士获得了信徒。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兄弟会〞。但这一流派或教派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主要是在纪律问题上。

查理二世复辟后，在苏格兰实行了主教制。盟约宗教的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四百名牧师被驱逐出他们的教区。在〝修道院〝举行的会议带来了新的惩罚。1688年的革命恢复了长老会制度。大多数〝卡梅伦派〝社团坚定地抵制查理二世的专制措施，对威廉主持下的教会事务管理不满意，仍然保持与众不同。顺从长老会秩序的圣公会牧师们保留了他们的生活。这影响了接下来的神学进程，因为它在性质上带来了〝温和〝或〝宽容〝的因素。1712年安妮女王时期，恢复了非宗教人士的赞助。这个问题注定要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搅动苏格兰教会。人们对没有教会〝召唤〝的牧师的安顿深恶痛绝，他要主持教会的工作。这种信念引起了第一次分离，这是由埃比尼泽-厄斯金在1737年领导的。从这时起，〝温和派〝为所谓的赞助人的权利辩护，并执行这些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了上风。纬度主义的浪潮席卷了苏格兰。温和派的领导人，其中历史学家罗伯逊是最有影响力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不喜欢一切看起来像宗教热情的东西，而且在文学方面比在神学方面更有优势。他们的措施使异见迅速蔓延。当一个不受欢迎的牧师被强加给一个教区时，其受委屈和不满的成员会放弃旧的礼拜场所，为自己建立一个集会场所。这在大城镇尤其常见。然而，在这一时期，高地人大多被赢得了新教信仰。随着本世纪的开始，一个福音主义的复兴开始了。温和派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他们对罗伯特和詹姆斯-霍尔丹等人的传教努力的反对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信任。福音派开展了反对多元化的斗争，并取得了成功，同时还

制定了教会扩展计划，并代表国外传教的事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针对被指控为异端的个人的诉讼，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注意。约翰-麦克劳德-坎贝尔（John McLeod Campbell）是一位智力和虔诚度都非常高的神学家，于1831年被罢免，因为他认为保证是信仰的本质，而赎罪和赦免的规定是针对所有人的。爱德华-欧文（1792-1834），是一位传道人，最初在格拉斯哥与查尔姆斯的同事一起工作、然后，通过他在讲坛上强有力的慷慨陈词，在伦敦聚集了大量的听众，一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加入了他。他对《圣经》中的预言深感兴趣，并宣称他对基督迅速降临的期望。说方言的能力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和欧文自己在伦敦的会众中出现，或被认为会出现。1833年，他被安南的长老会罢免了牧师职务。引起反感的教义错误是认为救世主把我们的人性带上了，因为我们因堕落而变得易受诱惑和腐败。欧文认为，圣灵的恩赐和使徒教会特有的职务，包括使徒本身，都是通过为主的明显降临做准备的方式恢复的。受他的影响，珍视这些观点的″天主教使徒教会″应归功于它的起源--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但包括一些在学习和圣洁方面都很出色的人。它的成员声称自己不是整体，而是唯一的真教会的一部分。在它的信条中，道成肉身是最重要的，而在耶稣的尘世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作为一个人，依靠圣灵做了一切。在他们的组织中，他们保留了先知、使徒、传道人和牧师这四方面的事奉。他们期待着基督的到来，在千禧年之前。他们在每个主日庆祝圣餐，并在崇拜中有精心的仪式和庄严的礼仪。

罗马多次试图让俄罗斯教会服从教皇的统治，但都没有成功。1439年，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俄罗斯教长伊西多尔同意了这种联合；但当他回到莫斯科时，他的行为遭到了国王和人民的愤慨，他被废黜。1581年，当俄罗斯处于类似的困境中时，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委托的耶稣会士波塞文再次进行了同样不成功的尝试。但在与立陶宛一起被并入波兰的俄罗斯省份，他的努力获得

了成功。与基辅大都会和他的一部分神职人员实现了联合。如果不了解从将罗马天主教体系加给俄罗斯前臣民开始的宗教争斗，就无法理解波兰在近代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两个王国和敌对教义的长期竞争。在彼得大帝实施的重大变革中，有一项是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由教长统治的 ″神圣 ″教会。

1721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主教会议，对主教进行统治。

″圣会″，沙皇对它的影响是最高的。沙皇因此成为教会和国家的首脑。同时，修道院机构的大量财产被置于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立的 ″部门 ″的监管之下。修道院在俄罗斯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教会或联盟的组织，修士们没有权力对沙皇的教会或其他程序进行抵抗。

彼得大帝的创新助长了抵制偏离祖先的崇拜和生活方式的趋势。新教和理性主义观点的影响在这些不同的教派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历山大一世为教育和提高他的人民作出了巨大努力。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圣经协会的主持下，免费分发圣经，该协会是伦敦圣经协会的辅助机构；但这项工作在1826年被教会的反应所阻止。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对来自国外的宗教影响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

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也有同样的保守脾气，但通过教学部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教会中进行了健康的改革。下级神职人员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回廊修道院也得到了改革。鼓励向穆罕默德人和异教徒传教。1861年，解放农奴的计划得到了实施。虚无主义在他统治的后期蔓延，1881年，他成为虚无主义者针对其生命的阴谋的受害者。早在1874年，俄国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党。1875年，从这个政党中产生了 ″恐怖组织″，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消灭教会和国家的所有权威。这就是虚无主义为政府的弊端和压迫提出的补救措施。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土耳其人的帝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基督教国家的支持，并免于毁灭，这标志着时代的特征。在1840年，苏丹从他自己的臣民Mehemet Ali的攻击中获救，欧洲国家的联盟从他手中夺取了叙利亚。1853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监护权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沙皇实际上声称自己是东方教会的保护者。西方大国拒绝迫使土耳其采取苏丹承诺在黑塞哥维那和其他起义省份的政府中实行的改革，这使得俄罗斯决定自己发动战争（1877年）。土耳其被打败了，但通过柏林会议，西方国家再次拯救了土耳其。

希腊人的独立在1830年的伦敦会议上得到了承认。1833年，希腊教会断绝了与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的联系。它由国王任命的神圣会议管理，但在精神方面是独立的。国王必须是希腊教会的成员，但崇拜的自由也扩展到其他教派。

在叙利亚，1860年爆发的德鲁斯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对该地区所有基督徒的猛烈迫害。据估计，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就有八千人被屠杀了。土耳其军队从君士坦丁堡派来惩罚大屠杀的肇事者，并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能量。法国军队也在该国停留了一段时间，以保护基督教居民。

保加利亚教会受制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牧首，并被这位教士管理不善。他把教会的高级职位交给了愿意出最高价的希腊牧师，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敲诈勒索使自己发财。但在1870年，苏丹颁布了一项法令，赋予保加利亚教会以独特的存在，并将其置于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

"前主教"牧首格里高利将保加利亚人逐出教会，但他的诅咒在希腊教会的其他分支中没有得到承认。

土耳其人的政策是允许其他宗教的信徒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的主要官员由他们自己与土耳其政府共同任命。因此，伟大的亚美尼亚教会实际上一直受制于它的教长。它与希腊和罗马天主教都保持着距离，对双方的某些特点持敌对态度。亚美尼亚联合教派，即亚美尼亚-天主教徒，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对教皇表示效忠。但在1867年，皮乌斯九世在Reversurus诏书中宣称，他们在任命和罢免所有教长和主教方面拥有特权，因此发生了叛乱。1871年，教皇将其逐出教会，1872年，所有拒绝承认哈桑牧首和梵蒂冈会议法令的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惩罚。

==========

第六章

美国宗教教派的历史简述

革命时期的教派

在美国革命初期，圣公会在南方殖民地是建制派教会。在新泽西和纽约，它得到了政府官员的特别青睐。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从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建立，每个城镇都有义务维持公共礼拜并支持一名牧师。为此，对居民进行了评估。由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都是公理会的成员，所以礼拜是这种性质的。随着其他教派的出现，法律进行了修改，允许每个组织为支持自己的礼拜活动而缴税。1727年，康涅狄格州就圣公会通过了这样一项法案，即在斯特拉特福德的基督教堂成立后不久，作为他们在该州的第一个宗

教团体；1729年，同样的权利被扩展到贵格会和浸礼会。在那些没有会众的地方，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个人都必须为支持那里现有的公理会礼拜活动而捐款。这一要求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苦难。人们相信，在所有殖民地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测试。甚至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除了那些宣称信仰基督的人，没有人可以投票。当革命开始时，自然会出现废除宗教不平等的运动，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浸礼会教徒，除了公理会教徒外，没有一个宗教团体的人数超过他们，而且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特别的伤害，立即在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竭力争取废除令人厌恶的限制。一个浸礼会委员会在费城举行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上向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提出了他们的申诉。浸礼会成员对爱国事业的支持，以及各方对人权的宣扬，为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听证会，并使他们在繁琐的拖延之后获得了成功。在弗吉尼亚州，帕特里克-亨利、杰斐逊和麦迪逊为他们争取了利益。1785年，宗教自由法规获得通过，杰斐逊认为能够成为该法规的作者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该法规禁止国家对信仰和礼拜事务进行干预。所有教派因此被置于平等地位，没有人因支持宗教而被征税。在新英格兰地区，免除这最后一项要求，或免除为公民选择的特定宗教形式缴税，是后来完成的。康涅狄格州于1818年实现了这一目标；在马萨诸塞州，直到1833年政教完全分离时，这种性质的最后一项规定才从法规书中消失。在该州，从1780年到1811年，一个宗教团体必须成立，以使其成员免除教区教堂的税收。

联邦政府的宪法是一个权力有限且明确的政府，它对各州政府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宪法规定，"不得要求以宗教测试作为担任美国的任何职务或公共信托的资格"。但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充分的保障；第一条修正案包含了这样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建立宗教或禁止自由行使宗教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府宪法在宗教方面的中立性与有助于在宪法上印上这种性质的影响，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暗示宗教义务的各种条款，这些条款构成了旧州组织法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关于遵守星期日、任命牧

师等的法律规定，不是出于明显的宗教动机，而是出于对广大公民的舒适和安宁的合理考虑。在关于普通学校教育的法律规定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把可能冒犯任何相当多的人的宗教观点或偏见的研究和规定放在一边。法院认为--在吉拉德遗嘱案中，斯托里法官宣布--基督教--"一般的基督教"，区别于任何特定教派的信条--是各州普通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基督教不得被肆意攻击。这是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本案中的论点，之前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Updegraph案中也曾主张过这一点。但是，如果要超越文明人的理性因其自身明显的真理和价值而接受的基督教道德准则，那么定义 "一般基督教 "的难度将是普遍承认的。在新的州里，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传统的立法和影响老的政治团体的历史无关，走向公民政体彻底和一致的世俗化的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人们常说，自愿制度的效果是创造了一个多宗派的局面。但统计数字显示出一种趋势，倾向于聚集在几个大教派中。我们观察到，增长最快的教派在其组织中都很紧凑。人数排在第三位的浸礼会是个例外；但他们对圣礼的看法成为联盟的纽带，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活动。他们的性格和历史中的其他特点，将有助于解释他们的显著繁荣。

在革命结束时，公理会的教会主要局限于新英格兰。他们对长老会的政体没有什么异议，以至于当新英格兰人移民到西部时，他们毫不勉强地加入了长老会。1801年通过的 "联合计划 "阻碍了西部各州的发展，该计划对新定居点的教会组建进行了规定，并允许公理教会拥有一名长老会牧师，或者反过来。在新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战争的影响，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法国不忠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对实践宗教的事业是有害的。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复兴活动。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它们的影响非常有益。在当时耶鲁大学校长德怀特的布道下，1802年在那里发生了宗教复兴。这是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类似的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

德怀特是一位神学教师，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摩西-斯图尔特（Moses Stuart）和纳撒尼尔-W-泰勒（Nathaniel W. Taylor）等知名领导人都是在他那里接受了讲坛和神学讲座的培训。新英格兰公理会的团结被本世纪初逐渐兴起的一神论（即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所打破。1783年，波士顿的国王教堂（Episcopal Church）重新制定了其礼仪，将三位一体的教义排除在外，这表明了之前的意见倾向。一神论在哈佛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新英格兰的东部地区，在有教养的阶层中有许多信徒。正统派，即后来被称为三位一体的公理会成员，于1808年建立了安多弗神学院。“旧加尔文派″和″霍普金派″两派在这项事业中联合起来。通过正统公理会的代理，美国对外传教士委员会于1810年成立。在促进教育和学习方面，公理会成员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热情。除了″美国委员会″之外，他们还通过其他志愿协会的媒介，与长老会的新学校分部合作，开展传播福音的活动。大约在本世纪中期，一种信念蔓延开来，即公理会的教派利益需要得到照顾。这种感觉引起了1852年在奥尔巴尼召开的会议，目的是将东西方的公理会成员联合起来。随后于1865年在波士顿召开了全国公理会会议。这是一个庞大而有活力的会议。它颁布了一项信仰宣言，其中宣布了旧的忏悔--威斯敏斯特和萨沃伊--曾是1648年和1680年的新英格兰会议通过的″实质上″值得接受，但提出了一个新的声明，以普世教会的口吻起草的福音教义。最初，在新英格兰，成员在同意″盟约″的情况下被接纳进入教会，他们的皈依已经事先得到确认，令教会满意。后来，特别是在一元论观点的传播激起了人们的恐惧之后，各教会制定了当地的信条，新成员在信条中声明他们的信仰。自然，这些信条在内容上彼此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也是如此。波士顿会议促成了全国公理会的永久性制度，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于1871年在欧柏林举行。1880年，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全国理事会采取了一些措施，挑选了25人编写信条或教义，或两者兼而有之，″以指导和教化各教会″。根据公理会的原则，任何信条都不能强加给教会而不侵犯每个教会固有的自治权。信条是由公理会的委员会编写的。

从两个教会开始，即罗杰-威廉斯在普罗维登斯建立的教会，以及约翰-克拉克在纽波特建立的教会，浸信会在不断的反对声中前进。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是一位博学的东方学者，哈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放弃了婴儿洗礼，并在1654年辞去了他的职务。他在普利茅斯殖民地范围内的斯基图亚特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1665年，第一个浸礼会教会在波士顿（或查尔斯敦）聚集。缅因州的一连串浸礼会信徒，不愿在那里安居乐业，便移居到南卡罗来纳州，并于1693年在查尔斯顿建立了一个教会。几年后（1698年），在费城组织了一个浸礼会教堂。浸礼会教会的协会也随之成立。其中一个协会，即费城协会，于1707年开始存在。另一个协会于1767年在R.I.的Warren成立。这些机构没有教会权威，因为每个教会都是独立的。浸礼会不时发布他们的教义信仰声明，但他们对这些声明没有约束力。1689年在英国通过的忏悔书是其中最重要的。它是《威斯敏斯特忏悔录》，在有关民政机构、教会和圣礼的议题上做了修改。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718年，在波士顿浸信会牧师艾利沙-卡伦德（Elisha Callender）的授职仪式上，该镇的三位主要牧师都在场。那次讲道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不赞成地提到了浸礼会在以前的时代所遭受的 "严酷待遇"。他们的教派在革命后迅速发展。他们关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原则正在取得全面的胜利。他们不要求传教士的学识。每个教会都选择并任命自己的牧师。至于他们的牧师，如果他们缺乏教育往往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并成为冒犯更有教养的阶层的理由，那么这就使他们得到了那些接近他们自己水平的人的青睐。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教师的精神力量有时会引起一种类似于那些听到第一批福音传教士的感觉，他们（世人）惊讶地 "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1765年，布朗大学成立；从那时起，在浸信会教派的支持下，又成立了许多其他学习机构。牛顿的神学院成立于1825年。在其教师中，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如西尔斯和哈克特。有人担心，随着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作为对牧师的准备，旧时代浸信会传教士所特有的家庭活力和热情会减少，传教士的数量会变得太少。1827年

至1855年担任布朗大学校长的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1796-1865）在晚年就有这样的感觉，他是该教派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名声显赫的教师和作家。1850年，美国圣经联盟成立，目的是采购和传播符合浸信会成员认为正确的解释的圣经版本。浸礼会学者对授权的英文版本进行了修订，T. J. Conant博士是其中的主要作者之一。1845年，由于关于奴隶制的鼓动，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经双方同意分离，并开始在不同的组织下开展传教和其他慈善工作。

除了刚才介绍的常规或加尔文主义浸礼会外，还有其他几个教派对圣礼采取类似的观点。其中一个规模较小的团体是自由意志浸信会，他们在神学上属于阿米念派。1827年，他们在新英格兰建立了一个大会堂。门诺派很早就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在那里，"邓克尔派"，其中一小部分成为 "第七日 "浸信会，在英国被称为安息日派，是在1719年建立的。1810年，来自爱尔兰北部、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亚历山大-坎贝尔加入了他的父亲托马斯-坎贝尔，后者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门徒长老会牧师。他们最初的努力方向是恢复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使徒的主要原则，并促进基督教的联合。他们很快就确信，浸礼是唯一正确的洗礼方法，而婴儿洗礼是非法的。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现在是这个运动的领袖，在1827年，由于一些意见分歧，他被排除在浸礼会的团契之外。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西部和西南部各州。坎贝尔教导说，重生是通过话语，或圣经中提出的真理，圣灵专门通过这些话语施加影响，而在洗礼中，信徒的重生是通过他个人接受赦免和公义来完成。所有由人类组成的信条都被摒弃了。他们有时被称为 "坎贝尔派"，他们只称自己为 "门徒 "或 "基督徒"。每个教会都是独立的，但各教会在传教和其他基督教的工作中团结起来。每个教会的官员、长老和执事都由其成员选出。坎贝尔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并因其在辩论中的准备工作而备受瞩目。他写了《基督教体系》和其他作品。在大多数细节上，"门徒会 "与广大的福音派信徒完全一致。他们吸

收了被称为″基督徒″的教派的一部分，该教派产生于三个不同的运动（约1800年）。已故的加菲尔德总统是″门徒会″成员之一，并在俄亥俄州希拉姆的他们的学院中担任了几年的教师。

在革命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圣公会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偶尔也有一些例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耶鲁大学校长卡特勒博士，他是一位公理会的牧师，于1722年前往英国接受圣职。与他同行的还有康涅狄格州的另一位公理会牧师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也在同一时间（1723年）被重新授予圣职，并在之后成为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院长。战争开始时，东部各州的圣公会牧师一般都是宣传协会的传教士，他们要么离开这个国家去了英国，要么，如果他们留下来，就会被认为是在与殖民地的争斗中同情英国政府。主教会在中部各省得到的官方支持，只是让它在所有抵制议会对美国社区的傲慢态度的人中不那么受欢迎。在费城，杜赫一开始是个爱国的神职人员，但在1777年，他试图劝说华盛顿放弃他认为无望的竞争。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他的财产也被没收。

在弗吉尼亚州，神职人员经常过着漫不经心的生活。在战争期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去了英国。在《独立宣言》发表前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不时地担心，尤其是在新英格兰，担心英国政府会在殖民地建立主教团。塞克大主教以及与他一起提出这一计划的其他人,只希望设立具有纯粹宗教职能的主教，这是事实。但传播协会的传教士们当时在新英格兰的村庄里很活跃。如果这样的计划得到实施，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没有人可以预料。

人们对议会的僭越行为充满了恐惧。人们认为，在美洲任命主教需要议会的法案。″有一种普遍的、公正的担忧,″约翰-亚当斯在后来写道，″主教、教区、教堂、牧师和什一税都将由宗教议会强加给我们。这种忧虑并不局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弗吉尼亚，人们普遍反对这种性质的项目，理由也是如此。

大部分由圣公会教徒组成的弗吉尼亚州议会感谢四位神职人员对这种提议的抗议。他们宁愿选择没有主教的所有缺点，也不愿意看到扩大宗教议会的管辖权和减少属于省级立法机构的自治权力议会的危险。”

怀特主教观察到，当时的教友们普遍反对获得一位美国主教。这位高尚的人以其特有的坦率，为那些对美国主教职位项目感到政治担忧的人开脱了所有的不诚恳。他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独立一实现，反对者就放下了他们的抵抗。然后，约翰-亚当斯热情地推动了在英国为美国主教争取祝圣的努力。怀特主教自己也承认，他也曾有过上述担忧。他说，"英国政府如果批准在殖民地设立主教职位，就会根据新计划的统治，努力使其服从于一个政党的支持，这并非不可能"。

美国的圣公会在革命斗争后的组织和持续存在，主要归功于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威廉-怀特，另一个是塞缪尔-西伯里。由于他们杰出的担当和基督徒的智慧，从那些看似无望的不和谐因素中，出现了联合与和谐，并在形式和安排上有了永久和增长的种子。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主教。怀特是费城的一位牧师，他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圣公会教徒，他甚至建议应该挑选监督员，他们应该在没有祝圣的情况下行使主教的职能。经过各种协商，在从纽约到弗吉尼亚的七个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牧师和非牧师代表的会议上，对祈祷书和条款进行了修订。这样编写的书被称为 "拟议的书"。这些修改决不限于建立独立的美国政府所需要或建议的修改。这些条款被大幅修改，并被减少到20条。与此同时，康涅狄格州的少数神职人员在该州的伍德伯里举行会议，并选择塞缪尔-西伯里为他们的主教;他在英格兰接受祝圣的过程中遇到了政治障碍，于是在苏格兰被不具约束力的主教们祝圣了。

1787年2月4日，在纽约被选为主教的Samuel Provoost和在宾夕法尼亚被选为同一职位的William White在兰贝斯被祝圣。随后（1790年9月19日），弗吉

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伦敦被祝圣；这样，英国就有了三位主教的继承人。1789年，大会召开，Seabury主教和他在东方的弟兄们应邀出席。教会的章程已经商定。怀特主教和他的伙伴们所珍视的教会精神类型与另一方的高级教会倾向很不协调。此外，普罗沃斯特对承认西伯里的祝圣仪式的有效性犹豫不决，并对他本人怀有敌意。这似乎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西伯里曾是一个英国军团的牧师，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忠诚的。这里有一个不可调和的、持久的分歧的所有材料。但是，个人和神学方面的困难被怀特和西伯里的良好意识所扫除。他们都不是敏锐或博学的神学家，但他们为彼此的会议带来了一种和解的精神。会议决定保留《尼西亚信条》，《亚他那修信条》，西伯里不情愿地同意了祈祷书。他似乎认为它是在东方教会中使用的。他对圣餐仪式的变化感到满意，这些变化引入了他非常赞成的苏格兰祈祷书的特殊性。“奉献 ″和 ″祈求 ″被安排在分发面包之前。关于洗礼中的十字架标志，也采用了同样的规定。赦免书被排除在探视病人的仪式之外。在不同的地方，″牧师 ″被替换为 ″神父″。在1801年的会议上，保留了Seabury不赞成的《三十九条》，并稍作修改后获得通过，但没有要求神职人员明确赞成这些条款。这些条款在美国教会中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强制性，这是一个问题。在美国圣公会的章程中，既要有教区会议，也要有全国会议。教友代表的原则被采纳。在大会上，各项措施将由主教院和代表院同时采取行动，代表院由教士和非教士代表组成。与英国教会不同的是，它不仅与国家完全分离，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平信徒参与教会立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圣公会的相应发展和进步并没有实现令人惊讶的战胜不和的危险而自然产生的快乐预兆。1802年，立法机关下令出售弗吉尼亚州的（圣公会教会产业）glebe土地和其他教会财产，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迪逊是一位不活跃的主教。但在他的继任者摩尔的领导下，特别是在1829年威廉-米德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助理主教后，由于他不遗余力的谨慎努

力，该地区的圣公会得以复兴。此前，他曾带头在亚历山大城创办了一所神学学校。在新英格兰，格里斯沃尔德多年来（1811-1843）都是受人尊敬的主教。但是，在建立教会和刺激其扩展方面的最高影响力要归功于霍巴特，1811年至1830年的纽约主教。他拒绝承认除圣公会之外的任何其他教团的有效性，对其他基督教团体合作的宗教团体敬而远之，并在总体上坚定地支持高等教会（即等级制教会）的理论。除了这类活动外，他还将一种强烈的热情带入了实际的基督教工作中。牛津大学 ″盎格鲁-普世教会 ″学派的兴起，自然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吸引了很多人的同情。所谓更自由的学派的产物之一是1853年的 ″纪念运动″，威廉-A-穆伦伯格（1796-1877）是其主要作者。这是向主教们发出的请愿书，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礼仪自由，并打开大门，让更多人接受圣公会的任命。教会代表大会的建立，每年举行一次，讨论教会和美国基督徒特别感兴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要归功于自由派的领导人。它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874年举行的。为了顺应一个广泛的愿望，不局限于任何一类神学家，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修订《祈祷书》，目的是为了丰富礼仪服务，并使其使用更加灵活。他们的劳动成果体现在 ″附件的书 ″中。其中一些建议已被采纳，而关于其他许多建议，还在等待决定。1886年，主教们就基督教联合的问题向公众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以和解的语气写成，并表示愿意在礼拜方式和其他方面作出巨大的妥协，但前提是坚持主教的任命。

盎格鲁-普世教会神学的传播和高教会党（即主张等级制教会）的发展唤起了强烈的反对。低等教会情绪（即主张会众主义教会）的一个成果体现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对祈祷书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消除一些人所称的 ″罗马化 ″的因素。与1873年在纽约举行的福音派联盟会议有关的情况，导致肯塔基州助理主教乔治-D-卡明斯退出了新教圣公会的牧师职位。他和其他人现在组织了 ″改革派圣公会″。它的制定者不承认主教的神圣权利，主教和长老之间的秩序区别，教会中的特殊圣职。祈祷书的修订是为了排除这些观点。改革派教会的主教与其他长老坐在一个机构中。需要说明的是，新教圣公会的主教

们在1871年发表了一份 ″声明″,大意是洗礼仪式中的 ″重生 ″一词并不能 ″确定洗礼主体的道德变化是在圣礼中产生的″。

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长老会成员在佛罗里达州（1562年）、卡罗来纳州（1565年）的长老会中建立了早期的定居点，但这些定居点并没有被证明是永久性的。1685年，大批胡格诺派教徒移民到南卡罗来纳州。在该州的历史上，胡格诺派的名字是最杰出的。但在新英格兰、纽约和卡罗莱纳州，大多数法国新教徒与英国血统的公理会、圣公会或长老会已经形成的教会联合起来。

在十七世纪，有相当数量的讲英语的长老会成员移民到了英国。但在与当时的公理会教会联合时没有发现任何困难。1708年之后，康涅狄格州的公理会教会的政府在性质上是半长老会的。康涅狄格人在长岛组建的教会最终成为长老会。在卡罗琳时期，大多数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移民都在东、西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定居。1683年，Francis Mackemie牧师从爱尔兰北部被派来传教，并在马里兰定居下来。第一个长老会于1705年在费城成立，第一个由三位长老组成的主教会于1716年成立。1729年，主教会议″通过法案″，根据该法案，威斯敏斯特忏悔录被作为教义和政体的标准，涉及所有基本和必要的条款。

在革命之前，长老会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其成员一般都是美国自由事业的认真捍卫者。约翰-威瑟斯庞是《独立宣言》的坚定拥护者，是通过该宣言的国会成员，后来在公共事务中也很有影响力。战争结束后，从当时存在的16个长老会中成立了4个会议；第二年（1789年），第一届大会第一届大会在费城召开。在那里，全国长老会的章程被制定出来。会议通过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并作了一些修改，几乎只涉及到与民事文官政府和行政机构的职责有关的问题。在本世纪末，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广泛复兴大大增加了该教派的力量，但同时也造成了分裂，并导致 ″坎伯兰长老会 ″的崛起。1801年与

公理会达成的 ″联合计划 ″是促进长老会在纽约和俄亥俄州以北地区传播的一种手段。教义上的分歧逐渐在教会和长老会之间产生，而这些教会和长老会的前身是苏格兰人和美国人。教会中以苏格兰和爱尔兰元素为主的教会和长老会，与那些被新英格兰改良的加尔文主义所浸染的教会和长老会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前者严格坚持 ″旧派 ″和 ″新派 ″的长老会制度，并反对与公理会和其他团体的合作形式，如 ″联合计划 ″和在国内外传播福音的团体中所体现的。除了这些教义和教会上的分歧外，国内反奴隶制运动的进展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争论来源，它在大会的辩论和程序中混杂着影响。

许多争议与试图将持 ″新派 ″观点的杰出牧师艾伯特-巴恩斯、乔治-达菲尔德和莱曼-比彻判为异端有关。其结果是，1838年出现了分裂，并组织了两个集会。普林斯顿神学院成立于1812年，其教授在 ″旧派 ″分支中非常突出，由他们出版了《圣经汇编》这一神学评论。1836年成立于纽约的联合神学院是灌输 ″新派 ″温和加尔文主义的主要机构之一。爱德华-罗宾逊博士因其关于巴勒斯坦地理的著作而闻名，从1837年到1863年去世，一直担任圣经文学的教席。他编辑了一份博学的神学季刊《圣经文献》。奥本神学院成立于1820年，与 ″新学派 ″有共鸣。在战争前夕，即1862年，旧派大会分裂，南方长老会成立。在北方长老会中，争论中的旧问题已经过时了。一种和解和普世教会的精神占了上风，以至于，在1869年实现了重合，1870年5月，第一次统一的大会在费城举行了会议。教会为开展传教和其他基督教工作而建立的组织，是由以前分离的两个分支的董事会和委员会联合而成的。坎伯兰长老会是在与1797年在肯塔基州开始的复兴有关的情况下产生的。坎伯兰长老会对那些被认为教育有缺陷的人提出异议。由此产生的分歧，在1810年导致了这个被教会高层司法机构解散的长老会的重组。新的教派从其信条中排除了加尔文主义的预定和有限赎罪的教义;但在其他方面坚持了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它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机构。北美的 ″联合长老会 ″就是这样的由 ″准改革派 ″和 ″联合长老会 ″结合的产物。

联合归正会本身是由两个小团体的联合而产生的，它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的分支。其中一个是由一些所谓的 ″联系教会 ″组成的；另一个是 ″改革派长老会″，由来自苏格兰的移民组成，他们对1688年的解决方案不满，认为国家对教会的权力太大。所提到的联合，即产生了 ″联合归正会″，发生在1782年。约翰-梅森（John M. Mason）是美国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是这个教会的主要神职人员，并在1804年在纽约成立的神学学校中担任教授。1782年，″准长老会 ″的残余势力在联盟中置身事外，直到1858年，他们才与 ″准改革派 ″一起加入了 ″联合长老会″。但没有加入1782年联盟的 ″准归正会 ″的残余势力在 ″美国归正长老会 ″中得以延续。这个教派的一个独立分支强烈反对美国宪法，认为它是异教徒，因为它没有明确承认上帝的存在和宗教的义务，因此拒绝行使选举权。

在美国，″改革派 ″一词和欧洲一样，被用来指代新教徒中的加尔文主义分支。如上所述，它被应用于源于英国的一个以上的教派。它也是最初由来自荷兰和德国的移民组成的加尔文主义团体名称的一部分。后者，即 ″德国改革派″，我们很快就会谈到。前者是由来自荷兰的基督徒组成，最初被称为 ″荷兰归正会″。它的正确名称是现在的 ″美国归正会″。它是美国最古老、最值得尊敬的宗教教派之一。它是由第一批移民在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建立的。它的第一座教堂是在1628年成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牧师都是从荷兰派来的。这种情况，再加上在神圣的仪式中长期使用荷兰语，阻碍了这个有许多力量来源的机构的发展。它在自我管理的制度下获得一个统一的组织方面进展缓慢。它的组织包括班级、特别会议和总会议，并与霍尔的改革派教会相似。虽然它采用《贝尔格忏悔录》和《多特信条》，但其主要标志是《海德堡教义》。罗格斯学院是其主要的文学机构，成立于1770年。1867年，″荷兰人 ″一词通过正式行动从该教派到那时为止的名称中删除。

在十七世纪，路德教派从荷兰来到纽约，并从瑞典来到特拉华河畔。1710年，在安妮女王的作用下，四千名路德教徒从帕拉特州被赶到了纽约、宾夕法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1734年，另一批来自萨尔茨堡的路德宗流亡者在乔治亚州定居。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有相当数量的路德宗基督徒，但他们来时没有牧师，没有稳定的组织，不得不依靠学校教师和其他非专业人员来主持他们的宗教集会。其中一些人的行为是松散的或不规范的，偶尔会假定行使牧师的职能。最后，1742年，亨利-梅尔基奥-穆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ühlenberg）被派了过来，他具有令人钦佩的有效服务的资格。他发现三个教会中的两个--其中一个在费城--特别委托给他负责，处于混乱和分裂状态。此外，他还立即被带入了与津赞道夫和其他摩拉维亚人的冲突中。他们起初倾向于把他看作是属于他们的领域的一个入侵者。由于他不辞辛劳的工作和不加掩饰的宗教热情，再加上高超的知识天赋，路德教派的组织得益于此。在他的领导下，第一个路德会于1748年在费城成立。1787年，也就是穆伦伯格去世的那一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富兰克林学院成立了，他的儿子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革命军中服役。战争结束后，几千名黑森人留下来，并加入了路德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教派缺乏繁荣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较保守的人决心保留德语，而许多人则希望让他们的孩子熟悉英语，并以英语进行宗教仪式。。一个有希望的事件是在1820年成立了美国路德教会总联合会。大量且日益增多的移民涌入，引起了宗教观点的多样化。1864年，由于教义上的分歧，导致了另一个伟大的路德教组织 ″总理事会 ″的成立，它于1867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它是由奥格斯堡忏悔录的严格信徒组成的。这个路德派分支的主要成员之一是著名的教师和作家查尔斯-P-克劳斯。对更严格遵守路德宗标准的要求导致在1872年成立了第三个机构，即 ″路德教会会议″。它的成员在密苏里州非常多。许多人从撒克逊州过来，对旧的路德宗正统思想有强烈的依恋。除了这三个分部外，在内战开始时，还出现了南方各州的总联合会，由退出与北方弟兄们的关系的路德教徒组成。在路德教会中，有一种决定性的、日益增长的对在德国长期使用的

礼仪形式的偏爱。他们的政体总体上可以说是包含了公理会和长老会的元素。

德国归正会--"美国的归正会"--一开始大多是由来自帕拉丁的流亡者组成。他们一般都在宾夕法尼亚州安家落户。第一个委员会，或称会议，成立于1747年。它的议事程序总是被送到阿姆斯特丹的教区进行修订，因为它和荷兰归正会一样，与荷兰教会处于从属关系。移民工作继续进行，但服事新来者的牧师相对较少。1773年，该教会解除了与阿姆斯特丹教会的联系。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现在独立的美国教会收到了大量的加入者，但在有序的管理和牧师的教育方面却不那么顺利。此外，它在某种程度上被从德国带来的理性主义观点所感染。随之而来的是反动，1825年成立了神学院，10年后，该学院被安置在梅克斯堡。1836年，马歇尔学院在那里成立。在这所学院里，F.A.Rauch，一位优秀的哲学教师，是第一任院长。1840年，约翰-W-内林成为神学院的教义神学教授，也是该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菲利普-沙夫在那里开始了他作为教师和教会历史作家的重要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作品引起了一场轰动，被称为 "梅克尔堡神学"。海德堡教义，即德国归正会的信条，受到了梅兰学派的影响，其特点可以用一些模糊的词语来描述，即教会性和圣事性，同时还受到更明确但不僵化的加尔文主义类型的影响。在麦克斯堡学派的著作中，这两个要素中的前一个，即来自梅兰的要素，再次被带到了前台。在该体系中，基督的神人地位被赋予了核心地位，据说通过他，不仅可以实现和解，还可以将新的精神生活引入人类，而人类在第一个亚当身上就已经脱离了上帝。在与罗马教会的观念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们努力将这些观念中所体现的真理纳入其中，但并不放弃宗教改革的独特原则。人们坚持认为，圣礼是宽恕的保证，是恩典的载体，也是标志。与这一教导有关的是礼仪崇拜的复兴。由沙夫等人编写的《敬拜令》被引入，供教会选择使用。教会的培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有一些来自帕拉丁的德国逃亡者在爱尔兰定居，并在那里接受了卫理公会。

这些人中有一队移民到了纽约。其中有菲利普-艾姆bury，一个班长和当地的传教士。在他们中的一位名叫芭芭拉-赫克（Barbara Heck）的虔诚妇女的紧急劝告下，他于1766年恢复了向其移民同胞传教的工作。他在一位英国军官托马斯-韦伯上尉身上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助手，卫斯理曾授权他担任当地的传教士。就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当地传教士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Robert Strawbridge）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并在马里兰州组织了课程。1771年，卫斯理派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过来担任监督员，不久之后，托马斯-兰金（Thomas Rankin）也来了，他成了助理。当革命战争爆发时，种植卫斯理教义的工作在不同的地方吉祥地开始了。1775年6月，卫斯理写信给英国总理和殖民地秘书，劝说他们不要对美国人使用武力，尽管他在信中自称是 ″一个高级教会的人，一个高级教会的儿子，从小就在服从和不抵抗的最高理念中长大″。但不久之后，他被约翰逊博士的反美小册子《税收不是暴政》所打动，并亲自出马，写了一本小册子，几乎只是对它的删节。然而，他指示他在美国的传教士保持严格的中立，阿斯伯里和其他人也遵循这一建议。但这样的立场不可能不使他们在美国遭受厌恶和威胁，甚至是偶尔的暴力。圣公会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卫理公会的皈依者在战争期间很难从那里接受圣礼。阿斯伯里反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管理主的圣餐；但斯特劳布里奇在这方面无法控制。革命的结束带来了缓解。1784年，卫斯理保留了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作为监督人或主教。在他到达美国后，他将阿斯伯里祝圣为同一职位。科克并没有长期居住在这个国家，尽管他曾九次访问这个国家。在经历了艰苦的工作之后，他在前往锡兰的途中去世，他要去那里建立一个传教所。1784年12月，在巴尔的摩举行了一次有60位牧师参加的大会。在那里，科克和阿斯伯里的选择得到了确认，并且由卫斯理编写了一份信条，其中包括25条。它是在英国教会的三十九条基础上制定的。省略了奥古斯丁主义或加尔文主义的教义特点；谨慎地避免了一些可能被某些人间接认为有利于 ″洗礼重生 ″思想的措辞，而卫斯理以前一直赞同这种思想，也许他从未明确否认过这种思想；但卫斯理自己对圣灵的见

证和基督徒的完善的看法没有被引入。问题是，人们是否期望所有加入卫理公会的人都相信这一信条。在卫斯理与他的兄弟于1743年出版的 ″联合协会的一般规则 ″中，并没有提出加入的教条要求。唯一的资格是希望得救，以及基督徒行为的细节。卫斯理一生都声称,除了 ″真正渴望拯救自己的灵魂 ″之外，不需要对成员提出任何要求。对于传教士来说，需要同意卫斯理的 ″新约圣经注释 ″和他的 ″布道 ″中的一部分。史蒂文斯在他关于卫理公会历史的详尽著作中得出结论，在巴尔的摩通过的条款适用于神职人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卫斯理把《使徒信经》留在了洗礼仪式上。现在，在阿斯伯里的领导下，卫理公会的完整组织之路已经打开，它的巡回传道规则，它的班级制度，它的地方性阿斯伯里会议，以及它的全国性大会。阿斯伯里一直活到1816年。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不多，因为他16岁就开始传教了。但他掌握了一些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他天生的敏锐和清晰的智力远远弥补了早期训练的不足。除了作为传教士的能力外，他还有一种指挥能力和组织天才，这一点在他与卫斯理的交往中得到了加强。阿斯伯里的一生将涉及美国卫理公会前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不停地旅行；据说，平均每年要走六千英里。他按立了超过四千名传教士。通过他和他的合作者，福音被带入西部社区先驱者们分散的住所，并被许多人接受，而这些人是其他机构无法达到的。关于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旅行和劳作的记录使人生动地想起使徒和他们的助手，以及他们在基督教的第一个时代所经历的危险。他们的教会组织是如此完整，以至于曾经得到的东西都没有失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数的学院和大学成长起来，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图书出版机构--″图书关注″，开始于1789年。在讲坛上，伴随着数以千计的默默无闻的传教士简朴但有效的口才，人们听到了萨默菲尔德（1798-1825）和马菲特（1794-1850）等复兴演说家的声音，以及斯蒂芬-奥林（1797-1851）等强有力的推理者的声音。神学学校被建立起来，卫理公会的学者们对神学文献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872年，教友代表被引入大会。1845年，卫理公会因奴隶制的争论而分裂，南方教会被单独组织。这次破裂是美国内战之前的严重预兆之一。在卫理公会的小团体中，″

新教卫理公会 ″的人数最多。这是在1830年组织的，因为一部分地方传教士和非专业人员希望在整个教派的教会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它不喜欢主教团行使的权力，在新的组织中，主教团被废除了。它的信条与卫理公会的主要机构没有什么不同。

“联合兄弟会 ″是一个宗教组织，与卫理公会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创始人是菲利普-威廉。奥特宾，德国归正会的一名传教士，于1752年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布道时，他自己心中的宗教热情被唤醒，他觉得这确实是一种新生，于是他在不同地方举行聚会。在来自不同教派的与会者中，有一次，门诺派的传教士马丁-博姆（Martin Boehm）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在他的布道结束时，奥特宾握住他的手，以示兄弟般的友谊，说：″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这暗示了教会的名称，通过他们的共同劳动，教会获得了稳定的形式。非专业传教士由他们委托。“联合弟兄会 ″的信条是阿米念派的，他们的组织与卫理公会的类似。他们选举自己的主教，任期有限。他们一直是奴隶制的强烈反对者。他们在建立学习机构和传播宗教知识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地积极努力。

1740年，摩拉维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定居，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三个城镇，其中伯利恒是一所大学和神学院的所在地，是最著名的。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塞勒姆建立了另一个中心。自1844年以来，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将摩拉维亚人排除在其城镇之外的规则。在这个国家，未婚者的三所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和寡妇会--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专门有权按立的主教。总主教会议每十年在赫恩胡特举行一次；但美洲是一个独立的省，有两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个省长老会，负责处理其范围内的教会事务。主教制度不是教区制度。摩拉维亚人的崇拜是礼仪性的。

与公谊会（贵格会）历史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他们在1827年分成了

两个部门。希克斯（1748-1830），一个在公谊会中很受欢迎的布道者，他在教学中倾向于一元论的观点，即基督的人格和赎罪。一场广泛的争议产生了，其结果是社团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一般称为″希克斯派贵格会″。而其余的人，坚持旧的观点，被称为″正统派″。公谊会的会众在月度、季度和年度会议上相互联系，代表从低级会议被派往高级会议。那些证明有圣灵呼召传道的人被承认为牧师。公谊会在年轻人的教育、道德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成员人数如此之少的宗教团体的常规。

当美国宣布独立时，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的罗马天主教徒很少。在玛丽地有一万六千人，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革命后，在许多殖民地限制他们公民特权的法律逐渐消失了。罗德岛的法规中禁止他们投票的法律在1784年被废除了。美国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主教是约翰-卡罗尔（1735-1815），他是马里兰州人，在法国接受过教育，并在国外生活多年。该教区成立于1789年。卡罗尔是在英国被祝圣的。他拥有巴尔的摩主教的头衔，在他去世前不久被任命为大主教。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因其道德上的卓越表现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波士顿的第一位主教是Cheverus（1768-1836），他是法国人，在法国当过牧师。他于1795年加入波士顿的天主教传教团。1795年，他在新英格兰为他的教会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那里他得到了许多新教徒的尊敬，1823年他被召回法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巴尔的摩在1808年被定为大主教区。第一届省议会于1829年在该市举行。罗马天主教会在美国的进步是由于该团体的成员从外国大量移民而来。美国人从新教皈依的人数并不多。其中有一位新教圣公会的主教，即北卡罗来纳州的艾夫斯主教（1852年）。在皈依罗马教会的美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奥雷斯特-A-布朗森（1803-1876）。他的早期教育是有缺陷的。他的思维非常活跃，而且很善于推理。他热衷于学习法国和德国的哲学，并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神学方面写出了许多有活力的风格和原创性的文章。1844年，他从一个怀疑论者的立场转向罗马教会，并在他的″季度

评论″中为其辩护多年。约翰-休斯（1798-1864）是一位著名的论战者，也是管理主教办公室的有效人员，他是纽约的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1852年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全会，是美国罗马天主教徒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那里，教会对秘密社团和公立学校制度的反对意见得到了阐述。第三次全體理事會於1884年11月9日在巴爾的摩召開，並持續開會約一個月。教会的进步表现在，出席会议的有属于美国的十四位大主教、六十位主教和一位使徒长老。主席是吉本斯大主教。理事会的牧函强调了对神职人员进行非神学和技术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维护公民和宗教自由，需要对人民进行与世俗学校教育相关的宗教培训；以及家庭责任，包括家庭奉献的好处。据了解，议会提议，除非有原因，否则校长不得免职，并应选举主教；应为全国制定教义；并应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

对美国的宗教现象进行概述时，很难不提到摩门教。正如穆罕默德教派的情况一样，摩门教中是否有足够的基督教成分，或者它是否没有被适当地归入假宗教或异教徒宗教。摩门教派由约瑟夫-斯密于1830年在纽约的曼彻斯特创立。他自称被天使引导到一个地方，发现那里埋藏着写在薄薄的金板上的″摩门经″。一个叫所罗门-斯波尔丁的人为另一个目的写的手稿在多大程度上为这部摩门圣经提供了材料，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在风格上，它是对《圣经》授权版本的模仿。据称它是摩门的作品，摩门是希伯来人，是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几个世纪从巴勒斯坦移居到智利的移民的幸存者。斯密建立了摩门教，或他所称的″末世圣徒″，就是基于这个骗局。1843年，他宣称得到了认可一夫多妻制的启示。1848年，摩门教徒被赶出伊利诺伊州，迁至犹他州，并建立了盐湖城。杨百翰（Brigham Young）取代了被暴徒杀害的史密斯，成为领袖。杨于1877年去世，由英国人约翰-泰勒继任。他最近去世了。摩门教的新兵是由派往欧洲的使者获得的，主要来自英国、瑞典和挪威的工人阶层。

一个反多妻制的团体从摩门教团体中分离出来，在1851年起源。

==========

第七章

基督教传教士。罗马天主教在十九世纪

在宗教改革的第一个时代，天主教会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在世界各地建立的传教士队伍，在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开始萎靡不振。关于中国和马拉巴尔习俗的争论，这一点已经说过了，1773年耶稣会被镇压，政治革命搅乱了法国和欧洲，并在一段时间内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权力、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然而，本世纪的传教活动还没有开始，教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传教时代。庇佑七世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特权，恢复了耶稣会士，并重新开设了宣传学院，这是所有天主教机构中最重要的传教士教育机构。该学院的繁荣继续增加，在1867年，它的学生中有许多国家的代表，以至于在主显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人们用25种不同的语言吟唱着降临的祝福。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在本世纪和以前一样，都是在其机构--位于罗马的传播信仰部--的指导下进行。它通常被称为〝宣传〞，成立于1622年。通过它的权威和简单的传教士，包括小教堂、孤儿院，也许还有医院，可能会被提升到一个使徒县，或代管区，或者，最后是主教区。这样一来，罗马教会的等级组织就几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传教士们的行动由于受到由宣传部红衣主教组成的单一委员会的指导而变得更加有效。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经常阻碍新教传教士协会工作的相互干扰。在为支持传教士做出贡献的组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822年在

里昂成立的信仰传播协会。不仅是培训学院，还有宗教团体，特别是耶稣会、方济各会、多米尼克会、拉扎会、皮普斯会、卡普钦会和加尔默罗会，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传递他们工作的信息。

他们向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传递教会的信息。在土耳其帝国和波斯，以及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他们不断地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各教派、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等都效忠于罗马教廷。在印度的工作，在上个世纪因马拉巴尔习俗的争论和耶稣会的镇压而被削弱，1834年后又因果阿的分裂而进一步受到干扰。但这种不幸并没有阻止教会的稳定发展。在东亚的安南、中国和日本，传教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迫害，直到通过欧洲列强的影响在这些地方宣布宗教自由。非洲的气候也不比东方人的刀剑更有破坏力。但是，除了对基督和圣母教会的忠诚，传教士们并没有因为危险而退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觊觎殉道者的冠冕。

在大洋彼岸，在英属美洲和美国，教会的人数和权威都在稳步增长，而在墨西哥和南美的几个共和国，教会被剥夺了许多财富和许多古老的特权。天主教传教士虽然在这些古老的国家辛勤劳作，但并没有忘记南海岛民。他们在这些民族中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瓦利斯岛和甘比尔岛，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繁荣的传教所。但是，本世纪的标志不是罗马教会在世界不同土地上取得的成功，而是新教传教士的崛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新教教会并不是在渴望将福音传给当时在基督教世界范围之外的国家。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所有福音派团体所特有的传教精神才开始有所体现。1644年，马萨诸塞州总法院下令，各县法院应确保居住在各自县内的印第安人得到 ″对他们的教育″，郡内的印第安人应接受 ″关于上帝的知识和敬拜的指导″。为了推动这些和类似的努力，五年后，漫长的议会创建了一个团体，名为 ″新英格兰福音传播主席

和协会"。这就是第一个新教传教士协会、资助了约翰-艾略特和其他人，他们在居住在清教徒殖民地附近的印第安人中工作。这样开始的工作在下个世纪由大卫-布雷纳德（1718-1747）和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继续进行。

东印度群岛是顽强的尼德兰人从葡萄牙人的统治下夺取的许多殖民地，是17世纪初荷兰传教士活动的舞台。数以千计的人在这里受到文字利益的影响而接受了基督教，但当这些动机消失后，他们又重新陷入异教。荷兰人和英国人在这个时候所做的这种孤立的努力只能取得很小的成就。新教世界的宗教生活必须首先被激活：必须有一个活生生的基督教，而不是一个死的正统观念。德国虔诚主义者斯佩纳（1635-1705）和弗兰克（1663-1727）的工作对丹麦产生了影响，带来了如此必要的变化。1704年，在国王腓特烈四世的支持下，丹麦宫廷传教士、斯佩纳和弗兰克的朋友吕特哈勒传教士（Dr. LütHalle Mission, ken）本着基督教复兴的精神，开始了第一次传教。他派往印度东南海岸的特兰奎巴（Tranquebar）的人，在德国虔诚主义的氛围中接受了训练。传教士本身归功于哈勒孤儿院的创始人弗朗克的努力，甚至比丹麦国王和他的牧师还要多。因此，它被恰当地称为"丹麦-哈勒传教团"。齐根巴格（Ziegenbalg）寄给弗兰克的关于在特兰奎巴尔（Tranquebar）工作成功的报告，为这项事业募集了许多朋友。英国社团捐献了资金和书籍，国王乔治一世来信表示他很高兴，不仅对传教的进展感到满意，"而且，"他说，"因为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值得称赞的促进福音的热情。"

从虔诚主义运动中，摩拉维亚教会至少部分地得到了第一次传教的动力。Zinzendorf伯爵的庄园里，来自摩拉维亚的受迫害的弟兄们在1722年定居。他早期与弗兰克的交往，证实了他已经有了与基督认真交流的强烈倾向。在他被任命为摩拉维亚教会的主教后（1737年），他在一次布道中感叹道："我有一种激情，那就是他（基督），只有他。"在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黑奴

受苦的故事，以及挪威牧师汉斯-艾格德（Hans Egede）在格陵兰岛的耐心努力（尽管没有成功）的激励下，津森道夫和弟兄们在1732年决定从他们的人数中派两个人去每个国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前，18名传教士几乎是在没有钱或钱包的情况下，从赫恩胡特出发，在各地建立传教站，并在国外建立一个远远超过国内的基督教团体。

英国的福音派复兴，加上在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新同情心，传教士迎来了传教活动的辉煌时代。

在传教士的历史上，这个时代只比基督教时代的第一个时代不更引人注目。1784年，英国诺丁汉的一个浸信会牧师协会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人们为上帝的圣灵浇灌在教会和牧师身上进行更认真的祈祷，并补充说：″将福音传播到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应该是″你们热切请求的目标。这些想法，通过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在穆尔顿的努力，变成了行动。凯里1761年出生，是北安普敦郡一位校长和教区书记的儿子。他年轻时喜欢研究植物，并观察昆虫、鸟类和动物的习性。他也没有忽视语言。尽管他所处的环境给他带来了许多阻碍，但他还是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荷兰文和希伯来文。早在1781年，即诺丁汉会议的三年前，他就开始全神贯注于一个想法，即把福音传给异教徒。在他做鞋匠的店里，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排列着每个国家最新的宗教和政治统计数据。他一成为莫尔顿的牧师，就向邻近的牧师们敦促他的观点，但他们拒绝相信这样的计划不会受到困扰。当1792年5月在诺丁汉举行的协会即将解散时，他拉着富勒的胳膊，用恳求的语气问道：″那你毕竟是又要去做什么了吗？″这些话并非没有效果。10月2日，浸礼会成立，凯里是其第一批传教士之一。凯里乘船前往印度，并在那里，在该协会其他成员的帮助下，建立了塞兰波尔传教所。凯里寄给他在英国的朋友的信引起了仁人志士的兴趣，包括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不仅在持异议者中，而且在固定教会中。传教士也是如此--在这种感觉中，伦敦传教士协会应运

而生。

它是一个由独立派、长老会、卫理公会和圣公会组成的联盟，据说其 ″唯一的争斗，″不是为了促进某一部分的利益，因为基督是不分裂的，而是以团结的热忱让远方的人知道他本人的荣耀、他工作的完美、他恩典的奇迹和他救赎的溢出的祝福。″该协会的理事们和凯里一样，对 ″库克的航行 ″感兴趣，选择了南海群岛作为其首次活动的场所。同时，这个时代的宗教运动已经唤起了英国教会的新生命。1799年，16位神职人员在伟大的反奴隶制倡导者威尔伯福斯和其他志同道合者的鼓励下，成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于1812年成为教会传教士协会，负责在非洲和东方传教。该组织的原则之一是″应保持与其他传教士协会的友好关系″。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国外传播福音的协会，是独立派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同一时间，由旧的清教徒团体发展而来的 ″国外福音传播协会 ″也落入了高教党（即主张教会等级制度者）的手中。从那时起，就有人抱怨说，″它认为自己作为教会的代表，有理由'在别人的基础上到处建造'″。

卫理公会的人在传教的热情上并不落后于他们的弟兄们。1786年，科克乘船前往新斯科舍省，被一场风暴驱赶到南方，在西印度群岛登陆，并在那里开始向黑人奴隶传教。他在那里和锡兰开始的工作被他死后不久成立的卫斯理传道会所继承。

英国和爱尔兰长老会的努力自然被他们在苏格兰更多的兄弟们的努力所掩盖。苏格兰传教士协会和格拉斯哥传教士协会成立于1796年，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不再独立于苏格兰教会的组织而存在。迄今为止，既定教会中存在的对传教士的反对意见，被查尔默斯的恳切话语以及他强大的Duft个人影响力所克服。结果是，在1829年，亚历克斯·达夫，现代最杰出的传教士领袖之一，被派往印度。当1843年教会混乱时，达夫加入了自由教会运动，并在建立其

非常成功的传教工作中发挥了首要作用。从1847年开始，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就积极支持许多传教事业，主要是在西印度群岛。与这些英国协会合作的还有成立于1799年的宗教小册子协会，该协会以一种辅助性的86种语言发行书籍和小册子。

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成立于1804年，以至少196种语言或方言出版和发行圣经或其中的部分内容。除此以外，其他较小的组织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在爱丁堡也有一个医疗传教会。医生们在其机构中接受培训，前往各异教徒国家传扬福音，不仅用语言，而且用仁慈的医治行动。与许多大型协会有关的是妇女协会，其目的是启迪和拯救异教徒土地上无知和痛苦的妇女。

当传教活动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们也开始有了类似的热情。1808年，在塞缪尔-米尔斯（Samuel Mills）的努力下，威廉姆斯学院成立了一个社团，其目的是 "通过其成员的努力，向异教徒传教"。不久之后，该协会被转移到新成立的安多弗神学院，在那里，其成员由来自其他学院的年轻人增加。其中最出色的一位，阿多尼拉姆-贾德森，向1810年在布拉德福德召开的马萨诸塞州总协会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询问他们是否会在成为传教士的目标中得到教会的支持。这一呼吁导致了美国长老会传道会的成立。在这一年的年初，1812年，第一批传教士启程前往加尔各答。由于东印度公司政府的不宽容，他们被迫避难，其中两位在孟买，一位在缅甸，另一位在锡兰。大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同的事件，同样令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感到沮丧，那就是贾德森和赖斯对洗礼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因此而离开了董事会（即，他们认识到，浸礼才是符合圣经中的洗礼形式，并因此而回到美国、加入了浸信会）。然而，最后证明这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祝福。

因为他们唤起了美国的浸信会，形成了一个联盟，以促进传教士联盟的事业。1813年7月，贾德森在缅甸找到了他的路，这也是他们最成功的工作领域。美

国委员会虽然起源于公理会，但多年来得到了长老会和荷兰改革派教会的合作。但在1837年，老派的长老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委员会，即基督教委员会，新派在教会的两个分支重新合并后加入了该委员会的支持。1870年教会的两个分支重新联合后，新派加入了该委员会。荷兰归正会也在1857年切断了与美国委员会的联系，并独自开展工作。美国委员会在印度、桑威奇群岛和西亚堕落的教会中的工作尤其值得注意。与它有关的是一个独立的、繁荣的妇女委员会，其目的与前面提到的类似性质的组织相同。长老会和浸信会也有类似的妇女传教士协会。

欧洲大陆上的福音派团体--荷兰、德国和法国--尽管他们的劳动范围远远落后于讲英语的兄弟们--都充满了传教精神。该协会的总部设在巴塞尔，因此以巴塞尔为名。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德国组织，但它因其和谐地结合了路德教会和改革宗教会而引人注目。同样，出于同样的原因，莱茵传教会也是如此。

在对开展传教工作的组织作了这一简要的、因此也必然是不完善的概述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组织。它是对异教徒的福音，因此，还需要说明在不同地区所取得的成果。在许多地方，传教士在为他们的工作奠定基础时不得不克服障碍，以至于多年后传教士才得以稳固地建立，他们的各种机构也开始运作起来。陌生的语言和方言，在结构和形式上与欧洲的方言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其中一些甚至还没有被写成文字，因此需要掌握这些语言和方言，以制作语法和字典，以及圣经的翻译。传教士试图向其传授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的原则，这些民族要么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统治之下，这些宗教虽然被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侵蚀，但却灌输了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要么就是沉沦在最低级的野蛮阶段，对道德和宗教的印象不敏感。这些也是困扰传教士道路的重要

困难。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放荡不羁的欧洲冒险家的强烈嫉妒，或大贸易公司的怀疑和恐惧的阻碍，他们认为基督教启蒙的到来将结束他们的专制。但是，从巴塞洛缪-齐根巴格（Bartholomew Ziegenbalg）躺在特兰奎巴尔（Tranquebar）的丹麦监狱里，或者与当地儿童一起坐在沙地上学习泰米尔语的时候起，人们就本着使徒的精神前行，像优秀的十字架战士一样忍受苦难，并在许多挫折面前耐心地工作，直到福音和圣经在三百多种语言的民族中传播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在印度，也就是一些最早的传教士努力的地方，人们讲25种语言，坚持传教工作对象的是四大本地宗教体系--印度教，即婆罗门教，经佛陀的教导稍作修改，帕西教，穆罕默德教，以及所谓的魔鬼崇拜。1706年，齐根巴尔格和普吕肖在科罗曼德海岸的特兰奎巴尔开始了丹麦-哈勒传教团。这些人和他们的继任者用白话文向人们传授圣经，建立学校，并聚集了许多信徒。他们从Tranquebar出发，前往邻近的地区。他们在马德拉斯劳作。1758年，他们中的一个人基尔南德（Kiernander）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个传教所。施瓦兹，1750年到达该地，他是丹麦-哈勒协会派出的人员中最有能力的；他在正直方面有如此广泛的声誉，以至于马德拉斯政府正在与之谈判的著名的海德尔-阿里说："把这个基督徒送来吧，他不会欺骗我。"1793年，威尔凯里（William Carey）在加尔各答登陆，他为印度的福音化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获得了一个蓝靛厂厂长的职位，从而使自己和家人摆脱了贫困；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资源，他将自己出色的语言能力用于将经文翻译成孟加拉语和印度的其他语言。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韦尔斯利侯爵在加尔各答建立的新政府学院的孟加拉语教授，后来又被任命为梵语和马赫拉提语教授。从这时起，他将自己丰厚的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支持塞兰波尔传教团。他和他的伙伴马什曼和沃德 "万事俱备"，在半个世纪结束之前，他们作为主要成员的兄弟会以各种方式为传教会捐助了8万英镑。凯里于1834年去世，他在东方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不仅对传教事业，而且对语言学科学都是非常

宝贵的。

与此同时，伦敦传教会和教会传教士协会，以及传播协会，都派出了他们的代表赴印度。1823年，雷金纳德-希伯接替米德尔顿，担任加尔各答的主教。1830年，苏格兰教会派出的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所学校，该学校不是通过白话而是通过英语进行教学的。这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逐渐克服了起初受到的反对。许多协会的传教士急切地进入这一领域。在奥里萨（Orissa）地区，即有辱人格的朱格纳特崇拜的所在地，以及孟加拉最遥远的地区，都建立了传教站。甚至连 ″印度的雅典和印度教的主要据点 ″贝拿勒斯的人们也开始渴望一种比在他们的一千座寺庙中兴盛的宗教更纯净、更美好的宗教。在更远的北方，锲而不舍的摩拉维亚人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谷里劳作。在印度传教的早期，东印度公司的嫉妒心阻挠了传教士的努力。正是这种不宽容的态度驱使霍尔和美国传教委员会的A.B.C.诺特去了孟买，纽维尔去了塞伊，以及Judson到缅甸，从而有机会建立了三个繁荣的传教所。来自孟买的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在艾哈迈德努古尔（Ahmednuggur）建立了他们的传教所，通过直接的布道工作和本地圣经妇女的劳作，收集了许多皈依者。1834年，与卫斯理教派、浸礼会和英国教会协会共同在锡兰传教的传教士，试图将其部分精力转移到大陆上的劳动。因此，马杜拉传教会应运而生。亚历山大-达夫为加尔各答所做的工作，由另一位苏格兰人约翰-威尔逊为孟买所做，后者成为了一位杰出的东方学家。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协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印度人。将福音和基督教教育传给妇女一直是他们的目的。自1854年以来，它一直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进行，被称为 ″泽纳纳传教团″。由于在印度和锡兰所做的努力，在1883年，有超过60万的本地基督徒。

在缅甸，朱德生工作了六年，才有一个人信主。虽然从那时起，教会逐渐增多，但最显著的成功是在居住在内地的克伦人中取得的。牧师们没有被 ″这

个民族就像山里的野牛一样不可驯服〞的说法所动摇，而是进入了他们的国家。从丛林中的藏身处冒险出来的当地人知道新来的人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宗教教师后，松了一口气，说：〞我们的祖先说克伦人曾经有写在皮革上的上帝之书，但他们不小心让它被毁了：从那时起，作为一种惩罚，我们一直没有书籍，没有书面语言。〞传教士听取了他们的呼吁，将《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并将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缅甸教会中。

骄傲地珍视着孔子的格言，并按照道教和佛教的堕落仪式进行崇拜的中国，并没有在其境内接纳福音的使者，直到她被迫向卖鸦片的人打开大门。在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出的马礼逊开始住在广州--到1842年欧洲人被允许居住在五个条约港口之间的漫长时间里，《圣经》和其他基督教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并流传。美国委员会是第二个开始在中国工作的社团。此后，不少于28个协会进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省份和内地的一些省份也被福音触及。通过纯正的基督教文学来影响知识阶层一直是主要目标之一。直到1865年，才试图进入中部省份。在这一年，中国内地传教会成立，并开始了它的工作，这在一开始必然是一个准备工作。在中国的数以百万人计口中，1883年只有大约七万名基督徒，其中不少于两万名是圣餐者（即教会正式成员）；然而在驱散偶像崇拜和迷信的黑暗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日本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他们古老的神道教，但像许多东方民族一样，成为了佛祖的信徒。从1854年，即佩里-日本远征的那一天起，他们热切地寻求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和思想。美国的长老会是新教徒中第一个将西方国家的宗教带到他们身边的人。1877年，他们与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和美国归正会一起加入了“基督教联合教会〞。前一年，日本政府将星期日定为官方假日，显示了它对基督教机构的倾向性。

日本有一万三千名基督徒，其中大约五千人在1883年是圣餐者；从它充满希

望的未来，我们转向西亚，转向古代教会退化的残余中的改革。1821年，美国委员会的利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走过曾经被七大教会覆盖的地区后，成为经过叙利亚的第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新教传教士。当时在巴勒斯坦的那片土地上普遍存在无政府状态。叙利亚传教团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823年威廉-古德尔和艾萨克-伯德到达贝鲁特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遭到了马龙派的反对，他们的族长居住在卡诺宾，虽然他们是古老的莫诺特教派的一个分支，但在中世纪时，他们已经与罗马教廷联合起来。四年后，圣公会、路德教会、拉丁教会、希腊教会、马龙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和阿比西尼亚教会的代表聚会并举行了共融仪式。叙利亚福音派教会由此开始。1865年，由伊莱-史密斯博士开始，并在他去世后由范-戴克博士完成的《圣经》译本出版了。六年后，叙利亚新教的基石学院在贝鲁特奠基。与此同时，传教团被交到了长老会的手中，1870年，新派长老会的加入使它得到了加强。教会传道会在耶路撒冷、拿撒勒和其他历史悠久的城镇建立了站点。除此以外，还建立了其他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传教士。

亚美尼亚教会新生命的开始来自于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在俄罗斯的一个协会的帮助下，出版了古代和现代亚美尼亚语的圣经。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认真研究圣经，并接受了福音派的信仰。

1831年，古德尔博士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开设一个传教站。有一段时间，该教会内部似乎有可能会进行改革。但亚美尼亚的教会人士，像他们的希腊教友一样，对改革运动越来越嫉妒。最后，在1846年，他们对那些继续持有新观点的人发出了教会的诅咒。这导致了在这一年成立了第一个亚美尼亚福音派教会。传教士的工作从君士坦丁堡扩展到的各个城市，其他教会也立即组织起来。该领域在1860年被划分为三个大的部门，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土耳其传教区，在每个部门中后来都发展出了一个繁荣的学院。由于以前的版本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将圣经翻译成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在这一分支的传

教工作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古德尔博士（Schauffler）那样拥有如此高的地位、他的工作于1861年完成。在他身边的是绍夫勒博士，他用阿拉伯文或神圣的文字将《新约》翻译成土耳其文。在所有这些和类似影响的吸引下，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团体稳步发展，直到1883年，其人数接近十万。

美国委员会在西波斯的景教中开始了同样有趣的工作，并在1871年将其移交给长老会。第一个进入波斯东部地区的是摩拉维亚人。在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之后,他们不得不撤退。1811年,英国政府驻科恩波尔的牧师亨利-马丁(Henry Martyn）进入波斯国王的领地，以便将《新约》翻译成波斯语。他本已破碎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受到损害，他的版本完成一年后，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在这一地区，教会传道会正在进行这些早期先驱者所开始的工作。

在非洲，仍然存在早期基督教会的残余。这些教会是一神论的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怀有类似的信仰。为了接触这些教派，英国教会传教士进行了首次尝试，只是为1854年进入这一领域的美国联合长老会更成功的劳动做了准备。30年的布道和教育使科普特人中出现了一个基督教团体，人数达到八千，其中有一千多人是正式教会成员。福音传到了非洲其他地区，那里居住着数百个不同的部落，他们因迷信而堕落，说着奇怪的野蛮语言，并经常彼此发生流血冲突，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记录。1768年，9名摩拉维亚人在不健康的西海岸登陆，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成了疾病的受害者。他们是第一批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是从塞内冈比亚到殖民地角建立传教所的第一批人。如今，进入这一地区的16个社团已将大约十万名当地人带入基督教社区。

在南非做了更有效的工作,从18世纪最后几年伦敦传教会的范南非(VanSouth Africa)在卡菲尔人中建立的传教所开始。伦敦传教会著名的罗伯尔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曾经是一名苏格兰园丁，是第一批越过奥兰治河向居

住在贝丘纳兰的野生部落推进的人之一。在他这样的人的影响下，野蛮的酋长们被转化为正义与和平的朋友。他的助手和女婿是著名的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他和其他人一起，为使非洲内陆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利文斯通于1849年开始前往恩加米湖，并由此开始了对非洲未开发地区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在邦威罗湖岸边的生命结束。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在1861年试图在尼亚萨湖南部靠近希雷河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学代表团〞（代表牛津、达勒姆和都柏林）。不久之后，在北部的大湖岸边、刚果河岸边以及非洲的主要商队中心之一比赫，都建立了传教所。

1818年，伦敦协会的传教士进入马达加斯加时，当地人早已放弃了他们祖先的简单信仰。传统上说，这种信仰曾在马达加斯加兴盛一时，现在已经成为偶像崇拜者。国王拉达玛一世虽然自己是异教徒，但却赞成在他的人民中引入基督教教育。在他1828年去世时，他的一位妻子夺取了王位，并将所有阻挡她的人处死。尽管她热衷于她的民族的偶像，但她并没有阻止1831年两个基督教教会的成立。但仅仅过了几年，异教徒就劝说她说，新宗教的信徒们正在策划叛国。于是她开始了一场凶残的迫害，这种迫害几乎无人能及，直到1861年她去世时才结束。在这里，正如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一样，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首都附近的地区有25万当地的基督徒，在1883年成为传福音的中心，该岛的其他地区从这里开始传教。

在西半球，从格陵兰岛到巴塔哥尼亚都有新教传教士。爱斯基摩人从摩拉维亚人那里接受了福音，英属美洲的印第安人从教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福音。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从教会的传教士和卫斯理人那里得到了福音。居住在美国境内的本土部落，以及黑人和中国移民，在某种程度上都得到了美国教会各个组织的照顾。在西印度群岛，摩拉维亚人是新教徒中最早建立的传教士；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在推进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疾病在中

美洲和圭亚那肆虐，巴塔哥尼亚及其沿岸岛屿的当地人也很凶残，但传教站还是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并建立了小型基督教社区。

南太平洋群岛的传教士是基督教胜利的故事中最有趣的一页。在那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数千堕落的食人族被改造成了聪明、爱好和平的人。为了接触他们，传教士们既不畏惧劳苦，也不畏惧危险。伦敦协会在1796年派遣了他们的第一个传教团前往大溪地，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佳的岛屿，但居住着一个迷信、感性和吃人的种族。传教士受到了国王波马雷的接见，他的儿子波马雷二世也赞成引进新宗教。但直到1815年，当波马雷战胜了他的叛乱酋长时，基督教才获得了优势地位。两年后，岛上的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观看由威廉-埃利斯最近带来的大溪地拼写书、教义和《路加福音》的早期纸张，最近由威廉-埃利斯带来的印刷机打印出来。这些人当他们看到第一页印刷品时，"普遍发出了惊讶和喜悦的叫声"。不久之后，"年老的酋长、牧师和战士，手里拿着他们的拼写书，可能会看到他们坐在学校的长椅上，也许和一些小男孩或女孩并排坐在一起，他们现在正在接受字母的教育。" 当耶稣会士在一艘法国巡洋舰的炮火下登陆并捣毁教堂时，该岛及其周围的岛屿至少在外表上已经被基督教化。但皈依者仍保持着忠诚，并在1863年由巴黎（新教）传教士协会重新组织起来。

在本世纪初，夏威夷群岛在卡梅-哈梅哈一世（Kame Hameha I）的统治下联合起来，开展了更为出色的工作。1819年继任的李霍利霍（卡美哈美哈二世）允许夏威夷宗教的暴虐条例被废除，当崇拜偶像的酋长们起来反抗时，他不仅粉碎了叛乱，还摧毁了国家偶像和寺庙。与此同时，有几个三明治岛民已经找到了去美国的路。其中有一个叫奥布基亚的青年，他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登陆后，被耶鲁大学的建筑所吸引，问他们有什么用途。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发现他在这些建筑物的台阶上哭泣，因为没有人给他指导。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导致了美国委员会建立了夏威夷传教所。1820年，当传教

士在夏威夷群岛登陆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被一场战争席卷，古老的宗教及其偶像、庙宇和神职都已消亡。人们欣然听从传教士的教导。年复一年，教会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有所增长。1837年，一股宗教情感的浪潮席卷了这片土地，有两万多人皈依。传教士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在1848年，董事会开始组织独立的本地教会，准备从该领域撤出。15年后，传教会被置于夏威夷福音协会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夏威夷人在美国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下，向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派遣了传教团，并向马克萨斯群岛派遣了自己的独立传教团。

在卫斯理公会的教导和指导下，数以千计的斐济岛民，即南洋最凶猛的食人族，在福音的力量下被制服了。在福音的力量下，他们开始热衷于斐济群岛，并将福音传给他们海岸以外的异教徒部落。这段历史中，新赫布里底群岛基督教化的努力与许多高尚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特别是与约翰-科勒里奇-帕特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是王座法官帕特森和塞缪尔-泰勒-科勒里奇的侄女弗朗西斯-科勒里奇的儿子。就在他离开伊顿的时候，最近被任命为新西兰主教的塞尔温对他的母亲说：″帕特森女士，你能把科勒里奇交给我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森心中萌生的与主教同行的愿望并没有消失，他成为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研究员和阿尔芬顿的教士。1854年，当塞尔温再次来到他家时，他再也无法抑制这个珍视的愿望了。他的家人以无私的爱把他交给了向美拉尼西亚人传讲福音的工作。他在塞尔温的指导下工作，直到1861年，他被祝圣为美拉尼西亚的主教。他的第一个职责几乎是埋葬戈登和他的妻子，他们是来自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被埃罗芒加的当地人谋杀。1867年，传教士的总部从新西兰搬到了诺福克岛，那里离帕特森的工作地点更近，也更适合他从北方的热带岛屿带来的儿童的体质，让他们接受教育。他又潜心工作了四年，然后就死了，被Nu. kapu的野蛮居民杀死了。在这样的劳动和牺牲下，基督教被带到了太平洋的各个岛屿。

仅仅计算皈依者的人数，甚至是属于基督教团体的人数，是无法估计现代传教活动的成果的。虽然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用基督的律法取代迷信的统治，但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实现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们自由地、积极地给野蛮人以文明，给没有字母的民族以文学。我们也不应该不注意，在其他方面，他们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几乎每一门科学，特别是地理学、人种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都有一些最丰富的材料归功于他们。总之，即使是最卑微的传教士也参与了一项工作，就其目标的崇高性和结果的有益性而言，这是现代的主要成就之一。

==========

第八章

基督教的虔诚和基督教的慈善事业

革命的时代、一群人的时代

前面对后世宗教运动的记录涉及到对虔诚和宗教生活的不同阶段的一些说明。在本章的范围内，对如此复杂的主题进行非常系统的处理是不现实的。

过去的两个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期。政治革命在欧洲扫除了平庸的体制，在美国从殖民地省份中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联邦民主制。

文学界、教育界、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发生了一场革命。神奇的发明使全球所有的居民走到了一起。基督教被要求适应这一新的事物秩序，在改变的环境下履行其上天指定的使命。

文学已经不再是教会精神的产物。它宣称自己的自由。它的素材从内在的灵魂和外在的自然中，从古代艺术和文字中，从人类历史中汲取材料。古代艺术和文字，以及最广泛的人类历史，都是它的素材。由于这个原因，它并不必然与福音的精神和概念格格不入；因为即使与智力的活动和产品有关，神的国度〞也像面酵一样〞。一切都取决于基督教对宇宙和人类的看法，以及基督教的人格理想，是引起同情还是反感。诗歌--单独挑出文学的一个部门--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获取其基调，或者从统治的哲学中获取基调。雪莱，以其敏感的天性，在民众起义反对暴政的时候，准备从法国作家那里接受对宗教中公认的文件的否定，并将他对传统主义的疯狂讨伐进行到抛弃神圣和人类法律所赋予的义务的极端。然而，在雪莱早期对人类兄弟情谊的热情中，以及在他对残酷压迫的悲愤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因素，这些都是通过在学校教室里听到的声音第一次带入他的视野，这些声音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回声。

在拜伦的《曼弗雷德》和其他诗歌中，以及在歌德的《维特的悲哀》（他未成熟的青年时期的作品）中，找到了其自我的、热情的表达方式，这种感伤主义至少见证了灵魂对自身的不满和对未实现的美好事物的渴望。在英国诗歌中，考珀、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丁尼生等人的名字表明，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古典诗派，即德莱登和波普的诗派中取得了进步。在后来的诗人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更高的真理和与福音相一致的愿望的同情。

在德国，席勒在其早期的诗人生涯中，受到康德哲学的强烈影响，这至少给他的作品带来了道德上的严肃性。而歌德则相反，他在谢林的泛神论思想中发现了更多吸引他的因素。正如歌德不遗余力地避免看到痛苦和不幸，他也毅然决然地避开了对罪恶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因为这可能会扰乱他精神的平静。然而，正如他自己明确暗示的那样，这种注意力的抽离有时会使他付出

努力。在他的代表作《浮士德》中，正是灵魂对充实安宁的永不满足的追求，道德上的邪恶所激起的颤栗，心甘情愿却又因此而对诱惑者更加可怕的屈服，天堂的怜悯--这些都是福音教义的特色元素--打动了这个精彩悲剧的读者或观众。诗人，包括歌德，在坚持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而不是他从外面〞用手指的末端〞触摸它的概念时，《新约》为他们提供了理由。这是基督教神学，如果它不是犹太教神学的话。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诗人，他谈到了“崇高的感觉、更深层次的东西”。

只有当个人的意志、有意识的智慧被否认其品质时，基督教的启示才会受到指责。同时，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宿命论下，人类的责任和考验，以及不朽的生命--在想象力的作品中最崇高的东西所依据的真理--都萎缩了。在诗歌中，就像在科学中一样，与基督徒的信念相冲突的不是上帝在世界中的理念，而是泛神论对真理的忽视或拒绝--上帝和人的个性的真理。但是，尽管歌德在这种程度上受到他成长的思想氛围的影响，他是一个太过伟大的人，不会对基督教信仰掉以轻心。在他与艾克曼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说〞让精神文化不断提高，让自然科学不断发展，在进步中不断拓宽和深化，人类的思想也会随心所欲地扩展，--若没有基督教的提升和道德文化，正如它在福音书中所闪耀和照耀的那样，人永远不会进步。〞〞对天才的崇拜〞，在高高在上的人可以不受道德约束的观念下，是一种偶像崇拜的形式，太过可恶，太过贬低，无法在有良心的地方站稳脚跟。然而，它自然而然地来自泛神论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盲目的力量被神化，它的所有表现形式被视为同样神圣。

在近代另一位伟大的文学领袖身上，人们看到了泛神论和有神论立场之间的摇摆不定，他就是托马斯-卡莱尔。他对所有虚假的憎恶在其根源上意味着有神论的信仰。一个信仰的英雄，如路德，他知道如何欣赏。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虔诚对他来说是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卡莱尔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给他的朋友

林拉登的厄斯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显示了他内心沉睡的信仰，而悲伤的经历唤醒了他的新生命。这是在他妻子去世后写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还能说什么？有一天晚上，在我辗转难眠，越来越悲惨的时候，这些话，这个简短而宏伟的祷告，奇怪地进入我的脑海，有了新的强调，仿佛是为我写的，在黑夜的胸膛上闪耀着温和而纯洁的光辉；在那里，我一字一句地读着它们，突然遏制了我不完美的徘徊，突然有了出乎意料的柔和的镇定。也许有三四十年了，我从来没有正式重复过这个祷告--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是多么强烈的人的灵魂的声音；是可怜的人性中所有崇高和虔诚的最深切的愿望；值得用'按照这种方式，你们祈祷'来推荐。″

在基本宗教真理方面的深刻信念是由那些远离现有教会组织的人表达的。他们远离现有的教会组织，也许还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教条式声明。著名的法国传教士拉科代尔（Lacordaire），据说他在年轻时被 ″非宗教的虚无 ″所震撼，从野心的梦中惊醒。这并不奇怪，这样的想法甚至对许多人都有力量，尽管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达到对教会教义的可靠信仰。不管是考虑到个人灵魂的渴望，还是社会的需要，人们都觉得无宗教信仰的深渊是一种可怕的想法。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和资本的冲突，还有工人阶级为实现革命变革所做的共同努力，都让有思想的人对失去宗教信任和希望所带来的可怕的邪恶印象深刻。在过去的几代人中，劳动者即使被剥夺了生活的舒适，也许是压迫性社会安排的受害者，也会在仰望上帝和期待未来国家的补偿中找到安慰。在繁重的工作中，对宗教的思考使他们振作起来，在沉重的负担下使他们振作。在这个问题上，天才人物维克多-雨果在《当代评论》中翻译的一段话中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把它教给所有人，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活着就没有价值。是什么减轻了劳作，使之神圣化，使人们变得坚强、明智、耐心、公正，既谦虚又有抱负，并有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永久愿景，它的光芒照亮了当前生活的黑暗？

就我自己而言，我深深地相信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经过许多斗争、许多研究和无数次的考验，这是我理性的最高信念，因为它是我灵魂的最高慰藉。″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不幸，″他（雨果）继续说，″我几乎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个不幸；那就是把一切都押在现世的趋势。如果把今世的物质生活作为唯一的目的和目标，你就会因为最后等待它的消逝而加重它的每一种痛苦；你给不幸者的负担增加了未来虚无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原本只是痛苦，也就是上帝规定的法律，变成了绝望，变成了由地狱强加的法律。因此，我们的社会震荡了。我确信，我是那些怀着诚意的人之一，因为这个词太软弱了，但他们以难以言喻的热情，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希望改善所有受苦人的命运；但所有改善中的第一个就是给他们希望。当有无限的希望在其中闪耀时，我们有限的苦难就会大大减轻！我们所有人的责任，不管是谁，都有责任给他们带来希望！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无论我们是谁--立法者和主教、牧师、作家和记者--都要向外传播，以各种形式分配和挥霍必要的社会能量，以消除贫困和苦难，同时要求每张脸都抬头看天，引导每个灵魂和思想到未来的生活，在那里正义将被执行。我们必须大声宣布，没有人将遭受无用的痛苦，正义将被赋予所有人。死亡本身应是一种补偿。正如物质宇宙的规律是平衡，道德宇宙的规律也是公平。上帝将在一切的尽头被发现。″

现代科学的发现在当时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对基督教真理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真理，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需要对怀疑论进行反思，并认识到科学精神--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人类--其居民的精确、有条不紊、详尽的知识的追求--与宗教精神并不矛盾。另一方面，无论知识的扩大会带来怎样的兴

奋，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人不能只靠科学生活，在他的内心有另一种能力和渴望，灵魂的真正生命和和平与之密不可分。人们很快意识到，人与上帝的基本关系并不取决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大小，也不取决于它与恒星宇宙的关系，不取决于它的年龄，也不取决于人被创造后可能经过的时间。人的意识，即在他之上有一个无限的上帝，在他之内有一个道德法则，不受这种性质的事实影响。进化被认为是一个简单描述自然界的所谓方法的术语：创造和指导的能量，通过这个过程开始并被推进，它不包含任何解释。在此可以说，不仅是自称的基督教教师，而且是自然科学中新学说的最权威的阐释者，都宣布这些学说与设计的伟大论点没有任何差异。在这些科学权威中，有最认真、最真诚的信仰者。其中一位是法拉第，他属于桑德曼派的一个小教派，在上个世纪从苏格兰长老会中分离出来，但他们坚持福音的基本真理。另一位是克拉克-麦克斯韦，他是一位能力最强的物理学家，他发现〝力的守恒〞的学说与自然或启示宗教的证据没有任何冲突。

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旧的公式失去作用，新的宗教真理声明尚未成熟的时候；当基督教信仰被历史批判或其他宗教所取代时；当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被哲学推测所抛弃时；在许多聪明的人心中，信仰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与怀疑相混合。勃朗宁的诗中，主教把信仰换成了怀疑。〝怀疑的生活因信仰而多样化、换来的是因怀疑而多样化的信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合法赢得的信仰胜利，这有力地说明了基督教对灵魂忠诚的要求所依赖的坚不可摧的基础。近代以来，这样的例子在德国并不鲜见。有些人对宗教的认识如此深刻，对他们来说，福音的光芒如此清晰，以至于他们从未受到怀疑主义的困扰。罗特，有猜测的天才，有头脑的思想，熟悉怀疑论流派的理论和论据，但他宣称，他对上帝的存在毫无怀疑，在相信神迹方面也从未遇到过任何困难。一个有趣的记录是，他战胜了怀疑，对基督教真理的信仰年复一年地增强，这在他的传记中得到了体现。他与尼布

尔、施莱尔马赫、尼采、诺安德和尼科夫以及当时的许多其他杰出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他创办的″研究与评论″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评论。他的动机是为了行善。他说：″我不期待任何回报″。他的观点与理性主义的观点相比，是这样描述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足够的支持，在上帝从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赋予人类的那些能力中找到支持。按照他们的说法，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现在每个人只需要运用已经赋予的能力，而不需要从上面得到进一步的帮助，就完全有资格发现真理。现在，我们不属于这种追求者、也就是理性主义者。相反，尽管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行为，但他们仍然在黑暗中行走，只要他们被留在自己身边就会迷失；他们的首要和最大的愿望是上帝日复一日地更新他们，但是，除了启示和救赎，他们看不到对罪恶的逃避，在夜晚的黑暗中没有光。″

在灵性衰退的时代，当对系统的崇拜、贫瘠的正统观念被取代时，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神秘主义者就会出现，以实际行动表明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是一种理解力的锻炼。在这样的心灵抗议中，可能会混杂着变化无常，没有坚实的基础。然而，与许多异象相联系的是对神圣事物的真正洞察力，以及对那些知道如何从麦子中筛选出糠秕的人的高价值建议。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神秘主义在罗马天主教会的发展，因为它出现在莫利诺斯、费内隆和盖恩夫人的著作中。在德国，在阿恩特（1555-1621）的著作中，以及在后来的虔诚主义中，人们看到了神秘主义精神，与当时的冰冷学派形成强烈对比。但在现代德国神秘主义者中，雅各布-鲍姆（Jacob Bhme）是最有趣的一个。他的死亡发生在为现代时期的开始所设定的期限之前不久，但他的影响却延伸到了后来。他是格尔利茨的一个鞋匠，学识非常有限，当时不宽容的路德教条主义对他这样深具宗教性的人来

说几乎没有什么营养，但上帝的话语保证他（上帝）愿意把圣灵赐给那些祈求他（上帝）的人，这使他（鲍姆）感到高兴。在圣灵的照耀下，他相信自己能直接辨别出信仰的真实性，并将其披露给心灵的眼睛。他被周围的路德教士诋毁为异端梦想家，但他真诚的虔诚以及哲学的深度，自此被罗特、柯勒律治和黑格尔等在精神品质上大相径庭的人所认可。他对自己不受影响的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他死亡的情况很有特点。在死前几小时-是在一个星期天，他似乎听到了甜美的音乐，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向妻子和孩子们告别，说：″现在我要去天堂了。″

如果高尚的宗教情感，对天堂世界和信仰对象的真实性的幸福体验，可以被称为神秘主义，那么这个词可以适用于许多人，他们的活力和智力的清晰性从未受到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教徒虔诚的基调是严厉的。清教徒的宗教生活充满了自觉性。他要求对他要相信的东西有一个理由。他避开了奢侈的的感觉和表达。然而，在乔纳森-爱德华兹身上、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与之平行的奉献热情，我们必须求助于最神圣的中世纪圣徒的生活。在他年轻时的某一天，他在他父亲的牧场上 ″走在外面″。这是他自己说的：″当我走在那里，仰望天空和云彩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上帝光辉的威严和恩典的甜蜜感觉，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似乎看到这两者甜蜜地结合在一起；威严和温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甜蜜、温柔和神圣的威严，也是一种威严的甜蜜，一种可畏的甜蜜；一种高尚、伟大和神圣的温顺。上帝的卓越，他的智慧，他的纯洁和爱似乎出现在一切事物中；在太阳、月亮和星星中；在云彩和蓝天中；在草、花、树中；在水和所有的自然界中，这些都曾使我的思想大为安定。我经常坐着看很长时间的月亮，白天花很多时间看云和天空，看上帝在这些事物中的甜蜜荣耀，同时用低沉的声音唱出我对创造者和救赎者的思索。″

他（爱德华兹）说：″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年复一年地思考神圣的事情；经常

独自走在树林里和孤独的地方，进行默想、独白和祈祷，并与上帝交谈；在这种时候，我总是唱出我的沉思″。

他对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样说的：″1737年，有一次，我骑马到树林里锻炼身体，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下了马，就像我通常的做法一样，走在路上进行神圣的沉思和祈祷，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荣耀，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调解人，以及他奇妙、伟大、充分、纯洁和甜蜜的恩典和爱，以及温顺的屈服，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显得如此平静和甜蜜的恩典，也显得比天还大。基督的位格显得无比卓越，其卓越程度足以吞没一切思想和概念--据我判断，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使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并大声哭泣。我感到一种灵魂的渴望，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就是被掏空和消灭；躺在尘土中，只被基督充满；用圣洁和纯洁的爱来爱他；相信他；依靠他生活；服务和跟随他；并且完全成圣，变得纯洁，具有神圣和天堂般的纯洁。我还有几次经历，性质基本相同，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爱德华兹绝不是唯一一个将加尔文主义教义与狂喜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清教徒。塞缪尔-霍普金斯，另一位新英格兰的圣徒，记录了他在年轻时经历的直觉和情感：″一天晚上，当我在壁橱里沉思和奉献的时候，一个新的、奇妙的场景向我敞开。我对上帝的存在和同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它比我以前所看到的更真实，更有影响力，更荣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角色进入我的视野，显得如此真实和荣耀，通过他的救赎之路如此明智、重要和可取，以至于我对自己感到惊讶，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它们是如此平实、令人愉悦和奇妙。我渴望所有人都能看到和知道这些事情，就像它们现在出现在我面前一样。”

霍普金斯在耶鲁大学读书时，被引导开始了基督教生活，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大卫-布雷纳德（1718-1747）的影响，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印第安人传教士。

这位皈依者因此成为新英格兰的主要神学家，并且是最早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人之一。

从教会的近代史中可以得出许多例子，说明认真灌输关于罪的真理，以及通过基督实现和解的真理，能够深入人心，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向。对这种性质的布道无动于衷或怀有敌意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所感动，令人惊讶。这不仅仅是在未受过教育的阶层。同样的效果也出现在学术团体中。在英国剑桥大学，福音派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梅恩，他的职业生涯惊人地证实了上述说法。加尔各答的威尔逊主教在他死后不久这样评价他：″对比一下他历程的开始和结束。他孤独地站了许多年；他长期受到反对、嘲笑和回避；他的教义被歪曲；他的声音和举止的小特点被讽刺；他的教会经常发生骚乱；他是一个不被考虑的人，也不被认为是教会的正规神职人员。这就是事情的开始。但请注意最后的情况。在他传道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他多次被邀请在大学里参加讲道课程。他所宣扬的同样的伟大原则几乎在剑桥的每一个讲坛上都得到了宣扬。他的教堂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

“这几句话的作者永远不会忘记，大约六年前，当西梅恩先生在那所博学的大学里发表关于圣灵的布道时，教堂的外观给他留下的印象。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的每个部分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院长、博士、文科硕士、学士、本科生、镇上的会众，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听着这位年长可敬的人讲课。他的身影现在就在我面前。他固定的面容，他大胆而又恭敬的讲话方式，他令人钦佩的精心准备的演讲，他对不同阶层听众的尖锐呼吁，他们的注意力，都构成了我所见过的最庄严的场景。而在他去世时，我们的大学何时对一个人给予过如此明显的荣誉？″

托卢克在德国学术界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他是一位个人特质完全不同的传道人、他的神学在重要方面与西梅恩的神学并无不同。他于1826年被聘为哈雷

的教授，当时那里的大学还没有成立。

1826年，当那里的大学处于理性主义的控制之下时。他被打上了〞虔诚主义者〞的烙印，一进门就遭到了人们的反感和蔑视。他的布道和教学引起了激烈的反对。但是，这逐渐让步了；而且，在他去世前很久，他看到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而同情福音派的事业。许多学生从他身边走出去，传播他在个人谈话中、在讲坛上、在学术椅子上如此热切地教导他们的真理。

为了说明福音的力量，在后来的时代，通过对社会的影响，在基督徒精神的激励下，在个人经验中产生巨大的成果，读者必须求助于基督教传记。只有通过个人历史的细节，才能对福音中所蕴藏的力量有一个生动的印象，现在和过去一样，用情感和希望来激励人类的灵魂，并为社会改革提供动机和手段。这里可以提到一个例子，那就是苏格兰著名的传教士查默斯的例子。他是一个精神和体格都很强壮的人，有清晰的头脑和热情的心。人们会记得，他还是一位能力超群的数学家，也精通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1803年，他成为距离圣安德鲁教堂9英里的基尔曼尼教区的牧师。他在布道中灌输道德的格言，但他的布道的实际效果不大。最后，几个亲戚的死亡和一次严重的疾病发作（他完全康复了），促使他反思自己的宗教性格的基础，以及需要一种他意识到不具备的信仰和希望的精神。现在他对基督和救赎之路的看法和感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815年对基尔马尼教区的讲话中这样描述了这一变化的特点和效果：〞在这里，我只能记录下我在你们中间进行了长达12年以上的实际试验的效果，虽然是未经设计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大谈特谈不诚实的卑鄙，虚假的恶毒，诽谤的卑劣；总之，谈所有那些唤起人心对人类社会的害虫和干扰者的自然愤慨的人格畸形。现在，如果我能够凭借这些热烈的争论，让小偷放弃偷窃，让说坏话的人放弃审查，让说谎的人放弃偏离真相，我就会感到一个人得到了最终目的后的轻松。我从来没有想过，

所有这些都可以做到，但每个听众的灵魂仍然与上帝完全疏远；即使我在偷窃者的心中建立起对不诚实的卑鄙行为的憎恶原则，使他被说服不再偷窃，他仍然可能保留一颗完全不向上帝求助的心，像以前一样完全不被爱上帝的原则所占有。一句话，尽管我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更正直和可敬的人，但我可能让他像以前一样缺乏宗教原则的本质。但有趣的事实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尝试反对心灵对上帝的自然敌意；我没有注意到这种敌意的化解方式，甚至一方面是免费提供，另一方面是相信接受福音的救赎；而基督，通过他的血，使天生站在远处的罪人靠近天上的法律。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当然也在我的人民中推动荣誉、真理和正直的改革，但我从未听说过在他们中实现了任何这种改革。我并不觉得我强烈要求社会生活中的美德和礼节对我的教友的道德习惯有什么影响。直到我意识到人的心在所有的欲望和情感中与上帝完全疏远；直到与上帝和解成为我牧师工作的明确而首要的目标；直到我以圣经的方式将和解的方法摆在他们面前；直到通过基督的血免费提供的宽恕被敦促他们接受；直到圣灵通过基督的媒介给予他们。一句话，直到我的人民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因素上，我才听到这些次要的道德改革、这些道德改革以前虽然是认真和热心的、但恐怕同时也仅仅是我早期服务的最终目标。对你们天国主人眼睛的感觉给你们带来了另一种影响；当你们这样努力在所有事情上装饰你们的上帝和救世主的教义时，你们可能，尽管你们很穷，却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伟大人物重新认识到信仰。至少你们教会了我，传扬基督是传扬道德的所有分支的唯一有效方式；从你们简陋的小屋中，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祈求上帝让我能够带着它所有的简单性进入更广阔的舞台，并以它所有的力量来制服更多人口的恶习。″

查尔默斯被调到格拉斯哥的特伦教堂，成为英国最富说服力的传教士之一。在那里，他有机会实施他所珍视的计划，进行牧民访问，通过建立学校进行系统的教育，以及通过其他机构将福音传给广大人民，传到每一个家庭。他孜孜不倦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注意到，他所有帮助穷人的计划都

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是善良的。有需要的人被训练为尽可能地依靠自己。在格拉斯哥所做的大事，查尔姆斯试图在苏格兰各地都能做到。他是自由教会组织的领导者，是讲坛上的演说家，他以狂热的态度宣扬福音的真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让蜂拥而至的人群激动不已，他还是一位教义神学以及宗教与科学和经济问题的关系的教师，他对他的国家和他所属的那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法衡量。然而，从他的生活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力量的秘密，点燃他所有才能和成就的力量，是在基尔曼尼教区的那段经历中，重新塑造了他的精神。

更加一致和彻底地抛弃禁欲主义的理想是近代新教虔诚的一个特点。偶尔，这种理想的强烈影响仍会显现出来。这是之前提到的一部宗教作品的特点，即罗特的《严肃的呼唤》，--关于这部作品，一位已故作家说：″没有为任何伟大的利益，政治、社会、艺术、科学留下空间，这些利益锻炼和训练人类的能力，是文明生活的粘合剂和装饰品；它们属于世界，与世界一起必须被放弃。″

但是，禁欲主义的理想已经越来越多地停止了对基督教性格形成的概念的影响。在这种变化发生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改革的工作带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部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基督徒的活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上，这不仅关系到人的精神健康，也关系到他们的世俗福利和舒适。在十八世纪，在革命起义和争取人权的斗争中，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冲动。与这些政治运动同时或之后的福音派复兴，产生了刺激发展已提及的各种形式的仁爱的效果。一种 ″人性的热情 ″逐渐产生，其来源是真

正的基督教，它试图减轻所有阶层的负担，他们的世俗命运适合于激发同情心。这种慈善事业的一个方面表现在人们越来越厌恶各种残忍行为，甚至厌恶那种消极的残忍行为，即忽视那些有可能得到救济的不幸者。人们以各种方式努力减轻人类的苦难，甚至包括罪犯的苦难，这些苦难对于他们的约束和改造是不必要的、或者在死刑的情况下、结束他们的生命。慈善活动的一个特点是倾向于联合努力。为了各种具体的慈善工作，人们成立了各种协会。防止虐待动物的协会的存在是一个标志，表明人们普遍反对施加痛苦，甚至对最低级的有生命的东西施加痛苦，也表明人们习惯于通过有组织的努力来进行仁爱的劳动。

在基督教仁爱的成果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主日学的建立。在英国的格洛斯特镇，有一个针厂雇用了许多儿童，他们有的住在那里，有的来自邻近的地方。他们在星期天聚集在街上，他们肮脏的衣着、粗野的举止和亵渎的言语，引起了聪明的印刷商罗伯特-雷克斯的注意和怜悯。1781年，他雇用了几位妇女在星期天为他们开办学校，并劝说孩子们参加。他的安排是如此明智，以至于这些学校在确保学生的改革和良好行为方面非常成功。这一实验的名声传到了国外。类似的学校也在其他许多城镇建立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改进是获得了志愿教师，他们出于爱心，不计报酬地做他们的工作。在卫斯理的影响下，卫理公会已经开始以这种方式进行主日学教育。雷克斯创办的学校只为穷人服务；但随着该机构在英国和美国的传播，所有阶层的儿童都成为与之相关的教学对象。自1864年以来，主日学已被引入德国。

在促进改善监狱条件和囚犯待遇方面，John Howard提供了巨大的服务。他完全配得上〝慈善家〝的称号，人们通常把这个称号贴在他的名字上。在一次前往西班牙的航行中，他被一艘法国私掠船捕获，并被带到布雷斯特。那里对待战俘的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73年，他被任命为贝德福德的首席治安官，调查了那里的监狱状况，然后访问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其他

监狱。他对发现监狱的肮脏和不健康状况感到震惊，也对狱卒依靠从囚犯身上榨取的费用来维持生计而产生的弊端感到震惊。已经服满刑期的囚犯常常被迫长期呆在监狱里，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支付这些费用。通过艰苦的努力，霍华德促成了法律的颁布，为监狱的看守人提供了固定的津贴。他自费在法国、德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以便通过亲自考察来确定建造监狱和管理监狱的方法。在这些调查中，他没有回避对健康或生命的危险，以便获得准确和完整的信息。他的报告的效果是在英国颁布了更好地管理监狱的法律，以期改造囚犯并训练他们的工作习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霍华德进行了其他漫长而艰苦的旅行，目的是调查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传播情况，并设计出预防的方法。他走访了许多地方，甚至乘坐一艘从士麦那到威尼斯的臭船，该船在航行中遭到海盗的袭击，以便亲自体验检疫纪律。最后，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他在黑海的赫尔松（Cherson）因照顾一个患营地热病的女孩而死亡。他的勇气和他的仁慈是一样的。他完全没有野心，不希望得到赞美，也不希望有人纪念他的善行。他说："不要给我立碑，让我被遗忘。"这是一个乐于为善的人的话。

霍华德去世后约20年，监狱改革的工作被一群男人和女人重新拾起，其中一些人是公谊会的成员。其中伊丽莎白-格尼-弗莱（Elizabeth Gurney Fry）完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仁爱工作。此时，议会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囚禁男女罪犯的监狱潮湿而令人厌恶。"污垢和疾病比比皆是；即使建筑物内有病房和院子，妇女与男子也没有完全分开，而闲逛、赌博、喝酒和说脏话在他们中间是司空见惯的。" 监狱很拥挤，"因为犯罪率大大增加，在过去的十年中，定罪率增加了一倍多"--1806年至1816年。弗莱夫人的工作开始于纽盖特监狱的妇女部门。在这个地方，挤满了数以百计的不同等级的罪犯，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几乎赤身裸体，由于缺乏食物、空气和运动而濒临死亡。这个地方的囚犯 "处于一种不受约束的闲散、骚乱和各种恶习的状态"。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和谐和暴力的景象，让人不忍目睹。在她的第二次访

问中，应她自己的要求，弗莱夫人被单独留在了这里，在这些妇女中呆了几个小时。她向她们宣读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中关于葡萄园主的比喻。她还就第11个小时，以及基督愿意拯救罪人，甚至是最堕落的罪人发表了意见。"有些人问基督是谁；有些人担心他们得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于弗莱夫人提出的为孩子们建立一所学校的建议，他们的母亲感激地同意了，并选择了一位家庭教师，一位曾因偷窃手表而被判刑的年轻妇女。她是第一批皈依基督的人之一。弗莱夫人不时地探望那些被判处绞刑的人--其中一些人是在受到严重诱惑的情况下犯了伪造罪。她向这些人传达了福音的信息，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监狱的官员们认为可以将工业和秩序带入纽盖特监狱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的；但是通过她个人的影响，在她确保的其他人的帮助下，她在女囚犯中实现了性格和行为的转变，这似乎不啻为一个奇迹。许多人，包括最高级别的人，都来参观监狱，亲眼目睹所创造的奇迹。弗莱夫人所实施的改革也扩展到了其他地方。在她的努力下，在运送犯人的船只安排上，以及在犯人登陆后的接待和对待方式上，都有了最有益的改变。她的工作并不局限于英国。她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国家。为了她所服务的事业的利益，她的信件延伸到了俄罗斯和意大利。她的建议几乎在欧洲所有地区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在美国和英国，在监狱纪律协会的主持下，监狱的建设和内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为拘留、改造和训练少年犯而设立的独立机构已经建立。反对将罪犯运送到英国殖民地社区的人最终成功地结束了这种做法。

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谈一谈一些最突出的慈善形式，这些形式在后来的时代中是基督教情感的产物。

刑法的改革与监狱和纪律的改善同步进行。1764年，小论文《监狱纪律》的出版推动了这一改革。它以清晰的方式讨论了法律惩罚的设计，并提出了关

于法律惩罚的理性和人性化的观点。

在英国，这种法律改革的领导者之一是塞缪尔-罗米利爵士（1757-1818年）；他开始的良好工作由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成功推进。为保护在矿山和工厂工作的妇女和儿童，制定了正义和人道的法律。1842年，英国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揭露了在矿场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的悲惨状况，结果议会立即采取行动，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妇女从事这种工作。被称为《工厂法》的措施，在1878年的《综合法》中达到了顶峰，其中包含了卫生方面的规定。劳动时间的限制，对工人假期的保障，以及在发生事故时对他们的安慰和金钱上的帮助。其他议会法案也涉及到了工业职业的细节。其中一些法案提到了劳动者的健康问题，另一些则提到了向他们支付工资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不能忽视进步的证据，这些证据出现在照顾疯子的更多仁慈和合理的方法中，以及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建立医院和其他机构以救济以前被忽视的不同阶层的患者中。近代以来，通过公共权力和自愿的努力，为减轻战争造成的痛苦而采取的措施必须追溯到基督教情感的影响。

在本世纪，入侵部队蹂躏敌人领土的权利很少被实际主张。根据现代战争规则，非战斗人员不应受到骚扰。他们的财产，如果被夺走，应按其公平价值予以赔偿。对于病人和伤员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救护系统是由法国人在1795年建立的。一位法国外科医生首先设计了一个担架员队伍的计划。根据1864年在日内瓦通过的欧洲公约，伤员和与救护车有关的官方工作人员被免于作为战俘抓捕。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一位英国女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率领一队志愿护士去照顾病人和伤员；后来又有其他人从事类似的仁爱事业。基督徒们为防止战争的发生所做的努力并非没有取得一定的成功。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美国内战结束时，为了解决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争议，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在大陆国家存在着庞大的军事机构，耗尽了居民

的资源，并不断挑起敌对行动，这仍然是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责难。

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都颁布了法律，以抑制文盲，并对全体人民进行初级教育，使全体人民接受基本知识的教育。

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本世纪的一项成就。早在上个世纪，甚至更早，当人们了解到与奴隶贸易有关的野蛮行为时，英国的好人就开始谴责它。贵格会为废除奴隶制作出了第一次共同努力，他们在1761年将所有参与奴隶制的人排除在他们的社团之外。在格兰维尔-夏普的努力下，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作出决定，不能在英国持有或将奴隶带入英国。在美国革命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和法国都成立了反奴隶制协会,拉法耶特是这项事业的推动者之一。丹麦通过一项1802年生效的法律禁止了奴隶贸易，英国在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导致1833年在英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鼓动，是由威尔伯福斯、克拉克森、巴克斯顿和其他积极的合作者推进的。美国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原则上反对奴隶制。这是华盛顿的信念，他在遗嘱中解放了他的奴隶，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以及北方的政治家们也是如此。正如英国废奴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在他们鼓动的早期阶段，只有一些逐步解放的计划被认为是可行的。在美国，最早提倡立即解放的人之一是William Lloyd Garrisou。这一提议遭到了许多自称希望通过较慢的过程来消灭奴隶制的人的抵制。大约在1839年，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分成了两派。联邦宪法强加给北方各州的有关奴隶制的义务，使加里森和那些同情他的人，站出来激烈地主张分离。 他倾向于有关妇女权利和不抵抗的观点，这使许多与他一起行动的人被感到厌恶。许多人认为他对奴隶主的谴责是不公正和奢侈的。1840年，一个新的全国反奴隶制党成立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组织开始了对奴隶制的战争。对分裂的恐惧和对宪法赋予自由州的责任的认识，是导致不少北方牧师和教会远离废奴主义者，特别是远离那些追随加里森旗帜的人的突出动机。政治上的废奴主义旨在将奴隶制排除在领土之外，并将这一制度封闭在有地方法律保护的各州内，其

力量不断增强，并最终在林肯当选总统后取得了胜利。南方各州的分离和他们组成的联邦被推翻后，宪法修正案在美国各地禁止了奴隶制。然而，并非没有一场血腥的内战--这片土地上所有居民的自由和联盟因此都得到了保障。自战争以来，为了对被解放的黑人进行基督教教育，人们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涉及到大量的资金支出。

现代慈善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努力之一是对酗酒恶习的道德讨伐。戒酒改革在英国和美国都取得了最大的成果。一大批演讲者和无数社团的努力得到了各种立法措施的支持，以防止或遏制醉酒的贩运。作为对被诱惑者的额外保障，可能有数百万人已经作出了完全禁酒的承诺。这场斗争中的一位著名领导人是 "马修神父"： - 西奥博尔德-马修（Theobald Matthew）--爱尔兰科克的牧师，他于1838年开始工作。他的工作首先是在他自己国家的下层社会中进行，他所访问的每一个地区都是如此。他走遍了英国，并在美国呆了两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努力都获得了成功。据说，在格拉斯哥，一天之内，他为一万人进行了宣誓。

人们对教会的分裂状况所产生的弊端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是时代的标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各教派的活动增加的同时，它们也分别形成了与其他基督教团体建立更紧密的兄弟般的同情和交往关系的倾向。以前肆虐的伟大教义冲突，如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冲突，已经平息。即使是新教和罗马教会的长期争论，也是双方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方值得尊重的地方，并更公正地估计到对共同观点的重视。作为表明新教徒倾向于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在相互争斗中浪费精力的一个事实，可以提到《福音联盟》。这个联盟是1846年在伦敦由800名牧师与平信徒组成，代表了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新教教派。为了说明大家认为应该将哪一类人纳入联盟，联盟批准

了九项教义的声明。该联盟在不同的国家成立了协调的分支机构。美国分会宣布，基督的″神人合一（即基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和赎罪工作″是″基督教的核心和灵魂″。联盟的长期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欧洲举行。它于1873年在纽约召开。在这些会议上，有学识和虔诚的知名人士参加，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信条和形式做礼拜。然而，基督教徒对密切关系和直接合作的渴望并不主要体现在这类公共运动上。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地方的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教派的人加入其成员。它的分支机构已经在欧洲大陆，甚至在东方，远至印度和中国建立起来，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尽管最早的组织是在1851年在蒙特利尔和波士顿发展起来的，但它不少于3500个协会。积极成员必须是福音派教会的成员。准会员的资格是良好的道德品行。该协会的第一个目标被定义为″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拯救年轻人″。与此相关的是，通过带有宗教性质的机构，促进″他们的智力、社会和精神福利″。这些协会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显的基督教工作--与基督的教会有关的工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暗流，时代的潮流被显示出来，就像表面上的喧嚣运动一样真实。这个伟大的国际协会的存在只是时代的标志之一，它指向同一个方向。教派的障碍被来自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在无数的慈善事业中走到一起而克服了。

在其他方面，基督徒门徒的精神团结，其意识必须先于基督教的任何有希望的实践，以确保有机的结合。安全的有机结合之前，必须有这种意识。越来越多的相同宗教文献进入不同基督教组织的家庭。有一些虔诚的书籍，所有人都对其表示欢迎。罗马天主教信徒所喜爱的《效法基督》给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苏格兰长老会中发行，由查尔默斯作了赞扬性的序言。同样的赞美诗在各名门弟子的圣殿和炉边都有唱诵。

在这个地方，谈论英国赞美诗的宝库是很方便的，它可以说是现代时期的产物。在沃茨之前，有一些优秀的赞美诗，是由英国作者写的。如靳主教的《晨

间赞美诗》和《晚间赞美诗》，以及他创作的赞美诗--"赞美上帝，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他"。如爱迪生的赞美诗："宽敞的苍穹在高处"，以及，"哦你所有的怜悯，我的上帝"。但在圣歌历史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是沃茨。另外，所有赞美诗作者中最丰富的是查尔斯-卫斯理。"耶稣，我灵魂的爱人 "只是他相当多的歌词中的一首，这些歌词被所有讲英语的基督徒所珍视。"耶稣的名字听起来多么甜美 "是他的歌词之一。约翰-牛顿的作品，包括在 "奥尔尼赞美诗 "中，那里还出现了考伯的赞美诗，其中 "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行动 "是最好的一首。安妮-斯蒂尔（Anne Steele）、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鲍林（Bowring）--他写了 "守望者，告诉黑夜"；特伦奇、凯布尔--《基督教年》的作者；赫伯、法布尔、波纳，这些只是英美基督教信徒熟知的几位赞美诗作家的名字。很少有赞美诗比红衣主教纽曼的 "引领，仁慈的光 "更受重视。美国作家在所有教会的赞美诗中都加入了一些公认有价值的贡献。如德怀特的赞美诗："主啊，我爱你的国度"，以及雷-帕尔默的赞美诗："我的信仰仰望着你。"

==========

==========

==========

译者附录

天主教历代教皇列表（来源：https://www.newadvent.org/cathen/12272b.htm）

1. St. Peter (32-67)
2. St. Linus (67-76)
3. St. Anacletus (Cletus) (76-88)
4. St. Clement I (88-97)
5. St. Evaristus (97-105)
6. St. Alexander I (105-115)
7. St. Sixtus I (115-125) Also called Xystus I
8. St. Telesphorus (125-136)
9. St. Hyginus (136-140)
10. St. Pius I (140-155)
11. St. Anicetus (155-166)
12. St. Soter (166-175)
13. St. Eleutherius (175-189)
14. St. Victor I (189-199)
15. St. Zephyrinus (199-217)
16. St. Callistus I (217-22) Callistus and the following three popes were opposed by St. Hippolytus, antipope (217-236)
17. St. Urban I (222-30)
18. St. Pontian (230-35)
19. St. Anterus (235-36)
20. St. Fabian (236-50)
21. St. Cornelius (251-53) Opposed by Novatian, antipope (251)
22. St. Lucius I (253-54)
23. St. Stephen I (254-257)
24. St. Sixtus II (257-258)
25. St. Dionysius (260-268)
26. St. Felix I (269-274)
27. St. Eutychian (275-283)
28. St. Caius (283-296) Also called Gaius
29. St. Marcellinus (296-304)
30. St. Marcellus I (308-309)
31. St. Eusebius (309 or 310)
32. St. Miltiades (311-14)
33. St. Sylvester I (314-35)
34. St. Marcus (336)
35. St. Julius I (337-52)

36. Liberius (352-66) Opposed by Felix II, antipope (355-365)
37. St. Damasus I (366-84) Opposed by Ursicinus, antipope (366-367)
38. St. Siricius (384-99)
39. St. Anastasius I (399-401)
40. St. Innocent I (401-17)
41. St. Zosimus (417-18)
42. St. Boniface I (418-22) Opposed by Eulalius, antipope (418-419)
43. St. Celestine I (422-32)
44. St. Sixtus III (432-40)
45. St. Leo I (the Great) (440-61)
46. St. Hilarius (461-68)
47. St. Simplicius (468-83)
48. St. Felix III (II) (483-92)
49. St. Gelasius I (492-96)
50. Anastasius II (496-98)
51. St. Symmachus (498-514) Opposed by Laurentius, antipope (498-501)
52. St. Hormisdas (514-23)
53. St. John I (523-26)
54. St. Felix IV (III) (526-30)
55. Boniface II (530-32) Opposed by Dioscorus, antipope (530)
56. John II (533-35)
57. St. Agapetus I (535-36) Also called Agapitus I
58. St. Silverius (536-37)
59. Vigilius (537-55)
60. Pelagius I (556-61)
61. John III (561-74)
62. Benedict I (575-79)
63. Pelagius II (579-90)
64. St. Gregory I (the Great) (590-604)
65. Sabinian (604-606)
66. Boniface III (607)
67. St. Boniface IV (608-15)
68. St. Deusdedit (Adeodatus I) (615-18)
69. Boniface V (619-25)
70. Honorius I (625-38)
71. Severinus (640)
72. John IV (640-42)
73. Theodore I (642-49)
74. St. Martin I (649-55)
75. St. Eugene I (655-57)
76. St. Vitalian (657-72)

77. Adeodatus (II) (672-76)
78. Donus (676-78)
79. St. Agatho (678-81)
80. St. Leo II (682-83)
81. St. Benedict II (684-85)
82. John V (685-86)
83. Conon (686-87)
84. St. Sergius I (687-701) Opposed by Theodore and Paschal, antipopes (687)
85. John VI (701-05)
86. John VII (705-07)
87. Sisinnius (708)
88. Constantine (708-15)
89. St. Gregory II (715-31)
90. St. Gregory III (731-41)
91. St. Zachary (741-52) Stephen II followed Zachary, but because he died before being consecrated, modern lists omit him
92. Stephen II (III) (752-57)
93. St. Paul I (757-67)
94. Stephen III (IV) (767-72) Opposed by Constantine II (767) and Philip (768), antipopes (767)
95. Adrian I (772-95)
96. St. Leo III (795-816)
97. Stephen IV (V) (816-17)
98. St. Paschal I (817-24)
99. Eugene II (824-27)
100. Valentine (827)
101. Gregory IV (827-44)
102. Sergius II (844-47) Opposed by John, antipope
103. St. Leo IV (847-55)
104. Benedict III (855-58) Opposed by Anastasius, antipope (855)
105. St. Nicholas I (the Great) (858-67)
106. Adrian II (867-72)
107. John VIII (872-82)
108. Marinus I (882-84)
109. St. Adrian III (884-85)
110. Stephen V (VI) (885-91)
111. Formosus (891-96)
112. Boniface VI (896)
113. Stephen VI (VII) (896-97)
114. Romanus (897)
115. Theodore II (897)
116. John IX (898-900)

117. Benedict IV (900-03)

118. Leo V (903) Opposed by Christopher, antipope (903-904)

119. Sergius III (904-11)

120. Anastasius III (911-13)

121. Lando (913-14)

122. John X (914-28)

123. Leo VI (928)

124. Stephen VIII (929-31)

125. John XI (931-35)

126. Leo VII (936-39)

127. Stephen IX (939-42)

128. Marinus II (942-46)

129. Agapetus II (946-55)

130. John XII (955-63)

131. Leo VIII (963-64)

132. Benedict V (964)

133. John XIII (965-72)

134. Benedict VI (973-74)

135. Benedict VII (974-83) Benedict and John XIV were opposed by Boniface VII, antipope (974; 984-985)

136. John XIV (983-84)

137. John XV (985-96)

138. Gregory V (996-99) Opposed by John XVI, antipope (997-998)

139. Sylvester II (999-1003)

140. John XVII (1003)

141. John XVIII (1003-09)

142. Sergius IV (1009-12)

143. Benedict VIII (1012-24) Opposed by Gregory, antipope (1012)

144. John XIX (1024-32)

145. Benedict IX (1032-45) He appears on this list three separate times, because he was twice deposed and restored

146. Sylvester III (1045)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an antipope

147. Benedict IX (1045)

148. Gregory VI (1045-46)

149. Clement II (1046-47)

150. Benedict IX (1047-48)

151. Damasus II (1048)

152. St. Leo IX (1049-54)

153. Victor II (1055-57)

154. Stephen X (1057-58)

155. Nicholas II (1058-61) Opposed by Benedict X, antipope (1058)

156. Alexander II (1061-73) Opposed by Honorius II, antipope (1061-1072)

157. St. Gregory VII (1073-85) Gregory and the following three popes were opposed by Guibert ("Clement III"), antipope (1080-1100)
158. Blessed Victor III (1086-87)
159. Blessed Urban II (1088-99)
160. Paschal II (1099-1118) Opposed by Theodoric (1100), Aleric (1102) and Maginulf ("Sylvester IV", 1105-1111), antipopes (1100)
161. Gelasius II (1118-19) Opposed by Burdin ("Gregory VIII"), antipope (1118)
162. Callistus II (1119-24)
163. Honorius II (1124-30) Opposed by Celestine II, antipope (1124)
164. Innocent II (1130-43) Opposed by Anacletus II (1130-1138) and Gregory Conti ("Victor IV") (1138), antipopes (1138)
165. Celestine II (1143-44)
166. Lucius II (1144-45)
167. Blessed Eugene III (1145-53)
168. Anastasius IV (1153-54)
169. Adrian IV (1154-59)
170. Alexander III (1159-81) Opposed by Octavius ("Victor IV") (1159-1164), Pascal III (1165-1168), Callistus III (1168-1177) and Innocent III (1178-1180), antipopes
171. Lucius III (1181-85)
172. Urban III (1185-87)
173. Gregory VIII (1187)
174. Clement III (1187-91)
175. Celestine III (1191-98)
176. Innocent III (1198-1216)
177. Honorius III (1216-27)
178. Gregory IX (1227-41)
179. Celestine IV (1241)
180. Innocent IV (1243-54)
181. Alexander IV (1254-61)
182. Urban IV (1261-64)
183. Clement IV (1265-68)
184. Blessed Gregory X (1271-76)
185. Blessed Innocent V (1276)
186. Adrian V (1276)
187. John XXI (1276-77)
188. Nicholas III (1277-80)
189. Martin IV (1281-85)
190. Honorius IV (1285-87)
191. Nicholas IV (1288-92)
192. St. Celestine V (1294)
193. Boniface VIII (1294-1303)

194. Blessed Benedict XI (1303-04)
195. Clement V (1305-14)
196. John XXII (1316-34) Opposed by Nicholas V, antipope (1328-1330)
197. Benedict XII (1334-42)
198. Clement VI (1342-52)
199. Innocent VI (1352-62)
200. Blessed Urban V (1362-70)
201. Gregory XI (1370-78)
202. Urban VI (1378-89) Opposed by Robert of Geneva ("Clement VII"), antipope (1378-1394)
203. Boniface IX (1389-1404) Opposed by Robert of Geneva ("Clement VII") (1378-1394), Pedro de Luna ("Benedict XIII") (1394-1417) and Baldassare Cossa ("John XXIII") (1400-1415), antipopes
204. Innocent VII (1404-06) Opposed by Pedro de Luna ("Benedict XIII") (1394-1417) and Baldassare Cossa ("John XXIII") (1400-1415), antipopes
205. Gregory XII (1406-15) Opposed by Pedro de Luna ("Benedict XIII") (1394-1417), Baldassare Cossa ("John XXIII") (1400-1415), and Pietro Philarghi ("Alexander V") (1409-1410), antipopes
206. Martin V (1417-31)
207. Eugene IV (1431-47) Opposed by Amadeus of Savoy ("Felix V"), antipope (1439-1449)
208. Nicholas V (1447-55)
209. Callistus III (1455-58)
210. Pius II (1458-64)
211. Paul II (1464-71)
212. Sixtus IV (1471-84)
213. Innocent VIII (1484-92)
214. Alexander VI (1492-1503)
215. Pius III (1503)
216. Julius II (1503-13)
217. Leo X (1513-21)
218. Adrian VI (1522-23)
219. Clement VII (1523-34)
220. Paul III (1534-49)
221. Julius III (1550-55)
222. Marcellus II (1555)
223. Paul IV (1555-59)
224. Pius IV (1559-65)
225. St. Pius V (1566-72)
226. Gregory XIII (1572-85)
227. Sixtus V (1585-90)
228. Urban VII (1590)
229. Gregory XIV (1590-91)
230. Innocent IX (1591)
231. Clement VIII (1592-1605)

232. Leo XI (1605)
233. Paul V (1605-21)
234. Gregory XV (1621-23)
235. Urban VIII (1623-44)
236. Innocent X (1644-55)
237. Alexander VII (1655-67)
238. Clement IX (1667-69)
239. Clement X (1670-76)
240. Blessed Innocent XI (1676-89)
241. Alexander VIII (1689-91)
242. Innocent XII (1691-1700)
243. Clement XI (1700-21)
244. Innocent XIII (1721-24)
245. Benedict XIII (1724-30)
246. Clement XII (1730-40)
247. Benedict XIV (1740-58)
248. Clement XIII (1758-69)
249. Clement XIV (1769-74)
250. Pius VI (1775-99)
251. Pius VII (1800-23)
252. Leo XII (1823-29)
253. Pius VIII (1829-30)
254. Gregory XVI (1831-46)
255. Blessed Pius IX (1846-78)
256. Leo XIII (1878-1903)
257. St. Pius X (1903-14)
258. Benedict XV (1914-22) Biographies of Benedict XV and his successors will be added at a later date
259. Pius XI (1922-39)
260. Pius XII (1939-58)
261. St. John XXIII (1958-63)
262. Paul VI (1963-78)
263. John Paul I (1978)
264. St. John Paul II (1978-2005)
265. Benedict XVI (2005-2013)
266. Francis (2013—)

==========

==========

==========

译者附录

历代法国统治者列表

（来源：https://www.sport-histoire.fr/en/History/List_of_Kings_of_France.php）

Merovingian dynasty (447-751)

447-458: Merovech

458-481: Childeric I

481-511: Clovis I

558-562: Chlothar I

562-566: Caribert

566-584: Chilperic I

584-628: Chlothar II

628-637: Dagobert I

637-655: Clovis II

655-668: Chlothar III

668-674: Childeric II

674-691: Theuderic III

691-695: Clovis III

695-711: Childebert II

711-716: Dagobert III

716-721: Chilperic II

721-737: Theuderic IV

743-751: Childeric III, deposed by Pepin the Younger

Carolingian dynasty (751-987)

751-768: Pepin the Younger

768-814: Charlemagne

814-840: Louis I the Pious

840-877: Charles II the Bald

877-879: Louis II the Stammerer

879-882: Louis III, with his brother Carloman.

879-884: Carloman, with his brother Louis III.

884-888: Charles II the Fat

888-898: Odo of Paris

898-929: Charles III the Simple

922-923: Robert I

923-936: Rudolph

936-954: Louis IV of Outremer

954-986: Lothair

986-987: Louis V the Lazy

Capetian dynasty (987-1328)

987-996: Hugh Capet

996-1031: Robert II the Pious

1031-1060: Henry I

1060-1108: Philip I

1108-1137: Louis VI the Fat

1137-1180: Louis VII the Young

1180-1223: Philip II Augustus

1223-1226: Louis VIII the Lion

1226-1270: Louis IX the Saint

1270-1285: Philip III the Bold

1285-1314: Philip IV the Fair

1314-1316: Louis X the Quarreller

1316-1316: John I the Posthumous

1317-1322: Philip V the Tall

1322-1328: Charles IV the Fair

House of Valois (1328-1589)

1328-1350: Philip VI

1350-1364: John II

1364-1380: Charles V

1380-1422: Charles VI

1422-1461: Charles VII

1461-1483: Louis XI

1483-1498: Charles VIII

1498-1515: Louis XII

1515-1547: Francis I

1547-1559: Henry II

1559-1560: Francis II

1560-1574: Charles IX

1574-1589: Henry III

House of Bourbon (1589-1792 and 1814-1830)

1589-1610: Henry IV

1610-1643: Louis XIII

1643-1715: Louis XIV

1715-1774: Louis XV

1774-1792: Louis XVI

1814-1824: Louis XVIII

1824-1830: Charles X

First Republic (1792-1799)

1792-1799: Several kind of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 the Directory)

French Consulate (1799-1804)

1799-1804: Napoleon Bonaparte

First Empire (1804-1815)

1804-1815: Napoleon I

July Monarchy - House of Orleans (1830-1848)

1830-1848: Louis-Philippe I

Second Republic (1848-1852)

1848-1852: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1852-1870: Napoleon III

Third Republic (1870-1940)

1871-1873: Adolphe Thiers

1873-1879: Patrice de Mac-Mahon

1879-1887: Jules Grévy

1887-1894: Sadi Carnot

1894-1895: Casimir Perier

1895-1899: Félix Faure

1899-1906: Emile Loubet

1906-1913: Armand Fallières

1913-1920: Raymond Poincaré

1920 -1920 (8 months): Paul Deschanel

1920-1924: Alexandre Millerand

1924-1931: Gaston Doumergue

1931-1932: Paul Doumer

1932-1940: Albert Lebrun

French State (1940-1944)

1940-1944: Philippe Péta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44-1947)

Juin 1944-Janvier 1946: Charles de Gaulle

Janvier 1946-Juin 1946: Félix Gouin

Juin 1946-Décembre 1946: Georges Bidault

Décembre 1946-Janvier 1947: Léon Blum

Fourth Republic (1947-1958)

1947-1954: Vincent Auriol

1954-1958: René Coty

Fifth Republic (1958-now)

1958-1969: Charles de Gaulle

1969-1974: Georges Pompidou

1974-1981: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1981-1995: François Mitterrand

1995-2007: Jacques Chirac

2007-2012: Nicolas Sarkozy

2012-2017: François Hollande

Since 2017: Emmanuel Macron

==========

==========

==========

译者附录

历代英国统治者列表（来源：https://www.britroyals.com/rulers.asp）

Kings of England

Dates	Ruler
757-796	Offa
802-839	Egbert
839-856	Aethelwulf
856-860	Aethelbald
860-866	Aethelbert
866-871	Aethelred I
871-899	Alfred the Great
899-924	Edward the Elder
924-939	Athelstan
939-946	Edmund
946-955	Edred
955-959	Edwy
959-975	Edgar
975-978	Edward the Martyr
978-1016	Aethelred II the Unready
1016	Edmund Ironside
1016-1035	Cnut (Canute)
1035-1040	Harold I Harefoot
1040-1042	Harthacanut
1042-1066	Edward the Confessor
1066	Harold II
1066-1087	William I
1087-1100	William II
1100-1135	Henry I
1135-1154	Stephen
1154-1189	Henry II
1189-1199	Richard I
1199-1216	John
1216-1272	Henry III

Kings and Rulers of Wales

Dates	Ruler
825-844	Merfyn Frych (Merfyn the Freckled)
844-878	Rhodri Mawr (Rhodri the Great)
878-916	Anarawd ap Rhodri
916-942	Idwal Foel (Idwahl the bald)
942-950	Hywel Dda ap Cadell (Hywel the Good)
950-974	Iago ab Idwal

Dates	Ruler
974-985	Hywel ab Ieuaf (Hywel the bad)
985-986	Cadwallon ab Ieuaf
999-1005	Maredudd ap Owain
1005-1018	Aeddan ap Blegywryd
1018-1023	Llywelyn ap Seisyll
1039-1063	Gruffydd ap Llywelyn
1081-1137	Gruffydd ap Cynan
1135-1137	Gruffydd ap Rhys
1137-1170	Owain Gwynedd ap Gruffydd
1170-1194	Dafydd and Rhodri ap Owain
1194-1240	Llywelyn ap Iorwerth (Llywelyn the Great)
1240-1246	Dafydd ap Llywelyn
1246-1282	Llywelyn ap Gruffydd (Llywelyn the Last)

Kings and Queens of Scotland

Dates	Ruler
843-858	Kenneth MacAlpin
858-862	Donald I
862-877	Constantine I
877-878	Aedh
878-889	Eochaid
889-900	Donald II
900-943	Constantine II
943-954	Malcolm I
954-962	Indulf
962-966	Dubh
966-971	Culen
971-995	Kenneth II
995-997	Constantine III
997-1005	Kenneth III
1005-1034	Malcolm II
1034-1040	Duncan I
1040-1057	Macbeth
1057-1058	Lulach (The Fool)
1058-1093	Malcolm III Canmore
1093-1094	Donald III (Donald Bane)
1094	Duncan II
1094-1097	Donald III (Donald Bane)
1097-1107	Edgar
1107-1124	Alexander I
1124-1153	David I
1153-1165	Malcolm IV
1165-1214	William I
1214-1249	Alexander II
1249-1286	Alexander III
1286-1290	Margaret ('Maid of Norway')
1290-1292	Interregnum
1292-1296	John Balliol
1296-1306	Interregnum
1306-1329	Robert I (The Bruce)
1329-1371	David II
Aug-Dec 1332	Edward Balliol (also for periods 1333-1346)
1371-1390	Robert II

Dates	Ruler
1390-1406	Robert III
1406-1437	James I
1437-1460	James II
1460-1488	James III
1488-1513	James IV
1513-1542	James V
1542-1567	Mary, Queen of Scots
1567-1625	James VI (James I of England 1603-1625)

Kings & Queens of England and Wales

Dates	Ruler
1272-1307	Edward I
1307-1327	Edward II
1327-1377	Edward III
1377-1399	Richard II
1399-1413	Henry IV
1413-1422	Henry V
1422-1461	Henry VI
1461-1483	Edward IV
1483	Edward V
1483-1485	Richard III
1485-1509	Henry VII

Kings & Queens of England, Wales and Ireland

Dates	Ruler
1509-1547	Henry VIII
1547-1553	Edward VI
1553-1558	Mary I
1558-1603	Elizabeth I

Kings & Queens of England, Wales, Scotland and Ireland

Dates	Ruler
1603-1625	James I (King of Scotland as James VI 1567-1625)
1625-1649	Charles I
1649-1653	Commonwealth
1653-1658	Oliver Cromwell (Lord Protector)
1658-1659	Richard Cromwell (Lord Protector)
1660-1685	Charles II
1685-1688	James II
1689-1694	William III of Orange and Mary II (jointly)
1694-1702	William III (alone)

Monarch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ates	Ruler
1702-1714	Anne
1714-1727	George I
1727-1760	George II

Dates	Ruler
1760-1820	George III (Elector, 1760-1815, and King,1815-20, of Hanover)
1820-1830	George IV
1830-1837	William IV (King of Hanover 1830-7)
1837-1901	Victoria (Empress of India 1876-1901)
1901-1910	Edward VII
1910-1936	George V
1936	Edward VIII
1936-1952	George VI
1952-2022	Elizabeth II
2022-	Charles III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

==========

==========

译者附录

历代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列表

（来源：https://www.behindthename.com/namesakes/list/german-rulers/chrono）

Name	Years	Other Names
Karl I the Great	800-814	(Charlemagne)
Ludwig I the Pious	813-840	(Louis)
Lothar I	817-855	(Lothair)
Ludwig II the Younger	844-875	
Karl II the Bald	875-877	(Charles)
Karl III the Fat	876-887	(Charles)
Arnulf of Carinthia	887-899	
Ludwig III the Child	900-911	(Louis)
Konrad I of Franconia	911-918	(Conrad)
Heinrich I the Fowler	919-936	(Henry)
Otto I the Great	936-973	
Otto II the Red	961-983	
Otto III	983-1002	
Heinrich II	1002-1024	(Henry)
Konrad II	1024-1039	(Conrad)
Heinrich III	1028-1056	(Henry)
Heinrich IV	1054-1105	(Henry)
Heinrich V	1099-1125	(Henry)
Lothar III of Saxony	1125-1137	(Lothair)
Konrad III	1138-1152	(Conrad)
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52-1190	(Frederick)
Heinrich VI	1169-1197	(Henry)
Philipp of Swabia	1198-1208	(Philip)
Otto IV	1198-1215	

Friedrich II	1212-1250	(Frederick)
Konrad IV	1237-1254	(Conrad)
William of Holland	1247-1256	
Richard of Cornwall	1257-1272	
Alfonso of Castile	1257-1273	
Rudolf I	1273-1291	(Rudolph)
Adolf of Nassau	1292-1298	(Adolph)
Albrecht I	1298-1308	(Albert)
Heinrich VII	1308-1313	(Henry)
Ludwig IV	1314-1347	(Louis)
Karl IV	1346-1378	(Charles)
Wenzel	1376-1400	(Wenceslas, Wenceslaus)
Ruprecht	1400-1410	(Rupert)
Sigismund	1410-1437	
Albrecht II the Magnanimous	1438-1439	(Albert)
Friedrich III the Peaceful	1440-1493	(Frederick)
Maximilian I	1486-1519	
Karl V	1519-1556	(Charles)
Ferdinand I	1531-1564	
Maximilian II	1562-1576	
Rudolf II	1575-1612	(Rudolph)
Matthias	1612-1619	
Ferdinand II	1619-1637	
Ferdinand III	1636-1657	
Leopold I	1658-1705	
Joseph I	1690-1711	
Karl VI	1711-1740	(Charles)
Karl VII Albrecht	1742-1745	(Charles, Albert)
Franz I	1745-1765	(Francis)
Joseph II	1764-1790	
Leopold II	1790-1792	
Franz II	1792-1806	(Francis)